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

清末教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全编
+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

清 末 教 案

第 四 册

法文资料选译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 合编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末教案：法文资料选译/耿昇，杨佩纯译。—北京：
中华书局，200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

ISBN 7-101-01581-6

I. 清… II. ①耿…②杨… III. 教案(历史)-清代
-1736~1840-史料 IV. K249.3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6) 第 17482 号

清 末 教 案

第 四 册

法文资料选译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发 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朝阳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9 印张·429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38.00 元

ISBN 7—101—01581—6/K·695

第四册目录

一、法国外交文书

法国外交部有关中国教案的外交文书

- 第 29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施阿兰致外交部长阿诺托
 (1)
- 第 44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施阿兰致外交部长阿诺托
 (3)
- 第 45 号 外交部长阿诺托致法国驻北京公使施阿兰
 (3)
- 第 46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施阿兰致外交部长阿诺托
 (4)
- 第 49 号 法国驻龙州领事方苏雅致外交部长阿诺托
 (6)
- 第 54 号 法国驻北京临时代办吕班致外交部长阿诺托
 (6)
- 第 55 号 法国驻北京临时代办吕班致外交部长阿诺托
 (7)
- 第 56 号 法国驻北京临时代办吕班致外交部长阿诺托
 (7)

- 第57号 法国驻龙州领事馆临时代办祁理恒致
外交部长阿诺托…………… (8)
- 第60号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白藻泰致外交部长阿诺托
…………… (8)
- 第64号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白藻泰致外交部长阿诺托
…………… (9)
- 第68号 法国驻龙州领事祁理恒致外交部长阿诺托
…………… (10)
- 第69号 外交部长阿诺托致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
…………… (10)
- 第70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阿诺托
…………… (10)
- 第72号 外交部长阿诺托致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
…………… (11)
- 第74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馆毕盛致外交部长阿诺托
…………… (11)
- 第77号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白藻泰致外交部长阿诺托
…………… (11)

法国外交部外交文书中有关四川传教区一次赔偿案的谈判

(毕方济被拘禁案)

- 第50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 (12)
- 第51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
…………… (12)
- 第52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 (13)

-
- 第 53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
..... (13)
- 第 54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 (13)
- 第 55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 (13)
- 第 56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 (16)
- 第 57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
..... (17)
- 第 58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 (17)
- 第 59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
..... (17)
- 第 60 号 法国驻重庆领事哈士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 (18)
- 第 61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重庆领事哈士
..... (18)
- 第 62 号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白藻泰致外交部长
德尔卡塞 (18)
- 第 63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重庆领事哈士
..... (19)
- 第 64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 (19)
- 第 65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
..... (19)

- 第 66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 (20)
- 第 67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 (20)
- 第 68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 (20)
- 第 69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 (20)

有关广东传教区一次赔偿案的谈判(仲德辉神父被杀案)

- 第 70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 (21)
- 第 71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
..... (22)
- 第 72 号 法国驻广州代理领事福理业致外交部长
德尔卡塞 (22)
- 第 73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教廷大使普伯尔
..... (23)
- 第 74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
..... (23)
- 第 75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 (23)
- 第 76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
..... (24)
- 第 77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教廷大使普伯尔
..... (24)

第78号 法国驻广州领事馆代理领事福理业致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25)
第79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26)
第80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	(26)
第81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26)
第82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27)
有关湖北省比利时传教区的一项赔款案的谈判 (董若望神父被杀案)	
第83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	(27)
第85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德尔卡塞	(27)
第86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28)
第87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28)
第88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28)
第89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	(28)
第90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28)

- 第 91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布鲁塞尔
公使热拉尔 (30)
- 第 92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罗马教廷
公使尼撒尔 (30)
- 第 93 号 法国驻布鲁塞尔公使热拉尔致外交部长
德尔卡塞 (31)
- 第 94 号 法国驻教廷大使尼撒尔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 (31)
- 第 95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 (31)
- 第 96 号 法国驻中国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 (32)
- 第 97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
..... (33)
- 第 98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布鲁塞尔
公使热拉尔 (34)
- 第 99 号 法国驻布鲁塞尔公使热拉尔致外交部长
德尔卡塞 (34)

二、《传信年鉴》

- 两广传教区宗座监牧明稽埒神父致教廷传信部
枢机们的书简 (35)
- 湖广代理宗座代牧主教方来远神父致教廷传信部
枢机们的书简 (51)
- 云南宗座代牧主教和菲洛迈利亚主教袁绷索致教廷
传信部枢机们的书简 (54)

-
- 陕西宗座代牧主教高一志致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书简
..... (57)
- 一位高级教士致会友的一封信
..... (63)
- 贵州代理宗座监牧佩尔尼致在巴黎和里昂的教廷
传信部枢机们的书简 (65)
- 来自教廷的传教士梅纳尔致外方传教会神学院阿尔布朗
书简的摘录 (73)
- 遣使会传教士罗安当致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书简摘录
..... (94)
- 耶稣会士梅德尔神父致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书简
..... (101)
- 贵州宗座代牧主教胡缚理致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书简
..... (104)
- 入华耶稣会士神父们的几封信简的摘录
..... (109)
- 耶稣会梅德尔神父致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书简
..... (123)
- 阿波罗尼亚主教和贵州宗座代牧主教胡缚理致教廷
传信部枢机们的书简..... (127)
- 外方传教会贵州宗座代牧主教和阿波罗尼亚主教
胡缚理致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书简..... (138)
- 中国西藏宗座代牧区的综合报道
..... (140)
- 中国川东宗座代牧区的综合报道
..... (156)

中国北直隶省的综合报道	(164)
中国两广传教区的综合报道	(174)
中国川东宗座代牧区的综合报道	(185)
中国广东宗座代牧区的综合报道	(193)
中国川东宗座代牧区的综合报道	(198)
外方传教会林神父致贵州宗座代牧主教 胡缚理的书简	(215)
中国传教区的综合报道	(221)
贵州传教区的综合报道	(235)
中国川东传教区的综合报道	(240)
外方传教会川东代理宗座代牧白德立会士致教廷 传信部的欧洲枢机们的书简	(241)
中国山东宗座代牧区顾立爵 1870 年 11 月 20 日的书简	(249)
云南宗座代牧、外方传教会的袁绷索致教廷 传信部枢机们的书简	(252)
中国广西传教区的综合报道	(256)
广西传教区日志摘录	(257)
中国满洲传教区的综合报道	(282)
满洲宗座代牧区的讷依致巴黎外方传教会 神学院院长莫里的书简	(282)

中国川西传教区的巴黎外方传教会洪广化主教致 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书筒摘录.....	(294)
中国川东传教区的消息.....	(302)
巴黎外方传教会川东代理牧监白德立致教廷 传信部枢机们的书筒.....	(302)
中国川东宗座代牧区的综合报道.....	(312)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普罗沃致川东宗座代牧 范若瑟主教的书筒.....	(312)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普罗沃致巴黎外方传教会 神学院诸院长们的书筒.....	(319)
中国西藏传教区的综合报道.....	(326)
中国西藏传教区宗座代牧丁硕卧主教致巴黎外方 传教会神学院院长席鲁的书筒.....	(326)
入藏传教士卡罗致蒙莫特的拉古特的书筒摘录	(329)
西藏宗座代牧丁硕卧主教致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 书筒.....	(333)
中国川西宗座代牧区的综合报道.....	(338)
川西宗座代牧主教洪广化致教廷传信部 枢机们的书筒.....	(338)
传教士顾巴德致罗马外方传教会司库鲁赛的书筒 摘录.....	(344)
中国西藏宗座代牧区的综合报道.....	(348)
西藏宗座代牧丁硕卧主教致教廷传信部 枢机们的书筒.....	(348)
中国江西宗座代牧区的消息.....	(353)

- 江西宗座代牧遣使会士白振铎主教致教廷传信部
 枢机们的书简…………… (353)
- 中国江南宗座代牧区传教士们的综合报道…………… (367)
- 中国川西和川东宗座代牧区的综合报道…………… (383)
- 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川东宗座代牧白德立致
 莫南(里昂教区)的副本堂神父克拉维鲁的书简
 (附蓝德银书简的摘录)…………… (397)
- 中国云南宗座代牧袁绷索主教致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
 书简…………… (412)
- 博利瑙的主教和满洲宗座代牧杜伯勒主教致巴黎外方
 传教会神学院院长安布拉斯特的书简…………… (424)
- 广东宗座代牧助理邵斯致巴黎外方传教会
 神学院院长们的书简…………… (429)
- 中国满洲宗座代牧区的呼兰教案——一名传教士
 所遭受到的虐待…………… (434)
- 中国云南宗座代牧、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古分类主教致
 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书简…………… (442)
- 中国教案的综合报道…………… (446)
- 卡普斯的主教、广东助理主教邵斯致巴黎外方
 传教会神学院的长上和院长们的书简…………… (446)
- 波勒米的主教、川西宗座代牧洪广化致巴黎外方
 传教会神院长上和院长们的书简…………… (450)
- 中国交州传教区的综合报道…………… (451)
- 浙江宗座代牧赵保禄致巴黎外方传教会
 总会长菲亚特的书简…………… (452)
- 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贵州传教士罗伯恩的书简 …… (459)

-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沙海雷会士致云南宗座代牧
古分类主教的书简…………… (463)
- 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云南宗座代牧古分类一封书简的
摘录…………… (467)
- 远东传教区的最新消息…………… (468)
- 交趾支那北部宗座代牧卡斯帕尔致巴黎外方
传教会神学院院长们的书简(附克罗赛书简的
摘录)…………… (468)
- 中国川东宗座代牧区的综合报道…………… (470)
- 川东传教士孟神父致其修女们的书简…………… (471)
- 广东宗座代牧区的综合报道…………… (489)
- 巴黎外方传教会赴广东的会士弗雷罗的书简…………… (490)
- 望教者和殉教者…………… (500)
- 巴黎外方传教会赴川南传教区的传教士李锡尔的
书简…………… (501)
- 中国广东传教区的最新消息…………… (507)
- 来自教廷的传教士勒·达朗迪埃致广东代理
主教邵斯的书简…………… (508)
- 中国川南宗座代牧区的综合报道…………… (514)
- 川南宗座代牧沙得容主教致圣—加尔米埃(里昂教
区)的本堂神父塞翁修道院长的书简…………… (515)
- 中国广西宗座代牧区的综合报道…………… (524)
- 广西宗座代牧区的传教士赖神父致巴黎外方传
教会的德尔佩斯会长的书简…………… (524)
- 斯泰尔的两名传教士在华被杀…………… (528)
- 鲁南传教区宗座代牧福若瑟神父的书简…………… (528)

- 斯泰尔神学院院长让松神父的书简…………… (530)
- 中国的教案——苏安宁被杀案…………… (531)
- 司立修报告苏安宁与数名基督徒于4月21日
 被杀情况…………… (531)
- 苏安宁会士被杀和广西基督徒们遭受的苦难…… (531)
- 广西宗座代牧司立修主教的书简…………… (532)
- 中国广东宗座代牧区的综合报道(伸德辉会士
与13名基督徒被杀案)…………… (536)
- 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广东宗座代牧区邵斯主教的
 书简…………… (537)
- 中国鄂南宗座代牧区的报道…………… (543)
- 帕利多尔和卡西安神父对董若望神父被杀案
 所作的记述…………… (543)
- 中国广东宗座代牧区的综合报道…………… (547)
- 巴黎外方传教会广东宗座代牧区邵斯主教的书简
 …………… (548)
- 中国广东宗座代牧区的综合报道…………… (553)
- 广东传教士纪尧姆神父致巴黎外方传教会
 修道院长德尔佩斯的书简…………… (553)
- 中国北直隶樊国梁主教的书简…………… (557)
- 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 (564)
- 中国闽北宗座代牧区的最新消息…………… (565)
- 闽北宗座代牧玛索的书简 成功与困难——主教的
 巡视…………… (566)
- 在华殉教者的名册…………… (570)
- 北满宗座代牧蓝绿叶致外方传教会神学院院长

德尔佩斯的书简.....	(570)
南满巴黎外方传教会会长舒莱致辛纳的书简.....	(572)
直隶东南部张家庄住院的会长、耶稣会士谢内沙 神父致亚眠耶稣会士省会长神父的书简.....	(574)
汉口方济各会士司库比科利神父致波特伦的书简	(576)
圣母圣心会修道院长贺歌南神父的书简.....	(578)
中国北京的教案.....	(579)
有关湘南范怀德主教被杀的详细情节.....	(582)
译后记	(587)

一、法国外交文书

法国外交部有关中国教案的外交文书^①

DOCUMENTS DIPLOMATIQUES(CHINE)

1894—1899,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第 29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施阿兰致外交部长阿诺托

1896 年 7 月 15 日于北京

我前不久曾向阁下禀报说,我们赴贵州的传教士们在获准使那些被非法监禁的基督徒们获释之后,本来曾指望看到遵义、湄潭城以及其它地方能尽快向他们重新开放,他们于 10 年之前被以暴力从那里驱逐了出来。我今天非常欣慰地向阁下报告说,贵州传教区最终获准重新进驻了它过去曾被驱逐出来的那些城市和设施,并且还得到了它本应得到的赔偿。

1896 年 1 月 18 日,我通过致总理衙门的一封电报,要求以一

^① 该部分译自法国《外交文书·中国》,1894—1898 年,1898 年版。——译者。

项协议来全面解决贵州的所有教案,协议中要包括对传教区所遭受的暴力、虐待和破坏进行赔偿,传教士们要返回他们被非法地驱逐出的遵义、黄平、余庆县、开州和湄潭城。我还曾补充说,我将亲自为宗座代牧主教易德谦(Guichard)主教送去为使其传教士们重返上述城市而必须的指示。总理衙门清楚地知道这一切必须兑现。根据从北京传去的命令,共有三名代表(其中包括藩司文海在内)负责与传教区的副主教文瑟纳(Gréa)教士保持接触并进行谈判。

我通过2月25日的另一封新电报,敦促总理衙门加快谈判进程。3月30日,宗座代牧主教从贵阳致电给我说,谈判很有可能会获得成功。

4月30日,易德谦主教大人通过发自贵阳的一封新电报告知我说,文瑟纳教士就在同一天签署了一项有关最终解决的协议。7月8日,4月30日所签署的协议的副本和译本连同主教大人的一封书简最终传到了我的手中。根据这项共分六款的协议,作为自1883年以来所遭受的损失和破坏的赔偿,贵州天主教传教区共获得一笔总额为3万两(12万法郎)的赔款;传教士重返遵义、黄平、余庆县、开州、湄潭城,它在那里重建了已遭破坏的住院,在最近几次教案中受到牵连的人均被捕并依法受到了惩处。

通过5月18日的一封书简,易德谦主教大人用最慷慨激昂的辞句,对顺利解决这场旷日持久和痛苦的官司,向我表达了谢意。

我保留督察总理衙门执行在贵阳的代表与传教区之间所达成的这项协议以及批准协议的权力。

此外,我还叮嘱贵阳宗座代牧要注意与当局和民众维持最好的关系,以使该省的宗教和解能持久,传教区能在充分的安全中从事其宗教信仰、慈善和爱国的事业。

施阿兰(Gérard)

第 44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施阿兰致外交部长阿诺托

1897 年 3 月 18 日于巴黎

法国驻重庆的领事哈士(Haas)于本月 16 日致电并通报我说,由于我的反复敦促和根据来自北京的紧急命令,最终由四川总督的代表嵇志文和我们的传教士们之间在打箭炉签署了一份最终协议,以重建我们在西藏东部边界的巴塘、亚海贡和盐井的传教区。现已达成协议,嵇志文代表首先前往巴塘、亚海贡和盐井,以为传教士们的返回作准备,而我们的传教士们自己将于 4 月 29 日出发,以重新占据他们在十年前被暴力驱逐的三个住院。

我今天又致信总理衙门,以通知中国的大臣们说,我们首先将派遣穆文琦(Morisse)先生和稍后再派遣德托美(Dautremer)先生赴重庆,我在这样做时并未放弃以最坚定的方式进行强调的机会,指出我们传教士在上述地点恢复活动一事不能再往后拖延了。

施阿兰

第 45 号 外交部长阿诺托致法国驻北京公使施阿兰

1897 年 4 月 16 日于巴黎

法兰西共和国驻龙州领事致电子我说,刚刚于广西爆发了一些严重的动乱。一名传教士已被杀,两名受到了威胁,由里昂商会派遣的考察团成员正处于危险之中。您应该断然地提出要求,让那些本应作出干预却似乎不准备介入的地方官吏们下达命令。请您与我们的领事保持联系,您在就有关可能会给予我们的赔礼和赔款问题上,与总理衙门打交道时,应保持极大的谨慎。

阿诺托(G·Hanotaux)

第 46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施阿兰致外交部长阿诺托

1897 年 4 月 22 日于北京

阁下于本月 16 日向我指出,根据共和国驻龙州领事向您转报的消息来看,前不久在广西西北部的百色和镇安府之间的地区爆发了严重动乱。您指示我协同总理衙门,紧急采取平乱和保护的必要措施。

广西的宗座代牧司立修(Chouzy)主教大人 4 月 7 日从贵县发出了一封拉丁文电报,我仅仅于 12 日才收到。他通过这封电报向我报告了传教士邓玉函(Mnzal)被谋杀一事,此人是在百色地区被暴徒们杀害的。我于第二天(4 月 13 日)便去拜访总理衙门,请中国的大臣们立即向广西布政使下达紧急命令,以逮捕和迅速惩罚杀人凶手。

阁下的电报和法国驻龙州领事方苏雅(Françis)先生于 15 日发出的电报,我于 17 日在北京都收到了。这两封电报向我通报说,广西正在成为一场动乱的舞台,有两名教徒受到了威胁。里昂商会考察团成员正经百色前往龙州,他们都处于危险之中。就在同一天——4 月 17 日,我向总理衙门发出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除了要求毫不拖延地处决杀害邓玉函神父的凶手外,还要求派遣军队去恢复秩序并解救我们的同胞,同时也保留提出我认为应该要求的赔款和赔礼的权力。

李鸿章于 17 日晚上派人转告我说,我要求颁发的命令已经下达给总督和布政使,而总理衙门将保证执行即将采取的保护措施。

20 日,我在收到方苏雅先生一封新的电报后,便立即前往总理衙门,以提醒李鸿章注意形势该是多么严重。面对广西布政使的动作缓慢和该省军队的不足,我必须坚持让中央政府全力以赴地

进行干预,局势要求必须这样做。我还补充说,如果中国政府不能确保在一个与我们的边境^①相毗邻的省分恢复秩序,那么我将被迫向共和国政府揭示这场危机所涉及到的全部广度和深度。李鸿章向我保证,最严厉的命令已经下达给我并将继续下达给广州与桂林。但他无法向我提供有关动乱起因和我们同胞命运的任何具体情节。

次日清晨,也就是4月21日,当我入宫接受皇帝的召对时,我对诸王公和李鸿章说,我时刻关心着准确地获知他们可能从广西收到的消息以及向总督和布政使下达的命令。我当时获知,通过当天上午发布的一道命令,被认为犯有渎职罪的广西布政使成了皇帝一次严厉指责的对象,他通过电报接到了命令,要向动乱现场派遣为确保平乱和保护所必需的军队。李鸿章告诉我说,圣旨是以最严厉的辞句写成的。

方苏雅先生通过我今天上午(19日)才收到的一封电报向我报告说,里昂商会考察团的成员们现在都安然无恙。考察团长布勒尼耶(Brenier)先生在他2月25日发自云南府并于今天才寄到我这里来的一封信中写道,他与德布雷纳(Deblenne)博士以及译员达梅(Damée)准备从云南府到达百色,途经黄草坝和跛脚,也就是要经过贵州西南部。他在贵州、云南和广西三省交界处遭土匪袭击而耽延了行程。我希望我们的同胞们今天仍能有幸安然无恙。北京政府采取的措施能有幸成功地使他们摆脱困境并使他们完全处于安全中。此外,我也未向中国的大臣们掩饰帝国政府的责任该是多么重大!如果在共和国政府和公使馆为使里昂考察团持有护照以及高度审慎的推荐信而作出了所有这些关照之后,仍对我们同

① 可能指法属印度支那。——译者。

胞的自由或生命造成伤害,那么为抵罪他们该遭到多么严厉的惩罚啊!

施阿兰

第 49 号 法国驻龙州领事方苏雅致外交部长阿诺托

1897 年 5 月 4 日于龙州

我最终成功地抓获了杀死邓玉函会士的主要头目、四名小头目和几乎整个骚乱集团,并立即把他们处死了。

方苏雅

第 54 号 法国驻北京临时代办吕班致外交部长阿诺托

1897 年 9 月 12 日于北京

我非常感谢阁下给我转来了一封书简,共和国驻教廷大使通过此信向您表达了谢意,因为法国在远东为支持天主教传教区而从事的活动惹起了教廷红衣主教枢机的不满。表达这种谢意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我并不相信,我们的保教权在任何时候都如同在中国那样被稳固地确立,或者是具有那样有效的成果。

有人从汉口致信给我说,那里整个地区都很平静,甚至在河南的情况也如此。我在数周前曾害怕,当传教士们返回巴塘时会于西藏煽动起动乱。应倪德隆(Giraudeau)主教阁下的请求,我要求总理衙门进行干预。它积极地作出了干预,从而使得退还教产问题得以迅速结案,甚至使主教也感到满意。在满洲,某些没有多大分量的困难已经被克服。在蒙古,使由比利时传教区购置的蒙古田产的地主证合法化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

唯有三件教案仍留作悬案而未决:邓玉函神父被杀案、广东传教区 1884—1885 年所受损失案、将广西遣使会传教士过去在南昌

拥有的地产归还给该传教区案等。

我希望能使这些教案获得一种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

吕 班(G·Dubail)

第 55 号 法国驻北京临时代办吕班致外交部长阿诺托

1897 年 12 月 17 日于北京

早在很长时间以前,中蒙古副本堂神父教区的比利时传教士们,就在坚持不懈地解决由他们向正黄旗蒙古人购置大片地产的问题。施阿兰先生曾多次寻求解决这一教案,我同样也催促总理衙门对此结案。总理衙门现已答应我解决这一案例,我刚不久通过省会长刘拯灵(Goisset)教士的一封书简获知,该传教区已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吕 班

第 56 号 法国驻北京临时代办吕班致外交部长阿诺托

1897 年 12 月 31 日于北京

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抗争之后,我获得了 15000 两的赔款,我本是由于邓玉函神父的被杀而欠下我们的赔偿之补充而索求这笔赔款的。这笔款项应该被毫不迟疑地交到法国驻龙州领事的手中。

这样一来,在这一不幸事件问题上进行的谈判便宣告结束了。我们对于所获得的赔偿应该表示满足了。广西布政使和武官们均遭到了惩罚,杀害我们同胞的凶手已被处斩,某些次要的事件已经获得了解决,最后是我们索求的赔款已经全额支付。

吕 班

第 57 号 法国驻龙州领事馆临时代办祁理恒致外交部长阿诺托

1898 年 1 月 13 日于龙州

作为因杀害邓玉函神父而索取的赔偿,一笔 15000 两的款项,已于今天由中国当局支付给我们领事馆。

祁理恒(Guilien)

第 60 号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白藻泰致外交部长阿诺托

1898 年 3 月 11 日于上海

天主教传教区的地位至今未能在江西在令人满意的基础上得到确立。我们仍在等待这些困难的最终解决,它们在 1865 年左右导致了我国人员被从该省的省府南昌驱逐出去了。由罗淑亚(de Rochechuart)先生于 1870 年亲自尝试所作出的个人活动未能产生任何实际效果。我多次提出的强烈抗议也仅仅产生了某些事倍功半的效果。所以,我才毫不感到惊讶地获悉,这些动乱近来具有一种特别严重的性质了。

继赣北代理主教樊体爱(Fatiguet)先生 2 月 26 和 28 日的两封电报之后,紧接着又是一封包括着详细资料的书简。它们使我获悉,上个星期于二坊(丰城县),某些匪帮追捕基督徒,杀伤了其中的一大部分并杀死了数人。传教士们的设施及其人身安全都面临着严重危险。在南昌,我现在掌握其煽动民众反对基督徒内容的揭帖,它们被张贴在城市墙上。

从樊体爱提出第一次警告时起,我便向江西布政使发去一封电报,要求他下令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传教区和惩罚暴乱者们。布政使通过同一条渠道回答说,他将采取必要措施。我密切注视着他是否恪守诺言。此外,我曾认为,一旦我获知了这些事件的具体情

节,便应该向布政使发去一封正式公函,以此敦促他立即结束现在愈加激化的动乱。

我另外还通过电报提醒共和国驻北京的外交代表要密切注意这些事件并提示他必须立即采取的措施以与该省当局联系,吕班先生自己也向总理衙门作出了强烈反应。我建议要高度的警惕注视这一事件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消除危及我国侨民安全的动乱。

我认为,这一问题的关键也就是我们应该全力以赴进行解决的一点,就是使天主教传教区返回南昌城内并归还 1865 年没收的地盘。这种措施可能会在该地的居民中产生一种巨大影响。我经共和国驻北京代表的同意才决定派遣代理领事高乐待(Claudet)先生赴南昌,以便在布政使的协助下就地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不怀疑这次旅行定会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

白藻泰(de Bezaure)

第 64 号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白藻泰致外交部长阿诺托

1898 年 4 月 2 日于上海

我于今年 3 月 11 日的信件向阁下通报了近期在江西省发生的动乱,以及我为了确保平息动乱而立即采取的措施。我于今天通过天主教传教区代理主教樊体爱神父的一封书简而高兴地获知,我致布政使的电报产生了一种实实在在的效果。这名官吏确实刚刚派遣四艘炮舰进入了动乱地点,并且奉丰城当局的命令而平息二坊的暴动。

这并非是已经取得的唯一的成功。南昌知府近期曾去会见过那位天主教传教士,以与他谈判在城内重建我们的宗教设施问题,而法国的慈善机构在 35 年前就被从那里驱逐出去了。

总而言之,我认为江西的教案正在解决之中,我很快就会向阁下报告其最终解决的消息。

白藻泰

第 68 号 法国驻龙州领事祁理恒致外交部长阿诺托

1898 年 4 月 28 日于龙州

我收到了广州布政使的一封电报,获知该省的传教士苏安宁(Berthollet)神父以及两名土著天主教徒不久前被杀。我已要求立即作出赔偿。

祁理恒

第 69 号 外交部长阿诺托致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

1898 年 4 月 28 日于巴黎

我收到了法国驻龙州领事的一封电报,获悉广西传教士苏安宁神父已被杀。请立即要求儆戒性地惩罚罪犯并采取保护传教区的措施。您一定要保留我们提出赔偿的权力。一旦当您为我确定凶杀的情节、广西省出现的动乱可能会对我们利益造成其他后果之后,我们将提出我们自己的要求。

阿诺托

第 70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阿诺托

1898 年 5 月 1 日于北京

我已经完成了您在电报中指示应采取的措施。总理衙门向我保证,它已下达了严格的命令以惩罚罪犯,并请我向您通报这一切。我已经在考虑我们的索赔要求了。

毕 盛(S·Pichon)

第 72 号 外交部长阿诺托致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

1898 年 5 月 3 日于巴黎

我为苏安宁神父的被杀提出了如下赔偿要求：一、处决罪犯和惩罚应对此负责的当局官吏；二、割让一块地盘以为广西建一座小教堂及其所必须的住宅楼；三、赔偿一笔 10 万法郎的款项，用于为上述建筑提供资金并赔偿原建筑的产权所有者。

阿诺托

第 74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阿诺托

1898 年 5 月 28 日于北京

我刚刚收到了总理衙门的一封信。从此信来看，我们为苏安宁神父被杀而提出的所有索赔要求（其中包括在广西建一座小教堂），都同意我们了。

毕 盛

第 77 号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白藻泰致外交部长阿诺托

1898 年 6 月 11 日于上海

江西教案处理协议已经签署。

白藻泰

法国外交部外交文书中有关四川传教区一次 赔偿案的谈判(毕方济被拘禁案)

第 50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1898 年 8 月 4 日于北京

我们驻重庆的领事向我报告了荣昌两名传教士已被捕。其中之一已逃脱,却又受了伤,重庆的教堂已遭抢劫和摧毁。

虽然总理衙门企图否认,但其中的一名传教士仍遭囚禁。该传教士已落入到一名十多年之前就被判处死刑的反叛头目的手中。当局声称准备为制服该头目而采取行动。但他们又补充说,该传教士的生命面临很大危险,很可能会爆发新的动乱。

总理衙门向我提出了一种处理意见,根据这种安排,暴乱头目由乡绅们保证归降,该传教士便会立即被释放,其它的条件将明确地留给北京解决。我已致电哈士先生以征求他的意见。

大足官吏以及总督的职务,在这一案件中都受到了严重影响。我于昨天致信总理衙门,要求立即罢免这些官吏中的第一位。如果该传教士被杀的话,那么我将保留提出要求将该官吏判处极刑的权力。

毕 盛

第 51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

1898 年 8 月 5 日于巴黎

我收到了您有关重庆骚乱和传教士被捕的电报。

我要求您与哈士先生合作,采取有利于保护我们传教士和确保对罪犯实施惩罚的措施。

德尔卡塞(Delcassé)

第 52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1898 年 8 月 22 日于北京

在有关四川教案的问题上,我已经指出了中国当局在拘禁至今尚未被释放的传教士问题中的责任。现已达成协议,即将发出新命令以获准对我们同胞的释放。该教案一旦解决,大足县的知县必将被撤换。这项措施与我们本欲强烈提出的要求并无关联。

毕 盛

第 53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

1898 年 8 月 23 日于巴黎

对于推迟释放我们在四川的同胞,我只是感到了极大的遗憾。请作出一种新的活动,并且明确地指出,我们要索取赔偿,特别是由于他们很长时间以来都愚弄和滥用了我们的忍耐。

德尔卡塞

第 54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1898 年 8 月 29 日于北京

我非常关注四川教案,为此而于昨天又开始了一次奔波。

我于本月 21 日通知总理衙门说,我们的索赔额特别高,这是由于传教士们被关押的时间比较长。

毕 盛

第 55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1898 年 9 月 9 日于北京

四川的形势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就混乱不堪，在由我国驻重庆领事和成都的传教士们向我们提供的情报中，已经向我多次提到袭击天主教徒们的暴力行为以及全面排外的活动。我在到达之后很短的时间内，就被迫进行干预以使人尊重我们的同胞，并使他们遭受的损失获得赔偿。

6月10日，我收到了哈士先生的一封电报，告诉我说一个叫作余蛮子的人新近被监禁。1892年1月1日，应我国公使馆的要求和根据他在大足所犯的罪行，此人被判处死刑。由于多名地方权威人士的干预，现在却已出狱。我立即上书总理衙门，要求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确保实施六年前向我们承诺的保证并惩罚应对其暴行负责的官吏们。

7月2日，根据成都主教的一封电报，我又向中国政府送去一封新的信件，以获许严厉镇压一场以顺庆传教士们为攻击目标的动乱，传教士们的住院已遭抢劫和捣毁。

7月24日，哈士先生分别发自同一个月7、8、13和18日的四封电报叙述了两名传教士遭到了余蛮子及其同谋人的拘捕，这些电报被同时送到了我这里。我立即向总理衙门通报了这一切，对于这些电报被如此严重地耽搁拖延而感到惊奇。我同时又宣布说，根据这些消息来看，为反对我国人而施行的暴力活动的全部责任都落到了四川当局身上了。我特别指出了大足县那名官吏的态度。尽管我们反复提出要求，该官吏却一味地拒绝下令逮捕被判处死刑的罪犯，从而使之逍遥法外。我明确地保留了我们在今后提出赔礼和赔款要求的权力。在等待期间，我又提出了立即罢免余蛮子保护人的要求。两天之后，我得到一种正式答复，通知我说大足和荣昌的知县已被总督召至成都并且已被暂时委官取代，川东道的道台已奉命“采取坚决和秘密的措施以搜捕、拘禁和审判余蛮子”，以

便在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恢复“和平”。此外，只有在“其它案件被审慎地和令人满意地解决之后”，才会给予我这种保证。

这些声明并未使我感到满意，我于是立即致信总理衙门，坚持我过去提出过的罢黜有关官吏的要求，同时也是为了强调根据1892年协议的规定而对重新爆发骚乱的四川暴徒们判以极刑。此外，我利用衙门升堂时的一次召对机会，以便强调作为我这些书信之缘起的事实的重要性，同时也为表明我们以后还必然会提出重要要求。

7月30日，李鸿章令翻译前来见我。他声称这是为了让我了解，由于推迟处决余蛮子而给北京政府造成了窘境。根据大家向我通报的情况来看，这个人（余蛮子）在他的所在地区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的朋友都是重要的乡绅，他们互相勾结起来以使他免于死。这些人决定，如果他被诉诸法律，那么他们便暴动。总理衙门拒绝采取制裁他的手段。但如果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并派遣军队去擒获囚犯，那就会产生最严重的动乱后果。被拘禁的传教士（两人之一在此期间已成功地逃脱了）肯定将会被杀，天主教徒们将会受到威胁，法国的司铎们就会面临极大的危险。李鸿章派人请求我同意放罪犯一条生路，以避免发生更大的灾难，其条件是此人让所有乡绅担保而表示顺从。按照这些条件，该传教士就会被释放。否则，大家对该传教士那注定的命运就不负任何责任。

我回答说，我自己不能负责缔结这样一项协议。如果余蛮子被捕并在应判处死刑的情况下被处决，那么我们就不会抱怨由于地方官吏们的大意疏忽和互相勾结而造成的这样一种局面；我将向您请示并将听取我们驻重庆领事的意见；在所有情况下，我都会坚持过去曾要求采取的预防措施。

我在通报阁下的同时，也通过电报请示了哈士先生。哈士先生

告诉我说,我提出的建议不会在不挑起新危险的情况下被接受。我同时又通过上海的一份报纸获知,大足的官吏前往看望余蛮子并与之进行协商,他们共谋和通过暴力强行得到了一项书面声明,表示赞同李鸿章强加给我的条约。我在这份文件中发现了我曾要求过罢黜的官吏们之间互相勾结的一种新证据,我于是便于8月2日致信总理衙门,指出我保留“以法国政府的名义要求,在该传教士被杀的情况下,提出将大足知县判处极刑”的权力。

此后,我便向李鸿章和总理衙门越来越频繁地开展口头与书面交涉。现在已作出了新努力,以驱使我为了华方济神父和四川传教士们的利益而放弃执行对余蛮子那业已宣判的判决。我坚定不移地拒绝这样做。然而,我应该指出,本人根本不信居心叵测的总理衙门,尽管它声称无力对该地区的煽风点火者们采取任何行动,否则就会使天主教徒们的生命冒极大的危险并挑起一场很难平息的动乱。所以,我不想批准这样一项条约,因为该项条约的结果会确保主要罪犯不会由于我们要求惩罚的那些罪行而受到制裁。与此同时,我认为应该使人理解,为了释放我们的同胞,中国政府始终是可供使用手段的唯一仲裁者。

我也使人理解到,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私利可谋。但我于8月21日非常注意地指出,我们索取的赔偿特别高昂,就如同华方济神父的关押期也特别长一样。

我知道已有新的指令传给了四川当局,以尽可能地决定释放华方济先生。

毕 盛

第 56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1898年9月23日于北京

我国驻重庆的领事电告我说,四川合州的教堂和住院刚遭抢劫和破坏,传教士得以在衙门里避难。此外,哈士先生向我报告了当地法国医院遭抢劫和焚烧的情况。动乱蔓延于全省,合州县的所有基督教堂均遭抢劫,该县的传教士受到了死亡的威胁,铜梁的大住院被摧毁而当局又未采取任何措施以阻止抢劫活动。

我已向总理衙门指出,它从一开始就拒绝采取我要求的任何预防措施,这些教案的责任再加上拘禁华方济神父的责任,完全是由于对四川的罪犯从未进行惩罚的结果。在保留今后提出要求的条件下,我完全坚持我们所索求的赔款。

毕 盛

第 57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

1898 年 9 月 26 日于巴黎

我赞成您为荣昌教案所采取的措施。请立即再次要求释放传教士并做戒性地惩罚罪犯。

德尔卡塞

第 58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1898 年 9 月 26 日于北京

动乱仍在四川蔓延,那里的定远县和龙水镇天主教住院均遭抢劫和焚烧。

毕 盛

第 59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

1898 年 9 月 26 日于巴黎

我已请庆常前来。我向他重新提到了我们应该利用反对中国

政府的大量不满情绪。本人已经注意到,我们在任何方面均未获得满足。我已宣布说,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将被迫由我们自己来谋求能确保我们获得满足的赔偿。庆常向我许诺将向总理衙门强调指出,帝国政府在长时间拖延给予我们满足答复时应承担的责任。

德尔卡塞

第 60 号 法国驻重庆领事哈士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1898 年 10 月 2 日于重庆

暴动变得很严重,重庆已处于警戒之中。

哈 士

第 61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重庆领事哈士

1898 年 10 月 7 日于巴黎

我与海军部长和共和国驻北京公使进行了协商,以确保您的安全以及侨民的安全。

如果您想到宜昌避难的话,那么我会依靠您的经验以及您专心评价时的冷静。

德尔卡塞

第 62 号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白藻泰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1898 年 10 月 10 日于上海

我荣幸地通知阁下,新任川督已于今晚乘船出发赴宜昌了。然后他再从那里经陆路直接前往成都府。

奎俊阁下在出发之前曾前来看望我。我便利用这一机会重新讲到了四川教案以及我对于我们在该省的传教士、商人和旅行家们的担心。

我把自己刚刚从重庆收到的最新消息通报了总督。这些情报把局势描绘得始终都很严重。川东传教区的大部分天主教住院均被摧毁,大批基督徒们均遭屠杀。奎俊阁下对于这些消息感到很激动,于是便向我保证说他将前往四川,并且率领足够的兵力以结束这些抢劫活动。他根据总理衙门的指令以及他本人按照我的要求,从本处用电报向成都和重庆当局发出了指示,并且已经采取了某些措施,以释放华方济神父并在最快的时间内抓获暴徒余蛮子。

白藻泰

第 63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重庆领事哈士

1898 年 10 月 13 日于巴黎

我收到了传教区的一封电报。请相信我对向我发电报的传教区的感激心情,应该让他们知道共和国驻北京公使已收到了为保护他们的人身和财产所必须的命令。

德尔卡塞

第 64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1898 年 10 月 18 日于北京

动乱仍在四川持续发展,那里四个新县的基督教堂口均遭破坏。

毕 盛

第 65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

1898 年 10 月 26 日于北京收讫

对于您在四川问题上所采取的措施,中国政府取得了什么结果呢?

德尔卡塞

第 66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1898 年 10 月 30 日于北京

我今天为了四川教案再次前往总理衙门展开了活动。

毕 盛

第 67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1899 年 1 月 1 日于北京

中国政府已在四川开始了严厉的镇压,相当多的一批叛乱者被杀戮或被驱散了。

某些匪帮仍继续关押着我们的传教士。

毕 盛

第 68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1899 年 1 月 22 日于北京

重庆主教报告,华方济(Fleury)神父刚获释放。

毕 盛

第 69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1899 年 2 月 7 日于北京

阁下已经知道,自 1898 年 7 月初就遭四川反叛者们囚禁的法国传教士已被释放。我通过重庆主教的一封电报而获悉了这一消息。总理衙门的一封电报很快就证实了这条消息。我收到的中国政府的通报中记载说:“余蛮子(也就是叛乱分子们的首领)的儿子自 1892 年 1 月起就应我们的要求而被判处死刑。”他把华方济神

父带到了周万顺的营地并表示归顺。他将传教士一直押解到了藩司营地,藩司保证能使他安全到达重庆。

刚不久才兑现的太大推迟了的释放是我们不断采取措施的结果。

为了使北京政府有能力拯救被囚禁的传教士们的生命而与叛乱者们进行谈判,我们在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之后,现在已变得根本不可能允许如此之久地拖延时间了。我坚持不懈地强调对匪帮发动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行动,因为匪首们希望以拘留华方济神父作为人质而免遭镇压。我要求做出的决定已被采纳,而且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受到王师攻击的余蛮子已决定释放其囚犯了。

毕 盛

有关广东传教区一次赔偿案的谈判 (伸德辉神父被杀案)

第 70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1898 年 10 月 18 日于北京

福理业(Flayelle)先生的一封电报告知我说,伸德辉(Chanès)神父和数名天主教徒在柏塘被烧毁的小教堂中遭杀害。

我紧急要求总理衙门约见我,现已确定为明天约见。我将要求采取坚决措施。

毕 盛

第 71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

1898 年 10 月 19 日于巴黎

我刚刚会见了庆常,他尚不知道伸德辉神父及其教友们被杀一事。我告诉他说,您必须负责对罪犯实行儆戒性惩罚。我还补充说,如果动乱甚至一直蔓延到沿海地区,使我国公民和保护人的生活处于危险中,那么我们将被迫自己负责他们的安全了。

德尔卡塞

第 72 号 法国驻广州代理领事福理业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1898 年 10 月 20 日于广州

我必须沉痛地向阁下报告广州传教区的伸德辉神父死亡案,他是于 10 月 14 日在柏塘与相当数量的一批土著天主教徒一起被害的。

冯舜生(Frayssinet)神父的一份报告清楚地说明,中国当局采取了两面派态度并且对传教区怀有仇恨心情。这次悲惨事件的责任完全地和不应有任何可行借口地落到了他们的身上。他们事先已被准确地和多次地通报了形势的危急状态。

我立即向总督发出了一份非常强烈的抗议并通过电报通知了公使馆。10 月 17 日,总督的师爷前来向我表示遗憾并且表达了其政府的歉意。我以严厉的措辞重提我的抗议,并且向他宣布说法国不允许杀害其一名公民的凶手不受惩罚地逍遥法外。黄先生希望着手讨论解决这一教案,我明确地拒绝在这方面追随他,向他宣布说根本不允许我来讨论对一次如此严重事件的解决。我向他指出,共和国驻北京的代表是唯一有资格讨论解决这一令人遗憾的教案的人。唯有他才能与法国政府合作决定应该向中国提出赔偿的问

题。

现时来看,我只要求您儆戒性地惩罚所有罪犯,总理衙门将于稍后不久的时间内把法国公使阁下的决定通知您。

福理业

第 73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教廷大使普伯尔

1898 年 10 月 20 日于巴黎

共和国驻北京公使通过您普伯尔(Poubelle)将会在本函附件中看到其副本的电报,刚才我才获知,在柏塘地区近期出现的动乱中,传教士伸德辉与数名天主教徒一起在该住院的小教堂中被杀。毕盛先生同样地向我报告了他为这次新的暗杀而获得赔偿意欲从事的奔走活动。

至于我本人,我昨天起就提醒中国公使注意这些消息,而且还是使用了一种强调性的和庆常不会感到惊奇的坚定态度的语言。

德尔卡塞

第 74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

1898 年 11 月 6 日于巴黎

请将由总理衙门对于你就伸德辉神父被杀案,于 10 月 18 日的电报中确定的措施所给予的答复尽快报告我。

德尔卡塞

第 75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1898 年 11 月 20 日于北京

我多次发现总理衙门在我的干预下敦促颁布了一道圣旨,命令逮捕罪犯。此外又罢免了一名知县。但我尚未能成功地得以罢

免总督的师爷，此人由于其顽固地敌视基督教和在教案中的责任，而被福理业神父指名道姓。然而，福理业先生并未通知我说罪犯们均已缉捕在案。

我将把提出赔偿的问题一直保留到您发出最终指示为止。如果您如同我认为可能的那样，您将 1884 年教案与现今教案的解决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就应该索取一笔约为 16 万两左右白银的赔款。我们无疑应该非常强硬地坚持这一切。

毕 盛

第 76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

1898 年 11 月 25 日于巴黎

您应该要求做戒式惩罚罪犯，另外还应该为伸德辉神父的家庭和传教区索取赔偿。

德尔卡塞

第 77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教廷大使普伯尔

1898 年 12 月 7 日于巴黎

我于本月 3 日的信件已向您通报，广东传教士伸德辉神父于 10 月 14 日在柏塘被杀。

依照我的指令，共和国驻北京公使立即要求中国政府对这桩谋杀案给予赔偿。毕盛先生致电向我说，柏塘所在县的知县已被罢免并且已服毒自杀。我们的外交代表补充说，他将继续向总理衙门追究以获得在政治和司法方面的满足，谋杀我国侨民的事件又授予我们继续追究的口实。

如果您认为这一切都合适的话，那么我就让您把这些消息通报教廷国务卿红衣主教。

德尔卡塞

第 78 号 法国驻广州领事馆代理领事福理业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1899 年 5 月 18 日于北京

我认为应该结束一直持续到 5 月 7 日的在广州举行的各种谈判了。这些谈判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柏塘教案(伸德辉神父被杀案)。

此后,依照共和国驻华公使阁下的指令,我不顾总督的反对而中断了谈判并将此事提交北京,柏塘的三名乡绅恰恰于此时来到了本领事馆。他们自称是由知县派来的,并且已获得其同胞们的同意而与我们谈判这个问题。

我告知他们说,总督拒绝批准和下令执行从对邵斯(Chausse)主教大人许下的诺言,他们利用这种形势而设法逃避那些义务。我已根据自己下达的命令而将这一教案的档案转交给毕盛先生。

我的使命已经结束了。因而,我再也没有权力重开谈判,更没有权力与他们缔结条约了。此后,法国公使阁下将独自掌握这种权力,并向他们通报他认为应该强迫这些人接受的条件。由于已失信于其最初的保证了,他们应该能预料到新条件会比旧条件更为苛刻。

这些人似乎被我的声明吓得目瞪口呆了,于是便要求我给予一种恩惠而致电毕盛先生。他们接受了由我们决定的所有处理条款(除了给传教区的 8 万元之外,还必须支付伸德辉先生家庭 8000 英镑)。他们声称,这一条款并未出现在由广东主教提出并由他们接受的条件中。

我连续地用电报将这些条件发给了共和国驻北京公使阁下,他已允许我接受这一切。我要求总督能确保其执行。

尽管此人对传教区和欧洲人心怀敌意,但我仍希望他这一次

能理解,彻底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案件符合他的利益。

福理业

第 79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1899 年 5 月 27 日于北京

我重新对广东总督的态度提出了强烈抗议,他对一切都横加阻挠并阻止了于其总督管辖范围内的任何事件的解决。他特别反对解决伸德辉教案,该教案应该在我们的海军士兵出发前解决。从柏塘居民一方面来看,它是由我们提出的一项建议的内容。我已经宣布,我们将坚持这项建议,既不准备压缩其内容,又不能修改其条件。

毕 盛

第 80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

1899 年 6 月 2 日于巴黎

我赞成您态度的坚定性。我按照您的意愿,已经与驻巴黎的北京公使谈到了柏塘的教案。我已向他指出,我对于不能看到帝国政府准备作出一种令人满意的解决已感到忍无可忍了。我已经向他宣布说,我们永远不会同意缩减或改变我们的要求。

德尔卡塞

第 81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1899 年 7 月 19 日于北京

对于柏塘教案,我仍然遇到了一种顽固的阻力。由于我们对此的要求与我们在广州湾问题上提出的要求相联系,所以同样的惩罚也是可行的。

毕 盛

第 82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1899 年 12 月 25 日于北京

在广州湾事件得以解决的同时,伸德辉的被杀案也已支付 8 万元赔款而告结束。

毕 盛

有关湖北省比利时传教区的一项赔款案的谈判^①
(董若望神父被杀案)

第 83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

1898 年 12 月 13 日于巴黎

您于本月 10 日的电报中所提到传教区是否就是鄂西的比利时传教区呢?我毋需叮嘱,您必须全力以赴地关注这一案件。

德尔卡塞

第 85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1898 年 12 月 15 日于北京

四川和湖北传教区的形势变得严重起来了。在这后一个省份(湖北)中,一名比利时传教士遭到了囚禁。我提醒大家非常严肃地注意总理衙门,这场教案已有发展。

毕 盛

^① 译自巴黎 1900 年出版的《外交文书·中国》,1898—1899 年卷。——译者。

第 86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1898 年 12 月 15 日于北京

在我 12 月 10 日的报告中,所提到的传教区正是湖北西部的比利时传教区。

毕 盛

第 87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1898 年 12 月 17 日于北京

我们驻汉口的领事电告我如下事实:“一名比利时神父在一次暴动中被杀”。我请德托美(Dautremer)先生对当局采取强有力的交涉,我将要求总理衙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毕 盛

第 88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1899 年 1 月 3 日于北京

在鄂西被杀害的比利时传教士叫作董若望(Delbrouck)。德托美先生电告,暴乱仍在持续,他将向总督进行交涉。

毕 盛

第 89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

1899 年 1 月 9 日于巴黎

我请您随时向我报告,在董若望神父被杀之后,您为了获得公正赔偿而奔走交涉的结果。请告知我,您索求的赔偿以及对您的奔走交涉所产生的后果。

德尔卡塞

第 90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1899 年 2 月 9 日于北京

我曾通过 1 月 3 日的电报有幸向您指出,一名比利时传教士董若望神父在鄂西被杀。

阁下曾让我使您随时了解我在这场教案中奔走交涉的结果,并指出可以由公使馆提出赔偿。

德托美先生有关董若望神父被杀期间混乱情况的报告刚刚传到我这里。大家由此便可以看出来,巴东县和宜昌的官吏们三周以前就被告知了正在策划中的犯罪行为,他们仅仅回答说,当该传教士抵挡不住时,他们将对他的救助要求给予含糊其辞的保护。这位传教士于 12 月 6 日被 20 多个人拘捕,他们对他严加拷打,使他根本无法行走并用轿子把他抬到了他们于 12 月 11 日杀害他的地方。他们砍掉了他的头颅并解剖了其尸体,将其四肢吊在一棵大树上。

此外,这种野蛮行为的肇事者和同谋者烧毁了数座他们已经抢劫一空的教堂或住院,杀死了中国天主教徒,并摧毁了他们的住宅。毁坏活动主要发生在巴东县、长阳县、来凤县和利川县。

我已邀请德托美先生继续向总督进行交涉,以谋求在以下基础上解决该教案。

一、依照中国法律惩罚杀人凶手和其他罪犯、暴乱的肇事者、放火犯等。

二、对负责官吏实行纪律处分。

三、对董若望神父的家庭作赔偿(这笔赔款最多可达 10 万法郎)。

四、对传教区和天主教徒们的损失进行赔偿。

五、由中国政府出资,在根据与传教区达成协议的地点,建造赎罪的小教堂。

六、颁布恢复秩序的措施,张贴告示,平安地重新把传教士和天主教徒们安置到他们的设施、住处和房地产中。

另外,我已经请我们的领事为确定对传教士及其信徒们的赔偿而编制了受损失的明细帐,为了赔偿间接损失而应接受一定数量的附加赔偿数额。

至于公使馆,它将向总理衙门密切追究这一案件。我也会不失时机地使阁下随时了解我的奔走交涉情况及其结果。

毕 盛

第 91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布鲁塞尔公使热拉尔

1899 年 4 月 4 日于巴黎

我们的外交代表通过您将于本文附有副本的一封信,向我指出了董若望神父被杀的背景,阐述了他认为应就这次谋杀案赔偿而向帝国政府提出的要求。

德尔卡塞

第 92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罗马教廷大使尼撒尔

1899 年 4 月 4 日于巴黎

我已经使您了解到了共和国驻北京公使利用鄂西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区发生动乱的机会,所采取的与中国政府的交涉措施。我同时也向您指出,就居住在该省的一名教士的死亡的问题,毕盛先生已经重新与总理衙门进行了谈判。

我们的外交代表通过一封您将看到其副本的电报,向我指出了董若望神父被杀害的背景,阐述了他认为应就这件谋杀案的赔偿而向帝国政府提出的要求。

我允许您将这些情况口头通知(教廷)国务卿红衣主教。

德尔卡塞

第 93 号 法国驻布鲁塞尔公使热拉尔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1899 年 4 月 14 日布鲁塞尔

在向王国政府通报了共和国政府驻北京公使就赴鄂西的比利时传教士董若望被杀案致本部的报告时,根据包括在阁下本月 4 日的书信中的指示,我当然不会忽略向王国外交大臣指出,毕盛先生目前正在继续向中国政府寻求解决该教案。

德·法夫洛(de Favereau)先生在收到我的这份通报之后,请求我向阁下为表示“王国政府对于共和国政府的谢意,因为共和国政府很愿意对在华的比利时传教士们给予保护”。

热拉尔(Gérard)

第 94 号 法国驻教廷大使尼撒尔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1899 年 4 月 25 日于罗马

4 月 4 日,承您的美意而非常乐意地向我通报了法国驻北京公使于今年 2 月 9 日致您的电文,其中涉及到了随着谋杀董若望神父以及我们公使馆为获得合法赔偿而试图作出的交涉所造成的形势。

利用阁下的允许,我迫不急待地使红衣主教国务卿能够理解毕盛先生在这种背景下所施加的影响。红衣主教阁下作为交换也将教廷的谢意传到了巴黎,他非常高兴地发现了保护国代表在司法方面的积极活动。

尼撒尔(Nisard)

第 95 号 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1899 年 7 月 13 日于北京

我们驻汉口的领事电告我说,董若望神父被杀案已经以一种

令人满意的方式解决了。

毕 盛

第 96 号 法国驻中国公使毕盛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1899 年 8 月 8 日于北京

我荣幸地告知阁下，湖北董若望神父被杀案和抢劫比利时传教区的教案已获得解决。

德托美先生主持的与总督的谈判，经过由领事馆坚持数月努力之后，在我今年 2 月 9 日的政务书信中所指出的基础上，已达成了一种解决方案。但在这项方案被批准之前，由于已被撤换的知府的挑唆，于施南府又爆发了新的动乱，从而又使一名传教士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德托美先生认为必须再次索求补充赔款，我同意了他的意见。然而，为了尽快地结束这场教案，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阻止类似事件的复发，他首先强调应采取镇压和预防措施。

7 月 13 日，发自汉口的一封电报向我通报了一项最终协议已经缔结的消息。

非常遗憾，数日之后，一封新的电报又使我获知了利川、巴东、施南等地重新爆发了动乱。秘密会社哥老会焚烧和抢劫了其他的基督教会口，杀死了 8 名营勇和多名基督徒，他们本来计划杀死曾保护过万娄思(Verhaeghen)神父的施南府汛营千总并烧毁全城。我们的领事自称无能为力，总督也缺乏威慑手段。总理衙门因我的关注心情感到了害怕，于是便要求采取紧急措施以重新恢复秩序，向我许诺将从事所必要的一切。从此之后，我再未获知任何控告的人。

协议作了如下规定：

1. 对传教区和传教士的家庭赔款。

2. 惩办罪犯。

对传教区的赔款被确定为 44500 两；对董若望神父的家庭依旧例赔银 1 万两。此外，中国还许诺划拨一块地盘和一笔紧急款项以建造一座教堂。物质赔偿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精神上的赔偿也已开始执行，数名罪犯均遭擒获和斩首，应对此案负责的官吏们受到了贬职。现已决定，将根据我们提供的蛛丝马迹而继续不停地追究司法方面的事情。在把矛头指向传教士和基督徒们的攻击中，应该负有某种责任者的名单将由我们负责向官吏们提供，我们将公正地分配和扎实地实行惩罚。

因此，我们可以把湖北教案视为已告结束。这种结果适得其时地于此时出现，以向那些希望对此提出异议的人证明，我们的保护是行之有效的。

毕 盛

第 97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

1899 年 10 月 6 日于北京收文

您通过于今年 8 月 8 日的来电，非常乐意地向我通报说，在我国驻汉口领事和中国当局之间，就董若望神父被杀案而向湖北南部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的赔偿问题，已经达成了解决协议。

我觉得，您与德托美先生协商后确定的赔偿数额，似乎可以公正地补偿传教士们在滋事期间所蒙受的损失，这些教士们的教区正是动乱发生的地点。

因此，我只能赞同您所采取的态度。我非常高兴地发现，由我们在汉口的代理人根据您的指示而采取的措施产生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此外，我已将您电文中包括的资料转交给了我们驻布鲁塞尔

的公使,我允许他从中摘录致比利时政府一份报告的内容。

德尔卡塞

第 98 号 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致法国驻布鲁塞尔公使热拉尔

1899 年 10 月 9 日于巴黎

毕盛先生刚刚给我寄来了一项协议的文本。该项协议是在我们驻汉口的领事和中国当局之间签订的,涉及到了由中国对湖北比利时传教区的赔款问题。

至于为了同一事件而向中国索求的精神赔偿,您可以发现它们以使传教区感到满意的方式解决了。

德尔卡塞

第 99 号 法国驻布鲁塞尔公使热拉尔致外交部长德尔卡塞

1899 年 10 月 28 日于布鲁塞尔

我已经向比利时政府通报了共和国驻北京公使所谋求到的一项决议,它是为了解决中国政府对鄂南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区的赔偿问题而签定的。

王国外交大臣于这一天收到我有关此项内容的通报时,对我说其政府非常满意地欢迎本项协议的缔结,认为它对于董若望神父被杀案以及比利时传教区在此期间所受损失的赔偿是公正的。

德·法夫洛先生让人请求我,应向共和国政府转达王国政府对于法国驻北京公使馆在这一教案中极其有效的干预再次表示谢意。

热拉尔

二、《传信年鉴》^①

ANNALES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1856—1900, LYON, L'EDITEUR DES ANNALES

两广传教区宗座监牧明稽埒神父致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 书简^②

1856年7月8日于广州

先生们：

广东传教区遭受了如此长时期和如此严峻的苦难，它为刚刚送往教堂的三位新近遇难的殉教者而感到自豪。广东省的使徒传教士马奥斯多(M. Chapdelaine, 马子农, 马赖)神父刚刚在广西被斩首,和他一道被杀害的还有听他亲自传授《福音书》知识的一位年轻的新教徒及一位名叫阿涅斯(Agnès)·曹桂英的年轻寡妇,她一直勇敢地致力于对异教妇女的训练。昨天,我通过一位驿夫和从广东省寄来的一些书简中获悉了这些悲惨的消息。我刚把它们汇编整理完毕,深感这三位基督教徒英雄的殉教情景是那样感人肺腑,他们忠心热爱着上帝而让人如此受教益,我认为他们和你们

① 根据里昂《年鉴》出版的版本翻译。——译者。

② 译自《传信年鉴》第28卷,1856年。——译者。

一样虔诚。先生们,请你们同意把此看作是对慈善事业的合作者表示尊重的证明,并把它们看作是对享有真福品者之死的可敬重的传教士表示崇拜所作的贡献。

马奥斯多先生被指派去广西省。自古以来,广西省一直未有过传播《福音书》的工匠。马奥斯多先生于1853年10月从香港启程,他一路上屡遭抢劫,并多次遭受死亡的威胁,经过三个月最艰难的旅程后,才抵达广州,他应在那里加入传教区。他在传教区找到了虔诚的传教士利昂(Lyon)先生。很早以前,利昂先生就非常熟悉当地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他引导着马奥斯多先生深入当地,熟悉当地情况。一见到这片乐土,马奥斯多先生顿时感到了自由和高兴,他跪下来感谢上帝领他来这片乐土。他再次向上帝表示他愿意为完成委派给他的光荣任务而献出他的全部力量和生命。他的胜利结局充分表达了他那高尚的虔诚之心。经过两年的努力,他已经归化了近200名异教徒。成绩是显著的,使徒对前途充满了信心。但不久敌人却对我们进行了一次最悲惨的迫害,使我们如此美好的希望化成了泡影。下面便是对一部分情况的介绍。

有一位年轻的刚受归化的异教徒因指责其妻行为不端而与其发生了争吵。事后,他的妻子向其在衙门充当打手并公开表示无比仇恨基督教的父亲和兄弟告了状。从那以后,他们决定趁此机会进行一次大报复,他们报复的对象不仅仅是这位年轻的新教徒,而且还包括一些天主教徒,尤其是作为他们的首脑的神父。于是,他们找到官员那里指控基督教徒们最不公平,最荒唐愚蠢。其间,他们说基督教是虚伪的、邪恶的,其信徒学鸟飞,还说这些信徒掌握有魔法的秘术,并且可以利用这些秘术为所欲为。此外,信徒们的脑海中有有一个姓马的外国人,认为他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煽动百姓造反,到处培养自己的信徒,现在是当局为制止邪恶的发展而采

取措施的时候了。

尽管这种指控有着明显的虚伪性,但他们却仍然得到了官员的热情接待^①。从那以后,人们可以预见后来所发生的极其疯狂的仇教。没等休庭期结束,从第二天(1月19日,即公历2月24日)开始,官员就派两个民团团首集合足够数量的打手,向瑶山基督教区发起了进攻。我们应指出的是,在广西的几个地方,如西林县下属的衙役都是上级头领任意从百姓中挑选来的。当衙门有事时,这些上级头领便根据他们使命的重要性去附近小村庄向恶棍们及一些游手好闲者求援,在一般情况下,这些人不可能有再次被请的机会,而且这些临时组合起来的打手比正式的御用军更可怕,因为他们用不着害怕失掉地位,也无须要注意节制,他们趁此机会抢劫一切他们认为合适的东西。于是,就这样集结了一支上百人的队伍,其中包括有告发者的父亲及其兄弟,他们手持长矛、大刀及其它进攻性武器,向距城三法里^②的瑶山村开去。我们的马奥斯多神父就居住在这座城市中,这里也曾经是那位年轻的妇女——此次打教的肇事者举行结婚典礼的地方。

这帮兵勇们刚开始行动,他们要进攻基督徒们及其神父住地的消息已在百姓中传开。一位居住在城里的已获秀才顶子^③并刚刚受归化的异教徒得到这一消息后,便急忙向神父发出了一封快信,把这个反对他的阴谋告诉了他,并且还把自己的房子让给神父作为避难之所。经历过危险考验的传教士热情地接受了这个提议,他由一位年轻的新教徒带路立刻出发,这位新教徒带着神父绕

① 这位官员所表示出的热情在前一封书简中曾做过描述。

② 约12公里,每古法里约合4公里。——译者。

③ 原文做“globule de lettré”,指清代获得秀才资格的人。——译者。

弯路赶赴西林,而衙役们却取道于人们通常所走的那条路。基督徒们在神父的一位年轻仆从的帮助下迅速把一些最珍贵和最令人可疑的物品收藏起来,尽可能好地藏到毗邻的一间茅草屋里。此后,广州的二三位基督徒便离开其住处,目的是为了目睹可能发生的事情,然后把消息告知附近的传教士,其他人则留在那里坚定地等待着衙役们的到来。衙役们来了。唉!我们可怜的基督徒们远没有想到事态竟会这么严重。他们原希望用几吊铜钱^①就可以平息初起的骚乱,然而,衙役们刚一到这里就声称他们不愿意听到谈论任何妥协,并立即扑向首要的新教徒,对他们实行捆绑、抽打,还用各种办法对他们施以肉刑,以让他们交出传教士的物品,并勒索他们所有的东西。同时,这帮疯狂之徒还拥进村子里,出没于各家各户,乱打乱砸,毫不留情地抢劫夺走他们能发现的一切财物。耕牛、猪、山羊、鸡、衣物、被子、铜币以及当地产的一包包棉花等,都成了这些抢劫犯的掠夺物。他们仅给基督徒们留下一点玉米和大米维持生存。他们就这样载着赃物,带着 15 名高贵的囚犯撤走了。他们没有回城,却撤到了一个异教徒的大村庄里,其目的是为了能随心所欲地拷问这些被捕的囚犯,掠走囚犯们剩下的一点钱币。因不断的拷打折磨,他们又抢走了囚犯们 200 吊铜钱。继这些可耻的敲诈勒索之后,他们才把囚犯们带到衙门去,到了衙门,囚犯们得到的仍旧是拷打和酷刑。年轻的曹桂英亦在被捕之列,她的名字我们在上文已提到,本文后面我们将介绍她的美德和其不可动摇的决心。

白满(Lawrent Pe-mou)是马奥斯多神父最忠实的新教徒之

^① 把 1000 枚古代中国使用的圆形方孔铜币系在一起组成一吊,约 14 吊相当于一个苏(sou,法国辅币名),今相当于 $1/20$ 个法郎,即 5 生丁。——译者。

一，他逃脱了衙役们的逮捕之后，便来找到了神父，并向他表示愿意与他的司铎（一位来自遥远的地方并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挽救其同胞灵魂的人）共生死。一位如此高尚和富于牺牲精神的人理应得到报偿。不久之后，有五六位妇女（囚犯们的母亲或妻子）怀抱着小孩也来到了罗恭叶的家，她们一方面是来看看神父，另一方面也想从神父嘴里得到她们在这种危险的处境之中应该做些什么。神父打定主意后，便同意她们带着小孩去找官员要求放出她们的丈夫或儿子，要求归还被他们抢走的东西。但她们又表现出某种害怕的神色，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此，白满对她们说：“噫！你们怕什么？如果你们自己不敢去找官员，那我就带你们去！如果需要死，为了上帝的荣光，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那我们也可以毫不害怕地献出自己的生命！”说完，他带头出发了，他领着她们到了衙门。根据中国对于那些没有呈递诉状而进行告状的人所应遵循的惯例，妇女们来到衙门后，便可怜地喊起冤枉来了。官老爷在他的住房里面听到呼喊后，便立即赶了出来，以了解其缘由。但他不听来人的诉状，却叫人抽打她们，捆绑他们，其中白满更是他发怒的对象，因为白满竟敢带领这些妇女直闯入他的衙门。

如前所述，马奥斯多神父逃到了西林县他忠实的新教徒罗恭叶家。他原想在那里比较安全，却没想到衙役们竟敢对在这座城市及其附近享有较高威望的一位文人之家进行严格的搜查。这样，他原来只打算回县府甚至去衙门，然而这就等于自投打教狂之手。对于他来说，当他在罗恭叶家度过第一夜时可以很容易地从广州方面逃走，他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地，也可以找到他忠诚的会友，传教区修道院会长童文献（M. Perny）先生及他的邻居利昂先生，后者曾为他在广西布讲《福音书》提供了许多的方便。但是他能忍心自己逃走而遗弃他的亲爱的和还很不熟练的新教徒

吗？他不担心如果他由于害怕而脱逃，却让新教徒们自作安排，面对刽子手们而感到灰心气馁吗？他是一位善良的司铎，终于决定把自己的命运与基督教徒们联系在一起，以便在必要的时候，他可以教育他们为上帝而献身，因为他曾教育他们要为服务于上帝而献出自己的生命。马奥斯多神父只想通过祈祷和舍弃一切的办法把自己的命运和上帝联系在一起。天主啊！我们多么希望在这庄严的时刻，上帝能为他加冕！他已给他的会友们写了最后的告别信！我们多么希望从中看到高尚的情感、虔诚的热爱！我们又是多么热忱地希望看到他一直渴望参加的光荣斗争的到来！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他亲眼见到敞开的天堂后，竟忘记了大地，他跪下来祈祷，直到衙役们来抓他为止。

在要抓他之前，衙役的班头先派一名打手去罗恭叶的家里察看，以便弄清传教士是否确实在里面。这名衙役来到马奥斯多神父面前，并说他是受官员的委派而来。听了这些话以后，神父朝他转过来并毫不露声色地对他说：“我祈祷完了，你走吧，你去报告你的头目说我等一会儿就去他那里。”

得知马奥斯多先生的隐蔽地点后，官员立即派了一帮衙役包围了离官衙不远的罗恭叶的住房。衙役的班头独自一人进去，令其部下严密地看守着各条通道。由于尊敬的罗恭叶，这位获得秀才顶子者的威力，他们没动放在房子里的任何东西，他们还得尊重罗恭叶老人。这位丧失视力的可敬老人自从受洗礼后，一直忠实于基督教徒的称号。但是，衙役们抓走了马奥斯多先生，并把他捆了起来，同时被抓的还有这位秀才的次子以及前天晚上陪伴着神父的年轻新教徒，然后，衙役们把他们三人一起带到了官员的衙署。

勇敢的白满及那五六位基督徒妇女已经被抓到了衙门。前天晚上在瑶山被抓的新教徒也在同一天傍晚被带到这里。因此，到2

月 25 日晚上,总共有 24—25 名尊敬的公开表明信仰的基督教徒集合在那里向他们的圣教表示敬意。多么壮观的场面!对于天堂来说是多么的美丽!对于这些可怜的新教徒来说是多么令人感动!他们自从跨入基督教的大门就如此心甘情愿地与耶稣基督一起过着屈辱的生活。那时,他们已经能够懂得上帝对他们的示意动作的意义,无疑是为了增强他们的勇气。据报道说,同一天在瑶山也实行了对基督徒的逮捕,人们发现在这个村庄的上空出现有一顶光彩夺目的冠冕,其中间有一个十字架,崇拜偶像的人可以看见这种冠冕,基督教徒同样也可以看见它。异教徒们认为这是原告的凶兆,对于基督教徒们来说则相反,不用说他们就都已明白这冠冕不久将通过十字架降临于他们,他们虔诚地顺从上帝为他们的命运所决定的一切。他们一进牢房,打手们就给他们带上镣铐,并用藤条狠命地抽打他们,打得他们直呻吟,而后对他们进行初审,我们只是从目击者所记录的某些片断中了解了这次审讯的情况。此外,衙役们还在镣铐之外上了枷,他们就这样有幸为耶稣基督带上铁镣枷锁过了一整夜。

第二天,26 日,白满第一个被传讯到大堂,他自动提出愿意跟随传教士同受苦难,他第一个光荣而又勇敢坚定地公开表明信仰耶稣基督,这种勇敢和坚定是由于神灵在他的灵魂中激发起了强烈的信仰。一开始,官员就以严厉地威胁并恫吓他说:

“你为什么信仰天主教?天主教是一种邪教,它煽动百姓造反。”

“不对,”勇敢的新教徒回答说,“你所指责的那些天主教徒根本就不存在。天主教教我们驱恶行善,并拯救我们的灵魂。”

“你为什么跟随马(马奥斯多的中文姓)神父?”

“我跟随他,是因为他教我们认识了真正的上帝,并教我们参

加了神圣的天主教。”

“你还想跟随他吗？”

“我永远不抛弃他！”

“如果你不离开他，不背弃你的宗教信仰，我就叫人砍你的头。”

“官老爷可以砍掉我的头，不只是可以砍掉我的头，而且还可以砍掉我妻子和我的孩子们的头，但是叫我背弃我的信仰，背弃天主教，停止向天主祈祷，那是不行的，我永远不当如此卑鄙可耻的背教人！官老爷！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杀我的头，但我永不背弃我的宗教！”

官员向他发怒了，并叫人用藤条狠命地抽打他，官员见他仍坚持自己的决定，便气愤地说：“好吧！你愿意砍头，那就马上砍下你的头！”于是官员叫来他的一个凶狠的衙役砍下了白满的头。

人们还未能发现这位耶稣基督的光荣殉教者的宝贵遗骸已变成了什么样子。一些人说他的遗体已被埋葬，另一些人的说法则相反，大多数的人肯定地说他的遗体被扔到垃圾堆里去了。但这有什么关系！总有一天上帝会找到他的遗骸的。他的为此而勇敢地遭受折磨的肢体将定能得到它应有的荣光。仅有五天的时间，这位高尚的教徒已在圣水的洗礼中得到了新生，就这样，他获得了洛朗(Laurent)殉教者的圣名，他的表现也真实地体现了这个圣名的坚贞精神。由于他的圣师始终不愿意离开神圣的六经，故而念诵着走向刑场，白满同样也愿意和他亲爱的马神父永不分离。和马神父一样，白满面对酷吏的狂怒毫不动摇。和马神父一样，他的灵魂由他如此堂堂正正洒下的鲜血冲洗得更加纯洁美丽，并且聚集于殉教者的光荣队伍，以和他们永生共享天福！

白满被处决之后，紧接着就是对年轻曹桂英的处决。在颂扬这

位年轻英雄的事迹之前,我们先对她前几年的几件事略作一些描述。

曹桂英生于 1833 年,她诞生于广州省一位年迈而贫穷的基督教徒医生之家,从幼年时代开始,她就爱好虔诚和坚贞的美德。15 岁那年,她开始了孤儿的生活,从那以后,她便失去了一切救济,而被省里的传教士慈善机构所收养。尔后,慈善机构送她上学就读,她在阅读和书写汉文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次年,她与一位基督徒结婚。三四年之后,其丈夫去世。从此,贫穷而又年轻的曹桂英便无依无靠了,但她仍对上帝的圣意表现得很虔诚和顺从。就在这时候,广西省向宗教开放,新教徒的队伍迅速壮大起来,应马奥斯多神父的请求,利昂先生把这位年轻的妇女送到马神父那里,以让她接受女性基督教徒的教育。曹氏十分出色地完成了交给她的任务。她具有经得起任何考验的美德,性情温柔、谦逊。不管处境的好与坏,她始终对自己的命运感到高兴,一心只想为上帝争取一些生灵,并引导他们走向安全之道。因此,通过完成她自己岗位上的任务,她准备参加宗教界女英雄的竞赛行列,参加上帝的光荣战斗。

她在瑶山事件中于 2 月 24 日被捕。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她比别人表现得更为勇敢的结果,她被用铁链捆住并被带到审判官那里,审判官企图千方百计动摇她坚定的信念,但曹氏对其宗教信仰始终表现出一种不可战胜的决心。不论是许诺还是威胁,不管是官员向她发泄粗野的咒骂还是眼前展示的酷刑,都丝毫不能动摇她忠于上帝的决心,她始终坚贞不渝,直至生命的最后的一刻。从官员对她施展的种种审讯中,人们特别注意到了那些反映她灵魂的平静和天真纯朴的场面。

“你从哪里来?”

“我从贵州兴义府来。”

“谁向你传授基督教？”

“是我那一直身为基督徒的父母。后来，人们又送我上学，我在学校里学会了读一点东西。”

“你来这里干什么？”

“两年前，这里就有许多的人拥护基督教，我来这里为的是教妇女和女孩子们学会祈祷并为上帝效劳！”

“你为什么教她们学习如同鸟一样飞翔？”

“我根本就没教她们飞翔，而是教她们祈祷。官员所说的都是对我们的造谣诽谤。”

“你为什么在夜间而不是在白天教她们？”

“因为她们白天或是下地劳动，或是纺纱织布，到晚上才有时间学习。”

“啊！居然有这种事！你必须坦率地把真实情况告诉给我。假如你还想活的话，那就必须这样。你是马神父的妻子，对吗？”

她很气愤地答道：“不是，我不是！在抵达这里之前，我不认识他。”

官员对她大发雷霆，还用不堪入耳的汉语中骂人的粗话咒骂她，然后又接着对她进行审讯：“你告诉我，马神父有多少钱？”官员露出一副唯利是图嘴脸地问道。

“我一点也不知道。”

官员还向她审问了其它一些事情，最后向她说：“如果你不放弃马神父的宗教信仰，我就将处死你。”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处死我吧，但我绝不放弃马神父的宗教，即天主教。”

“你希望我怎么处死你？”

“与马神父一样的酷刑。”

实际上，官员也同意了其所选择的办法，并叫人为她准备了一个类似于关押传教士的囚笼，后面我们将对这种刑罚进行描述。农历一月二十三日（公元2月28日），她和马奥斯多神父同时被关进这种笼子。两个囚笼相距很近，他们都可以看到对方，但不能说话，这两位基督殉教者为了同一事业，遭受同样的酷刑，并希望一起接受同样的惩罚，对于他们来说，这情形是很令人感动的。四天过后，便开始残酷的严刑拷打，一月二十七日，这位神圣的杰出女英雄由于饥饿和缺水而被耗得精疲力尽，成了残废。她把自己的灵魂还到她的造物主手中，然后从耶稣基督的手中接过殉教者闪闪发光的冠冕。她的尸体很可能被埋葬，但人们还没有找到她的安息之地。我们希望有朝一日上帝将使她能 and 基督教徒一样受到尊敬。

亲眼目睹了勇敢的新教徒的斗争之后，该轮到耶稣基督的教士和宗教的使徒自己受刑了。他用行动让人看到了他的灵魂中充满了上帝赐予的勇敢。开始是审讯他的宗教信仰，马奥斯多神父像回答开场白的问题一样作了答复。接着，官员向他提了几个很不得体的问题，诸如：“你有多少钱？”“为什么叫你的信徒学习飞翔？”如同某些人所想到的那样，神父似乎不明白官员的意思，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想仿效耶稣基督天主在黑洛德（Hérode，即希律）面前的态度，他对于官员的痛骂保持沉默，不做任何回答。官员气急败坏，他叫人用专门打人的皮鞋底在神父脸上抽打100下，仅一下就打得他颌部流血。狂徒怀着报复的心情，使出他们全身的力气，一下不少地足足打了100下。结果，光荣的殉教者牙被打飞，颌部被打坏。他就这样，失去了说话和回答的能力，刽子手又把他按在地上，用藤

条在他背上抽打了 300 下。在这残酷的严刑拷打期间，神父没叹一口气，也没呻吟一声，以致于官员及其帮凶们都感到钦佩和发呆。因为根据中国受刑者的习惯，当听到大堂上下令要打他们时，他们就唉声叹气，并哀求官老爷饶恕他们。但对于我们这位高尚的公开表明信仰的基督教徒来说，他已把自己的心和灵魂与受苦难的上帝联系在一起了，他能够忍受最残酷的拷打，并且对那种难以忍受的疼痛不会有任何表现。官员把这种如此不平凡的安静看成是某种魔法的力量。他于是便马上叫人杀了一条狗，下令把狗血喷到殉教者身上。然后又继续打，直打到他再也不能动弹了才把他送进牢房。因为他们已经把他打得无法走路了。啊！上帝啊！顷刻之间，他居然站起来了，并且像一个十分健康的人一样开始散步行走。衙役们目睹了这一新的奇迹后便走近他身旁，神秘地问他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顷刻之前还不能动弹，而现在却能自由自在地行走？神父笑着答道：“这是仁慈的上帝在保佑着我，降福于我！”啊！耶稣基督骁勇的殉教者的清白无辜，美丽的灵魂无须更多地表白了。但这些瞎了眼的狂徒却从这种新奇迹中发现了神父身上的魔力所起的作用。于是，他们叫人用当地有名的最不洁净的肉做了一顿饭给他吃，以摧毁他身上的魔力。由于他早已知道一些秘密会社的信徒们非但厌恶这些菜肴，而且还把它们看作是自己神秘行为的解药。所以神父把打手们为他准备的一点少得可怜的东西吃了个尽光，以便向他们表明他不属于任何一个被禁止的会社。需要指出的是，这就是他从被捕以来到现在所得到的全部食品，因为官员严禁给他任何东西吃，违者将被处死。

然而，这些只不过是这位高尚的公开表明信仰基督教的基督教徒所应经受考验的一部分。27 日，他受了整整一天的锁链

酷刑^①。27日,他们把他和年轻的曹桂英关在用来勒死重罪犯的囚笼里。这种笼子高1.5米,当受刑者被关进去后,脚尖刚好着地,脑袋伸在笼子上面,脖子被套在呈半圆形的两块木板之间,这样就能使受刑者遭受勒死前的各种酷刑,也能勉强呼吸以维持多活一段时间,有时还能维持活五六天之久。受刑者的两只手向前伸直,而身后则被用绳子牢牢地系在一起,固定在一块木板上,直挺挺的不能动弹。受刑者就这样被关在笼子里,放到牢房前示众。我们勇敢无畏的基督教徒就以这种痛苦的姿势度过了2月28日的一天一夜。在这长时间的令人痛苦的临终之际,在我们高尚的殉教者的生命的最后时刻,官员派其一个仆从来告诉神父说,如果他愿意出400两白银,那么官老爷就给他自由。神父说他没有钱,只有书。利欲熏心的可鄙的官员又一次打发人来说,如果神父给不起这笔钱的话,那么至少也得给150两白银,这样官员就不处死他。如同第一次一样,神父仍说他没有钱。他接着又补充道:“我落在官员手中,他可以随意处置我!”毫无疑问,我们这位虔诚的传教士确实没有能力交出这笔钱,他也不可能在其贫穷的基督徒中间筹集到这笔款,但是他可以向官员声称自己能找他在贵州的朋友要到这笔钱,这样做就可以赢得时间,或者还能有办法免去一死。但是,上帝也许不会让他想到这种迫不得已的筹款办法,这种办法可能延长他痛苦的朝圣,使他丧失许许多多的圣人最后所向往的幸福,这种幸福就是献身于为了爱护我们而第一个献出自己生命的基督!

① 下面是在1840年殉教的佩尔布瓦尔(Perboyre)神父所描述的几行有关铁链酷刑的情况:

“他们要我跪在铁链上,然后用粗大而结实的绳子把我的大脚趾和头发系在一起,以使我的两只脚悬空。这样,我全身的重量就靠光着的两条腿来支撑,我就以这种姿势跪了半天。”

然而,2月29日来到了。这一天对于我们的殉教者来说是幸福的一天,这一天结束了他的短暂的痛苦,出现在他面前的是永恒的和难以表达的幸福!夜里,官员接到通知说有人从监牢(我们高尚的基督徒所呆的地方)里面听到了一种奇异的声音,于是官员急忙来到神父身旁。当时,官员发现他仍在呼吸,便叫人把他从笼子里押了出来,同时还叫来了一名手持锋利大刀的衙役,并且命令这名衙役把神父的头砍下来。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的使徒戴上了冠冕,他的使徒生涯是短暂的,但他勤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们最亲爱的可敬的教友马奥斯多神父于1814年1月6日出生在古塘斯教区的拉罗歇,1843年6月10日举行派立礼和被授神父神品,1851年出发赴传教区,1856年2月29日为基督教而献身。

然而,我们光荣的殉教者被处死后,其遗体怎么样了呢?29日这一天是这悲惨景象的见证人,也许最好应该揭去蒙在这一悲惨场面上的面纱,应该揭去蒙在对殉教者宝贵骨骸进行凌辱的面纱,但没必要!我们也不害怕揭示公众舆论对这一事件所报导的一切,然而还是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衙役们的残酷行为,如同历史所作的记载那样,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上帝有足够的力量来保存其选民的遗骸的完整,而不会使之失去任何一部分,并且还能让它们在光荣的复活节那天再现。殉教者宝贵的头颅被砍下来后,衙役们把它挂在城外的一棵树上。这些地方最普遍的习惯是当犯人的头颅被示众时,应该装在一个笼子里,以便能避开下等人的凌辱。然而,他们却不为我们耶稣基督的殉教者提供这最基本的条件。他们简单地把殉教者的头发系在树杈上,让其头颅悬空。孩子们见了以后,产生了对地狱的害怕,于是他们便把它当作射击的靶子,并用石块把它打了下来。人们看到这颗高尚的头颅滚落到尘土和污泥中,成了不洁净动物的猎物,被这些动物撕碎而吞噬。

由于死者的头发按中国发式的习惯编成了结实的辫子，所以才得以保存下来。其头发在尘土中抛弃了有一个多月，后来被一个年轻的新教徒捡了起来寄给了利昂神父，经辨别没有发现任何疑点，这位神父才确认是殉教者本人的头发。

殉教者的上半身也没找到。一部分人说被掩埋在为作恶者保留的地方；另一部分人的说法则相反，他们认为最大的可能是被剁碎后扔进了垃圾场，最后也成了当地最不洁动物的食物。

他的心脏成了什么样子呢？据人们所知，在中国，一个大罪犯被砍头后，其心脏是要被取出来的。然而，我们神圣殉教者的心脏到底成了什么样子呢？这是一件说出来令人可怕的事情，也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情！我很不愿意相信这件事，也不想说这件事，更害怕把它写出来！唉！他的心脏被从胸膛里取出来后，放在盘子里还突突直跳。野蛮的残暴刽子手们好奇地高兴地仔细观看后，便把它切成碎片放进猪油锅里油炸，炸到半熟时便把它取了出来，然后，这些吃人肉者像猛兽一样把它吃掉了！唉！简直是人类的退化！能够把残暴驱赶到遥远的地方去吗？然而，这种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情在这些不幸的、悲惨的异教徒地区却时有发生。人们曾见过一些失去人性的人竟扑向同类的心脏并吞食之。这些人相信吃了这样的菜肴可以为他们在战斗中带来不可征服的勇敢。这种重罪是最可恶的，是不能饶恕的。他们以此来对付一位可怜的、无辜的、从来只知道爱护人类的传教士，在传教士向他们献出他的灵魂中仅有怜悯心的同时，他们却叫他丧生于最恐怖的酷刑。对于他们来说，这难道就是和平和爱慕的愿望吗？然而，应该承认，尽管出现了这种过分的粗野，但我们亲爱的马奥斯多神父却还是得到了上帝的祝福，他使我们心情愉快，他向我们指明天堂有我们的故乡，上帝将宽裕地报偿我们在人世间为了他的事业而遭受的惩罚！

施行这许许多多欺压和野蛮的行为后，残酷的官员似乎应该得到了满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前三位牺牲者刚刚断气，他又对其他囚犯施行了新的酷刑。根据一些基督徒的记述，他们中间有几个人也遭受了与我们这三位殉教者同样的酷刑，他们也几乎获得了同样的冠冕。接着，这位杀人不眨眼的官员又对逃过了他第一次搜查的一些人采取了粗暴的行动，他令人把这些人拖进衙门大堂，对他们施以残酷的笞刑，并且强迫他们交出一笔远远高于平均数的保释费。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只得把自己的全部财产卖掉；另一部分只好欠债赎身，这些地区过分的高利贷逼得欠债者长年背上了极沉重的负担。后来，利昂神父向我写信之时，有九名囚犯仍在地狱中呻吟，他们没有出狱的希望了。我的上帝啊！这个面临如此美好开端的小小基督教会口将会怎样呢？啊！这些光荣的殉教者从天上用他们的鲜血浇灌了它，保护着它，并将给这里带来和平，扩大信仰崇拜上帝者的队伍！可敬的会友之命运令我们向往。对于他，我们是那样的亲密无间，在他出发完成委托给他的光荣远行任务之时，我们友好地和他拥抱。我们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并给我们可怜的即将到达幸福彼岸、面对汹涌澎湃的波涛而激动不安的传教士以帮助！

先生们，请接受我及崇高的会友的崇高敬意，请信任我的忠诚。

你的谦卑仆人 宗座监牧明稽埒(Guillemin)

湖广代理宗座代牧主教方来远神父致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书简^①

1856年7月3日

先生们：

尽管我们的宗座代牧主教已经把我们这个省的情况告知于你了，但我想你仍然乐意得到我负责照管及我居住的那个传教区的消息。

我不向你述说六年来的残酷战争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因为我若把这些情况告知你，哪怕是轻描淡写地向你述说一番，也会使你感到悲伤。诸如屠杀、放火、偷盗、抢劫、不道德的事件、破坏、绑架男女和儿童以及许许多多道德败坏的言行等无处不有，尤以骚乱分子的罪行更为严重。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神圣的，在他们的眼里既没有神权，也没有人权。住房都被烧毁，没有谁能避免这一灾难。妇女都是他们的受害者，男人都是他们的奴隶；不论老少，一律都要为他们服徭役。如果有人不同意顺从他们，以其愿望和武力而拒绝这样做，那么最常采用的就是杀头。他们拆毁房屋，挖掘墙基，寻找一切他们可以找到的财宝。兵勇们不但毫无羞耻地抢劫妇女们的项链和首饰，而且还穿上她们的服装，戴上他们偷来的首饰在大庭广众之前逛来逛去。

如果我把全帝国从事大宗买卖商人的洽谈生意之地——汉口商行的火灾情况记录下来，那样就是铁石心肠的人阅后也会被感化。我只须说一说这座城市，人口最稠密最大的棚户居民区被大火吞食的情况以及为灭火抢救房屋而遭受利剑刺杀的居民，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火灾一直漫延到武昌府的城郊，该府的神功架和庙

^① 译自拉丁文《传信年鉴》第29卷，1857年。——译者。

宇也都被摧毁。骚乱者每到一处,那里就遭他们破坏抢劫,那里就留下了他们残酷可怕的踪迹。他们所到之处,到处是一片哀鸿,到处是痛苦的呻吟。这个为其妻被抢走而哭泣,那个为其夫失踪而号啕,有的为其儿子或父亲而伤心,有的为其姐妹和未婚妻而落泪。我不再想一一列举我们受害者所遭受的苦难以及我们所目睹的不幸了,因为它们不仅使我们感到痛苦悲伤,同时所有阅读本书简者也要因此而伤心落泪。我们这些身陷这种处境之中的人,常听说许多不幸事情,常常因此而感到格外悲伤,致使我们对生活感到如此的厌倦。我们已经陷入无限的悲痛之中,而且上下级之间不再可能会有联系。因为所有的道路都已被堵塞,或因骚乱者,他们在省里骚乱,或因帝国的营勇,他们的兵站布满全国各地,致使任何一个传教士都不能去看望由自己照管的基督教会口。

我们有一个教士两次被捕。仅仅是由于交了一大笔赎金,他才获得了自由。另一位传教士曾被捕入狱,凶手们把他捆绑起来要把他处死,多亏一些人声明为他担保,他才被释放。一位名叫万保禄(Padel Wang)的七十来岁的教士也被抓捕。当衙役到来时,他终于越狱逃跑了,而我甚至用钱也没能使他获得释放。还有六位在沔阳州被俘的基督教徒也是这样。还有三位知名的基督教信徒由于为天主教教义加注释,所以这个副本堂神父的住所也因此而被血洗。还有近三十名新教徒由于未参加应征入伍,结果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关进监牢,后来便杳无音讯。我们的物质损失也是重大的:圣祭服、圣餐杯、书籍、衣物、家具、主教及其教士居住的五栋房屋都被抢劫和烧毁。

尽管这一骚乱的时期给官员们镇压基督教徒提供了种种方便,但也只是在鄱阳和安陆府相继发生了一些严重事件。一些崇拜偶像的居民在鄱阳挑起了一场迫害,安陆府现已平息。

试想在这种多难的环境中怎么能够传教呢？然而，上帝却没有退缩，而是尽力投身于我们的痛苦之中，给我们以出乎意料的安慰。现已建立了五个新的基督教区，被赶出教堂多年的几个背教者又重返教堂。如果上帝的敌人和一些人不挑起某种出乎意料的风波，那么我们就可以预测在新近向《福音书》开放的几个小镇上，基督教徒的人数将一定能因我们和你们的高兴和喜悦而增加。这正是我们向上帝所要求的一切。我们高兴地获悉人们在欧洲也在为和平以及一些汉人的归化表示热烈祝愿。由于虔诚的祈祷，我们得到了安慰，我们希望将来还能得到安慰。

现在这个省的天主教士较多，我们的基督教徒将可以更为方便地、经常地从事圣事活动。我们坚信这个使徒的副本堂神父区将来会更好发展，并且必将收到更丰厚的硕果。

此时此刻，我们应该把这些正义的恩典行为归功于你们著名的教会，因为你们传教会给我们带来了慷慨大方的救援。这些救援或是对我们神学院有利，或是为我们的教士提供给养，或是有利于这个副本堂神父教区的其它一些需求。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教士队伍就不可能扩大，我们的费用不可能会有这么多，传教士的痛苦也不可能减轻，以致于他们还要向乞丐们乞求施舍，这个省的基督徒们可能都被沦落到最贫困的境地。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已被驱散到了老虎经常出没的巴东山，他们在那里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有一位传教士给我来信说，他们中间大部分人甚至连一件拜见司铎的衣服都没有。他还补充说，他一见到这种匮乏状况，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流。读着他的来信，我也一阵阵直打寒战，我的心如同遭受榨油机挤压一样受压抑。如果贫困人数只有一小部分，那么我们还有可能给他们以某种宽慰。然而在巴东地区的500名新教徒中，几乎没有一人未遭受苦难。对于我这个负债累累，而且又难以弄到

欧洲货币的人来说,又怎么能救济他们呢?虽然我不能为他们买下一块地盘,不能避开贫困,但他们至少应该能过上一种可以忍受的生活!我把他们的命运委托于你们教会,把我们的人、我们的神学院和这个副本堂神父区的全体教士都托付于你们。我们整个传教区掌握在你们手中,它只能靠你们的宽厚才能得以生存。在我们这种共同的和不可磨灭的对你们给我们的好处之感激中,我们向上帝祈祷,祈祷所有教会的繁荣和永福,祈祷如此经常并永远应得到降福的虔诚的教会的发展。我们为传教区的功绩,传教区的好处,尤其是上帝的荣光表示祝愿,祝愿传教区发展,永存!

万分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你们卑谦的仆人 宗座代牧方来远(Michel Navarro)修士

云南宗座代牧主教和菲洛迈利亚主教袁缙索致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书简^①

1856年7月7日于云南

枢机先生们:

我们刚刚度过了动荡不安的一年。这一年里,地区性的教案未断,动乱骚扰亦时有发生。在广南府,有一户姓张的人口较多的基督教徒家族,在几乎倾家荡产的情况下,被迫移居别处以便保持自己的信仰及他家的珍宝——人世间的盖世之宝。在开化府,官员在最后一轮审讯中对我们的三位囚犯说,他们只有在帝国的动乱结束后才有希望获得自由,但这场骚乱何时才能平息呢?骚乱者人数众多而且很鲁莽,帝国的兵勇既懦弱无能,又胆小怕事,他们几乎总是避开每一场决定性的战役。首府的一个官员也对我们五位公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29卷,1857年。——译者。

开表明信仰的基督教徒说：“既然你们不愿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那么你们就去监牢里念你们的祈祷文去。”我相信，要是肯支付一大笔赎金，官员就会释放他们。但是我们不能走这条路，因为释放了这一批，他第二天又会叫人逮捕第二批新教徒，这是没完没了的。因为这些衙役们是贪得无厌的，如同中国人所说是“喂不饱的”。

然而，尽管官员们和其他一些有权势的人物纠缠不休，但上帝的慈善事业仍然一直向前发展着，而且宗教信仰仍继续牢牢扎根于这个省。啊！如果我们能充分和完全地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丰硕的成果！这里的百姓也就用不着担心害怕，他们就会成千地归化基督教。你们虔诚的会友们神圣的祈祷、施舍、你们的虔诚以及传教士们的努力工作将一定能感动上帝的心，我们相信我们期待渴望已久的解放之日总有一天会到来的。

这个省有很多伊斯兰教徒，伊斯兰教徒也就是汉语所说的“回子”。几年以来，他们的人数已达上百万。他们不停地作战、抢劫、杀人、放火。他们反对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也反对他们。但我们的基督教徒除外，因为我们不参与他们的事情。一方面，官兵们害怕这些伊斯兰教徒，并担心与其官员们一起落入他们的手中，这就导致了无休止的抢劫。另一方面，商界也因此而遭受巨大损失，因为商人们不敢取道和沿着被他们占据的道路去做买卖。这同时也给我们信件的邮递带来极大的不便，来往信件只能在偶然的情况下才可以成功地通过这些地区。因此，国家事务陷于一种十分混乱的状态之中，以致于人们难以预料这种局面何时能结束，也不知道会有何种结局。上帝多么怜悯这个可怜的中国啊！能够挽救中国的唯一迅速而又可靠的措施就是她诚心诚意的受归化。所有欧洲虔诚的生灵和我们永远联合在一起，一道请求上帝给予恩典。上帝是

无比的善良,无限的仁慈。这个陷于绝境的帝国需要一个君士坦丁。

确确实实地说,我们现在还处在天主教的老迫害狂时代,即尼禄(Néron)、图拉真(Trajan)、戴克里先(Pioelétien)、背教者朱里安(Julien)等的时代。在我们这些耶稣基督心爱的传教士和基督教徒中,有的手脚被捆绑在一起扔进了大海,有的戴着镣铐被关进了可怕的监牢并常被判处饿死在监牢内,有的在遭受可怕的酷刑后被勒死,还有的最后被砍头剁成碎块。人们曾见过杀害马奥斯多先生的刽子手吃其心脏的场面。在中国竟然还有吃人肉者!这就是中国政府对于过去和现在给予她巨大帮助的法国表示感谢的方法。这次如此,以后也永远如此,官员们将不会忘记用谎言向外国人表示感谢。中国的这些达官贵人面对小小的敌人竟如此软弱胆怯,而对无辜者却大发雷霆。对于他们来说,无辜者丝毫不会使他们害怕。他们是一些只崇尚武力而被恐惧牵着鼻子走的人。

云南省是帝国地域辽阔的省份之一,如果这个省有一个贤明的官府和良好的秩序,那么它也可能是最富裕的省份之一。该省也是人口稀少的省份之一,它只有150万左右的人口。此地尽管多山,但也有不少壮观的山谷、辽阔的平原和一些养有许多鱼的湖泊。当地的生活必需品样样俱全。然而,百姓们一般仍很贫穷和不幸,这主要是当地官员们所造成的后果。在和平的年代,这里的生意兴隆,当地盛产的金、银、铜、铁、铅、锡、煤等矿物闻名全帝国。在腾越州(厅)和大理府,均有许多宝石出售。在后一个城市,还有一些漂亮的大理石采石场。如果我们十分安全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材料建造起一座漂亮而雄伟的教堂!

我想,明年10月,我将在这里为两个神父授神品。这将给传教区增加一笔开支,但继上帝之后,还有传信部——我们的第二个上

帝,它如此富有怜悯之心,是如此慷慨大方的母亲。所以我们不担心没有救济。

枢机先生们,请接受我们深切的谢意和崇高的敬礼!

宗座代牧主教 袁绷索(Joseph Ponsot)

又及:我获悉在云南省府发生了大骚乱,亨总督^①令人杀害了所有的伊斯兰教徒,从80岁的老人到吃奶的婴儿,男人、妇女无一幸免。多么可怕的残杀!同时,他还向全省所有城市发布一道可怕的法令,命令官员们以他为榜样,对所有的伊斯兰教徒和“苗子”进行抢劫。我同样也担心着我们基督教徒的命运,他们也可能是这道法令的牺牲者。

陕西宗座代牧主教高一志致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书简^②

1856年9月6日于陕西

先生们:

首先请允许我向你们说明,在刚刚流逝的三年里,尽管我应该给你们写信,但由于连绵不断的悲惨战争环境所影响,致使我连一封信也未能写给你们。今天,骚乱者已远离该省,而且道路的通行也更自由了,所以我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把有关我这个使徒的副本堂神父教区的情况告知于你们。我高兴地告诉你们,几个月以前,我就收到了你们的来信以及你们恩典于我的一部分津贴。为了感谢你们的厚待,我只能在信中向你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并请求上帝越来越多地恩典传教区那特别慷慨大方的慈善机构。

① 指云南总督亨善。——译者。

② 译自《传信年鉴》第29卷,1857年。——译者。

下面扼要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三年以来在我们传教区所发生的事情。当地的异教徒们在恶魔教唆的启示下，向我们施行了他们最常用的一种阴谋，他们到处散布有关我们的各种诽谤性传闻。一传十，十传百，事情很快就在一大片地方传开了。例如，1853年复活节前夕，在方圆一天多路程的各个地区，都流传着有关我们及我们一些邪恶念头的谣言，传说什么我们在房子下面挖了许许多多宽阔的地道，地道里积累了各种各样的食物，甚至还有五十多座磨坊，还藏有2000人；我们准备一有机会就向省城西安府发起进攻，不用说我们已和帝国的叛乱者建立了联系，尤其是还和广西省的叛乱者有往来。这些愚蠢的谎言好像真有其事一般地传进了当地最高官吏们的耳朵里了，衙门中的老爷对此又不敢进行大张旗鼓的公开调查，只好多次在夜间秘密派遣密探在我们住所周围进行监视。

然而，省府一直笼罩在最严重的恐怖之中。大家都已知道我们要向省府发起进攻的日子。其实这场恐怖活动的肇事者大官老爷已做了许多准备：他派遣许多兵勇出城去，或是替他辩解，或是为了防备我们，定要把我们消灭在他们的阴谋之中。我们处在极大的危险之中，仁慈的上帝让我们逃脱了这一危险。一些下级官员向他们的上司提出，在采取特别措施之前，最好应该由刑部做一次调查。大官吏根据这个意见，派遣一个军官陪同三位文职员去我们住所进行调查。他们来到离我们的住院最近的高陵县城后，三个被遣来的人在这里停了下来，正如他们向一些人解释的那样，他们不愿意为此而冒这么大的生命危险。那个军人乔装改扮后，被派去只身进行侦探。他得到了我们所有人的最好款待，同时他还按自己的意愿对我们整个住院进行了仔细的搜查。然后他向我们说明了其使命的目的，并告诉我们说他一回到高陵县，就会有三个巡视官到这

里来找我们。实际上,他走了不到两小时,就有三个人和一队衙役来找我们了。那时,我离开家已有半个多月了。留在家里的只有一位欧洲教士,一位土著教士,一位汉语教师 and 所有仆人。那位欧洲教士有幸及时去找一些基督教徒,他们把他藏了起来。其他人则在家听任官员们的处理。官员们窜进我们的两栋住房(即我们的神学院和我的住院),他们对所有最秘密的隐蔽角落一一进行了搜查。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能表明我们有阴险计划的证据,于是便就我们修道院长的情况进行了长时间的审讯,其目的是想了解他的来历及其为人情况。我们的人由于过分害怕而不能十分肯定地作出答复。官员们由此而产生了怀疑。因此,他们决定临时从这里撤出。他们后来又撤退到了邻近的一个城市。

第二天一大早,三个衙役奉命把我们的所有人员及各级神职人员都带到衙门大堂再次对这些人进行审讯。他们由于要对簿公堂,所以心咚咚地跳得更厉害了。这次审讯的问题仍和头天夜里所提的问题一样。然而最终宣判的结果是修道院长必须要在两个月内上公堂听审,否则我们的两栋住宅及所有的东西都要被没收。审讯结束后,我们的人随即都被放了回来。两天后,我获悉了这件事的详细情况。经过考虑,我打算采用一种能避免灾难的办法来了结这件事。我先对各种事情进行了周密的斟酌,又向上帝恳求给予救助。事毕,我决定让人从我们的使徒副本堂神父教区的边缘地段把一位土著教士请来,这位教士出生于陕西省,他在副本堂神父教区任司铎职务。使我决定采取这个办法的原因,是我们的一些人早已说过修道院长来自于那个省,他曾经为了某些事情去过那里。这位中国教士身体虚弱,他在赶路途中患了中风病。尽管如此,他经过12天的艰难跋涉后,终于在规定期限届满时来到了我们身边。我利用仅有的时间对他应采取的办法提出了我的看法,并且做了充

分的准备。在上帝的保佑之下，我派他去见等待着他的官老爷。

这位中国教士来到大官员面前后，他按照中国礼仪的规定，脸朝地跪拜在官员面前。官员向他提出了有关几位首领情况的问题，他都一一做了适当的回答。一切就在这无关紧要的讯问中结束了。多亏了上帝的救助，才使我们从困境和担忧之中解脱出来。我们随即召回了我们的修道院修士及老师。暴风雨过后便恢复了平静。这一天，我们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宁。异教徒们再也不敢反对我们了。感谢上帝的降福，这场几乎使我们遭受不可抗拒的破产的风暴消失了，并且由此而带来了最美好的平静时刻。

仅仅几天以前，一位和尚来找我询问有关我们神圣宗教的知识和解释。他之所以来找我们是因为他读了一本异教徒的书，书中写到了分布在中华帝国的各种教派的情况，其中有一段记载了几条有关我们信仰的内容。我和他就他特别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我立刻被他的歉意，接着是他的眼泪和谈话所感动。他承认说我们的宗教是真正的宗教，而且他不再对他的神位有丝毫的怀疑。接着，他对我们说，他几年以来走了一个省又一个省，一路上参观了一些浮屠，但是他从未感受到过这种内心的喜悦。“啊！”他不停地重复说，“我找到了真正的神灵，而人们在这个辽阔帝国的土地上所崇拜的全部偶像只不过是些被神化了的谎言。”这位初学教理者具有一种非凡的才智，他那最热忱信仰的种种表现尤为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为了充实他的宗教知识，他已经三次来到我们的住所求教，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使他在圣水的洗礼中获得新生。根据他的功绩和虔诚，我敢于肯定他受归化将对一些不幸的非基督教徒的灵魂产生良好的影响。

在兴平县的一个名叫漕浦的小镇子里，有几户基督教徒之家。那里有一个崇拜偶像的人，此人骄横古怪，当地所有的居民都十分

害怕他,以至于谁也不敢碰见他,为的是不与他打交道,更不和他家的财产沾边,以防止他抓住伺机报复的把柄。很久以来,他的妻子就拥护《福音书》。但她高度保守其秘密,因为她害怕她那任性、凶猛而又特别反对基督教的丈夫。这个可怜的女人只能呻吟悲叹。为了拯救这位迷途的生灵,她坚持不断地虔诚地祈祷。多亏上帝的无限慈悲,这条凶残的狼终于变成了一只驯服的绵羊。有一天,他从地里干活回家,他一进屋就发现其妻子正跪拜在地上全神贯注地在做祈祷。他刚一见到其妻子就问:“你在那里做什么?”听到这十分熟悉的声音后,这位女新教徒吓得发起抖来,几乎不敢呼吸了。她张口结舌,连一个字也没能说出来。其夫接着说:“你是基督教徒!为什么瞒着我?但你不应害怕,我也想做一个基督教徒,你教我吧。数日以来,我就打算信奉基督教了。”恢复知觉后的妻子听到这一席话后,抑制不住其内心的高兴而叫喊起来:“啊!我的上帝啊!我多么感谢你!感谢你终于满足了你这虔诚而又悲伤的女仆的要求。”

现在,此人已加入了我们望教者的行列。一个月以前,他来到我们的住院,我通过他了解到了这些令人快慰的详细情况。用当地基督教徒的话来说,他从那以后就成了我们同乡中最温存而又最爱好和平的人。至今,他为在非基督教徒面前维护自己的信仰表现得十分勇敢。其他被征服的人也跟着他归化了基督教。他那坚定和虔诚的表现感动了他身边人的心:他的弟弟(一位和他一样刚毅的人)、他的儿子以及他那与一个异教徒结婚的女儿都以他为榜样。他们都以最焦急的心情等待着能穿上白色圣洗礼服的那一天早日到来。为此,我必须立即给他们派去一位教士。

我还要谈谈我们一个传教士被捕的情况,这位传教士名叫彼得罗(Serasino de Campo di Pietro)。他诞生于那不勒斯王国,于

1854年8月19日抵达这里。这位神父生活在一个分散于一座小山腰中的基督教会口之中心。山脚下有一个大市场。有一天,天刚拂晓,就在房东开门之时,一个班头和他的七八名衙役趁机突然冲进传教士的卧室,无缘无故地用一根铁棍在传教士的胳膊上猛击一下,他的胳膊上顿时出现了一道令人疼痛不已的伤口。然后,他们把他的两只手反绑在背上,让他光着脚,把他当成一个罪犯一样带走了。他们让神父在身着这套可怜装束的情况下,停留在聚集的人群中央。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欣赏如此奇特的场面。围观者都思忖着:“他是一个小偷!他是一个流浪汉!他是一个无赖!但是,他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还留着红棕色的胡子!多么可怕的鼻子!他是什么人种!”总之,我们可怜的传教士成了所有这些粗野的围观者们消遣取乐的笑料。这种种虐待和嘲讽使这位和善的殉教者想起了救世主耶稣基督所遭受的耻辱,他想到从今以后他再也不是耶稣基督的信徒了。此时此刻,他在为耶稣基督的圣名而遭受苦难。这种场面持续了几个小时。然后,衙役们把他抬到一辆大车里,以便将他带进周至县城,并转送到衙门。官老爷开始问他从哪里来。传教士承认说他从欧洲的一个国家前来。听了这一回答,那名行政长官在后来的审讯中就对他十分有礼貌了。有一位异教徒,曾经是一户基督教徒之家的朋友。他在提出愿意为这位传教士担保的同时,还向官员提出要把这位外国人带到他家去的请求,这一请求得到了官员的同意。第二天,传教士被传讯到公堂。衙门方面向他问了几个问题以后,还为他准备了一顿便餐。他一吃完饭,人们便要他上了车,以便把他送到省府去。到了省府,又对他进行了短暂的审讯。从审讯室出来后,他就被关进了臭气熏人的黑牢,和他关在一起的还有各类罪犯、小偷和强盗。如果基督教徒们不赶快送钱给监牢狱卒的话,谁知道还要关他多久呢?后来,他终于被转移

到了一间稍微好一点的牢房,因为这间牢房里起码只关押了他一个人;也幸好是这样,因为他的监禁期延长到了一年半的时间。当我突然想到要随给赵芳济(Maresca)主教大人及法国领事的信件一起寄去一份邮件——一张极好的诉状时,他已遭受了各种各样的审讯,但一直没有对他作出任何判决。在赵芳济主教大人和法国领事看来,仁慈和活动高于一切,于是他们负责向驻防大臣提出交涉,多亏了他们积极有效的活动,这位虔诚的被俘者很快就得到了释放。

请接收,先生们……

宗座代牧主教 高一志(Ephise Chiais)

一位高级教士致会友的一封信筒^①

1857年9月15日于江西省桥头

大约在八个月以前,曾福定(Ferdinand Montels)先生一直居住在吉安府省,由于多病,他几乎只管一些弃儿的营救和抚养工作。1857年6月24日,他收到了中国遣使会司铎谭先生的一些邮件及一封书筒。谭先生的传教区与曾福定先生的传教区相隔大约七法里^②。这是谭先生的紧急邀请,他因病重不能在这次考验中为曾福定先生做助手。曾福定先生生活在被义军占领的地方,因此他留着长发。由于他必须途经帝制支持者们占领地才能抵达其会友驻地,所以他只得让人把头发剪短。但是他还须把剪下的头发包在其旅行包中,以便在他返回原地时作为证物,向义军证明他是不得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30卷,1858年。——译者。

② 每古法里约合四公里。——译者。

已而剪掉头发的。于是，他于6月25日偕两位基督教徒袁若望(Jean Yuen)和易彼得(Pierre Y)就这样出发了。在他们走了约三法里并渡过赣江后，碰上了一支帝制支持者的队伍，这些人非要打开包袱检查不可。由于包袱中有二三本欧洲的书籍，二三本中文书，特别是还有头发。因此尽管他一再申明他和义军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他是一位法国传教士，其工作是布讲一部经典教义、收容和赡养一些弃儿；现在是要去看望他的一位病危的朋友，这位朋友住在离吉安府不远的总部；随行的两位基督教徒是他的向导。但这些帝制支持者还是对曾福定先生的事务产生了怀疑。

6月26日，曾福定先生被带到了兵营，又被传至一个下属官员面前，这位官员下令给他带上了镣铐。他很有分寸地向官员指出这种做法是越权，并说明其权限只能是把他的送交总将领处解决。

这位官员反驳说他不仅有权给曾先生带上镣铐，而且还有权砍曾先生的头。

曾福定先生又说：“皇帝也没有这个权力，因为根据中法之间所签定的条约，在中国被捕的每一位传教士都应由法国当局的卫队护送至向欧洲贸易开放的其中一个港口。”听了这一席话后，这个官员或是由于听到一个囚犯向他提醒其职责而发怒，或是由于他最近一次败北而想报复，或是由于他不了解中法两国所签定的条约(因为该条约远不可能公布于全帝国)，所以他还是叫人砍下了曾福定先生及两位基督教徒的头颅并把他们三人就地埋葬在同一个坟墓里。

这些情况一部分是由谭先生向我提供的，一部分是临江府的基督教徒们告诉我的。当我再获悉有关这件事的其它一些情况时，我将通知居住在上海的财务司库的教士先生。

宗座代牧主教 F·-X·顾主教(Danicourt)

贵州代理宗座监牧佩尔尼致在巴黎和里昂的教廷传信部 枢机们的书简^①

1858年9月14日于罗马

先生们：

欧洲正注视着东方。此时此刻，中国正是大家担忧的对象。商业贸易焦急地等待着中华帝国向外国工业敞开门户。很长时期以来，善良的天主教徒们一直为可怜的非基督教徒们祈祷，他们终于敢大胆地希望在这块土地上能有宗教自由。生活在中国底层的一个传教士一无所求，他只是热情地渴望有一天能说：“上帝的谕旨是封锁不住的。”但是，先生们，我将会向你们承认这件事吗？尽管此时此刻在东方发生了这一切，但我仍然不相信传教事业会完全得到自由。

不管将来怎样，事实是中国的教会刚刚把三位新殉教者送上了天堂。事情的发生地离我所照管的这支小小的使徒队伍很远，正是这条传到法国的消息使神父和传教士从内心感到很激动。的确，当他读到这些信徒们的斗争故事时，心情很激动。他同时也为上帝感到高兴，上帝使他们用鲜血把自己与天主教联系在一起。如果可能的话，他们的牺牲将更加密切我与贵州省的联系。我心爱的新教徒们用鲜血浇灌了这块土地。对于我来说，这块土地变得更宝贵了。

贵州教团自开教以来便开始斗争。在半个世纪中，它遭受了40多次打教的袭击。近500名新教徒面对异教徒官员公开表明信奉基督教，至少有200人为了神圣的事业而被驱赶到鞑鞑地区，他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31卷，1859年。——译者。

们之中有 20 多人仍忍受着这次严厉的流放远乡的痛苦。暂且不说死在镣铐下的公开表明信仰的五名基督教徒。最近一些时候，他们为了宗教信仰而牺牲了生命，获得了荣光。这个省之所以大有希望，那是因为它比别的省经受了更多的考验。对吗？鲜血熏陶了卢朝明(Jérôme Lou)、黄·洛朗(Laurent Ouang)和林·阿佳特(Agathe Lin)等殉教者。他们为了自己的祖国，用鲜血浇灌了基督教的种子。

你们可曾知道，贵州省曾经是“苗子”部落的居住地。他们被乾隆的军队驱逐到南部和东部的群山之中后，便在那里独立地生活着。他们并不加入汉人的部落，汉人很蔑视他们，并把他们看作是粗野的蛮人。很久以来，我们就想向这些部落宣传宗教信仰。上帝终于为我们创造了机会，自从我们和他们认识以来，我们便为他们想出了最有利的主意。“仲家子”^① 部落已经得到了拯救。

那是在 1853 年夏天，我们的传道员和一位刚毅的中国教士罗多马(Thomas Lo)先生已在他们中间撒下了第一批福音主义的种子。郎岱县首先出现了一批被征服的人，卢氏家族便是拥护基督教的先行者之一。不久以后，他家五六个人就来到首府参加庆祝圣母升天节。这些新教徒的虔诚使我们很受感动，以致于我们为他们免去了参加升天节的一般手续。他们怀着最感人的虔诚之心聆听讲授教理。他们中间最年长的是卢朝明，他是一位十分精通汉字的人。听了他讲述的他的改宗以及他原有的观点后，我发现他是一位很有天赋的生灵，上帝寄希望于他。卢先生在梦中梦见了一位留有长胡子的老人，他身穿式样奇特的圣服，奉献了一份祭品。一整夜，这位新教徒面对这如此新鲜的场面看得出了神。醒来之后，他激动

① 指布依族。——译者。

地追溯着他所梦见的每一个详细的情节,他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意义。就这样,卢先生在首府产生了聆听神圣弥撒的虔诚。他见到教士在祭台时也不感到惊奇!因为他在梦中见到了那位在祭台的老人,那些神圣的装饰品和仪式。在整个庄严的献祭期间,他一直跪拜着,高兴得哭了起来。在走出祭台时,他带着一种能战胜最不信宗教者的语气重新讲述了他的观点。

节日过后,卢先生和他的同乡们返回了村庄。他日以继夜地埋头学习祈祷文和教理知识。他的举动带动了他的一部分亲属,也有一部分人总是反对基督教。卢先生则立刻对信奉异教的迷信行为进行驳斥,并且对宗教教育进行说明和解释。他在本村和邻近一些村子里讲道。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的一片热情终于收到了应有的成果。可以说,这块土地远不能满足他的才能的施展。他想到“仲家子”中有许多户人家已经移居去广西,所以他在茅口几位新教徒的陪同下亦于11月出发赴该省了。上帝乐于降福于他的良好愿望,并且高兴地利用他的司铎职务在该省传播宗教的种子。因此,他也就有幸几乎走遍属西林县管辖的瑶山小村庄的每一个角落。当他返回来时,他以无法形容的喜悦心情向我讲述了他所做的归化工作。我的会友和我都很钦佩上帝在这种场合的举措。有一位会友刚刚加入到了我们的行列,他的任务是在广西省传教。上帝为它新的使徒马奥斯多铺平了道路,对此,我们向上帝表示由衷的感谢。

12月,一些受归化的人来到贵州寻找他们的传教士,其目的是要传教士回到他们中间去。马奥斯多神父必须要一位向导和一位传道士。我自然想到了卢先生。我的话一出口,他就立即借一位年轻的使徒出发了。不论是在旅途中还是在瑶山逗留期间,卢先生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着马奥斯多神父,他这许许多多忠诚的举动只有上帝知道。

卢朝明抵达村子不久,一些十分仇视基督教的异教徒便告发了他。于是他和马奥斯多神父及其他2名新教徒都被捕了。此时,他仍然以其令人钦佩的口才为大家辩护。在他被俘期间,异教徒们成群结队地涌向监狱。卢朝明是一位普通的望教者,夜以继日地向这些好奇而又吃惊的人群进行讲道。20天后,官员释放了他们。卢氏认为他能为耶稣基督受苦而感到幸福,并将准备以双倍的虔诚去参加圣洗。赋予他新生的恩惠延续到了1855年夏天。附近的一些异教徒不停地对他进行打搅折磨,并竭力要毁灭茅口的宗教。在卢氏最亲近的亲戚中竟然有几个人与他为敌,反对信仰宗教。卢氏为此感到很痛心,然而他信仰宗教的情绪一直很高涨。那时候,云南省的总督亨大人,正从郎岱县经过。卢氏打算向他呈递一份请愿书以求得到他的保护。总督对他的请求表示支持。从那以后,异教徒们不再给这个地区的基督教徒找麻烦了。广西的崇教者大声疾呼要卢氏为他们安排洗礼,但在他改宗之时所发生的一些家务事不允许他接受其同胞们的心愿。他希望在下次陪同马奥斯多先生旅行时能获得这种失去的权力。马奥斯多神父只得避开卢先生出发,但上帝却给了他荣耀,使他把自己的鲜血倾洒在他本省的土地上。

后来,卢氏终于摆脱了家务的约束,他向本县的传教士宣布说自己愿意为宗教事业贡献出一切。由于他很有学问,教士很赞赏他的决定,并接受他参加到了望教者的行列。刚加入这支新队伍不久,卢氏就跑遍了好几个地方,在那里卓有成效地布讲《圣经》。

1857年7月,他的布讲活动激起了这些地区某些异教徒对他的反对,他们让一些衙役把他抓了起来。他被带到官员那里后,仍然竭力进行申辩,以至于官吏把他放了出来,并且派人跟踪他。结果,他非但没获得自由,衙役们相反却又一次给他带上了镣铐。梅

西满(Mihières)神父获悉这一消息后,急忙给他寄去了一些救济品,并给他带去了一封慰问信。此外,这两位送信的基督教徒也在为他的释放而奔波。然而,面对那些只想要钱才能妥协的狱卒和一位拒绝赎身的囚犯,事情又怎样能获得成功呢?贵州传教区的一条规定就是从来不自己赎身。如果我们的新教徒很贫穷,那么我们就须负担他们在监牢里的生活。事情就这样,他们的命运和我们一样,都掌握在上帝手中。卢先生的长子来请求官员释放其父亲。初审时,他还得到了较好的接待;到了第二轮审讯时,官吏审讯了他的宗教信仰问题。在审讯中,年轻人十分勇敢地公开表明信奉基督教。由于他拒绝践踏十字架,官员一伙人就对他施行残酷的杖刑。谁经受了这种酷刑都要发抖,并且亲身体会到了这种酷刑的名称的含义。然而,对于这位勇敢的年轻人来说,任何酷刑都不能动摇他的信仰。于是他们只得把他也关进了他父亲的牢房。囚禁一直延续到11月中,后来,永宁州的一位新官员赦免了他们。

当他们来到茅口时,他们高兴地见到了我们亲爱的会友梅西满先生,他当时正在那里对基督教区进行一年一度的巡视。他的巡视安慰了这些善良的新教徒,同时也再次激起了异教徒们对基督教的仇恨。异教徒们去衙门告发了茅口的新教徒。他们的行动是那样地神秘,以致于基督教徒们丝毫没有觉察到暴风雨即将要向他们猛袭过来。妇女们和年轻的姑娘们在汉族姑娘林阿佳特的带领下学习着教理。这位姑娘是我们省的杰出代表之一。她曾经给这个地区做了许多事情,所以她在所有的新教徒中享有绝对权威,新教徒们对她既尊重又喜欢。

在离此地不远的地方,我们这些望教者中间有一位名叫黄才(Laurent Ouang)的人,他做了不少的归化工作。有一位新的基督教徒曾经来到首府看望基督教徒,并出席他们的会议。黄才找到梅

西满先生,为的是把上帝对他所做工作而给他的恩惠告知于这位先生。然而,敌人却趁他们不在时在村子里四处游说,挑拨离间。所以当它们返回来时,村子里一些崇教者的处境完全变了样。他们的村长把百姓们集合起来与基督教徒们作对。于是打教就这样降临到了基督教徒们的头上。黄氏望教者认为应该暂时离开一段时间为好,他原想去首府,在那里过了新年后再返回。但旅途的不安全使他改变了计划。他于1月27日从该地区的新教徒那边来到茅口。这个地方早已为他留下了这种不平凡的恩惠。

同一天晚上,郎岱县的官员也来到茅口。对于当地的新教徒来说,该官员此行的目的还是一个谜,他们似乎还不知道异教徒们告发了他们。所以他们没想到在临近危险之时要采取的任何预防措施。晚上,他们仍照例聚集在一起做祈祷。卢先生的一个叔叔是基督教的死敌,他对其侄子的释放早就怀恨在心,并且一心想叫人再把他抓起来。他告密竟是那样急迫,那样积极,以至于官员都不能亲自去核查事情的真象。我们亲爱的新教徒还没做完祈祷,房子就被打手们包围起来了。人们抓走了卢先生和黄氏望教者,把他们一起送交给官员。随后立即对卢朝明开始了审讯。

这位勇敢的被俘者已经是第三次落入基督教敌人之手了,他不想仅限于回答官吏提出的预审性问题,而是直接了当地谈起了要审讯他的内容。不一会儿,他阐明了《福音书》的伦理,表明了一个基督教徒的生活是无可指责的。他说:“崇拜真正的上帝犯了什么罪?他每天都为皇帝和官员们而祈祷上帝,这难道是犯罪吗?他每天都为帝国祈祷和平并要澄清在帝国挑起混乱的缘故,这难道也是犯罪吗?我们的信仰要我们忠诚纳税,要我们尊重所有与天主教相一致的法令,难道我们维护这些告诫也是犯罪吗?对我们来说,背教、欺骗、邪恶、吸鸦片、赌博都是禁止的。谁能指控我们偷

盗？谁能指控我们侮辱他人？我们诽谤过任何人吗？指控我们的人可以尽其可能地利用我们所反对的人作证。我们的基督教只是教人热爱上帝，热爱为了上帝和因上帝而作出牺牲的人。基督教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升天之路，一条真正幸福的路。如果我们遵循这条道路是犯罪的话，那我们就甘愿做这样的罪人。”

官吏面对这种局面感到十分尴尬，于是他便以平庸的指控来掩护自己，说什么基督教是一种邪教。听了这句话后，卢先生更加发怒了，他以基督教教义为根据，以更激烈的回答驳斥了官吏。这种回答似一道强烈的光线直刺官吏的眼睛。接着他们开始了对黄才的审讯，他对审讯的问题作了清楚的回答。由于黄氏出生在首府一户老基督教徒之家，因此，对于他来说，除了受迫害之外，不会有什么新的东西了。再说，他又不是第一次因为《福音书》之故而被带到衙门。官员谴责他来到某县布讲宗教，并且还向他宣布说要把他当成囚犯带到省府去。

然而，经过片刻的慎重考虑后，官员不但没对我们这两位公开表明信仰的基督教徒施以任何酷刑外，而且还叫人释放了他们。卢朝明回到家以后，和他的儿子一起吃了最后一顿饭，安慰了全家，鼓励他们要相信上帝，要坚贞不屈。对于他个人来说，他早已作好了一切准备。茅口的这些善良的新教徒如此信奉基督教，以至于他们之中无一人想逃跑。其实，他们完全可以在夜里采取一些安全措施以防止第二天发生意外事故，但他们却仍然若无其事地在一起做祈祷，就好像没有任何危险要威胁他们一样。

卢先生的叔叔见到官员准备宽大处理这些基督徒时，就勃然大怒了。他立即以最恶毒的语言诽谤基督教，并且催促官员惩罚他们的主要信徒。他说：“为了制止新教派的发展，必须杀一儆百，我可以承担一切责任。但如果国内骚乱突然发生，那我将是无罪的，

官员将一人受连累,请官老爷三思而后行。”这一席话完全打消了官员的一切顾虑,对于骚乱的害怕取代了其它一切考虑。于是他对真理视而不见,并决定处决这些无辜者。对于卢氏和黄氏的处决已确定了,第三位受害者免以死刑。林氏贞女的无限虔诚更激发了茅口基督教徒的热情。为此缘由,卢三公对她也更仇恨了。人们把她指点给官员看,她不但不躲起来,反而还在暴风雨到来的前夕支持鼓励新教徒,并且在殉教时还在他们面前表现出最令人喜欢的样子。轮到官员审讯她时,她受审的时间特别短。对她的处死事先早已决定。夜里,人们选择了处决她的地点——茅口河边。刽子手们都已被指定,并为执行任务而作了准备。

1月29日,星期五清早,官员又让人抓来了卢氏和黄才、林氏女和其他六位新教徒。他最后一次强迫他们放弃宗教信仰,践踏十字架。勇敢的信徒们大声回答说:“宁死不弃教!”“我今天就要把你们处死在这里,你们知道吗?”“我们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但我们只害怕一件事,那就是罪恶。能为我们的宗教事业而献身,我们感到十分幸福,我们宁死也不背教!”说完,他们就跪拜在地上,为斗争的临终时刻而祈求上帝的保佑。在官吏的示意下,黄才,卢朝明和林氏都被带上了镣铐。打手们把他们与其他公开表明信仰的基督教徒分开,并且马上把他们带到了刑场。他们眼望着蓝天,虔诚地祈祷,坚定地走向刑场。在路上,卢朝明对其中一个刽子手说:“快点执行你的任务吧!免得我遭受更多的痛苦。”来到处决地之后,他们最后一次跪拜在地上,互相打招呼问候,祈求上帝救助,然后愉快地听凭刽子手们的安排。信号发出了,他们的头颅同时被大刀砍了下来,几位新教徒急忙来到鲜血淋漓、尚散发热气的受难者尸体周围。这三位信徒的头颅被悬挂在路旁的绞刑架上。躯体被扔进了河底的深渊。第二天晚上,基督教徒们把他们的头颅盗取出

来,并及时地掩埋好。

这次殉教的消息如同闪电似地在该省里传开了。它震撼了我们所有基督教徒的心,更震撼了圣·保罗教会学生们的心。在他们寄往法国的一封拉丁文书信中告诉我说:“一些人都在称赞贵州省辽阔富饶,在我们看来,我们却为这一小小的地区而感到骄傲。我们将可以说,中国的领土贵州省不是帝国中的一个小省……总有一天,我们将会收到用殉教者鲜血所浇灌的丰收硕果,并且决不会因我们的过失而否认这个世世代代证明的神谕:殉教者的鲜血是基督教徒们撒播的种子!”^①

我怀着最深切的敬意,为能成为你们谦卑顺从的仆人!

前宗座代牧主教佩尔尼(Perny)神父

来自教廷的传教士梅纳尔致外方传教会神学院阿尔布朗书简的摘录^②

1858年1月18日于我的监禁之地热河(蒙古)

院长先生:

在我们这里刚刚发生了一件严重而又古怪的事情,如果我要把所有特殊的事情都讲给你听的话,那就要写几卷书。但我争取用一封简短的书简把这件发生在我身边的十分复杂的意外事件告知你。如果你还觉得太长的话,那就请你原谅我这个可怜的囚犯,因为我觉得和朋友们交谈是最令人惬意的事。

松树嘴子基督教会口地处蒙古最东头,在离村子大约一法里半的地方修有木栏围墙,它把这块辽阔的土地和我们亲爱的满洲

^① 他们抛弃了本省的荣誉和享受,来到我们这个贵州小省并且取得了荣誉。我们认为为中国的小省贵州殉教是很有意义的。殉教者的鲜血是基督教的种子。

^② 译自《传信年鉴》第31卷,1859年。——译者。

隔开。这个会口一直是最平静的地方，打教之风也从未使这个地区有所变化。在有了上帝的保护之后，加上又有蒙古这块宗教的安定的收容之地，该地区无疑应该享有这种特权。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才使罗马在不多年以前把这个基督教区让给我们的宗座代牧主教，以便使他能利用那里令人渴望的安全和稳定形势来建立一所神学院而提供方便，在被严密控制而又一直令军队讨厌的满洲里，人们几乎不可能希望有这种安全性和稳定性。神学院建在这里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而且于附近还建了一座较为别致的小教堂。尽管设施都很简单，但却足够了。方济各(Verrolles)主教阁下委托我管理这里的学院，弗拉内莱(Franelet)先生负责我以前一直管理达六年之久的那个县。我们一起生活在我们这座新建的小住院，比起国王住在他的卢浮宫要幸福千倍。然而，也许是我们离多疑的满洲里太近，我们这个邻居使他们产生了疑心和忧虑；也许是这个魔鬼对于地处他们宝塔旁边的这座神圣的庙宇以及在这里培养起来的旨在不久将向他们发起危险战争的年轻教士产生了猜疑，也许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珍惜我们享有的宁静，所以我们终于感到这种宝贵的平静远离我们而去，至少是暂时远离我们而去。一场令人可怕的暴风雨终于在去年8月份突然降临到了我们头上，向我们露出一副最咄咄逼人的面孔，使我们预感到一场最凶残的迫害即将来临。

敌人把各种各样的最荒诞的谣言传到了几个怀有仇恨心和嫉妒心的异教徒那里，这些谣言还开始在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人中间流传。听了这些谣传，我们刚开始只是一笑了之，后来这些谣传变得有点像真的一样了，流传范围也渐渐地扩大，传到了远方。不到一个月，就传播到了整个地区。在方圆近百法里以内，到处都听到在议论松树嘴子村，这时的松树嘴子村就好比是一个积满了能

量即将要爆炸的火炉。在离村子大约一法里半之远的木栏围墙的一个入口处,有一名小官员站岗,他被流传的不祥之谣言吓得胆颤心惊,他于是便召集了村子里的几个人,让他们负责在他那个地区的大堂上控告我们。在这许许多多的传说中,我将向你介绍这个村子里所发生的最严重的、最损害名誉的、最像真的几件事:

“我松禄是松林子门(Song-Ling-tze-men)或松树坡的关务人员,我有幸把一些西洋人在朝阳区松树嘴子村为上帝建造一座神庙的消息告知于锦州府的几位著名的修道院院长。事情是这样的:西洋人建起了一座塔楼,修建了上百栋形状稀奇古怪的房子。他们还在那里修了地道,筑了空心墙,里面隐藏有700—800名白人,这些人蓄着红胡须,留着长头发。现在他们正在制造叛乱的武器,生产用他们衣袖发射的箭以及其它一些违禁机器。白天,他们登山,测绘平面图,挖壕沟,捡石头筑城堡,做祈祷。他们不许任何人接近。晚上,他们扮成幽灵,在人们酣睡之时去剪他们的头发,他们还剪鸡翅膀。他们收买小孩,然后把孩子们的眼睛和心脏挖出来,取其血来充实他们的魔力。他们有一些白鸭子、狗和黑驴,还有一些其它用来施魔法的东西。他们买了许多驴皮,然后再把驴皮剪成人的样子,放进大坛子里发酵,接着再把从孩子们身上抽取的血与白鸭、狗和黑驴的血搅拌在一起,一切就绪后,他们就借助这种混合血来使被剪成人模样的驴皮变活,然后让它们投入战斗,参加打仗。瞬间,他们进行最远的旅行所需要的一切都可准备好:他们骑上马,站在木凳上。一夜之间,这些木凳就可以把他们运送到西洋,等他们载满了金子和银子之后,再把他们从西洋带回来。他们靠什么维持生活呢?这就是他们的秘密。因为人们从未见他们购买过那么多人所需要吃的食物。在他们住的地方还有很多大炮,其中四门大炮总是瞄准着他们那个院子的四个角。”等等。

对于人们散布的有关我们的这类种种荒谬之事，我就不谈了。然而，我还得请你再听下面一个美妙的故事，它将能使你对于中国人想象力的丰富做出评价。

一个异教徒说，他曾混入到我们的新教徒中，并进到了我们的教堂里。传教士问他是否愿意做一个基督教徒，他回答说很愿意，但他的妻子反对。传教士要他回去从他妻子的头上拔一根头发来，他的妻子即刻就不会再反对了。这个异教徒怀疑是某种魔法，并且又担心她的妻子中魔，所以他拔来了一根马鬃。然而，神父一看就发现比女人的头发要粗些。异教徒为了表示歉意，他告诉神父说他的妻子很坏，他不敢去拔她的头发。传教士反驳说：“那好吧！你把这根红绳子拿去系在你妻子的头上。”异教徒总是害怕他心爱的妻子受害于某种魔法，善良而又忠诚的异教徒把红绳子系在马尾巴上。结果，这匹马立刻发起狂来，吼叫着直朝我们的村子跑来，一头撞在我们的门上。

对我们的指控在证实了所有这些无稽之谈的同时，还引起了令人难以相信的恐慌，恐怖笼罩了农村，一些衙门和整个城市也都敲起了警钟。交易中断了。文武官员商议着应采取的措施，人们谈论着军队非同一般的集聚。一时间，留哨队如同临战前夕一样组织起来，到处是沮丧和恐慌。也许是魔鬼高兴制造恐怖气氛，也许是敌人采取新的对策来伤害我们，不管怎样，邻村的异教徒却肯定地说他们看见了许多群幽灵于夜晚在街上来来往往，制造许多可怕的灾难来威胁他们。许多母鸡被剪掉了翅膀，在周围地区于夜里还发生了几起偷盗事件。他们把这些现象都归罪于我们那些神奇的驴皮，他们说这些驴皮是在这些秘密的小规模出征中经过训练和锻炼的，并且还将在未来可怕的战斗中得到锻炼，立下战功。

就在这个时候，村子里四个因犯罪而出名的令人可怕的恶棍

落入一名官员手中，他们告发我们是他们的同谋，并且说我们的住院是他们经常碰头的地方。无须更多的解释，附近的异教徒们就都因此而到别的地方找寻最安全的避难地去了。他们抛弃自己的房屋和已播种的土地，并残酷无情地向欠债人索取债务，以满足他们移居新地的需要。唯有我们的基督徒们却仍然安定地生活在这一片恐慌之中，他们和平常一样耕种其土地。上帝之子的镇静与恶魔之奴隶的混乱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照，这种对照就更激怒了他们，更加剧了他们对我们的反对。他们卑鄙地驱赶在他们家中当仆人的某些可怜的基督徒，并把其中一名基督教徒的头发拴在一棵树枝上悬空吊起来。有一个异教徒曾经把他们一个只有一个月左右大的小女婴托付给邻村的一位新教徒。不久之后，他获悉其女儿已经死亡。但他对她的死因表示怀疑，于是他当着一大群异教徒和基督教徒的面挖开了墓穴。小女婴已入土近六个月了，人们看到里面有一口棺材，一些给死者穿戴的衣服碎布片。此时，人们都很感动，因为当地的异教徒们通常把死亡的孩子扔在田地里，以作为残忍的肉食动物的食物。然而，当在场的目击者看到这具小尸体已腐烂，唯有眼睛和心脏均完好无损时都惊奇不已！这一件事如此及时而真实地驳斥了上文不远处有关对于基督教徒的诽谤，下文不远的地方有关神父本人在大堂上得到官员们的极大赞赏的一段文字也将证实了这件事。

我们的基督徒被指控参与谋反和施魔法，而且还一直被认为是共谋。在关务人员披露之后，也就是在8月21日，有一名基督徒很快就被衙役们在其家中抓捕，并被押解到衙门审讯。第二天，另外两名新教徒父子也被抓了起来，被吊在他们出售水果的市场。对此，我们感到很担心。因为在那时的中国，最轻的谋反怀疑者也要立即处以死刑，而主谋则要遭凌迟之刑。然而，在人们看来，

我们比可疑人更严重,我们是被依法起诉的人,即已由公堂侦讯的人。但是上帝来拯救了我们,它给我们其中一位正直的基督教徒以灵感,赋予他美好的念头,鼓励他在官员对第一个被抓的新教徒进行审讯之时,挺身而出来到官员面前。他按照惯例,先向官员下跪,然后向官员提出了反诉。他以有力的措词,义愤填膺地否认了所有强加在我们头上的罪名。他坚决要求官员亲自或派衙门的人去搜查我们的住院,并表示愿以自己作人质,直到搜查人员返回。如果他的声明有某些错误的话,那么他将愿以他本人及全家人的性命作担保。这一富于牺牲精神的行动,让人十分感动,充分表现了他的真实和无辜,并给官老爷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此时的官员为相信了无稽之谈而感到羞愧。或者是为了给在大堂上受传讯的这个正直的基督教徒恢复名誉,他以最美好的语言赞扬我们神圣的宗教和我们的教徒,直至当堂宣布已故的道光皇帝在他临终之前曾悲伤地责怪自己在执政期间打扰了基督教徒,并承认他们是他最忠诚的和最可靠的人。

我们这位正直的基督教徒的举动使这座不安的城市更不平静安宁了,同时也没有阻止了对新教徒的逮捕。从第二天起,民事、军事两个衙门派了一些衙役对我们的住院进行搜查。而当团首来到离我们村子一法里的地方时,他感到很恐慌,于是便一边喊着他着魔了,一边往回跑,他感到被我们的魔力弄得头晕目眩。几天之后,他冒险又一次出征,结果又和上次一样。民事衙门的代言人最勇敢,代言人一心一意为了拯救天朝。就在同一天,代言人冒着落入驴皮人之手的危险,竟一直来到我们的住院。来者的神态和活动反映了他们精神上的忧虑和头脑的混乱。你可能高兴地得知这支勇敢的队伍里的贝亚尔(Bayard)已被晋升一级,以此作为对其勇气的奖赏。于是,来者仔细地察看了我们的住院,我们那八只多产的

鸭子,以及我们那两条看家狗则好像因某些坏事而感到良心上的责备一般,都跑到这些来人的身边。它们的举动给我们带来了一场大笑,幸运的是除了看出它们调皮狡黠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值得怀疑的地方。我们的驴子在这种十分壮观的接待中也发出了悦耳却又很吵人的叫声。来人要把我们这极普通和极简朴的住宅与教堂的平面图画出来。为了证明我们真是法国人,是天朝真正的忠实盟友,我们出示了自己的担保书,这是我们忠诚的驻上海领事敏体呢(de Montigny)先生受了神灵的启示发给我们的。这份担保书使我们博得了官员们的好感,在这件事中起了重大作用。对于我们来说,他们的检查是出于对我们最大的尊重。返回时,他们不但相信我们是无辜的,而且还从我们的住院看出我们是很有条理和很有礼貌的人。他们向官员呈递的赞扬我们的证明报告,使得官员立即释放了我们那四位被监禁的基督教徒。

也许你以为我们不幸的遭遇到此就已结束了吧?然而,恰恰相反,这仅仅是开始,而且事态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恶化,因为几乎每日都有络绎不绝和成群结队的来访者,他们来自各个角落,来自遥远的地方。他们这一部分人是为了来证实事情的真实状况,那一部分人则是为了参加他们所认识的几位基督徒的葬礼。因为有人说有几个基督徒由于绝望而上吊,或者由于害怕而被吓死。除此之外,还有化装的官员们的秘密使命,这些人跑遍了农村,获得了一些消息,搜集了一些民间传说。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接受了两省八区相继指派来的12次正式调查,这些调查都比第一次要隆重。

然而,你会说第一次调查承认并证明我们是无辜的,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调查呢?实际上,这是一种令人费解的做法,除非是在这个地区。应该向你们说明的是,一开始接受对我们指控的那个衙

门立即把诉状转到了设在沈阳的省高级衙门,他们是在送走起诉书之后才到我们住院进行搜查的。沈阳衙门收到起诉后,又立即把诉状通知给了热河大堂,事后才派遣两位官员从近 80 法里的地方赶来对我们进行两次不同形式的搜查。就这样,诉状从一个衙门转到另一个衙门,随后,各衙门也就一一派人对我们进行搜查。毫无疑问,先审理,如有必要的话再报高一级正堂裁定,这是最公平合理的。然而,这还没有完,每个代表都在最融洽的气氛中对我们进行搜查,写出一份赞扬我们的笔录。然而,又和第一次安排一样令人难以解释,每个衙门都满足于得到其代理人写的笔录,谁都相信我们的看法,也用不着要通知其它衙门,一切都听凭代理人自由活动,自我反省。每人都把错误移转给别人,把真实情况保留下来。这种稀奇古怪的行动方式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其中主要是我们几位基督教徒在一些地区被捕,他们只是来看我们晚了点,如果第一批来访者发表了他们的检查报告,证明我们是无辜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被捕了。

在被监禁的新教徒中,人们想让其中一位还未受洗礼、新近刚归化于基督教的人叛教。官员把两条木块摆成十字形,放在他前面,并且要他从上面走过去。这位新教徒还没明白官员此举的目的,便依从了他。然而,官老爷指责他自称是基督教徒的目的就在于要骗官,可怜的望教者弄明白官员此举的用意之后,便对刚才想嫁祸于他的突然袭击提出强烈抗议。他们于是又把他关进了牢房,他就这样一直长期受折磨,直到我们的案件得到澄清后,他和别处被关押在牢房里的基督徒才得以释放。

然而,地方当局的沉默却招来了不幸,上级衙门怀疑地方政府被收买。由于这种猜疑,热河和沈阳两个正堂商定各自派一名忠诚正直的官员一起来搜查我们的住院。热河的总督把两个高级官员

的即将来访告知于我们朝阳的官员，吩咐这位官员要为他们安排住宿，陪同他们去搜查，要以特殊的礼遇招待他们，使他们完成好这一重要使命，一切费用和开销均由总督本人负责。这位官员听到这种消息后犹如晴天霹雳，感到很激动。他也不再怀疑他自己的失宠，于是他第三次跑到我们的住所。这位官员是一位老满族人，他极其单纯、坦率。他从不相信强加于我们的事情，对他们的招待比对第一批来访者更恭敬热情。他对法国，对我们表现出十分好感，声称我们是贵客，或是远方的兄弟。我们大家对此感到非常吃惊，他对我们神圣的宗教赞不绝口，认为我们的基督教徒是最正直的人。不过他还是希望能阻止这次预定的高级人物耗费巨大的来访。他尽可能准确地画下了我们住房的平面图，丈量了我们的院子，测量了我们的门窗等等。他然后请求我们陪他去城里，以便去公堂画押，因为法律要求要申报我们的姓名、年龄、职业、国籍以及我们来中国的年代。他向我们担保这次奔走活动可以使我们的一切事情了结。此外，他还以自己及其七个孩子的性命发誓说，填完这张表格后，我们就可以马上返回到我们的岗位。因此，我们只得接受了他的要求。我由于身体状况不佳而免了这趟旅行，而我的同僚弗朗内莱先生跟着这位官员进城去了，官员让他自己决定是住客栈还是住在为他免费提供的官方馆驿。

不幸的是，我们这位善良的老满族官员所采取的一切预防措施都太晚了。第二天，当人们通知他热河高级官员来访时，他那美好的愿望就变成了泡影。原来，来者是哈达市的首席官员，皇室成员。他下令把弗朗克萊先生看守在客栈里直至调查结束。然后，他立即去找在邻城等着他的沈阳的代表。他们的来访一直由我们区的一个老官员陪同，他取代了我们的起诉人，因为我们的起诉人为官吏集团奔波效劳而被逐出门外。这就是在我们的住院经过许多

次搜查之后的处境,也就是说我们一直被指控并被看作是谋反和施魔法的罪人。

当这次新的危险来临时,我们还在商议应该采取的办法。我们到底是冒着被抓走的危险等待他们的到来还是让我们的人先转移到安全之地去而撇下房子让他们搜查呢?经过和我们的基督教徒们商量后,我们认为逃走不能打消对我们的猜疑,而留下来正是一位司铎为其信徒们献身的机会。我们在场,可以承担全部责任,掩护我们的新教徒,保护他们,对付公堂对他们的欺负。同时,我们认为我们撤走还可能给我们返回到基督教会口带来长时期的困难,也给以后替换我们的传教士的居住带来不安全的因素。因为当局仍然怀疑我们的住院,他们还得继续对我们的住院进行监视。再说,过去的事实表明,人们对我们是信任的,而且我们现在不也看到了调查正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吗?和来访者进行一刻钟的会谈就足可以说服他们相信我们是无辜的,并且彼此还能成为朋友。就这样,我们的正式会谈在令人惬意的娱乐气氛中进行,大家或者沉浸在我们的小管风琴悦耳的琴声中,或者在思索着我们美好的前景,或者在欣赏我们其它的欧洲奇物。接着,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突然出现了一只小而漂亮的蒸气咖啡壶,惊愕不已的官员们眼看着从壶里流出一满杯咖啡,并都谦恭地觉得咖啡比中国茶更好喝。我们向他们布讲了我们神圣的宗教,我们的解释推翻了反对我们宗教,反对我们和我们基督教徒的偏见。最后终于使得对我们的指控以及后来的一切活动给我们带来的利大于弊。即使是被捕,我们也为我们亲爱的基督教徒能得到精神上的援救而感到安慰;遣使会虔诚的波兰教士格特里歇(Goettlicher)居住在离我们村子还不到一法里的地方,他没被告发到公堂,并且还躲过了这场风暴,有幸逃脱了官府的围困。我们得知这位亲爱的同伴仍然能

和过去一样自由自在地来来往往，走访他和我们的新教徒，而没有任何人敢反对，甚至无人过问。

10月29日，我接待了四位著名的来访者，陪同来访的还有一批为数可观的随从。来自各方的好奇者人山人海，把我们的村子和附近的山丘围得水泄不通。在这里，人们从未见到过如此多的官吏。我一面请这些达官贵人走近金球和水晶球，一面把他们引进我的住院，进到屋里后，他们的表现正好与前面的来访者那种友好的态度相反，他们首先立即向我开始了第一次正式的审问，气氛显得不甚友好。“你姓黄吗？”——“对。”——“你是那个王国的人？”——“法国，你们帝国高贵而又忠诚的盟友。”——“你从何处登陆后来到这里的？”——“我刚来时，不会一个汉字，你想我怎么会知道仅经过一次而又从未再去过的小小村庄的名字呢？”——“你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地方的？”——“已晏驾的道光皇帝执政时的二十六年。”——“你经过了哪些地方？”——“我一路上经过了许多地方，其中有一处是委托给我们起诉人的卫兵守护的松树城门。”——“你是晚上经过那里的吗？”——“不，不是，而是正中午的时候。”审问我的人皱了皱眉头，咬了咬嘴唇。

我支吾搪塞地回答了其它一些问题后，轮到我向差官们提问了，我问他们是不是被派来收取这类情报的，或者是为了来看看我们住院是否有某些阴谋和魔法的迹象。接着，我补充道：“官老爷！皇帝用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在他的国家可以信奉基督教，而且他还赞扬基督教教义的精优，夸奖那些布讲和遵守教义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接着又说：“皇帝同意一位指控我们造反并施用魔法的小小官员的辟谣，而且他还发现在许多敢于搜集这些可憎的诽谤之事的官吏中有一些反对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几百年来，传教士们一直在中国传教，你们听说过有基督教徒及其立教人制造

混乱、煽动造反吗？你们的皇帝自己还曾把我们基督教的教士召进北京，并对他们倍加称赞，直至把他们提升到高级官员的显要地位。据说，我们的指控人一直坚持他起初的声明，并声称所有来这里走访过的官员或被我们收买，或中了我们的魔法，谁知道你们是否会比其他人更幸运一些呢？你们应该把这个指控者本人带在身边，也许他能看得更清楚些。”

开场白结束了，官吏们起来开始搜查我们的住院。我在提出感觉太累并想要休息的同时，又请他们对我不能陪同他们表示原谅。我只是在他们进来搜查我的卧室时才下床来。我向他们说：“你们在我们这里发现造反或者施魔法的什么踪迹没有？”他们以微笑向我表示回答。接着，他们请我把我的西洋镜（多景镜）指点给他看，而且还要我为他们表演管风琴。最后的表演使他们很开心，然后他们返回离我们村子有四分之一法里的客栈，没有让我跟他去，他们这样做使我也感到很高兴。这次，我满以为摆脱了他们，但是他们又让人叫走了我的传道士。不一会儿，我们的人又回来告诉我说要我去公堂为我的供状画押，一位官员还用他的车来接我，免得我步行这一段九法里的路。所有的官员都向我保证说，这张法律表格填写完后，我立即就可返回我的岗位。一位带顶子的师爷以名誉担保他亲自送我回家。我不太相信这些漂亮的中国式的声明。然而，我只得接受他们决定强加甚至采用暴力强加于我的这种冠冕堂皇的邀请。于是，我坐进了官员的车，在所有分级列队在路上的异教徒的众目睽睽之下，我由四位传道士陪同，跟在官军后面。来到城里后，我在客店里和法朗克莱先生会面了。

第二天，我们俩人都被公堂传讯，他们在公堂上又向我们提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和前面问的问题一样，只有关于我同伴的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是新问题。法官们较严厉地指责了我的同伴，说他

七年以前曾在这附近被抓过一次,后来把他送到广东去了,他竟然还敢返回这里。然而,我的同伴法朗克莱先生懂得怎样能使他们变得哑口无言,他抓紧机会一面控告蒙古王公和官员无视法律,对他进行虐待,直至给他带上镣铐。他接着又说,如果他们不负责把他引渡回去,他就自己向法国领事提出申诉。审问结束了,在为围观我们这两位如此著名的魔法师而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好奇人群的夹道欢迎下,我们回到了客栈。

第二天,即诸圣瞻礼节的那一天,我们又一次被传讯去公堂为我们昨夜的申诉状画押,只等到将声明中某句使欧洲人刺耳的话修改之后,我们才画了押。然后,他们什么也没说就送我们回客栈了。我们本以为一切都已了结,他们让我们自由地返回自己的岗位了。然而,当我们看到一些打手们在监视着我们,以阻止我们动身出发时,才发现我们的判断错了。我们白签了申诉状,一切都是徒劳。那两个代表已下令把我们拘留在那里。几天之后,他们又下令把我们押往热河。他们在第二天,便让我们这位可怜的满族老人支付给每人 200 银两(约 100 法郎)作为报酬,为了把在我们住院搜查的报告呈递给他们各自的上司,他们就走了。我们则被监禁在朝阳城长达 15 天之久。在此期间,我们善良的基督教徒可以来看我们。这些亲爱的朋友们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全,为我们不能返回到他们身边而感到悲痛。在这种形势下,他们像子女孝敬父母似的给了我们一些礼物和捐款,以便为我们的旅行和减轻被监禁的负担而提供一些必需品,此情此景令我们十分感动。

11 月 10 日,我们的满族官员让人叫我们去,他因曾许诺过我们能立即返回的诺言未能实现而向我们表示极大的遗憾。他通知我们准备第二天出发去热河,花钱为我们租了一辆车,还派了一名下级官员和六名仆从护送我们。

在为期七天的旅途中，我们经过了最荒芜的山脉，一路上还穿过了塔子沟和八沟两座城镇，才抵达北京的小凡尔赛城——热河。热河城位于北京以北 40 法里的地方。当时皇上的行宫就建在这里，所以它因此而惹人注目。皇宫建在山坡上，周围有长达 12 公里的围墙。里面一直由皇帝的近亲看管照料，院子里有一眼喷涌的热泉，热河这座城市就是因此而得名。此外，那里还有一片无边无际的森林，从热河开始一直延伸往北横穿连绵起伏的蒙古山脉，历代皇帝们夏天常来这里避暑，在森林里打猎取乐。神圣的皇宫周围耸立着许多宝塔和十分漂亮的喇嘛寺院，其中主院用蒙古语叫 Pouta-la，屋顶全是用金黄色的铜瓦覆盖。我们估计这座城市大概有 25000 居民。

热河市有三个大衙门，我们一到热河，就被带到其中一个衙门去。其知府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要我们别害怕，人们不想也不可能以任何方式虐待我们。然后，我们被安置在为囚犯准备的一套住房里，由官员们负责我们足够的费用。等了八天之后，人们又用车把我们带到第一个衙门。在那里还有享有红顶子的老都统、享有蓝顶子的道台、享有水晶顶子的知府和另外两个知府。我既未计算享有黄顶子的许多下属官吏，也未计算全部出席这次特殊召见的仆从人数。人们已注意告诉我们说可以不行礼，我们只能站着。我们刚一到大堂，就看到了官场的严肃气氛，官场上每个官员都戴着有各种颜色宝石的仿制品朝珠。人们向我们宣读了一份声明，此声明与我们先前签字的声明没有什么不同。声明后边是证明我们无辜的报告，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指责我们叛乱施魔法的起诉。衙门要我们在声明上签字，我们坚持要他们把“小的”一词换成“洋人”后才签了字。接着，他们只字未提有关对我们的处理，便把我们带到我们的住房去了。

只是在讯问之后,一些下属官员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将可能被带往沈阳。这种安排从一开始到现在从未说过,也许这是为了试探我们对于这种安排的意见,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坦率辩解的机会。于是我们反驳道:“你们既然承认我们是无辜的,为什么还要驱逐我们?难道你们没有看见大家都认为我们是无罪的吗?你们去搜查我们的住院时,我们没有躲起来,你们为此而鼓掌。你们说我们逃跑有可能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有可能使衙门陷于最尴尬的境地,现在你们要赶走我们,难道这就是你们对我们光明正大的报答!你们派来的差官们曾以他们的名誉向我们担保说,我们将可以回到我们的岗位,而你们现在却要把我们送到沈阳去!你们是怎样对待自己的诺言的?但是你们应该清楚,如果你们坚持拒绝让我们留下,那么我们就要你们派人和我们一起把我们家里的全部财产运走,一切费用全由你们负担。这尚不算完:无辜的人是不会自己离开的。因为我们是在被指控犯有叛乱罪的情况下才由你们送交我们领事馆的,那么我们的原告必须陪我们一起去,以便我们的事情能在我们各方官员到场的辩论中得到解决。这才是合情合理的,也是无可非议的。”

实际上,我们的这些意见及其它要求只是为了制造一些障碍以阻拦他们把我们送走。然而,这些意见被呈递到更高一级官署去后却在那里产生了强烈的印象,而且他们也为有理由不把我们送到沈阳去而感到很高兴,因为他们深知这是劳民伤财的事。早在两年以前,蒙古的宗座代牧孟振生(Mouly)主教大人为了像我们一样拯救被怀疑与反叛者串通一气的基督教徒而曾向官员自首,结果官员为送走他而花了大笔经费。此事在他们中间广为流传,成为无人不知和无人不晓的一件事。他们谁都知道孟振生主教大人已返回他所在的那个离此不远的县城很长时间了。可是,我们的官员

们又不敢自己承担释放我们的责任,而且还担心沈阳官署会对此事不满。他们决定和沈阳衙门一起商议我们的事情,于是便给位于此地 150 法里的辽东省府沈阳写了一封急信,以向他们咨询并取得他们的意见。信使走了两个月,在等待回信的日子里,我向你谈一谈我们在热河居住期间的情况。

他们让我们住在这里,除了不许自由出城外,我们有很大的自由观看来来往往的官员,他们每次跨进宫殿门坎时要鸣礼炮三响致敬。每月一日和十五日,总督都要去宝塔拜佛。许许多多骑马的随从前呼后拥,他们有的在前面开道,有的在后面护卫,开道者大声叫喊时所发出的低沉而又冗长的喧哗声酷似我们驱赶狼群时所发出的怒喊声一般。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自由地说笑、唱歌、写感恩歌、祈祷、踏踏实实地睡觉和给朋友写信,你看我会不会享受这些自由。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小小的院子里散步,尤其是每天有节制而又单调的三顿饭后的散步,我们从未间断过。我们散步是那样地有规律,以至于使人们认为散步是教堂礼仪的组成部分,是我们基督教的活动之一。人们甚至询问我们,根据我们宗教仪式规定,我们应该走多少步和走多长时间。

我们几乎每天都要接待一些好奇的来访者,甚至还有衙门中的一些很高级的人物。不说你也知道,我们没有错过一次这样少有而又宝贵的机会来向大家宣传我们圣教。如果说我们没能归化一个人的话,那么我们至少已成功地让人对真正的上帝有了一些了解,描绘了偶像崇拜的疯狂,让人欣赏了我们教义的圣洁和美好。在所有来访者中,我们发现只有一位年轻的伊斯兰教徒对宗教问题感兴趣,但是你们实在不会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他自信能使我们放弃自己的耶稣教义,而改宗信仰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如果我向你讲述所有人们向我们提出的有关西方王国、西方制度以及我

们同胞们的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滑稽可笑的问题,那将会使你们捧腹不已。你们实在难以相信我们欧洲的钟表匠在这里享有多么高的声誉。在我们这里的中国人看来,只有法兰西学院的钟表匠才称得上是权威,根本不可能使他们明白在世界上还有比钟表制造者更具有渊博知识和才华的人物。

自我们到这里两个多月以来,我们亲爱的基督教徒从 70 公里以外的地方三次给我们派来信使打听我们的消息。我们从他们那里收到了一些来自南方的书简,从来信中得知一支强大的法英联合舰队已抵达中国海。这次远征的目的是想把欧洲的最高意愿强加于天朝,使它接受不太合其意愿的通商条约。有一点可以肯定,战争给我们现在的处境带来了不利。但是,我们有耶稣和圣母的保护,有这条箴言作为我们的座右铭,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我们来得太晚了,以至于殉教者感到了害怕和失望。

我们从信使那里还得知,有一个富裕的崇拜偶像的人,竟敢说我们的第一位讲授教理者已经背教了。他威胁我们这位传道士,要他在衙门公堂上承认他是一个造谣中伤人的人。有一个异教徒对此产生了恐惧,于是他召集了其 60 多个朋友,请他们出面调停以制止这件事。仲裁人判决罚那个崇拜偶像者一顿丰盛的饭菜,由我们的传道士主持,并让受罚者当众为我们的传道士恢复名誉。我们这位正直的新教徒认为自己所信宗教的好名声和基督教徒的称呼比世界上所有的财宝还要珍贵万分。从此以后,崇拜偶像者再也不敢对我们新教徒信口雌黄了。他们十分清楚,如果他们做出类似的事情,那么官府将会怎样对待和处置他们的。因为在三个月以前有一位官员在没有任何控告和起诉的情况下,曾主动对一个这类能说会道的、在城里竭尽造谣之能事恶意中伤我们几位基督教徒的人施以笞刑。

1858年2月3日

一位派往辽东省府沈阳的驿夫已返回20多天了,但我们还不知道他带来的回音。我们只知道在他到达之时,人们立刻派另一个驿夫去北京了,有关叛乱的指控也已经转到北京去了。我们等待着这位驿夫的归来,以了解由皇帝本人主宰的我们这些人的命运。

1858年4月19日于上海

从我继续和结束此书简之地的地名就足以向你们说明我们整个事情的最后结果。派往北京去的驿夫从北京带来了命令,说要把我们再带到上海去,并且还有明文规定各方面都要像对待正直诚实的人一样对待我们。唯一值得我们庆幸的是在整个旅途中,陪送我们的官员们能忠实地遵守上司的善意规定。2月15日,我们乘车从热河出发,直奔离北京50法里的总督衙门保定府。在这一段路上,我们穿过了把中国北部和内蒙古隔开的宏伟而又举世闻名的长城。在大半天的时间里,我们从远处眺望这座宏伟工程的壮观景色,只见长城时而蜿蜒盘旋在半山腰,时而登上陡峭险峻的高山之巅;再从很近的地方看去,长城上有无数的堡垒和被截去一段的炮塔。北京朝廷一方面无力维护这座防止北匈奴入侵的庞大长城,另一方面也无力修葺由于年久失修而造成的多处损坏。多年以来,它施以种种计谋,实施一种狡猾的政策,以讨好傲慢的蒙古,表面上装出十分崇拜喇嘛教的样子,特别是采用一种让其一些小王公和王族世家之间建立同盟关系的办法使蒙古人变得顺从。这样,中国政府就不再害怕蒙古的入侵了,非但不害怕;而且它还不知不觉地以和平的方式侵占蒙古的一些偏远地区。

第一个封斋期的主日,我们在北京过了一夜。我们用了一个半小时的快速赶路才横穿过北京城。北京城平均分成四个城区,每个区四周都有一堵又高又坚固的砖墙。第四区呈果核形状,那里不许

行人靠近。里面是神秘的天朝皇帝居住圣地。这座如此闻名的首都除了我下面要介绍的几处地方外,就没有其它别的特殊之处了。第一,我们穿过了四座异乎寻常大的宫门,每座宫门都有五层高,通过宫门的整体图和立视图,更衬托出其宏伟的面貌。第二,有一座十分迷人的山,名叫煤山。其周围是高墙,位于第二道皇城的中央。山上有一片令人惬意的小树林,山顶上或建有漂亮雅致的观赏亭,或建有镂花凉棚。这些建筑物都排列得很对称。第三,一座漂亮的桥,名叫玉河桥。桥是用极其漂亮的光彩夺目的石块砌成,桥的每侧都有一大排小而漂亮的柱子,柱子的顶端雕刻有不很雅观的龙的图案。小桥直伸向景色迷人的小海,人们可以乘船在海上游览。第四,一座辽阔、富丽堂皇的庙宇,其名叫地王庙,皇帝每年去那里上供一次。第五,一些呈圆形的宝塔,宝塔很高,尖顶,顶上安装有一个漂亮的镀金球。其中有一座宝塔的塔顶和四周都有宽敞的阳台,阳台配有别致的栏杆或铁栅栏,好像给这座古塔戴上了一顶轻飘飘的花冠。

我们穿过的一些街道既很宽又很直,但不很平坦,没有铺路石,较脏。街上挤满了来来往往的行人、车辆、牲口,尤其是成千的骆驼,骆驼背上载满了煤包或其它物品。还有一些十分漂亮的房屋,迷人的门面。带雕刻的木门窗或雕刻成圆形,或雕刻成工艺细腻的镂空形,全都镀成金黄色,外观十分漂亮、雅致、豪华。但是,除此之外,没有一处公共广场,没有一处能显示出人类智慧的欧洲式的古迹。巴黎美丽而又雄伟,北京漂亮而又浮华,有许多小巧精致的东西。阔别 19 年后,巴黎给我的印象依存,而北京给我的印象却已经消失。我不敢对其民众说些什么,他们肯定也达不到巴黎民众的素质。

这一路上,我见到最引人注目的东西也许是三座漂亮宏伟的

桥。桥用漂亮宽大光亮的石块砌成，石块上雕刻有狮子和其它动物，雕刻技术熟练灵巧。第一座桥名为卢沟桥，位于北京以西4法里，它因其漂亮和工艺的精巧而胜于其它桥。卢沟桥长200法尺^①。离此30法里的地方，横跨琉璃河修建了一座桥，即第二座桥。桥长500法尺，共有190根小圆柱。第三座桥位于涿州附近，桥长2000法尺，有578根圆柱支撑着两边极大的宽石栏杆。这是为防洪水而修建的一种堤坝，因为到了雨季，大雨使流经这一地区的小河泛滥成灾。

2月26日，我们抵达保定府。保定府是一座典型的中国城市。我们在这里住进了一家客栈，官府对我们在这里的生活招待得很周到。12天以后，总督派了另一位官员带我们去南方。我们于是有幸来到了辽阔的山东平原。旅行10天，我们抵达济南府。济南是山东省会，也是重要的商业中心。到达这里以后，另一位官员来替换了他的同伴，这位官员负责把我们一直送到江南的第一座城市，该城名叫清河县，这里是运送军粮的大运河边上的一个繁盛的商业港。大运河通黄河、长江两大河流。这两大河流横穿中国，帝国一些省的各种产品就经由此两大河流运到北京。到了这里以后，我们又换了一个向导。多亏了上帝的保佑，这位向导不仅负责用车送我们，而且还用船把我们直送到抚州。我们住在离抚州市80法里的地方。我们累得筋疲力尽，讨厌的车子沿途在我们从未见过的石子路上跳跃似地行驶，把我们颠得浑身像散架一样难受。后来，热心的人们给我们提供了两只帆船，我们为能乘坐这两只别致而又舒适的帆船完成这段艰难的路程而感到十分高兴。我们在美好的复活节那天登陆了。

① 法国古长度单位，一法尺相当于325毫米。——译者。

在这一段旅途中，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叛乱者是文物艺术的破坏者，因为我们目睹了他们的所经之地都被毁坏成了废墟，看到了被他们劫掠蹂躏的几座城市的状况，其中扬州城更为突出。不久以前，扬州城还曾因其辽阔的商业区而十分繁荣昌盛，因其众多的人口而十分重要，后来则被叛乱的义军蹂躏得破烂不堪。在一片碎砖瓦砾中，我们只看到骷髅样的几具尸体，只有一些由饥饿和战争造成的许许多多不幸居民的死尸残骸。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河两岸便布满了成千的尸骨。

8日，我们来到辽阔雄伟的长江流域。我们在的这个地方，河宽有1法里多。中国人称这条河为“海子”（扬子江），理由是既因为它威严宽阔，又因为它以其清澈透明的水维持着无数条运河。在这里，我应提到的是用已凿好的漂亮石块砌成的无数宽阔的石桥，石桥横跨这些运河，修得十分别致、豪华、高大。大部分桥只有一个桥拱，各种规格大小的帆船都可以从桥拱下通航。但是我很难用恰当的语言来向你描绘这些漂亮运河的外貌和生气勃勃的活力。你们可以想象数不胜数的小船不停地来来往往，除了主人家带着他的全部家产外，其余每条船都装载着行人的货物或商品。

14日，我们来到苏州。该城市很大，方圆有4法里多，人称这里是中国内地最大的商业城。苏州城外有运河环绕，城内运河纵横交错，运河里飘满了各式各样的格外漂亮别致的小艇和帆船。我们在这一站最后一次换了向导，两个新官员被指定把我们一直陪送到离此只有27法里的上海。18日，我们终于结束了我们艰难的旅途，到达了目的地。全程长达430法里，行期两个多月。一路上经过了48座大城市，穿过了近四个省。我还有多少奇遇、多少奇妙有趣的事要向你们叙述啊！但是只好到此结束了。我还要向你讲一件使我们感到有些惊奇的事。我们来到上海时，看到码头上停泊着

许多战舰,而且我们还获悉有一个强大盟国的大使已在几天前出发去位于北京以东 30 法里远的天津卫港了。感谢上帝恩赐我们这次远征,并使之变成降福于中国和拯救中国的机会。

我们正直忠诚的领事敏体呢先生以完全法国式的态度接见了我们,并请我们吃饭。我在遣使会会士们的司库处等待着小艇出发赶往辽东,以返回到我亲爱的教团,哥伦比(Colomby)主教大人写信催我快些回去。在这方面,我比大人更性急。

请为我和我亲爱的学生祈祷,我的学生中已有四人开始了他们的哲学课。

耶稣和马利亚圣尊,我为能做你们十分恭敬、十分忠诚的仆人和同伴而感到荣幸!

教廷传教士梅纳尔(AI·Mesnard)

遣使会传教士罗安当致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书简摘录^①

1859年7月15日于江西

先生们:

当来自地球四方的哀求声在你们耳边回响时,你们就会听到我们痛苦的叫喊声。江西的全体传教士聚集在一起由衷地向你们表示最热忱的感谢。当你们真正了解了我们所需要的大量的必需品和我们遭受不幸的人数之时,你们才能真正理解我们的感激之情。我可以有意向你们述说一下这些事情,因为我刚刚跑遍了一些遭受灾难的地区。我向你们要讲述的一切都是我亲眼目睹的事实。在本书简结尾处,我还将要向你们讲述曾福定先生于 1857 年 6 月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 32 卷,1860 年。——译者。

26日被处斩而献身的事。尽管这件事过去已许久了,但人们并不知道它的真实细节。先生们,只有你们才将是第一批获知这些情况的人。

上帝之公正的难以捉摸的秘密!江西省13个府、72个县,没有一个地区逃脱了战争的蹂躏。据我所知,在其带城墙的80座城市中,只有4座城市没有遭受叛乱者的破坏和抢劫。其中遭受破坏最严重的城市是吉安和南安,这两座城市都遭到了袭击,所有的官员和那些在逃难中未能得到救助的人都被杀害。在南安,一个地方官员竟让人在他的衙门前处决了上万之众。我亲自跑遍了方圆4法里之大的范围,没见到有一幢幸存的房屋。这些地方已没有人烟,曾经那样肥沃的稻田无人耕种,只得出卖给新的地主。

这就是你们的仆人和一位土著司铎的教士之所在地。在如此可怜凄惨的状况下,我们怎能找到我们的基督教徒!大部分基督教徒的财产都遭到了损失,躯体和灵魂都受到了折磨。他们的小教堂被摧毁,房屋被烧掉,其中有几个人或已逃走,或因其父母被杀害而悲痛万分。这一切都是那么让人感到震惊!以至于共同做祈祷的仪式已被取消,遵守过礼拜天的习惯已被忘掉。由于不幸所激起的仇恨,经常发生肆无忌惮的抢劫。因为在普遍的混乱中,整个事情似乎都属于首先占有者。由于上帝的拯救以及一系列经常性教诲,这些迷途者几乎全都改邪归正了。混乱的年代把这些人推进了深渊,目睹这些深渊,他们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虔诚了。

吴城曾经有一个繁荣昌盛的基督教会口,这里有一座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建立起的教堂。15年之内,官员曾两次下令拆除这座教堂。泄气和气馁使得人群四散而去,但留下来的一些人仍恳求一位传教士来巡视。在这种情况下,王吾伯(Rouger)先生来到了吴城。由于没有祈祷室,新教徒们在什么地方做祈祷呢?对此,他

们早已有了准备,于是便把用来收储各种商品的一个货棚改成了祈祷室,在里边设了一个祭台并尽一切可能进行了装饰。然而,该建筑物属于一个异教徒所有,当他一发现崇拜真上帝的人租用了他的货棚,他就发出了警告。他知道我们的教堂新近被摧毁,教堂的看守老人被杀害。所以,他把传教士及其基督教徒都赶了出来。

王吾伯先生出城后,他来到曾在逃跑时结识的朋友和广德(Laribe)神父的坟墓前,度过了痛苦而又漫长的几个小时。然后,他又回到人们曾经找到他的那个地方。那里曾经是一个木工厂,有30个异教徒工人在里面干活,噪音很大。我们把隐藏在深处的一间小黑屋子用来作为举行圣事的地方,把木工场临时作为圣殿,用衔接不好的木板篱笆作为隔板。教士的住所也是一样。所有这一切都与那30个工人相毗邻,他们敲打、刨木料、锯木材,而且还喧嚷、唱歌、喊叫!传教士让人去看一看在这一片嘈杂声中是否可以进行教育、忏悔、祈祷和做神圣的弥撒。人们回答他说,新教徒不是能解雇工人的老板,可是又无法找到另一个地方。于是,教士提出离开这里。多么可怜的基督教徒!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怎么办呢?他们都来到传教士面前,无能为力,只得哭了起来。这位才智横溢的神父又怎么办呢?他也哭了……痛哭之后,怜悯之心豁亮起来:白天不能行动,我们可以利用晚上。从晚上9时至深夜12点,这段时间便是训练和忏悔之时。早上3时左右做弥撒,以便使一切活动能在喧闹声开始的黎明之前结束。我们就这样连续度过了10个夜晚。“所有可怜的基督教徒能够忏悔和领圣体的幸福使大家都得到了安慰,忘记了疲劳。”王吾伯先生对我说。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一位多么好的神父啊!他诞生并生活在马厩里,成群的天使曾是他的保护人,并且也对上帝住在如此悲惨的地方感到很吃惊。我们的耶稣肯定对这群天使说:“你们以后会看到我居住的地

方比这里还要差。”他在吴城就曾经如此。

如果说许久以前就许诺的宗教自由的命令，终于颁布了，那么收获就一定丰厚。异教徒们自己承认他们所期望的就是这样，以表示拥护基督教徒。我们已经为成百成千的望教者举行了洗礼。我们的希望是完全有根据的，因为神谕已经说过，而且经验也反复证明了这一点：“殉教是传播基督教的种子。”我们在失去了吴城美丽教堂的同时，去赢得了一位受人尊敬的老人——可爱的殉教者的化身，老人名叫谢 Quentin。一个官员奉命要他发誓放弃信仰宗教，他却毫不犹豫地模仿《圣经》里谈的高尚的以利亚撒 (Eléazar)，他引证了各种理由说明他不能触犯天主教。我们还可以向上帝介绍神父流血的悲惨状况，正是这件事引导我向你们介绍曾福定先生的献身。

我们来自广西的第一手资料中得知，我们这位同伴就是内战的受害者。当时他是被当作叛乱者而被处死的，这是一个错误。为了正确评价这件事，我将要让这件事恢复其真实面目。由于骚乱和遥远的旅行，我们谁也不能去看看传教士的坟墓，今天我亲自从那里回来了。相当多的目击者都是很精明能干的，他们的报告都很一致，正是根据所有这些可靠的证词，我才得以对于这件事做些更正或补充。

谭安东 (Antoine Than) 是一位土著教士，当时他身患疾病，体虚无力，生命垂危。他请其一位名叫吴彼得 (Pierre Ou) 的年迈传道士去向曾福定先生说明他病危的情况以及他要得到临终圣事的渴望。曾福定先生急忙出发去拯救他。由于他必须途经一条河流才能抵达到谭教士那里，而河两岸分别被两支互相敌对的军队占领着。所以他只得让人把他的头发剪掉，这样大江此岸的义军下令给了他一条活路；但他经过帝国军队占领的大江彼岸时却不能使

这些头发长起来。为了慎重起见，他又找了一位名叫荣庆新的基督教徒当向导，他这样做无疑是为了使各方都有一名代表替他当向导。

他们一行三人渡过了这条河后，就有几个帝国兵勇来与他们搭讪。荣和吴停了下来以便让这几个人搜查曾福定先生要他们携带的小包裹，而曾福定本人未被叫住，所以他独自一人继续向前赶路。走了几分钟之后，他停下来等着他的两个向导。他一直等到晚上，等了一夜。第二天，他本人也被几个兵卒追上了，这几个营勇是一个名姓金的小官员派来跟踪曾福定先生的，同是这个小官员坚持要抓他的两个向导。教士和官员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辩，他们彼此都不太懂得对方的意思。大家听懂了的是曾福定先生说他是法国人，来到中国布讲天主教。由于他是根据现有的条约以天主教教士的身分来到中国的，所以只接受法国领事的管辖。金大人听到否认他的权限后很生气，他一气之下便让人打了曾福定先生 50 大板，并把他与其他两名基督教徒一起押送到了帝国军队兵营。

荣和吴为什么被逮捕？人们从传教士的小包裹里找到了什么株连他们的东西呢？下面就是关于这个问题一些说明。当时荣氏曾急忙向他距此地两法里远的母亲写了封信：“人们在曾福定先生的包裹里搜寻到了一顶软帽，这顶软帽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认出我们是基督徒了，因此我们的生命受到了严重的牵连。请立刻找一些人来为我们辩护。”他母亲请来了六位正直而又亲切的异教徒，他们是荣氏的朋友。然而遗憾的是他们来晚了两小时。这顶软帽大概曾是传教士们在中国用来参加庆祝圣教的奥义时戴的帽子。人们强迫他们说出帽子的用途，荣和吴二人为此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只得承认是基督教徒，并且供出了教士，承认被怀疑的物品是教士的东西。就这样，曾福定教士被控告，他的新教徒（荣的书信

作为证据)也被当作基督教徒而受连累。我们于下文将更详细地介绍这一事件的经过。

他们来到王师的营地后,就被一个高级官员送到一个下属官员的衙门去了,后者正好是我们圣教的敌人。我们不了解该官吏对他们的审讯情况,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对他们判处死刑。吴彼得被首先宣布与案件无关,理由是他说他是本地人,因为他的乡土口音也许还有他那满头的白发可以作为佐证。但当他刚刚走出衙门几步远时,其中一个官员助手向官员提示说,尽管这个老人确实是当地人,但他和其他两人一样都是基督教徒。所以他立刻又被传了回来。“你真是基督教徒吗?”官老爷问他。“对,我是基督教徒。”吴彼得回答道。“该死!”迫害狂总结说。

“可怜的老人啊!”一些激动的异教徒说,“承认自己是基督教徒,多愚蠢啊!只要说不是,他就可以活命。”

三位被判死刑的人立刻被剥光了衣服,执行死刑的刽子手们把他们的衣服瓜分了。他们的手被反剪在后面向前走去,每人后面都跟着一个持刀的刽子手。走了300—400步后,刽子手们要他们沿着田埂走过去,然后来到一块荒芜的和遍布石子的空地。曾福定先生被命令跪下去,他服从了。这时,举起了刀的刽子手耳边响起了平静的声音:“等一下。”人们看见曾福定先生振振有词地做了最后一次祈祷,他是那样的平静从容,就好像是在祈祷室一样。他的这一宗教行动使我们的会友很受感动,而刽子手第一刀就把他的头颅砍掉落地了。就这样,神父先于他的两个新教徒见上帝去了。荣氏和吴氏二人也几乎同时被杀害。这就是三位完美的牺牲者的形象,这就是为宗教信仰而献身的三位殉教者。

正是出于这种爱德,这位年迈的传道员冒着在义军中行走两天旅行之风险,以满足一位死者的心愿。正是出于这种爱德和令人

钦佩的忠诚，荣先生听从了传教士的召唤。当他接到书简时，他虽因劳累过度而正在卧床休息，但仍立刻起床向其母亲要点食物准备上路。这位母亲在他这唯一儿子还未出生前就失去了丈夫，她出于母爱之心而全力反对其儿子这种举动。年轻的英雄回答说：“母亲，正是为了上帝我才要走……我要走了。”正是出于圣职的爱德，曾福定先生终于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不顾欧洲人难以忍受的炎热和内战的可能性而上路了。他深知谭先生在离开我们六个月之前而痛哭流涕，担心不能领受圣事而离开人间。为了安慰他和使他不感到孤独，为了他临终的圣事，曾福定先生冒着生命危险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去看望谭先生的旅途。

然而，这三位爱德的受害者也是殉教者吗？一切都证明了这一点。吴氏传道士回答他是一名基督教徒时，就已声明立誓献身；荣新教徒在给其母亲的信简中宣布他和他的同伴被查是基督教徒了，因而他们的生命也就要受到株连；曾福定先生公开表明自己是法国传教士，其使命是讲授《福音书》。他们三位的声明证明对他们被指控的唯一理由就是他们信仰基督教。尽管他们一个是欧洲人，一个是帝国中的人，一个是义军地区的土著人，但他们都被判处死刑。因此，他们不是由于教派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都信仰基督教才被处死的。对于官吏来说，他对于信仰上帝的崇教者的仇恨，对于基督教采取敌视态度的名声，在他身上表现出了十足的迫害狂的特点。直至最后，公众舆论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怀疑。附近一位基督徒向一个异教徒的头领询问所发生事情的情况。后者回答道：“我知道你也信仰这种宗教，你或者应保持沉默，或者也和这三个人一样，也就是说和基督教徒一样人头落地。”

当我有空再去看看我们殉难者的坟墓时，这件事从发生到现在已有两年了。我事先并没有打算，然而上帝却允许我在周年那天

几乎是他们被处决的同一时刻来到了他们的墓地。那块浸透着他们鲜血的土地正是掩盖他们躯体的地方，他们就被就地掩埋在那里。我的双眼紧紧盯住这块掩埋着我的一位教友，一位朋友的墓地，我的心感到很压抑。我希望在想画一个十字架符的同时，也做一次祈祷，也许我不像他最后一次做祈祷时能控制自己。坟地上长有一片一米高和开着许多小白花的灌木丛，灌木丛下面似乎正好是遇难者的脚。一片十分浓厚而又油绿的草地正好长到壕沟的边缘，周围光秃秃的，就好像是上帝为了要辨认出其埋葬在坟墓里的仆人一样。因为掩埋他们三位遇难者尸骨的坟地上长了一片绿油油的草，而被处死的异教徒的坟墓却是一片不毛之地。

在我结束这封书简的时候，我获悉自己刚刚走访过的那个地区中迫害基督教的教案即将发生。那里的两位新教徒已入狱，一些信仰宗教的人被捕。杀害曾福定先生的凶手毓科是这场教案的肇事者。他也是杀害一位法国传教士的凶手，如今他还逍遥法外，这个杀人者妄图任意仇杀基督教徒，并且还想利用他的权势继续在基督教徒中制造新的流血事件。

顺致崇高的敬意！

遣使会会士罗安当(Antoine Anot)

耶稣会士梅德尔神父致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书简^①

1860年9月3日于上海

先生们：

我们现在面临着一大堆困难，尽管我的工作很忙，时间很紧，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33卷，1861年。——译者。

但我还是把你们关心的有关传教团的一些灾难、所取得的成绩以及繁荣昌盛的景象写信托轮船给你们寄去。

首先,我向你们报告一个可能会给中国所有传教区带来最美好希望的好消息。法国和英国好像联合起来一致对天朝采取了敌对行动:大沽的战斗已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甚至在上海也于道义上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一些基督教徒和非基督教徒也为欧洲人取得的胜利、和平将有坚实的基础而感到高兴。最后要告诉你的消息是噶罗(Gros)男爵和额尔金(Elgin)勋爵已在天津,一些会议即将召开。

当我们在北方的士兵取得了战绩,一些外交家为我们的自由行动创造了条件的同时,上海已遭到了义军^①的攻击,江南的传教区遭到了很大的损失。我们的一些小教堂和基督教徒的家庭都遭到了破坏和抢劫。我们的新教徒被抢劫一空,并被赶出他们的故土而逃亡到我们身边,乞求耶稣基督兄弟们的施舍。我们希望上帝能保护这次如此不幸的逃亡,但上帝还想锻炼和考验我们。愿上帝的圣名得到祝福。

1860年8月17日,几支义军像激流一般涌了过来,居民们不顾一切地涌回上海。马神父(Louis Massa)当时正处在义军包围的位于距上海五法里的蔡家湾(Tsa-Ka-Wei)孤儿院中。将近下午四点,他看到了无数旗帜在四面八方飘扬,随着义军的向前推进,某些庄园和村庄都变成了一片火海。他已来不及带着100多名孤儿逃跑,但是,他最后还是让两批孤儿在两个可靠的人的带领下逃走了,当他和村子里的其他一些人及基督教徒正在祈祷时,义军狂叫着逼近了。神父来到门口,请求他们宽容这些无辜的人群。然而,

① 指太平军。——译者。

他得到的回答是砍向他的几刀和几梭标。他们向他要钱，他把他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给他们了，可他们对他打得更凶狠了。他们四处搜寻，由于没能找到东西，所以就更加虐待他。最后，他们把他拖出孤儿院，扔进旁边的稻田。他不久就断气了。

由于他拖住了义军，所以很多小孩和基督教徒才脱逃了。这次有 27 人和他们敬爱的神父惨遭杀害，三四人失踪了。我们首先把其余的人召集到徐家汇学院，然后便带他们去上海了。但一位忠实的传道员和留在他身边的六个小孩为了保全一半设施，却牺牲了他们的一部分房屋。

第二天，8 月 18 日，徐家汇和邻近的村庄也遭殃了。幸好我们想办法让所有的教士、学院的学生带着从蔡家湾孤儿院逃来的孩子及时撤走了。这些人保住了性命，但学院的东西几乎全被抢光或毁坏了。其中一部分房屋若不是将领们把司令部设在那里，那么毫无疑问也将被烧毁。邻近村庄的基督徒都遭受了严重的抢劫、杀害和火灾的折磨。

19 日和 20 日，义军来到上海。他们在郊区犯下了种种暴行，甚至居然进攻欧洲人的兵营，但是却遭到了猛烈的反击，只得撤回乡下。此后的几天更为恐怖，一部分郊区村庄被烧毁。大修道院和大教堂处在危险之中，如果没有 10 名法国士兵猛烈的抵抗和几位年轻基督教徒的临时参战，那么一切都将摧毁。这时，我们宁可克制，而不愿激发他们的疯狂。

多亏上帝保佑，事态的发展趋势开始了好转。惊恐的义军遭到了欧洲人的还击后退到了距上海七八法里的地方去了，人们希望从北方凯旋而归的部队来赶走他们而解放这一地区。上海的居民中曾有许多支持这些义军的人，自从看清楚他们的真面目以来，对他们也只有表示轻视和反感了。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关心与我们无关的问题,我们十分希望太平。我们的损失很大,这种损失在短期内是难以挽回的,我们半个省的基督徒都破产了。然而,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要忍耐,同时还要医治创伤,减轻痛苦。连绵不断的战争使我们的工作后退了很多;你们无限的慈悲给我们带来了安宁和救济,我们将在这个基础上力争重整旗鼓,振作精神,恢复一切。我甚至十分希望能拯救许多正直的非基督教徒。

面对连续不断的混乱和各种各样的要求,我们还未能够拟定出我们的预算,也未填写给枢机团的表格。我请你们能耐心等待,我们将马上寻找一个安静的机会来完成这项小小的工作。请你们祈祷上帝给我们需要的恩惠,以便能更好地利用这许许多多仿佛准备使辽阔的中国受归化的重大事件。

江南全体传教士向你们顺致崇高的敬意。

耶稣会士梅德尔(M. Lemaitre)

贵州宗座代牧主教胡缚理致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书简^①

贵州传教区 1862 年 2 月 23 日

先生们:

殉教者们的鲜血刚刚洒在了我们省的土地上。牺牲者是:

一、里夫里河畔的圣-卡特琳娜的文乃耳(Jean-Pierre-Néel,里昂主教管区),2月17日上星期一为了宗教而被处斩;

二、他的传道员陈传经(Jean Tchên),42岁;

三、一位名叫吴贞相(Martin Oû)的行洗礼者;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34卷,1862年。——译者。

四、新教徒张天中(Jean Tcharg),因为他的房屋被用来作为传教士的避难所;

五、贞女易么姑(Lucie Y),她出生在这座大城市一个十分体面和尊贵的家庭。被捕时,她正在文乃耳先生开设的一个新祈祷处忙于教育女望教者。

他们都是由官员戴鹿芝下令在贵州被处死的。此人早在1858年2月28日就曾杀害过茅口的三位殉教者。现在,他仍继续在他所管辖的整个地区内追捕新教徒,并且有几人可能已落入他的手中。

文乃耳先生的最后一个从事虔诚事业的场所夹沙笼站口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已经有超过了百名的望教者,而不是只有四个了。这是一种巨大的成就,它足以引起我们敌人的注意。民团的一个指挥官开始了仇教,他抓走了一个新教徒,并且威胁说还要抓走其他所有新教徒。毫无疑问,这是他和我在上文说到的官吏戴鹿芝合谋的结果,提督田大人^①早已向省里的所有官员都颁发了一份秘密通报,要他们在某个地方会见我们这些人时把我们杀掉;同时还要注意不要承认我们是欧洲人,也不要承认我们是基督教徒,而是声称我们是暴动的义军首领。按照这种规定,他已答应提升他们。

2月16日星期日晚上,文乃耳先生来函把这次新的仇教事件告知了我,这封书简表现了这位勇敢的同事一片忠诚之心。他写道:“我本来想明天启程赴首府,但为了支持我的新教徒,我留在了岗位上。这些新教徒中最老的一位张天中是我的房东,今天上午他已接受了洗礼。”

^① 即贵州提督田兴恕。

听了这一消息,我把我的陈氏传道士派去,以争取调解这桩事。他已于星期二晚上出发了,日夜兼程赶路,并于星期三下午抵达。他一路上又累又饿,精疲力尽,疲乏不堪。

他来到张家门时还未发现有什么事。但他刚一进去,一位夫人就把他拉到一旁说:“我们的人遇难了。”她喊叫道:“我们亲爱的文神父(文乃耳先生)、他的传道士、行洗礼师吴贞相、易么姑和我的丈夫在前天被处斩了!……如果我没有这些孩子,我就和他们死在一起了……”当这位夫人匆匆忙忙地向他讲述主要情节并让他吃饭时,教堂被民团的30个人包围了。戴鹿芝的四名衙役闯了进来问:“——你来这里做什么?”我们的传道士因刚刚吃下第一口饭而又无法下咽。“吃吧!”一个团丁对他说,“吃饱了,你将会更有力气去见官员。”可怜的陈传道士说:“既然我快要被处死了,吃了饭也没有用。”他站起身来,把两个主要衙役拉到一旁。“我的弟兄们”,他对他们说,“请你们想想,我还有年迈的父母,请你们不要把我交给官员。”——“你有白银吗?”——“我有一点。”——“你能给我们多少钱?”——“每人三钱银子(约2法郎25生丁)。”——“这不够,拉去见官!拉去见官!……”他们动手把他捆绑起来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传道士最后同意给每个衙役一两银子(合7法郎50生丁)。传道士拿出他应允的钱数——七两银锭。但是衙役们把钱从他的手中全抢了过来。——“这太好了,”传道士说,“现在你们落在我手里了,你们的命运和我的命运连在一起了。如果你们把我送交官府,那么我就控告你们是强盗。”——“你什么也不必担心,什么也不应害怕,你将可以逃走。”

但是怎能出去呢?民团在门口设有岗哨……殉难者张天中的夫人把事情承担下来了。她打发衙役们去门前和士兵们逗乐以牵制他们,消磨时间。然后,她借助于这种分散其注意力的手段而让

传道员从后面通向花园的一个便门出去，然后带他上山。穿过岩石和荆棘；翻越了二三座山以后，这位夫人指给他通向大道的方向，可她的脚和手都已血迹斑斑了。传道员仍旧日夜赶路，肚子饿得咕咕叫。他最后终于来到我这里，“——多亏上帝的保佑，主教！”他跪下来说：“又有许多人殉难了！”然后，他向我叙述了上引事情的详细经过，我又补充了一些我所能搜集到的东西。

文乃耳先生的灾难好像是由事先预谋策划而决定的。星期一中午，衙役们在他正要离开时突然前来，这些人用链子缚住传教士、他的传道员陈传经和房东张天中。另外还有一些人跑去搜寻在邻近村庄行洗礼的吴贞相。衙役们把他们带进距此五里地（二—三公里）的城里去了。

为了尽早执行，官员把他的公堂设在城外围墙下准备执行枪决的旷野上。审问时间不长：——“你叫什么名字？”——“我的中文名字叫文乃耳，法文名字叫 Néel。”——“你要像其他人一样跪在我面前。”——“我不是中国人，由于我们法中两个帝国缔结有条约，所以我从法国来传播宗教。我不下跪，我是客人，不是罪犯。再说，我还有护照，你可以看看。”——“你的护照是你们政府发给你的，而不是我们政府签发的，我们不相信……放弃你的宗教，否则，我就要处死你。”——“这道禁令是无用的。如果你愿意，那么你就屠杀吧。”——“立即处斩！”接着他向三位基督教徒说：“你们这些傻瓜，放弃你们的宗教信仰吗？”——“不！”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给我杀死所有这些恶棍，什么都不要再说了。”

刽子手都来了。夹沙笼的民团团首要亲手砍下文乃耳先生的头颅。一声炮响，四个脑袋都落地了。

在文乃耳先生的头滚到地上时，人们说从天上飘下来一团闪闪发光的彩云在他的尸体上空静静地停了片刻后便消失了。异教

徒们感到很害怕，刽子手比其他人更为惊恐。一些来到我们这里的异教徒向我们叙说了这条消息，并且向我们保证说民团团首对此感到十分慌乱，局促不安，他确实为做了一件坏事而感到害怕。我将设法获得一份关于这一事件的最可靠的材料。尽管如此，这一奇迹将不会使那些了解文乃耳先生的任何人感到吃惊，因为他是一个圣人。

官员命令把他们的尸体不加掩埋地扔在荒郊，其目的是要让麋集在附近地区的豺狼和豹子来吃掉它们，尤其是让狼来吞噬它们。夜里，这些野兽 30—40 只一起成群地到处觅食，它们非常熟悉刑场的道路。甚至在大白天，也常见到一些野狗争夺这些可怕的猎物。在这座城市的同一城墙脚下，我亲眼见过一些狗争夺一具死尸的碎肉块，其中的一条狗抢夺了一条腿，一直拖回距此 200 多步远的主人家。一群群乌鸦呱呱叫着向这条狗追去，这是令人恐怖的。这就是我们亲爱的殉教者宝贵遗骸的命运。新教徒不能去取走这些尸体：因为他们大部分人都已逃走，其余的也被衙役们严密看管起来了。

第二天上午，殉教者张天中的夫人又派遣她年仅 15 岁的女儿去查看尸体的状况。那时尸体已全被野兽吞噬殆尽，只剩有唯一一些大骨头了。这位姑娘说，还可以辨认出文乃耳先生的遗骸。有人问她是怎样辨认出来的，她回答说：“有两只脚脚趾头上还剩有一点肌肉，我可以通过皮肤的白颜色辨认出来。”她没能带回任何东西，因为还有一些团丁在那里站岗放哨。

这就是我对于这些宝贵死者所了解的全部详细情况。我已经让四五个基督教徒去了。他们一边乞讨，一边到处奔波，以便能悄悄地得到他们将可能得到的东西。

文乃耳先生年仅 28 岁零 8 个月，是贵州所有传教士中最年轻

者。

那天夜里,易么姑没有被捕押走,因为当时她正在一个较远的村庄。但第二天上午,她也被处死了。有关对她的审问情况,我只了解官员提出的这个问题:——“放弃宗教信仰,结婚,我将对你予以赦免。”——“上帝保佑!我既不放弃宗教信仰,也不结婚。”易么姑回答道,就这样她也被斩首了。我也不知道她的尸体怎么样了。

在结束这段叙述时,我不希望通过某些政治上的考虑来毁坏殉教者们战斗事迹在基督教徒的心中永远留下的虔诚印象。最不明智的人也将会很容易地懂得这位中国女子信仰的基础。

我们唯一感到高兴的是上帝允许选择我们可怜的传教区,中国最小和最不重要的传教区为教会献出了殉教者们的鲜血。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它将使这片不毛之地肥沃起来,变成多产地,结出无数的幸福之果。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将能见到中国宗教最终出现的这个美好日子吗?这是我们还不能知道的,但这不是我们的奢望。我们所希望的一切就是把我们的全部力量贡献给这一伟大的事业,以我们的汗和血换来上帝的欣慰。对于一名传教士来说,这就是全部目的。

先生们,我荣幸地向你们表示诚挚的敬意!

你的忠诚的仆人贵州宗座代牧主教

胡缚理(Louis S. Faurie)

入华耶稣会士神父们的几封书简的摘录^①

1862年3月和5月于上海

先生们: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35卷,1863年。——译者。

你们很想了解人们在欧洲谈论很多的战争和条约造成或允诺的东西。我坚信上帝一定能使一切都转向它的荣耀和拯救灵魂。但是至今它仍乐于向人们说明他们的力量是虚弱的。如果它不负责使秩序恢复正常的话,那么一切都将以巨大的混乱而告终。欧洲人为了使他们的影响变得必不可缺而帮助在中国发生的暴动。一些人希望通过这个办法来取得大的收获,尤其是在贸易方面取得好结果,他们已经一直注视着在旧帝国的残骸上所产生的巨大财富。如果暴动每年都使几百万中国人丧生,那么在投机商们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大宗的买卖已增加到数百万法郎了。但现在贸易已停止,义军不再准许从内地购来丝绸和茶叶,他们到处毁坏庄稼,杀害在各省的欧洲人,而且还带着 20—30 万人来上海进攻这些欧洲人。此时,法国人和英国人把他们的陆军和海军力量联合起来以保护这些人的生命和财产;如果我们长期以来不习惯于依靠上帝的保护,那么我就开始担心我们的事业会被摧毁。

我们所有各县都遭烧杀和洗劫,我们一半以上的基督徒的住房都被破坏,几乎所有的教堂都被烧毁。许多男人被杀,妇女被绑架劫持,一些年轻人不情愿地被征募当了匪徒。到处是放火、抢劫、凶杀和不可言状的可憎事物和行为。起义军声称他们是从天上派来蹂躏帝国,并要在溜走之前尽其可能地做最多的坏事。在已经受基督教归化的地区,他们没组织任何活动,但却很快耗尽了这些地区的所有一切资源。在那些受归化后又反抗或骚乱的地区,他们就摧毁一切东西。几个月以前,他们责令欧洲人把上海归还给他们,否则就要把他们一个不剩地歼灭光。把这个地方交给他们,对于欧洲人来说就是抛弃中国和放弃以条约所获的利益。支持帝国政府的势力不可能为保卫这座城市做任何事,同盟者有可能承担这件事,下面就是直到 5 月中旬,他们用武力所取得的一系列的战

果。青浦的义军队伍拥有 3000 人，他们已经出动，但是被冰雪阻止在水道那边了，并且遭到华尔(Ward)上校的猛烈攻击，上校先生身边仅有 700—800 人，他们向这些起义军猛扑过去，扰乱敌人三天，使大多数敌人都丧失战斗力，800 人被俘，其中有 300 人被处死，其余的都被剃光头并且用两个皮阿斯特就把他们遣回了。这一辉煌的战功之后，西部军队就溃散了。

北部军队的人数更多；但是它被迫呆在离上海相当距离的地方。几支义军来到离吴淞特别近的地方时，负责守护这个主要地方的一个海军官员向他们发射了几发子弹，使我们长久打消了重新开始的愿望。欧洲机枪的可怕的事实使他们要作出许多考虑，最好的深思熟虑的人出发前往嘉定，他们要求在那里避难。当地的居民们拒绝开门。被激怒的起义军终于发出了威胁，威胁要动武。但城根一带的大炮使他们遭受了如此大的损失，以至于他们一直在陆续撤退。上海北部就这样摆脱了任何危险。

但是最令人可怕的一支是浦东义军，他们占据了几个设防的岗哨，这对上海是一个经常性的威胁。2 月 20 日在洋泾浜召开了一次大会，会议决定向离上海约三法里的白鹤桥兵营发起进攻。这次出征将可以使城市从极大的不安中摆脱出来；因为，控制了该兵营的义军，打算渡过黄浦江，向欧洲军队司令部发起进攻。义军主要将领忠王已经接到了要夺取上海的明确的命令，他现已回到苏州。几天之后又举行了一次最有决定性的会议。盟军已有近千人。华尔上校的 300 名中国人正开始进攻，义军勇敢地抵抗着，但是被射向营地的子弹所压倒，很快就被华尔部下赶进了他们的防御工事。他们全面崩溃，在极大混乱中穿过旷野四处溃逃了。于是法国人、英国人、清帝国军队的士兵们手持刺刀向起义军猛冲过去并对他们进行了可怕的屠杀。这次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比任何一次都

多,使起义军在另一处设防很好的营地青浦也感到很惊慌。他们深知夺取上海的企图是不能成功的,因此也就放弃了对上海的进攻。

浦东的居民想利用起义军的泄气情绪,要求他加禄人(Tagals)保卫他们的家园。人们知道这200个马尼拉的正直的士兵在五个月中使这个可怜的地区摆脱了起义军的肆虐。约有50人响应对他们发出的号召,许多中国人也和他们联合起来了。因为其中有一些基督徒,所以费都尔(Wuillaume)神父来到徐家汇以使他们能得到司铎部的帮助。敌人几次冲上来,但总是带着伤亡被击退。3月4日,敌人以一支人数更多的军队向距徐家汇不远的一支忠实可靠的小部队发起了进攻。那是在一个早上,费都尔神父做完弥撒后在一位马尼拉人和两位中国人的陪同下出去拜访一家异教徒。在一条小道的拐弯处,近百名义军士兵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那雄壮有力的声音,他那坚定的目光使义军士兵们稍停了片刻;但强盗们见他没带武器,便疯狂地向他猛冲过去。第一下、第二下打得他头晕眼花,但并没有打倒他。接着第三下,费都尔神父被打倒了,但他又重新站了起来,然后跪在地上为他的传教区和亲爱的基督徒把他的生命献给了上帝,就在这姿势中他挨了致命的一击。

不久,战胜了起义军的马尼拉人和民团赶来了。他们向杀害神父的凶手猛冲过去,几乎把强盗们全都杀了。费都尔神父的尸体不能运往上海,因为整个地区都遍布义军士兵,所以尊敬的梅德尔神父把他掩埋在被强盗们用暴力打死他的地方。然而,这令人悲痛的意外事件发生几天之后,马尼拉人已撤退到了上海,这时起义军又返回徐家汇。他们在那里打听到了费都尔神父的墓地后,就把他的尸体挖了出来处以火刑。

国内战争已经给我们的另一个传教士带来了不幸。当起义军来到江阴时,桑理爵(Sentinier)神父还一直留在江阴附近的一个

祈祷室里。他被捕后又被带到义军一个将领面前：“你是欧洲人，”这个将领对他说，“你在上海杀害了我们的伙伴，好吧，我们也要把你杀掉。”于是马上就对他进行预审。桑理爵神父对向他提的一些问题作了某些简洁的答复后，就沉着冷静地在审理他这个案子的法官们占据的房间里踱来踱去，这些审判官很可能就是杀害神父的刽子手。由于神父没有被捆起来，加之审判官们都忙于抢劫之事而顾不上对他进行处理，所以他冒险地竟一直走进了毗邻的一个小院，然后又来到旁边一间房子里，接着又踏上了室外的一条道路，最后穿过了田野。走了一刻钟之后，他就到了扬子江畔，他在那里找到了一条小船并躲藏在里面。在这段时间里，披着长发的义军士兵们叫他们的囚犯去继续受审。他们四处寻找着，找遍了一个又一个隐蔽的角落，但是已经太晚了。上帝把我们的传教士送回来了，除了有点疲劳和没有行李外，就没有别的损失了。

特别是在中国志愿兵和马尼拉人撤退以后，起义军愈来愈狂暴和凶残了。他们早已决定，在上海郊区进行抵抗时，要进行一次骇人听闻的清洗，事实上，他们已忠实地执行了他们的决定。在不知道方圆多少里的范围内，人们只看见令人悲痛的抢劫和蹂躏、凶杀和纵火的惨状。在中国的土地上从前建了许许多多小村庄和小城镇的地方，如今只剩下几片废墟、几堵墙垛，到处都是既没有隔墙又没有门窗的房屋断垣残壁和屋顶的碎瓦，这就是从强盗的暴力之下逃脱出来而不得不离开他们父母家园的许多不幸者的最后一处避难所。城市的破坏程度也是很严重的，因为叛乱者进城时担负有先放火毁城的任务。一些房子的家具和细木护墙板都被用来烧饭了，其余的用来修筑防御工事。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景象是路上和渠边到处是尸首。其中大部分死者的头颅都被砍了下来，几乎所有的尸体都被剥光了衣服，另外有一些人的尸体被狗吃掉了一

半。在中国最受人重视的坟墓也没能逃脱受辱没。多少具尸体被从墓地夺走,看了墓穴附近的一些尸体状况都使人感到害怕和恶心。重新穿上的衣服被撕碎,旷野上到处是乱七八糟的骸骨和破布。

对于我们美丽的基督教会口,我又能说什么呢?唉!它们几乎都成了中国破坏文物者狂怒的牺牲品。只用了三天的时间就把我们20年在江南工作的成果全部毁掉。横塘教堂及传教区一部分建筑物全被摧毁。蔡家湾教堂及孤儿院剩下的一切都被火烧毁。其它一些城市和教堂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下面再补充某些惨案的详细情况:农具都被毁坏、耕牛被牵走、许多地方的稻子被烧掉,令人担忧的是无法进行播种了。从现在开始到明年,我们就可能面临危险的境地,即使不是可怕的饥荒,至少也是严重的缺粮。

这种悲惨的景况是不会持久的。三月末,“信息女神”号三桅战舰载着300名装卸工和600名非洲轻骑兵来到了。这对于上海来说是一件大事。英国人也从他们那里召来了部队,这样军队人数很快就接近3000人,由士迪佛立(Haveley)旅长指挥。从此,我们就可以隐约见到我们灾难的结束了,或者至少可以抱有很大的希望。因为那时我们的部队人数很少,勉强只能维持守势。而现在海军可以很好地守卫着港口,甚至还可以去摧毁不远处的营地。但是他们还要返回舰艇去,因此事情恐怕要拖很久了。3月31日,他们已决定向躲避在离徐家汇一里半的地方的3—4万之众的起义军发动进攻。4月4日和5日,他们巧妙地发出了几颗炸弹把起义军从他们的两、三个营地赶走了。17日,又向东部芝罘发起了第二次进攻。这就是非洲轻骑兵参加的第一次事件。像在阿尔及利亚一样,他们在这里表现出了其英勇无畏的精神:他们端着刺刀向被2000多名义军士兵占据的一个大镇子猛冲过去。经过两小时的战斗后,

起义军完全失败了，镇子已被撤空了。这些起义军中有一万人在欧洲人没打来之前就逃跑了。大家发现在他们的营地中，有 7000—8000 人被捆住脖子塞在一堆了。这些人都是被起义军当做囚犯抓来的平民百姓。他们在起义军把他们带到另一个省并被征去当兵之前一直被捆着。起义军就是这样训练新兵的。所有这些不幸的人都被释放，并且都交给尊敬的梅德尔神父了，神父向他们提出一些希望和启示之后就打发那些愿意返回家园的人回家了。其余的人都被带到上海去了。

在复活节的一个星期中，安排了另一次出征。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我们勇敢的士兵向嘉定进军了。这座城市比上海城大，城墙也较高。这支远征军有 800—900 名法国人、3000 名英国人、华尔部下的 1000 人和近百名由一位法国上尉按照欧洲方式训练出来的中国人。天主教成员在这个很有前途的土著军团中占统治地位。4 月 17 日，在进攻纵队中有 130 名基督徒，他们勇敢地 and 非洲轻骑兵并肩前进。其中还有一个负了轻伤的人说，有一颗子弹打进胸部了，但它不能阻止他和他的同伴们一道前进，并且在返回时还一直走到深夜。进攻嘉定的战斗于 5 月 1 日凌晨 4 时打响。6 时，我们的队伍从南面进城了，而惊慌失措的起义军却从北门逃走了。我们年轻的中国部队在这次新的进攻中立下了卓越功勋，他们中间有三名士兵阵亡，有 15 人受伤。梅德尔神父在战场上为这三名战士举行了洗礼。

当我们遭受这些灾难时，由于起义军的暴力行动、流行病和饥饿造成的人员大量死亡，人口显著减少。特别是儿童的死亡速度达到了令人可怕的程度。在上海，每天都有近 20 名基督徒死亡。但是，应该承认，官员们和民众本身由于道德败坏，他们理应受到这些灾难的惩罚。在使中国政府感到耻辱的事中，我还补充一件事，

他们的保护人自己即皇家士兵比敌人更野蛮，他们仅从远处采取一种根本不伤人的方式发起进攻。他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可耻地虐待可怜的百姓，并且还冷酷无情地抢劫他们；而当起义军来到时，他们不进行抵抗，而是去别处进行抢劫，制造混乱。他们经常亲自完成由起义军在一些地方开始的摧毁破坏工作，并且你还可以见到他们拆毁破坏房子。他们掠夺一些物资，然后再卖给这些物资的所有者。现执政的同治皇帝被他的国民们所忍受的痛苦所感动，所以他就免除了对浙江、江苏和安徽三省征收亩捐和厘捐。

还是来谈谈起义军吧。你们问我应该怎样看待他们？他们是一些实施最粗野的共产主义的人。只需一句话就可以解释了。这伙强盗来到一户祖孙三代之家。“Gnéu-Tze(拿钱来)！”这就是他们破门而入的第一声叫喊。为了能要到钱，他们在必要时还使用了不太锋利的刀。接着，他们对老翁和老妪说：“你们太老了，不能为我们干活了。”强盗们把他们从生活的重负中解脱出来，在他们看来这是无用的和令人难以忍受的生活。然后对当家的丈夫说：“我们要你的妻子去给我们做饭，我们要把她带走。如果你可以的话，你替我们去搬运行李。你的孩子们去给我们当奴隶。”而那些小一些的孩子则被他们抛弃了。他们的巡视以抢劫而告结束。这些人抢走了大米、家禽等东西……我说的只是一伙叛乱者的所作所为，但它是所有其它各伙义军行为的真实写照；这种种卑鄙的行径不止一次；而是每天如此。正是这些人使欧洲商人大发雷霆！的确，欧洲商人们很早就对这些人有所了解。但当和这些人发生联系时，就可以看清和这些被保护者做生意是捞不到任何好处的，因此他们就改变了对这些人的态度，并且还已公开地坚决宣布一定要歼灭这些人。

1862年5月于上海

正像你们所了解的那样,自从打教者入侵浦东和普陀以后,大部分的人都已来上海寻找避难所。有 6000—7000 名基督徒来董家渡要求得到普通的简陋住所过夜,要求得到每天的食粮。杜若兰(Desjaques)神父从他那方面已接纳了 2000—3000 人。这样徐家汇的压力就小了许多。三个月以来,所有这些逃亡者一直住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为了养活这么多人,必须要有粮食才行,而且上帝使我们这里得到了粮食的供应。欧洲人表现得十分慷慨大方。接着在法国海军的几次拍卖中,我们以极便宜的价格买到了大量的饼干和其它一些食品。但我们上海的中国人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得到的施舍很多。有一位新教徒不但献出了大米和皮阿斯特,而且还安置好了 100 个可怜的逃亡者的居住和膳食。“我的神父,”他对禄理格(Loriquet)神父和杜若兰神父说,“你们要做的事太多了,你们不能把全部的工作都承担下来,让我来管理施舍吧。如果我没很好地完成这项工作,那么你们可以指出来,然后你们再重新安排。对于你们来说,你们要慰问许多人,那里有许多的工作要你们去做。”神父们乐意地接受了他的建议,而且事情办理得没有比这再好了。在我们三位主要神父的帮助下,他以一种值得颂扬的积极性做好了全部的工作。

上帝用他的保护行为,使我们看到它对这些牺牲精神是感到愉快的。马义谷(Nicolas Massa)神父已在我们住院附近修建了一个大棚,后来他把大棚租给了一个很富有的基督徒。这个大棚可以容纳好几百个逃难者。由于人们不知道把这些逃难者安顿在何处,所以禄理格神父来到这个基督徒家,请他考虑安排好这许许多多不幸的人。但他拒绝了。“我不懂你的意思!”神父对他说,“怎么啊!天下着大雪,你们的同胞受苦受难,而你们却拒绝给他们安排一个

住所！你们就这样没良心吗？”等等……尊敬的会长神父和主教阁下本人亲自出面，但也是毫无收获。这一坚决的拒绝使大家都感到很惊讶，因为承租人向来是一个善良忠诚的基督徒。其实他早已向某些流亡者做了大量施舍，并且已安排有 200 多人住在他自己的家里。到了夜晚，突然响起了一阵可怕的轰隆声，原来是积雪太重把大棚屋顶压垮了。第二天，这位神父对杜若兰神父说：“我现在明白了他昨天为什么说我没有良心，这是上帝想拯救这许许多多本来可能会遇难的不幸者。”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下面要叙述的事情稍微有一点离题，但这是一件值得我报道的事。

在艾尔梅(Laimé)神父那个县的内桥(Neddio)有一个新近定居下来的年轻而又富裕的异教徒。12 月份，他一听到仇教者到来的消息后就离开内桥，打算去远处为他自己、妻子和母亲找一个住处。但当他返回时，眼前的事情无不使他感到非常惊愕和失望！仇教者已经走了，但他的房子已化为灰烬，妻子和母亲被抓走。他怀着悲痛忧伤的心情来到神父身边，神父鼓励他，安慰他。“但是，我的神父，你不能不惜一切代价把我的妻子和母亲找回来吗？我已准备在必要时牺牲我的全部财产。”——“你想，我怎么能去向迫教者提出要求呢？因为我也和你一样要避开他们。但是我很想教你一个办法，它能找回你爱恋的人。只有真上帝，基督徒的上帝才能帮你把她们找回来，只有它才是万能的。祈祷上帝吧，你将会如愿以偿的。”——“啊！对了，我愿向上帝祈祷。”——“好吧！我们来一起祈祷上帝吧。我将会使你认识我们上帝并且告诉你应该怎样祈祷。”年轻人满怀诚意地顺从了这一切安排，接受教诲和洗礼。他刚受洗完毕就跑来找神父了：“我的神父，仁慈的上帝使我如愿以偿了。我向他请求救出我的妻子和母亲，他就使她们回到我身边来

了。现在，她们也想成为基督徒和我一样崇拜上帝。”神父看了看他，并且让他讲述了她们意外返回的经过。事情是这样的：在离开浦内时，打教者们带着上万名俘虏（不包括妇女和儿童）。在赶路时，一名打教者发现在这许多俘虏中有我们两个不信教的人。她们的命运和泪水使这个人很受感动。他热心地同情她们、关心她们。在规定分享战利品的那天，他走近她们说：“你们归我管了。”然后，为了使她们放心，他又小声补充说：“什么也别害怕，我想救你们。你们今天晚上10点准备好吧！当我的同伴们快要熟睡时，我们就将离开营地。”两个俘虏一直难以相信这些许诺的真实性。但她们暗自思忖，他在旅途中对我们多好啊！然而，晚上10点时，打教者中的两名正直的人来了：“不要说话，快跟我来。”他们走了，然后穿过营地登上了准备迎接她们的一条小船。“现在我可以完全自由地解释清楚了。我是新泾的一名基督徒，被打教者抓了以后就被迫跟着他们了。但我希望仁慈的上帝将酬报这件好事，并且有一天能给我以自由。由于我要在我的同伴们起床前返回营地，所以我只能把你们带到邻近的村子里。我们在那里将可以找到一位基督徒，他将会亲自把你们送到内桥去。”他果然把她们交给了这个基督徒，然后就马上回去了。不久，这位年轻人的妻子和母亲都回到了他的身边。我本来还要对上帝的亲切关怀进行一些类似的描述，但我急于要谈谈关于我们在上海的逃亡者的情况，所以不再细说了。

当他们向我们提出要求避难时，我们原以为只是几天至多几个星期的事，但现在他们挤在寺庙里和在郊区一些地方建起来的茅草房子里度过了几个月。毫无疑问，上帝已允许它拯救一大批异教徒和一些被不幸逼迫才去履行自己义务的基督徒。当疾病发作时，逃亡来的基督徒和异教徒来到我们中间还不到一个月，随即就出现了可怕的大量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得到了特别的赈

济。对于异教徒来说,虽然我们不能向他们提供解决其悲惨处境所需要的物资援助,但我们至少想向他们提供一些天下最宝贵的东西。一些虔诚而又热情的中国传道士跑遍了他们集聚的城市和郊区,为一些生病的小孩举行洗礼。他们一部分人带去某些药品,以便能被更好地接待;另一部分人只带去洗礼用的圣水,他们想法把圣水洒在孩子们的额头上,使其父母不受伤害。谷振声(Della Corte)神父的一位老传道士开始时每天为20至30人举行洗礼。有一天,受洗礼人数一直升到68人之多。他一直继续长途奔走。奥利夫(Olive)神父的一个传道士对他说,三个星期之前,他已为300个儿童举行了洗礼。

看到有如此多的幼童生病时,大神学院的一些学生抽出一部分散步的时间来寻找这些稚幼的不幸者:他们为其中大部分的人举行了洗礼。董家渡住院的护理潘奥定(Bernard)修士和他的一些中国助手也来到一些主要的中心地点。他身背药箱像一个医生一样工作着,因此他可以到处出入。他可以借机接近病人,向他们询问一些情况,给他们一些药片。许多惊奇的异教徒拥挤在他的周围向他提问,或者叫他去为他们生病的亲戚看病。修士为他所取得成绩而感到高兴,他忙得团团转。他在行医时也没忘记他的主要目的。如果可能的话,那么孩子们都将会秘密地接受洗礼,当着一群好奇人的面,把孩子们放在圣水中使他们得到新生。母亲们经常亲自抱着他们生病的孩子来请修士为他们举行洗礼。有时候一夜之间他可能要为15到20个人举行洗礼。成人们也没有被遗忘,修士劝他们或者让别人劝他们信奉基督教,他的话一般都很容易地被人接受,他对每个人进行了短暂的教诲之后就举行洗礼。异教徒们也并不对此感到生气,他们相反却亲自促使一些病人信奉基督教。病人们甚至常常是那样热烈的渴望做一名基督徒,以致于他们担

心不为自己举行洗礼的心情胜过担心死亡的威胁。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身体至今一直较好,可是有一个晚上他却突然感到不适吐血了。“怎么了!”人们随即听到他喊叫着,“难道当真我没有被洗礼就要死去吗?”旁边的人跑去寻找传教士。但当传教士来到时,这个异教徒由于大量吐血而已经窒息死亡了。人们不止一次地给我们送来一些奄奄一息的老翁。神父或者传道士教给他们最基本的道理,额头上的洗礼水还未干燥他们就咽气了。“注意,”一个不幸者在人们检查他的伤口时以微弱的声音说,“请注意在我未被洗礼之前不要使我的头颅和身体分开。”实际上,利刃大刀早已在他的脖子上砍伤了一道很宽的伤口,只有几根筋使头颅还连在躯体上。仁慈的上帝使他如愿以偿,使他在临死前的瞬间受了洗礼。上帝是多么仁慈啊!过去成百名异教徒坚持错误,或者至少对基督教的拯救抱着一种令人讨厌的冷漠态度,而他们今天在面临死亡时,听到传道士的第一句话就很受感动,并且还要求按照他们了解甚少的基督教的方式去死!

1862年8月30日

你们从我们的书简中知道了内桥被攻克。在这次战斗中,勇敢的法国水师提督卜罗德(Proter)光荣地倒下了。继此之后,又发起了对另一座城市的胜利进攻。但另一些匪徒也在继续向我们逼近,英国人出于谨慎,则认为应放弃已经夺得的地区,目前重要的是保卫上海。随着欧洲人向上海的撤退,敌人步步跟踪,紧追不放,所以我们现在又一次处在匪徒们包围之中。

打教者们这一次进犯造成的损失比前一次更严重。在这伙强盗经过的地方,男人、妇女和小孩都惨遭他们杀害。原来残存下来的一些住房以及后来匆忙在废墟上新搭起来的一些茅草棚、树木、

秧苗,甚至连一些篱笆都被破坏烧毁。集聚在徐家汇和上海的流亡者非常多,疾病不断增加,霍乱威胁着他们,给他们带来了可怕的灾难。下面的一件事就是一个证明。7月11日,安于仁(Andrieux)神父被派往离徐家汇不远的一个村庄,以去抢救几位生命垂危的基督徒。晚上九时,他为第一个病人举行了圣事,早上三点半,他就使其中的24人公开表明了信仰,并且为18人举行了临终涂油礼。他只有从一间小屋到另一间小屋的时间。我将不向你述说我们的传教士在这种悲惨的形势下是多么地忠诚和劳累。基督徒和崇拜偶像的人都是他们关心的对象。肉体的痛苦也罢,灵魂的痛苦也罢,什么都不能阻挡他们的仁慈之心……

今天,我们的使徒仍继续在奔跑,但收效甚微。这是因为死亡使逃亡者的队伍变得更纯洁。另外,我不知道打教者们为什么感到如此恐慌。他们像施过魔法似地消失了,他们的逃跑使得我们的一部分基督徒回到了他们的家园。不管上帝为我们安排的前途如何,我们对现在的生活感到十分安全。我们扩大和整修了徐家汇的防御工事。六位非洲轻骑兵和我们的神父相处很好,关系很融洽,他们继续在我们住院周围巡逻。为了支持他们,我们在徐家汇的学院里培养了300名很有教养的士兵。这批人很快将要增加到1000之众。此外,英国人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设立了一个有2000人的警卫队,其中有70位爱尔兰天主教徒。他经常来看望神父们,参加做弥撒、告解、领圣体并在我们教堂里共同做念珠的祷告。

如果上帝已为我们的努力降福,那么它也已迫使我们忍受最痛苦的牺牲。战争、过度的劳动和霍乱使我们的队伍变得更纯洁。我们的六位神父、一位助理修士和我们的主教年文思(Borgniet)阁下在几个月内相继去世了。如此之大的损失所造成的人员匮乏使我们希望能很快得到从法国派来的许多新合作者。请为我们和

我们的传教区祈祷^①。

耶稣会梅德尔神父致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书简^②

1862年11月11日于上海

先生们：

我们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收到了你们早已想准备拨给江南传教区的一笔新的津贴，你们慷慨的捐献真是再及时也没有了，因为一些被打教者蹂躏破坏的县遭受了难以用语言表达的苦难，我们可以用你们的施舍拯救许多人。上帝会百倍地偿还你们给我们的一切好处。在这段时间里，你们会亲自看到你们的施舍和祈祷所结出的全部硕果。

对于我们来说，前几年是艰难困苦的年代。你们十分愿意关心我们的贫困处境，今年似乎是一个毁灭性的年代。如果我们不是有了上帝关心其事业的长期的经验，那么我们早就很容易地失去一切希望。由于上海积累的丰富资源的吸引，由于对丝毫不让打教者接近上海的欧洲人的疯狂反对，打教者们集中了他们的全部力量对这座城市发起了进攻，并且到处宣称他们绝不宽容任何人。现已有一支10万多人的军队向我们美丽的浦内县和浦东县扑了过来，并且在那里进行了大量烧杀洗劫。匪徒们甚至已经一直打到上海对面离战舰几十米远的黄浦江岸来了。

其它两个人数很多的兵团已经占领了西部和北部。他们的营地建在地势很好的地方，我们在城里只能通过水路和船舶才能和

① 10多名尊敬的神父耶稣会士即将动身赴中国。

② 译自《传信年鉴》第35卷，1863年。——译者。

外面取得联系。

农村的居民仓促逃往上海，并且堵塞了街道和市郊。据估计，这个小小的地方很快就已挤满了 300 多万人，他们一个比一个更加惊恐。许许多多的欧洲人也为他们的财宝和生命而害怕得战栗不安。

然而，王师及官员只想和仇教的人融洽相处，或者躲藏在欧洲人身边不敢露面，而欧洲人仅有数千人来对付这无数的匪徒。人们特别担心匪徒们在夜间进行偷袭以及在城市和港口放火。此外，在这种包围中又怎能避免如此多缺吃少穿的人不挨饿呢？对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勉勉强强已收留、安置、供养了早已来到我们这里的上万名基督徒。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还有另外一些人一小批一小批地来到这里。一些异教徒也找我们帮忙，并且还和一些新教徒来分享分配的粮食。我们使众人尽可能少受折磨，但怎么能接济这么多的需要呢？为了成千万来到上海的不幸者，上海的居民们从他们方面做了非常慷慨的施舍。毫无疑问，正是由于这一点才使上帝的怒气平息下来，才拯救了这座城市。

一些法国和英国的海军司令考虑他们即将离开码头，并且决定他们自己最先动手。他们并不担心去进攻兵营和附有设防工事的城市，虽然它们都有 1 万、2 万或 3 万起义军保卫着营地和城市。上帝降福于他们勇敢的决定：10 战斗获得了 10 次全胜，上海也可以喘一口气了。但法国方面为第九次取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兵勇们来到城墙上击溃敌人的时候，英勇无畏的水师提督卜罗德被一颗子弹打中倒下了。所有的中国人和欧洲人都认为这是一大损失。征战结束时，人们都感到战争是那样的严酷：英国水师提督贺布(Hope)先生的腿部也严重受伤；法国水师提督布罗德战死于疆场。不多久，带领一支军纪严明的土著人队伍的华尔司令也被

杀害了。

卜罗德水师提督先生是拯救上海的远征军的灵魂。有了他，同盟军最后才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打教人马上以从未有过的疯狂和凶残反扑过来。如果说他们不敢进攻上海的话，那是他们已完成了对郊区的破坏。特别是到了5月底前后，流亡者显得更加惊恐不安，房屋和大棚再也容纳不下新来的人了。道路上、田野里、公园里到处都是缺吃少穿的可怜的人。随着苦难和精神的折磨，疾病也乘虚而入，到处都出现了死人和垂危的病人。

在这些灾难的日子里，一些传教士、传道士、神学院学生和学院的大学生们从早到晚地奔跑忙碌，以便能给不幸者以援助和安慰。我想说他们在拯救灵魂方面的主要成果是大量的，许多异教徒把他们永生的幸福归功于起义军在人间给他们带来的困苦。至于短时间的援助，我们早已决定要不惜一切地援助这成千极需要救济的人。我们只有很少的东西可以用来施舍，但我们要以一个富有者和能生产大量面包的人之名义而行动。中国平民、基督徒和异教徒的慷慨大方使我们很受感动。总而言之，我们暂时不缺少物质资源；但我们很快就没有力量了，并且将只得放弃我们的事业。上帝已在那里做了许多事情。在我们累得抵挡不住的时候，打教者中产生了一种惊慌的恐惧：他们在一片混乱中撤退了。逃亡者原以为他们都会死在上海，但他们现在却看着空荡的战场离去了。

我们自己不久就全明白了，我们就能估计出的损失的大小。1月和2月，艾尔梅和柏理师(Pajot)神父已经被累死了。3月，费都尔神父又被打教者杀害了。6月，虔诚的信徒葛必达(Clavelin)神父阵亡了，多维涅(Dovergne)神父、神学院一修士、一位助理修士和一初学修士被召去作为永久惩罚。殉教者中还有两位中国神父，许多传道士和圣一依纳爵(Saint-Ignace)学院的几个学生。

我们这些在极度疲劳之后还活下来的所有人几乎都病倒了，并且还有几人生命垂危。但江南这个可怜的传教区还将要做出巨大的牺牲。年文思(Borgniet)主教大人一直为我们做出了虔诚的表率。他身体很健壮，但现在感到也难以支撑下去，而且在去拜访我们在山东的神父的旅途中做了短暂的休息。7月31日是我们神圣的创始人的纪念日，他为神圣的弥撒举行庆祝，并且给信徒们分发圣餐。但在恩典活动结束后，他突然感到霍乱缠身，尽管有一位能干的护士修士的精心照料，但他在忍受了几小时的折磨后还是停止了呼吸……

多亏上帝保佑，使我们现在都比较好地恢复了健康。仇教者在这些县再也找不到粮食了，所以他们好像慢慢在撤退。因此，我们试图返回去，把我们原有的一些新教徒召集起来重新进行培养训练。有几位神父已经搭起了一些芦苇棚以临时替代教堂，因为在基督教徒家属未返回之前，教堂还不能完成修缮。

传教士们在一个完全被摧毁的地区生活是非常穷困的，我们要尽力向他们提供一些生活必需品。此外，他们某些信徒的诚心诚意和异教徒一些令人感觉良好的倾向给了他们很大的安慰。当我们有了一些新的传教士去替换在英勇作战时倒下的那些人时，我们就可以迅速前进，并且向光荣的上帝展示我们的战利品。请你要求“家父”派来一些人手来，因为我们的任务很艰巨。也请你为我们年轻的土著人祈祷，因为他们在我们遭受危难的日子里，完成了我们希望他们在以后锻炼成熟时所做的一切。

我们大家都同意，在如此多的废墟要重新修复之时，应该把重建学校做为整个修缮工程的开始，可能此地比其它地方更明显，因为这里宗教事业的发展取决于对年轻人的教育。我们应该感谢仁慈的上帝在上海为我们主要的学校准备了一个避难所。因此，神学

院就可以与在和平时期一样正常开课。徐家汇学院处在离危险地带很近的地方,但由于几个正直人的保护,学院仅有一天中断上课。一所寄宿学校和一个孤儿院都被暂时地转移到城里,几间学习的房子被临时安排给流亡者居住;以使那些在家可能没受过教育的人能够在流亡中学习教理讲授和经文。我们小基督徒的学校非常协调,它们不但给小孩以好的影响,而且对家属甚至对异教徒也有很好的作用。

为了不使你们感到厌倦,我省去了有关传教区各种事务的详细情况。和去年一样,我把这些情况汇编于一个附表内,这样,你们就可以对所有的事情一目了然。

请接受我的诚挚的谢意!

你卑谦顺从的仆人耶稣会士梅德尔先生

阿波罗尼亚主教和贵州宗座代牧主教胡缚理致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书简^①

1863年9月8日于贵州

先生们:

我们历尽了千辛万苦之后,上帝才给了我们一点歇息的机会。现在我们开始感到轻松愉快一些了。

田提督^②根本不把皇帝的任何圣旨放在眼里,因为他手中掌握有军队和以前从各处勒索来的许多金钱,他威胁要举旗造反。当大家一直胆战心惊、惶惶不安时,张亮基大人带着一支军队在5月份及时勇敢地开到城里。他很快安排好了一次攻城计划,还以皇帝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36卷,1864年。——译者。

② 请参阅于本刊1862年9月号第418页中有关这一特殊人物的小传。

的名义罢黜了田大人，并且命令他遣散其军队。庆幸的是，他的军队比他更清醒，他们都服从了。然而，田大人身边还剩有 500 名士兵顽抗，但由于城市设有很坚固的防守工事，所以他们什么也不敢做。由于对田大人施用了各种计谋和种种威胁，因而才使这个危险人物离开了这座城市。

不久以后，总督劳大人到任了，他是皇帝委派来解决我们案件和采取补救措施的。他到达的同一个晚上，便机灵地让人告诉我不要去看他；他想亲自来对我进行首次拜访，以便使大家明白皇帝对我的尊重。

在他到达后的第三天，他果然带着由上百名各级官员组成的全体随行人员来了。下轿时，不举行冗长而复杂的中国式仪典，他亲热地拉着我的手并以热忱的口吻对我说：“按照法国的方式办。”他首先向我谈到了他在广东与某些欧洲人的友好关系，接着向我提起了几位欧洲人，最后讨论了关于我们宗教利益的问题。他指出了最有利的安排，一切都使人相信他将要很好地处理我们的教案。我邀请他参观了教堂。我本来还想领他去参观孤儿院，但却担心他太累了。因为他已年迈，行走有困难。上楼梯时，我请他依靠在我的胳膊上，他不客气地同意了。

在这位总督作出示范之后，便完全是接待拜访和回访。总督是星期一起来的。在这一周的其余几天里，我没有一点休息的时间。在首府的全部官员，所有地方官和主要商人都听凭驱使。进入我的卧室的人数有时竟达 20 人之多。他们都想了解宗教、地理、天文、历史。他们也想都要观看所有东西：望远镜、显微镜、图片、拉丁文和法文书籍。我向他们演奏了几支手风琴乐曲，他们特别喜欢《达戈巴尔王》的曲子，但他们对《马赛曲》不很感兴趣。演奏完毕后，还须回答他们提出的有关法国铁路、电报机、摄影术等方面的许多问

题。他们隐隐约约地听说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但却几乎都不相信它们。

第一杯茶后,我邀请他们参观了教堂和我们的孤儿院,他们对此感到很惊奇。他们大部分人只是模糊不清地知道我们收养了某些婴儿,有一些人甚至以为我们真把孩子们的眼睛挖下来制药。当他们看到这许多孤儿都穿得很好,身体健康,都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时,他们似乎感到很愉快,都承认我们对孩子的照料要比国家收容所好。他们的称赞绝非夸张,这些官办的收容所是令人厌恶的。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因为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不了解这样美好的事业而感到惊奇,并且久久不能恢复平静。他为自己愚蠢地相信了流传的一些有关我们帐目方面的荒谬和恶意的中伤而特别感到自责。“道理是这样的,”我对他说,“我们的宗教支配着我们行善,我们所做的事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只是为了使上帝高兴。当右手施舍时,左手不应该知道,这是我们中间所公认的一条原则。”——“这种教义不是中国式的”,他沉思了一下说。——“它不是来自地球上任何一个地区,”我又说,“它出自于上帝。因为人生来就是自私的”等等。接着,谈话内容自然转到了宗教问题。

当我的参观者要回家时,我给了他们一些好书,特别是归化异教徒的一些好书。我对他们说:“现在你们已经见到了主教,外边的人认为你们一定懂得宗教,因而也就少不了向你们提问题。你们仔细读一下这些书,并且替我进行布讲。”这些书已经结出了丰收的硕果,有一些人已来要求我讲解,并且认真地考虑打算要信教。

这些参观使我感到非常劳累,但我没拒绝过任何一次来访。许多从未见过欧洲人的中国人对我们怀有某些古怪的看法,见到我们就发起抖来。他们早已听说了许多有关我们帐目的荒唐事,其中有这样一件事:“我们把使人失去理智的春药放在茶里;结果使在

我们这里喝了这种茶的人都失去了控制自己不成为基督徒的能力。”所以，当见到我们和其他人差不多，并且和中国人一样有礼貌又和蔼可亲时，他们既感到高兴，又感到惊奇。他们没有一个人不愿意喝我们的茶，乃至喝我们的酒，也没有一个人不愿意吃我经常请他们吃的糕点。许多成见都被打消了。

然而，唯有一名参观者——首府的一位知府没有从外表上消除对欧洲人天生的仇恨。在我去看他的那天，他邀请了许多人，伺机使我在他的整个军营丢丑。他禁不住说我几乎不会讲中文，而且还说通过提出反对意见可以很容易使我感到为难。我已知道了他早已精心准备的战斗方案。首先，他让我在其客厅室内等了相当长的时间。其次，他露面时，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副严峻的面孔和恶劣的情绪。我假装不知，并且向他致以习惯性的仪礼，他按照严格的仪式做出了回敬，但态度冷淡而又生硬。

为了解决一些属于这位知府管辖的事情，总督劝我和他融洽相处，我请他让那位帮助田大人写诽谤性短文攻击我们的文人到庭。因为他身处总督和我之间，可以迫使他收回其诽谤。他冷冰冰地回答我说：“如果我能找到他，那好办；如果我找不到他，那就活该！”我又说：“如果贵州的一些官员都不能找到他，那么我就写信上呈皇帝，因为这种有损于我们声望的错误，当然是皇帝希望人们进行矫正的所有错误中的最严重者。”他对此未加任何反驳，但又突然开始了对宗教的讨论。从这个原则出发，每个人都应该保留自己的信仰，并且不要改变。——“我今天不是来向你布讲宗教的，但鉴于你似乎对此感兴趣，所以我们可以谈谈。你信仰何种宗教呢？”——“孔子的儒教。”——我已读过这位大人物的所有书籍，但我没发现他有任何崇拜偶像的地方。在孔子那个时代，中国还没有偶像，人们只是崇拜上帝。然而，根据你们一些最受尊重的评论员

的看法，上帝就是“天主”。你看，我们与孔子的教义比与你更接近，因为孔子只崇拜唯一的上帝。

我就这样地高谈阔论起来了。当我发现他听得不耐烦时就停下来，并问他刚才我谈的这些东西是否是真的，是否与历史相符。他未作任何答复而是把话题转到了另一件事，我也随之改变了话题。相反，在场的人却对我很注意。也许这几句话将不会使人完全失去希望。

总督了解了这次谈话的详细情况后，在同一天晚上就向知府提出了严厉的警告。我于此之后又数次见过他，现在他对我非常和蔼可亲。

所有这些访问对于百姓产生了一种很好的效果，并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好处。几个占有从教堂偷来物品的人把这些东西还了回来。田大人那技艺高明的女厨师把士兵们曾作为礼物送给田大人的一幅大型图片装在蒙有黑帘的车辕上，在喇叭和弦乐的伴奏声中很客气地送给我们。这一次她听懂了天主教的教义，并且认真严肃地打算信奉天主教。

毫无疑问，我们还有许多敌人。有七、八个为一死者搞迷信活动的和尚喝了一点酒之后，又写了一块蛮横无礼的标语牌反对基督徒。在经过我们的药房时，他们把这块标语牌扔到了我们的药房。官员叫人把他们都抓了起来，每人被用藤条抽打100下，并要他们跪在被凌辱的药房之街道中央赔礼道歉。

数天之后，在同一间药房里又出现了同样类型的短笺，上面签有一个年轻人的名字。这位年轻人的父亲是北京的官员。药剂师威胁要马上传讯他。这一案件及时传到我那里后，我立即去为被告进行了辩护。“不是他，”我对那些告状的人说，“不是这位年轻人写成这些诽谤之词；他是世家名门之后，很有教养，他不会做这类事。

此外,如果他是肇事者,那么他就不会那样傻,以至于在短笺上签名,尤其是在已有几个人因为这类坏事而被关进牢房的时刻,他更不会这样做。这可能是某个敌人想损害他的名誉而干的事情。”我让人把这张便条烧毁,一切就这样完结了。其父母为此事非常担忧,他们获悉我已顺利处理此事后便派遣一家之长,一位70岁的老人带着他的孙子(这位年轻人)来向我表示感谢,并赞扬我的公道、美德和高尚灵魂,又说了一些中国式的客套话,最后还忍不住流下了感激的热泪。为了向他们证明我对他们的无辜没有任何怀疑之意,我还向他们演奏了手风琴乐曲,并且让他们看了我的所有珍品。在为他们送行时,我还送给他们几本好书。看来这一家很有被归化的希望。

在同一周内,总督让人把广州府(一重要城市)的一个年轻人从我们这里偷走的带有耶稣像的十字架、图片和其它物品送交给我。他同时还告诉我说罪犯即将被斩首,以杀鸡儆猴,作为儆戒他人的示范。我立刻为罪犯求饶,并且得到了他们的同意。第二天,罪犯就被放了出来。其父来向我表示感谢,并且答应他的全家都将信奉基督教。此人在广州府是一个很有威望的人物,他的举动一定会对很多人施加影响。

监牢里还关有一个年轻的鲁莽人,他是田大人的姐夫。正是他在最近几年经常带着许多士兵和演员干了许许多多当众侮辱我们的事情,也是他曾有一天举刀向我砍来。他也被判处为死刑,但我却为救他而积极努力。所有的人都反对我这样做,因为他是一个无拘无束的很坏的人。全城的人都讨厌他,他的诉讼难以取胜,因为官员们抱怨我的宽容会使他们束手无策,而如果他们不对罪犯判处死刑以作儆戒,那么我们事务的安排将会遇到更大的障碍。一天,总督对我说:“在我拉开弓的时候,你却来把我的弓弦剪断了,

你怎么能希望我达到目的呢？”我回答说：“我是一位主教，而不是官员，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处死这些恶人，而是为了拯救他们。”

我知道，有几个狡猾的人想凭感谢笼络我而滥用我的宽容，以得到我对其它问题的让步。但他们打错了主意。一年以来，他们和我商谈一些事情时，不允许我有偏差，他们大概想知道我调解的想法能达到何种限度。我对他们的全部政策就是让他们什么也得不到。我谈任何问题都直截了当，从不支支吾吾。如果我要和他们斗智，那我很快就会被打败的。至于他们的阿谀奉承，在这里是司空见惯的事。我根本不需要提防他们的贿赂，因为这是他们共有的作风，以上就是全部情况。他们的政策就是使事情复杂化，并且尽其最大的可能拖延事情的解决，以便尽可能长期地保留向受牵连的人勒索赎金的方便。目前，在官员的责任中再没有比这更为实际的了。因此，为了只谈我们的公使为贵州传教区要求的赔偿问题，负责对杀害文乃耳的凶手戴氏进行预审的官员们就请求我同意让戴氏继续任职。他们说，因为是他抓捕了迫教者，如果免去他的职务，那么敌人就会马上向首府猛扑过来，人们就会指责我。我回答他们说我的职责只限于收取在北京规定的赔偿，至于对罪犯所采取的措施和惩罚，则不归我管；我希望他们像熟悉自己的本行职责一样尽职。最近他们要求我以宽宏大量的仁慈心怀同意把对田大人的死刑判决减为流放。他们完全不是什么仁慈、怜悯，而是不想看到一个中国官员要为杀害一个欧洲人而抵命的不体面的局面。他们还希望这次能成功，因为它可以作为以后解决类似事件的一个先例。

我还回答说我并不希望田大人被处死，而且我从未要求处死他；相反，我真心诚意地希望能拯救他的肉体 and 灵魂。但这个问题超越了我的权限，我的调解是没有作用的。此外，在中国皇帝宣布

对田处以死刑的宣判书中,他的绝大多数罪行是反对其国家的。因此,即便法国赦免他,在中国政府看来也决不能减轻他的罪行。接着我补充说:“我丝毫不想骗你们,我也不想当面答应你们说我要根据你们的意愿去说情,而背地里却写完全相反的内容,因为这是中国的习惯,而不是法国的惯例。这就是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法国以及其它一些在中国驻有代表的欧洲国家对儆戒性惩罚这种背叛的作法很感兴趣,以至于我不能希望得到对罪犯的饶恕。对于我来说,中国的皇帝知道我仁慈地原谅了他,而且还并不止一次地向他表示过。但在目前的形势下,当条约的墨迹刚干,当法国竭尽全力与起义军作战和拯救朝廷时,处死一个持有符合手续的护照的法国人,这就是我们的皇帝不允许这些人能逍遥法外的理由。我请你把法国的利益与宗教利益区别开来。宗教原谅他,这是出于仁慈之心;如果法国方面也原谅他,那我将为此而感到高兴;但如果我告诉你们说我希望如此,那我就欺骗你们了。”这就是我让他们经常听到的说法。

如果这封信不太长的话,那么我还要提供某些中国政策十分稀奇的例证。然而,他们的政策取得了这样一种好结果,为了欺骗我,为了让我忍耐下去,某些官员挖空心思通过拜访、送礼、各种礼节(在街上碰见我时表示的礼仪除外)等方式来奉承我,尽最大的可能赐给我荣誉。如同没有任何错觉一般,我乐意地接受了这一切。在此期间,不了解其意图的老百姓从这些事中得出了一种良好印象。上帝为他的荣光利用了这一切。

这个省的起义军还进行了许多破坏活动。首府一直很平静。但人们仍很惧怕,某些县里笼罩着一种可怕的灾难,鼠疫和饥饿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死亡。人们估计这几年有半数以上的人口丧生。

祝愿上帝设法为我们带来和平的生活,上帝之天能延伸到这

个辽阔的帝国,使我们能将一大批生灵升往天堂。

先生们

我为能成为你忠诚的仆人而感到荣幸并表示万分感谢。

(中国)贵州宗座代牧主教和阿波罗尼亚主教

胡缚理

如果我们从贵州传教区胡缚理主教那里来到广东传教团明稽埭主教身边,我们就可以目睹我们传教团更辉煌的胜利。

下面看看《箴言报》(Le Moniteur)是以怎样的言辞报道这一切的:

12月8日在广东为天主教堂奠基之际,举行了庄严隆重的仪式^①。

正如他所允诺的那样,总督在提督、财政总监、两位鞑鞑将领、仓务官、中国军队的一位将领、两位官员和城市几个县知县的陪同下来参加了仪式。此外,几乎所有领事机构的人员、美国传教士、香港法庭的大法官、意大利和西班牙天主教传教区的神父、来自邻省的22位法国传教士以及欧洲侨民中所有的显贵居民也都出席了奠基仪式。

教堂的围墙长200法尺,宽150法尺,周围有300名满族士兵站岗,他们穿着崭新而又很别致的服装。这些人周围还有许多法国传教区的邻近居住区的居民,法国传教区的四周是十分拥挤的。

奠基仪式上有一人发表了演说,一位是法国领事李天嘉(de Trenquayle)先生,另一位是明稽埭主教大人,他突出地强调了其

^① 准备作为广东大教堂屋基的这块奠基石是明稽埭主教大人从耶路撒冷遗址搬来的。

传教士和他本人对总督参加奠基仪式感到非常重视。实际上,这种屈尊行动被认为会对中国居民的思想有真正的影响,为使分散在一些省里的传教士至今还受威胁的形势向好的方面发展作出了贡献。

可以肯定中国居民获悉广东总督已经来观看浇注建筑当时的第一座天主教建筑物的纪念性基石,并且由他的一些最高级官员簇拥着,跟在为祝圣它而结队行进的宗教行列之后围绕此建筑物绕行一周而感到特别惊奇。

总之,对于广东居民来说,这个节日具有史无前例之大事的特点,并且在中国人中间和欧洲常驻外交代表的头脑中留下了一种强烈的印象。它证明了中国当局至今所保持的和解的心情,并可能被看做是今后欧洲和远东关系史上一种吉祥的征兆。

外方传教会成员,(中国)云南宗座代牧主教花修道院长先生于去年5月7日去世,他刚听完一名鼠疫患者的忏悔。

花先生出生在朗格勒(Langres)教区的马伯维尔(Marbéville)。他于1843年离开法国,经过两年冒险的旅行之后,他才抵达自己的岗位,恰逢他43岁那年,他以司铎仁慈的最美好行动结束了他的使徒职务。“这一损失造成了传教区的人员空缺”,他的一位可敬的主教写道,“尽管他身体十分虚弱,但我们亲爱的同伴一直准备把迷途的羊羔带回羊圈。不仅基督徒对他很尊重,而且异教徒们对他也很尊重;他到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所以大家一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后都感到很悲痛,都沉痛地悼念他,而我则好比失去了左膀右臂……他的葬礼在我们生活的国家和时代里是很隆重的;共有500多人为他送葬到墓地——他亲爱的好朋友已故杜蒙(Dumon)先生墓地附近。他只走在我们前面几步……”

“接替花先生代理宗座代牧主教职务的古分类修道院长先生，于其书简中记载了关于他接替的同伴临终前几天专心考虑宗教利益的许多详细情况；下面我们向读者们一一介绍这些情况。

“一位虔诚热情的传教士为拯救人类而献出了他的生命，”古分类先生说，“对于人民来说，它永远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当上帝夺去了那些具有长期经验、罕见的才能、能为一个省做出上述服务的人时，那将是整个传教区的巨大灾难。对于我们来说，在这种灾难之外又增加了其它灾难，花先生也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去了。”

由于他的工作过多，所以他有一个助理司铎，这主要是为了减轻他在照料病人方面的负担。去年4月22日，这位土著司铎被召去看一个鼠疫病患者。我们亲爱的同伴感到十分危险，所以他让其助理留下了，尽管路途遥远而又艰难，他仍然打算亲自出马。返回时，夜幕出其不意地降临了，向导带错了路，使他在非常疲乏的情况下不能回到学院。这段夜路使他累得精疲力尽。

4月26日，他疾病发作，开始是剧烈的头痛和内热。尽管他极度虚弱，尽管他疼痛难以忍受，我们亲爱的病友还是参加了他的主保瞻礼日——5月1日神圣的弥撒，这是他最后的圣祭。一清早，他希望能得到并且已十分清醒地得到了宗教的所有救援。当医生们对他迅速恢复健康还抱有希望时，他甚至下令要为他准备棺木。

最后，5月7日，将近傍晚时，他的病情发生了恶变，他似乎一直十分难受。但在断气之前不久，他的脸上突然露出了喜悦的神情：一种天使般的美使他恢复了原来的容貌，颇为容光焕发。不久，这个美好的灵魂离开人间高升到了上帝的怀抱。一动不动的躯体本身好像预先分享了圣贤的荣耀。在基督徒瞻仰的四天里，照亮他一生最后时刻的天光于其身上留下了清晰的印痕。

云南主教阁下根据其宗座代牧前主教去世之前的事业，追溯

了我们在去年已汇报过的另一献身的行动^①。事情发生在一些被称为“长毛”的起义军入侵他那个县的时候。为了避免死亡或者被奴役,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逃到了他所管理的学院围墙内。这些人被包围了至少有两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花先生供给他们的一切需要,保证了他们的安全和供养。最后他成功地拯救了他们,但却被累得精疲力尽。下面是他在摆脱这些艰难困苦后向我们介绍的情况。

“由于欧洲一些基督徒无限的施舍,由于有人们不能过多赞扬和祝圣的传教区慈善机构,我们的基督徒才没有人被饿死。啊!在这些苦难的日子里,我们从异教徒那里得到了多大的恩惠啊!我们不能为自己享受这些恩惠,它们不可能属于我们。通过神圣的守护天神的斡旋,我们已把它们退回给上帝,以使它们变成大量的恩惠和功劳重新降临于这些不仅救济他们的欧洲同胞,而且还救济远方苦难的普通而又真诚的人。我们的开销是很大的,但我们事先可以相信慈善机构将会感谢我们的慷慨,因为这些费用拯救了 3000 多人。当合作者最后能够明白他们的施舍是何等的有益,又给人多大的安慰时,他们将感到无比高兴,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首先就是要履行我们基督的诺言”。

外方传教会贵州宗座代牧主教和阿波罗尼亚主教胡缚理致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书简^②

去年 1 月 11 日,贵州宗座代牧主教胡缚理阁下致外方传教会神学院的院长的这封书简,在大家刚读过的那些书简的基础上补

① 见《传信年鉴》1863 年 9 月号第 387 页以下。

② 译自《传信年鉴》第 37 卷,1865 年。——译者。

充了某些细节。

我们现在处在极其贫困的境地，一切东西都得不到满足。今天，利昂先生致书于我说他也不再能获得所需要的东西，他已中断了自己的讲道。他编列了一份名单，在他的登记簿上已经记有4万崇拜真上帝的信教者。但是还有上百个村子未被汇编入册。仅在利昂先生的那个县里，你就可以写上6万个崇教者，这个数字只能低于实际数字。在其它一些县里，人数也是十分可观的……我们在原有的一些基督徒（男人、女人、年轻人和老翁）中，动员了我们所能找到的所有人，并且把所有的人都培养成传道士。对于这些人来说，必须准备旅费及旅途食粮。他们大部分人都很贫穷，在他们劳动期间，抚养他们家庭的任务就须由我们来承担。

在使整个地区并入教会权力范围的全面热潮中，难道人们相信在教会中还会出现殉教者吗？……下面就是我们从胡缚理主教阁下于去年1月25日致波尔多小神学院院长拉塔斯特(Lataste)先生的书简中所了解的内容：

“……1858年，民团的一个团首由于仇恨基督教的名字而处死了两名新教徒。根据法律，此人本应作为杀人犯而被判处死刑。但对于他来说却很庆幸，因为负责此案的官员只判他仇视基督教，非常巧妙地把事情拖延下来，使得他能在两年前获得对罪犯的宽恕的赦免。但是此人好像是属于虎类。从此之后，他却不停地迫害基督教徒，使得大部分基督徒只得离开村子。”

还剩黄氏一家未受洗礼，他们把对宗教的信仰埋藏在心里而不敢公开表示。去年，一些失散的基督徒由于总督的干预又返回他们的家园。黄氏家族认为不再有什么害怕的了，于是他在圣诞节的前几天就开始和基督徒一起做祷告。因此仇教者对他进行威胁。黄氏就把总督保护宗教的命令贴在他家的门上以作为全部的回答。

12月28日圣婴节那天早上,民团的团首突然派人包围了黄家,他破门而入,抓住了黄氏和他的妻子,把他们拖到街上斩首以后就扬长而去。

许多人跑过来,黄家只剩下了两个孩子,一个三—四岁,另一个还是吃奶的婴儿。他们扑向其父母尚还发热的尸体,一个叫爸爸,另一个找妈妈寻吃奶。所有在场的人都悲痛地掉下了眼泪。这时,村里的暴徒手举大刀就来了:

“啊!你们哭什么,”他喊叫着,“你们要反对我做的事,那就当点心!”

村民们都惊慌失措地逃跑了。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在冷冰冰的尸体旁度过了一整天。他们悲痛万分地叫喊着爸爸和妈妈,可是他们的爸爸和妈妈倒在血泊中再也不能回答了,他们用两只小手抱着这两个与身躯分离的鲜血淋淋的人头。周围是那样地恐怖,谁也不敢收养这两个孤儿。傍晚,大孩子朝他父亲每天祈祷的教堂门口走了过去,他在那里喊了起来:“爸爸,你祈祷吗?咱们一起去吧,我饿了……”

传道员再也克制不住了,他于是便收养了这两个孩子。但在当天晚上,他找到一个山洞躲藏起来了。其他所有基督徒也躲了起来。

总督积极地让人追捕杀人凶手。他不许我为他求饶。

“这是一个杀人犯”,他说,“必须要使社会摆脱他。”

愿上帝能启发他,为了拯救他的灵魂,愿上帝为他收下他洒下的几滴无辜的鲜血!

中国西藏宗座代牧区的综合报道^①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38卷,1866年。——译者。

我们得到的来自西藏的最新消息(1865年3月10日)是令人不安的^①。我们在那里成了在拉萨的清帝国驻藏大臣敌视的目标和察绒一些喇嘛仇恨的对象,传教士们遭受着下一次被驱逐的威胁。他们刚刚目睹了某些基督教徒的村庄突然遭到袭击的情景,那里的居民们有的被迫四处逃散,有的被关进牢房,还有五位新教徒在酷刑中丧生,另外五人也即将遭到同样的命运。

接着仇教又开始了,最后终于达到了摧毁传教区15年艰苦奋斗、受苦受难、流血牺牲所创建事业的目的。西藏传教区被毁灭了。

为了逃避所遭受的各种各样的欺压和烦恼,一些基督教徒都躲避到猛卡、江卡和觉那洞的那些慈善机构的传教士那里去了。但是,在这些避难所本身可能遭到侵犯之时,一些喇嘛采用了曾使他们获得过成功的办法。即使基督徒们孤立起来,也不许有人接近他们,从而达到饿死他们的目的。与此同时,他们还严格禁止那些长得像藏民一样的人与之建立任何联系。1865年上半年就在这种种的忧虑之中度过了。然而,传教士们感到安慰的是他们已为两个成人进行了洗礼,还接受了五个望教者,并对其中的四人进行了培养训练,同时还使七个濒临死亡危险的异教徒小孩获得了新生。

开始时,阴险奸诈的手段较暴力行为占有优势,以暗斗为主。后来,同时从各个方面发起的公开战争则连续不断。6月末的最后几天前后,当前一年^②被阿都(Aton)俘虏的所有基督徒在西藏中心的贡杰被杀害时,当他们把费苟(法式,Fage)和都伯尔纳尔(Dubernard)先生从江卡驱逐时,当他们在觉那洞追捕吕项(杜朗,Durand)和毕天祥(Alexandre Biet)先生时,猛卡被武装力量

① 见《传信年鉴》第37卷(1865年),第438页以下。

② 见《传信年鉴》第37卷(1865年),第436页以下。

侵占了。

6月29日,毕耶(Félix Biet)先生写道,我们的敌人,喇嘛的代理人和杀害基督教徒的刽子手罗顿一策旺带着五、六十人来到了。一年以来,正是他经常说:“我将去猛卡杀死宗教的大师们,烧毁他们的教堂。”马上又来了一伙匪徒,所有这些侵略者于一个夜晚便作好了更加敌对的准备。某些基督教徒们向山中逃去,只有一些身体衰弱的人、儿童和我们留下来了。

“德格丹(Desgodins)先生和我,我们在清晨两点钟时互相忏悔,决定要割喉自杀。后来的几天也是在同样的不安和焦虑之中度过的。我们将要收获的庄稼有一半被毁坏。来访者络绎不绝,他们对我们进行谩骂和侮辱……我们的处境极其悲惨,被迫每天要为自己、儿童和逃亡者磨粮食。将来还会发生什么事呢?……如果你们不再听到谈论我们,那么你们就将会知道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了,红门将敞开着,我们将可以得到殉教者的金棕榈奖。”

7月3日,人群终于散去了,气氛也稍平静些了,但平静却预兆着暴风雨的来临。9月6日,毕耶先生写道:“来自各方面的消息向我们证实了拉萨三大寺院作出了摧毁猛卡的决定。我们只能是祈祷和等待。”

正像人们将从下面一封书筒中看到的那样,这些消息是准确的。

西藏宗座代牧主教丁卧硕主教致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书

筒

1866年1月3日于打箭炉

先生们:

根据教会所有的人都应屈从的那个人的意旨,我从可爱的云南土地迁到西藏来了,我幸运地于1864年12月21日到达我的岗位。我不敢希望能发现委托给我的基督徒“羊群”都很平安,本来就是由于我无经验和孤独才将该地区交给我的。但我不认为我的第一封书简应该把传教区用血换来的新荣耀和这些痛苦中的一种痛苦告知于你。传播福音的使徒们应该通过这一切而继续在人类中活动。

然而,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惊奇。侮辱、抢劫、放火、凶杀等活动破坏了帝国的这部分地区,这些现象也可能必然要发生在这些遥远的地区,因为中国当局在那里的态度十分和解与折衷,并且比在其它地方表现得更有争议。许多谣传都声称某些传教士和基督徒被从西藏驱逐出去了。我们认为这些谣言是徒劳无用的稻草人,我们那些勇敢的同事仍在继续平静和稳重地工作着,这是取得长期胜利的保证。但是考验的时刻,也就是公正和怜悯的时钟将要为西藏敲响了。

1865年9月29日,一伙足有500—600人的武装队伍来到我们在猛卡的传教区前面。接近早上5点钟时,一声枪响发出了约定的信号,没有经过战斗教堂就被包围并被攻克了。瞬间,门、窗、桌、椅、天花板和家具等都被砸得碎片横飞;我们的基督徒都被捆绑起来而遭到拳打脚踢。他们不分男女老少,全都一样对待,甚至连最幼小的稚童也和他们的母亲一样被毒打。德格丹先生和毕耶先生则被单独严密看管在一间房子里,顿时,最可怕的混乱笼罩着这幽静的地方。经过几天的解释、斥骂和暴力之后,全部基督教徒都被赶走,教堂及其附属建筑物都被放火烧毁,大家即将收获的极好庄稼都被毁坏了。现在,曾经作为法国势力范围的猛卡不再存在了。那里到处是一片废墟,留下的只是悲惨的回忆。

前一天,也就是9月28日,另外两位传教士吕项和毕天祥先生正在离猛卡13法里郊区的一个名叫觉那洞的小村庄里。50名西藏人由一些化装的汉人陪同,向我们同事的宅邸走了过来。远处的枪炮声在山谷中回响,这声音预示着敌人的来临。几个汉族人正想进行自卫抵抗。六名营勇有两把军刀和两支枪,但没有火药。光靠这些武器则无法进行抵抗,再说传教士们还打算拒绝谈论此事,于是只好决定逃向各方。有两位神父互相告解,因为这是庄严的时刻!永别的时刻!说完这些仁慈的话以后,毕天祥先生感到最幸运了,因为他在早上两点时逃脱了凶手来到了五里村,后来又逃到了察木多,他从那里把这些详细情况致函告知于我们。他的身体状况于此时很不好,有一只脚疼得很厉害。

吕项先生也很年轻,身体比毕天祥先生更壮实,他第一个来到架设在澜沧江的索桥上,后面只跟着几个基督徒。他勇敢地让他们先过去,而把最后过河的荣誉和危险留给了自己。他自己抓住架设在江上的一根长长的竹索向前冲去。当那些追赶他的人来到江岸时,他随着身体的重量产生的速度而飞快地沿着绳索滑了下去。在这同一时刻,响起了两声枪声……他的前胸和脖子中弹,吕项先生失去了知觉,两手一松,其身体就消失在波涛中了。有一个基督教徒头中两弹,另一个一只胳膊中弹受伤,第三个被捆住手脚投进江了。

面对所有这些罪行,西藏人却装着不知道。

22天以后,有人在距吕项先生坠入江中一法里远的五里附近找到了他的尸体。他的面容刚开始毁损。毕天祥先生给他重新穿上一件象征殉教和纯洁的红白装饰的衣服,察木多喇嘛的寺主在这些不幸事件中向我们伸出了友谊之手,几位汉族基督徒和这位教主为吕项先生奉献了某些精美供品,毕天祥先生欲将吕项的遗

体与这些供品一并葬在云南的土地上。

蒙佩利埃主管教区的吕项先生就这样去世了,当时他年仅 30 岁。他非凡的才华使人想起了上帝为他在传教区指定了一种光荣的生涯。这种希望没有落空,上帝给了他最大的荣誉,也就是殉教者的荣誉。吕项先生于 1858 年离开法国。1859 年他刚来到四川时就被捕了,但由于他的机智果断和各种幸运的机遇,他活了下来。他的汉语讲得十分流利,后来又学习了藏文,懂得藏语中最棘手的音调变化。所以,当地土著居民很欣赏他那准确的发音。

如果我们人世间失去了一位朋友,那么仇教的西藏在天上就多了一个保护人,在我们悲痛之时,想到这些也是很愉快的。

我们物质上的损失是很大的,据估计达 20 多万法郎。但我们的上帝却很富有,如果人们给我们以自由,那我们就会有许许多多的朋友以上帝的名义给我们施舍。

把我们祈祷和希望结合起来吧!先生们,请允许我怀着非常感激和尊敬的心情讲述这一切!

你的十分谦卑的顺从的仆人

西藏宗座代牧主教丁卧硕(Joseph-Marie Chauveau)

随之而来的粗暴景象和后来猛卡被摧毁的事件激起了基督教的坚定的行动,我们不能不让我们的同事们了解这些坚定的态度。他们在那里将可以为他们自己找到一种进行教化活动的内容,也为西藏的将来找到希望的理由。

在进攻猛卡的两天以前,德格丹先生和毕耶先生已得知了由基督徒的两个最可恨的敌人罗东—策旺和阿都指挥的一些土匪们的行动。藏民们立刻接到了逃往山间峡谷的命令。至于某些中国人,他们中有些人由于认为他们的国籍能使自己免遭所有虐待,所

以就想留在传教士们的身边。

但是阿都不是那种能在某些类似的顾虑面前可以克制的人。他让人把汉人捆绑起来,自己多次殴打他们,然后又让人把他们绑在柱子上。一个藏民独自一人在猛卡;他被痛打一顿后又被两手反剪地吊在房顶上。察木多的路差在夜里给传教士们送了一封信,结果也遭到了同样下场。匪徒们把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以说明按头领的意旨可以杀死他们。晚上所有的汉人被成双成对地绑在一起,交给一大群民团团丁。

第二天,也就是9月30日,当夜幕降临时,所有躲藏在山上的藏族教徒(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被当作俘虏带到了猛卡。在他们中间,有八个六岁以下的儿童,其中有三个婴儿。

为了向人民证明西藏不能有基督教,某些喇嘛发出了驱逐基督教徒摧毁基督教设施的通告。为此目的,他们要察绒的所有村庄每户出一人,普赖、求松、比通,甚至离猛卡有10天路程之远的江达也要派代表参加他们马上召集的一个有上千藏民参加的大会。

两位传教士和他们的新教徒都被带到察雅让他们听取决定他们命运的判决。仇教者们装出合法的样子,一直使他们的仇恨大爆发。因为那时在拉萨还没有王爷。另外,达赖喇嘛还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实际上是三大寺院管理着一切事务,所以甘丹、色拉和哲蚌三大喇嘛是寺院的代表,也就是拉萨的三位大喇嘛官员就到察雅来了。这些喇嘛法主也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反对基督教徒的行动。一位被称为仁钦孜的文职官员充当他们的副官。

毕耶先生在1865年11月21日的书简中继续说,10月7日星期六,我们和37名基督教徒在武装喇嘛押送下离开了猛卡。出发前,我们的新教徒和我们面对当地民众与喇嘛仇教者一起用中文和藏文唱起了《圣母马利亚》的歌。尽管他们被俘,但他们都想表

明自己在思想上和心灵中都与基督教徒息息相通。

出发时,有人告诉我们说,他们见到我们的设施都着火了。我们刚一出门,就看见 10 多个人手里举着火把,顿时教堂、传教士的住院、基督教徒的房子等都被火烧毁了。一些喇嘛放着枪,发出刺耳的尖叫声以宣布佛教战胜基督教的全面胜利。他们说,这是拉萨当局战胜法国的全面胜利,人们认为法国已被打败,因为猛卡已化为灰烬,我们也被赶出西藏了。

10月9日,我们抵达察雅。房顶阁楼的一间破房子就是我们的住处,而我们的基督教徒则挤在一个平台上。

就在这同一天,我们还必须到一个寺庙去接受由四个官员组成的委员会的审理。当我们进去时,他们早已经各就各位地坐好了。

谈论的问题归结为四个:

一、人们可以在西藏布讲宗教吗?

二、猛卡是否永久租借给法国传教士了?

三、你们是否可以把那些农奴出身的西藏人从我们手中夺走^①?

四、可以不赔偿我们购买的土地、开垦地和传教区 10 年来所建造的房屋而把我们赶走吗?

对我们肆无忌惮的审问使我们不能把最后一个问题提到桌面上来。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声称由法国和英国签订的《北京条约》是中华帝国早已承认的,这项条约早已在拉萨张贴出来了。根据条约规定,全体藏民都有信仰基督教的权力。我们补充道:

^① 在西藏,农奴是一钱不值的,人们可以把他们当作牲口看待。

“我们有成都府^①鞑鞞将领的证书,它给了我们在全西藏布讲宗教、购买土地及房屋和建造教堂的权力。我们还有皇帝亲自签署的另一份证书,这份黄色的证书上还有皇家的龙饰,它也承认我们有上述同样的权力。”

“达赖喇嘛对此提出反对,”仁钦孜的人回答说,“这已足够了,条约已张贴在拉萨,但没有什么关系。你们还是无权做基督教讲道。你们甚至无权居住在西藏。如果你们拥护达赖喇嘛的宗教,那么你们就可以住在王国。”

接着开始了第二个问题。

“有一份官方文件同意把猛卡山谷永久出卖给我们。”

“我们不知道你们所说的事情。”

于是,我们出示了我们的财产证书。

达赖喇嘛是主人,土地、房屋等一切都属他所有。

第三个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官员们说:“我们不希望西藏有一丝一毫的基督教的踪迹。你们手中掌握的所有西藏人将要被夺走。如果他们放弃信仰你们的基督教,那么他们以后仍旧是奴隶;反之,我们将把他们投入江中。”

“我们永远不会出卖他们。如果你们把他们夺走了,这将是继我们的财产被抢劫和被烧毁后的又一次抢劫。”

“你们赶快把他们放出来。”

“我们决不放出来!我们将用自己的生命祈求得到他们。”

顷刻之后,官员们派遣他们的仆人抓来了一些西藏人,把他们关在牲口棚里。八个汉族中有三个男人、一个妇女和四个九岁以下

① 四川省的省会。

的儿童，他们都被监禁起来了。

这些人又突然奇怪地返回他们家。他们很鲁莽，又不能克制自己，也感到内疚和害怕，因此官员们想办法要从一些传教士那里得到了这最后一次谋杀的认可。

官员们对传教士们说：“你们同意交出西藏人吗？否则我们就把他们投入江中。”

“什么！你们打了一些基督教徒，让他们带上镣铐。你们抢走了我们的财产，烧毁了我们的房屋，你们刚把我们的一些藏胞和八位汉族人关进监牢……我们法国传教士对这些暴力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你们还不满足！你们竟敢还要我们同意所有这些极不公正的事情！我们是决不会同意的。”

“只要你们拒绝这种要求，我们就把你们扣留在察雅。”

“你们有权有势又有武装，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将永远不同意你们所要求的一切。”

“我们将把所有的汉人都关进监牢。”

“你们随便好了。”

“我们将把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投入江中，把另一些人押往拉萨。我们将把所有的西藏人投入江中。然后，我们将可以见到根据你们的意见决定所必须的事情。”

“这是继你们已经做出的一些不公正的事情之后又将犯下的罪行。我们将坚持我们坚定的立场。”

他们一边商议对于其俘虏所采取的行动，一边又在忙于准备铲除基督教在猛卡留下的最后遗迹。他们不止是抢劫放火，而且还要把因圣体的上帝降临而变得神圣的土地正式还给恶魔。突厥斯坦的一个老喇嘛和 12 个西藏人被派到了猛卡，其目的是要在那里修建一些寺庙，竖起一些名叫“山顶嘛呢堆”的具有迷信的石头堆。

听到这一消息，传教士们可能为已经见到的避免使火灾烧毁其教堂的可怕褻渎之危险而感到安慰。

最后，他们做出了反对传教士的判决，下面是他们正式通知传教士的一段话的措词：

“至今我们还没有能够统一看法，”仁钦孜的人说，“我们的命令已下达。后天，我们将把所有信仰基督教徒的藏族人和我们将指定的一些汉族基督教徒投入江中。”

“这一切罪过都与他们无关，他们都没犯罪。”德格丹先生回答说。

“他们是基督教徒，难道不该死吗？”

“他们中间有一些妇女、婴孩，还有一些不懂事的儿童。你们把他们投入江中不是太狠心、太残酷了吗？”

“你们不要心慌，把他投入江中是我们的事。”

“你们杀害这些无辜的儿童、妇女、男人，你们犯了大罪。”

“如果是大罪，我们自己承担，我们不害怕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

新教徒们获悉早已对他们作出判决时，便大声喊叫着：

“我们很高兴。”

“后天，你们就将被扔进山脚下的这条大江中^①。”

“我们是基督教徒。为了向喇嘛和大众证明这一点，我们将读着我们的祈祷文向江边走去。”

下午，传教士们把他们召集起来，向他们述说等待他们的幸福，向他们保证说天堂的大门对他们敞开着。他们平静地听着，而且通过最后一次忏悔和为上帝而祝圣。

① 潞子江，它把暹罗王国和缅甸分离开，然后流入马达班(Martaban)湾。

10月14日到了。第二天,指定为殉教日的前夕,基督教徒们不再只是屈从者,他们都很高兴。异教徒们对妇女极力加以恫吓,向她们说已经准备好了装她们和婴孩的皮包。装好后要把她们投到江里去。但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她们对此根本不害怕。

“晚上,”毕耶先生叙述说,“一位名叫丹珠(Tundjroup)的传道士来向我们问好,并要我们为她洗礼。他是西藏的一个牧民。从前当他生病时,他去竹卡拉附近向白雪神(Kaoua-Kerbo)顶礼,人们把他当作农奴。他后来于猛卡受皈依,我们使他获得了被阿贝诺纳(Abénonas)夺去的自由。”

我们问他是否害怕。他微笑着回答我们说:

“我不害怕!”(Matchra!)

“但明天早上有人将要把你扔到江里去。”

“当我的躯体沉入江底时,我的灵魂就将升天了。”

我们审查了他对宗教的了解情况,他对宗教知识很熟悉。接着,我用尼古拉(Nicolas)的名字为他进行了洗礼。

继他之后,又来了两位望教者;他们是一对夫妻,德格丹先生用丹特雷亚(d'Andréa)和达噶塔(d'Agatha)的名字分别为他们俩进行了洗礼。

10月16日,星期一早上九点,我看见藏族妇女抱着她的九个月的小玛提亚(Mathias),后面跟着她的另外两个小孩:三岁的巴特洛(Bartholo)和六岁的路易(Louis)登上了阿贡的房顶。其后,策日涅察(Tsérignetsa)背着他的两个孩子即两岁的马提纳(Martina)和我在猛卡行过洗礼的三个月的吕西亚(Lucia)也上来了。然后,撒囊切(Sananchié)与她的一个两岁的孩子小拉法埃尔(Raphaël)和其他一些西藏人都登上了房顶。

敌人刚刚下令把我们捆绑起来投到江里去。他们声称我们即

将投向神父的怀抱。

我们把他们召集到我们附近，并跪下来一齐背诵《天主经》、《圣子经》和《圣母经》。经过一番短暂的鼓励后，我们向他们重新提出了赦罪的宽恕。在德格丹先生继续鼓励他们时，我从他们每人身上剪下一绺头发和一块衣服布头，用来作为殉教者珍贵的纪念品。

汉族人很快也被绑起来带进牢房，接着就轮到那些西藏人了。男人、女人都戴着镣铐，小孩都和他们的母亲捆绑在一起。

我们的最后一项要求是陪送我们的基督徒到江边。我们得到的答复是：“所有的西藏人乃至小孩都将被淹死。我们每天投一个人到江里，其他的人都将是死刑执行的目击者。你们法国人，宗教的主人将可以目睹着一批基督教徒被淹死。”

讲完这些话之后，人们开始上路了。热振寺人（拉萨的文职官员的代理人）指定了当天的牺牲者，正是一名潞子江的人，在我们被捕的前夕给我们带来了吕项先生和我兄弟的书简。他被押送到悬崖边投到江里去了。此后，刽子手们又向他投去一些石块。他被处死的原因不是由于他是一名基督徒，而是由于他给我们带来了书简，虽然那时他还不是基督徒。

不论是热振寺人辛辣的嘲讽，还是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场面都没有动摇新教徒的坚定性。我们一起登上了山顶。后来，我们十分疲惫和极其悲痛地回到村庄。这种惨景从早上九点一直持续到下午三点。

同一天晚上，德格丹先生向四个官员写了如下几行字：“你们从我们这里劫走了所有的西藏人，并且把我们的一些汉族人关进了牢房。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永远需要他们。由于我们的缘故，有一个人被你们投到江里去了，你们必须承担这一罪责。如果你们再杀死我们的一个基督徒，那么你们将又犯下新的罪行。”

读了这一短笺，官员们气愤至极。第二天清早，他们派人叫来了热振寺的人。

他们对他说：“今天早上，你要把两位法国人的财产扔到江里去。尽管这些法国人提出了抗议，但还是必须要把猛卡的所有西藏人乃至婴儿都投到江里去。”

热振寺的那个人磕完头，接着回答说：“你们吩咐我放火烧毁猛卡，我已把它烧了。昨天，你们要我把一个人投进江里去，我也已照办了。今天，你们的命令使我感到很愤慨，我不干了。以后我干我的，你们干你们的，互不干扰。”

西藏人生活中未曾有过的反抗使官员们感到很惊讶，连他们自己也开始怀疑他们刚才为什么发出这道命令，他们打算做出一种妥协。在大众看来这是一种妥协，而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胜利的荣誉。那位热振寺的人、芒康的一个官员和几个喇嘛接受了谈判任务。他们十分希望德格丹和毕耶先生不是那种特别难以对付的人。结果是德格丹和毕耶先生同意给官员和代理人 800 个法郎的款项，使得把原来对西藏人宣判的死刑改判为流刑。传教士们可以重新占有他们的财产，然后和他们的新教徒一起被送往边境。

10月21日星期六，一群有39人的基督徒在德格丹和毕耶先生的率领下，由四个衙役的监视之下离开察雅去中原的边境地带。这是一般公开表明信仰的基督徒所走的一条流放的道路，这一路上尽管没有像从猛卡到察雅那样给他们带来殉教的情景，但仍然摆脱不了欺压和折磨。在冰雪中翻山越岭，长途爬涉是很劳累的，但官员们还任意折磨他们，这使我们更加难以忍受。

10月25日夜晚，毕耶先生写道：小玛提亚升天了，他是由于在监牢中染上了疾病而死的。衙役们开始不允许我们埋葬他，后来由于我们坚决要求才得到了他们的许可。我们希望这个小天使的

圣骨能在我们被赶走的这个地区得到上帝的恩宠,并且能使我们在察雅所受的痛苦不会变成对我们仇教者的处罚!相反却能被用于他们的归化,特别是能有益于使那些拚命反对我们神圣宗教的芒康喇嘛们受归化!”

10月31日星期二,一些俘虏来到巴塘地区的江达,这个地区从属于四川,但在政治上由拉萨管辖。根据惯例,应该使基督徒在那里得到自由,得到避难生活的自由。但实际上他们却仍然继续受欺压。衙役们发誓要禁止人民和一些宗教头领以及他们的信徒建立任何形式的联系、禁止帮他们做事和给他们粮食,甚至禁止和他们谈话。江达地处澜沧江右岸,衙役们早已有收到了强迫传教士过河并且要尽可能地让他们远离西藏的命令。衙役们的行李和粮食都存放在澜沧江左岸,这就使得他们这一群人只得舍弃江达而过河去。

1865年11月21日,我们得到了最新的消息,猛卡的基督教徒既没有房子住,又没有粮食吃,他们只得临时居住在四川柯罗洞附近的一个山谷中。

从丁主教先生的来信中,人们已经了解到在仇教者们接近时,觉那洞的基督教徒一部分跟着毕耶先生,另一部分跟着在抢渡澜沧江时被杀害的吕项先生逃走了。

这次谋杀之后,营勇们从原路返回村庄进行抢劫。这次行动的首领是拉萨的一个喇嘛,他是西藏当局的代表,大喇嘛的一个普通仆人。他不是以一个普通仆人的名义而是以他的主人的名义而行动的。实际上是西藏权力机构在外省土地上进攻和追击法国传教士,因为觉那洞属中国云南省所管辖。

毕耶先生和他的50个基督徒首先逃到察木多。他们在那里得到了总督的保护,使他们摆脱了新的追捕。喇嘛早已让人杀害了吕

项先生,抢劫了觉那洞。他还给察木多总督一个箭囊,内有一支箭、一些绳子和木料,此外还有这样一道命令:“把藏在你家的宗教师和他的所有基督教徒放出来。”如果拒绝放出他们,这个箭囊就意味着宣战:木头意味着这里的房屋要被烧毁,绳子意味着居民们要被捕,箭矢意味着他们要被杀害。

官员回答说:“在觉那洞,于我的土地上,有两位法国人,他们是宗教之师。他们有一个被你们杀害了,另一个在这里,我是不会把他交出来的。”他的这一答复传到了阿都那里时,他已在猛卡搭好了帐篷。进攻中原领土可能带来的一连串的担忧使得阿都不敢走得太远。

我们从最新的一些消息中得知,毕耶先生打算在离察木多有15天路程之远的云南黄家坪创建基督教的会口。

至于江卡的机构,它们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一些基督教堂和费芍先生现还在巴塘。

这些就是给所有在西藏的基督教站口带来毁灭的事件。但是打击着这个传教区的许多巨大的考验不应该使我们失望,教会正是在仇教和殉教的斗争中才能扩大耶稣基督的领域。

毕耶先生写道:一切都被摧毁了,但是我的心灵中仍充满着希望。如果宗教的大师已受到仇视,那么信徒们忍受苦难而背十字架就用不着吃惊了。反之,如果宗教大师在天下取胜了,信徒们也将获得胜利,唯有时机还不肯定。我们还必须付出努力,受苦受难,这是西藏传教士目前的任务。上帝给了我们极大的勇气,它使我们敌人长期的工作遭到破坏,同时它又给我们派来了丁主教作为我们的大师。安慰伴随着苦难,希望伴随着失败。鼓足勇气耐心坚持,总有一天西藏将会胜利!我们被从一座门赶走,但我们一定能从另

一座门进去,或者从印度斯坦,或者从缅甸,还可以从云南、从四川进入西藏。耐心,奋斗,甚至高兴!这就是传教士的箴言。

中国川东宗座代牧区的综合报道^①

由于仇教者对宗教信仰的仇恨,玛弼乐^② (Mabileau)先生被处死了。当我们宣布了他的这一悲惨结局时还不了解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既不了解基督教徒在酉阳县惨遭仇视的情况,也不了解范若瑟^③ (Dèsfleches)代理宗座代牧大人殉教的情况。在四川的一名教廷传教士童文献(Perny)先生给外方传教会神学院的先生们寄来的记述使我们今天才能满足我们同事们的那些合情合理的虔诚希望。

在四川的教廷传教士童文献先生致外方传教会神学院先生们的书简

1866年1月16日于上海(中国)

……两年前,范若瑟先生的宗座代牧区最东部的一个县里没有一个对真上帝的崇拜者,出生在这个县的几名非基督徒在受归化后回来了,他们劝说其朋友和亲属信奉耶稣基督。这种努力获得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38卷,1866年。——译者。

② 《传信年鉴》第38卷(1865年),第153—154页。玛弼乐先生出生在潘伯夫(南特教区),于1858年赴四川。

③ 范若瑟: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1838年来华,1856年为罗马教皇第一任驻川东代表。他并未“殉教”,而是于1878年回到欧洲。——译者。

了成功,不久就成立了一个新教徒中心,并且委托一位中国司铎照料他们。由于宗教运动不断发展,甚至扩大到了邻近农村地区,所以人们认为完全有必要派遣另外一些神父和当地土著传道士去那里。几个很富有和很有影响的非基督徒开始时很惊奇,然后又很焦虑地注意着新宗教的发展。

一年以后,这个县已有1万到1.1万名从教人了。司铎们和传道士们为这些初步的成绩感到高兴,他们以条约的文书为依据,和一位可能过分自信的虔诚之士一道继续他们的征服工作,而没有谨慎对待当地的一部分非基督教徒和官场的某些人。当时宗座代牧主教阁下一直留在四川省府。为了防止冒失行事,他认为应该让一位欧洲传教士去领导这些司铎和当地土著的传道士。华爱仁(Eyraud)先生被指定担任这一工作。他一到酉阳(县城),就认为一个旨在阻止宗教发展的人数众多的强大派别早已形成了。这一派别主要是由那些已争取使官吏完全支持其事业的文人所组成。一位欧洲人在城市里的出现只能加速他们计划的实施。

当被罢黜和由于在贵州传教区中的表现而几次受到被宣判死刑威胁的田提督从他的家乡回来经过酉阳时,向这些刚刚成长起来的新教徒猛袭过来的一场暴风雨早已酝酿成了。尽管他已失宠,但他那行伍之士的名声竟这么大,以致于在他一路经过的地方到处都得到最热烈的欢迎。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这样一个失去了他的全部显职,并且认为由于一些欧洲人和基督徒对他的指控而使他的生命受到威胁的人对基督教该多么仇恨。他向酉阳的文人们讲述了他的不幸,并且极力劝说他们尽快结束和他们共同的敌人之间的往来。当时正是中国春节前的除夕,春节过后暴风雨降临了。

午夜,地处离酉阳几法里远的一个基督徒的小村庄突然被

一伙抢劫和放火烧毁房屋的崇拜偶像的人侵占了,新教徒几乎没能逃走。在全县各个地方,每天晚上都有这种有组织的破坏活动,时间持续了一个月。华爱仁先生不知道应该躲藏到什么地方去,于是便只好决定藏身于一个异教徒之家。尽管气候恶劣,已经被捕的三位中国司铎和几位传道士仍然被带到酉阳城一个几乎完全荒芜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度过了几个星期,各种虐待使他们疲惫不堪。

他们妄想抓捕的是华爱仁先生,而且也很容易地发现了华爱仁隐蔽的地方。他们勒令房东把欧洲人交出来。一个地道的异教徒竟然冒着眼看他的房子被放火烧毁和生命受到损害的危险,坚决拒绝他们的要求。他的妻子为维护热情待客之权力也同样表现得很勇敢。面对这种坚决的拒绝,敌人们只得到其家中抓住他并把他杀死于其家里。在这种可怕景象发生时,房东女主人帮助华爱仁先生逃走了,同时她自己也逃脱了。顷刻之间,这个普通的妇女从远处见到她的房屋变成了一片火海。她躲藏了几天,然后又女扮男装和新教徒一起动身去四川省府以要求得到正当的权力。华爱仁先生被从一个隐蔽处追捕到另一个隐蔽处,最后他隐藏在一个低级军官家里,这位小官员很懂得对基督教徒的安排。华爱仁先生在这个避难所里度过了四个月。

听了这些灾难的消息后,范若瑟先生急忙向省总督提出控告。犹豫了很久以后,总督才决定罢黜酉阳的官员,并答应派一个能承认基督教徒正当权力的继任者去酉阳。被罢黜的官员发誓要进行一次重大的报复。为了更好地达到其目的,他在酉阳城建起了一座与中国习惯相反的住宅。

当他们得知新县官正在赴任途中的消息后,宗教的主要敌人和丧失了权力的官员一道向新官员派去了一个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名义是护送他的卫队,实际上是用厚礼收买为他们办事的人。这

位官员经过了范若瑟大人居住的重庆府。这位高级教士拜会了他，并且极力说服他相信被野蛮追捕的新教徒是无辜的。该官员含糊其词地答应要制止打教。接着，那名高级教士向官员介绍了他的代理宗座代牧玛弼乐先生，同时说明派玛弼乐去这个县的目的是要他和官员一道补救仇教所造成的损失。他们得到的回答是在新的政府部门的领导下，玛弼乐用不着有任何担心和害怕。有了这句诺言的担保，我的同事做好了准备后，就踏上了去县城的征途。官员到达不多久，他也就到了。

他来的不是时候，当时正是童生会试之机。城市的所有旅店和私人住宅都住满了文人。玛弼乐先生找不到合适的住处，只得住在城市里一个偏僻的寺庙里。

他刚开始和这位新官员进行商谈时，便发现他曾与这个不正直的人和宗教的死敌打过交道。果然，这位官员一开始就声明说他过去是一个外地人，对他前任的一些行为当然不会负任何责任，他仅仅负责那些在他管理时期所发生的事情等等。他曾经同意发表一些与宗教自由有关的条约之条款；但是他一上任就职就拒绝履行他的诺言了。

一个月过去了，代理宗座代牧主教还没有得到他们一丝一毫的让步。成千的新入教者都被流放，他们的房屋都被烧毁，他们的家庭都四处流浪，妻离子散。受迫害、被破坏、被流放，漂泊到异省他乡的多达 1200 余户。其中几户在不久以前还很富有，后来则沦落为乞丐了。那些没有能出逃的妇女、老人在加入望教者的行列之前，每天都被迫去向宗教的敌人乞讨，他们为了宗教信仰而受尽了折磨。在这些不幸的苦难日子里，传教士感到最为难的一件事就是一些新受归化的人还寄希望于他的声誉。在他们看来，一位欧洲神父可以获得一切，只要去拜访一下官员就可以解决一切。当然，这

是很有希望的,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神父,而是一位主教。范若瑟主教大人经常接见这些漂泊四方的成群结队的新教徒,所以他因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而感到伤心。他经常和主教城的首席官员进行会谈。官员一方面答应了许多事情,另一方面他提出了许多希望,这就是谈判的大致结果。

但是,聚集在酉阳的一些童生并没有停止活动;他们高度赞扬仇教者们的行动,并和这些人勾结在一起,同时还声明他们不允许任何一个欧洲人居住在他们的省内。他们得知,华爱仁先生在被俘四个月以后,最近已被押送到了重庆府,而另一位欧洲人已来替换他了。这些童生们好像要去看一件珍品一样,每天都成群结队地来到玛弼乐先生的教堂观看。从他们向玛弼乐先生所提的问题中,其敌对思想已暴露得一清二楚了。为了减少他们对基督教和欧洲人的偏见,玛弼乐先生以最有礼貌最客气的方式接见他们,对他们的纠缠不休作出了最大的忍耐。但他认为,他向这些接踵而来的游人所作出的努力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们思想上的敌对情绪随同一种令人不安的征兆而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重庆府的首席官员下达了许多有利于新教徒的条例条令,力劝酉阳的知州给新教徒们以正当的权力。但在中国,这些条例、条令却经常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因为一些秘密的命令可以抵销这些条例、条令的一切影响。在他上级的命令没公开之前,酉阳的官员不再掩盖他与基督教的敌人互相串通的阴谋了。他甚至中断了与玛弼乐先生的联系。

8月中旬前后,玛弼乐先生已经明白,他的处境变得很危险了。他模糊地预感到暴风雨即将来临,并且想方设法地摆脱它。原先,他打算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告知于范若瑟主教大人,以便能得到他的指示。但是从酉阳到重庆需要14—15天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阴谋分子已作好了最后的部署。从8月20日开始,参观玛弼

乐教堂的游人不再是装作参观普通珍品的样子了。他们在那里高声说话,声明强烈反对新宗教,反对把新宗教传入酉阳县的种种企图。

面对这些如此公开的敌对行为,玛弼乐先生应该怎么办呢?逃走还是藏起来?然而,不幸得很,哪种办法也行不通,哪里能有藏身的地方呢?城里仅剩下一家基督教徒。新教徒们的住宅早已被烧毁,他们自己也都在逃亡之中。前一年奉宗座代牧主教之教谕,为召集和接见传教士而买下的一幢房子也被烧毁了。那么逃跑可以吗?为了保证他个人的前途,这也许是他愿意的事情。但谨慎小心使他选择了避开这次危险的决定。他把这些不信上帝者发怒生气的事告知于酉阳的知县,并且要他采取适当的措施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未得到任何答复。

二

8月26日夜晚,纠集在一起的一队营勇来敲教堂的门。玛弼乐先生拒绝开门,并且极力向这伙不幸的人说明他们的举动是不合适的。经过较长时间的讨论,他们终于撤退了。27和28日晚又发生了与前次完全一样的事情。为了把这些事告知于范若瑟主教阁下,玛弼乐先生向重庆府派去了三个报信人。

8月29日晚上9点至10点钟,人数比上次更多的同一伙人又来了。恶魔是害怕阳光的,他选择了黑夜以实施他们的阴谋计划。当时玛弼乐先生刚刚上床休息,像前几晚那样,他又急忙起来,向这些不怀好意的来者发表讲话。但这一次却不同了,他们什么也不想听,而是想进屋。听到这群人乱哄哄的喊叫声,玛弼乐先生认识到了局势的严重性。他立刻要他的两名传道员从暗窗逃跑,去衙门求救。此时,闹事者破门而入,占领了教堂。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呢？只有上帝知道。凶手们在玛弼乐先生身上出完气之后，又把他拖到位于城市下游的河里去了，这是确实无疑的。这种如此嘈杂纷乱的暴力使未与我们的敌人混在一起的异教徒们为自己感到忧心忡忡。和往常一样，这些可悲情景的真正操纵者并不直接参与这种行动，而是让他们所豢养的一些人充当肇事者。

这些无耻之徒把被他们已经折磨得快死的俘虏玛弼乐投到江里。但是在这位传教士几次沉入水中以后，他们惊奇地看到他还在呼吸，于是便想象着江中还有一个神奇的人，只得带着受害者离开了河岸，然后又把他放到城内的一条街上。这时玛弼乐先生大叫了一声，刽子手们都惊呆了，他们急忙抬起一块石头压在他的头上就散开了。我们从异教徒们那里得知了这些特殊的消息，但是由于他们不懂得欧洲的语言，所以不能向我们说明玛弼乐先生临终前的叫喊声的含意。玛弼乐先生的衣服都被脱光了，胡须也全被剃光。正是在漆黑的夜间和待伐林木的偏僻处，殉教者的灵魂脱离了他残废的尸体。总有一天，他尸体的伤口将会变成享天福者的五伤。

玛弼乐先生的一位传道员把发生的事情告知了官员，但官员拒绝从衙门出去。他说，因为他对民众的这种暴动无能为力，况且他又没有指挥军队的权力。传道员打算立刻去接应玛弼乐先生，但官员却把他拘禁起来了。此时此刻，官员公开暴露出了他已和暴动操纵者们阴谋串通的真面貌。至于另一种断言，那也是错误的：因为事实上是在那里有一位能够调动军队的军事官员，他可以根据需要而采取行动。原来他就是那位曾让华爱仁先生在他家避难四个月之久的军官。但遗憾的是他对于这件事知道得太晚了！从玛弼乐先生被捕开始，他就已经是一支军队的将领了。但是对传教士的罪行已既成事实，聚集在一起的人群也已散开。然而，他还是抓

了几个罪犯交给了文职官员。这位文职官员一直到黎明时才和他的一支普通卫队走出衙门,根据中国法律来察看尸体,并且叫人把尸体陈殓在一个棚子里。他在该案件的审讯口供中将表明承认 22 处伤口中每处都是致命的。从法律的观点看,这件事表明刽子手们对这名公开表明信仰的基督教徒采取了何等过分的行动,也表明了这位基督徒在令人难忍的长期垂危中所遭受的一切痛苦。

我们全体基督教徒都很尊敬和热爱玛弼乐先生,所以他不幸遇难的消息使我们都感到十分悲痛,大家都向他表示哀悼。我们希望他的鲜血将使酉阳县的土地更加肥沃。玛弼乐先生在那里献出了他的年轻的生命,他光荣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教团把这一天定为这位圣先驱者被斩首的纪念日。

根据中国的一些习惯,在向酉阳县文职官员起诉结束以及在条约生效之前,范若瑟主教阁下不能要求得到他的代理宗座代牧的遗体。另一方面,怎么能使令人尊敬的代牧之遗体长期得不到埋葬呢?官员本人预料他将是被指控的对象,这一点他是清楚的。为了减轻被告的罪责,他打算举行葬礼并负责支付安葬费。他让人把尸体洗净,然后给他穿上七件丝织教袍,在伤得很严重的头上戴上礼帽,最后把这具珍贵的尸体陈殓在一口价值昂贵的棺木里。选择一个什么地方埋葬他呢?最后还是选择了该传教士曾经居住过的那座教堂。大概是秘密的天意安排了这一出乎意料的选择。安放在教堂中央的棺木周围有一个小陵墓。然后官员急忙向范若瑟阁下写了一封很长而又十分简洁明了的书简,把他刚刚为悼念玛弼乐先生而举行的葬礼告知了这位大人。很清楚,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赢得这位高级教士的宽容。

尽管如此,仇教仍没停止。近一年来,1100 至 1200 户新教徒仍流浪在教区内。基督教的敌人已发誓要把基督教徒一个不剩地

歼灭干净。他们说,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将可以为此而破费他们的全部财产。不久以前,几个躲藏在山上的新教徒被他们抓住了,他们就采用了闻所未闻的残暴行为把这些人活剥处死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将来的命运怎样呢?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们准备做上帝乐意要我们做的一切,我们准备忍受上帝乐意要我们忍受的一切。

……我荣幸地向十分尊敬的院长先生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你的卑谦顺从的仆人四川教廷传教士童文献

中国北直隶省的综合报道^①

一些匪徒已把与北直隶东部相邻的几个省洗劫一空,直隶东北部又一次遭到了匪徒们的蹂躏。耶稣会纪隆(Aime Guillon)修士来简向我们叙述了这个创建还不到12年的传教区所遭受的令人忧伤的考验之详细情况。

耶稣会纪隆修士致布卢瓦大神学院的修道院长的书简

1868年3月13日于天津

……我在前几封信中已不止一次地谈到我们应该在我们居住的村子里修筑防御工事以提防匪徒们来破坏。抢劫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我们必须加强防御措施,基督教徒们已能成功地铸造一般的大炮。这些准备工作足以把一年以来在我们周围制造恐怖事件、进行劫掠的700—800名骑马的强盗赶到远离我们的地方。但在1月中旬前后,有近25000名“长毛”起义军(太平军)越过黄河,向北直隶扑了过来,他们一路上杀人放火,抢劫行凶。他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40卷,1868年。——译者。

们已习惯于战争的艰辛，所以民众一听到他们的名字就感到恐惧害怕，这种恐惧使我们很快就明白了我们要顶住他们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人在“长毛”们接近时都可能被吓倒，而我们只得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抵抗。如果需要，那么我们就决定放弃一切抵抗，并向他们做出让步。

这些起义军不只是以抢劫为业，而且还形成了一个政治派别，其目的是要驱除鞑虏王朝，以便把一个汉族人再次扶上皇帝的御座。鉴于我们是受法国保护的外国人，所以我们希望他们在进攻我们时会顾及到招致欧洲国家的报复之后果，担心由此而使他们的事业受到影响。但当我们的基督徒听说了我们打算不进行自卫的意图后，便纷纷从四面八方派出代表来劝我们要进行抵抗。他们向我们许诺给予相当含糊的援助，但我们并不认为这些劝告和救援是十分严肃认真的，因此在10万之众的皇家王师不敢和他们打仗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决定与这些长毛人为敌，因为我们面对着一个无能力的国家当局，要保护其居民，要保护自己的形势。平时，由于法国军队在北京享有威望，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表面上的而不是实际的好战示威演习来保护我们自己。但现在形势则不一样了，一般的示威演习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此外，我们认为，既然我们已经希望与敌人和解，那么即使在遭受最大损失之危险的情况下，那也最符合我们传教士的特征，最符合放弃武器和把我们交给上帝安排的性格。然而要注意谨慎小心，这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

当我们在商议时，“长毛军”已开始行动了。他们肆无忌惮地跑遍了白河以西的地区。白河为南北流向，它把这个省平分为两半，它流经献县附近，流向天津，把我们隔在河右岸。有几次，骑兵部队曾来到离我们只有三一四法里的地方。那时到处充满了恐怖气氛，平原上到处是离家出走的人，他们带着能抢救出来的几件行李，妻

子小孩紧跟在后，四处流浪，无处藏身，都找不到任何自认为是安全的地方。皇家军队的一些新军借口要追击敌人而每天来来往往，但他们却十分留心地在离敌人相当距离的地方。这些军队不但不能使居民们放心，相反他们却几乎像强盗一样进行抢劫破坏。从而使得居民们惊慌失措，不得安宁，悲惨的局势日趋恶化。

这就是我们自一个月以来从我们斜坡的高处作为无动于衷的证人而看到的情景，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而已。这种表面的平静却使某些中国人很吃惊，他们认为我们什么都不怕。因此，我们很快就发现有一些基督徒，甚至是某些非基督徒都向我们这里逃跑过来了。我们的村子里挤满了难民，特别是小孩和妇女，因为他们格外害怕落入那帮卑鄙下流的乌合之众的手中。我们一些最明智的基督徒从前对于我们的一些事情很不放心，但当他们听到敌人朝我们这个方向进发的消息时，便于2月23日这一天主教封斋前的第一个星期日恳求我们进行抵抗并接受他们的救助。他们这一次忠诚申明，同时还随附有一份长长的要求来防守阵地的志愿者名单。危险的紧迫性与这些请求消除了我们犹豫不决的想法。在等待胡博理(Leboucq)神父到来期间，我负责加紧准备工作，信使们到各地去向基督徒乃至我所认识的一些非基督徒求援。24小时后，我们就要投入抗击“长毛军”的战斗了。然而，敌人在星期一就已靠近我们。胡博理神父让信使告诉我们说，他已骑马赶一段夜路以便来和我们会合，一路上他还唤醒了即将参战的基督徒。

九点的钟声响了。我们进入防御工事，密切注视着敌人的运动。许多骑兵在平原上奔驰，到处一片混乱，难民也乱成一团。难道这些骑兵是一伙强盗吗？他们向装载着难民的车子涌去，虽不殴打任何人，但却抢走了马匹和骡子。他们正是“长毛军”的先遣队。他们的骑兵抢占了张家桥，然后再从桥上过河。我们的两个驿夫步

行赶回来了,因为他们的马被抢走了。基督徒们跑了过来,但他们向西、向北和南方逃走的道路已被截断,只剩下唯一一条可以通行的路,一些武装以长矛和火枪的步兵迅速向我们开了过来。他们都是基督徒,约300人左右。他们离我们不到一公里远了。与此同时,相同数量的骑兵走在“长毛军”的红旗前,从邻近一个村子里冲了出来。我们的基督徒停了下来,重新排开他们的战斗阵势,挥动着旗子、准备迎战他们等待的敌人。“长毛军”被这种情况惊呆了,他们也停了下来,准备战斗。当他们看到反对他们的增援部队从我们的村子出来时就掉转头撤退了。

11点时分,旷野中又恢复了平静,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抢劫者全都返回到张家桥的桥上。一个新的计谋很快开始了。各自有20—30个骑兵的匪帮达上百个之多,每个匪帮分别以白旗、红旗、黑旗和一把小号作为信号,他们游行达一个多小时之久,每个匪帮之间的间隔为三至四个步枪射程。这些匪帮中有一半向北行进,其余的向南进发,他们都是为了去接应东部战线而组成一个可以包围200—300个村庄、献县城和我们的居住地的大包围圈。游行之后,一支骑兵队伍迅速向包围圈的中心进发,并向他们从四方包围的献县城猛扑过去。我看见约有200名骑兵出现在城东门,他们强迫卫兵们打开城门。人们向他们中间射出一排炮作为答复,排炮未造成任何损失。他们立刻下马冲向无人防守的壁垒,该城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被他们攻克了。城市里几乎只剩下一些官员了,王师、民团和大部分的居民早已逃之夭夭了。我们获悉,官吏们在敌人进攻的时候自己也企图逃跑。知县即首席官被他们识破并被杀死在城东门。四天前,胡博理神父经过那里时还看见过他的尸体,衣服都被剥光,只盖着一领破草席。第二位官吏的运气最好,但他也满身是伤,多亏化装才有幸逃了出来。他是我们真诚

的朋友之一，这在中国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他对基督徒的信赖胜过他的同伴，因而逃亡到了一个村子里，那里的一家基督徒收留了他并帮他容易地逃跑了。

城市被攻克了，该轮到我們了。敌人忙于去邻近村庄进行破坏抢劫，他们似乎不敢靠近我们。现已1点钟了，被通知来救援我们的基督徒已来不及赶到。我们统计了一下人数，只有近150人。为了安排各岗哨和牢固地阻挡敌人的进攻，我们至少需要800人。抵抗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只能进行谈判和尽快隐蔽我们的防御工事。这时，一支70—80人的骑兵队已来到我们的门口；他们要求“大人”（当地的大人物或地方守将）出来说话。胡博理神父和我走了出来。胡博理神父和一个刚有26岁的年轻人（即他们的头领）说着话。神父告诉他说我们是法国传教士，我们不想打仗，而且受法国保护，对于他们与皇帝及官员们之间的争端持中立态度。

“正是这样，我们才丝毫不反对你们，”年轻的头领回答说，“但我需要马匹，你必须给我一些马。”

“今天早上已经给过你两匹马了。”

“那我不知道。我还需要一匹。”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有一匹特别好的马，我把它给你好了。”

那个人立刻提高声调，转过身来以威胁的口气说：

“我不是要一匹，而是要100匹。”

他们所有的人都声嘶力竭地叫着支持自己的头领，有一部分人甚至下马准备涌进来。

我们被迫退让到最后而继续进行谈判。后来由于不能使该头领做出理想的让步，所以我们邀请他本人进村来。尽管大门敞开着，但他还是不敢进去，他害怕中埋伏。当我要带他进去时，他想让

神父留下来作人质。我们告诉他说，他手下的一些人已经通过斜坡，手持矛枪自由自在地在村子里行走，这样才使他放下心来。到达我们的住所时，我先翻墙进院子去打开紧闭的大门，强盗们趁机立刻涌了进来，抢走了我们和一些逃难基督徒的 20 匹马，接着他们又强迫我们把住房、教室和所有的房门打开。

我于此先不说我们在这五个小时内的悲惨处境。强盗们一看我们没有武装，马上就露出了他们贪财的嘴脸，他们在我们头上挥舞着军刀以强迫我们说出已藏匿的所谓财宝。说实在的，我们此时此刻所担心的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早已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上帝。我们唯一关心的是要想法阻挠他们亵渎宗教，保护我们的基督徒、孤儿院的儿童、神学院的学生，特别是那些已撤退到教堂以便能在上帝的保护下维护自己尊严的 500—600 名妇女和少女。

我当时曾以为，侵略者抢走了马匹、钱财及住院最珍贵的物品后，他们的贪婪之心就可以满足了，但这种幻想很快就破灭了。胡博理神父和我一直追踪着年轻的首领，目的是想使他变得温和一点，同时也争取他控制一下那帮强盗的野性。当我发现这些狂怒的人中有一人从神学院出来，后面跟着三个扛着我们枪枝的可怜的小学生时，我们正给他打开司库神父的钱柜，给他一些钱和钱柜里其它一些值钱的东西。从这三人的神态来看，他们已被俘虏了。我们向他们跑了过去。跪倒在强盗面前，恳求他可怜他们太年幼。但现在——均无济于事了，他对我们的请求回之一笑，并且以威胁作为对我们的回答。多亏了我们从内心恳求的上帝和圣母保佑。当我们只是表面上向抢劫者提出请求时，我们终于使得两、三个遭难者获释。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交换，因为当我们急着救出被他们折磨的一些基督徒时，强盗们已返回神学院抓走了另外两个学生。我们三个亲爱的儿童、尊敬的会长神父的传道员和几个基督徒就这

样被抢走了。

这些强盗抢够了东西后就走了。他们仅 10 多人却抢走了 40 匹马和骡子。这样，他们还剩余 30 匹马。然而，正是我们的神父和修士们补足他们的总额。现在说说对我们的追捕，要想逃避经常出现的死亡的威胁是不可能的。主要的是我们成功地摆脱了困境。

这帮强盗走了以后，他们所获得的战利品又引诱来了另一帮。但他们看到没有什么东西可抢时，就打算把我们带走。庆幸的是夜幕降临了，“长毛军”已接到返回其大营的命令，他们就这样离去了，临走时还说第二天再来。他们年轻的将领已被胡博理神父笼络过来了。毫无疑问，正是由于他的帮助，我们才无一人被抓走。他走时对我们说：“你们对我们太轻信了。今天我们对你们还不错，但明天还会有一帮更凶狠可怕的强盗要来。请你们相信我的忠告，不要留在这里了，否则你们都得送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他是一个能出好主意的人。因此我们决定想办法迅速逃跑。离开住院时，我们看到路上躺着三具浑身是血的尸体。她们是基督教修女，在自卫反抗时被匕首刺伤了，而强盗们以为她们已被刺死就扔在这里了。可以看出她们当时并没有遭到致命伤。

上百个村庄被烧毁的火光照亮了黑夜。我们必须从这场大火的包围圈内突出去，并且还要注意避开路上的岗哨。我们七个都是欧洲人，五个神父和两个修士，后来我们在旷野里又遇上了四个基督徒、几个孤儿和一个基督教修女，他们也加入到了我们的行列。在出发时，我们没找到欧杜安(Audouin)和温斯巴什(Winsbach)修士，我们原以为他们被抓走了，但三天以后，却获悉他们也已逃跑出来了。

我们就这样默默地走着，穿过原野，拖着沉重的步伐踉踉跄跄地行进。路上到处长满了互相交织在一起的野枣树，样子很像我们

欧洲的荆棘，我们的衣服被这些树枝挂得破破烂烂。为了避开被敌人控制的村庄，我们不得不绕路而行，因此尽管我们加速赶路，但仍只赶了很少的一段路程。多亏了我们挚友的引路，我们终于能在接近子夜时抵达一个还未遭“长毛军”光临的村庄，并在几户基督徒之家住下了。这些善良的人早已得到了我们遭难的消息，并且以为我们均遭杀害。此时此刻，他们正准备动身出发。我们的到来给了他们很大的安慰。由于我们有几个人已累得精疲力尽，所以人们为我们准备了一辆四轮畜力车以便把我们送到更远的地方去。在此期间，他们给我们送来了新鲜食物。我们必须赶在天亮之前迅速走出包围我们的火圈。我们朝位于皇家运河边上的一个大镇保定方向赶路了，因为我们想渡过运河，以便把迫教者隔在河水彼岸。早上七、八点钟时，我们抵达目的地。

当打教者来到时，因患支气管炎而卧病在床的博雷拜尔(de Beaurepaire)神父也只得起来逃跑。为了减轻衣服的重量给他带来的劳累，他不得不脱掉他的一部分衣服，因此他又感到一股寒气向他袭来。就这样，支气管炎还没好又患上了胸膜炎。恐怖甚至袭击到了运河对岸，人们都已逃跑。我们没有粮食吃，也没有减轻病人痛苦所必须的任何东西。等了两天之后，我们只得采取最后的办法，即去天津，因为去那里也许还能找到药剂师，使博雷拜尔神父能得到仁慈的修女们的治疗和护理。于是我在尊敬的会长神父和赫鲁雅尔(Hérouard)修士陪同下就出发了，留下杜巴尔(Dubar)主教大人、胡博理神父和傅尔蒙(Fourmont)神父来监视“长毛军”的活动，并且立即返回我们已撤空的住院。从皇家运河到天津间的旅途上也很不顺利。逃跑后的第八天，我们终于抵达目的地，我才得以把病人送进医院，多亏修女们的治疗和护理，病人很快就脱离了危险。

3月16日

我们已获悉到了有关住院的消息。在我们出发的当天晚上，一些强盗就占据了它，并在那里进行了两天的洗劫之后才离去。强盗们本想放火烧毁它，但显然是上帝派去了守护者，因为住院仍屹立在那里，只有两、三间房子的房顶被烧坏。几个被抓走的基督徒也已成功地逃出去了，我们的一个神学院学生已来到我们这里，两个修女被杀害，几个人受重伤。总之，我们失去了两位传道士和两个神学院学生，我们的马匹和骡子都被抢走。住院的家具、教堂、圣器室、药房都被破坏。除了我们能带走的或沿途搜集的一些破烂外，衣服、祭器、祭服、装饰品都没有了。这就是我们的财产所受损失的清单。

3月26日

我已回到我们的住所。打教者走了之后，疯狂的百姓由于受到皇家军队和“长毛军”等强盗们的迫害，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抢走、妻子遭侮辱、房子被烧毁、个人所拥有的一切都遭抢劫后，终于一下子全部挺身而出地向敌人展开了斗争。几天以来，许多被他们突然抓住的强盗或营勇都被残酷地杀害了。基督徒也和他们一样站了起来，但他们只是进行一般的自卫。他们把我们的会口变成了抵抗的中心，已有1200名基督徒带着妻子儿女逃到这里。被召去天津要求法国大使和中国当局给予支持的胡缚理神父在得到武器和弹药后，又首先给我寄来了。几天之后，他将在一位教官的陪同下返回住院，后者是受我们大使的委托来训练一支欧式小兵团的官员。如果我们能成功地组织起这样一种可靠的防御体系，我们周围的大批非基督徒就会投奔于我们，这股似乎要摧毁传教区的风暴将有利于扩大我们的影响，将使我们三、四个月以来在这个教区出现的令人如此快慰的归化活动产生一个新的飞跃。到那时，真正可

以说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

耶稣会士纪隆

尊敬的胡缚理神父来信声称,一些匪徒抢遍了邻近一些省份后,又刚刚抢劫了北直隶东部一带的地方,而另一帮强盗却长期占据着江南,并在那里屠杀和俘虏了这个省几乎半数的居民。他们在追求一种政治目的的同时,主要是忙于抢劫。

这些抢劫集团于 1859 年在河南开始组建。从那时候开始,其人员主要是来源于秘密会社。他们的别名为“老捻子”或“长毛”。人们还给他们取名为“红胡子”,因为他们带着用马尾作的胡子,借以恐吓百姓。

他们的头领是河南人,刚满 30 岁,他让人叫他“阎王”或魔王,他为人极其凶狠毒辣。他接替的是其叔叔的职位,后者以张洛行之名而著称,他叫张洛禹^①(Tcham-lao-iü)。他总是穿着一件鲜红色的、袖子又大又长的长外衣。他自称是明室的后裔,并想得到天朝的王冠。他的坐骑呈黄色,与其祖先皇帝的宝座相似。他有六位大臣,这些人时刻守候在他身旁,寸步不离,他们坐着绿色的轿子外出旅行。

但这位阎王是什么王子?或者是什么皇帝呢?他只是烧杀抢劫。据说,他的母亲陪着他到处作恶,其母比他更残暴。每天晚上,人们要尽可能地给“阎王”带来一个属于名门世家的年轻人,他然后使用军刀砍下这个年轻人的头。大家都说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总要杀一个人,我们也掌握有目击者叙述的证词。更有甚者,在他酣睡时还必须要有着火的亮光。人们把他住房的北、南、东、西四周的房屋都放火烧光,然后在他住宅周围再安排 600 名骑兵来回巡

^① 误,应为张宗禹。——译者。

逻,为他放哨。

不管阎王有怎样的企图,然而可以肯定,政治并不是他所统率的强盗们的主要目的。这伙强盗人数达4—5万之众,他们到处为非作歹,制造恐怖气氛。他们去到哪里,哪里老百姓就闻风而逃。皇家军队的士兵比谁都害怕他们,兵卒们总是小心翼翼,丝毫不敢向他们发起进攻。然而,大部分的“长毛军”只是以一些安装有尖铁头的长竹棍作为武器。一部分人有长矛,少量的人有军刀,枪枝很少。显然,这支起义军的直接目的只是抢劫、杀人或不情愿地征募一些温顺的农村居民。我们特别担心的是眼看着全国都沦落到极悲惨的境地,饥荒将袭击着那些不久前还想留在他们家里的人。匪徒们将会发展到不计其数,并且将可能得到某些武器。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能组织这样一支队伍,那就无法包围和夺取某些大城市。

“长毛军”上身着妇女装饰,头戴红头巾。他们的裤长齐膝盖,以便让大家看到烙铁在他们腿上打下的一些火印。新征募的人一到,头领们就急忙给他们烙下这样的印号,以便不被皇家军队或官员抓去或被杀害,同时还可防止他们逃跑。他们满脸都被蓬乱的长头发覆盖,让人看到他们就感到害怕。

中国两广传教区的综合报道^①

我们已多次指出,在1860年的条约中,有关保证中国的传教士和基督徒宗教自由的规定并不充分。如果这些条约至今不能防止全面仇教行动的重演,那就谈不上阻止由官员们的任性、文人们的仇教或许多偏见所煽动起来的地区性打教行动了,这些条约也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40卷,1868年。——译者。

就毫无效果和作用。

下面的事实就是一个例证。1867年10月，一位法国传教士在广东被捕并已被囚禁达两个星期之久。他的释放完全是由于驻汕头法国领事馆的代理——驻当地的英国领事勇敢和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的结果。这位传教士本人已就此事向明稽埒主教大人写了如下的报告。

外方传教会维塞尔致广东广西宗座监牧明稽埒主教的书
简

1867年10月26日于海阳

先生：

本月21日，我怀着喜悦的心情给你写了一封书简。我想阁下已收到。当时，我只有一张破旧纸片，我的双手被镣铐紧紧地铐了半个月，故而我于此时只能勉强握住笔。今天，我已差不多恢复正常了，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想让你了解我被捕的原因以及随之而发生的一些事件。

此前，我曾高兴地和你多次谈过有关基督教小会口海阳的一些情况。这个地区刚组建有几年的时间，它地处一个让人几乎难以进入的群山峻岭中央。我刚到那里时，该地区仅有40—50名基督徒。感谢上帝的仁慈，我才得以较经常地去那里居住一些时候，那里的基督徒已增加到130人了，这里所有的宗教界人士和修习人员都认为上帝的荣誉高于一切。如果没有忌妒的魔鬼进行竭力的阻挠乃至企图毁灭刚刚诞生的基督教，那我们就不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

揭阳距海阳地区有三法里远的路程。我经常去那里居住，此地有相当数量的基督徒。另外，还住着一户人口很多的大户人家，这

一家的人都很坏，他们发现揭阳这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后，就决定要抢占这个地方，并且打算把此地变成他们的强盗窝。因为官员们从不到这些山区来，并且谁都可以进入山区中去，所以他們要采取行动强占这个地方并不很难。他们打算先把一件坏事嫁祸于基督徒，然后再以此为借口而抢占基督徒们的土地，并把他们赶到远离村庄的地方去。面对这一切，基督徒们毫不畏惧，并且坚决拒绝接受这伙强盗那危害他们安全的企图。

异教徒们妄想轻而易举地完成他们的事业，成为传教士的主宰者，这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所在。然而，他们的意图不久就被我识破了。我曾经多次听到过同样的威胁，又有多少次在我从村子里经过时未发生不好的遭遇。这种种迹象都使我看到了实际存在并即将要发生的危险。

就在这个时候，达尔迪(Tardy)先生来到了揭阳这个村庄。由于我很久时间一直未见过这位教友，所以我打算不放过这次能与他见面的机会，于是我决定从海阳去揭阳接他。按照我们基督徒的习惯，我首先进到小教堂做祈祷，以请求得到圣母的保护。然后，我偕一名仆人以及两个陪同就出发了。

我刚从教堂出来就被异教徒们盯上了。当我抵达他们村子对面之地时，就见到有 50—60 人挥舞着长矛毫不掩饰地向我冲了过来。我的基督徒们催促我赶快逃跑。我加快了脚步，在我和追捕我的那些人中间隔着一条较深的河流。但我很快就感到难以逃脱他们的追捕。于是，我一边把我的同伴们打发走，一边叮嘱他们要注意自己的安全。然后，我照原路返回到异教徒们的面前。

“我在这里。”我对他们说，“既然你们想要抓我，我就跟你们走吧。”

他们其中一人抓住我的长发辫，另一人夺过我手中那包有铁

皮的棍子猛击我的肩部。与此同时，另外两个手持大刀的人也对我进行毒打。他们这种粗暴的行为持续了五分钟。除此之外，他们还对我进行侮辱和威胁。

“应该把他杀了！”一个人说。

“他的皮真厚！”另外几个人说。

“把他的眼睛挖掉。”他们补充说，“这样他就不能逃跑了。”

我就这样在一大群人的叫骂声中来到村子里。

我的仆人也同时被捕，他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几乎不能说话了。他急忙赶来迎接我。

事情稍微平静以后，我对强盗头子熊启(Siong-Kit)说：

“你凭什么派人抓我？”我问他。

“我有话要对揭阳的人说。”他们用讥讽的声调对我说。

“这与我有何相干？我与揭阳又不是一家人。根据国家的法律，你没有权力逮捕我。”

“这在其它国家是可能的，”其中一个参与者回答说，“在这里就不一样了。当学生犯了错误时，先生应该挨打；如果百姓作恶了，就应该责怪官员；基督徒犯罪了，神父就应该受惩罚。”

讲到这里，那个中国人夺走了我的旅行拐杖，并多次对我进行疯狂地毒打。如果按异教徒们所说的那样打下去，即使不打死我，也肯定要把我打成残废。然而，每当他们的拳头打在我的胸脯上时，我都没有发现在我身上留有他们打我的伤痕。难道这是我的错觉，或者他们每次都是打在我的圣牌上？

可是，他们带来了手铐，并紧紧地铐住了我的双手，还在手铐中上了一把大锁。接着，他们把我带到楼上的一间屋子里，里面有准备好了的镣铐。镣铐是用两块木料做成的，每块木料长 1.50 米左右，木块边端有一个洞口。他们把我的脚塞进洞口里，然后把一

根本栓从下向上插进去以把我的脚紧紧绑住。迫害狂们觉得这样还不牢靠，他们抓起我头上的长辫子从木板缝里穿过去，然后再紧紧地系死在木板下面。他们就这样把我绑住，使我几乎不能活动。

夜幕降临了。大人一定能想象到我在黑暗的陋室里所度过的悲惨时间，置身于令人难以忍受的处境中，精神上惶惶不安，思想上忧心忡忡，此时此刻是多么地难熬啊。我的肩膀和胳膊被打得伤痕累累。我试图在木板上稍微伸直些，但是镣铐和手铐却使我连这一点小小的欲望也不能满足。在这种痛苦的处境中，我向我们的圣母和不幸者的庇护者（耶稣）求救。我自言自语道：“但以理（Daniel）已被从狮虎洞里救了出来。毫无疑问我在哪方面都不能与先知相比。但是自从上帝在十字架上把圣母降临于我们之中以后，我们确实在天堂得到了圣母的最大的慈爱和力量。我只能寄希望于圣母，这一点我是清楚的。”说真的，当想到这些时，黑暗的恐怖就好像消失了；我的心里重新出现了平静与和平，即使在这一切都令人感到恐惧的强盗窝里，我也觉得无所畏惧，我得到的只是上帝愿意赐给我的东西。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最大的财富。

临近午夜时分，外面又响起了叫骂声，人群包围了房子。

“这该死的外国人在哪里？大家把他交给我们了，我们将看看他今天是否还像昨天那样失去知觉。”

在我被抓的时刻，他们曾以为我懂得遁它（Tountac）巫术，施用这种魔法可以使被打的人在挨打时只要把注意力集中于某一物体，就可以感到不是打在自己身上，而是正好打在那件物体上。他们每个人都想打我，都想要囚禁我的房门钥匙。我再一次向圣母求救。

看守不让他们进去，一阵争吵和叫骂以后便没有声音了。一些狱卒认为我的牢房不很坚固可靠，他们于是就把我的镣铐打开，把

我带到另一个地方去了。到了那里，他们又给我带上镣铐。安顿好之后，在他们认为我确实不能逃脱了，于是就去我上面的一间屋子里睡觉了。我又困又乏，疲惫不堪，再也支撑不住了，渐渐地熟睡了。当我醒来时，天已大亮。我想跪下去感谢上帝赐给我恢复体力的睡眠，但我那被捆绑的双脚和双手却不允许我这样做。

我被捕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达尔迪先生所在的揭阳。基督徒们立刻拿起了武器。他们全都想来搭救我。

“神父已被捕了，”他们说，“还何必要教堂和找基督徒呢？我们去把神父搭救出来或者与他一道同归于尽！”

他们的决定是勇敢的，但欠谨慎。如果失败了，那我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会被那些疯狂的人随意处置，他们将要我付出极大的代价来抵偿我们旨在反对他们的企图。达尔迪先生对此很明白。所以他劝说基督徒们放下武器，并向他们保证说他将亲自去把情况通知于驻汕头的英国领事及驻此地的法国领事馆的代理人坚佐治(Caine)先生。果然，他启程了。

我的手脚一直带着手铐和脚镣。大家非常清楚，这种处境使我很不舒服。但我很快发现采取谨慎小心的办法就可以适应给我带上的镣铐。这个办法就是专心地学习，学习能减轻我的某些痛苦。然而，手铐的重量是不可能减轻的，他们对我的折磨也是不可能减缓的，尤其使我感到为难的是我得被迫去求助于一些毫不相干的人给我所需要的东西。人们给我一点米饭，有时是几块白薯也都需经过看守之手，正是这些东西才使我免遭饿死。只有通过他们之手，我才能得到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人给我的一些小小帮助。为了这一切，我遭到了多少次的拒绝，又听了多少令我不快的话语啊！

有一天，我渴得要死，我向其中一个似乎容易接近的看守要一杯水喝，结果也被拒绝了。

“啊！”我对他说，“这是我的一串银链，是我被捕后留下来的唯一的物品，你拿走它换杯水给我喝吧。”

这个看守急忙把银链收了起来，但他却没有给我水喝，而是把他的烟斗递给我说：

“神父抽烟吧；我不能给你水，因为水太凉，你喝了会生病。”而我对此还得作出满意的表示。

还有一次，为了使我那被打伤的疲乏的肩膀能得到休息，我要求他们给我一点稻草，但同样也被拒绝了。我得到的全部东西就是一块不知道什么树皮做的根本不能保暖的破布片。夜晚，我的伤口不但没有减轻疼痛，却反而更恶化了。尤其是在我的两只手失去活动能力的情况下，一大群蚊子向我袭来，我没有任何办法摆脱因为它们叮我而带来的痛苦。

我的日日夜夜就是这样度过的。我遭受了冷酷无情的中国人给我这可怜的囚犯所带来的严酷和苦难。

然而，窝主们并没有放弃他们希望从我这个被捕者身上捞到好处的打算。他们提出要我写信劝告我的基督徒们对他们所要求的一切都做出让步。我没有答应他们，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把我们的地方舍弃给敌人，而在打教者面前充当可耻的逃兵。

“不，”我向他们作出了坚定的回答，“我不能这样做，你们有你们自己的东西，至于那些不属于你们的东西，我不能给你们。”

我的这一回答使我遭到了新的侮辱和威胁。如果我的这些狱卒中的一个愿意承担处死我的任务，那么邻村的一个异教徒就奉送给他一头水牛。由于怕影响村庄的名誉，这一举动就推迟了。此外，他们也担心从四面八方集聚起来的基督徒向他们发起进攻，况且异教徒的村庄缺乏钱财也是其原因之一。于是，他们又决定把我卖掉，然后用这笔钱购买武器和弹药。他们找到了一些买主，最终

出现了几个只要求尽快成交的人，因为这些人希望把我转卖以捞取一些好处。最后卖价为 200 个皮埃斯特，相当于 1200 法郎左右。

第二天晚上，我该跟我的新主人走了。一切旅行准备工作早已就绪，一位由 12 个仆从跟随的官员于此时突然来到海阳，他们受驻汕头英国领事馆的委派而来，要求带走被当地居民监禁了几天的—位法国传教士。

20 年来，从未有任何一个政府部门的代表来过此地。因此，这位官员的突然出现使当地的土著人感到十分惊愕。

“喂，怎么搞的？”他们说，“为了一个该死的外国人，我们还要遭受官员们的限制和搜查！”

再说，他们还要支付官员及其随从们的一笔巨额费用，并且还要取消有关决定解决我的问题的第一次交易，同时要付出相当的费用作为赔偿。然而，对于这些异教徒来说，他们占有我就好像得到了无价之宝，如同和某种迷信思想中的神物一样，因此当涉及到给予我自由的问题时，他们立刻结成为一支防卫部队，并且声称他们无论如何是不会同意放走我。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官员及其随从人员只得退出，我的处境也随之变得比以前更为艰难和更不稳定了。

从那以后，他们施展了各种手段，从而使我的监禁条件越来越恶化，食物越来越少，监狱看守也变得越来越苛刻，对我的监禁表示同情的基督徒惨遭毒打，他们和我说话的腔调更加刻薄和更加不怀好意。我听见一个异教徒向他的同伴们说：“为了接待官员，我们花费了如此多的钱，我们一定要报这个仇，我们要叫这个神父尝尝绞刑的滋味。”所谓绞刑也就是把我的手反剪背后，然后用绳子捆住我的手把我吊起来；第二个人建议把我的衣服剥光；第三个人要动用竹圈给我加箍，也就是说用竹圈把我的头缠住，然后用楔子

勒紧竹圈，直勒到血从我的眼睛、鼻孔和耳朵里流出来；第四个人靠近我说：“神父，你可知道某一个地方和某一处悬崖吗？好吧，如果官员再来纠缠我们，我们就把你扔到悬崖下去。”第五个人询问我，如果我对活埋极其反感的话，那么我会喜欢哪一种死法。

从早到晚，我总是听着这类的话语，使我感到很厌倦。阁下也许认为这些只不过是威胁而已。对，可以说是威胁。然而，实际上这些威胁是随时可以发生质变的。如同我们曾经所见到的那样，我们的一名基督徒于三年前就被他的异教徒兄弟活埋而身亡，那些异教徒们当时就曾像对我一样对他进行野蛮粗暴的恫吓。

身处在这些威胁和困惑之中，我依靠的是上帝和令人敬畏的圣母马利亚，异教徒们每用一次新的刑罚，我都感觉到有一种安慰和希望涌进我的胸膛。我甚至还希望能遇上一位同情我的人，能竭力减轻我的痛苦，她就是一位善良的老妇——派人逮捕我的人的嫂嫂。

一个晚上，快要到关押我的地方时，她问我的父母是否还活着。听了我的肯定的答话后，她马上补充道：“你可怜的母亲多么令人同情啊！当她获悉你不幸的消息时将会哭得多么伤心啊！”

说话间，她把其小孙子叫了过去，要他给我送来一些吃的东西。白天，我虽没吃任何东西，但那天晚上我至少没有感到饥饿。稍晚，我听见她问其弟妹道：“为什么要抓这位神父？如果我们妇人有点权力的话，那就马上让人释放他，至少我们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以减轻对他的刑罚。”

同时，她点燃了一小堆草，让草堆冒烟以驱赶叮我的蚊子，她对我照顾极其细心。从那以后，她每天都是如此，从未间断过。有时，她的儿子企图阻挠她为我服务，但她却始终是那样的忠诚。

“让我做吧，”她对其儿子说，“他那可怜的母亲多么不幸啊！假

如万一你也沦落到他这种处境时，我将为有一个人能这样细心地照顾你而感到格外高兴。”

我在亲切的安慰中想到她所说的一切好像是我老母亲的想法和思虑。想到这里，我的痛苦也因此而减轻，难熬的夜晚也不那么艰难了。

六天过去了。10月13日，另一位小官员在20余人的陪同下来到这里叫人释放我。坚佐治先生获悉我一直被监禁的消息时，就派遣由约翰逊(Johnson)舰长指挥的一艘布斯塔尔(Bustard)英国炮舰直开到海阳县的衙门前，质问监禁我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官员只得遵命。但不幸的是，由于这支20余人的队伍人数太少，又很少经受战争的锻炼，所以很难能办成对我有利的重要事情。随着这支队伍的到来，村子里开始了骚动和混乱。

一部分人说：“必须设法处理好这件事，因为官员们带着成百的营勇即将赶到这里，他们将要毁坏整个村庄。”

一些狂热分子的意见则相反，他们对我说：“放你出去！不！永远不能放你出去。我们抓你也许是做了件蠢事，但既然你已被我们抓住，你就必须留在这里。与其放你出去，还不如杀了你。”

与此同时，这些狂热分子还抓了我的两名基督徒，后者远道而来为的是商谈有关释放我的事宜。这些异教徒激烈分子强行把他们的头按到地上，疯狂地抽打他们，把他们打得半死。官员的衙役们也不敢为他们说话，衙役们看到自己的到场毫不起作用时就准备离开。但他们仍声称很快就会有这些人的消息，并宣布说这起如此严重的事件是不会如此就罢休的。于是村子里出现了一片恐惧和担忧的气氛，大家都谨慎行事。夜晚，人们把村子里的主要财产——水牛牵到山上，把最小的幼童送到远处的亲戚家里，每个人都考虑着自身的安全。

当两位在前夜被抓住并被毒打的基督教徒恢复知觉时，他们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恳求我做出妥协，以便能使他们和我都能得救。我不知道这仅仅是他们两人的请求，还是异教徒们向他们的建议。但是异教徒们开始为自己担忧起来，所有的妇女哭得泪流满面，再三恳求实现和平。面对此情此景，再也没有什么可搪塞的了，异教徒们也只得同意进行商谈。

正当他们砸碎我的镣铐要释放我的时候，仍丝毫没有忘记自己的利益。他们向我索要价值 200 皮阿斯特的保证金并要我签字，以表明正义在他们一边。他们开始向我作出让步，打算用这笔钱换得一些耕地。在这种压力之下，我只得接受这些要求。再说，还有那两位来为我辩护而被抓的基督徒请求我决不要拒绝这些要求，否则他们还要因此而继续忍受痛苦的折磨。于是，我给了他们 200 皮埃斯特。此后，我的镣铐才被解除。第二天，10 月 20 日，圣母升天瞻礼节的那天，我获得了自由。我再次看到我的基督徒们为见到我出现在他们中间而感到高兴，他们为接待我而献出了他们所有最好的东西。

主啊！这就是我被俘期间和释放时的主要情节。

那是在一个星期六，负责保卫我的一位小官员首次来到这里。那一天，知州派来的第二支部队也来了。后来，为了纪念贞洁无瑕的圣母，这一天就定为圣母童贞节。就在这一天，我也获得了自由。正如上帝曾想要告诉我的那样，在我被俘期间，是圣母马利亚多次拯救了我。实际上，圣母马利亚就是我这个被遗弃的传教士之母，同时我还要重复说的是多亏了圣母马利亚，我才能在艰难的考验中始终保持清醒平静的头脑。为了向她表示感谢，我曾经幸福地巡视了富里埃尔(Fourvière)圣母院的教堂。我在那里许下了诺言，坚信自己的慈善可敬的母亲将以我的名义忠实地履行诺言。

至于与我们传教区特别有关的事情,我的天主啊!我承认向你讲述我的赎金问题是很不光彩的。我知道,为了建造广东教堂,为了你支持的所有其它事业,你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尽管在我遭受各种迫害的情况下,圣母特意给我以帮助,但我还是希望圣母能教给我一些办法,既能使我从债务中解脱出来,又丝毫不影响你自己的事业。使我最悲伤的是海阳的异教徒们只顾要我们的钱,却拒绝把他们已经卖出的土地让出来。所以周围响起了一片为我已缔结和约而表示懊悔的声音。人们希望官员们来摧毁这个村庄,把被周围邻居一贯仇恨的那些人驱逐出去。

不管怎样,我可以原谅对我个人的人格侮辱,但我认为必须要把我们基督徒的安全问题以及我个人将来的安全问题告知于法国领事馆。

上帝啊!我请你再次对这件事给予关心,我将永远记住你的仁慈的心,我为能马上见到你而感到格外的幸福。主教大人为了上帝的荣光和《福音书》的传播而如此勇敢地从事和支持的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为能和你一起分享这些成绩而感到格外的幸福!

出于这种心情,我向你致以崇高的敬意和万分的感谢!

阁下谦卑的忠诚的传教士外方传教团

维塞尔(Verchère)

中国川东宗座代牧区的综合报道^①

在川东刚刚发生了一起杀害基督教徒的流血事件,玛弼乐先生于1865年8月29日在那里被极端残酷地处死了。1869年1月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41卷,1869年。——译者。

2日,一位法国传教士、巴黎外方传教会成员、巴桑贡教区的李国(Jean-François Rigand)神父,两位土著神学院学生和50位基督教徒由于敌人的仇教而被杀害了。

在报道这些光荣死者的消息之前,我们简要地阐明一下酉阳州新近创建的传教区的历史。

—

五年前,在酉阳州就开始了传教区的迫害。1868年10月21日,川东的宗座代牧白德立(L. Blettery)先生致信教廷传信部枢机处说:酉阳州有几座城市和一片广袤的土地,那里居住着土著人。从较近的一个时代以来,他们就归顺于天朝政府了。仅在五、六年以前,人们才开始对他们进行归化工作。上帝虔诚的事业迅速地发展着。当突然发生第一次骚动时,已经有了1万多名新教徒。骚动刚刚平息下来,范若瑟主教阁下就认为应该派遣他的代理代牧玛弼乐先生去酉阳挽救败局。你知道那里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在他到达酉阳三个月后,就被一些迫害者的乱刀砍死了。

张佩超是杀害玛弼乐先生的操纵者,在离他宅邸很近的地方,有我们新基督教徒一支引人注目的和经过严格考验的队伍。那里有2000名左右的基督教徒。四年以来,他们也一直是敌人彻底追捕的对象。他们的房屋大部分被摧毁。妇女们带着小孩逃跑了,但是有200—300人以构筑的一堵残墙作掩护而进行自卫抵抗。

在没有任何财政来源的情况下,在迫在眉睫的危险情况下,他们仍很活跃,很有生气。去年,他们坚持抵抗张佩超在贵州征集的一支3000人的武装队伍长达数月之久。当我们获悉他们的胜利消息时,以为他们都完了。一位有势力的异教徒由于被他们事业的正义性所感动,因而给了他们以很大的支持,迫使敌人只得撤退。这

一年的春天,敌人又向他们发起了进攻,但没有什么结果。在我给你们写这封书简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基督徒还陷在我们的死敌从贵州召来的同一些义军集团的包围之中。我得到的最新消息说他们的事业获胜了,当地的一些异教徒和他们一起参加了战斗,因为这些异教徒也遭到了起义军的暴力侵犯。这伙强盗经过哪里,就把那里抢劫一空。传说有 100 多户异教徒的房屋都被烧毁了。

那些官员们却躲得远远的,听凭这些强盗为所欲为。他们的态度是很清楚的,希望能亲眼见着基督教徒被消灭。由于不允许他们公开迫害基督教徒,所以他们高兴别人做他们不能做的事。张佩超把一些起义军召进四川来。根据中华帝国的法律规定,他应该被处以极刑。但这次却把我们和他们颠倒过来了:张佩超成了公共财产的保护者,而我们基督教徒却成了扰乱社会秩序、威胁国家安全的造反派。

10月23日,李国先生从他在酉阳的住院向外方传教会神学院院长盖兰(L. Guerrin)先生写了一封书简:

我们用不着担心了,酉阳县已恢复了平静。我们基督徒和那些打算信仰圣教的异教徒特别担心害怕的审查期限已过去 20 天了,没有暴露出任何阴谋。多亏上帝保佑和同情怜悯这些人。我相信,那些被迫离开岗位的当地土著司铎的即将返回将预示着许多人要接受归化。

我曾经让人在小山买下的房屋已被恶魔般的疯狂者摧毁了。一些异教徒尽力阻止我们继续留在那里。

你已经知道,在酉阳县的祈祷所火石埡所发动的反对我们基督教徒的残酷战争。不久以前,迫害狂们把他们高价收买的邻近地方的坏人征募起来后,就烧毁了我们基督教徒们几乎所有的房屋,抢走了收获的粮食。一些给过我们以某些关心的异教徒也遭受了

许多折磨。卖给基督教徒一些生活必需品,尤其是向他们提供避难所等事件都被认为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是,官员们却眼看着这种种的欺凌变成暴动而不闻不问,最后,他装出对此很关心的样子。武官带领着 200 名士兵去整顿恢复秩序。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也去了。一些基督教徒没有房屋,没有收入来源,没有粮食,他们成群地来到我身旁。怎样来救济这样严重的灾难呢?在那些仍然留在这个地区的人中,有多少人住在山洞里,过着缺衣少食的日子!将来只能增加我们的忧愁。饥饿临近,这么多的可怜人将以什么来充饥呢?

1868 年 12 月 21 日,李国先生向外方传教会神学院院长写了最后一封书简:

迫害仍在火石垭继续着,在距此九法里的苏家河和毛俱场基督教徒居住的地方,又重新开始了疯狂的打教活动,敌人在那里屠杀了 3 位基督教徒,绑架了其他 10 名新教徒,并抢走了他们的财产,烧毁了他们的房屋。一些类似的新迫害也降临到我们其他几位基督教徒头上。这些凶残的敌人就是起义军,他们把我们的新教徒弄得家破人亡以后,他们又自愿充当进攻异教徒本人的人。这次打教可能波及的范围比较广,这就是我们面临着的仇教所造成的新威胁。请为我们和这可怜的地区祈祷吧!

10 天以后,人们就可以见到传教士忧伤的预感将怎样得到证实。

二

当仇教袭击着酉阳县的一些地方时,县府的一些基督教徒并没有感到担心和不安。12 月 30 日,也就是李国先生殉教的三天前,他还亲自致书代理宗座代牧要求派一些新小学教师来酉阳州

为新教徒讲道。但是,在中国,平静基本上总是暂时的,极不稳定的。继表面的平静之后,突然又会出现可怕的风暴。

1869年1月17日,川东宗座代牧主教范若瑟阁下向外方传教会神学院的院长们写了下面这样一封书简:

我们在酉阳的灾难没有结束。我们刚刚经受了比以前每次都要更悲惨的新灾难。上帝给我们神圣的旨意吧!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我们遇到了顽固的强大敌人,他们已发誓要采取各种办法乃至公开使用暴力来阻止基督教的传播。但不幸的是由于与官员们相勾结,或者至少是由于他们疏忽了公正地对待我们,这些计划得到了促进。这样,我们的基督教徒处处都提高了警惕性。唯有在人们认为无须担心的城市除外,因为住在那里的一些文职官员和武官多次向李国先生保证说,他用不着担心害怕。

啊,人们没有想到的时刻到了,1月2日上午,一伙武装人员进城了,他们向我们教堂和其它设施周围构筑的围墙发起了进攻^①。官员们对此却视而不见,听之任之。行政长官甚至阻挠基督教徒自卫抵抗,并且还向他们喊话:如果他们不吵闹,那就可以搭救他们。实际上这些话是背信弃义的,进攻仍继续着。因为牢固的大门挡住了他们,所以他们就用火药把门炸开,接着就开始了对我们可怜的基督教徒的屠杀。

“李国先生正和他的两个弟子跪在祭台前祈祷,刘伯禄(Pierre Lieou)和秦保禄(Paul Tsin)从我们的大神学院出来。此时,凶手们都一齐动手打李国先生,他站了起来,但是又被刺了两

^① 这一设施特别包括有一所女校和一所成人学校,这所成人学校是为培养50名新基督教徒而成立的,这些人都是他们在向丈夫、兄弟住处以及其房屋多次被烧毁以后,因反抗张佩超将军的匪帮而逃来酉阳的。

刀倒下去了。他被斩首时早已被打死了。

我们的同伴就这样光荣地在酉阳州殉教了。三年前,玛弼乐先生也曾在此被害身亡。他们都是为了相同的事业,即由于“仇教案”而被处死的。他们今天遭到了如此疯狂的迫害,愿他们在上天成为酉阳这个地区的保护人。

1月20日,白德立先生向外方传教会神学院的院长德尔佩什(Delpech)先生写信说,当时有40—50名基督教徒和李国先生一起被凶手们杀害。这次屠杀以后,凶手们又把教堂的设施都烧成了灰烬。奉官员之命,我们亲爱同伴的尸体被烧化了。然后,官员在他的报告中肯定地说李国先生是在一次意外的火灾中遇难身亡的。后来,我们只找到了殉教者的躯干。

李国先生在前往酉阳之前,曾巡视过彭水的基督教徒。当地的官员十分欣赏他的活动能力及其爽直的性格,这位官员在和酉阳官员的一次谈话中还曾颂扬过他。酉阳的官员很想留下他,于是这位官员就请求其上司向主教大人把他要了来。范若瑟阁下高兴地答应了官员们的要求,并且希望李国先生在使这些长期处于混乱的地区恢复和平的工作中能比其他任何传教士做得都更好。然而,正是这位其衙门设在我们药房对面的这同一位官员,竟然冷酷无情地让坏人把他曾经要来的李国先生杀害了。在凶杀和纵火烧毁房屋时,他让人紧闭营帐的大门。毫无疑问,这些杀人犯事先肯定得到了不受处罚的担保。

此时此刻,在酉阳和农村又发生了什么事呢?疯狂的打教者们跑到他们知道有基督徒的地方到处杀人放火。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遇难者的人数。在华爱仁先生时期的第一次打教时,最糟糕的是玛弼乐先生的死亡造成了巨大损失。这次的损失很可观,而且也将是难以挽回的。他们想要在这个面积至少相当于法国两个省的幅员

辽阔的省份里毁坏基督教的名声。我们的一些新教徒懂得，对这些敌人不能有什么要屈服投降的地方，他们在逃跑时寻求自己救生法。每天都有一些新的逃难者来到重庆府。主教阁下的住院里挤满了人，他们一个个都十分贫乏。如果我们能预料到这些损失的结局，如果能希望这些可怜的基督教徒将马上能恢复他们的家业，那么我们就互相安慰。可是，我们却不能得到这种安慰。

令我们更加不安的是仇教行为似乎不会只局限在酉阳县内。所以彭水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也已开始露头，并且正准备进行突然袭击。官员对于阻止他们的这种行动表示无能为力，他劝告华爱仁先生向这次骚动作出让步，并撤退到一个最安全的地方躲藏一段时间。华爱仁采纳了他的建议，和他一起在彭水工作的葛荣先生也同意了。人们还不知道余克林先生怎么样了。因为他也住在酉阳。但是，几天以前，他已离开城市去农村巡视基督教徒去了。当他得知所发生的事件和迫害狂们在搜捕他的消息时，他就已打算躲到一个安全的场所去。可是，不久他就被人发现并遭到了逮捕。有人说他花了 150 两银子（合 1200 法郎）的代价才得到了自由，然后就去汉口（湖北）了。

在这些学校的女教师中，有一位是我们大神学院管事的妹妹。她刚来两个月。她在逃跑时突然从墙上掉下来，两条腿都被摔断了。另外一个更年轻的女教师也被这些强盗抓走了，一位异教徒后来花了 28 贯钱（合 168 法郎）把她赎了回来，当时她正在这位异教徒的家里。

1 月 24 日，范若瑟主教阁下告诉外方传教会神学院的院长先生们说教案仍很猖獗：

在酉阳县，教案仍继续着，其疯狂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彭水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然而种种迹象表明，打教可能要从这一个省波及

到其它地方。祈祷上帝帮助我们战胜这如此多的敌人吧！

一些官员劝我放弃酉阳地区，并且不要再向这个省派遣司铎。我不能采纳这一建议，因为我们在那里有 2 万新教徒，并且希望能归化更多的人。我们怎么能因为几次打击就害怕、就要抛弃一个如此有希望和有前途的地区呢？骚乱是可怕的，但它可以使天空晴朗，并且把我们引向美好的明天。

我求你不要忘记我们。我们需要你们派来许多新的教友。我以我们最亲爱的殉教者玛弼乐先生和李国先生的名义向你提出这一请求。

三

关于川东一些最新消息使人比较放心一些了，打教已经停止。2 月 13 日，范若瑟主教阁下再次向外方传教会神学院的院长们致信要求派去一些来自教廷的传教士。我们从其书简中摘如下几段文字。

酉阳州的灾难是当地一些官员和他们的心腹阴谋策划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要预防和制止这些骚乱是很容易的。幸运的是这些骚乱没有扩大蔓延到外省去。我们坚信玛弼乐先生和李国先生将会像懂得怎样报仇的圣人一样去行事，他们将会得到上帝许许多多的恩惠，以归化那些以极度野蛮的方式对待他们的那些无耻之徒。如果上帝给我们以自由和安定的环境，那么就将可能通过祈祷帮助我们最后在这个地区定居下来，在那里作《福音书》的讲道将会结出许多拯救之成果。

敌人远不能打败我们，最近的一些事件只能增强我们的信心。可以想象，如果酉阳是一片不毛之地，那么我们在那里就会一无所获，恶魔也就不会花费如此大的精力把我们拒之门外了。现已下命

令要这些犯罪的官员把他们的岗位让与那些禀性正直的人。这一措施的落实将能帮助我们重新夺回我们的阵地和医治骚乱给我们造成的创伤。

我现在不得不付出最大的力量来收复我们失掉的地盘和巩固已取得的胜利。我在这个省里需要 10 位传教士：3 位去酉阳，3 位去彭水，2 位去秀山，2 位去黔江。请给我派来这批人，我们很快就会有相当数量的能干的新教徒，他们将会使我们的敌人感到惶恐不安。

中国广东宗座代牧区的综合报道^①

我们要指出广东省在反对传教士和基督教徒方面所犯下的新暴力行为。去年 12 月，雷州成了一场野蛮行为的舞台，人们从外方传教会文礼(Jolly)先生于 1869 年 1 月 22 日的书简中便可以了解到有关这方面的详情细节。

为了全面了解这些事件，我们应该指出，两年前曾第一次被烧毁的雷州传教士们的住院和小教堂，刚刚由官员和百姓们负担费用重新建起来了。

文礼先生写信告诉我们说，为了使我的身体得以康复，我返回了雷州。使我感到安慰的是，我得以参加了我们尊敬的赖神父(M. Delavay)迁往那座重新修建的小教堂的定居仪式。一些时候以来，人们一直传说着一些或多或少令人担忧的谣言，但我们亲爱的同伴丝毫没有对这些引起重视，他也许是利用了表面上有利于民众的安排，也许是相信了官员们允诺。

12 月 24 日晚上六一七点间，我们预料的事情发生了，有人开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 41 卷，1869 年。——译者。

始向教堂投来了许许多多的石子和碎砖块,同时还伴随有群氓的叫骂声,我们立刻派人去通知官员们。知州和知县马上前往军官那里要求调兵援救。但这位老仇教者、基督教徒和外国人公开的敌人却早已与阴谋制造者们秘密勾结在一起了,他抵制了所有的要求。我们只得依靠自己。已经来不及逃跑了,教堂已被数千人包围,他们因为有人指控我们为吃人肉而杀死了一个儿童而感到十分恼火。

我们只得被迫坚守阵地。当时正值圣诞节之际,许多基督教徒在这里集会。这时,他们也只好决定进行一场必须的激烈的自卫战,以保护自己的性命。烈火包围着我们,聚集在街上或守候在附近房顶上的人群向我们进攻过来,我们十分紧张。自卫战进行得很猛烈。基督徒们没有武器,就用房顶上的瓦片和砌墙的砖块向敌人砍去,进攻者终于被击退了。他们两次放火烧房,但两次都被我们扑灭了。我们的阵地变得越来越有利了,以至于能把他们驱赶到一定距离远的地方。但是这些短暂的胜利既不能使我们的处境变得很危急,也不能使之变得很稳定。

将近早上两点钟之时,我们得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文职官员们鼓励我们坚持抵抗到天亮,他们告诉我们说军事官员已同意派来营勇。但这一允诺只不过是敌人的一种诡计,我们并没有高兴多久。天亮时,我们为无人支援我们而感到悲痛。尽管文职官员作出了努力,但他们对这群执意反抗我们的人却无能为力。

除了拒绝援助之外,又加上了他们的背叛。我们的基督教徒实际上原来在房顶上占领了有利阵地,能迫使敌人撤到距离适当远的地方,但这些文职官员建议我们把基督教徒从房顶上调下来。然而,基督徒们刚一下来,进攻者就利用这一暂缓的机会毫无阻挡和毫无危险地向我们冲了过来。他们第三次放火烧毁教堂,并对教堂

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其疯狂程度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我们的基督教徒措手不及,复加以又饿又累,精疲力尽,完全丧失了抵抗的能力。摆在他们面前的最后一条活路就是在人群中冲开一条路撤出去,但第二次背叛又堵死了他们的出路。

那名军官早已在离教堂最近的一堵墙上打开了一个狭窄的出口,并且在那里布置了几个兵勇站岗。由于求救之心太切,基督教徒们在一片混乱之中向这边冲了过来,结果受骗了。这里原来是一个可能遭到抢劫或暗杀的危险场所。基督徒们来到这里后,兵勇们把他们抓了起来,剥光他们的衣服,还把他們推到迫不急待的人群中以满足这些人的狂兴。知县及其衙役们的到来也未能制止住这些过激行动。

我从混战中撤退出来了,身上只被抓伤三处。不太走运的是赖神父被从知县的臂膀中抢了出来并被市井小民拖走了。知县的衙役们又一次把他救了出来,但他却遍体鳞伤,头部有三处严重受伤。我们的上百名基督教徒被剥光了衣服,受尽了嘲弄和殴打,其中有几人伤势严重。

所有的教堂,所有的基督教会口,除了一两处外,均被烧毁了。还有数名基督徒被打死,但我们还不知道其确切的人数。

我们唯一的一个避难处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将领的衙门,因为文职官们不敢把我们收留在他们那里。就这样,我们的一切全由这位官员负责,我们的安全保障与我们想象的情况相差很远,这将是你们难以理解的。但是上帝一直关心着我们,它不允许另外的事故再降临到我们头上。由于上帝强有力的教法,赖神父很快就脱离了危险。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派一人去广东,但赖神父的身体尚未恢复健康,还不能胜任这次劳累而又危险的旅行,我只得自己去。感谢上帝,一路上我都很幸运,这就为我把这些悲

惨的细节写信告知于你们提供了方便。

这次灾难使由阿玛特(Amat)先生煞费苦心创立的基督教会口几乎全部被破坏,人们由于最近取得的一些成绩而激起的希望也变成了泡影。现在,必须采取紧急的强有力的措施,才能医治这些创伤。在此期间,我们只能祈求上帝保佑赖神父和我们这些至今无家可归并走投无路的基督教徒。

1月27日的一条记录补充了如下的内容:

在雷州的最近一次冲突中,有成百名基督教徒都或多或少受了伤,有七、八名丧生。赖神父现已开始康复,雷州的教堂只剩下一堆废墟了。

异教徒们一直进攻到白鸽寨来打击基督教徒和摧毁这里的教堂。但是白鸽寨的异教徒居民明确地表示反对这种袭击,他们声称不容许有人接近教堂。他们似乎始终是为了纪念这个省的一位老传教士——白鸽教堂的建造者阿玛特先生,出于对他的尊重和崇敬的心情才激发他们采取了这种坚定的态度。

去年2月20日,广东省的宗座监牧明稽埒主教阁下写道:“我们不知道这些灾难何时能得到补偿,这些制造混乱的人何时能得到应有的惩罚。”

在寄给外方传教会神学院院长们的同一封书简中,明稽埒主教阁下指出,有621名受洗的成年人于1868年在全省都已行圣事。

该高级教士补充说,又有两个新地点向布讲福音书的活动开放了。一个是靠近本省最西头的灵山,文礼先生已在那里争取了许多新教徒;另一个是廉州,那里有相当多的异教徒开始接受我派往那里的一位传道员所给予的教育。为了保证他们计划的实施,他们要求广东的圣婴堂能收下他们的30个孩子,以便让儿童们在那里

学习当地的语言。我已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非常符合我们愿望的要求。这就是给我们带来美好希望的两个新地方。非常遗憾,我没有传教士可派往那里去,但无论如何要采取断然的办法。否则,所有这些希望从此以后就会有成为泡影的危险。

在上川岛(San-cian),圣一方济各一沙勿略(Saint-François-Xavier)教堂终于竣工了^①。现在岛上已有两座教堂,一座是享真福品的使徒结束一生的地方;另一座位于城市中心,那里有一个基督教徒聚会的附属建筑物、一所小学和传教士的住院。建造全部设施的费用大大超过了我预先估计的数目。然而,我们可以想想,如果要到离上川岛有50多法里的地方去寻找工人和材料来建房,那也就不觉得奇怪了。建造的房屋都很坚固,因为它们要能抵抗附近地区那些如此猖獗和如此频繁的骚乱。我还可以补充说,这些建筑物都是很漂亮和雅致的。比这一切都要重要的是它们为岛民们的受归化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这个小岛上有8000到1万人,我们的同事布罗(Braud)先生在这里深受他们的尊敬和爱戴。人们对他非常信任,没有他就办不成任何事情。他十分希望能看到在全部工程刚一竣工,就有许多人转向耶稣基督。圣一方济各一沙勿略教堂的祝圣将在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日(4月4日)举行,广东、香港和澳门许多想来参加的人将在那一天来参加祝圣。

1869年3月20日,从香港发给我们的书简写道:

“今天晚上,由于仇教者的驱赶,使得雷州一位重要的基督教徒从广东来到香港。他向我们讲述了许多十分悲惨的消息:抢光和烧光基督教徒所有东西的事态仍在继续蔓延。白鸽教堂一开始还得到了附近异教徒们的保护,但最后还是像其它教堂一样被烧毁

^① 《传信年鉴》第40卷(1868年),第252页。

了。赖神父现在的处境十分危险,收留他的官员对他很不好,几百个异教徒准备在他从官府出来时杀害他。中国广东当局确实答应要破坏者们负责修复被毁坏的建筑物所需要的开支费用,并且还要赔偿抢劫对基督教徒所造成的损失,但是谁都知道中国方面的承诺是毫无价值的。”

中国川东宗座代牧区的综合报道^①

去年7月,我们简单地报道了李国先生以及他的一些新教徒于1869年1月2日在酉阳州教堂惨遭杀害、光荣殉教的消息,这场仇教的消息直至2月13日才停息。今天,我们要作一次补充报道,并且还要发表与酉阳基督教有关消息的续篇。

—

另一位传教士余克林(Hue)先生曾和李国先生一道被派前往酉阳站口。但他已在圣诞节之际离开酉阳城去巡视农村的基督徒去了。因此,他逃脱了2月2日的屠杀。

我们从古尔东(Gourdon)先生的来信中得知,余克林先生在听到李国先生殉教的消息后,为逃脱对他的追捕已躲藏起来了。由于重庆府的道路已被封锁,所以几个基督徒打算竭尽全力保护他一直逃到常德府(湖南省)。但是他们一路上受到了二、三次袭击,甚至有一人竟被杀害了。余克林先生也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中,但他只损失了一部分衣物和随身携带的一些银两,同时还遭到某些虐待。我们半裸着身体翻越几座大雪覆盖的山脉以后,已落泊到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42卷,1870年。——译者。

吃野浆果的地步,拯救余克林先生是没希望了。除了有一人留下之外,其余的基督教徒都后撤了。余克林先生和他的同伴朝常德府方向走去了,他们一路上靠乞讨为生,晚上睡在他们认为可以睡的地方,因为到处都有人追捕他们。经过19天的跋涉之后,他们终于来到了常德府。如果他们能拿出一笔巨款作为报酬,那么此处的一位小军官就会同意带他们去汉口(湖北省)。余克林先生将其获救归功于他曾向圣母许下的诺言。

在1869年4月12日致外方教会神学院院长先生们的书简中,余克林先生报告了李国先生最近的谈话和活动。这些资料都应该搜集和保存下来。

讲完上帝怎样通过一些很大的痛苦帮助李国先生英勇献身的情节之后,余克林先生继续这样写道:

回忆一下去年12月16日所发生的事吧。那一天,李国先生和我正在我们的酉阳教堂,希望能了解到处传来的恐怖声音的出处和几个地方已经开始的某些骚乱。当时除了我们的一些传道员、仆人和8至10个木工外,还有因仇教被驱赶来的80多个新教徒,男人、妇女、儿童和我们在一起。李国先生早已把他们收留下来了,因为这些不幸的人既无房屋,又没有钱和粮食,而且他们的异教徒亲属还拒绝收留他们。我们的敌人仇教者集结起来时,害怕的基督教徒就成群地向我们涌来,但我们亲爱的教友不能决定抛弃他的人群,再说他也没有想到危险竟然如此紧迫。

12月23日,李国先生和他的一些使者被他们的伪善语言欺骗了。他们向我们信誓旦旦地保证说,绝对没有任何值得担心的事情,他们可以承担全部事件的责任。李国先生向我说了有关如下事情:

“现正值圣诞节前夕。我们两个人留一人在这里就可以了。农

村的基督教徒都很恐惧；难道你不能去他们那里度过圣诞节吗？不能去给他们以安慰吗？”

“好吧，”我回答说，“我们给他们去函要他们来找我。”

我们向他们发出书简了。当天他们就来了。晚上，李国先生和我互相告解，第二天圣诞节下午，我就来到了位于离城市四法里的基督教地区小窑坝。和往常一样，我照例把高兴而又镇静的李国先生留下了，他忙碌于装饰教堂，并通知他的一些新教徒来欢度神圣的节日。我万万没有想到再也不能于人世间见到他了。

我横穿城市之时，发现了一张张惊恐深沉的面孔，它使我产生了种种悲惨的预感。我一来到小窑坝就发现基督教徒们都十分恐惧。我尽一切努力让他们安下心来，但是谣言传播得那样猛烈，以致于再也不能对形势的严重性抱有幻想。我每天都把在农村耳闻目睹的一切写信向李国先生进行汇报，他也每天给我写来一封信，把在城里和官场所发生事件的消息告知于我。一直到最后，他始终都保持着令人钦佩的愉快、镇静、勇气和耐心。

12月31日夜晚，有人通知李国先生说，有700—800名全副武装的抢劫者已集结在离城只有三法里的地方，他们将要烧毁我们的教堂。李国先生找到官员那里，但这位官员却拒绝过问此事。

强盗们举着写有“奉旨灭教杀洋人”的条幅，也就是说：“奉皇帝旨意，摧毁基督教，杀死欧洲人。”15天以前，他们一位名叫何彩的团首就张贴过一份揭帖，竭力煽动平民百姓造我们的反。他补充说：“杀死司铎，因为他们来中国传扬天主教，向百姓布道说不要崇拜我们的偶像。在我们烧毁了基督教徒的教堂和住院、杀死其亲属、夺走其财产时，他们又帮助基督教徒向我们提出起诉。杀死基督教徒，因为他们听从这些有害的教义，与我们打官司以便要我们交出已抢走的财物，赔偿我们给他们造成的损失。”

帮助李国先生和异教徒们调解纠纷的黄氏传道士看出了严重的灾难不可避免之后,就对传教士说:“神父,快逃走!别留在这里了,你快逃命吧!”李国先生不想这样做。

1月1日凌晨近四点时,李国先生派遣他的黄氏传道士出城去报告所发生的事情。

传道士出去了。当他得知敌人已经临近时,便又飞快跑来向李国先生喊道:

“神父,快来!快出来!还来得及。不然,你马上就该完了。”

“你想我怎么能逃呢?”李国先生回答说,“我怎么能抛弃这些可怜的基督教徒呢?不,我不逃走。如果他们都逃走,那么我就和他们一起逃走;如果他们要死的话,那么我就和他们死在一起。留下来是我的责任。”他留下了。

传道士不久就发现了敌人,他躲藏起来并幸运地逃走了。他现到我这里来了,我正是从他那里得到了这些新的详细情况。

教堂被包围了。1月2日傍晚,强盗们破门而入,杀害了李国先生及和他在一起的全部新教徒,但妇女除外。她们中间只有两人倒在了谋杀者们的凶器之下。教堂接着就成了一片火海。这些受害者的珍贵遗体好像是在事情发生几天之后才被收殓起来,陈放在官员本人准备的棺木之中。这就是我们对这次大屠杀所了解的全部情况。

我们在这些材料中再补充如下内容。这是另一位传教士古尔东先生从一位目击者那里得到这些情况后记载下来的。

这位目击者说,住院里有将近100人,大部分都是正在学习教义的新教徒。李国先生正确地预料到事情将是怎样的结局,他为全部望教者进行了洗礼,然后开始了祈祷。此时正值刽子手们准备放火烧教堂之时。于是我和神父及他的两个学习神学的学生都躲藏

在一个角落里,但是由于火灾的威胁,我们只得放弃这个藏身之地而冲到院子里去。就在这同一时刻,大门碎片横飞,人群突然猛冲过来和我们发生冲突。有几个人向他们大肆攻击的神父扑了过来。我成功地爬上了围墙,当我从另一侧跳过去后,我回头看到神父被刺了一刀。我刚一来到街上就被一个人抓住了,当我求他饶命时,他把我的衣服剥了个精光。我逃到我认识的一个异教徒家中。夜幕降临了,我就逃到农村才算死里逃生了。

李国先生于1834年6月2日出生在阿尔克和塞南。1857年11月,他进入贝桑松大修院。在那里度过了三年,他于那里得到神品以后,又于1860年9月9日被吸收加入外方传教会修道院。1861年12月2日领受神父神品,1862年3月31日动身前往四川东部。他在于澳门登陆之前,曾在大海中遇到船舶失事,在炎热的太阳下几乎赤身度过了几天,受尽了又饥又渴的苦难。

来到四川后,他连续在荣昌、大足和彭水县进行福音讲道。1868年,他被任命为被玛弼乐先生鲜血染红的酉阳传教区的会长。

前面提到的余克林先生的书简中,谈到了李国先生使徒生活的情况。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不再转载,而只列举如下两件事。

1866年,余克林先生写道:“前一年,我的李氏传道士曾陪同李国先生拜访了一些基督教徒。他向我汇报说,在这次访问时,李国先生在白山坳(Pai-chan-gao)一位姓刘的可怜的陶器制造者的家里做弥撒,耶稣基督以小孩的面貌,头戴闪闪发亮的桂冠出现在他的手中,然后停留在圣餐杯之上,直到面酒形内的圣体完成。有两位新教徒目睹了这一奇迹。一位是黄氏,去年我已为他进行了洗礼;另一个就是陶器制造者的妻子。”

有一天,我壮着胆子向李国先生询问了关于这一案件的情况。他红着脸没有回答。1867年,我亲自来到白山坳,我通过我的传道员向基督教徒黄氏和刘氏打听了这件事。他们两人都肯定了我刚才提到的这件事的真实性。去年,这一证据又一次得到了两位新教徒的证实。

在河保长的唐家,我听说了另一件事。一天用晚餐时,我谈到了维安耐(Viannay)先生令人钦佩的品德。

“我们都很了解这一切。”在场的人回答说。李国先生已和我们详细地谈过这些事。圣神早已向达尔斯(d'Ars)本堂神父先生启示李国先生成为一位传教士。“——超脱自己,摆脱人世间的事情”,圣本堂神父早就向还是世俗的李国先生说:“你马上就要离开你的父母、财产和故乡,你将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布讲天国。”

当我如此获悉我们亲爱的教友一生中特殊经历后,使我感到十分惊奇。此后不久,我遇到李国先生时,向他询问这些事。他回答我说:

“这是真的。当我还是世俗人时,曾向达尔斯本堂神父先生表示了忏悔。他激励我摆脱人世间不持久的事情。”

但由于他担心谈得太多,于是便停下不说了。从此以后,我就再不可能把谈话引向这一内容了。

二

传教士们书简的摘录揭示了酉阳事件后来的情况。

1869年3月19日,普罗沃(Provôt)先生向外方传教会修道院的院长德尔佩什先生写道:

……当匪徒们在整个酉阳地区扩大抢劫、凶杀、放火时,即使没有数千户人家,至少也有几百人都无处蔽身。他们没有粮食吃,

几乎没有衣服穿,只得靠逃难求生。妇女、儿童和老人都躲藏在最偏僻和最难攀登的一些山洞之中。那些有能力进行长途艰苦跋涉的人都来到重庆府和成都向当局要求正当的权利,向范若瑟阁下要求援救。自从仇教开始以来,我们在重庆的机构和离城半天到一天行程之远的三座教堂里,都住满了这些不幸的人。

属酉阳管辖的彭水县也没有能长期逃脱暴风雨的袭击。华爱仁、高荣(Gojon)先生和我预料匪徒们不会在一开始就来进攻我们的教堂,于是我们便决定准备进行自卫。为此,有上百名武装精良的异教徒和基督教徒来到我们的住院度过了几天。但是没有官员的支持我们又能做什么呢?然而,直到那时还比较随和好商量的彭水知县却突然变得与我们敌对起来。一方面,他拒绝让我们进行自卫,因为我们早已向他提出了请求;另一方面,他又把要撵走我们一些人的命令告知于我们。他曾经不敢拒绝城市一个最卑劣的小酒馆老板的一切,而现在他却拒绝了我们,阻挠我们反抗一帮流氓无赖。一些与传教士和基督徒有关的条约的条款就是这样被遵守的!

我们只能逃跑了,否则就会像李国先生一样遭到恶运。我们乘坐一条小船来到涪州,投宿在萨巴蒂埃(Sabattier)先生家。我们来到那里已有两个月有余了。

为了促使重庆当局制止在酉阳和彭水地区不断发生的对我们基督教徒的凌辱,范若瑟主教大人全力以赴和格外小心地工作着。一些传教士被派往现场,但他们都被我们的敌人用金钱所贿赂,所以他们无所事事地返回重庆了。酉阳和彭水的官员是罪恶活动的真正操纵者。鉴于他们不行使他们的权力以制止这些罪恶活动,所以被“权宜”革职了。新任酉阳的知州刚从这里启程赴任,但他是一个几乎不可信赖的人。彭水的新任官员于昨天晚上来到这里。上

帝希望这两个人都能恢复和平,希望我们失散的基督教徒都能重建家园,耕种田地,种植水稻等等!但愿我们自己很快能返回去对如此多的缺少精神和物质援助的新教徒给以安慰和鼓励!

萨巴蒂埃先生和我早已决定秘密动身跟在酉阳的官员后面前往那里。还有 20 名基督教徒未能返回他们的家园,他们可能陪同着我们,并且在我们受到攻击时能保护我们。此外,我们每人还必须有一个仆人,然而却谁也不敢跟随我们。有人说,这无疑等于去白送死。我们的敌人很多,必须等待官员在这个地区来一次清洗,驱走匪徒。范若瑟阁下谨慎地不让跟随官员,而要我们在涪州再等一段时间,我们坚决不同意后一种办法。

范若瑟阁下把我们目前的困难和我们对将来的担忧告知于北京的公使馆后,他又赴首府打算和新的川督进行交谈。会谈将会取得什么结果呢?总督开始是那样不好,他来到四川是那样令我们忧郁,以致于我们十分失望,非常担忧。

再告诉你们一些来自酉阳的最新消息。在此期间,两位官员不是奔赴他们的岗位,而是派 1000 人包围了我们的纸房溪城堡。被监禁在那里即将两年的中国司铎要求我们给以援救。他们只有两个星期的粮食了。这些不幸的人已经忍受了三、四年的苦难,他们即使不被杀害,也将可能被饿死,上帝给他们帮助吧!躲藏在纸房溪附近山洞里的上百名基督教徒,包括男人、妇女、儿童都已被处死了。三天以前,匪徒们抢劫和烧毁了有 30—40 间房子的基督教徒的整个村庄。

4 月 28 日,余克林先生写道:“酉阳和彭水还没有恢复平静。”

试图回到酉阳去的萨巴蒂埃和普罗沃先生都被新上任的官员赶了出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传教士已经到达了离城市四法里的地方,却没有任何人敢对他们有丝毫的侮辱。他们以为是田大官

人^①的周密部署之结果，于是就向他寄去了他们的名片以表示对他的问候。可这位官员刚一得知他们的来临，就煽动百姓反对他们，并强迫他们后撤。

这次失败以后，华爱仁、普罗沃先生和我又动身去彭水，当时我们已得知了我们的敌人早已集结起来以阻止我们回去的消息。他们用野蛮残暴的语言重复道：“我们准备要吃掉司铎们的肉。”

这样，我们又一次停了下来，我们不幸的新教徒刚刚回到被烧成灰烬的家园，他们又将会怎样呢？

直至现在，公使馆为我们作出的好心的努力在毫无诚意的官员面前就这样付诸东流了。

去年9月23日，传教区的代理宗座代牧白德立先生向外方传教会枢机处写道：

在酉阳州地区，于离城三天路程远的地方，六年以前就已建立了一个在各方面都引人注目的基督教会口。但从它诞生以来，许多次仇教就一刻也没停止过对它的折磨。

基督教的大敌、造成玛弼乐先生和李国先生之死的真正首犯、臭名远扬的张佩超就住在这个基督教会口附近的地方。他在整个地区进行破坏和放火，使得这里不得安宁。为了迫害这些基督教徒，他连续五年煽动和收买异教徒为他效劳。为了消灭这些基督教徒，他从贵州召来义军充当打手。

面对这样一个如此恐怖的敌人的威胁，300—400个新教徒（男人、女人和小孩），都躲避在一座小山上。他们在那里每年肯定要被2000—3000名异教徒包围一、两次，时间至少一个月。在整个山上再也找不到一块石头，因为所有的岩石都被砸碎用作抵抗进

① 指提督田兴恕。——译者。

攻者的武器了。

在张佩超的阴谋煽动下,打教又一次在酉阳爆发了。此时他们已处在这些人的一次包围中,这次仇教选择了李国先生作为第一个牺牲的对象,并且使仇教之火在整个酉阳地区蔓延开来。4月,由于许多不幸的人的挑唆,复加以饥饿所迫,一些基督教徒不听劝告而鲁莽行事,他们离开他们修筑的小小的围墙,向敌人的营地冲去,结果有33人被杀害,其余的人都被击溃。第二次出击得到的结果与第一次相同,但只有五、六人死亡。

当时还可能会听到官员们狂热的叫喊声。只要人们已经包围了基督教徒,烧毁了他们的住院,官员们就保持沉默。张大官人一家从贵州召来起义军,应该判以死罪。根据中国律条,这一家族应该满门抄斩。但是正是为了反对基督教徒,使用了防御的合法权利,所以各级官员都克制了他们的愤怒之情。实际上,他们是拍手欢迎的,因为他们从那里找到了把基督教徒说成是反叛者的借口。他们反复说,基督教徒是老百姓的迫害者,他们屠杀了600人。

鉴于基督教徒已这样被正式地宣布为叛逆者、纵火者和异教徒的迫害者,所以必须对他们提出控告。这正是他们已经做的事情。异教徒们从各个方面向基督教家族提出指控,打手们开始了行动,他们让被控告的基督教徒在监牢里受尽折磨,直至被告背弃宗教方肯罢休。根据官方文件记载,被基督教徒屠杀的异教徒人数达600之多。现在的问题已不在于寻找同类控告的证据,而是只想获取基督教徒和异教徒的证词以确认这个数字。有一个异教徒不愿意提供证实一种令人十分愤慨的诬蔑诽谤的证词,宁愿遭受痛打而被关进监牢。为了获取证言,他们采用了毒打和酷刑。在数月的流放以后,如果一个基督教徒敢于向其家成员中的凶手提出起诉,或者是向他家的纵火者提出起诉,那么整个衙门都大呼诬蔑诽谤,

以承认把他关进监牢的起诉的合法权利。

一位鞑靼的高级官员谈到了所发生的事,他向一些最贫苦的基督教徒施舍了 8000 两白银(合 64000 法郎),可是担任分配银两的官员不同意。他们坚持自己的策略,主张在基督教徒和异教徒之间分配这一款项。后来,除了用来收买背教者的几份以外,这笔钱最终还是全部落入异教徒之手了。一想到那些迫使这些新教徒背教而采用的手段就感到很可怕:许诺、威胁、欺压、监禁,真是无所不用,甚至有些官员为吹嘘而谎报这个地区已恢复和平,基督教徒已享受充分的自由。他们自己不敢公开和正式做的事情,则让他们所豢养的匪徒出面为他们卖命。

我们酉阳的基督教徒大部分都回到他们家去了。不对,我弄错了,他们已不再有家了,他们只是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一部分人得到异教徒亲属的膳宿和保护,另一部分住在朋友的家里。但一大部分没有避难处,朋友和亲属因为害怕衙役而不敢收留他们。他们住在山洞里,也不敢去修盖他们的房子。他们说:“何必呢?也许还没修完又被烧毁了。”

我不应该忘记告诉你的是一些官员已打算向迫害我们的仇教者表示感谢;他们给仇教行动所有的主要头目都加戴顶子,这样那些不能得到犒赏的人就后悔。

当我们一些为了不背弃宗教而周身受伤的基督教徒在监牢里呻吟并且被慢慢折磨致死的时候,成群的衙役和异教徒却还在农村奔波,采用各种威胁手段强迫我们的基督教徒背弃宗教,官员们已向政府报告说一切都已结束。我们感到幸运的是法国驻北京代办罗淑亚伯爵给我们提供了援助。他强烈支持受压迫者,并且对我们传教区表现得很热情虔诚,他的热情应得到我们衷心的感谢。

他和北京政府一道派遣广西传教区会长梅西满先生去进行调

查。此人于圣母升天节前夕到达四川。他必须亲自前往玛弼乐和李国先生被杀害的现场,然后起草一份报告寄往公使馆。官员们设置重重障碍以阻挠这位特派员完成他的使命。他们预言百姓将再一次起来造反。他们的预言很可能变为现实,因为百姓只是听凭官员们的驱使而行事,而那些不想让梅西满先生不费力气就能完成他的使命的官员完全能够激起百姓起来造反。为了掩盖他们不公正的行为,他们只想惩罚几个犯有其它罪行的异教徒和几个基督教徒,以使人相信异教徒和基督教徒两方都是有错误的。

在酉阳和彭水地区,基督教徒有 1000 多所房屋被烧毁或被推倒。基督教徒本人在那里没有任何安全保障,一些最知名的人士虽没有马上被衙役们抓走,但也不能回家了。

传教区其余的人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然而在全省和在全中华帝国一样,一种没有好兆头的骚乱行为正在形成。到处都流传着一些比较令人惊慌的谣传。官员们的为人、他们的不公正的行为、公开的仇恨使这些谣传变得似乎有了一定的可靠性和他们要把这些谣传的起源追溯得更加古老的企图。

三

我们用一封将从另一方面能说明有关传教区情况的书简来结束对川东的回顾。无论是这个具体的传教区还是中国的大部分传教区,情况都是如此。仇教在那里并不普遍,因为有条约的约束,过分明目张胆的破坏必会引起欧洲的干预;和平在那里也并不普遍,因为当地的政府部门的庇护,官员们几乎永远不受处罚。这是对于中国天主教传教区表面上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所作的解释。下面是古尔东先生从白果树神学院寄来的书简:

两年半以前,当我来到四川时,我先在重庆府度过了圣诞节,

然后就来到重庆府西北 30 法里大足县的一个小村庄。为了在那里建立一个修道院,我们曾经在那里购买了一幢小小的府邸。但这个计划未能实现,房子一直空着。我正是在这里定居下来学习语言。

这所住宅地处在一个名叫蒋家坝的美丽的峡谷中,蒋家坝意即蒋家的谷地或原野。它离大足四五法里,离每个村庄和甚至每条路都是 1 法里半。这里是群山环抱的峡谷,群山中有几座比较高的山;峡谷中有许多绿树成荫的小丘。一望无际和高低不齐的丘陵格外引人注目,与群山相连,其山脉分支构成许多壮观的山谷。人们在平原上种植水稻;茁壮的秧苗泛起一层层绿波,使整个平原都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无数的小丘陵就好像是这大海中的群岛。夏天,到处是一片丰收的景象,无一寸不毛之地。山上,人们种植有小麦、蔬菜、果树,特别是油桐树(桐子树)。到了鲜花盛开之季,满山遍野都披上了鲜艳的盛装,人们仿佛置身于一个美丽的花园之中。

我住的教堂住院位于峡谷的深处,住院后面是我刚向你们讲到的那个山脉分支。主持这个县教务的李国先生就任之前,我就在这里度过了在中国旅居的前六个月。正是在 1867 年圣灵降灵节之际,李国先生来到了彭水。我负责的那个县幅员不太辽阔(其直径几乎只有 15 法里),但那里的基督徒却很多,经常领受圣事者达 1000 人,还不包括新基督徒和孩子。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地生疏的人来说,这是一项比较艰巨的工作。我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巡视了这个县的全部祈祷处。

休息一个星期后,我又启程了。封斋期中间,我来到一个有 500 多名基督徒的大祈祷处。我在这里患了一场病。后来,我就利用病后恢复期绘制了一份该地区的地图。

一回到我主要的祈祷处龙水镇,我就又继续并结束了钟楼的工程。你们听说是一个钟楼而不是教堂后也许会感到惊奇,但事情

就是如此。玛弼乐先生在大足已任职数年,由于他精力充沛,并且又善于与人交往,所以他把为龙水镇祈祷处铸钟的想法告诉了他的基督徒。他自己支付了一部分费用,余下的费用由捐助款开支。

根据玛弼乐先生的资料,铸钟成功了。大家都赞叹不已。而且还有许多东西:一座 200 多斤重的大钟,人们敲响三声钟,召集基督徒来做弥撒,这是前所未闻的事情。人们刚开始时曾担心这会引起异教徒的敌意,可事情恰恰相反。由于有了这口大钟,他们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做饭了,因为大钟每天准时在 12 点钟敲响。它也被用来作为“闹钟”,因为三声钟敲响时便是白天的开始,一切活动都开始了。此外,这同一口钟制约周围所有和尚们的行动规律。村子里有三、四座寺庙,过去每座寺庙的和尚早晚都习惯击鼓或打大筒子。现在,他们一听到早上和晚上的三声钟敲响,就开始击鼓。不久,龙水镇的大钟就在这个地区广有名气了。

但是大钟还只是安放在一个临时的屋架上,故必须为它找一个确定的令人敬仰的地方。玛弼乐先生绘制了钟楼的平面图。当他刚要开始这些工作时,却启程赴酉阳了,因为那里殉教者在等待着他。他在酉阳时也没有忘记钟楼,迫不急待地催促着他的继任者中国司铎,以至于后者很快着手开始了钟楼的建造工作。但是钱很快就花完了。人们又开始设法筹集费用,搜集了一些钱。第二年,李国先生接替了这位中国司铎,他把自己的钱拿来用于钟楼的建造。钟楼成功地建造起来了,最后还剩下屋顶没完工,只须暂时覆盖一些瓦就可以了。

当事态发展到这种程度时,李国先生把对该县的教务管理工作交给我,他去酉阳了。去年春天,一场飓风卷走了钟楼的大部分脊瓦。我请求赔偿损失。事情谈妥了,已开始工作。一个月以后,修葺和竣工的钟楼得到了普遍的赞扬。

钟楼建在村庄最高的一个地方。这是一个极简单的木制六角形的小楼阁，它有三层，具有中国风格，也就是说每层都有装饰漂亮的屋顶。小教堂上有一支用陶土制成的箭矢，箭头上装有一个漂亮的十字架。从远处看，十字架闪光发亮，光彩夺目。在屋顶上面的六条尖脊上和箭矢下部，有六个天使拜倒在十字架前。再往下是另外六个用长枪武装的天使，威胁着用嘴叼住六条尖脊顶端的六条龙。下面两个屋顶每条脊端也各有一条龙。这尚不算完；你们再看看窗户，上面雕着一些花卉，画着一些飞鸟。一旦进入底层大厅，你便可以看到顶棚上画有朝拜初生耶稣的三博士。对于一个中国人，也就是对于一个异教徒中国人来说，画得已经相当不错了。现在龙水镇的钟楼是我们基督教徒的光荣，是全体人民的珍贵物。它尤其是我们两位殉教者——这一创举的真正创办者玛弼乐先生和李国先生的纪念碑。

在这座纪念碑旁边建有一座教堂，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代替教堂的一个大棚。现在的问题是重建之，以使之成为一座可与钟楼相媲美的教堂。

在听我谈论这些肤浅的论证时，你们也许会想，这一切在仇教一直很猖獗的地区能行吗？我回答说，当地的仇教确实一直未断，时而发生在这里，时而爆发在另一个地方。哪里平静下来，我们就在那里鼓足勇气加倍活动。此外，应该指出的是除了少数例外，人民对我们还是较有好感的。我们的敌人除了文人还是文人，如果他们没感到有官员的支持，那么他们是不敢攻击我们的。一切祸根都来自官员。如果他们好，那一切都好极了；如果他们坏，那么他们就怂恿文士同基督教徒无理取闹。诉讼案、民众骚动都出自他们，不公正的行为和交战也祸出于此。下面是全部仇教行动的计划。

在大足县有很多基督徒，他们都是老基督徒。异教徒和基督徒

都习惯在一起生活,而且相处融洽。再说,官员们也并不令人讨厌。我曾有机会会见的现任文职官员为人正直,主持公道,不抽鸦片,他根据健康的理智原则为人处事,很尊重基督教。在我离开以后,他甚至于其家人的面前称赞基督教,而且还决定让两个人参加基督教。军事长官则是一个伊斯兰教徒。不过,伊斯兰教徒和我们亲如兄弟,他们声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姊妹教,我们完全赞同他的看法。第二位官员已有 80 岁了,他也同样对我们很有好感。我送给他几本论述宗教的书。他高兴地阅读了这些书。他认为这种教义甚佳,他希望能和衙门中的几位基督教徒对这个问题进行交谈,而且他声称自己很希望他那个不务正业的儿子加入基督教,以让他改邪归正。但他自己却不打算做一名基督徒。

和这样一些官员在一起,我们完全可以允许自己对某些基督教生活有所表露。不幸的是,并非所有地方都这样。在这方面,我们只有在少数地方才能感到如同在大足一样的安全。譬如在与大足相邻的城市荣昌,去年就发生了至今还未结束的骚乱,那里的官员一直是我们公开的敌人。我们在一个曾经没有一个基督徒的地方开辟了一个祈祷处,不久,我们就在那里吸收了近 200 名新教徒。那里住着一个文人,他曾经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表现出过其仇教情绪。看到一些基督徒定居在这个村子时,他便大发雷霆。他首先发表文章,极力诽谤和中伤基督徒。全县的民团聚集起来,准备歼灭基督徒。多亏了好心的军事官员的努力,才使这些不信上帝者冷静下来。道台(即重庆的知府)颁发了一道和解的命令。

就在这时候,荣昌的官员被调任了。他的继任者更坏,此人不但没有发布道台的命令,而且还煽动我们的敌人反对我们。主持该县教务的蓝德银(Landes)先生揭露了企图杀害或驱逐基督徒们的一场阴谋。他去找官府,要求官员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作出解释。

那一天,与阴谋有关的所有人正好都在衙门。蓝德银先生当着他们的面质问官员为什么不服从道台,为什么不张贴道台的告示。该官员显得十分尴尬,使得所有在场的人都笑了。蓝德银先生陈述了所发生的一切,列举了谋反者的名字,并告诉官员说如果他不马上使一切都恢复秩序,那就要向上级政府部门上诉。这就使事情发生了突变。大家以对传教士们的蔑视和嘲讽的态度接待了他们,当蓝德银先生即将离去时,他们都一直在发抖。这些都是发生在我离开大足县的同时刻的事情,我不知道事情现在发展到了什么地步。

我接着再继续我的报道。去年9月,我又开始走访大足县。主教大人要我对基督徒进行调查登记。我想对全部人口进行一次普查,至少进行一次粗略的普查。一次有利的时机出现了。官员为了检阅民团团体而跑遍了所有的商业中心。我在各处进行了普查,下面就是普查的结果。全县大约有900个居住中心,每个中心平均至少有200户。总共有18万户。村镇、城市中每户一般有4口人,农村每户一般有8口人,平均计算每户为5口人。这样,一个方圆15法里的地区就有90万人口。根据我的普查看,我认为这些数字并不十分准确,我想把这个数字提高到100万更为合适。如果全中国也按同一比例计算,那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又怎么能养活如此多的人呢?中国人不会不懂得土地的开发和利用,所有的土地都种上庄稼。包括那些似乎难以走进的地方在内,到处是一片绿油油。这样的土地可以变得很肥沃,这里有百分之十的地方很容易被改良过来。啊!要是—一个基督教地区,该是多美啊!但为了达到此目的,我们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在这人口众多的地方,仅能找到2000基督徒。你们可以再想办法招收一些新传教士。

外方传教会林神父致贵州宗座代牧主教胡缚理的书简^①

1870年8月3日于贵阳府

主教大人阁下：

大人最近得知遵义府^②和附近基督教会口的一些不幸消息。任国柱(Vielmon)先生已数次给你去信谈到了这些情况。知县的衙门,或者更恰当地说我们的监牢既没有笔,又没有纸,要给你们写信是很不容易的。今天,我刚一回到贵阳,刚从疲劳中恢复过来,就马上来补救这一疏忽。

从在遵义府讲道开始,这座城市的几位显要人物便勉强承认了基督教在他们那里的迅速发展。他们说,他们不能毫不担心地看着这些欧洲人在他们那里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他们表现出了一些敌对情绪。去年农历二月,他们曾试图发动一次政变。今年农历三月,他们又一次准备煽动居民造反以反对我们,但时机尚不成熟。五月初五(西历6月14日),时机终于来到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异教徒给他们创造了这样的机会。

那一天,在城市里的一座大寺庙里庆祝节日。在场的异教徒很多,而且在他们中间还有一名新基督徒。另一个基督徒由于感情冲动,也可能是由于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的唆使而想把一名褻渎宗教的新教徒从寺庙中叫出来。这是一次有准备的行动。所有的异教徒都向一位过分虔诚的基督徒冲了过来,并对他进行拳打脚踢。一大群带有事先准备好大棒等武器的人立刻向我们的设施乃至基督徒的住院猛冲过去。我们的一些人、修道院的修女、圣婴堂的孩子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42卷,1870年。——译者。

② 遵义府地处贵州省,但在和四川交界的省界线上。

都被驱散到城里了。几天以前，任国柱先生和赵修士一直与我在一起。现在我们三人各向一方逃跑了，并且就躲藏在邻近的房子里。

赵先生几乎马上就被他避难家庭的异教徒出卖了。他被送到敌人那里，并被屈辱性地从城市一些街道上拖走。敌人辱骂他，殴打他。如果他没有强健的身体，那恐怕就要被他们毒打致死了。敌人把他带到骚乱发生之地的寺庙里。当我落入异教徒之手时，有一天赵修士对我说道：“我曾有过片刻的害怕。但是我刚感觉被带到这座庙宇时，我想到他们由于对宗教的仇恨和要挽回他们侮辱偶像的过错而把我杀害在那里时，我就很高兴等待着我的命运。”结果这个希望落空了，因为寺庙的大门仍然紧闭着。

敌人抓住他的长头发又把他拖往教堂。

“宗教的大师，”敌人一边打他一边向他喊道，“现在你念圣母经吧！”

接着他们粗鲁地辱骂着宗教和传教士。那时有几个官员早已来到教堂，慢慢地把纠集起来的人轰赶出来。当赵教士来到寺庙时天已经黑了。刽子手们发现知府也在人群中，他们随即意识到其手中的牺牲者将会逃脱出去。盛怒之下，知府的一个衙役甚至当着官员的面竭尽全力向赵教士的头猛击一拳。由于反冲力的作用，官员的顶子也掉下来了。然而，罪犯竟然没有遭受谴责。在混乱中，赵教士逃脱出来，躲避到另一个官员的旁边去了。胡缚理先生也刚刚来到那里，我趁天黑之机和我的两位同伴重聚了。

对于官员们来说，要采取措施制止事态不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是很容易的。但他们不是想反对城市中显要人物的决定，而是要摆脱基督教，因此他们决定听凭百姓为所欲为。故此，第二天所有的东西都被抢劫一空。为了使我们从人群的狂怒之中摆脱出来，知县把我们三人都带到他的衙门去了。我们的敌人可以自由行

动了。不一会儿,教堂、药房、圣婴堂的设施都被洗劫一空,全遭毁坏。到了晚上,建筑物都被夷为平地,只剩下唯一一块木板了,甚至连石头和砖块都被搬走了。参加抢劫的第一批人是知州和知县的衙役和城市里的士兵。

圣婴堂许多孩子都被剥光了衣服,就这样来到了贵阳府。损失是巨大的。由于从遵义府到贵阳府的旅途很艰苦,所以他们把传教区的许多东西都交给我们保管,遵义的住院被认为是很安全的,所以邻近的一些传教士也都自愿把他们所有的最漂亮的祭披、圣餐杯、圣体盒等东西委托给我们保管。但我们却未能保全任何东西。

城里的一些基督徒中那些没有背教的人都遭抢劫,全被驱赶出去。在农村,唯有一部分被那些不希望他们弃教的朋友保护下来的人除外,其余的人也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谁都不愿意收留这些人,他们所受的苦难是极其悲惨的。遵义的官员们不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这些罪恶行径,他们一直只是在口头上说些好话。城里的显要人物仍无拘无束地继续进行破坏,直至把他们的破坏劣行坚持到底。在这次不幸的事件中,可能有上千户人家被抢劫,有15名基督徒被杀害,受伤人数还不清楚。仅仅在任国柱先生不久前讲道的遵义城西部的一个区西乡,就有数户人家的七名基督徒被异教徒杀害。荣昌的一个行洗礼者被碎尸后投入河水里。这个小小的基督教会口是最有希望的基督教会口之一,它就这样遭到了严重破坏。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呆在知县的衙门里。我们在这里每天都能听到一些来自城市和农村的不幸消息,但我们除了祈祷以外就不能做其它事情了。我们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晚上,有时都会感到惊慌,这是老百姓为了把我们官员的保护下夺走并且杀害我们而乱哄哄地涌向他家闹事所致。最后,在度过了一个月如同监牢般的生活之后,我们必须离开遵义城,由数位官员和相当多的

营勇护送,我们于7月20日才安全抵达贵阳府,来到为我们生命而忧心忡忡的同伴身边。

我们又平安重聚在一起的喜悦使我们很快就忘却了疲劳。但这种喜悦并不是完全无忧无虑的。因为赵教士于6月14日遭受毒打和虐待后,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在衙门中,我们请来了自己的药剂师,但服药后仍无效果。他一直顽强地忍受着,每当我向他询问有关他被打致伤的情况时,他总是请求我不要探听这方面的情况。

我的书简写完了。阁下!我和遵义府的基督徒都希望得到你的祈祷。

主教大人,请相信我。

你谦卑的仆人教廷传教士林神父(Bouchad)

10天以后,8月14日,任国柱先生向胡缚理主教阁下写了下面这样一封书简:

· 昨天,赵教士已经结束了他于6月14日开始在遵义府所忍受的苦难。

经过一个多月的监禁生活以后,赵教士来到贵阳和他的同伴重逢的兴奋使他忘记了伤口的疼痛。一时间,我们认为由于大家的照料,才使他脱离了危险。在遵义时,敌人向他的颌骨猛击了几掌,使他张开嘴以后在没有手扶的帮助下就无法合拢了。疼痛迅速加剧。几天以后,他就变得令人更加担忧了。赵教士自己懂得自己的处境,根据自己对病情的了解,他打算进行死前的准备。

是我为他举行临终圣事。我是易神父(Guichard)和文瑟纳(Gréa)先生的助手。病人清楚地回答了礼拜仪式上的所有祷告。在我帮助他用短短的言辞向上帝和这些最后的恩德表示感谢后,他用一种难以表达的满意心情对我说:“我想要死了!”星期五,他

几次表现出死去的愿望,为的是尽可能早地利用安息日宽恕的权力。他的这些心愿如愿以偿了。8月13日星期五晚上九点半,赵教士(M. Pierre-Etienne-Amédée Gilles)即将得到属于那些为宗教而殉身的人所有的报偿。祝愿这次长时期的折磨能使上帝息怒,能消除使我们传教区难以忍受的痛苦!

在遵义府,敌人一直追捕基督徒,而这次却是前所未闻的穷凶极恶。人们在一座大寺庙的路面上镶嵌了一个带三个彩釉瓷制十字架,偶像前面铺着红地毯。基督徒穿着他们的礼服必须踩在十字架上走过去,拜倒在偶像前,而且还要庄严宣誓永远背弃基督教。敌人接着又要他们签署一份证明他们弃教的字据。他们还必须蘸墨在字据上按手印,而不是盖印章,然后张贴在城里。那些不愿答应这些要求的基督徒就必须离开此地或者被处死。虔诚的人们为我们祈祷吧!

我不断向地方政府提出要求,然而却毫无结果。我刚刚向我们在北京的公使馆提供了全部情况。因为公使馆需要这些资料,以就赵教士之死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

赵教士于1829年4月1日出生在瓦尔里亚斯(阿维尼翁教区)。在基督教学校修士院学了数年后,于1854年进入阿维尼翁大神学院,1859年举行派立礼而成为神父。他开始时在阿维尼翁一所小神学院任教,后来成为萨瓦杨的本堂神父,1864年9月20日被接收参加巴黎外方传教会。第二年9月19日,他于马赛港登船启程赴川东宗座代牧区。1868年12月获准前往贵州。从此时起,赵教士就一直在遵义府的站口。

任国柱先生在7月20日从贵阳府写来的另一封书简谈到了我们转载的有关遵义府事件的详细情况:

遵义府教案变得更加猛烈了;绅士(显要人物)和一些权威人

士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没收了教堂和基督徒们的教产。他们把我们建造慈善机构的那块地盘挖掘了几米深,然后和煤混合在一起卖掉,为的是用火来净化土地。他们声称,因为在遵义府不能留下任何由于基督徒的接触而受玷污的东西。绅士们和那些被他们牵着鼻子走的人说他们既不要欧洲人,也不要基督徒和教堂。

这次仇教行动不是民众闹事,而是具有官方特征的行动。带领抢劫的是一些衙役和兵勇。他们以“同治(皇帝)灭教”的名义带领一帮专事破坏的匪徒去农村进行破坏。那些在逃跑中没能得救的人都遭受这帮狂暴之徒们的毒打。在遵义府这块如此有希望的土地上,已经洒有 12 个殉教者的鲜血了。

许多基督徒都逃避到我们这里,另外有许多人抛弃他们在贵州的财产后躲避到四川或其他省份去了。我们遵义府孤儿院的男童都被收留在贵阳。女婴则都躲避在基督徒官员孟氏和谢氏家中。她们化装成女官就可以去贵阳,就这样她们幸运地到达那里。

我不断地向巡抚曾璧光提出请求,以便能得到恢复和平的命令,但是毫无结果。他授命一个道台审理遵义府事件。这位道台是主要罪犯的朋友,他郑重其事地提出了下面这样一个方案:他说:“因为正是这位名叫杨希伯的基督徒导致了这次仇教事件的爆发,他把一个新教徒从寺庙里抢了出来,因而使寺庙里引起了混乱,错误是由基督徒一方造成的。他们应该自食其果,而不必去要求赔偿他们所遭受的损失。”

基督教徒杨希伯确实来到寺庙并带走了一个新教徒,当时有 300 多个异教徒早已集聚在那里,但这只是异教徒们为执行他们长期以来就已制订的计划的一种借口。因为城市和农村同时都发生了抢劫事件,这就证明了一切都是预先策划好的。杨希伯被关进监狱,这是因为敌人想把这一严重事件的责任都推卸到他身上。为

了更好地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又砸坏了寺庙的几尊偶像,杨希伯又被指控为这种破坏行为的肇事者。一名道台官员是熟悉国家法律的,他清楚地知道有12名基督徒被杀害,许许多多的人受伤,上千户人家破产,居然还敢要求基督徒放弃恢复他们权力的一切要求!这就是他的真面目!

巡抚本人也劝我接受道台的建议,当我要求他在北京的命令下达之前发表一项恢复和平的命令时,他嘲讽地回答我说:“他们要做什么?皇帝自己是不会来亲自处理这些事的,一切都要经我们处理。”然后,他加重了其讲话的语气,要求我不要因拒绝而使我在全省童生会试之际遭受几乎不可避免的新灾难。

他的这一席讲话并未能吓唬住我,但它们却使那些曾经护送我前往巡抚家的人感到惴惴不安。我现在处在这样一种不能逃避的境况中。对于我来说,逃跑和死亡一样不利。于是我老老实实地留在岗位上,我的职责也要求我留在那里。我非常用心地把所有这些详细情况写信告知我们公使馆,为的是一旦我被处死后,他们可以知道这些事情应归咎于谁了。

去年9月23日,有人致书于我们说,对于任何一个外国人都一样。如果不践踏十字架就不能在遵义府县通行,而且在仇教之前600名营勇早已把基督徒种植的水稻收割完了。

中国传教区的综合报道^①

—

几年以来,我们的《年鉴》中几乎没有有一期不刊载在中华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42卷,1870年。——译者。

帝国所发生的殉教事件或仇教的报道。然而，对条约的这些令人生气的残暴践踏从未有过在去年6月在天津才发生的那种残忍程度。众所周知，天津城位于离大海12法里和离北京24法里的地方，它是委托给辣匝禄圣—昧增爵(Saint-Lazare)，修会田嘉璧(Delaplace)主教阁下的北直隶宗座代牧区的一部分。正是在那里，在法国驻北京代表机构附近，为法国国旗而发生了谋凶事件，大家将会读到这些谋杀案的报道。我们将从上海传教区司库勒莫尼埃(Lemonnier)先生于7月6日写给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的院长先生们的一封书简中摘录有关这一教案的报道。我们将把在中国发表于英文报纸上的一些摘录补充进去。

勒莫尼埃先生写道，由英国邮车带来的一些电报和报纸将已使你们了解天津教案。最近的某些详细的报道使我们得知，它们和大家试图得到的第一批消息一样令人悲痛和愤慨。

去年6月21日，常驻天津的所有法国官员(无论男女，可能有一、两个人除外)，确实在大白天(早上九点至下午五点)都被杀害。遇难者计有：法国领事丰大业(Fontanier)先生和他的翻译西蒙(Simon)先生；从法国到北京的公使馆管事多玛三(Thomassin)先生，他和他年轻的妻子为在天津拜访其朋友领事先生而滞留于天津；遣使会会士的司库、修道院院长谢福音(Chevrier)先生和遣使会的一位中国司铎；圣—昧增爵会的10个修女；在天津的商人沙尔昧松(Chalmaison)先生及其夫人。此外，还有三位俄国常驻官员被群氓当作法国人杀害了。在这份名单上，我们还需要加上法国领事馆和遣使会会士司库处的所有仆人，仁慈堂慈善机构所雇佣的全体人员，100多名孤儿被活活烧死在修女院内，最后还有人数不明但数量可观的一批

基督徒。然而，你们对天津可怕的大屠杀将只能有一种不全面的看法。

大屠杀的详情细节更令人不寒而栗。法国领事的头颅和面庞布满了伤痕，胸部被长枪刺穿；西蒙先生被伤残到了无法辨认的程度；多玛三先生的头部、脸部和全身都被支解得很可怕，肚子还裂开着；他的妻子被大狼牙棒打死；谢福音院长先生的脑袋被打碎，胸部和腹部都裂开了。圣一味增爵的修女们被他们采用难以想象的野蛮方式处死了，她们被活生生地挖掉眼睛，割下乳房，还惨遭群氓们的奸污。

听到发出信号的铜锣声后，这场骇人听闻的屠杀按时结束。当法国人被杀光斩尽时，撤退锣声响起，执行者很有秩序地撤回住地。一些官员和他们的仆从、这场流血惨案的目击者只是在发布命令时才在那里露面。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天津的所有电讯都证实了这一事件。法国领事馆、大教堂和仁慈堂的所有慈善机构都被放火烧毁而变成一堆废墟，类似的情况就无须再补充了。

基本舆论认为天津事件只不过是官员们为了摆脱“夷人”而准备在全帝国演出一台大悲剧的第一幕。在一些分布于长江流域沿岸有欧洲人居住的城市里，一个月来不断发生局部的骚乱和混乱，这一切使人对于他们在北方开始进攻的真正目标几乎不容置疑了。所以，我很担心我们在内地的教友们。他们在这些遥远的地方会采取什么预防措施呢，难道只能抛弃这些地方，没有任何力所能使用的自卫手段，而听凭敌视的官员和一直准备进行抢劫的一群盲目轻率的群氓的摆布吗？

下面是仁慈的 10 位修女的名字：伊丽莎白·马盖(Elisabeth Marguet)会长，比利时人；若瑟·亚当(Joséphine Adarn)，同上；

维克多·阿德雷奥尼(Victoire Andreoni),意大利人;玛丽·克拉夫琳(Marie Clavelin),法国人;合蕾丝·勒怒(Thérèse Lenu),法国人(来自巴黎);范尚·勒格拉斯(Vincent Legras),法国人(来自巴黎);奥雷莉·勒泰利耶(Aurélie Letellier),法国人;欧仁妮·帕维雍(Eugénie Pavillon),法国人;路易丝·维奥莱(Louise Viollet),法国人(来自图尔);路易丝·奥苏莉婉(Louise O'Sullivan),爱尔兰人。前九人是一个接一个地按照前面已说过的办法被杀害的。《华北新日报》补充说,敌人把她们的心的挖出来,碎尸以后分给衙役们。如果相信《纽约自由报》的报道,第10个是路易丝·奥苏莉婉,她在大规模屠杀时逃到城市中一富商家去了。四个小时后,在返回传教区慈善机构时,由于脚上穿着欧洲式样的鞋而被敌人识破并被逮了。她遭受了同样的酷刑,并与其同伴一样被奸污。两天以后,她的尸体才在河里被找到。

谢福音先生一直和一位中国司铎胡万桑(Vincent Hu)在维多利亚圣母院(Notre-Dame-des-Victoires)祈祷,当杀害丰大业先生和躲避在领事馆的一些法国人的凶手向他们猛冲过来时,他们两个人都做好了殉职的准备。他们被拖到教堂外面,如同前文所述那样被杀害了。敌人把谢福音先生的尸体抛在河里,第二天我们在那里找到了。

7月11日,《上海晚报》报道的如下详细情况是由该报驻天津的一位记者向这家报纸提供的。人们将可以看到中国当局在这次预谋已久的攻击中表现得是多么的折衷。

6月22日,能够证明中国人方面的有意策划阴谋的是我的一些在离杀人现场两古罗马里多远地方干活的人,他们看着火灾对我说:“英国人一点也不用害怕,中国人只跟法国人过不去。”然而就在这天早上,人们看见在新教教堂的钟楼上有一个身带炸弹的

中国人，这无疑是要烧毁建筑物。就在这同一天，人们突然发现另一个衣袖里藏有一支手枪的中国人。

6月23日，被杀害的俄国人一个名叫博罗特颇福(Protopopoff)，另一个名叫巴索夫(Bazoff)。博罗特颇福刚刚十分高兴地举行完自己的婚礼。年轻的新娘仅有16岁。

几个遇难者的尸体已被抛到河里去了。人们根据衣服上姓名的开头声母H·F·辨认出了法国领事丰大业先生。

在帝国的许多地方，在内地都张贴有一些告示，告示上向人民指出了大家称之为“天主教”的“劣行”。

6月24日，人们在河里找到了一具中国女尸，她的打扮使人把她当成了一个天主教徒，他们认为她是在仁慈堂这个慈善机构授课。她的尸体被殴打得遍体鳞伤。

6月27日，中国人得知将要发生事端的另一个证据，这就是几天以来，家长早已领回了自己的孩子。450人中几乎只剩下200人了。此外，附近一带的某些商人由于害怕即将发生的事端，早已抛弃他们的房屋逃走了。

城市的首席官员知府早已发布了一项旨在煽动人民反对外国人的声明。6月18日，即大屠杀的三天前，法国领事已提醒崇厚(地方长官)对这项引起城市中重大混乱的声明给予注意。20日和21日，他又提出了另外两项要求，但都没有得到答复。

虽然尚无一名新教教徒被杀害，已有几人被打伤，并且还抢劫了他们的住院。后来，中国人又表示要把从他们这里拿走的东西物归原主。当时其人数达500人的兵弁一直在这混乱不堪的现场，但有人说即使他们来这里了，他们也不会对此做出任何制止。

另一家报纸《华北新日报》对法国领事之死叙述得清清楚楚。

丰大业先生本人受到了威胁，他的窗玻璃被石头砸碎了，又穿

着军装走出了屋子。他叫一个小官员(此人负责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而又不妨碍之)陪他来到崇厚的衙门,他要求人们对领事馆、对领事馆的人员以及他本人的人身进行保护。这位领事还要求巡抚保护慈善堂的修女和她们的住处,因为他早已听说仁慈修女的处境也很危险。崇厚回答说无权保护刚才向他提到的任何人。领事仍坚持他的意见,因为他手持一支手枪,崇厚出于害怕而突然跑出去了。

于是法国领事又去找另一位官员,这位官员回答说不能给领事任何援助。这次遭拒绝之后,随即就发生了一场争吵。在争吵中,衙门的一个兵弁用矛枪刺了法国领事一下,结果致使其大腿受伤。当他感觉到疼痛时,鲜血已渗透了他的衣服,丰大业先生来到衙门大门并要求让他出去。兵弁和人群似乎觉得有点害怕;但只是一瞬间的害怕。顷刻之后,他们马上向不幸的领事猛扑过去,他们用矛枪刺他,用大刀砍他。在将他令人恐怖的致残之后,就把他的尸体扔到河里去了。

下面是摘自同一家报纸的详细报道:

沙尔味松先生得知敌人进攻仁慈修女时,便急忙向她们的住处跑去保护她们。但他在街上就被抓了,并且被碎尸。听到这一消息后,其夫人逃到一个中国女基督教徒家中,一直躲到黑夜。后来,她化装成一个中国妇女,冒险出去寻找她丈夫的尸体。经过一番一无所获的寻找后,她想再逃到女基督教徒的家中去。但是崇厚短枪队中的兵弁认出了她,并把她杀死在街上了。

在同一次骚乱期间,敌人还杀害了50名中国土著人,因为他们被怀疑与欧洲人互相勾结。

天津一直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在连续几天的时间里,人们要求崇厚采取必要措施,但他仍然不予答复。

这次损害如此之大的暴动完全应该归咎于他，因为他和刽子手们勾结在一起，他将要受到应有的惩罚。

法国对朝鲜的远征于 1866 年结束的方式是不容置疑的，而在杀害两位主教和七位司铎之后，如果不对朝鲜政府进行惩罚，那就只能对法国在中国的影响造成极大损害。中国人见到朝鲜人杀害了几个法国人后却没有人要求他们赔礼时，就猜想法国同样也会忍受另外的侮辱和新的辱骂。

二

在天津大屠杀的几天以前，在江南首府南京发生了一场反对基督教徒的教案。

尊敬的耶稣会士费赖之(Pfister)神父在 6 月 16 日写给郎怀仁(Languillat)主教大人的书简中讲到，5 月中旬，人们在南京的一条街道上发现了一具年轻人的尸体；后来几天又有几个儿童失踪了。因此，在民众中间产生了极大的不安。人们到处寻找他们，并且还把几个被怀疑是偷孩童的人投进了监牢。在审讯中，犯人提出了天主堂(传教士住院)的名字。敌人问他们是否与基督徒有联系。“——有联系，”他们回答说，“我们是欧洲人派来的，我们有宗教书籍，我们认识天主堂的一些人。”审讯程序很快停止了，带头闹事者马上在民众中进行煽动。这件事持续了好几天。不信上帝者们发怒了，被激怒的大众把我们当作是偷小孩的人，是他们的敌人不让处罚的小偷。官员们眼看我们陷于困境并不感到生气，也许他们为使我们的困境而做出过巨大努力。

就在这时候，道台来看望我们了。他秘密地告诉我们一些攻击我们的谣言以及随之而来的威胁，还向我们谈了囚犯们的控诉等。我们回答说：“鉴于囚犯们指名道姓地向我们提出指控，所以我们

要求和他们对簿公堂。我们要求他们在我们中间指出他们所认识的人,说出这些人什么时候到过天主堂等等。如果在罪犯中有某个应受谴责的基督教徒,那么我们绝不反对根据法律使他如同其他人一样受到惩罚。”官员们在对我们的倾向情绪方面的突然变化来自何处呢?下面就是我的猜想。他们已经听到有关城市暴动计划的风声。实际上,这里有许多富裕的、加入秘密团体而又不喜欢官员的外国人。官员们害怕这些人抓住愤怒的人民向我们扑来的机会而试图推翻他们。

然而,城市的所有街道路面都放置了十字架,布置有人来监视那些不践踏十字架的人。一些送上门来的匿名短信把必须要做的事告诉给民众。我们听到有来自各方面的一些可怕谣言:“今天晚上有人要来烧死你们。我在一些街道上听说有人会在今天夜里来杀害你们。”有一张告示上写着“必须最终消灭这些偷小孩的欧洲人”等等。我们知道,自从威胁变得严重以来,如果官员们像我所说的那样不为他们自己提心吊胆;如果我们没有过去对道台和江南府的两次拜访而对撤除十字架采取强硬的行动,那么在本月10日和11日就会对欧洲人进行处决。然而,我们在附近的基督教徒不敢进城去,他们受到被逮捕或被杀害的威胁。一个因保护基督徒而犯罪的望教者遭到了残酷的毒打,并且还被判处戴枷数天。

煽动活动越来越猖狂。马制台(马新贻)决定把城市包围起来;每条街上都部署有兵卒站岗。有几人被处决,他们的头被挂在城门上。为了使人民平静下来,总督发表了两项声明。江南府张贴了另一份声明,声明上补充说传教士和基督徒都未犯任何罪行,同时还谴责在街上放置十字架。

声明公布的第二天,知府、2个知县、道台、另外2名官员、5至6个主要乡绅应邀参观我们的住院,他们从地下室看到小阁楼,现

在可以认为住院里没有隐蔽任何可疑的东西了。欧洲式的点心为他们早已准备好了，他们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点心。在那段时间里，我一直守卫着大门，极力阻止激动的人群敲打我们的门房和一个仆人，但未能阻止住他们砸开教堂旁边的门。尽管一些军事部署和告示使秩序稍微有了好转，但骚动还没有结束。有人说：“官员们害怕欧洲人。他们接受了欧洲人的钱，所以要保护他们。”

由于街上布置有军人的岗哨，所以现在街上至少在表面上恢复了平静。这种表面的平静与前几天的威胁相比使我感到更加不安。我认为我们正处在一场大悲剧的第一幕，只有上帝才知道其最后的结局。我倾向于认为这里有一种阴谋，我们的敌人企图煽动民众起来驱逐我们。我们已经得知在7月，然后8月，也就是说在8—9两个月要重新开始对我们进行迫害。

三

去年12月，在江南的安徽，建德县已变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仇教地点。

“将近1869年11月中旬时，”尊敬的耶稣会士金絨三（即金式玉，Seckinger）神父写道，“全建德县的文人都散布谣言说南京（江南首府）总督一直在进行军备以驱逐欧洲人和基督教徒。我们的敌人马上准备他们的武器，决定他们采取的方式和确定实施他们阴谋的日期。然而，他们想为争取我们的望教者进行了最后一次尝试，他们去到各家各户，采用许诺和威胁的手段使望教者重新崇拜偶像。但他们到处都遭到了同样的拒绝。”

那是12月8日，那一天是圣母无玷始胎瞻礼节，是永远都让人牢记的日子，天主教界的所有主教都聚集在罗马，由庇护（Pie）九世主持召开梵蒂冈大会。早上，建德县的山谷深处和山顶上突然

响起了枪声,比平时快一倍的铜锣声中掺杂有喧闹的叫喊声和火枪的射击声。很快人们就看见许多武装精良的匪徒从各个方向涌了出来,他们手里摇动着旗帜,在一些骑马的头目们带领下向前冲去。转眼间,四面八方都升起了滚滚浓烟。

毁灭性的行为开始了。敌人对我们的新教徒进行了抢劫和屠杀,破坏和烧毁他们的住房。下列某些数字就可说明这次野蛮进攻的结果:22个人(大部分为年轻的妇女)不知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2个望教者受伤,另外6人被打并被惨无人道地绑在打教者之家的宅邸^①,200人被驱逐到土地贫乏的不毛之地,一名基督徒和两个孩子被活活烧死,另外两个孩子被杀害。为了对这些遭难者表示悼念,人们自然为他们留下了简短的记载。

新教徒于文宏是一位虔诚的宗教宣传者。收获刚一结束,他就来到南京找我们领圣体,并且请求要带我们去他的故乡帮助异教徒们接受归化。他被抓住以后,敌人企图要他去踩耶稣基督的画像。他的全部答复是跪在耶稣基督的画像前,抗议说他宁死而不亵渎圣像。几分钟以后,他就被拴在其家的一根木桩上,其周围放有许多稻草,敌人然后便点烧了稻草。当敌人捆绑他时,这个勇敢的公开表明信仰的基督教徒对大家表现得很高兴。当敌人要烧死他时,他引用了耶稣和马利亚的名字。在他生命结束的时刻,一团火焰升上天空高处,所有的异教徒在欣赏这一奇景之后都叫了起来:“他升天了!”它为我们的宗教及其殉教者进行了辩解。

我从几位目击者那里得到了这些详细情况。

两个被活活烧死的儿童中有一个是七岁的女童。由于她试图越过凶手们在其父亲住房周围形成的包围圈,结果被他们抓住并

^① 王家是望教者耕种其大部分土地的地主。

把手脚都捆上后扔到火里去了。

另一个牺牲者是一个仅有两个月的小男婴。他的父亲不在家。正在附近一块地里采收蔬菜的母亲发现了坏人，她一跃而起向她那一直安静睡在房前的孩子冲了过去。但歹徒们也向她扑了过去。当坏人拖住她时，他们就从摇篮里把孩子夺了过来并猛摔到火里。

第二天，这些歹徒继续从事他们的愚蠢行动，他们把一个四岁的孩子摔死在其父住房的门坎上。

坏蛋们凶残地毒打着另一个五岁的小孩，直到认为他已死了才罢休。后来，当他苏醒过来后，在垂危中活了三天后就断气了。

这些屠杀的场面一直延续到他们确信在该地区内已不再有基督徒为止。为了防止基督徒的返回，他们在一些主要道路的路口修建了城门，在山谷间设置了路障。他们下令让兵弁和农民去杀掉他们认为是基督教徒的所有人，无论谁交来一颗基督徒的头颅就能有奖赏。12月21日，一个民团在他检查的行人身上发现了念珠，这个行人就因此被残酷地杀害了。

他们获得的战利品的一部分用来支付因为胜利而发狂的打教者每日狂欢酒席的费用。

得知离此 35 里的东部方向处，有另一个望教者的中心后，他们就向那里派去了其匪徒。去年，我们通过殷勤的关切为我们的事业赢得了一个异教徒秀才，他是本县最重要的一个乡绅，他征募了其农户，责令匪徒们退回去。警告是严厉的，而且也得到执行了。匪徒们返回他们的大本营干东坡，并且只能在他们地区的 40 里（23 公里）的范围内进行防卫。

当法国临时代办罗淑亚先生刚刚到达南京时，便有三名来自建德的基督徒去拜见他，向他汇报前述事实。代办先生将与马总督交涉。总督委托江苏大官吏仔细听取我们使者的陈述后，就作出了

暂时减少我们痛苦的允诺。

他告知罗淑亚先生说,他已下令搜查、逮捕和审判罪犯。如果他们杀了人,那就将根据当地法律以命抵命。知县将奉命对殉教者作出特殊抚恤,要保护他们,以便和平能得以保证。

接着总督答应在他管辖的所有城市里要张贴一项告示,提出有公开表明信奉基督教的自由,应该尊重传教士,而且还提出了罪犯应受到的惩罚。

在这段时间里,建德县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的六个望教者被拖到万家的小宅院中,以五天绝对不让吃饭的决定开始他们长期的监禁生活。然后敌人把他们带到 140 里(70 公里)以外的知县监牢,他们必须一口气地走完这段路。押送人员轮换着抢着扬起的鞭子,不停地抽打那些不再能行走的人。敌人还指责囚犯们自己放火烧毁了自己的住院。真好比是昔日古罗马暴君控告基督徒放火烧毁了罗马。敌人为什么不说当时基督徒被指控为放火烧毁了他们自己的住院、他们的修士和他们的孩子呢。

我们还是回头来谈干东坡吧。万家凶残的匪徒们不太满意他们每天所得的报酬,他们在附近一带巡逻,把入侵者一直驱赶到江西。我们的流亡者躲避到安徽和江西边境,焦急地等待着阴知县应允的援助。他们遭到了强盗们的追捕,由于他们在江西基督徒那里也获得了收容和保护,所以这些基督徒也受到了同样的威胁,实际上是遭受了同样的虐待。

1 月 13 日,建德的许多岗哨接到通知说有一位基督徒躲过了他们的监视。确有此事。一个名叫郑成术(Tchen-cheu-sou)的望教者由于饥饿所迫逃跑到他的一个亲戚家。第二天,他躲藏在阁楼里睡觉,快到深夜时,响起了极其痛苦的叫喊声。同一时刻,一些疯狂

之徒破门而入，他们抽打着这一家的居民并把这些人捆绑起来。放在一张铺开的席子旁边的一双湿鞋说明了逃跑者躲在这里了。他们把蜷缩在一个角落里的郑成术拖了出来，凶狠残暴的万可大身上总是佩带两把利刀，他残忍地将此人杀害了。

此人以从未有的疯狂召集了另一伙匪徒，并把他们带到了万家岗村。他们在那里处死了朱田英、他的两个儿子和两个仆人，接着又处死了另一名基督徒，因为他拒绝交出我们的殉教者于文宏的兄弟于文斌。

江西的异教徒们迫不急待地和这些刽子手勾结在一起，使得江西有 80 户人家落得了与我们同样的命运。

在返回大本营的路上，强盗们突然抓住了几个望教者，并把他们的头砍了下来。

在这次仇教的袭击中，安徽已有 11 个新的殉难者，加上江西的 6 个和先前的 6 个，那么这次仇教期间为宗教而殉职的基督徒人数共达 23 人之多。此后，我们又获悉一位母亲累得精疲力尽快要死了，她痛苦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在她那干瘪的胸膛上。我们还听说郑成术的妻子也落入杀害其丈夫的暴徒之手，她那三岁的小女儿因为无人照管而死亡。

……2 月，受拘押者们被递解到南京，他们在那里受尽了折磨。由于在万家小庭院里惨遭酷刑，伤口日趋恶化。本来每天极其菲薄的一份口粮又已减量。再加上房间的狭小，20 名囚犯关押在其中，他们只能以极不舒服的姿势挤在里面，致使 3 人身害重病。

几天以后，病员中有一人使我们感到十分焦急，因此我们为他进行了洗礼。从那以后，他不停地表示要为上帝献出自己的生命，并感谢上帝的仁慈关怀，这一切都使他为宗教而献身。这位基督徒名叫吴子昆。4 月 11 日，他已垂危了。狱卒们向道台作了汇报，

道台把他运送到地保家。12日,我们的一些传道士对地保说要去看望病人;结果他们被地保粗暴地打发回来了。于是我们便向道台提出拥有去看望吴子昆的权力要求。具体奉命办事的人只在晚上才来。道台的信中说基督徒已经死亡,但他得到了一切可能的照顾。我们从一些私人获得的消息中得知,道台的一个仆从探望吴子昆后,当着其他一些囚犯说:“如果他死了,那只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们都死了,那才是最好的了。”由于一些狱卒们有些迷信思想,所以他们要求不要让一个垂死的人死在这个监牢里。地保接到了把吴子昆转移到别处去的命令。于是他把基督徒吴氏扔到城隍庙门口的院子里,后来这位公开表明信仰的基督教徒就在夜晚死在院子里了。家里还留下一个寡妇、3个孩子和他的72岁的老父亲。

4个月英勇的监禁生活之后,为保护宗教而反对弃教者的圈套,基督教徒们还有许多事要做,经过尊敬的金铨三神父4个月坚持不懈的活动,我们的正当权利终于获得了承认,虽然已为时太晚和很不完全。

5月6日,尊敬的金铨三神父说,道台通知我们说,将宣布释放犯人。我们赶到公堂去了。师公宣布被起诉的基督徒完全无罪,宣布释放他们,并且要求知县为他们返回建德而准备所必需的一切东西,退还他们的全部财产。

教训是有益的。愿上帝能从中受益!基督教徒们高兴得跳了起来,他们向我们介绍这些由于缺吃少穿和种种折磨而使面容憔悴的囚犯。但在我们看来,他们光荣的伤痕则使他们变得更美。他们的高兴使我们想起了一些最早的基督徒和使徒们的高兴。他们从衙门里出来时充满了喜悦,因为他们被认为是以耶稣的名义而蒙受耻辱的。

5月14日星期六,官员们把主犯押送到建德,因为后者自己

要急于去做重新安顿基督教徒的准备。他要官员们提供一些小船把获释的基督徒送往建德。这些小船上悬挂着画有十字架的三色旗。他们在经过的路上宣告了法国和基督教对异教的胜利。

贵州传教区的综合报道^①

在贵州就如同在中华帝国的大部分其他省份中一样,对于基督徒们的欺压和粗暴行为仍在继续发展,而中国政府又似乎对此未加制止。大家可以通过传教士书简中的下述摘录来对此作出判断。

1870年3月10日,任国柱会士曾致信当时正在罗马的贵州宗座代牧胡缚理大人说:

“贵州确实是一片战场,在那里很容易赢得胜利的荣誉。在我向大人写这封书简的时候,布沙尔(Lebrun)先生可能已经手捧金棕榈^②了。

该传教士应该从桐梓前往贵阳。我让人询问巡抚曾璧光是否能让他取道经由遵义的路前来。巡抚令人通过一封正式信件(我已作为证据而把它保留下来了)而回答我说,官吏们已奉命有效地保护布沙尔会士。

过去,这同一位曾璧光曾让人向我通报了他向官吏们下达的命令。但这一次,他却对其命令严加保密。如果大家可以通过结果来判断的话,那么这一切都是事出有因的。

在遵义和湘江之间,有一个叫作新站(新站铺)的村庄。在该月5日天刚亮时,有30多个全副武装的人冲开了客店的大门,抓住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43卷,1871年。——译者。

^② 即 palme,意指获得最高的胜利和光荣。——译者。

了该传教士，剥掉了他的衣服并反复以重棒拷打他，满口喷出了最为恶毒的诅咒语言。布沙尔会士再也无法行走了。当恶徒们追捕其随从人员时，迫使他们在毫无保护能力的情况下，将几乎濒于死亡的传教士拱手相送其敌人。布沙尔会士手下的人于翌日返回这片洒满血泊的场地时，便再未获得有关该传教士的任何消息。

我立即向巡抚提出书面诉状，他对于这一教案并不比对其它所有教案更重视多少。

曾璧光在他以其不可调和的仇恨如此这般地追究基督教的行为时，可能坚信自己不会受到惩处，而这些做法又都是蔑视条约以及他从其政府那里获得的经反复强调的命令。我们必须承认，那些似乎是敦促他处理我们教案的命令并不是非常严肃的。因为若非如此，皇帝则本来可以使一名在如此之长的时间内违抗其诏令的官吏遭受贬职处分。

对于我们这些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们来说，我们只会对于自己与其他会士们分享贵州而感到高兴。因为这片非常珍贵和长期经受了仇教考验的土地必然会产生丰硕的拯救成果。我们的保证依据是从全局各省各地传给我们的对传教士们要求。”

幸运的是，任国柱会士在有关布沙尔神父问题上的担忧，未能成为现实。法国驻北京的公使罗淑亚公爵先生于数日之后向外方传教会在上海的司库林多默(Lemonnier)宣布说，布沙尔会士遭到了污辱和毒打，但他们得以安然无恙地到达了贵阳府。

任国柱会士本人也于1870年3月21日致信胡缚理主教大人：

“我非常高兴地向大人宣布说，布沙尔会士最终被找到了。在新站虐待他的那些武装人员，把他作为一名作恶者而将之带到了桐梓。他完全疲惫不堪了。上帝希望我不会被迫向您宣布说，他继

续遭受野蛮对待之后而死去了。

正如非常容易地预见到的那样,巡抚曾璧光为这一教案所做
的事并不比对其他所有教案做得更多。他甚至还不屑于答复我于
本月 8 日致他的书信。

我害怕在不断地向公使馆写信时过分烦扰他了,让曾璧光改
变态度是必不可缺的。中国政府对于将该官吏仍留任于原职位上
的顽固态度,可能已向法国公使证明,曾璧光的行为已在北京得到
了认可和批准。我从未见过贵州当局使用如此之多的欺诈奸计。我
希望最终会使真相大白于天下,这些很不称职的官吏们将会因我
们的教案而处于狼狈不堪的窘境。

我并不为受苦难而感到厌倦,因为受苦难本来就是传教士们
的天命。但基督徒们所受的磨难使我感到非常痛苦。自九个月以
来,共有 1000 多个家庭处于缺衣少食和无安身之地的处境。这种
令人恐怖的灾难导致许多人走向了坟墓。这是造成我们 25 名基督
徒暴卒的打教事件之结果。”

“上帝的手已开始捉拿罪犯们”,我们在同一位传教士的另一
封书简中读到,“遵义教案的主要罪魁祸首有两个儿子,他们均进
省府应试。他们二人都获得了进士的顶子,但其中之一人于晋升的
翌日却暴卒。死亡也同样夺走了这同一位打教人的父母。有一名
姓杨(杨树勋)的异教徒曾残酷地重刑拷打过赵类斯(Gilles)神父,
也遭暴卒,最后是其他多种儆戒性的惩罚。然而,无论这些惩处多
么显而易见,也未能平息我们敌人的狂怒。在遵义,他们仍在继续
挖掘我们建筑设施的地下。他们挖掘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表面土
层已完全不坚固了,由亵渎圣教的手造成的这片土地的多次坍塌
将数名挖掘者埋葬在他们自己掘成的墓道中了。

当许多异教徒把这些灾难视为基督徒们的上帝的报复作用

时，曾璧光仍不放松以其仇恨折磨我们。他很希望使我们最好的基督教官吏谢若金(Joachim Sié)背教。但谢氏堂堂正正地在抚台(巡抚)和藩台(布政使)面前捍卫了宗教事业，也就是说每当有人胆敢于他面前攻击我圣教教义的时候，他都会挺身而出地捍卫之。

法国公使馆不停地对于违背条约的事件提出抗议。抗议只有在它们能产生威慑作用时才会有效。在中国当局坚信法国公使和水师到来的漫长时间内，我们都抱有一种尽快解决问题的希望。”

5月间，在临近四川边界的怀柔县爆发了某些反对基督徒和一名传教士的暴力行为时，罗伯恩(Bodinier)会士于本年5月15日写下了下面这样一段文字：

“我于5月1日星期日结束了为我的传道员们举行的一次为期三天的避省。于此后的星期二，有人向我报告说，一支由衙役和当地恶棍组成的武装匪帮于当日上午抢劫了二郎坝的一个基督教的住宅，捆绑了该基督徒以及我的优秀的传道员徐团首(Martin Siu)。

我匆匆忙忙地奔向现场。因为我害怕基督徒们会以武器自卫。非常幸运地是根本未出现这样的情况。虽然我们的那些新受归化的教徒们尚未很好地理解到，宁肯忍受仇教之苦也不能以武力反击，但至少也相信这样一种抵抗只会有害于他们自己。

从另一方来看，那些抢劫者们都大张旗鼓地声称他们是奉官吏们的命令行事的，这是很可能的。自一年以来，已经拆毁了遵义教堂和抢劫了成千的基督教家庭。至今尚未做任何修复，又未归还他们一文钱。难道这不是很清楚地说明，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粗暴对待和抢劫我们而对我们又没有任何公正可言的例证吗？这是本处的所有人都在从事的一种推理论述，无论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都一概如此。这也是中国政府倾向性的另一种征兆。复活节星期

一,仁怀县的知县路过二郎坝,我曾想方设法地会见他,但他却没有接见我。可以证明其恶意的是他没有拜访我,甚至没有给我递上一张帖子来。这就使我在异教徒们面前丢了面子,大家会将此看作是官吏们不希望在其辖区内基督徒存在的一种征兆。

无论如何,新教徒们都不能拿起武器来击退侵略者,我必须试图让打教者们听到理智的语言。因此,我便与一名传道士在二郎坝市场进入了一幢住宅,住宅中有一批衙役及其助手们。我以温和而又彬彬有理的语言与他们攀谈,可是他们却不肯倾听我的陈述和根据其长官(崇实)的命令而把传道士还给我,而是用刀背和木棍边殴打我边把我驱逐了出来,尚且不谈向我投来的石块和发出的阵阵漫骂,一直到把我赶到与我们基督徒的住宅隔开的河边为止。

我必须自己蹚水过河而去,因为任何人都不敢负责把我渡过河去。此外,我是缓慢地退出来的,一直注视着陪同我的传道士,因为我害怕他也如同徐团首一样被捆绑起来。我们最终回到了住处,无疑是受尽了严重污辱。但我们在灵魂深处却非常高兴,因为我们为了神圣的信仰而忍受了某种折磨。若无这次经历,我永远不能相信会有为了我主耶稣—基督而遭受打击和辱骂的荣耀。当需要抛洒自己的全部鲜血时,难道不应该也如此吗?

这一切都发生在5月3日,也就是光荣十字圣架瞻礼节。我于5日晚上离开二郎坝而去。众人都一致断言,如果我不交出我的全部钱财的话,那就可能会被捆绑并砸断我的双臂和双腿。因此,我撤退到了20里(11公里)远的太平场^①。

但现在也轮到该地区也受威胁了。每夜都有警报,我每天都被迫变换避难地点。我从一个住处躲到另一地点。甚至在某个山洞

^① 疑为太平渡。——译者。

中过夜,在那里几乎被煤气窒息。我被迫前往附近的一个森林中寻找蔽身之地,而且最终受到了一名异教徒的接待,由于对暗探的恐惧而不允许我在他家中居留很长时间。所以,我于10—11日午夜离开那里并且安然无恙地到达了桐梓。

我致书仁怀县的知县,要求得到他的帮助和保护,现在仍在等待着他的答复。可以肯定,官吏们都从北京接受了尽最大可能地折磨我们的命令,尤其是不要为了使基督徒们获得公正待遇而介入其教案。”

任国柱会士自己也既致书巡抚又写信给北京的法国公使馆。

我们在该传教士写于5月18日的一封信件中读到:“法国的外交代表应该非常积极地推动我们教案的解决,应该接二连三地发来电报,以催促中国政府为我们主持公正。或者是由于已接到的命令没有任何严肃性,或者是出于仇恨基督教而对此进行抵制,曾璧光仍在毫不放松地追捕我们。只要这名高级官吏尚在贵州,就不会有任何可能的宗教和平,只不过是让他离开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曾璧光曾是恭亲王的老师,使这样一名弟子惩罚其师是很难做到的。我们希望圣父的恩宠会使我们坚强起来以勇敢地坚持到底,承受上帝垂恩给予我们的考验。此外,我们的敌人极力祸害我们的那种灾难已由于从四面八方支持我圣教的运动而减缓了。”

中国川东传教区的综合报道^①

下面一封书简概述了刚刚过去的一年(1869年9月—1870年9月)间川东传教区的历史。它提供了有关遭受了极端残酷而又非常光荣的考验的酉阳基督教堂口的细节,我们的教友们将会怀着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43卷,1871年。——译者。

强烈的兴趣而阅读这一切。

外方传教会川东代理宗座代牧白德立会士致教
廷传信部的欧洲枢机们的书简

1870年9月8日

先生们：

……今年并未因非常突出的事件而引人注目，没有任何真正的仇教，但却发生了许多惹人恼火的诬教行为。皇帝钦差李大人以处理酉阳教案为借口，并为使我们的基督徒获得某种满足，而从北京千里迢迢地前来本地，这次旅行对于我们来说则是灾难性的。此人是西洋人不共戴天的敌人，因而也敌视基督徒。他同时却又是处死了杀害李国会士的凶手之一。他完全赞同那些曾参与打教或保护了打教人的官吏们的所有诡计和所有不公正行为。为了更好地表达其感情，他将这些官吏擢升到更高的显要职位。该官吏向所有人都勾勒出了对待传教士和基督徒时需要坚持的行事方针，这就是当他们受到异教徒们的控告或者是当他们要起诉这些异教徒时，不理睬基督徒们的任何诉讼并拒绝给予他们任何公正待遇。

我们现在正在忍受这种策略的后果之苦。我们的新教徒被分散在仇视他们的异教徒中间，不断地成为他们欺侮的对象。有时会出现一个家庭中的几名成员受归化为基督徒，而其他成员则仍为异教徒。这后者必然会不失时机地寻找一种借口，以指控其亲属并将他们拉去见官。如果整个家庭都是基督徒，那就要由左邻右舍来充当这种角色了。让我们看到这些受到极不公正的污辱、由破产性的诉讼而贫穷化或为了获得和平而被迫背教的新教徒时，那该是多么令人悲痛欲绝啊。此外，这些例证也吓跑了异教徒中那些已经考虑迈出决定性一步的人。有一个家庭的父亲已听人讲到了这种

宗教,希望受归化成为基督徒。当他回到其家中时,便宣布了他的意图并表达了让其家人均奉他为楷模的愿望。其亲属们听到这一消息时,便群情激愤,纷纷抗议并召开会议。辩论持续的时间并不太长,众人剥夺了新教徒们所继承的祖业,将他逐出家门,要求他退避到他已被选择其宗教信仰的人中去。巡视了这一地区的中国司铎对于这样的一种肆无忌惮的行为感到了愤慨,以一种新的方式将这些仇教人召到了该市长官(每个市中心有二三位负责地方治安的长官)的面前,以便报告和评论他们的行径。经过大量辩护性讨论之后,受到不公正污辱的新教徒胜诉,仇教者必须向在场的基督徒们赔礼道歉。非常不幸,并非所有这类事件都全部能获得同样的结局。

一名拥有一笔相当可观资产的老翁将其财富分配给其诸子们。长子接受了宗教信仰,包括他在内,其全家共由 20 个人组成。其弟过去是清莲教教徒,这是一个对我们怀有不共戴天之死仇的邪教派别。其弟一旦获知这一消息,便暴跳如雷,调动了一切因素以败坏他的名誉。但当发现此人面对威胁就如同对于苦劝一样都岿然不动时,他便希望使用一些自认为是更有效的办法。他将其老父亲拉到了自己一方,使父亲坚信其长子有违孝道之嫌,蛊惑父亲将此人交官。经立案提出起诉后,立即就有一班衙役开始行动。除了前往正巡视该县的传教士那里躲避之外,被告人再没有其它对策了。大家向他重复了上百次:“放弃洋教,复归你先祖们的宗教吧!你应该幸福地生活在你的家庭中。”直到目前为止,他仍表现得勇气十足。

在传教区的另一地点,数名异教徒都归附了真宗。被这次失败激怒的魔鬼组织了一次武装反抗,异教徒们成群结队地揭竿而起,驱逐了新教徒,其中有四人或五人受了重伤。

类似的暴力事件几乎在各地都不断地反复发生,而且始终未受到惩罚。它们只能会使敌人得到鼓舞,而只有威摄才能遏止它们。事实上,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基督徒很少会获得甚至是最有限的公正待遇。

此外,如果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都非常坚定,懂得为一种极其神圣的事业受难的幸运,那么我们会在悲伤中得到一种很大的安慰。天啊!我们必须承认,除了勇敢的新教徒(他们甚至勇敢得具有英雄主义了)之外,还有某些以其软弱而使我们感到痛心的人。

我讲到了英雄主义。下面就是由新基督徒们提供的某些例证。福音书遇到了人类中的最粗暴和最粗俗者。我的教友之一——李国会士的继任者写信告诉了我这些令人宽慰的细节。下面我将引用他的话:

事实真相迫使我讲下面的话。他们的日常行为更加残暴和更加野蛮,而我们的所有新教徒都远不是圣人,尽管大众都会逐渐地由于修持基督教及其所宣扬的道德而发生变化。

因此,在仇教者们疯狂地到处都制造混乱和恐怖的时候,我们宗教的新崇拜者们变成了完全不同于他们过去的人,勇敢和持之以恒地为改变宗教信仰而受苦,忍受了各种酷刑和耻辱。我不能不赞扬我们教廷传信部的教友们,正是他们的祈祷和施舍才在上帝那里产生了这些奇迹。

18个月之前(我引证的书简是上一个7月间的),酉阳站口的一名从教人落入了仇教者们的手中。时值元月间,隆冬寒天。打教人动用了一切手段以迫使他背叛,诱使他签署了一份文件,通过这份文件而宣布说他将向他们出让祖产。他们剥去了他的衣服,捆住了他的双脚并将双臂悬吊在一棵大树的树枝上。他们在这种情况下

下又用木棍殴打他并用带有嘲弄口吻地对他说：“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竟然希望升入天堂。好吧！我们正是为了帮助你升天才将你吊在这棵树的树杈上。这一切尚不够，你还必须领洗。我们现在就来为你举行洗礼。”

他们向该教徒那遍体鳞伤的身体上泼满了冰冷的水。

匪首(也是他的亲属)向他怒吼道：

“背教吧！可怜鬼！不要给家族丢脸。”

作为全部回答，受刑者仍然勇敢地宣扬其信仰。

夜幕降临时，刽子手们把他抛在了地上，但却依然使他的双手和双脚被捆着。他们送给了他很少一点食物，他被迫用嘴叼住，如同牲畜一般，因为他无法自由地使用双手。

他们一连数日都重复同样的污辱和残酷虐待，但始终是一无所获。

一名富裕的异教徒经过那里，发现了这名不幸的年轻人。他对此人很同情，设法把他从大树上解下来并恢复了他的自由。这名精修圣人^①的四肢严重脱臼散架，以至于他处于一种极端的疲惫状态，必须等待三日之后才能重新行走。其敌人在此期间用刀架在其头上，强迫他为这些人写下了出让他们勒索财产的文契。经过这些拷打之后，他身患重病并于稍后因此而死亡，现已处于垂死状态。我最近前去为他举行了洗礼，他获得教名为丁伯录(Pierre Tin)。

去年，另外一名姓占的望教者也成为忠于教会的受害者。由于李国曾利用他处理过多起基督教教案，他为异教徒们所痛恨。他的一个邻居对他进行了诬告。望教者前来向我们求计。

^① 即 Confesseur，意指在仇教期间仍坚持公开信教的基督徒。——译者。

我回答他说：“你逃走吧！躲起来吧！你知道官吏憎恨基督徒。”

他回答说：“神父，我是无辜的，他们指控我是基督徒。如果官吏是公正的，那么他就不会惩罚我；如果他惩罚我，那么我就如同基督徒一样受苦，善良的上帝会保佑我。”

因此，他心情很平静地走上了公堂。那名官吏只受其仇恨的支配，下令抽打他 300 藤条，又让人给他带上了枷锁。占氏浑身都皮开肉绽，他于是便染上了一种很快就导致死亡的疾病。由于我们无法进入监牢，也不知道如何使他获得受洗的圣宠，所以我们便冒险地求告官吏放出那个垂死的人，以使他能在他的亲人的怀中平静地死去。我们相当愉快地获得了这种垂青。因此，病人被抬到了其家中，他居住在距此地有四古法里的地方。

他临死时，对围在其睡榻周围的那些人说：“你们看到了，我将作为基督徒而死亡，这是仁慈的上帝给予我的一种很大的恩宠。我留下了一个瞎眼妻子和一个年幼的稚童。我将他们留给了神圣的教会。不要忘记提醒神父们在基督徒中把我的孩子抚养成人，以便他也如同我一样成为基督徒。”这是他的最后遗言，他于此之后不久就咽气了，享年 41 岁。

如果我意图叙述可以安慰我们的所有具有教化人之特征的事实，那就会过分冗长了。我刚向您讲到的很少一点内容就足以向你们证明酉阳人的力量该有多大，我们在身体和灵魂方面应该怎样感谢传信部的那些虔诚的教友们啊！愿我们的上帝垂恩能使他们长命百岁！

既然我们需要讲酉阳，先生们，你们必然会非常高兴地了解该基督教会口和彭水会口的信徒们的处境究竟如何了，因为他们正身处频繁出现打教的环境之中。在此时此刻，他们享受到了一种相对的安宁，也就是说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追捕他们了，也不再焚烧

他们的住宅和抢劫他们的财产了。其原因很简单：再没有任何可供焚烧的住宅和再没有可供抢劫的财产了。甚至在尚未完全恢复平静时，为了谨慎，还必须使我们的教友离开他们在城内的住院并巡视乡间的基督徒，这已经是传教区的习惯了。在逍遥法外而不受惩罚和抢劫等希望的诱惑下，打教案的所有主要祸首们都毫不掩饰他们的感情，都时刻准备着，一旦有机会就要重新开始行动，卷土重来。

这些可怜的新教徒们刚度过痛苦的一年，他们尚远没有看到自己灾难的尽头。不仅是大部分富庶的家庭遭到了粮食、畜群、动产被抢和烧毁住宅等损失，而且这几乎也是附近地区所有基督徒们的共同损失。他们的小片地产也引起了仇教者们的覬覦，必须使这种垂涎和贪婪得到满足。仇教者们都会简单地占有他们所喜欢的一切。其中一部分人首先夺去了地产文契，然后再把主人驱逐出去；其他人则用刀剑架在人的脖子上，迫使其地产主为他们写一份出让土地的契约而又不付分文。

除了这种灾难之外，还应该再加上一场可怕的饥荒。饥荒除了蹂躏了酉阳和彭水地区之外，还使与陕西和湖北相毗邻的所有山区都荒芜了，其范围包括至少与法国 10 个省一样广袤的 10 个府。当时出现了许多受害者，既有异教徒，也有基督徒中的人。如果传教区未对他们做出巨大牺牲的话，那么这些基督徒中的人就所剩无几了。这些基督徒们既没有房子、动产、食物，又由于敌人的包围、遭到了其亲属们的遗弃，大家可以判断一下其苦难程度该有多大啊！

但可能也会有人说，在中国有许多衙门公堂，当有人被不公正地剥夺财产时，那么他也可能会恢复其权力。在天朝帝国，司法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平等的，至少是有一只瘸脚；但对于基督徒来

说,最经常的则是根本不存在司法公正。下面就是已经出现的情况。

只要法国驻北京公使馆表现出愿意负责照顾我们的那些受到极端残酷虐待的基督徒,那么我们就希望他们不仅仅能够收回其财产的所有权,而且还希望他们能对于由火灾、抢劫等所遭受的其它损失而得到赔偿。官吏们清楚地知道有违犯条约的地方,他们由于威慑的作用而很可能会随和地同意作出某种妥协。但一旦当法国驻北京的临时代办先生宣布说,他只有捉获杀害李国先生的凶手就会感到满意,而他不会关心基督徒们,这样一来,在所有官吏中便发出了一阵喜悦和胜利的欢呼。

这一消息立即传到了所有衙门。从此之后,我们敌人的计划就最终确定下来了,这就是在获得了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望而践踏基督徒们的自由时,他们便会将其全部仇恨的分量压在这些人身。

就在此期间,中国政府向四川派遣了一位钦差,此人自称他来此完全是为了替法国传教士的被害报仇。至于基督徒们的起诉,他则不予理会,这些诉状应该递给地方官吏。他将杀死李国柱的凶手之一处以死刑并将另外6—7名罪魁放逐^①。他刚刚再次出发,该省的首席官吏便以其充分的权力,或者更应该说是在钦差大臣的完全同意下,也判处了同等数目的基督徒们完全相同的刑罚。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未经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完成的,既未听取证人的证词,又未听取原告和被告的意见,大笔一挥就足够了。对于那些遭

^① 钦差大臣李鸿章下令处死了为张佩超效劳的普通团首何彩。至于基督教徒们不可调和的敌人张佩超,他是杀害玛弼乐(Mabileau)会士的唯一真凶和酉阳大屠杀的主要煽动者,依然逍遥法外而未受惩罚。此人借助于一笔虚构的款项(甚至低于为1805年毁坏传教区所作赔偿的数目)而保持了其全部自由。在他觉得合适的地点和时间,都可以非常方便地重新开始他已多次成为罪犯的可恶的活动。

到审判的异教徒来说,大部分人现在仍于其家中过着非常平静的生活,在和平中享受着他们抢劫的物品。其中仅有二、三人被投入了监狱,但大家已经预料到他们很快会被释放。我们的那些被判刑的基督徒们都自行逃亡了,他们干得很好。有关当局现在正在非常积极地追捕他们。

为了更好地效法,钦差大臣把酉阳的知州田秀栗调在自己身旁工作,此人由于他对圣教的仇恨和残酷,而于极端臭名昭著的仇教人中占据了一种很突出的位置。作为犒赏,他获得了“道”一级的官衔职务,这是帝国中最高级的地方官吏之一。

某些新入教的教徒退避到了一个山洞中。现任官吏是涪陵背教的基督徒,他认为那里也有一名已被判处死刑的基督徒骨干,于是便命令 500 名营勇包围了山洞,但却未能进去。他于是便使用了诡计。他以美好的许诺而说服新教徒们从其藏身地走出来,向他们保证他不会对他们有任何伤害。你们知道他是怎样恪守其诺言的吗?他令人当场处死了这些不幸者中的两位。他很久以来就追捕的那一位已处于安全之中了,其儿子为他而付出了代价,这就是因背教而遭诛的两名受害者之一。

对于其他那些失去了一切和被人押送到地方官吏面前的基督徒们,官吏们无法不让这些人在面临新灾难的情况下倾诉他们的任何控告。那些不公正地占有他们财产的人威胁说,要重新开始去年的场面。如果一名基督徒冒昧地提起一桩起诉案,那么那些受仇恨支配和被金钱贿赂的官吏们就会指责他进行诬告,还必须感激他们不在大堂上当众动大刑拷打而将原告人赶了出去。怎么办呢?要保持沉默吗?我们的全部新教徒现在都沦落到以乞讨为生的境地了。其次,这种不受惩罚和代价如此之小的利润对于一次新仇教者该是多大的诱惑啊!起诉吗?但在此时此刻,除了徒劳无益之外,

在所有人的眼中看来都是对基督教名称的侮辱。我们希望过去在天津发生的那些丑恶场面,在向欧洲人证明中国人怀有的感情之外,还使他们大开眼界,从而改变我们的处境。啊!但愿能赐给我们一种真正的和平,祝愿民众能够不害怕欺负地选择基督教,也希望归化活动在中国人中更快地增加和发展。

我们仍然处于一场可怕的洪水泛滥的影响之下,这场水灾发生于7月中旬前后。长江以及该省其它江河的水位都涨到了众人难以置信的高度。许多集市都被河水冲走了,七座或八座城市均被洪水淹没和遭受到了无法计算的损失。其中的一座城市全部被大水覆没了,大家可以乘船前往最高的房顶上。传教区失去了它在这些城市中所拥有的多家药店。本处所有的房子都是用木头建成的,几乎没有一幢房子能够抵抗住洪水的冲击。

洪水在退却的时候,于街道和房子中留下了大堆的泥沙和瓦砾。暴雨刚一停止,一轮炽热的太阳便使气温一直上升到40度。在这种气温下,污泥发出了一种恶臭的气味。在遭水淹的所有地方都有一种瘟疫流行,造成了人员的大量死亡。

……先生!请接受我的崇高致意和对于川东所有传教士们的谢意!

来自教廷的传教士,代理宗座代牧白德立(L. Blettery)

中国山东宗座代牧区顾立爵 1870年11月20日的书简^①

山东宗座代牧顾立爵(Cosl)大人于1870年11月20日从罗马写信告诉我们说:“我今天不想向你们陈述我们传教区的需要,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43卷,1871年。——译者。

你们清楚地知道这一切,而且你们也相当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慈善事业是我们支持的。我给你们写信是为了向你们通报一事实,它是由我们的一位传教士若阿金·奥尔希(Joachim Orsi)神父向我报告的。该神父于今年2月28日写信告诉了我们以下情况。

自从多米尼克(Dominique)神父去世之后,小留集的望教者们就害怕遭异教徒们骚扰。但由于上帝的保佑,他们至今仍然平安无事。但在甌平(甌城)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在那里,由于他们中一个与官吏们有联系的人叛卖了他们。此人曾向若阿金询问在萧家庄是否有基督徒,出于此人对于他们所有人之中的最年长者萧雄(此人向他们宣讲教理书)的仇恨而心怀恶意地声称根本没有。官吏们因此而逮捕了这名年迈的传教士和另外一名望教友。

官吏审问他们说:“你们信仰什么教?”

“我们是基督徒。”

“你们有什么标记?”

“我们有经书和玫瑰经(大串念珠经)。”他们于是便阐述基督教理和玫瑰经书。那名官吏仍未被说服,他大发雷霆之怒:“你们撒谎。你们不是基督徒,而是土匪和骚扰我民者。”他让衙役们极其狠毒地对他们严加拷打。最年长者挨了600鞭子,而最年轻者则挨了800鞭子。在这次残酷的行刑期间,他又多次追问他们信仰什么宗教,而他们始终都回答说:“我们是基督徒。”最后他们以一种更加勇敢和更加清楚的语言回答说:“听清楚,当官的!”他们对他,“你可以拷打我们,你甚至在愿意的情况下还可以让我们碎尸万段。但你应该清楚地知道,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你就会永远只能会听到我们的嘴还在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死也是基督徒。”

就在同时,萧雄的儿子前来向我叙述了事情的经过。我立即派遣洪推将我的名片送到公堂。该官吏抱歉地声称,他并非因为他们

是基督徒,而是作为匪徒才下令拷打他们的。他又补充说:“出于对您和对于派您前来此处的若阿金神父的尊重,我现在就释放他们,但您将替我为他们作保。”

在5月2日的另一封书简中,若阿金神父又为我寄来了这场教案后来的情况。他向我写道:“您还记得萧雄吗?由于一名教友的背叛和根据官吏的命令,该望教者挨了600鞭子,作为耶稣—基督的勇敢战士,他始终公开承认其信仰。他恢复自由之后便返回家中。由于浑身皮开肉绽,故长期卧床不起并于本月26日完成了其殉教过程。”

当我在济南府居住时,继公开原谅其敌人之后,他由传道员洪推举行洗礼。

今天早上,萧雄的儿子前来向我报告说,其父在死亡之前不久向他讲了下面一段话:“我的儿子,上帝现在要召我到他的身旁去。你要好自为之,要虔诚地崇拜上帝和忠实地遵守其教戒。”殉教者毫无痛苦地咽气了。他到上帝身旁去了,上帝在那里等待他以将他安置在真福地。啊!我该多么希望能在一名类似的殉教者死亡时在场啊!我称之为殉教者,我坚定地相信自己没有搞错。因为他是在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和他希望作为基督徒时死亡的,甘受600鞭笞之刑后才逝世的。

从纯粹的信教者的观点来看,萧雄的死亡使这个年轻的基督教堂口失去了一大支柱,但“流血的殉教则是基督教发展的种籽”。上帝不会放弃以其著名殉教者的功德而保护该堂口。此人的勇气肯定也是我们望教者们的一种生动例证,几乎所有人都受到了他的教诲和鼓动。

云南宗座代牧、外方传教会的袁绷索致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书简^①

1870年9月于云南

先生们：

始终是无限善良和慈悲的上帝如此仁爱世民，以至于他派遣其亲生儿子——独生子来到人世间，以将世界从永久的死亡中赎回和拯救出来。它的天意以其奇妙的智慧而幅射一切和操纵一切。它温和地支配一切，善于把小民和大人、富人和穷人都吸引到了自己一边，而又不会在任何方面伤害其自由。主要是在处于偶像崇拜者包围之中的天主教传教区内，大家才会经常遇到令人非常钦佩的归化。云南代理宗座代牧主教古分类先生于其今年10月9日的书简中向我们叙述了以下情况：

“在距我的主教府赵家营有八公里远的东干村，一名诚实的异教徒于其心灵中感到了某种痛苦的空虚。他向往善行，但却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求善行。由于他丝毫不知道更好的办法了，于是便决定离别其妻子和儿子而出家为僧。今年5月间，他与之交涉的那位老和尚以一种既罕见又值得称道的坦率言辞对他说：‘如果你寻求休息、大米和鸦片，那么我们这里则一应俱全而无一遗缺；但由于你希望真善和真谛，所以你必须去请教基督徒。我们的宗教是简单而方便的，而他们的宗教却是真正正确的。’这名可怜的杨大可直到那时为止也只听到过从坏的方面谈论基督徒，现在感到了无比的震惊。他最初不敢来拜访我，非常害怕中魔术巫道。他最后下定了决心。从第一次拜访开始，他的所有恐怖情绪都云消雾散了，即均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43卷，1871年。——译者。

被驱散了。他崇拜圣教,而且是全心全意地这样做。从未有过望教者会以比他更大的热忱来学习教理及其祈祷经文。杨大可于今年8月15日偕其幼子一起领洗。他今天成了该站口最虔诚的基督徒之一。作为对老和尚之证词及其正确建议的犒赏,希望我主赐予他更多的力量和勇气,以便使他自己也遵循他个人的观点行事。”

西道县(宗座代牧区的西部)的长上罗尼设(Le Guilcher)先生于1869年10月29日的一封信筒中,向我介绍了他的白盐井之行。他说:

“在大田坝接受30多名被迫弃教者之后,我便前去巡视我们在白盐井的那些青年基督徒。他们既未曾见过传教士,又尚未接受过神圣洗礼,自8年或10年以来仍在坚持其信仰。我经过了刚刚在15天前从‘回子’(伊斯兰教徒)手中收复的大雅县。我在那里找到了杨映可(Yang-in-ko)大人,他是基督徒们公开的敌人。我被迫去会见他,但我感到了《福音书》中这句话的分量:‘不要对您要向大人讲的话感到担心。’^①上帝赐给了我驯服这头老虎的荣耀,以至于使他请我吃晚饭。我拒绝了这种荣誉并送给了他几件礼品。他本人也立即回送了我一张山羊羔皮和15两银子(120法郎)以供我做盘费使用。我们现在和解了!民众们看到了所有这些事态之后,便一致说:‘该司铎的级别可能很高,因为连杨大人也向他赠礼了。’这些可怜的人不知道上帝往往都是利用弱者而挫败强者的。”

第三天,我到达了白盐井。那里的新基督徒高兴得连蹦带跳地欢迎我。在省府的公馆(由精明的劳总督^②送给传教区的官邸)灾难发生之前不久,可能是死在那里的校长的儿子对其父亲说:‘不

① 《马太福音》,第10章,第19节。

② Lao,是指云贵总督劳崇光。——译者。

应该为人事间的一点小事而使您感到失望,要一直坚持下去,迟早总会有一位神父来到你们之中。’这些话使他对其子的死亡有了准备。他勇敢地坚持其信仰,一名传教士最终到达他那里并有幸对他(他本人及其家庭的五个成员)行圣事,洗礼和坚振礼。

我在白盐井发现了另外三位原新教徒的家庭,另外四个家庭都崇拜过宗教。如果说出于谨慎而使我在那里停留了一个多星期,那就必须会有许多人受归化。我意欲尽快地返回那里去。官吏们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其中的一位祖籍为北京的官吏怀着非常感激的心情对我说,出于对已就此而降旨的皇帝的崇拜而必须优待司铎们。这位姓高的大官吏如同兄弟一般地接待了我,他曾三次前来拜访我。一位新领洗者的儿媳原是高氏官吏的孙女。

这样一来,我圣教便在众目睽睽之下得以在白盐井立足了。”

古分类先生于其今年4月11日的书简中,向我报告说,我们在曲靖府的2个遭囚禁的人已被释放。省城的大官吏们均被杀害张若瑟(Joseph Tchang)的凶手用金钱贿赂了,都倾向于绝不释放仍在继续受审判的两名基督徒。然而,如果这两名基督徒希望摆脱对他们的起诉,那么官吏们将会给予他们自由。我于是便命令古分类先生鼓励我们的囚禁者做出这种让步。但现在官吏们都变得更加苛刻了,另外还希望被囚禁者们宣布说他们在这场案件中错了。这种要求遭到了明确拒绝。最后,经过两年的关押之后,去年农历十二月十六日,也就是在今年的元月间,我们的两位囚徒被释放了。官吏们在这种背景下的行径使所有人都感到惊讶不已。事实上,中国的任何人都不会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从来不会在未达成和解或不经过审判的情况下释放在押犯,甚至往往是要同时经过

这两种程序。于此却没有丝毫相似的地方，南宁县^①提审了两名基督徒，询问他们是否愿意返回其家中以欢度新年佳节。

他们回答说：“愿意！但大老爷把我们关押在这里，我们怎能离开这里呢？”

“那好吧！”官吏接着说：“我们再不让你们回到监狱中来了。回你们家中去吧！你们去利用新年的机会而去享乐吧！然后再与你们各自的对手们和解。”

现在，我们已经不再有因宗教信仰而被囚禁的基督徒了。

这几年来，回教徒们几乎到处都遭到打击。现在已收复了他们曾占据的城市，到处都屠杀他们。有数目很大的一批回教徒归降了，其他人则撤退到了大理府。昭通、曲靖和东川府等地区都完全撤空了。省府及附近大平原的情况也如此。不久之后，王师即将兴师去包围大理。大家可以预料到，王师借助于一支由 10 门带膛线大炮组成的炮兵，该城肯定会不费吹灰之力地被攻克。据说新土司惊慌失措，已经要求和谈，但北京政府根本不同意。

来自云南内地的最新消息说明那里始终处于战争之中。在南方和距省府有 12 法里远的地方，徵江府城设防牢固，尚未被王师收复。他们那挂帅的将军——著名的曾抚台^② 希望相当礼貌地送走曾带来两门复膛线大炮帮助过他的两名欧洲人。这一颇难挽回的错误很可能将包围战拖延下来了。大理城依然相当完整地筑垒固守，比徵江府更难夺取。因此，如果中国人依靠他们自己，只要敌人还有生活必需品和军事辎重，那么他们就很难夺取该城池。在等待期间，可怜的民众们始终都受千方百计设法寻求发财的商贾及

① Lan-lin-hien, 这是当地人发音的特征。——译者。

② 指贵州巡抚曾璧光。——译者。

其下属们之贪婪行为的支配。

在该省南部和西部爆发的这些战争于该年阻止了我们对几个基督教会口的巡视。然而,今年的收获也不算很丰富。下面就是其成果:复活节的圣餐,3000多人;领洗的成年人,220人;为信徒孩子们举行的洗礼,500人左右;为异教徒们那些面临死亡危险中的孩子们举行的洗礼,近17000人左右。望教者的数目超过了500人。

……谢谢你们,先生们!谢谢你们对本传教区的慷慨慈悲。愿上帝祝福你们的神圣功德,使之获得越来越多的成果并且扩大到全世界!愿它对你们以及你们那些尊贵的教友们充满恩宠!我们将经常地为这种意图而作出神圣的牺牲!

谨请接受敬意!

菲洛达里主教,云南宗座代牧袁绷索

中国广西传教区的综合报道^①

广西是中华帝国的18个省份之一。其省界如下:北部是贵州,东北部是湖南,东部和南部是广东,西南部是交州东端,西部是云南。该省的人口多达700万,属于被以广东、广西和海南宗座代牧区之名相称的传教区的组成部分,被委托给外方传教会的明稽埒主教负责。

广西独自の传教区是我们的教友们不大熟悉的。对于他们来说,该教传教区已被表现为马赖先生的光荣殉教中了。这位殉教者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31卷,1871年。——译者。

的文件已在大约 15 年前就刊布于本《年鉴》中了^①，但它们尚不完整，甚至在某些问题上还是不太准确的。

鼓励我们发表下述报道的原因，是根据一些比较可靠的资料，由尊敬的马赖和外方传教会的巴赞(Bazin)所写。同一位传教士的札记对于近 15 年来广西福音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全面的概述。

广西传教区日志摘录^②

—

1870 年 1 月 15 日

一、广西省是中华帝国的所有省份中最后接受福音种子的省份，但它的一个新时代刚开始。我们殉教者的鲜血从来都不会白流，因而我们在一个不太遥远的未来，可以抱有在广西省获得丰盛收获的希望，我们尊敬的殉教人——其第一任使徒马赖非常喜欢该省。

我们首先对于该传教区的建立讲几句话。1853 年 10 月间，马赖先生离开广州前往广西。传教士们当时尚不太熟悉这条直线道路，所以他必须取道另一条既长又难走的路，经过了湖南、湖北、四川和贵州诸省。经过 3 个月的艰难困苦之后，他到达了贵州省府贵阳。他在那里停留了 6 个月以学习汉语，然后便前往马鞍山投奔利昂(Lions)先生，此人应负责让他进入广西。

上帝的天意为他神奇地巧妙安排了路程。早在 1837—1838 年

^① 《传信年鉴》第 28 卷，1856 年，第 401—481 页。

^② 这部日志是致小布瓦西埃尔(普瓦蒂埃教区)的副本堂神父塞纽(Chaigneau)的。

间,就有某些属于“侗家子”民族的中国人家庭离开了茅江(贵州)前往广西的西林县附近栖身。10年之后,这些移民中的12位又返回贵州探亲。在此期间,已有人在茅口传播福音。在新基督徒中,有一名著名文人卢大先生,稍后不久便以卢朝明之名而为人所知。他积极地负责向其亲属和从广西返回的朋友们介绍基督教。他对他们说:“我们的先父们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他们搞错了。正确的道路,通向福地的道路就是基督教。这绝非如同大家说的那样是新宗教。但我们的先父们却不幸对此一无所知,我们不能再模仿他们了。”

在来自广西的12名行人之中,共有八名选择了这种信仰。在他们返回之后,必然会宣布他们受归化,鼓动其族长们就在新宗教问题上所采取的对策而召开会议。大部分人都声称赞成这种宗教,于是便向贵州发出了一些信件以要求卢氏文人向他们施教。

当卢氏到达时,他共发现八个村庄自称是基督教的^①。在4个月期间,他不停地布道。当发现收获成熟时,他便派人去请马赖先生亲自前来。该传教士于是便于1854年11月间离开大山(贵州),于圣方济各·沙勿略节前夕到达了白家寨。望教者们的喜悦就如同是欢庆众人的节日一样地暴发了。

魔鬼不会无动于衷地看着从它的手中夺走了如此之多的人。它极力为阻止上帝的事业设置障碍,特别把一名叫作白三的人作为工具,此人是白家寨新教徒们的亲属。马赖到达那里之后仅过了数日,白三便去向西林县官控告他,声称该洋人前来这里是为了扰乱地方和挑拨宗族和睦。但魔鬼这一次却落入到它自己设置的罗网中了,这次起诉转而有利于真谛。

^① 这就是大山、新寨、白家寨、关山、蔡桥、板坡、渠桥和瑶山。

但衙差役黄氏^①和郑氏被派遣到了马赖那里,请他前往衙门。该传教士惟命是从,他在其卢氏和田氏两名传道士以及数名基督徒的陪同下前往。

那名被称为“道”的官吏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懂得基督教,过去曾任职于兴义府(贵州)。他在那里曾正式参观过基督徒们的小经堂,而且对这次参观非常满意,于是便向北京呈报了一道非常有利于基督教的折子。所有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甚至都一致声称其妻为基督徒。据说,该官吏让人将他的祈祷经书和马赖先生的同类经书进行了比较,发现它们颇为相似,于是便决定绝不能再骚扰传教士们了。

“你在传播什么宗教?”他询问马赖先生。

“我传播天主教,传播行善事。”

“如果这种宗教很好,那就应该在城市而不是在乡村公开宣扬它。乡村的居民很贫穷。由于他们从早到晚忙于劳作,所以没有时间学习这种教理和这些祈祷。他们害怕稍后不久会对你提出起诉。留在城市中吧!你在那里不会面临任何不愉快的事。把你可能拥有的钱和珍贵物品委托给我吧!在你离开的时候,我将非常忠实地把这一切退还给你。”

“我没有珍贵物品,我只有很少一点钱。”官吏拿走了银钱,仔细地称量和计算,详细地记下了重量和数目,包起来后又盖上了他的章。他面对着衙门中的所有人而完成了这项工作,非常希望大家知道是他保存着这一切,从而使盗窃犯们放弃了偷盗它的欲望。从次日起,官吏又秘密地把钱还给了传教士并对他说:“我不希望你留在本地区,回贵州去吧!那里有许多基督徒和一座教堂。我认识

^① 指黄才。——译者。

那里的一名属于你们宗教的教员，叫作李塞先生，请求他于其府上接待你吧。”

就在此时，那名官吏亲自向贵州派遣了两名信使，以考察道路是否畅通。在等待期间，马赖留在了衙门中。他在那里有单独的住宅并安静而舒适地生活。卢氏在那里与衙门的人一起度时光，向他们阐述基督教教理并反驳他们的异议。他以其学问和才能而使所有人感到了惊讶，但却未有任何人接受归化。不过，对于了解这些事态的人来说，这也是一种不会使人感到惊奇的事。

当信使返回时，便有报告说道路已被暴动者阻断。马赖会士要求官吏允许他返回基督徒中去。官吏命令一位黄氏衙役于其家中接待传教士。这样一来，马赖先生便在于那里度过 16 日之后离开了衙门。

为了留宿新客人，该衙役的家显得过分狭窄和拥挤了。在经过两三天之后，黄氏便劝他们去寻找一个更方便的住宿处，他认为他们最好是前往唐氏家中。该家庭的产业是制造和出售用做偶像崇拜的物品，他看到一个外国人前来居住当然会感到不快，尤其是因为该外国人的布教趋向会危及其买卖。众人利用这次机会便对传道士卢氏说：“如果你师能成功地归化罗氏家族，那么就可以确信我们将都会成为基督徒。”

马赖先生在这家人中停留了 12 天左右。卢氏向所有那些前来看望他的人讲述宗教，无论他们都是些什么人都一样。这些说教再加上道台对待传教士们的态度，这一切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有几个望族家庭都与马赖先生建立了联系并多次向他送礼。大家于其中特别提到了马公爷一家，该家庭甚至把马赖先生（由于其汉名）而视为其马氏宗族中的一员。这在中国已经是很大很大的荣

誉了^①。

唐氏家族确为卢氏传道员的说教所动，似乎已准备宣布自己是基督徒了。但他由于害怕一旦放弃偶像交易就再没有任何可供生活的手段了，故而欲行又止。

在西林县城内，有一个富裕而又高贵的家族，它不害怕公开宣扬宗教真谛。我们下文就看一下这种事态是怎样出现的吧。

某一天，马赖对其传道员说：“你为什么不出去呢？为什么不在大街上露面呢？你在那里可能会撞上某种好东西。”传道员出去了。在大街上偶然遇到了一名叫罗恭叶的中国人的妻子。这个中国人是全城最受尊重的人物之一，过去曾充任过各种公职，但由于他患上了眼睛失明症而被迫离职。这个女子返回家中之后，向其丈夫叙述说马先生仍在西林县，而且她还遇到了传道员。罗恭叶的内心中已被圣宠所启迪，立即派人去找卢氏文人，并请此人向自己介绍已在该城中引起了纷纷议论的这种新宗教。传道员未费多大力气就说服了一个具有如此良好倾向的灵魂。罗恭叶自称是基督徒并变成了一名虔诚的新教徒。我们于稍后不久还将会讲到他。

中国的新年过去了，马赖先生离开了唐家以前往巡视板坡的基督徒，然后又去视察瑶山的基督徒，他在那里度过了复活节。他接着又取道贵州，盛夏的酷热使得外国人无法在广西省居住。马赖先生在贵州潜心研究语言，因为他当时的汉语知识尚不完善，他同时也负责大山和板江等地的基督教会。

二、在 1855 年 12 月间，马赖先生再次出发前往广西，他这一次是去殉教。他徒步旅行，经过 6 日的行程之后，于圣诞节前来到

^① Chapdelaine 先生的汉姓是马（马赖）。

了板坡。卢朝明再未与他同行。卢氏返回了其故乡茅口去了,以在那里为传播宗教信仰而工作,他本人也成了这种信仰的荣誉见证人^①。

在西林县,自前一年以来,事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道台调任到百色,其继承人是来自云南省的张鸣凤,此人从此之后占据了这一舞台。

自从到达板坡之后,马赖先生便听人讲到了仇教。他接受了罗恭叶的登门造访。尽管此人已双目失明,但仍骑马前来以向马赖提供一处避难地。马赖接受了这一邀请,于12月26日返回了西林县。然而,当不祥风言停止传播时,他认为在新年之后就可以立即返回板坡去了。他在该基督教会口中停留了不长的时间,然后便前往瑶山。但他无时间实施其使徒的使命,殉教的时间到来了。

白三利用官吏们换任的机会而重新开始投诉。他需要对由白家寨村的归化而为其行为制造了障碍一事进行报复。他在西林县找到了两个贪婪金钱的人,他们非常乐于帮助他,这就是张大官人的两名差役黄才和王本。白三就诉状问题而与他们协商。那里流传说马洋人前来该地区是为制造混乱,他宣扬一种纵容所有罪行的邪教,家庭的和睦局面自他到达后就被搅乱了;他挑动民众反对官府;他迟早都会以武力而夺取西林县城。

1856年2月22日星期五,白三提起了诉讼。24日星期日,官吏向瑶山派兵,授命他们逮捕马赖先生。马赖获悉了正在策划的阴谋,他本来可以通过逃亡而幸免一死。基督徒们敦促他逃往贵州。他回答他们说:“如果我离开你们,那么你们就会由于我而受苦。为

^① 卢朝明由于宗教信仰问题而于1868年1月28日被处斩,同时被处斩的还有传道员黄丁玉(Laurent Ouang)和修女林·阿佳特(Agathe Lin),他当时年仅47岁。

了使你们免遭更大的苦难,我必须留在你们中间。”

然而,由于大家坚持恳求,马赖同意在罗恭叶家中避难,希望这位基督徒的名望能成为他的一种保护伞。他由四名新教徒陪同:白小满、卢朝明、白望林(白三的侄子)和卢成学。他们绕道到达西林县,而差役们却由通常的道路前进。这些差役们多达100多人,但却未能找到他们要搜捕的人,于是便向瑶山的基督徒们发泄其愤怒。他们捆绑了最著名的人物并在抢劫村庄之后将这些人押走。就在大逮捕的同一天,有四个女子前往衙门,恳求官老爷怜悯其丈夫。作为全部回答,便是将她们投入了监狱。

2月25日星期一,一批文武官吏在200名营勇的簇拥下,前往罗恭叶的府上。马赖先生以及陪同他的四名基督徒和罗恭叶的次子均被捕。

当众人到达衙门之后,张大官人(张鸣凤)便面对所有的基督徒囚犯而拷问马赖先生。

“你来此地干什么?”他审问马赖。“你为什么希望用使民众归化基督教的办法把他们拖向叛乱呢?我知道,你想组织一支军队和骚扰该地区。放弃这种无信义的宗教吧!”

“我的宗教是真宗,我不能背弃它。此外,我也没有任何恶意。我鼓励大家行善并由此而获得天福。”

官老爷于是便审问基督徒们。白望林拒绝背叛,被抽300藤条。至于白小满,在被抽打300藤条之后,那位官吏才要求他背教,白小满对于多次重复的这道命令丝毫不予回答。官吏至此而转向了白望林。他说:“你以我的名义向他宣布说,如果他希望背弃这种宗教,那么我就将饶恕他。”白望林敦促白小满作出回答。首先是一无成效。这名公开表明信仰宗教的人由于痛苦,而从胸膛里发出了一阵深沉的叹息!最后,白小满做出了一种巨大的努力,站立起来,

又跪在张大人的面前并对他说：“大官人，如果您想杀死我，那就杀死我吧！我家中还有三个人：母亲、妻子和女儿。您也杀死她们吧！这样就会干净利落了。但我不背教。”官老爷听到这些话之后，便写下了将他处以死刑的判决书。由于他害怕听到被告人的指责，所以立即令人堵住了这位勇敢基督徒的嘴巴，四名衙役奉命到城外砍下了他的头颅。

经过官衙大门之前时，白小满发现了他的母亲。他获准向她做最后一次致意。对于这个可怜的母亲来说，她眼睁睁地看着被押去受刑的儿子跪在自己脚下，这该是多大的痛苦啊！对于这个被从其母亲的亲吻中拉开以走向死亡的儿子来说，又该是多悲壮的英雄行为啊！白小满堪称是第一个将其神父和恩师——尊敬的马赖先生即将到达的消息带到天堂的人。

1856年2月25日星期一，广西的第一名殉教者就这样死去了。他当时年长36岁^①

官老爷利用这次迅速处决的办法来恫吓他相继审问的其他基督徒们。所有人都在被抽打数百藤条之后结案了。如果他们未被判处死刑，那是由于他们缺乏白小满语言中所具有的那种勇敢的坚定性。他们仅满足于回答说：“大老爷！我们信仰的和我们不能背弃的宗教，这就是我们贵州先祖们的宗教。”

审讯结束后，官老爷便下令抽打马赖先生300藤条。刽子手们极端残酷地完成其使命，以至于他们甚至不屑于计算用藤条抽打

^① 在直到目前已发表的论述中，白小满或白满一直叫作 Laurent Pé-mou。这后一种表达方式出自大家读作 Mou 而不是 Man。至于删去了其中的“小”字，这在通俗语言中则经常出现。但殉教者的真正名字（当地人对他的唯一称呼）是白小满，Laurent 是他的教名。白小满曾于1857年9月24日被庇护九世（Pie IX）教皇陛下宣布列为享真福品者。

的次数；直到他们看到受刑者鲜血遍体时才肯罢手。那些受难者们既不抱怨又不发出叹息的毅力把他们逼到了尽头。

寡妇曹二娘(曹桂英)最早成为粗野谩骂的目标(有人指责她是马洋人的情妇),然后又无故地拷打她。在动刑期间,她不停地吼叫:“马神父!可怜我吧!”其他的女子们丝毫未受拷问。这就是2月25日的升堂情况。

那些新基督徒们(无论是男还是女)都被重新押回了监狱。马赖先生必须在衙门的大堂度过夜间和次日一整天。他双膝弯曲并被绑在一根木桩上,双肘倚在凳子上,双手被缚牢,以至于他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活动。傍晚时,官老爷又重新把他传到了自己面前。

他询问此人:“昨天晚上,当拷打你时,你是否曾感到痛苦呢?”

“由于支撑我的上帝的圣宠,我再也不会受痛苦了。”

官老爷接着说:“啊!你还讲你的上帝!再于其脸上抽打了300鞋底吧!”

完全如同前一次一样,这次大刑也是在大家未计算数次的情况下执行的。受刑者的面颊青肿,牙齿都被打碎了,却不肯发出一声抱怨。经过这次大刑之后,马赖先生又被如同前天夜间一样被拘在那里过夜。

在此期间,白三绝非是无所举措。当他看到马赖先生于白小满招供之后仍然活在人世间时,他便害怕其受害者不被判刑。因此,他便与黄才和王本等开会讨论。这三个卑鄙无耻的家伙便捏造出了一种诬蔑,我们的羽笔拒绝于此记录下这一切来。他们于是便于2月27日上午围住了张大官人。据说,正是这种新的控告,才决定了该传教士的命运。

27日晨,在白三前来探望之前,官吏便派其师爷对基督徒们

说：“如果你们的师傅希望付 500 两白银^①，那么大官老爷就将会饶恕他。”

同一天夜晚，知县又将马赖先生和寡妇曹二娘（曹桂英）传到了其大堂上，宣读了将他们二人打入死囚笼的判决书。下面就是其具体情况。他们先把死囚犯的头颅置入一个由四根竹子造成的方框之中，它们可以自由地并拢以夹受刑者的脖子，从而最终导致被绞死。刑具稍后又被悬挂在离地面相当高的一根梁上，以使受刑者的双脚再无支撑点了。至于其双手，它们被向前伸开并被牢固地缚了起来。这就是大家所说的笼刑^②。据我看来，这更应该是枷刑，虽然汉文中的“站笼”意指“吊笼”。

一旦宣布死刑判决，马赖先生和曹二娘立即就被关在两个笼子中，笼子被并列悬空吊在衙门的大门口之上。现在已是下午 4 点钟了。在晚上 10—11 点间，马赖先生共三次清楚地发出了深沉的叹息，这是垂死的喘气声。随着这种痉挛性动作，笼子脱落下来并摔在地上。那些异教徒们跑来了，马赖先生仍在喘息。有些人希望把笼子吊起来，但其他人却反对这样做，认为受刑者已经死亡。因此，殉教者的身体一直被抛在那里直到次日凌晨，躺在地上。那些基督徒于他们的监狱中听到了马赖先生的咽气之声，甚至还得以在灯光下看到他，他们一致声称他几乎是在笼子掉下来时便立即死去了（将灵魂还给了上帝）。

这是咸丰六年正月二十二日，这一天正好相当于公历 1856 年 2 月 27 日星期三，马赖完成了光荣的殉教。大家错误地将这一天

① 300 两白银约合 1000 法郎，每两白银价值 8 法郎。

② 这里系指锁笼刑。——译者。

定于2月29日^①。可以肯定,马赖先生是于一个星期天从瑶山逃出来的,那里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对于此后的事件,则是由曾经亲自耳闻目睹了这一切的基督徒囚犯们所叙述的。

刽子手们的仇恨并未因杀死马赖而消除。28日星期四,两名衙役将殉教者的尸体抛在了一副担架上,然后又抬往城外并砍掉了他的头颅。当刽子手的斧头砍下去的时候,朝天喷射出了三股血柱。这就告诉在场的异教徒们说,这个洋人的鲜血与其他人的血不一样,它甚至在死后还会流动。其头颅后来被挂在一棵仅存在有树干的大树上。该城的儿童们以向它投掷石块而行恶作剧,一直到头发脱落、头颅落地并在恶魔般的牲畜啃嚼下消失为止。其尸体无疑也成了这同一批动物的猎物。发生了这最后一种事件的地点位于距城门不远的地方,地处道路的南侧。这是一片以四棵大树为界而形成一個四边形营垒的荒地。悬挂过马赖先生头颅的那棵树已被雷电击碎^②。

寡妇曹二娘仍留在了那里,她受刑的时间延长了。但到了公历3月1日,衙役们对于看到她仍活着而感到厌倦了,于是便将她带出城外。他们以其粗俗的语言说:“马洋人的这个女人的命太硬了,她不想死。我们看一下当砍下她的头时,她会怎样?”大家确实不知道这个女英雄是在什么地方被砍头的。她年仅30岁^③。

① 见《年鉴》第28卷(1856年),第478页。

② 马赖于1814年1月6日诞生于罗歇尔,属古坦斯教区。他于1843年6月10日被举行派立礼而成为司铎。于1851年出发赴传教区。他于1857年9月24日被教皇庇护九世宣布为列入享真福品者。

③ 寡妇曹二娘(曹桂英)是一个中国女子,属兴义府(贵州省)。她是被利昂派往了广西以帮助马赖布道的。她就在马赖被道台召去的那一天到达西林县,于是便到了县衙。她自称曹桂英,大家有时也读作Kong而不是Koug(桂)。其教名是Agnès。她于1857年9月24日被宣布为列入享真福品者。

三、大家也记述了伴随马赖的殉教或继此之后而出现的奇异现象。下面就是人们所介绍的情况。

2月24日晚间,当该传教士出发赴西林县之后,在瑶山发现了一种神奇的光芒。当地人声称这是一道很强烈的光芒,但又未以其它方式确定其特征。没有任何理由能证明这种光芒如同有人所写道的那样具有十字架状。但事实本身却是不容置疑的,其见证者是瑶山的所有居民。

马赖经过25日晚上所遭受的可怕鞭打之后,是否还会神奇地痊愈呢?可以肯定的是,听告解的神父当时无法行走,而于翌日却行走自如了。他对于询问他是否感到痛苦的官吏回答说他不感到痛苦(这种答复使他被残酷地打了一阵皮鞋底子),似乎证明在痊愈中有一种真正的奇迹。

农历三月三日(公历4月),一阵伴以雷声的可怕风暴吹倒了西林县衙门的两端,将巨大的大门连同其铰链而平地拔起。官吏张鸣凤惊慌失措地躲在了床下,惊呼他由于一次不公正的审判而触怒了上天。这些具体情节是由该官吏手下的人介绍的。

同在三月三日这一天,主宰罪犯生死和执掌判决之笔的供像城隍(我称之为崇拜偶像)的右臂断落了,这就是向该城的居民们指出,对马洋人的这次审判是不公正的,并且还激起了神灵的愤怒。

道台官吏于是便返回了百色。当他听到马赖先生死亡的消息时,便给其同事写去了一封指责的信件。他对其同事说:“张仁兄应该知道,你在判决马洋人时作了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如果此人确实是罪犯,那么我本人就会不用等您到达就审判此案了。”

是否如同大家所说的那样,刽子手们吞噬了殉教者的心脏呢?我在此问题上尚未得到任何毋庸置疑的资料。能够向我提供资料

的唯一一名基督徒很久之前就已经去世了。此外，这名基督徒也值得特别提一下。

卢保成有两子——卢朝明和卢朝启。长子卢朝明于贵州受归化。其父在长时间地与他的诱惑相抗争，但圣宠最后胜利了。在仇教期间，他与其长子一并被下狱。卢朝启每天都为囚犯们送饭，他因在奔走期间未被辨认出来，故而有幸在场目睹了殉教者的死亡场面。某一天，他发现一些狗在争夺马赖先生的肢体，由于异教徒们在场，从而使他无法搜集这些珍贵的遗骸。但他却成功地拣到了一片在被抛在较为偏僻地方的破衣片。返回家中之后，他便向其母亲宣布说，他将于夜间去盗走殉教者的头颅并将之携往贵州。母亲反对说：“但是，如果你去做这一切，那么你父亲和兄弟将会在狱中被饿死，因为再没有人给他们送饭吃了。”卢朝启只好放弃了其崇高的计划。数日之后，他相当高兴地取走了马赖先生的头发，于稍后不久又交给了杨神父。他于1868年把于其家中珍藏的那些破衣服片交给了我。非常遗憾，年轻的卢朝启很早之前就去世了，他本来能够提供有关我们的殉教者行为的其它情节。

四、马赖先生死后，其他那些被囚禁的基督徒多达14名，就只有忍受监狱的恐怖和衙门差役们的烦扰了，因为差役们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强行勒索了他们的金钱。农历五月（公历6月）五日，从广州传来了一道释放令，但这道命令只能以金钱为代价才能执行。为了释放在押犯而花费的金额高达1390贯（7000法郎）。可怜的基督徒们沦为一无所有的地步了，而且他们家中所拥有的一切均被抢劫一空。有人甚至摘去了妇女们的耳坠。但上帝却不停地保佑他们。在继此之后的战争和饥饿年代，异教徒们被成百地饿死，而基督徒们却从未缺乏过生活必需品，他们甚至还成功地设法勾销了几笔债务。

我们尚有待于看一下上帝的手是如何得以惩罚那些仇教人的。

当我们的那些尊敬的囚徒们经过五个月最凄惨的囚禁之后得以被释放时，白三希望与这些人保持一种良好和真挚之友谊的虚假外表。其主要目的业已达到了，他于是便设法置马赖先生于死地而自己发一笔不义之财。但是，他直到死，始终保持了对基督徒们的不可调和的仇恨，不肯忽略任何暗中伤害的手段。这种隐蔽的仇教行为又持续了一年，天神的公正于此之后才表现了出来。

在西林县有一个普通的人，后来成了一大名人，在平息其它地区的叛乱时初具名气。此人叫作程大爷，现在叫程大人，他成了云南最大的官吏之一。白三看到了此人的影响，认为这是对基督徒们重新提出起诉的有利时机，但基督徒们都在自卫。双方都来到了程大爷面前。此人发表了这样一篇绝妙的讲话：“我的敌人也就是基督徒们的敌人，我的朋友也就是他们的朋友。”白三明白地误解了，但已为时太晚。程大爷立即开始审理其案件。白三的所有阴谋诡计都已大白于天下，使他罪有应得地被判处死刑。在后来的两日间，他受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刑拷问，其后被斩首。他留下了两个儿子。孩子们在获悉其父受刑并被处死的消息之后，便离开了自己居住的白家寨，退避到贵州去了。这样一来，这个充满了对上帝恶意的家族便消失了。

张鸣凤官老爷也很快就从广州收到了将他革职的命令，言明嗣后永不得莅任，这就是说永远禁止他再企望任何公职。他在西林县仍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便前往 Lan Lin(南宁)。据说，他在那里非常高兴地在—一个与他同姓的官吏家中找到了一个家庭教师的

职位。大家不知道他后来的情况如何了。

1858年,另外一名打教人也因其罪行而受到惩罚,这就是王本。他的残暴行为使他变得令人憎恶了。于是便有人策划了一次针对他的阴谋,他在西林县西郊的一个小村庄中被捕。当地人为了使他们的复仇愿望得到满足,于是便在最恐怖的拷打中置之于死地。

现在只剩下黄才了,很快也就轮到他受报应了,当暴乱者经过西林县时,他被他们杀死了。

这样一来,所有那些曾积极参与杀害马赖先生的人都凄惨地死去了。

二

一、正如大家刚才看到的那样,摆脱了其所有敌人的广西基督徒们再也不会成为任何仇教的对象了。从贵州方面不时地给他们派遣几名传道士以使他们更加坚定其信仰。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每年也都到黄草坝去拜访传教士们。宗教信仰一直于他们之中保留下来了,尽管他们很孤立。

最后,在1859年间,贵州的宗座代牧胡缚理大人向他们派遣了一名中国司铎,即杨神父。此人在瑶山逗留一个月,然后又在官山度过了几天。在结束了对基督徒们施行圣事之后,他便再次出发赴贵州去了,携走了马赖先生的圣餐杯和几件祭服。

第二年,由“长毛”(长毛起义军,太平军)派出的某些使者于某一日出现在西林县居民们面前,并且发出了这种警告:“如果你们不想被消灭,那就打开你们的门吧!”那些感到惊慌失措的居民们打开了城门。起义军宣布他们的和平愿望并进入城内。但从次日拂晓前起,便下达了全面屠杀的命令,全城遭到了洗劫。共有三分

之二以上的居民丧生,有许多家庭满门绝生,特别是罗恭叶家更为如此。在这次全面的大屠杀中,却有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例外,起义军饶恕了所有马姓的人,因为这是马赖会士的汉姓。义军向所有马氏人说不必有任何害怕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这种特殊呢?大家一无所知。但在城内和该地区有谣言流传说,义军是前来为马神父报仇的。

经过 13 天之后,义军撤离并向贵州挺进。义军在经过沿途所留下的最为令人恼火的痕迹之一,便是他们在所经过的一切地方都留下的不驯服思想,西林县地区变成了混乱局面的受害者。各方纷纷揭竿而起。铁(刀兵)、火和饥荒致死的人要比“长毛”屠杀的人更多。所以,在某些过去非常繁荣的古老村庄中,仅留下了十分之一的人口。该地区变得一片荒芜,唯有野兽栖身,有诸如豹子、野猪和老虎之类出没。

在杨神父离去之后,再未有人去巡视过基督徒们,但他们却不可能被彻底遗弃。大约到了 1865 年末,两广(广东和广西)的宗座监牧明稽埒命令他的传教士之一华大人(Gennevoise)继任马赖先生。新任监牧于 1867 年 11 月 30 日才完成了其旅行。对于他来说,能踏上这片被三名殉教者的鲜血浇灌的土地并生活在这些悲惨的基督徒中,那该是多大的荣耀啊!因为这些人是在逃脱了一次大规模仇教的残余,其中许多人还带有尊贵的伤痕。当那些新基督徒们看到他们第一位使徒的继承人到来,其欢乐程度同样也很大。天啊!这欢乐持续的时间太短了。

西林县的居民获悉了这名西洋人的到达。他们感到了其全部民族仇恨立即复发。华神父大人并不气馁,他首先想就在西林县城内购买一幢房子,但大家都反对他这样做。后来有人又散布了一些蛊惑人心的谣言,以一次新的仇教来威胁他们。该传教士推迟了其

计划,他负责对基督徒们施行圣事并在常井村^①购置住院。但由于形势日趋恶化,他于是便决定南下广州,以便与总督商谈这一事件。1868年1月29日,华神父离开了广西,留下了一名传道员负责基督教会的事务。他一旦到达广州之后,便请法国领事来处理这一事件。时隔不久,总督向西林县的官吏下达了接待并友好对待华神父和巴赞(Bazin)这两名传教士的命令,他们很快就将往西林县,在华神父大人尚未返回广西时,他接受了另外一个派遣地,也就是说他被派往了四川。

二、我在巴黎就接受了前往第一个目的地广西传教的任务。但当我到达广州时,明稽埒主教大人便把我留在了该教省中。我仅在三年之后才奉命赴广西。这个消息在使我充满欢乐的同时,也在我的心中多少投下了一点阴影,因为我即将独自出发,将受上帝神圣意志的支配了,上帝是我的领路者。我于1867年11月1日离开香港,以前往上海。一艘汽轮船从那里用三天时间将我带到了湖北省的省府武昌府。我又从那里乘一只中国小艇,经过47天的航行,于1868年1月7日把我带到了重庆(川东地区)。

同月22日,我到达了遵义府,居住在当时任贵州传教会长的梅西满会士的家中。但就在他被任命为广西传教区会长的前夕,却被义军阻滞在遵义府,义军当时占据了所有道路。我仅于3月31日才到达贵州省府贵阳府。我在那里度过了七个月,其中大部分时间都被用来学习官话。

当我获悉西林县一名小吏到贵阳府办事并且正准备返程时,正计划着独自一个人取道广西。我设法与此人联系上了,但他对此却心不在焉。他根本不想负责把一个他深知必定会受到憎恶的外

^① 常井村是距西林县有六法里远的一个村庄。

国人带到西林县。尽管他作了所有努力,但仍无法摆脱我。他最终勇敢地拿定了主意,我应该说对他的盛加赞美帮了我很大的忙。

因此,我于1868年10月23日离开贵州的省府,我的旅伴是三名官吏。11月4日,我们这支小小的旅行队进入了广西界内。我最终踏上了这片企盼已久的领土,于是便满怀激情和发自心灵深处地吻了它。我将为上帝而贡献自己的生命,这是由于享真福品者马赖神父的斡旋,尽管我尚不够资格,但仍然是即将占据这一职位。我们又走了11天,于11月15日星期日晚上到达了西林县。传道员宋先生(我已经把我的到达通知了他)与我同时进城。我下榻于一座私府中,这是作为我旅伴的官吏巧妙地为我准备好的。

翌日,也就是16日,我休息,以消除鞍马旅行的疲劳,另外还准备次日的拜访。该城的乡绅们都因讨论他们是否接受我的问题而消磨了一天。大部分人在我的旅伴的催促下,都表态说,在从广州传来了命令之后,大家不能再抗拒了。这场事件就这样告终了,领我前来的官吏非常高兴地给我带来了好消息。17日,我以尽最大可能的隆重方式进行拜府,以便大家在此后不会把我从一个被所有人公开接待过的地区驱逐出去。我坐在一乘四抬大轿中,前面有两名带顶子的骑兵开道。我们的头顶上有红色的中国大华罗伞盖。我首次拜府就是去拜访一名文官,他虽然不在衙门,但我却见到了其师爷(秘书)。在进入该衙门时,他们非常隆重地为我打开了大门。我尚记得尊敬的马赖神父也曾来过这同一座衙门,但方式完全不同。他是作为罪犯而进入那里的,我却是以胜利者的身分而进入的。我先后参观了他遭受残暴拷打的、被桎梏加身、被按倒在地的地方,最后是他咽气死亡的地方。我似乎觉得看到衙门中的地板由于其鲜血而仍然鲜红。这就是我在与官吏的师爷交谈时始终关注的思想。愿上帝保佑,我在我们的神圣殉教者们遭受过极大侮辱

的地方所取得的胜利，不会阻止我分享他们现在于天堂享受的荣耀。

我向师爷阐述了自己的旅行目的，向他指出我完全是为了传播天主教才来到这里的。我请他代我向官老爷致意，并请求他能表现出赞助基督徒们的态度。我接着又去拜访其他官吏。

18日和19日，他们对我的拜府作了回访。20日，我的一应事项都办完了，于是便出城去寻找那些迫不急待地等待我的基督徒们。

三、因此，我现在到了常井村自己的家中，生活在我的基督徒中。所有人都非常愉快，我则平安无恙地消除一路的疲劳。我非常信任的传道士以他的忠诚使我获得了新成功，此时他却突然病倒了，并于12月11日逝世。我的仆人——一个16岁的孩子也于同时因患病而发高烧。

我在常井一直滞留到1869年1月1日。本处是广西的一个主要基督教堂口，它在马赖先生时期尚不存在。我接着又巡视了板坡、官山、盖角和瑶山。这些地区过去组成过大会口，现在只有一些残余了。我就这样一直等到中国的新年（春节）时期，这个节日降临于公历2月11日。无论如何，我必须在城内得到一幢房子以接受拜访，但任何人都不想卖房。非常幸运，出乎我意料的是有人前来表示愿意租给我一幢房子。

我从2月9日起，便来到西林县。10日，也就是除夕，我非常用心地装饰了应该举行神圣弥撒的房子，这也是我的客厅。一切都奇迹般地获得了成功，12日和13日，我接待正式拜访。继这些最早的拜访之后，紧接着便是一些好奇者的来访，而且这些来访的人数很多。

应我的要求，那名文官张贴了一张赞助圣教的告示。他允许所

有人选择这种宗教,以最严厉的惩罚来威胁那些诋毁它的人。那位官吏后来认为他应尽义务请我吃晚饭。我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拒绝。由于看到他一再反复恳求,而且也害怕惹起他的不快,所以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首席武官于次日也给我送来了一张类似的请柬。由于我拒绝,他便亲自前来。他对我说:“大教士,当华大人前来本处时,我们未能接待他,对他犯了罪孽。我们现在希望以优待您而弥补我们过去的过失。”

根据这种陈述,大家可以看到,即使我未能在该城内完成某些归化,我的旅行也绝非是无益的,因为它为归化做了思想和舆论准备。我也充分利用了我在西林县的居住而徒步去向曾悬吊过尊敬殉教者头颅的大树朝拜。经过一段简单的祈祷之后,我摘下了几片树叶就立即离去了,以便不再引起异教徒们的好奇心。这就是一件使我感到吃惊的事情。我在自己的房间中供上了享真福品者的画像,根本不怀疑它会被任何人识别出来。然而,有一名前来看望我的官吏却对我说:

“这不是马神父的画像吗?”

“是!”我回答说。

他又补充说:“许多人都认出了他。”他于是便开始诅咒将神父处死的那名官吏。

我于3月6日回到了我的基督徒中,在城内共度过26天。4月22日,我病倒了。因此,出发赴贵州的时间也被一直推迟到5月20日。但当我一旦到达那里时,一场新的疾病又迫使我在三个月期间无法行动。当略显康复时,我便巡抚了白马屯、平角和大山的基徒们。这些可怜的基督教会口远不如过去那样繁荣。现在已经快10年了,上帝会由于本人的罪孽而抛弃我。这样生活在孤立之中,灵魂最终会枯萎。但是,由上帝的意志去决定吧!所有这一切

都向我清楚地证明,人生在世本来就是一种流亡。希望那些对传教士的生活具有某种看法的人至少应该为他作祈祷。

在到达常井时,我在那里重新会见了西林县的新基督徒。这是一位姓甌的文人学者,他在广西动乱期间曾是义军的头目,后来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他的归化轰动一时。在短短的数日间,他便能够传习教法了。他的虔诚使他完成了大量归化。大众在看到博学的人也成了我圣教的辩护士时,他们无疑都受到了震动。

我前一年在西林县租用的房间太狭小了,于是便注意购置一座较宽敞的住宅。许多人都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因为他们害怕重新出现仇教。一名传教士最终在西林县的落脚将会消除这种恐惧心情。12月25日,我派遣我的传道员梁先生去城内寻找一处适合我们度过第一个中国新年的住宅,中国新年于今年公历1870年1月31日。我的传道员首先与官老爷梁府爷达成了默契,他是城中最有影响的官吏,对我始终都很友好。由于我的传道员与他同姓,所以他们承认为同宗。该官吏许诺提供帮助以购置一幢房子。数日之后,有人告知我说共有两幢房子待售,各自价值200两(1600法郎)。对于一个钱包比我充实得多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种好机会。但我的贫穷处境却不允许我提供比100贯(500法郎)更多的钱。我只好仅满足于租用其中的一间房子,以于那里度过年关。

1870年1月30日

四、我于一大清早便出发前往城内。我的基督徒们陪同我,祝愿我的全部事情都能获得成功。我骑马旅行,四抬大轿紧随在后。在到达城市之后,我将自己的名帖送给了团首——他属于我的朋友之列,请求他将其大红华罗伞借给我,那将是我最大的荣耀了。我于是便下马乘轿旅行,我的传道员骑上了其矮小的马匹。城门上

以鞭炮声来迎接我们。受惊的马驹子并将骑在马背上的人抛到地下。

我首先关心的是将自己的到达通知所有的官吏们。这一切完成之后,我便为尊敬的马赖神父写了一篇很短的祭文,他是我在紧急情况下的最大庇护者。我特别请求他设法让知县于内心中赞成我,我尚未认识该官吏。该官吏姓潘,他接任了去年曾友好地接待过我的那一位。

1月31日(中国新年)

从天刚开始蒙蒙亮,所有人都起床进行拜年。我也穿上了自己最漂亮的衣服,准备接待来拜年的宾客。三声炮响,预告团首已经出动。他首先来拜访我,就如同拜访一名最重要的人物一般。几句交谈就直接进入主题。在这些礼仪性的拜访中,习惯上是不要讲平庸的事。拜年的人络绎不绝。那名文官(巡抚)也来了。我匆忙把他迎入我的客厅中,这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其相貌使他显得如同一个老实人。我获得了彻底的成功,于一日间共接待了18次正式的拜年。

2月1日

我今天对昨天的来访都作了回访,而且是以尽可能以盛大的排场进行的。我到处都受到了最体面的接待。再没有发生其它任何情况。

2月2日

又有几位拜晚年的人,其中就包括基督之最顽固的敌人。他是该城内最有权势的文人。直到此时为止,此人始终拒绝与我以礼相待。今年,当他看到对我的普遍支持时,也被迫如同所有人那样行事。他一见到我,便对于最早有人向他散布的有关我的谣言表示道歉,他声称大家尚不知道这种宗教到底是什么。我回答他说,大家

对于一种皇帝也希望于其整个帝国中传播以促民行善的宗教抱有怀疑而感到惊奇。

2月6日

为了使西林县当局变得越来越支持我，我于今天请该城的官吏来吃一顿便餐晚饭。除了团首之外，他们都来了，因为该武官作为回教徒是不能吃猪肉的。我利用这一机会而向那名文官指出，我期待他能发布一道支持我圣教的告示，我已经就此向他们做过简单阐述了。所有人都非常注意地倾听而又一言不发，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我一无所知。至于发布告示，该官吏向我推辞说，本地区只有一些愚氓，任何人都不会从告示中看懂任何内容（对于在任的官吏们来说，这是一种不大讨人喜欢的奉承，因为他们都是一些本地人）。我回答说，这种异议没有任何根据，因为本地文人数量巨大。此外，他本人已经发布了许多道告示，而又不关心是否有人阅读它们。全面谈话均到此而告结束。

2月24日

我前往衙门，看一下我是否会得到这种神奇的告示。此外，我没有忽略祈求享真福品者马赖的庇护。这道告示被毫无困难地答应了。

2月25日

有人给我送来了两份告示。它并不完全是我希望的那种文笔风格，甚至是完全应该作出某些修改。但我认为最好是保持沉默，以便不去刺激一名据说是相当顽固的官吏。

2月26日

官老爷梁府爷前来看我。我们的全部对话都是围绕着购置一处房产而展开的。他向我保证将给予支持。他向我承认有一派势力绝对反对向我出售城内一幢房子的做法。但他又补充说，这派势

力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因为所有具有影响的官吏都忠于他。这就是为什么他希望买契由这些名人中的几位附署为证。由此可以防止翻悔,我在未来的地位就会不可动摇了。愿上帝保佑,这项计划能够成功。另外,梁氏官吏向我许诺,大家将于年底之前在西林县看到一座教堂拔地而起。我说:“若无教堂,我们就无法在城内实施归化。”这是真实的。当看到我居住在乡下时,便有些人还害怕仇教复发。在城市中立足便可以驱散这些畏惧心情。

2月27日

五、现在我的全部事情都结束了。所以,我除了为我取道前往自己所喜欢的大山做准备之外,再没有任何紧迫的事了。我把我的名帖送给了所有的官吏,向他们宣布说我出发的时间最终被定于明天。今天是尊敬的马赖神父殉教15周年。他也曾离开城市而取道大山。但他比我幸运,他走向了永久的大山,那里为了开始长久不变的欢乐而结束了所有苦难。啊!至少是他没有忘记在人世间占据其位置的可怜传教士,他从天堂可以居高临下地为该传教士伸出其救援之手,以便迟早也把该传教士引向享受同样的天福之地。

2月28日

仍然是在15年前的今天,西林县的官吏曾命令其两名衙役取走了殉教者那已无命脉的身体,以便将之带到城外并砍掉其头颅。时代变了,现在官吏们给我送来了帖子,在我的旅行期间都纷纷祝愿我万事如意等。

这一年,我在城内的居住绝非无益。共有三家人接受了福音的善良种子,如果说他们尚不敢公开发誓弃绝其错误,那么我认为现在尚缺少时间以使他们远离谬误。

正如大家通过我叙述的事实得以看到的那样,西林县城当局

的那些权威人士一般都对我很友善。有一派相当强大的势力反对引入基督教,希望将任何敢于归化为基督徒的人都无情地驱逐。正是这一派势力以其威胁和谩骂,最终阻止了我讲到过的三个家庭实施宗教崇拜^①。但这些新入教者远没有失去勇气,他们仍到处都于其亲属和朋友中实现新的征服,以便当他们的人数变得更多时能表现得更坚强一些。城中的居民们本身也很坏和很腐化,赌博、抽大烟和偷盗,这就是他们的乐趣和消磨时光的手段。由于这三种欲望,所以很难完成许多归化。我特别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乡下,对那里抱有很大希望。本处的问题仅在于找到某一位敢于首先做出表率的人物。

在离开该城时,我留下了一名姓陈的文人,他的口才始终与其地位一样高。我希望他最终能成功地说服几个有权势的家族,他们的表率作用会引起连锁反应。愿享真福品者马赖神父能前来帮助我!愿法国那些读到这几行文字的善良人会向天作虔诚祈祷,以让丰富的甘露降落到西林县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从而使该地区不再长期地拒绝已经向他们提供的受归化的机会。

至于我自己,我远离城市的嘈杂和混乱,将在安静中对我的所有小基督教会口施行圣事,然后将取道贵州。

4月6日

对我的基督徒们施行圣事共持续了一个月稍多一些时间。在这次巡视中,我荣幸地为32个人举行洗礼,既有成人,又有孺童。共有四个家族被允许举行礼拜仪式。

西林县的一名文人至今始终受其同胞们的谩骂,从而阻止了他要成为基督徒的愿望,他于本月3日前来作礼拜。这是我在城内

① 众所周知,基督教崇拜是承认了真正上帝的异教徒们的首先公开的宗教行为。

获得的第一个受归化的人。我们希望这种典范能被其他人所效仿，大门从此之后便是敞开的了……

巴赞 来自教廷的广西传教士

附言：

我们收到的来自香港的最新书简，它为我们提供了以下消息：

1871年1月3日，我们收到了广西传教士巴赞先生的一封书简，其中提到：“在西林县发生了大量的受归化现象，正在为于本年末建立一个人数众多的传教区作准备。我刚在城内买了一幢房子，以在那里为已殉教的享真福品者马赖神父建立一座赎罪的小教堂。”

中国满洲传教区的综合报道^①

下引传教士们的书简摘录提供了有关满洲天主教传教区现状的一种相当完整的概念。

满洲宗座代牧区的讷依致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院长莫里(Maury)的书简

1870年5月21日于八家子

您的那封友好的书简于4日前寄到了我这里，也就是说传到了我们北方大草原的中心地带。您善意而又非常迅速地寄给我的物品尚留在满洲海岸。它们被寄到我这里来所需要的时间比从法国到辽东的大车运输还要长。我们的满族人尚未修造铁路，甚至还要等待许久，他们才会让我们在稍微畅通一些的道路上获得旅行中的豪华享受。他们于此美其名曰皇家之路的道路仅仅是遍布泥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44卷，1872年。——译者。

泞的迷宫般的可怕之路,带有无边无际的车辙,它们确实可以痛苦磨炼考验最勇敢步行人的毅力。非常幸运的是,如果将乌拉或鞑鞑鞋陷入泥潭中,那么鞋子本身也不会在这种充满泥浆和漂浮不定的地面上损坏,因而也不会由于寒冷和潮湿而被冻死在那里。

您会认为我在夸张吗?不!我只是在叙述满洲的故事。此外,这也是我们的人用他们的语言称之为“翻浆”的地方。您知道这些地区的冬季极端严寒,其寒冷气温徘徊于 -30°C —— -40°C 之间,地冻深达七尺。那时道路被冻得很坚实并且很畅通。但等到温暖的阳光重回大地,曝晒得就如同在普罗旺斯的天空一般,那时您将会目睹到一种在其它任何地方都不会看到的现象,我戏称之为满洲地区的“跷跷板”天气。随着温暖光线的照射,大地逐渐解冻,积水在泥泞层之下形成了水层。地面膨胀翻浆,形成了厚厚的和充满裂纹的易碎而粗糙的表层。行人再也不能信赖这种会在脚步下压碎的地面了。每年都有许多鞑鞑坐骑在那里被陷得齐腰深。经过一个小时之后,它们便会死亡,而骑兵们却对此无能为力。

您对于满洲自然界如此之多的诗意该说什么呢?甚至是鞑鞑地区最漂亮的城市也不想失去这一切。如果您有一天重操您那朝圣人的手杖并使我有幸把您带到我们的双城子州治或者是省会吉林^①的辖区。我向您许诺,在尽可能满足于您之兴趣的情况下,让您看到这种可怕的现象,这就是中华大帝国的这些著名城市中的某种令人恐怖的事物!

一块铁幕遮在该民族的眼睑之上。当他们看到我们经过时,便会在心中咒骂我们,甚至会鄙视地说我们是“蛮子正经过这里,这是一个鬼子(洋人)”。这都是中国式的诅咒,而我们事先就衷心地

^① 那里是鞑鞑老驻防大臣副将军的驻地。Fou-Kiang Kiun,疑为副都统。

原谅了他们：“不知者不为罪。”可怜的民众啊！愿他们于某一日能睁开眼看到光明。作为司铎和传教士，我们均自非常遥远的地方前来，以让这些人了解和爱戴耶稣——基督，让他们感觉到如此之多的不幸者都是他们的兄弟。大家在看到如此之多的灾难时，怎会丝毫不感到痛苦呢？大家怎会不祈祷虔诚的上帝最终将它的慈悲扩大到他们身上呢？

在浏览您的书简时，我对于您祝愿希望我这个卑微小司铎的使命获得成功和拯救被遗弃灵魂的行为深为感动。天啊！我们这里的鞑靼人的心几乎如同凛冽的北风一样冷酷。一种令人讨厌的傲慢态度在满族人中占据着统治地位，这种傲慢自鞑靼“八旗”征服全中国以来始终都在日益扩大。该民族的特点就是对外来的一切都暗怀仇恨，由此而产生了对我们圣教的这种漠不关心、这种令人窒息的麻木不仁、这种鄙夷和有时甚至是狂怒，因为我们的神圣救世主并非是作为满族人而诞生的。我们的北方教区完全是一帮愚氓或者是一些无赖和无节制的人、赌博成性的人、被充军发配的强盗和土匪。但我们到处都拾捡几根罕见的谷穗。对于现时来说，我们甚至共计有数百名望教者。当魔鬼对这种微不足道的成功感到嫉妒时，便会前来损害我们的事业，挑起官府的欺压和愚弄。自从这些动乱爆发以来，我们就仅有四名望教者了。在那些最早的望教者中，许多人都不再敢出头露面，只好返回他们的佛塔中去了。

纵观围绕着我们而发生的全部现象，大家根本不知道正在酝酿中的事端。到处都是仇恨、迫害，甚至是殉教。魔鬼对于一个威胁要摆脱它的帝国是否会感到颤抖呢？或者是这些中国人是否会消灭欧洲人呢？我相信非此即彼。大家把欧洲的短枪（卡宾枪）交给了天朝帝国的勇敢骑士，一直把文明程度发展到变成了欧洲人的剑术大师。大家完全有理由特别感到害怕，弟子终究会倒戈反击

其师……

您已看到,满洲的一切并非都是令人乐观而美好的,人类都会为此辩护。本处的所有人都知道朝鲜的不幸历史。大家还知道产生过什么样的报复。您会听到异教徒们向您诉说“大法国兵”被朝鲜人驱逐了。甚至还会有人告诉您说,如果一名法国人遇到一名朝鲜人,那么他就必须向该朝鲜人叩头,一拜到地,以作为臣服的表现……所有这类谣言都于此广为流传,它们对中国勇士们的战斗激情很少有誉美之词。

同一位传教士还于一年之后向被滞留于法国的方济各主教阁下寄去了下面这样一篇有关大水灾的论述,这场洪水使我们一个副本堂神父的住所被破坏了。

圣一于伯尔(Saint-Hubert 鹿山口)教堂,1871年7月30日
上帝刚刚再次使我们经受了一次严峻考验,而这次考验又特别落到了由大人管辖的地区。

经过在营子^①居住一个月以使我恢复健康之后,我前来这里以呼吸山上的空气。在崎岖不平的道路(由于下雨而被冲得坑坑洼洼)上,我整整地行走了一天。到达距营口只有三里远的三堆子,我发现清河由于下雨而河水大涨,月亮被暴风雨的乌云所遮蔽,我从此既看不到也分辨不清楚自己身边的任何东西了。必须于那里宿营过夜,我在一家旅店中睡在一束稻草上,因为根本没有被子。

次日,我在营口的下部渡过了激流,由两名通过马笼头牵着我的马匹的基督徒相助。我的善良的天使使我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河

^① 营子是一个很大的贸易中心,本是位于辽—西拉木伦河口左岸的一个港口。该城被英国人误称为牛庄。牛庄是位于辽—西拉木伦河上游 20 古法里处的一座小城。

流,从而得以在您那些可爱的基督徒中做神圣的弥撒。

现在是上午10点钟了。天空灰暗,乌云聚集在山顶上。暴雨越来越大地下了一整天。夜幕笼罩着我们周围,洪水在峡谷中咆哮,我于11点时略带一点急躁不安地入睡了。在1点钟时,我被惊醒了,我在室内听到了水在地窖中的啪啪作响的声音以及水和木板互相碰撞的声音,在外部则是人群逃跑的响声。男男女女以及孺童,所有人都已经逃到了山顶之上。

大雨继续如同倾盆似地降落,水位一直在上涨。由于不知道这场大洪水到什么时候才能停止,所以我们便想到安全地点去暂时安身。大水一直没过了我的胸膛。在与激流搏斗中,我最终到达了大山上,在那里找到了我的基督徒们。我在人群中来回穿行,到处打听是否所有人都得救了。大家在互相计算着。上帝保佑!没有任何一个点名未应到者。

这是一个多么苦难的夜晚啊!我心情非常沉痛地看到我们这些可怜的基督徒们遭受苦难。然而,他们自称非常幸福地看到我置身于他们之中,即使他们要死去的话,也有人为他们赎罪。那些被冻得麻木的幼童们都在哭泣,男男女女都在念诵其玫瑰珠经。这是一种既悲惨又宏观的场面,我双眼含泪。这些勇敢的人说道:“今天是星期六,圣母将会拯救我们。”

风暴倍加激烈。我们只能听到一些恐怖的呼叫声以及房屋在浪头冲击下坍塌时发出的沉重响声。经过一次长时间的等待之后,天空才稍微放晴了一些,阳光又出现了。我于是便看到了清河的水涨到了屋脊上,在圣一于伯尔教堂和主教府的顶部流动,这些建筑都如同船舶一般被浸泡在一片汪洋之中。营口完全成了一片黄水的湖泊,我注目瞭望花园的城墙,它们已不复存在了,唯有其大门由于巨石建成的工事而仍在顽抗。教堂院内的两幢房子坍塌了,传

道员院子中的两间房子和村庄中的数间房子也都坍塌了，所有房子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了损坏。

我们在泥泞地上和暴雨中念诵早课经。大人！我可以向您断言，所有人都非常虔诚。

大雨于10时许停止了，水位于中午时开始下降。我希望立即了解这场灾难的范围。王廷先和孔科德(Concorde)随我而去。我们在村庄的街道上，于坍塌房屋的残垣断壁中行走，最终到达了教堂附近。教堂仍然屹立在那里，似乎是未受任何损失。我进入了大人您居住过的房子，走廊中的石子铺路已塌陷，所有的炕^①均已受损，地窑完全成了一片废墟，炉上的烟囱及其附近的小房子已不复存在。花园已变成了一条流动的河床，激流沿途冲走了一切。我于激流中发现了一些房梁、柜橱、从山麓中冲下来的大树以及动物尸体等。主教府只有地面之上的部分才保留下来了。

数小时之后，水位降下去了，我进入了教堂的圣器室。那里的损失相当严重，几乎所有的装饰物都遭到了损坏。共有30多件教士白长衣、祭披、长袍和祭坛的幕遮都丢失了。

您的那些可爱的基督徒们再没有房子了，他们都睡在大山上。我自作主张地为某些男子、老人和儿童打开了教堂的大门，他们在那里于草席上过夜。

中国人估计我们的损失近10000贯^②，我觉得这一数字有所夸张，我估计不会超过5000~6000贯之多。然而，这毕竟是一次重大考验，上帝会允许这一切的，完全会因此而感恩的。它拯救了我们的生命，这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于此只有三~七里远的异教徒们

① 炕是于其上面铺床的带灶土台。

② 每贯约合五法郎(1000枚铜钱)。

的整个村庄都不复存在了。在本来共有 300~400 人口的旗口寨只有二人幸免于难。在其它地方,死亡的人数也相当多,尤其是在开州。

我们于下文将会在由另一位传教士德拉博尔德(Delaborde)致方济各主教的书简中,会发现这场事故的下文。

1871年8月7日于营子

当可怕的洪水于其奔腾的沿途中到处都造成荒芜和死亡时,讷依(Noirjean)先生正在圣一于伯尔教堂中。他作为亲眼目睹者,在写给主教大人的一封书简中,描述了这场悲剧的具体细节。这篇叙述使我安慰您那心灵的任务变得容易了,我只向您讲述这些灾难在营子引起的不幸,而且是为受害者们辩护的。

我一旦从讷依先生处收到了有关大水灾的真实消息后,便立即将此通报了布什(Bush)先生^①。他回答我说:“在类似情况下,我们一般都习惯于作一次募捐,但由于迫切的需要而不允许解决具体问题。因此,我的意见是我们必须尽快应急,也就是说为大量面临被饿死的受难人供应食物,然后再负责组织一次募捐。”他当场就交给我 37 两白银(近 300 法郎)。次日,也就是 8 月 4 日,他又将一张 50 两(400 法郎)的银票寄给了讷依先生。同一天,我便返回到布什先生处组织募捐,以救助最贫困者的需要,而且对基督徒和异教徒都不作区别地救助。

在西蒙(Simon)先生致方济各主教的一封书简中,便包括有关土著青年神职人员业绩的某些细节。下面就是这封书简。

^① 英国的常驻领事官吏。

1871年3月2日于盛京(沈阳)

去年2月间,神学院转移到了盛京。南部的基督徒们自愿无偿地出借其车辆,将某些仍生活在“雪地圣母院”的家具以及某些拉丁语学者带到了这里。我在经过对该地区的巡视之后,也亲自赶到了沈阳,发现这里的小“移民区”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也执普通教师的教席。从此之后,我再未离开过那里,唯有疾病使我卧炕不起的那几天例外。

对大人说吧!这一教席使我感到了特别满足,我不喜欢像其他传教士们那样更多地行走、布道、举行洗礼和告解,那样做是骗人。感谢上帝,我理解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之美好特征和必要性。只要大家希望如此,我就将非常愉快地忠于职守,此外,上帝会为我们的努力而祝福。从表面上来看,学院的一切都正常。

在一开始时,学生的人数很少,逐渐地增加起来了,我们的住院中现在共有20名年轻人,他们都志在为上帝和圣教服务。有三个人学习神学,四名学生学习拉丁文著作,八名或九名自两个月来一直在练习阅读,我们将在近期让他们掌握语法。最后,有另外四名年龄更大一些的人仅坚持学习汉文著作。我们毫不犹豫地利用他们来作布道。所有这些都积极地工作,其行为堪称典范。

我们将同时推动汉文和拉丁文的学习,而且还荣幸地有一名好先生帮助我们,这就是白倪芳。他在西黄地教我学习语言之后,便告别了妻子和儿女而追随我来到了这里。大人很了解他。他颇有学问,颇善言辞,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向异教徒们布教时都为我们做出了很多的服务。尤其使我感到高兴的是,他没有过分强烈的中国思想,能够公正地评价孔夫子和孟子,这是很幸运的,因为有什么样的先生必会有什么样的学生。如果我们于此有一名大博士,半异教徒和半基督徒,那我们就可以肯定,尽管我作出了所有

努力,他也会将其思想传给我们的年轻人。我们对于类似的事没有任何可怕之处。白倪芳的施教是基督教性的,我们的学生们都走上了正路。

这些贫穷的孩子们非常需要学习,他们甚至在汉字方面也非常无知,我们对此感到非常惊讶,包若瑟(Boyer)先生和我都对此感到惊奇。大人们的学习也有半数被忽略了,他们从未深刻掌握我国的文字。最年轻的人则更为幸运一些,我们逐渐地使他们掌握了天朝帝国的所有文学作品。这是一种绝对必要的事。为了对此坚信不疑,只要在一座中国城市中居住数月就足够了。当来访者向我提及某些我根本不懂的文献时,我该是怎样诅咒自己啊!尤其是当在我身旁的学生无法向我提供其解释时,我特别要诅咒。在法国,当一名教士听到念诵维吉尔(Virgile)或拉封登(La Fontaine)的某句诗而又不知是指什么时,肯定会感到滑稽可笑和狼狈不堪。在中国,那里的学究气更足,引证其它著作的癖好更为普遍,经典著作知识更是必不可缺的。

至于神学研究,我们则以更大的热忱坚持进行。我的学生们绝不是才学出众的佼佼者。然而,他们每天都流利地向我复诵其课程并能勉强地理解其意义,尤其是在一般要持续三刻钟的解释之后更为如此,我尽量作出安排以让他们在三年中能学到全部神学。

除了学院几乎在是未经我们同意的情况下于那里建立起来之外,又有一个圣婴孤儿院建立起来了。在七~八个月期间,共有12或13个孩子被交给了我们。如果欧洲的悲惨事件尚未因耗尽施舍之财源而迫使我们对所有要求都熟视无睹的话,那么孤儿们的数量将每天都会增加。这些孩子们要修所有的教理课程,我希望我们在圣灵降临节时能为其中的数人举行洗礼。继此之后,我们将让他们进入初修。在他们之中,有两名年轻的前化缘僧、两个独臂人、一

名瘸子和一个几乎被冻成白痴的穷孩子。

我们将以转引由西蒙先生致外方传教会神学院院长鲁赛(Rouseille)的另一封书简中的几段文字,来结束对于满洲传教区的这篇简单浏览的文字。

1871年7月31日于盛京

自一年以来,我们不停地在盛京传播圣教。我们从不会在公共场合露面,但却准备了一个讲道厅。我们邀请所有人前往那里学习拯救的真谛。前来听讲道者不乏其人。我们有一名青年传道士(教经先生),他除了接待异教徒并向他们通报好消息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事可干了。但是,天啊!那些善意的人在这片不信基督的土地上很稀少,各地受归化者的数目都很少。但自我们(包若瑟和我)到达该县的两年以来,我们共登录了80~100名望教者。

数日之前,某些前来这里投考的童生们,对于我们在自己的大门上张贴的两份邀请前来听我们讲道的布告感到不快,他们带头撕掉了它们。为了获得这种结果,则必须按照文人们的习俗行事,以使我们的讲道人无法忍受而开始。因此,共有10多个最狡猾的人前来,他们都是学问不大而傲慢不小的人。非常凑巧,他们发现了比自己更为强大的人。我们学院的先生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些布告的作者。他们喋喋不休地诉说,以最大的成功与这些人抗争。这都是一场场真正的大论战。

第一天,他们声称天和地为永久之物,大家应将它们视为万物的父母。他们为此提供的最大证据是大地能产各种草木和树棵。然而,根据出自情理和孔夫子的论据,如果大家非常正确地向他们指出其语言的荒谬性,那么他们于翌日便会改变策略和理论。他们于是便不再以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天地崇拜者的面目出现了,而是以

我们看不到的天地之神的面目显现。他们似乎准备了全部计谋,并且准备好了其全部文件,但我们的讲道者仍在其所有战壕中追逐他们并最终把他们全部打败了。

“难道在宗教中还有比你更强大的人吗?”他们最后询问他。

“当然!”他回答说。

“啊!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就是不知道他了。”

他们呆若木鸡地走开了,携带大家借给他们的一本宗教书籍,但却许诺将尽快返回。他们未再次出现,在未向我们还书的情况下离开了盛京。

他们不幸遭遇的消息在整个城内都略有流传,其他多名文人也向我们的基督徒们讲述过这一切。但这些不幸的人却不是由此而得出结论认为我们的教理是唯一正确者,为获得拯救就必须信仰之;他们不是怀着谦卑的心情来听讲道,而相反却是逃避之。因为他们如同在中国所说的那样,害怕看到自己“哑口无言和丢面子”。

这批文人是很难受归化的。各邪念已充满了其心灵,真谛和信仰于其中不占据任何位置。然而,我们并不失望。我们即将播下种籽,仁慈的上帝会在他高兴时,让种籽发芽和结果。

我有意前往一个距城市不远的村庄度过我们一个月的假期,那里有几户基督教人家。我将自己最大的学生带到了那里,我们共同向附近几个村镇传播福音。我作茧自缚地滞留在这个令人厌恶透顶的村庄中,已经有一年的光阴了。如同在所有的中国城市中一样,除了砖坯和泥浆之外,那里再无其它东西了。我迫不急待地想前往乡下,见到树木、庄稼和绿色。我在内心中同样也感到一种去向异教徒们讲道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个休假月中感到快乐……

我们现在享有一种相当的寂静。有人仇恨、诬蔑和诅咒我们。甚至连乞丐们自己也不敢喝我们的水，因为他们声称我们于其中放了巫术药粉。

所有人都如同一大信条般地相信，我们会挖去婴儿的眼睛、心脏和肝胆，以制造我也不知道的什么东西。如果大家敢于做的话，那么他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他们的恶作剧尚未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后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这里有人声称，梯也尔(Thiers)先生未能接待天朝帝国的使节，所以中国人集聚了部队并在备战。我们只有求上帝的保佑了。

您在哪里呢？亲爱的院长！您现在在干什么？有人报告我们说，您在默东(Meudon)的处境很危险，子弹和枪炮如同雨点一般落在您身旁。您未受伤，我们为此而应感激上帝。我们对于您的境遇放心了。但是，上帝啊！我们对于留在巴黎的那些神学院院长先生们的命运就完全不放心了。革命派是否会真正敢于犯下这样的谋杀罪呢？最近一封英文电报未提供任何细节地使我们获悉了这场起义的结束、杜伊勒宫(Tuileries)被焚和巴黎大主教被杀。我们在此问题上作了许多评论，怀着非常恐惧的心情思考可能会有多少司铎们共享了巴黎大主教的命运。啊！法国该有多大的罪恶啊！上帝竟以这样的命运来惩罚它。

天啊，在众人所忍受的这些巨大灾难中，我的心简直被一种最令人痛苦的损失撕碎了。我唯一的兄弟——拉·卢瓦尔的国民别动队的战士于1月6日在芒市附近的拉弗尔什战斗中阵亡了。他的心脏被一颗子弹射透了，所以当场死亡。他是一名非常虔诚的教士，在他阵亡12天之前，已快要领受圣事了，因而我对于他的灵魂会得到拯救感到很放心。这是我那可怜母亲的唯一安慰，也是她高龄的唯一依靠。您可以想一下她该有多少怨言啊！我请您为我这

两个非常尊敬的灵魂祈祷吧！

中国川西传教区的巴黎外方传教会洪广化主教致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书筒摘录^①

1872年4月24日

先生们：

我的副本堂神父教区包括川北、川西两部分，也就是说囊括了该省的一半地区。我们的那些分散在一片有15~16日行程的广袤地区中的基督教人口高达4万之众，我们还可以于其中增加数千名未领洗的崇教者。

几乎到处都有一些基督徒。一片富饶而美丽的平原环绕着其省府。除了这片绝妙的土地之外，我们的地域还有极难进入的山区，从而使施行圣事变得更加困难。潜力很快就耗尽了，眼睁睁地看着尚很年轻的传教士们被累倒和在英年早逝的现象，绝非罕见。我们大约共有50多名司铎，其中有30多个是土著人，而且每天都为增加其数目而工作。我们的两个大小神学院一般都有100多名学生。我们共有136座儿童或望教者的学校，分散在整个副本堂神父的教区的这片辽阔土地上。它们向1500多人施行基督教教育，其中绝大部分都从我们这里获得了生活必需品。我们的基督徒们极端贫穷。蹂躏了四川的起义军于10年前经过了这里，留下了一直延续至今的苦难。儿童们从非常幼小的年龄起便开始劳动，等到他们学习基督教义的时候，则根本不可能让他们到我们的学校中，除非是向他们提供衣食，甚至有时还要为其双亲多少提供一些生活必需品。我们还应该补充说明，今年已使人深刻感到了生活必需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44卷，1872年。——译者。

品的昂贵。冬季漫长而严寒,大批穷人都死于饥寒。今年元月间的某一天,当我从我们的小修道院返回时,我的轿夫们停在距省府有二法里的市中。在面对客栈的地方,有两具尸体,其一是18~20岁的男青年,另一个则为40岁的男子。在他们身旁,又有一个已失去知觉的垂死之人。所有这些不幸的人都是饥寒交迫的受害者。

在我居住的地区,如果能够消除有碍我们的物质和思想的障碍,那么我觉得受归化似乎会很容易和人数也会很多。如果从其本性来看,那么中国人就不是基督教的敌人。如果让他们自由行事,那么他们就会走上自己所看到和理解的那种善道。对于他们来说,这样做越是容易,他们对于偶像势力的信仰就会越微弱。他们从事迷信活动,经常出入于庙宇,在某些日子中还焚香祷告,完全遵循天朝帝国的习惯。他们的双亲都是信仰迷信的人,其邻居和朋友们同样也如此。要挣断这条把他们与所有人联系起来的传统锁链,他们确实无法下这样的决心。在他们眼中看来,这有伤于孝道之风化。这些考虑使许多善良的异教徒都远离我们而去了。

除了这种障碍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困难,出自那些希望信仰基督教者的家庭。中国人非常执著于其习俗,我们刚才已经讲过这一点了。在归化基督徒时冲破这种习俗,那最常见的就是掀起整整一场反对自己的风暴,掀起持久的仇恨。双亲、夫妇、儿童,甚至有时还是所有人都参与了这一事件。双亲剥夺儿子继承权的现象不乏其例,其唯一的错误就是信仰了基督教。大家无法掩饰这一点,我们之中的这一障碍出自家庭,它将大批都有良好倾向的人维系在异教之中了。

但最令人望而生畏的却是出自于充任公职的官吏们的仇恨。大大小小的官吏、各种级别的文人、村正、民团首、营勇和衙役,一旦涉及到袭击新基督徒时,这群乌合之众便会形成了一个整体。他

们设置障碍,炮制出毁灭性的官司,有的还从事抢劫,始终都进行诬蔑。传教士们无法对这种令人不安的现状保持沉默,他们在寻求使公正大白于天下的手段。他们在诉讼中遇到了一些怀有成见的法官,这些人也会被以重金贿赂,他们往往都是我们基督徒的真正迫害者。我们的干预不会使他们感到高兴,舞弊和受贿暴露出来了。我们的那些缺乏理智的顽固派认为,以愚仇而纠缠我们要比诉诸法律更容易得多。

在四川,这些分别出自中国习惯、家庭困难和尤其是衙门欺压的障碍,形成了阻止中国民众归化基督教的主要原因。当然,还有其它许多原因,但却属于次要范畴。下面就是其中的几项原因。

在许多省份,人口都聚集在城市、村镇或集市上。四川的风俗习惯别具一格。每个家庭都于其田地中建造一幢房子并在那里孤立地生活。这种离群索居的行为成了讲道的一大障碍。一个村庄无疑可以固执己见地不接受好消息,但这也证明密集的人口则更容易受动摇。只要有一个重要人物前来受归化,那就可以使其他大批人步其后尘,纷至沓来。如果说坏典型也具有感染力的话,那么好表率的作用有时同样也不会小。由于在四川缺少村庄,所以在哪里布讲福音就会更加辛苦和收效更微。

在一般情况下,欧洲传教士和土著司铎们都不是我们可以派向异教徒的首批讲道者。大部分欧洲司铎都不太熟悉中国人的科学、汉文方块字知识和风俗习惯等。中国司铎们都是在我们的学院中远离尘世喧闹的地方成长起来的,由于缺乏自信的和有限的教育,所以均未受人世间腐化之玷污。我们根本就不能利用他们以组成我们讲道师的先锋队。生活在尘世间的人更适宜这类圣职。当我们能够找到这类精通汉文方块字知识、善于言谈和讨论的人士时,他们便会对我们有很大帮助。

自数年以来,四川省便由一名姓吴的汉族血统的大官吏(川督吴棠)统治。这位高级官吏是西洋人不共戴天的死敌。过去,他曾在帝国的一个沿海省份任官,当时曾与英国人发生过冲突。如同曾与欧洲人打过交道的几乎所有中国人一样,他也打输了这场官司。这个充满自信的人实际判断力很低微,他发誓要绝对向来自欧洲的一切报仇。此人在四川为我们制造了许多灾难,因为他将其爱找麻烦的思想传给了其属下的所有官吏。崇厚的兄弟——鞑靼族的崇氏驻防大臣(崇实)率领一个使团到法国去了,负责处理自1860年条约以来的四川教案问题。这位崇氏驻防大臣于去年被罢免了职务。他的继任者刚到达不久。但提督胡氏(胡中和)与他争夺处理基督教教案的权力。不久前有人将此呈奏了北京朝廷。在等待回答期间,我们感到了焦躁不安。提督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好处,或者说制造许多灾难。因为在中国,一个省的总督要比欧洲的一个王公更具有独立性。

当我两年前在法国时,有人经常询问我,中国的基督徒在信仰中是否虔诚、持之以恒和团结一致。是的!我们的大部分基督徒都使我们获得了这种安慰。毫无疑问,这些穷苦的人都有其弱点。如果大家想到他们生活在异教之中,而且他们也认为这种异教就相当于堕落人类的所有恶习,那么这一切都是可以解释的了。尽管存在着这些随时都会出现的危险,我的基督徒们仍然普遍地坚持走上了善道。在百名基督徒中,也只能勉强有一名才会经常不履行其早课和晚课义务、不会每天都念玫瑰珠经、不根据教规而作礼拜天的祈祷和庆祝所有节日、不严格遵守所有的禁忌和不能于一年至少作一、二次告解。如果出现我们的基督徒破坏或违背了其中的某些义务的情况,那仅仅是由于一时的紧张或者是出于人类的尊严。在所有人身上,都有一种很大的善意之本。

在我们的艰苦生活和劳动中,经常使我们感到痛苦的问题,恰恰并不完全是这些基督徒们思想上遭受折磨的场面。它们是人类软弱性所固有的,我们的中国基督徒仅仅是为此而付出了一种相对较少的代价。但我们每天都看到成千上万的人丧生,尽管我们为了拯救他们而作出了所有努力。这就是我们感到撕心裂肺的真正原因。在我们之中,魔鬼作为主宰一切者而占据了统治地位,可以将其魔军推进到他们希望的任何地方去。它可以随心所欲地宰割和夺占民众,以将他们投入永久的酷刑中去,而我们这些传教士们也只能拾捡几根麦穗,他们强迫为我们确定的这种条件使我们流出了非常痛苦的眼泪。只有基督徒心肠的极度苦闷才会知道一个灵魂的价值并迫不急待地想拯救它。天啊!谁会消除我们将会遇到的巨大困难呢?谁会驱散异教的愚昧呢?谁会使许多盲人睁开双眼呢?先生们,这就是你们以及你们虔诚教友们的祈祷。一种善良的灵魂应拥有一种特殊的秘密,以便触动上帝的心,打开心扉并从中得到拯救的圣宠。

为了公正地评价我们的新教徒,决不应该忘记他们生活在被异教徒包围之中的悲惨处境。异教徒们极度厌恶新基督徒并迫使他们忍受仇教的所有恐惧。难道他们始终都能够不再抱怨地忍受所有这些凌辱吗?先生们,为了使你们能够理解我们基督徒有时要忍受的苦难,请允许我向你们举出那些居住在徐水县的基督徒们的例子为证吧。在该县中,7—8年前就已有人讲道,上帝已为我们的事业降福,但该要忍受多少凌辱人的事啊!许多新入教的教徒遭屠杀,他们的尸体被投入了江河之中。在许多集市上,异教徒们组织了自卫队,以阻止基督徒们出没于这些集市。一大批住宅遭到了抢劫和焚烧,一位优秀的中国教士几乎被杀。难道大家对于我们的基督徒有时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也可能失去耐心不会感到惊奇

吗？

由中国政府发表的反对天主教传教士们的备忘录强烈地指责他们，说他们不止一次地形成了被传到法庭的基督徒们的辩护人。我们坦率地承认，如果捍卫受不公正欺负的无辜是一种罪行的话，那么我们正是这种罪行的肇事者。当发现我们的基督徒们仅仅由于是基督徒而饱受虐待之凌辱时，那又怎能向他们关闭我们的心扉呢？我们怎能不至少是向有关当局阐述支持他们的主要原因呢？但正如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样，官吏是基督徒们最大的敌人，也是基督徒们所有灾难的肇事者。抢劫活动都在暗中受到了他们的鼓动，大火都是由衙门放的。正是由于官吏们，平民百姓们才起来反对我们。当他们预审一件诉讼案件时，便反复斟酌这个问题，以使我们的那些本来是受害者、起诉人和原告的基督徒们反而变成了被告。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证来。近来，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提出控告，说多达40人的土匪们前来抢劫了其家庭。收受了巨额贿赂的官吏又秘密地与恶徒们相勾结，转而共同对付原告并以一种非常强烈的愤怒口吻说：“你为什么要把你的钱和财宝留在家中呢？如果你稍加谨慎，那就不会有人抢劫你了！”官老爷一点也不耽搁，也不想听取任何一点解释，便令人在此人脸上打了50鞋底子。面对这样的事实，谁不同情我们的基督徒呢？谁还敢于指责我们想在法庭上求得公正呢？正当大家阅读备忘录的时候又发现，对传教士们的主要指责之一，即出自他们对于那些为了追求公正而受难者的慈悲心。

我们要对这份臭名昭著的备忘录讲几句话。经过天津的大屠杀之后，中国人在这次可怕大屠杀的后果问题上，不会不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为了使文明世界心目中产生一种良好信誉的表象，他们使用了一种出自其狡猾和诡谲才能的手段：他们指责传教士们激

起了民愤。这条理由是不严肃的,它纯属是为了欺骗人才提出来的。正如在这道诬蔑檄文的第3条中所指出的那样,涉及到了一种在我的传教区中发生的事实。由于在同一篇备忘录的第7条中提到了我一样。先生们!所以我将去向你们解释这一切,你们可以在获悉了其起因的情况下判断中国的良好信誉是什么。

大约在这道备忘录的第3条中间,大家可以读到下面一段文字(1871年8月18日的《上海新闻》):“……在各省,传教士们都向地方当局替正在打官司的基督徒们辩护。四川的这名女基督徒便是证据。她要求其佃农以实物交纳根本就不欠她的租税,后来又犯下了杀人罪。一名法国主教冒昧地向官府递上了一道诉状,以为这个女子辩护并使她获得豁免。这件事于四川人中激起了至今仍在延续的仇恨。”下面就是对事件真相的报道。

有一名叫作戴才(Tay-Tsay,现已亡故)的基督徒,曾经是一个富裕而又劣迹昭彰的异教徒张氏的佃农。大约在咸丰皇帝在位末期的1861年,四川西部受到了一支起义军的侵犯,他们把一切都投入了血与火之中。在起义军到达时,戴才请其主人收下他应交纳的稻田地租(70石未碾的稻谷)。因为他害怕土匪们会前来烧毁其房子和稻谷,从而使他无法交纳年租。其地主却拒绝收租,声称他与起义军的秘密会社有联系,其财产和房子不会遭受任何损失。他的打算完全落空了,因为起义军烧毁了佃户戴才的房子以及贮于其中的稻谷。风暴过去后,张财主索要地租。佃户回答说无法交租了,因为稻谷已被烧毁。他还认为自己不应该对此负责,因为其地主在起义军经过之前拒绝接受租子。由此而出现了一次到地方官吏那里对簿公堂的官司。五个月之后,这场官司尚未结案,而当时到处都开始收割小麦了。张财主完全是违法性地派遣15名日工去强割其佃户戴才的小麦。佃农这天不在家,其妻戴高氏在一名

家人(其亲兄弟)的陪同下,希望阻止张家日工们割其小麦。这个不幸的女子当时就被张家的两个儿子抓住,并被抛弃在一个灌满水的沟渠中,还有人在现场将其头按在一个容器中以图淹死她。家人急忙跑去救助她。双方以刀刃发生械斗。女佃农的家人多处受伤,但她也砍伤了其对手们。张氏异教徒的儿子之一受了致命的伤。其父不是去告发佃户的家人,而是起诉佃农本人。然而,此人于这一天却根本不在家。艾氏(德拉玛尔, Delamarre, 他不是法国主教,当时的主教是佩罗淑)致信于负责处理我们教务的鞅鞅提督,要求他注意到,有人在对他讲张财主儿子死亡是由佃农戴才造成时欺骗了他。这种意见使得佃农脱身了,但其家人却在狱中被杀害。

在同一份备忘录的第7条中,大家可以读到下面一段话:“同治六年,四川布政使写信告诉我们说,法国主教洪广化在他致官府的一封信中,使用了由他本人私刻的一颗官印。”

有关这方印鉴的辩论和长时间的审判,以及用我的名义发表的一本小册子,都被伯洛内伯爵(Le Comte de Bellonet)告到了北京的总理衙门,这一整场事件已被审理并作出了判决。但伯洛内向在华的所有主教发出了一份通知,要替我那份受到侮辱的诉讼报仇。那么,应该怎样想象总理衙门那幼稚的厚颜无耻呢?它同时又被一种很大的恶意所玷污。总理衙门竟丝毫不感到脸红地对一件事翻悔,因为它过去曾亲自判定这是一名隐蔽在四川省府衙门中的赝品伪造者的作品。

先生们!我认为必须结束这封已经很冗长的书简了。请接受我们的传教士们和我本人都愉快地向您和您的那些虔诚教徒们的最真挚的谢意。若无您主持的天主教那杰出传信部的帮助,我们的传教区又将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每天都祈祷上帝使欧洲和平;为我们可爱的法国祈祷,它是传信事业的真实本源。

波莱莫尼区的主教、中国川西北宗座代牧洪广化

(Jean-Théophile Pinchon)

中国川东传教区的消息

巴黎外方传教会川东代理牧监白德立致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书简^①

1872年8月1日

先生们：

你们对我们传教区的关心定会使你们高兴地获悉，范若瑟主教阁下顺利地返回了其羊群之中。在他离开的三年期间，大家始终都焦急不安地等着他的返归。当看到主教大人被迫再次从事一次遥远而又危险的旅行时，我们的欢乐心情却变得焦躁不安了。酉阳和彭水的悲剧性事件使李国先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之后，导致在我们新基督徒身上发生了各种灾难。主教大人前往北京，试图使他们的命运略有改善。这些可爱的新基督徒们成了大量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众人都在放肆地诬蔑他们，因而必须设法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很久以来，传教士们就已经得以定居在酉阳和彭水城，并在那里继续其使徒之使命。他们甚至可以相当自由地在乡下多处行走。但其它许多地方却由于仇教者们的威胁而被封闭。

本处是我们拥有大批新基督徒的基督教堂口之一。我不希望再对它长期置之不理了，而是认为应该向那里派遣一名司铎，以给予他们某种精神上的支持。此人刚一到达，便发现自己身边笼罩着许多危险，而且面临的威胁又非常严重。经过一段短期的露面之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45卷，1873年。——译者。

后,他又出于对新灾难的畏惧远离而去。

这一年,就在主教大人返归之前不久,我希望作一次新尝试,于是便指令另外一名司铎前往巡查这些新教徒。在听到他到达的消息之后,整个地区都出现了一片极大的沸腾,我们的政敌便开始制订其计划。首先,他们活捉了司铎的传道士,就在该集市小官吏的衙门口粗暴地拷打他。他们然后又派去 20 多名女子去污辱他,纷纷逼问他,有的女子询问其丈夫的情况,有的询问其儿子的下落,她们都声称这些人都会被基督徒们杀害了。这样的场面从未中断过,大家纷纷谈论为对付他而应采取粗暴行动。他这一次又被迫向众怒让步并在三日之后离职而去。

这一事件并未到此而告结束,我们的敌人也匆匆忙忙地致信酉阳城的官吏,向他报告说,基督徒们发动了一次暴动。酉阳的副本堂神父余克林先生获悉该司铎正面临危险,于是便亲自跑去报官。该官吏佯装不信其报告的真实性,以便免除采取行动之劳累。但一旦当几名暴徒前来指责我们的主要基督徒要发动暴乱时,其全部精力便立即恢复了。他未作任何核查,便派出了一支 30 多人的营勇,发布了非常严厉的命令,甚至还发布了一道告示,这一切的矛头都是指向我们的。为了更好地掩饰其阴险恶毒的行为,他又让人告诉余克林先生说这些措施是根据别人向他的一再坚持恳求才做出的。我们的教友根本不信任该官吏的言辞有多大的真实可靠程度,他秘密派遣心腹人士尾随营勇而去。官吏命令的布告已张贴于市。由于它通篇所表现出的只是对基督教的仇恨,所以我们的新教徒们都被吓呆了。次日,又有两名基督徒的家庭遭到了驱逐,他们住宅的大门被封闭。两天之后,官府又缉拿了主要的基督徒之一,动大刑拷打他 3000 棒,然后再将他投入了囚牢。这个不幸的人遭到了极端残酷的拷打,以至于其身体许多部分的骨头都裸露出

来了。另外两名新基督徒曾与这名教徒一起居住，他们也都被投入了监狱，八个月来始终在狱中受煎熬。这些暴力行为的肇事者仍不希望在这种恶作剧中途停止下来，他们甚至去放火烧毁了这三户人家的房子。

这些事件发生在一个乡下集市上。当它们刚被城市中的居民所得知时，一名妇女便派其儿子向我们的药铺投掷石块，乱砍乱砸，而且还肆意谩骂在场的人。药店的一名职员为了恫吓这个孩子，便拽着他的手以把他带到了衙门。立即就有一大群市井小人冲了上来，扑向了我们的职员。他们想把他撕成碎片。然后当那个孩子的母亲破口大骂我们的传教士和基督徒时，人群又如同潮水般地侵入了我们的住宅。

余克林先生不会不知道这些场面的严重程度，他也对其后果深感担忧，认为应该向知府呈报。知府仅满足于回答他说：“既然这是一个孩子，那就把他留在这里吧。”这一切就算一了百了了。

这样一来，当我们的敌人希望惩罚我们时，他们便不再需要亲自前来谩骂、殴打、抢劫或者屠杀我们了。他们只要打发一些儿童、妇女或市井的流氓前来就足够了。一方面由于这些暴徒们可以被以低价收买和愚昧无知，另一方面是据中国政府的备忘录认为，真正的罪犯不会受到惩罚，所以传教士和基督徒们都可以无辜地受到虐待、抢劫和屠杀。

为了使你们更好地了解这些基督教堂口的处境，先生们！我想向你们引证余克林先生的一封书简的某些段落，它写于今年4月24日。

“二三年之前，紧接着一次打教事件后，由于该地区尚不安全，基督徒们的住宅已被焚烧，再没有任何地方接待我们了，所以我们被迫滞留在酉阳。我们的敌人利用了这一机会，以恫吓新基督徒并

迫使他们背教。

他们对这些人说,看你们多么愚蠢啊!你们信仰了基督教,大家到处都奋起反抗你们。大家可以不受惩罚地屠杀你们的亲戚、烧毁你们的房子、侵占你们的耕地,从此之后就会一天也不停地诅咒你们。由于你们已被官吏们遗弃了,所以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你们那些司铎们身上了。可是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呢?这些司铎们在一段时间内遭到了驱逐,现在又返回来了,但他们会对你有什么益处呢?他们受到了那些根本不重视其控告的官吏们的摒弃和鄙夷,他也感到了正在威胁着自己的巨大危险,于是便如同坐牢一般地自我封闭于其教堂中。因此,你们应停止再干不理智的行为,放弃一种给你们造成了如此之多灾难的宗教,与我们一起恢复偶像崇拜,那样你们就会得到帮助和保护。”

这就是我们的新教徒们每天都从打教者们口中听到的话。在此期间,便传来了天津惨案的消息,其反响几乎重新将我们抛入了新的灾难之中。然而,这场滚滚而来的风暴却逐渐地消散了,某些基督徒被仇教的深重灾难搞得精疲力尽,被这些几乎是持续的威胁和恫吓严重动摇了,因而产生了背教的薄弱意志。

一旦当恢复平静之后,我们便重新开始巡视距城市最近的基督徒家庭。我们的敌人于是便改变了策略和言词。

他们声称,你们的司铎们在两年间都保持着隐蔽状态,因为他们坚信没有过分暴露自己。但文人们现在都重新聚集起来了,一名大考官从北京前来以举行科举,你们的司铎们都感到害怕并躲避起来了。难道你们让他们从你们家中出来不也是很谨慎的举动吗?应该知道,皇帝已降旨要毁灭你们的宗教了。

大约就在同一时代,该官吏发布了一道告示,禁止当地的一种教派,大家称之为灯花教。他命令营勇和衙役们将他们可能会遇到

的该教派的所有成员都捆绑起来去见他。告示张贴出去之后，流言蜚语更加强烈。

大家一致声称，这里根本没有灯花教，官吏们从此而禁废的正是基督教。

我们必须指出，过去就发表过一道类似的布告，从而煽动起最近一次教案。这些流言蜚语绝不是没有严重后果的。实际上，受到恐吓的许多站口都拒绝接待我们。原来有40多名背教者正准备返回教团中，现在却推迟了他们的返归。然而，神圣的上帝在保佑我们，流言蜚语不攻自破了。

先生们！你们知道，我们酉阳和彭水的新基督徒是怎样受到了残酷虐待，所有灾难都降临到了他们头上；你们也知道官吏们的一切伎俩，他们都希望改变各自的角色，让打教者成为受害者，同时又让受害者成为打教者。皇帝钦差仅仅是惩罚了所有这些不公正行为。那篇臭名昭著的备忘录又重复了这些问题，并且作为已得到证明的事实而讲到了这些诬蔑。我们的基督徒们未得到人类任何公正行为的待遇，他们的刽子手们受到了赞扬和犒赏。上帝之手已经伸出来了，并且是以一种明显的方式伸出来了。它打击了众人希望宽容的那些人。我们可以略举几例为证。

在那些最大的罪犯之中，首先应该提到酉阳的官吏，他是一个可悲的基督教背教者。上帝不久前让他患中风病而给予了他一次沉重地打击，从而使他濒临死亡，而且从此之后就使他无法行使其官吏职务了。为了进一步增加对他的教训，在派遣营勇和草率发出我于上文刚讲到的迫害当地基督徒们的布告的八天之后，当有人放火烧毁这三名新基督徒们的房子时，一场可怕的火灾却使其衙门的部分设施成了灰烬。

余克林先生还写信告诉我说：

您在两年前向我们报告说，皇帝钦差为了给予我们某种安慰，曾将六七名打教人判处流刑^①。这是侮辱我们的又一场闹剧。所有这些被判罪者都有自由，他们可以自由进出衙门，自吹自擂地夸耀说，作为他们迫害基督徒之残暴行为的报偿，已被升官加爵。官吏们的意图是很明显的，他们希望民众能知道他们赞成我们敌人的极端粗暴行为和企图一举消灭圣教。但上帝干预了这事件，其手粗暴地打击在了我们的多名刽子手们的头上。其中的某些人正处在年富力强之时，却英年早逝，先后暴卒了。其中之一的张玉琮在数年内招纳聚集抢劫犯以驱使他们攻击我们。他顺流而上地乘船到达重庆，以使用推动对新教徒审判的办法来进一步迫害我们。他在返程中失去知觉并在尚未成家立业的 20 多岁时便一命呜呼了。

另外一位自北京而来，他是前往那里捐官和帮助那些屠杀我们的刽子手的。他归家不足三个月，便患了一种我不知道是什么名字的顽疾，几乎立即暴亡。

第三位比前两名更为可怕，由于他已经给我们制造的灾难和他可能会对我们所做的一切，也受到了惩罚，他姓陈。尚且不计他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前几次打教，仅在天津大屠杀之后，他又跑遍了整个地区，招募新的匪帮并掀起了反对我们的一场新风暴。去年 10 月间，有人向我们报告说他已经死亡。被派遣前来查看所发生情况的两名基督徒发现整个家庭都在哭泣，和尚们正在殡葬仪式中制造了习惯上所见的那种喧闹。这个在前一天还身体很健康的可怜虫很快就于其家中暴卒了。

现在是否应该向您讲另外一个刘氏家族呢？其家长是刘禄黄，这是一个以其残酷无情、杀人不眨眼、贪婪无度和甚至是亵渎宗教

^① 见《传信年鉴》第 43 卷，1871 年，第 83 页以下。——译者。

而臭名昭著的家族。正是这个家族褻渎了我于打教时期掩藏在自已那岩洞中的圣杯和圣衣。上帝的巨手也打击到了该家族的身上。自两年以来,该家族的两名成员都长满了一身极其丑陋的麻风,从而禁止他们有任何社交活动,由此最终将他们引入了坟墓。他们全身的肌肉已糜烂并发出了恶臭味,成片地脱落,这就是他们那难以忍受的痛苦之原因。这难道不是安提阿派褻渎宗教的酷刑吗?

其他的打教人也于其恶运中受到了惩罚。他们在打教之前都很富裕,最后却由于疾病、诉讼和未曾预料到的事故而坠入了最贫困之中。八天之前,我经过了三堆口小村庄,那里的一名司铎和三名基督徒均在仇教的日子里受到了逮捕和不公正待遇。有 30 或 40 名恶徒聚集在一家客栈中,极端地侮辱了他们,讨论了是否应该处死这些人。当我看到这升客栈化成灰烬时,我该是多么惊奇啊! 去年,那里发生了一场火灾,使客栈踪迹皆无了。

不久之前,我们的一名主要刽子手再没有任何可吃和可卖的东西了,于是便操起了其沾满大量罪恶鲜血的大刀,前往他过去曾抢劫过的一名基督徒家中,请求他买下此刀,以便使他能够以售刀款而得到一点大米,从而苟延其生命。

先生们,这就是余克林先生向我提供的具体情节,他是打教和受惩罚事件的见证人。当然,我们不会对自己敌人的灾难表示幸灾乐祸。相反,我们也祝愿善良的上帝能归化和拯救他们所有的人,我应该向您承认,大家非常高兴地看到了这些惩罚的可喜成果。我们基督徒们的信仰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多名异教徒都于其中得到了拯救的圣宠。

在酉阳附近,还有一个彭水县。彭水县在最近仇教中所受到的磨难绝不会小多少。现在是艾洛(Eyraud)先生负责该县的教务。我不得不向您摘引其今年 5 月 15 日的一封信筒中的某些段落。

我们的彭水县最终开始从其残酷的考验中稍稍复苏过来了。这片如此难以垦殖的土地却具有丰硕收获的前途。到处都有热忱的学习、勤勉的祈祷和对于领洗的迫切要求。那些部分受归化的家族逐渐地趋于全部领洗，每个站口都不乏有加入先受归化的新家庭例证。共有三所男校和两所女校、三名巡回传道士每天都极力扩大耶稣——基督的统治地盘。

许多新教徒都开始理解神圣的上帝在五年来所出现的事件中表现出的令人赞叹不已的主导作用了。我们必须排除一大批人那过分人道化的动机，以将他们的信仰建立在更为牢固和更神奇的动机之基础上。仇教恰恰是导致了这种结果。

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即使我们的新教徒们在仇教期间失去了一切也罢，他们现在于世俗事务中并不比迫害他们的人更加窘迫多少，虔诚的新教徒们要比那些不太虔诚者更为自由自在地生活。

牛岩铺的新教徒们于某一日曾对我说：“我们确实曾受了很多苦，但那些曾抢劫了我们所有东西的人要比我们更为不幸。有的人出卖了其住房，而且也没有可吃的东西了；有的人背井离乡以避免其债主们的追逼；还有一些打教人的家庭被灾难和疾病搞得满门灭绝了。”

听到谈论斑疹伤寒蹂躏了某一地区的情况并不罕见，每天都有死亡，而我们的基督徒却未染上这种病。我们可经略举几例以为佐证。

三年前，有一个黄氏家族征募了 20 多个恶棍，他们在某位王氏新教徒正在收割庄稼时前来捉拿他，把此人五花大绑起来并把他押解到我不知道是什么的地方去了。我们曾担心此人已遭杀害，但他于三天之后却又出现了，因为他侥幸得以逃脱了。这一年，由

于我到此站口巡视过，所以便询问这位基督徒：

“曾经残酷地虐待过你的黄家，他现在于哪里居住？”

他回答我说：“在对面那边。但仁慈的上帝已经公正地惩罚过他们了。在父子两代的五个人中，共有三个已经死去了。”

彭水打教的主谋秦心元就居住在距那里不远的地方。知府并不满足于饶恕他，而且还授予他一个顶子。但是，除了他变成整个地区的仇恨目标之外，他从迫害我们的时刻起就感到了上帝的手已打击到了其家庭中了。其妻不赞成他的行为，于是便服鸦片自杀，其老父于数日之后便掉入一条小沟中死去了。

现在，我们就从我们的仇教人那极端悲惨的结局转向有关背教者的结局来吧。

一名从教人有四个儿子和四个儿媳妇尚未肯崇拜宗教。在打教期间，他们都被包围在同一片废墟之中，人群抢劫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由此而出现了儿子们反对其父的喃喃细语的怨言。他们之中的两个人甚至暴跳如雷地反对其父亲，同时也反对那些传播宗教的传教士们，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灾难的原因。啊！愿上帝给予公正的评价吧！刚刚过了一年，这两兄弟便病倒了，经过三日的患病之后，他们又几乎是于同时死去了。另外两兄弟也理解了上天的警告，于是便携其妻子和两个嫂子接受归化，这个家庭现在给予我们的安慰就如同它过去使我们产生的恐惧一样巨大。这样的例证并不罕见。我还将引证以下两个例证。

第一个例证是一名新教徒儿子的情况，他也是新近受归化的从教人。其家庭在教案期间遭受的损失激怒了他，于是便咒骂宗教及其教徒。某一天，他正在田间劳动，便发生了地面塌陷，从而把他活埋进去了。

第二个例证是一名新基督徒的情况，他非常熟悉宗教，人未由

于其信仰而受过任何痛苦。然而,他后来变成了背教者,为了使人更彻底地忘却他曾是基督徒,于是便和一个异教派别的讲道者们勾结起来了,而这个教派在中国人眼中看来却臭名昭彰。三个月之后,他与其新朋友们发生了争执。一天夜间,大家把他叫来商量事情,他刚刚于其住处之外走了几步,便跌倒并被砍 20 余刀,于数日之后死亡。

向我介绍了这些故事梗概的艾洛先生又补充说:

你可以按照你的希望提出对这些事件的看法,我还不能向您全部引证。至于我本人,我不由自主地将此视为上帝的恩宠,上帝从本世创始起便指出了其公正和仁慈。事实上,虽然坚持下来的基督徒要比背教者的人数多得多,但我尚未获得会有哪怕是一个极其悲惨地死去的消息。如果他们死亡了,那也是在天主的和平之中,经过领神圣的洗礼之后,才带着某种善终的一切标记而出现的。

因此,先生们,你们看到了上帝不会抛弃对它感到恐惧的人,它可以在没有人类参加和甚至是违背人类意志的情况下完成其事业。尽管经受了如此之多的考验,但在酉阳和彭水这些饱受灾难的地区,仍有许多善行和尤其是有许多希望。

在该传教区的其它县中,没有发生任何值得特别注意的情况。我们享有某种表面上的安宁,它可以使我们充分地行使自己的职务。有人已经发动和现在每天都在发动对我圣教的诬蔑,世俗人必须拥有极大的勇气和一种巨大的圣宠才能信仰这种宗教。随着各种机会的出现,中国人的仇恨也就不时地表现出来了。这样,自一年以来,他们捣毁了我们的两家药店,抢劫或毁坏了那里存在的一切。但由于其结局与他们所想象的完全不同,所以应该希望他们能逐渐地清除其弊病,即如同疯子一般地扑向我们的药铺并捣

毀它的那种劣行。

先生们,请接受我有幸向你们表达的最深切的崇拜!

你们完全忠实的和对你们不胜感谢的仆人。

来自教廷的传教士白德立

附言:

在这一年间,我们共统计到 1135 从教人,662 名望教者和 517 名成年领洗者。

但此既未把酉阳又未把彭水县计算在内,我未掌握那里的人名录。

中国川东宗座代牧区的综合报道^①

川东刚刚再次使一名法国传教士喋血,这就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余克林先生。他与一名中国司铎戴明卿(Michel Tay)一起在黔江被处死。黔江是一座距酉阳有 20 多法里的城市,是玛弼乐和李国先生的活动阵地。

大家于下文不远处将会读到由普罗沃(Provôt)先生致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的报告。我们于其前面附上同一位传教士的一封信筒,其中阐述了余克林和戴明卿先生押解到黔江的事件。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普罗沃致川东宗座代牧范若瑟主教的
书筒

1873 年 7 月 19 日于酉阳

主教大人: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 46 卷,1874 年。——译者。

继酉阳教案之后的三年以来，我们仅仅与大人谈论我们基督徒的灾难和痛苦。今年，我们高兴地向您报告说，我们面前终于出现了比较晴朗的天空。祝愿我将向大人介绍的故事能对您所作出的如此之多的关切和关心得到的报偿，从而表达酉阳传教士和新教徒们的感激之情！

在我们去年的报告中，我们就已经指出，某些背教者已经回归，相当数量的异教徒已受归化。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真正令人赞叹的运动之先兆及其开始。在 1872 年的下半年和本年度的上半年，我们有幸成为这场运动的见证人。主教大人非常清楚地知道，在我们所计算到的如此之多的崇教者中，于 1867—1868 年的教案之前，都分散在 100 多个地点，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复归异教，又供奉起迷信的灵牌、撰写背教的谤文、保证其终生不再宣扬圣教，而许多既有权势又用心歹毒的谋士们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蛊惑说，这种宗教是许多破坏和灾难的祸根。本地世俗社会中的圣贤们为使我们的大部分新教徒背教提出的也正是同样的原因，我们为把这些受惊的和更应该是迷途的羔羊赶回羊圈而利用了这一切。有人对他们说：“你们应该承认，你们在选择这种宗教时可能搞错了，这就是你们的许多灾难之原因。”现在轮到我们的了，我们让他们亲眼看到了自己的灾难。我们极力减轻这种灾难，使他们学会不应该对这些很容易丧失的财富表示遗憾，将他们的希望和追求转向不怕盗贼的财富，转向可以确保能预防火灾和破坏的住宅。在整整三年期间，我们不停地往返于各站口，到处都插手那些鼓舞和安慰的指令。我们的传道士或讲道者以及当地的大部分人都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既负责照顾在考验中始终坚持忠于宗教的新教徒，又把那些由于害怕和更多的则是暴力而使之远离我们的人重新拉回来。他们也看到了其农业收成、动产及其住宅变成了抢劫和放火的

受害对象，不然就是父亲、兄弟或儿子被杀害，他们几乎忘记了他们自己的家庭。他们往返于其基督教会口，于其鼓励告诫中始终都要使用那些表现得非常强有力的权威。

为了使上帝感到欢慰和将其怜悯心转移到我们身上，则必须做出巨大努力。所以，在数月期间，我们又重新赢得了由于对一次新恐惧情绪而使我们失去了大部分人。众人从四面八方都前来向我索求经书，以便研究基督教的教义和形象，从而用这一切来取代迷信的供像和灵牌。我们自教案以来尚未曾再见到过的一大帮子人都跑来重新会见我们与我们的传道员，以至于我们即使有 10 名传教士，也既不可能满足如此之多的要求，也不能应邀出席如此之多的邀请。非常遗憾，要教诲这些分散在许多错综复杂和往往又是彼此相距甚远地区的数千名新教徒，我们却仅有四个人，也就是说两名传教士和两名中国司铎，而且其中之一患有可能会使我们传教区面临过早失去他之威胁的疾病，他被迫离开了我们以前往其家中休养。

就在背教者们如此返归的同时，数百名异教徒都在 40 多个地点要求接受我圣教的归化。大家是否应该承认这一点呢？我们不是根据可能而登录 400—500 名新崇拜者，而是本来可以于我们的信徒簿中登录 2 倍和甚至是 3 倍的数目，也就是说如果照顾如此之多人的困难性迫使我们表现得很严厉，以至于唯有用缺乏活动手段的原因来为之辩护了。

主教大人洞悉到了我们的需要，所以给我们派来了两位教友，也就是罗兰(Lorain)和朗格莱(Langlais)先生。第三位则是勒努瓦尔(Lenoir)不久之后就前来加入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以至于我们的力量倍增。我们完全有理由希望，即将开始的一年将比刚过去的一年会取得更大的成果。

为了对我们行使圣职的工作再加整顿,我们酉阳的基督教会分裂了。我们尊敬的教友会长余克林先生在对各站口进行这种划分的时候,其目的主要是在每个基督教中心都安置一名传教士。这样一来,主教大人的计划就在于将以酉阳城始终为其基本中心的次要教区提高地位,这项计划的近半业已实现。我们现在只剩下在重建次要中心中那些已被破坏的教堂了。上帝逐渐地在以酉阳城为中心的所有地方都帮助我们,我们于此在距该城分别有一日、或者是两日和第三处有三日行程的地方,一共计算到附属于酉阳主教堂的五、六座子教堂。

在从事这些建筑工作之前(我们微薄的资金收入不允许我们现时梦想办到这一切),我们认为应该提高自己酉阳住院的地位。主教大人已经允许我们从事这项工作,我们已经立即着手进行了。这项工作进展得很快,我们在数月期间已经具有了一座可以居住得下八名传教士和相同数目的传道员的住宅。我们尚有待于建筑正厅,于此当然是指礼拜堂。希望我们的财力能有助于很快就实现自己的愿望,能允许尽快实现我们基督徒们那最为强烈的心愿。这也是传教士们的心愿,他们自四年以来为举行神圣的奥义仪式而只拥有一间狭窄、低矮、潮湿和勉强能容得下40—50个人的厅子。

我们自修建自己的房子以来,享受到了和平,从而成为该城的官吏和其他权威人士对我们的好感之保证。时代完全变了。仅在四年前,我们甚至还不敢进入这座院落中。在那里新近发生屠杀的思想、看到我们尊敬的李国先生以及与他一起被杀害的40名基督徒的灵柩,这再也不是最令我们深感恐惧的事了。有人对我们在哪里生存的权力提出了质疑,大家希望将上帝的教堂改造成佛塔。这样一来,为了使我们放弃这片地盘,他们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有人甚至大打出手,向我们投掷大量的石块,以至于我们在一年多几乎

不敢再重新到那里去。

无须追溯得过分遥远,就在去年,当我们建筑现今拥有的楼堂时,当时的知府不是向我们的匠人们下达过停止施工的命令吗?否则就冒有受藤条抽打和枷锁加身处罚的危险。在采取一种如此严厉和如此不合法的措施时,我们应该想到,他违心地接受了我们敌人的影响。然而,由于我们敌人的力量很强大,所以那位官吏坚信他这样就可以平息由于处决我们打教人的一位首领而挑起的愤怒。我必须立即补充说明,在该知府作了有利于我们的说明之后,我们的工程只停工数日之后又重新开工,并且在未遇到任何骚动和混乱的情况下便竣工了。尽管这场小小的风波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化了,但我们未从中得到任何结论,认为我们在酉阳建立住院和讲道的权力远没有被乡绅们所承认;经过在该城居住三年之后,我们非常遗憾地发现自己还有着一大批敌人。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能够解释我们今天享有的宁静的事情呢?我们对未来的希望到底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

作为对我们经受苦难的报偿,神圣的上帝为我们精心安排了一种特大的惊奇和欢乐。主教大人在从北京返回(为了酉阳基督徒们的利益,他被迫前往那里去)来了,这仅仅是在他从欧洲返回的数月之后,希望在返回重庆之前经过酉阳。他希望亲眼看到这样一个地区,那里已成为如此之多的关怀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的目标,也就是说在这个酉阳城得到了安慰和庆幸。那里过去是众所周知的恐怖舞台,其新教徒们受到了如此严重的灾难,在发生教案的日子里,曾两次于其重庆的住院中接待过这些人。主教大人在于我们中居住的两个星期间以及他在这些很快就过去的日子里向我们提出了收容我们的审慎建议,这一切对酉阳的传教士和基督徒们来说,它们始终是对过去苦难的最美好的回忆和最充分的补偿。

数日之后,由负责我们法国驻北京公使团的公使热福理派遣的领事巴士东来到了这里。巴士东在途经酉阳并在那里居住了一段时间,他于此出现的重要影响出自他与中华帝国高级官吏们的平等地位、他对该国的语言和习俗那已经漫长的经验、使他与众不同的人格品质等,这一切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许多被那些别有用心地欺骗和愚弄了的群众都最终相信了,传教士们应该受到某种优待并且值得受到某种尊敬。当看到法国领事前来视察玛弼乐先生的坟墓时,玛弼乐是于八年前被他们抢到了城内的大街上并以极端野蛮的手段而将他致死的一名传教士。酉阳的居民都是此类野蛮行为的目击者,尚且不说他们是肇事者。这是 1868 年 1 月 2 日屠杀李国先生及 4 名基督徒事件的继续。酉阳人可能会自称于其地区界外也会有人对他们的暴行表示憎恶和沮丧,他们懂得根据需要而结束这些教案。我不敢断言,在这一群人中会有一名虔诚到可以自拍胸膛的百人队长。不过,至少是所有人都明白,杀死一名传教士就是一大罪状。我们的政府在开始时冒着千般危险而派遣一名外交代表并不是过分的抗议,甚至是一直走到中国的另一端也如此。所以,法国刚不久再次表明了它对传教区的忠诚。作为法国特别注意目标的酉阳传教区已经利用了这一点。

请主教大人允许我在前述的这些考验中,再补充叙述某些灾难。

6 年之前,我们已经在距酉阳有两日行程的秀山城购置了一处房产。一名中国司铎前往接收该幢房子。他刚在这个新的住院落脚,便有一群流氓无赖出现,他们对于一名与我们为敌的知府没有任何可惧怕的,于是便如同潮水般地冲向了我们的房子,将之抢劫一空并彻底摧毁了它。这名中国司铎非常幸运地逃脱了。从此之后,虽然我们试图重返秀山,但 6 年过去了,我们仍然无法获得

成功。在今年年初,我们又作了一次新的尝试,但仍未能大功告就。我们派往那里的两个人被识破是基督徒,被迫以最快的速度离去。一个月之后,另外两名过去有幸保持匿名的传教士又被重新派往秀山。如果他们仍未能在那里为我们购置一幢房子,那么他们在那里度过的两个月以及当地居民对待我们的态度等,这一切至少也会使我们产生某种希望,认为我们在一个不远的未来就会在该城内得到一片立足之地。最近的一件事情,进一步激励了这种希望。秀山的近 15 名童生前往成都^①以参加会试。他们经过我们的酉阳城并在那里停留数日。他们由于不敢亲自来拜访我们,于是便派其一位朋友来到我们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希望受到一名司铎的接待以向他们及其家庭传授基督教的奥义。他们曾阅读过我们的几部书,这些书的教义使他们觉得要优于他们的哲学理论。作为他们真诚心愿的证据,他们自己提议将把过去为建其祖先祠堂而募集的资金用于一座教堂。此外,他们让人询问我们,他们在重庆和成都是否可以与基督教徒们建立联系。我们在后一个问题上回答他们说,再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了,重庆和成都的两位主教不会拒绝接待他们。至于他们倡议建造一座基督教经堂的问题,我们已让人回答他说我们不能接受。他们派来的人携带他们尚未曾阅读过的书籍又离去了。因此,我们怀着很快就将重新占领秀山的希望在等待着。

我们在彭水的教友们不失时机地向主教大人报告说,他们也已处于看到自己进入黔江的努力圆满成功的前夕。该城的那位直到当时都以其对基督教的仇恨而著名的县令刚致书其顶头上司酉阳知州,声称我们可以派人去接收我们于数月前在那里购置的房

① 成都是四川省的省府。

子。他们过去曾顽固地拒绝让我们获得这份财产,以至于由我们彭水的教友们派去购置和看守房子的传道员们都被迫逃亡。这份财产太珍贵了,我们要迫不急待地使用它。所以,一旦当我们从本处知州口中获悉其黔江同僚的良好愿望时,便迫不急待地将这一切通知了我们在彭水的教友们,以让他们派遣两名布道员赴黔江。黔江和秀山是川东传教区仅有的两座顽固地拒绝向福音开放门户的城市。毫无疑问,巴士东先生经过那里以及他在酉阳和黔江讲的话于这次双重的胜利中起了很大作用。

请接受崇高敬礼!

来自教廷的传教士普罗沃(Paul Provôt)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普罗沃致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诸院长们的书简

1873年9月10日于酉阳

自多年以来,我们就尝试在秀山和黔江立足,这是我们传教区中仅有的两座尚未向福音敞开大门的城市。今年年初,虽然无法成功地在秀山购置一幢房子,我们在黔江过得还比较愉快。

经过几次反对之后,该城的官吏同意为购房契约加盖其官印了。在等待让一名传教士能够前去占据该房子期间,我们派遣了几名传道员和基督徒去接收它。后来又决定,我们之中的一个人将在一名中国司铎的陪同下前往黔江。我们在黔江县的邻县酉阳县享受了平静,那里对我们和我们的基督徒们好些,最后是川东道新近的一道布告,这一切都为黔江的官吏和平民对于传教士们的尽快到达做好了舆论准备,从而也促使我们下了这种决心。

虽然余克林先生自数月来一直患重病,但他同样也请求获得前往我们只勉强拥有数个基督教家庭的一座城市和一个地区,首

先确立宗教信仰的荣誉。我们教友的这种热情、虔诚、仁慈以及他对于该地区的语言、风俗和诸多事件的精辟知识都可以促使他获得圆满成功。

余克林先生在一名中国司铎戴明卿的陪同下,于8月24日离开了我们,这一天正是纪念圣徒巴多罗买(Barthélemy)的节日。三日之后,这两名传教士便进入了黔江城。我们已购置的房子尚需要修缮,他们下榻于一个富裕而忠实的异教徒开设的一爿客店中,此人同意接待他们并且很快就变成了他们的朋友。

两名宗教大师和尤其是一名欧洲人的到来,不会不引起黔江人的警觉并激起他们的好奇心。8月29日(玛弼乐殉教八周年纪念日),余克林先生写信告诉我们说,为了摆脱那些拜访者,他每天被迫在城内散步,以使那里的人习惯于看到欧洲人。

在他们到达的翌日,余克林和戴明卿便去拜访该城的官吏和指挥该县团局的小团首。他们受到了非常礼貌地接待,这就是他们可以期待桂(衢亨)县令的一切。从此之后,该县令即以其对基督教的仇恨而臭名远扬。

八天之后,当传教士们发现其周围已恢复了平静时,便打算离开他们不能举行弥撒的客店,前往我们那位于城外的房子中,以度过礼拜天和庆祝圣母诞辰节。与任何善行都为敌者不会给我们的教友们留下完成这一心愿的时间,或者更应该说是上帝希望在这片被殉教者的鲜血浇灌过的土地上奠定这个新生的基督教会口的基础。

9月4日礼拜四的下午,突然间在客店的四周响起了谩骂声。某些传道员出来了解这场混乱之原因,但很快就返回去了,对于他们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感到了恐慌不安。一篇最为激烈的反对基督教和特别是反对宗教师的布告已被张贴在距客栈只有数步远的

地方。这是一次向该城及其郊区的所有恶徒发出的呼吁，因为一群无赖（仅仅一句话就可以制止）即将于翌日从事残暴行为的计划。

余克林和戴明卿先生都预感到了危险，认为应该利用县令以求他令人揭去布告。桂县令拒绝接受传教士们的意见，他令其一名师爷转达给传教士们的回答极端含糊不清，以至于我们的教友都对此误解了。对于一个已经可以确信是某场阴谋之中心人物的人，大家再没有任何可期待的了。

夜间，余克林和戴明卿先生派出了他们的五、六名基督徒，仅于其身边留下了一名传道士和一个侍从。这一夜充满了动乱和喊叫声。传教士们以祈祷而度过了这个可怕而漫长的黑夜。大家发现他们互相赦罪，然后又按照我们神圣的救世主于其受难之前的举止行为而进行祈祷。白天，他们再也不会对迫在眉睫的危险抱幻想了，他们都想躲避到衙门中去。这是唯一的一条拯救之路。在这种时候逃走，那就等于面临一种几乎是必死无疑的下场。此外，在我们返回黔江的任何希望之门都会在长时期内关闭之前，这种手段使我们的两名传教士最终感到了极大的厌恶。他们对于应该保护他们的人既无阴谋又无仇恨，而是希望从这些人中找到庇护。

这名传道士与传教士们同时于客栈出发，他第一个到达衙门，在那里向管事人通报了正在威胁传教士们的灾难。这是一种已无必要的防范措施，因为大家已在衙门中制订了其它计划。我们的教友们已经成功地在堵塞了大街的人群中冲开了一条通道，他们从上午6点钟起便到达了衙门。县衙的大门紧闭。戴先生试图用几句话来平息这批歹徒。匪徒们则以投掷乱石而向他作出了回答。这些人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使他仰天大跌。就在同时，人群扑向了余克林先生，按着其头颅撞击门板并用石块和木棒来袭击他。余克林先生忍受了很长时间的痛苦，三次面朝地跌倒在那里，就如同

救世主那样,但他三次又都站起来了。戴先生也受到同样的疯狂行为的对待。众人把他们二人都拖到了流经该城下部的一条河流附近。他们遍体带有成千处棒伤地来到了这里,倒在那里就无法重新站立起来了。杀人犯们仍在猛烈地打击他们。这些人将余克林先生抛进了江中以便在岩石上撞碎其头颅。但我们这些可爱教友们的灵魂已经在天堂接受了正义和永生的桂冠。

这两位传教士就这样勇敢地战斗并光荣地获胜。来自教廷的传教士余克林先生年仅 36 岁,中国司铎戴明卿年仅 34 岁。

黔江知县获得传教士们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便匆忙赶去验证核实他们的死亡。他草草向这些人的尸体瞥去了一眼,而他本来只要以一言一行就可以拯救他们的生命。他下令买二领席子掩盖他们的尸体。

杀人犯们既贪婪又残暴,他们先后一一剥掉并抢走了传教士们的所有上衣。只要他们尚有一口气,就留下了他们的裤子。但他们刚倒毙,便有人直至是剥去了其最后一件衣服。他们被抛在一座小桥旁的沙地上,于四天之后仍然被暴尸于那里。由我们偷偷地派往黔江的基督徒们看到了这一切。我们对于遗弃和污辱这些尊敬遗骸表现得义愤填膺,希望秘密地取走这两具尸体并把他们带到我们的基督徒中。这本来在发生仇教期间也并非是不可能的事,但在我们的自由制度下,这会成为一种轻率或不慎行为。由于我们不能触动这些将成为一场诉讼之基础的尸体,所以这就成了我们遇到的许多棘手问题的原因。我们于是便请求我们的罗大官人^①采取措施,以便使两位传教士能被安葬在一个体面的地方,从而得以安息,我们还请求允许派遣一名神职人员和黔江的几名基督徒前

^① 指酉阳知州罗亨奎。——译者。

去验明尸体的身份并将它们陈殓在合适的棺木中。他们同意给予我们这种许可,但当我们在几名为保护他们而派出去的营勇的陪同下到达时,他们获知桂县令已经执行了罗知州的命令。两位传教士的尸骸被穿上了丝绸服装,以陈殓在棺木中,棺盖已被牢固地钉好并拒绝大家揭开它们。我们的神职人员也看到了他此行的目的无法实现,于是用书信请示我们如何办,酉阳知州又致书黔江县令。因此,我们希望自己的基督徒们能够打开棺木和验证我们教友们尸体的身份。

当有人向我们报告了余克林和戴明卿先生的死亡时,他们便告诉我说,有三名传道员都与这两名教友同时被害。值得庆幸的是,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数日之后,这三人又回到了我们之中。最后一名到来的人终生保留了他头上被石块击伤的疤痕。

这名传道员姓郑。五年前,当余克林先生经由湖南和湖北省逃亡时,正是他陪同该传教士。在这次事件的隆冬寒天里,在这个完全是异教徒的地区中的 20 多天的旅行期间,若无这位勇敢的传道员,那么他就几乎因饥饿和贫困而死亡。郑氏比传教士们早到黔江数周。他占据了我们的房屋,并且每天都在那里向听他讲道的人解释基督教义。当他获悉屠杀事件时,正在自己的岗位上。仅仅到了这个时候,他才认为应该逃亡。但在凶手们的追击下,他本人也在数块石头的袭击时倒下了。暴徒们认为他死去了,所以才放过了他,他三天间未吃任何东西。尽管遭受这样长时间的忍饥挨饿和大量失血,他仍然得以爬到距那里有八、九法里远的一个基督教家庭的房子前。八天前,当有人把他带到我们这里时,他正处于良好的痊愈状态之中。

黔江事件必然会在酉阳产生反响。我们的两个人立即前去请求官老爷尽快地采取措施,以防止这一消息可能会激起动乱。知州

满口答应,对于维持基督徒和异教徒之间数年来占主导地位的和睦融洽的良好关系不会有任何忽略。他恪守诺言。现在已对乡团的主要头目下达了命令,到处都张贴了支持我们的布告。因此,我们希望自己自两年来,特别是自巴士东领事先生经过此处以来所享受的和平局面,不会受到任何干扰。

愿上帝肯赐恩将我们的痛苦变成欢乐,把我们的害怕情绪变成希望。愿我们两名殉教者的勇气能使我们的基督徒学会蔑视所有灾难。由于对永远存在的善之希望,所有的灾难永远都会过去。我们这些人在那些尊敬的已逝世者之后仍活下来了,而他们的表率行为又激发了我们的虔诚。愿我们如同他们一样也能热忱地和持之以恒地为拯救那些委托给我们的人的灵魂而工作。

我们非常高兴地在酉阳县看到了我们的六位传教士,上帝刚刚夺走了其中的两名,他们过去都帮过我们很大的忙。这就是我们的会长余克林和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唯一一名中国司铎戴明卿先生。愿我们很快就能看到这些空缺得以填补。我们在巴黎的修道院急于填补由传教士们的逝世而留下的职位,它怎会不急于取代那些加入殉教者行列的人呢?

请接受崇高敬意!

来自教廷的传教士普罗沃

余克林先生于1837年1月15日诞生于弗莱尔(Flers),属于赛兹(Séze)教区。他于1863年12月21日举行授司铎神职礼,被委任为依热(Igé)的本堂神父。次年的7月间,他进入了外方传教会的神学院。1865年9月19日,他离开法国前往川东。

余克林先生奉命到永昌县取代李国先生,在那里度过了两年。1868年8月间,他前往酉阳与李国先生相会合。大家都知道他是

如何才得以摆脱 1869 年初的那次流血打教事件的,这次仇教夺去了李国先生的性命并使酉阳的基督教徒们感到了沮丧。但大家所不知道的情况则是余克林先生从未写信讲过的那些,这就是他在从酉阳到顺德府和汉口的长途旅行所忍受的一切。

在 1869 年 4 月返回重庆后,余克林先生又立即出发前往酉阳,于下一个 6 月 14 日到达了那里。普罗沃先生写道:“在他于该县度过的四年期间,他不停地以满腔的热情和持之以恒的精神从事拯救灵魂的工作。如果我们的基督教徒们都受到了教诲,如果说近几年来有数百人领洗,如果许多过去不信基督者都信仰了我圣教和几乎所有的背教者都回归正道,最后是如果我们使一大批盲目地向我们发泄愤怒的人都与我们和解,那么所有这些令人鼓舞的成果大部分都应该归功于这位优秀传教士的虔诚、耐心和谨慎。

余克林先生由于繁重的工作和疲劳而累得精疲力尽了,近几个月来处于一种使我们所有人都会产生严重不安的境地。我们害怕在一个不太远的未来失去他。但上帝决心在一个比我们害怕的期限还短的时间内从我们手中夺走他。今天,当他与其勇敢的教友们的灵魂均升天堂时,这些可敬的教友们绝不会忘记我们。作为其干预的第一种成果,上帝是决不会允许从两名传教士的死亡中得到祸害我们的借口与机会的,或者自始至终都关怀我们的神圣上帝必定会粉碎他们的阴谋。

戴明卿先生于 1839 年出生于川东的万县,于 1865 年举行派立礼,成为教士。有人写信告诉我们说,他是川东宗座代牧区最虔诚的土著教士之一。

中国西藏传教区的综合报道

从西藏为我们传来了某些严重而又悲痛的消息。去年10月间,在清朝和西藏地方当局支持下的喇嘛们摧毁了巴塘的基督教站口。

下面的书简向我们的教友们介绍了西藏近期教案的一些新插曲。

中国西藏传教区宗座代牧丁硕卧主教致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院长席鲁的书简

1873年10月7日于打箭炉(康定)

在传教中就如同在政治中一样,根据一句名言,那就是必须既要认真地对待一切,又绝不能把一切看得太严重。我遵循这种意见行事,而又不会过分对此感到不安。我认为应该仔细地回顾一番此时在巴塘发生的情况。

您知道,自从基督教出现以来,在偶像崇拜者之间,已于原则上接受了那种认为基督徒是政治灾难的原因的观点。我们的那些从未读过《天国》(《上帝之国》)的喇嘛们又重操过去奥古斯丁(Augustin)曾大获全胜地驳斥过的异议而反对我们。

今年3月和4月间,不计其数的老鼠(属于被称为田鼠的一类)遍布巴塘平原和附近的所有地区。虽然这种现象并不罕见,但在该地区却是前所未见的。因此,这些邪恶的小动物在巴塘为所欲为,就如同其本性驱使它们在各处所做的那样。它们咬断了小麦、大麦和其它粮食作物的根系,这些粮食作物却是那些灾难深重的居民们的唯一食物来源,而他们又完全不懂有效地利用消灭这些害虫的方法。毫无疑问,他们求告所有神灵,或者更应该说是所有

魔鬼。大家施用所有魔法、击鼓和呼喊祈祷，直至跳神起舞。但田鼠不肯甘心认输并继续肆虐。大家由此便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在巴塘及其范围相当辽阔的附近地区，1873年的农业收成算彻底毁掉了。

灾难是巨大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传教士们为其罪魁祸首。然而，喇嘛们都企图说服民众相信的正是这一点。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互相勾结串通起来，以在整个地区传播这种谣言。在喇嘛庙中策划了阴谋，但我们却对此一无所知。卡罗(Carreau)先生叙述了有关这些谣言的最早消息是怎样传到他的耳朵中的。

他在9月2日的一封书简中指出。星期六夜晚，当我正在呼吸新鲜空气时，突然被一阵自大门传来的喧闹声使我从沉思中摆脱出来了。我注目环视，看到一名老喇嘛似乎正在徘徊犹豫。我将他让到了我们的小客厅中，并且询问他深夜前来造访的荣幸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吉祥。在确信我的房间中仅有我们二人的时候，喇嘛便对我讲了这样一段话：

“巴塘的所有世俗人和喇嘛们都凶恶，甚至是非常凶恶。你们是否有允许你们居住在巴塘地区的文件呢？在衙门里是否有这样的文件呢？昨天晚上，我获悉有七、八个村镇的居民都前去向汉族和藏族官吏们控告你们，因为他们把你们视为其所有灾难的原因，希望能获准驱逐你们。但你们不必有任何惊慌失措，放心吧！如果在本月16日之前还有其它消息的话，那么我就会全部报告你们。为我的知心话永远保密吧！”

卡罗先生并未特别注重这种警告。他怀疑老喇嘛怀有阴险的或不太光明正大的目的。这是一大错误，完全如同他稍后自己承认的那样。他在14日的一封书简中告诉我说：

“我向您讲过的那名喇嘛没有骗我，他确实是为了我们的利益

才来到这里。他对我所讲的一切对于巴塘的任何人来说都已不再是秘密了。在已过去的数天间,许多人都向我提到了同样的观点,我们的仆人也都在集市上听到了这类风言风语。”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喇嘛们都利用了已经开始出现的饥荒而反对我们,希望煽动民众并将我们从这片领土上驱逐出去。

……拉萨与其它更靠西部和北部的所有喇嘛庙中的喇嘛们经常向北京遣使。在二、三年之后,当这些使者们返回西藏时,大家便以相当隆重的仪式来接待他们,簇拥他们和恭维他们,搜集出自他们口中的每一句话以作为一个上等社会的启示。通过他们的喉舌,欧洲的所有重要新闻都传到了我们山区,甚至一直传到了高地亚洲最遥远的地区。非常令人遗憾,这些喇嘛们到达北京之后,仅以一只眼睛来观察,而且还是一只斜眼。他们对于别人向他们介绍的情况,只不过是一知半解,而更多地则是曲解。因此,他们向我提供的和到处传播的都是一些不完整的、奇特的、荒谬的和不大可能的资料。我们地区也正是根据这些被歪曲了的资料才形成自己的观点。

从北京前来的最近一批喇嘛使者都声称,欧洲的大臣们都绝对希望朝拜皇帝,但中国的重要朝臣们也完全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将外夷引荐到天子面前是不合时宜的。这些外夷于是便前去请求日本天皇借给他们一些铁甲船并派遣一位将军,以帮助他们打开中国皇帝的门户。一名日本军官赶来了,欧洲大臣们都跪在他面前以向他陈述他们的愿望。该日本人进入了皇宫,随身带去了这些大臣们,他们就这样得以见到了中国皇帝,但皇帝未能获准向他们开口讲话。因此,大家应该得出结论认为,这些欧洲人不是雄鹰。因为他们被迫求助于作为中国属国的一个小王国的官吏。喇嘛们经常以玩弄这种冒险手法为乐,他们还玩弄多种其它手段,还可能会

凭空杜撰这一切。这一切始终都是不利于我们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却直言不讳地承认，欧洲人大量涌入中华帝国的东部，现在正在西进，在西藏被迫接受西洋人的做法已经为时不远。

衷心希望这些人纯粹是预言家。但在等待期间，他们可能会给我们制造大量麻烦。我们并不缺乏对策，但使用这些手段的民众却如此无知，以至于他们会使人相信这些手段是赤裸裸的极端荒谬的行为。在由该民族接受的思想与欧洲所代表的思想之间，其斗争将是长期而又艰巨的。藏族人仍处于文明的雏形阶段，正值童年时期，仍具有童年时代的本性、任性和固执。他们尚不善于推理，无分别地放纵自己的情感，所以，我们在其它民族中，在《天主传教区》刊物的几乎所有期号中都可以见到其它许多例证。喇嘛们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性格，这是一种适合所有罪行和一切真正过分狂热的手段。我们希望福音的仁慈能够战胜这类难以驯服的本性。

顺致崇高敬意！

丁硕卧 塞巴斯托波利斯(Sébastopolis)主教，
西藏的宗座代牧主教

入藏传教士卡罗致蒙莫特(Montmort, 奥东教区)的拉古特(Lagoutte)的书简摘录

1873年11月8日于打箭炉(康定)

今年9月间，我的教友和我本人都听到了一些非常坏的风言在流传。有人甚至声称，秋收之后将要驱逐我们。由于我们身处由清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虽然这里居民中的大部分是藏族人，所以我们也无法相信会有人采取如此极端的行动。在此期间，我们获悉该地区的文职官吏已经离开其衙门，一直到达了打箭炉地区，据说这是为了不参与使我们全面覆灭事件的过程。

10月9日,我们的基督徒们都惴惴不安地赶来了。他们向我报告说,共有800人(巴塘喇嘛庙中的寺户)已携带其火枪和大刀,扎营于距城市只有四分之一法里的地方,这些人即将前来袭击我们。

第二天,也就是10日上午,我们的仆人们把我们的马牵到了饮水槽,遇到了这些人中的八九个。这些人强行从我们的仆人手中抢走了马匹并将它们牵到了其宿营地。我们立即将此通知了汉族武官。11日上午,该武官带领其全部部队来到了我们之中。他表现出了一种怒气冲冲的样子,声称我们是当地居民苦难的根源,1870年的地震完全是由我们造成的,因为我们使天时不正,他最后命令我们离开。我们回答他说,这样的一席话令我们吃惊,他本人也不会相信自己所讲的话中的只字,我们居住的房子属于我们所有,建房地面的买契盖有他以及藏族官吏的印鉴,最后是我们的中国护照允许我们去自己愿意去的巴塘地面上的任何地方,我们绝不会离开这里。

由于他丝毫无法回答我们,于是便站起来并在离开时扬言:“走吧!我们将送还你们的马匹。”

同一天夜间,他带领其所有营勇又返回来了。他命令其士卒们于夜间监视我们,为每个人指定了岗位,命令他们在攻击者敢于前来的情况下开火。他讲到这里便威风凛凛地返回其衙门中了。

该官吏刚刚离去,其营勇们便也仿效他而撤离。有的人将其兵器丢在了房间,放心大胆地返回其家中去了,在家里于酣睡中度过夜间;其他人则跑到了我们的厨房中,在那里以吃喝我们的东西而消磨时光。

当营勇们在如此格外忙碌的时候,好奇心促使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兵器。我发现他们的火枪并未装子弹,弹夹完全是空的。我于

是便唤来我的教友前来作证。尽管我们非常伤心和忧愁，但我们二人仍然不禁放声大笑。这种完全缺乏弹药的情况向我们清楚地证明，喇嘛们买通了官吏，而官吏们又演出了一场恶作剧以欺骗和愚弄我们。

次日上午，也就是10月12日，汉族武官再次前来造访，并由两名藏族官吏陪同。他向我们重申了要我们离开该地区的命令。他说：“我没有足够的营勇去抵抗要求我们驱逐你们的全部民众。”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巴塘城中的民众没有任何骚动、没有讲任何反对我们的话，也没有干任何反对我们的事。至于喇嘛寺的寺户们，有人声称其数目多达800之众。我徒劳地作了计算，只发现其中的50—60多人。

那个可怜的人被我们的抗争搞得狼狈不堪，于是便愤怒得暴跳如雷，声嘶力竭地咆哮，站立起来并向我们发出了这样一种威胁之后便扬长而去：“我再也不管你们了，乡民会按照他们的愿望去做。”事实上，在白天期间，有几个由五、六人组成的团伙前来抢劫落在他们手下的一切东西。可是，我们发现他们不敢进入我们的房间，也从来不咒骂我们，更不对我们进行任何威胁。这就向我们证明他们服从命令。

夜间，巴塘市当局派人以官吏的名义前来催促我们离开。当我们正在举行谈判时，喇嘛寺的50—60名寺户突然前来并用石块砸碎了我们房子的后墙。

我的教友和我认为，现在已无益于继续进行抵抗了。我们刚结束自己的小会，这些人便又返回来了。他们推倒了我们的墙壁，用石块捣毁了我们房子的前墙，然后便平静地退去了，未敢触动我们。

在派人将我们的决议通知官吏之后，他在夜间便率领其汉族

士兵赶来了。他竟敢鼓足勇气向我们反复说,他已为我们做了许多事,但我们的敌人丝毫不想仔细倾听他所说的话;我们冒有很大的危险,他鼓动我们秘密地躲到附近的一间房子中。藏族官吏带来了他们的奴婢们,这些人都携带口袋以装走我们的粮食。此时,始终于四处游荡的那些攻击者们,终于前来见他们的藏族主子并向他们讲了这样一段颇有意义的话:

“你们和汉族官吏们,你们把我们召来以驱逐欧洲人。自五天以来,我们已经连续行军数日,没有任何可供吃的东西,你们甚至不肯把欧洲人的粮食分给我们。”

官吏们回答说:“我们不能这样干,我们已买好了粮食。”

官吏们把我们秘密地带到了他们的一家亲属中。我们刚到达那里,喇嘛寺的寺户们便挥舞斧头冲向我们的房子并很快地就把它推倒了。

10月15日星期三,上午两点钟,藏族首席官吏出场了,向我们下达了迅速骑马取道打箭炉而去的命令,既无金钱又几乎没有食物。我们要以这种装备行走180法里,背上披着雪花,脚下踩着一尺深的积雪。在我们离开的21天之后,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此人当时正试图以其仁慈的关怀而让我们忘记自己的不幸遭遇。

在我们的身后,距此巴塘更远一些的地方,我们留下了五位教友,他们将遭受同样的命运。因为我在途中听到看守我们的人反复说,汉族和藏族官吏们将把喇嘛寺的寺户们带到他们那里去。

在由喇嘛们的嫉妒心情而挑起的这一悲惨事件中,我们于八天之间丧失了20年的工作成果和巨额资金(5万多法郎)。如果我们的正当权力得不到承认,那么西藏的大门就将会永远向我们关闭,打箭炉的主教府也很快即将被摧毁。

顺致崇高敬意!

入藏传教士卡罗

西藏宗座代牧丁硕卧主教致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书简^①

1873年11月10日于打箭炉(康定)

我打算于今年给你们寄去针对我们得以维持下来的六个站口中的每一个写成的简单提要。当我们获悉一次类似1865年9月29日推翻白盐井教会风暴刚在巴塘发生时,施行圣事的名表已经送到了打箭炉。最早的消息是由该城的官吏们传给我们的,我们与他们的关系甚为笃诚。

因此,我们第四次被从这片西藏领土上驱逐出去了。我们完全应该指出,那里的“兵站”以一种充满疯狂的嫉妒监视着一个威胁要摆脱他的地区。在一个月之前组成西藏传教区的六个站口中,今天只剩下两个了。上帝明显已经看到了这一切,也就是诸如现在的德国和瑞士那样的某些传教区,有幸向教会提供了形成其荣耀和不朽苦难与眼泪的证据,无论其敌人讲什么话都一样。请允许我对此讲一下,以作为对你们的安慰。既然上帝还不想结束西藏的仇教时代,那么我们就应该甘心接受它近期允许出现的灾难以及这些灾难强加给我们的痛苦牺牲。这可能就是获得慈悲的最强有力的秘诀。

如果我们希望详细介绍本地区自10月10日以来所发生的事件,那将是一部长篇故事。我们仅满足于阐述事件的起源和主要的情节。至于恢复所有这些废墟,那是未来的事,即使这是上帝的意志也罢。在可能已经寄给你们的前一封书简中^②,我们对于巴塘喇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46卷,1874年3月。——译者。

② 这是指致席鲁(Chirou)先生的书简,我们于上文已经看到了。

嘛们的意图已经表现出了某些不安。我们并未对于向我们揭示的秘密感到震惊,而仅仅是对这一切无法控制的关注。这就是我们在风暴发生时的处境。

你们都知道,自从很多年以来,我们就立足于巴塘城郊和城内。我们在那里与任何人都未曾发生过纠纷。中国政府和西藏地方当局以及民众们自己,从未向我们表示过如此强烈的好感,以至于使一名偶像崇拜者的心灵感到无法理解,他们让我们生活在一种极大的安静之中。但我们应该承认,喇嘛们远没有向我们表示出同样的善意。从宗教的观点来看,巴塘只给我们提供了很少一点希望。但从当地的交通联络、传教士们的健康、运输手段和娱乐活动的观点来看巴塘则超过了我们至今所能够发现的一切。这座小城可以被视为拉萨、英属印度、法属印度支那和中国中原地区之间的中枢纽点。大家是否可以说,英国人不仅具有贸易的才能,而且还具有贸易的眼光呢?库柏(T. T. Cooper)先生提醒大家应重视巴塘可能具有的巨大物质利益。所以英国人便要求他们驻北京公使在新签订与英国有关的条约时,应使巴塘城被承认是所有外国人的商埠。我不知道这项建议后来的结果如何,但它证明了巴塘是一个必须占领的阵地,大家非常遗憾地感到未能更早地占据这块阵地。

我们必须指出,巴塘完全不属于西藏管辖。该城及其辖地完全隶属于中国中央政府。所以,携带我们的护照,就很容易与当地居民维持亲密友好的关系。我们曾得以租用和购买地盘,甚至是建起了房子,只要是遵照该地区的所有合法形式行事、有汉族和土著官吏们出席和获得他们的批准即可以畅行无阻,这些文书的原件仍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然而,近年来,拉萨的大喇嘛寺被多种基督教思想逐渐获得的巨大影响吓呆了,特别是被英国人在整个北印度的迅速发展感到

了震惊,于是便告发法国传教士们是最危险的人,是由英国人收买豢养的间谍。英国驻尼泊尔(Népoul)的常驻外交代表巴姆赛(Bamsay)上校于1869年,通过在拉萨的驻藏大臣而发出了致巴塘传教士们的一封半官方的书信;上文提到的英国旅行家库柏那出人预料地出现了,大家始终都希望把他与传教士们混淆起来,尽管传教士们提出了抗议。法国的一个考察团从湄公河流域突然间来到大理,当时恰逢回乱正处于最激烈的时候;法国官吏即将到达巴塘。他们是借口(一名西藏人会觉得这种借口很诡谲)研究河道才来的。一系列事件陆续发生了。它们都激发公众舆论产生了对一次新战争的不安和疑虑。有谣言流传说,法国传教士们正在为印度的英国人打开西藏的大门而秘密工作,这种谣言流传得如此之广,以至于一直传到中国内地。就在这同一年,那里的一个心地不良的人就此问题,在四川的15或20个法庭上对我们提出了控告。拉萨的那些大喇嘛寺由于由恐惧而产生的敏感性而搜集和评论这些谣言,他们曾多次致信巴塘的寺庙和其它一大批寺庙,严厉指责它们允许传教士们定居在该地区,建议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摆脱我们。巴塘的喇嘛们未经多大困难地同意了大喇嘛寺的观点。

直到那时为止,中国政府和土著官吏们尚未对我们表现出任何恶意,所以喇嘛们必须使用秘密和暴力的手段。喇嘛之间达成默契,佯装发动了一次骚乱。巴塘民众们被怀疑勉强地参与了这种共谋,大家认为他们不宜实施这种阴谋。因此,喇嘛们从具有二三日行程之外的地方召来了他们的一批寺户(共有50—60人)。为了恫吓传教士们,他们将这一数字严加夸大了。一些事先指定的首领们必须指挥所有的活动。这些粗犷的山地人在一般情况下都是不太守纪律的,现在却非常忠实地执行命令。有人命令他们扎营于距传教士们的房子有二公里远的地方,把他们分成了人数多少不等的

团伙。此外,还禁止他们骑马、携带火器和使用其大刀。在四五天内,分成七八个人的小团伙的喇嘛们从他们的寺院前往骚乱者们的营地,他们当然是向骚乱者们传递了鼓励或者命令。为了激励这些蒙昧的本地人,故意使他们缺乏食物,这是刺激他们的抢劫渴望的绝妙手段。

这样便为一切都作了准备,对两名可怜而又完全解除了武装的传教士的敌对行动于10月10日开始。第一天,这些人抢劫了传教士们的两匹马。在以后几天,喇嘛们的寺户在未得到城市居民们帮助的情况下,便进入了传教士们的住房并开始抢劫。这些可耻之徒中的任何人被都未受到惩罚,甚至没有任何人逮捕。因为汉族和藏族官吏们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整个这场骚乱都是由喇嘛们一手造成的。所以他们不敢用一种过分严重的敌视而激怒喇嘛们,仅满足于阻止流血。喇嘛们甚至多次建议我们的两位教友面对风暴而于一时间暂作让步。在遭到这后一批人的拒绝之后,军官们便坚持一种含糊的手段,而这种行径今天已受到了他们在打箭炉的上级们的指责。正如在其它许多情况下一样,官方当局在此情况下便既不为我们提供服务,也不给我们制造麻烦,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的。

骚乱者们由于当地头面人物的无能为力而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多次冲向传教士们住宅,甚至有一名狂徒竟然将其刀举在一名传教士的头上。10月12、13和14日,他们侵入了传教士们的房间并对其房子投掷了一阵如同冰雹般的石头。14日,从四面八方又重新发动了进攻,从花园的围墙上打开了一个很宽敞的缺口,彻底砸碎了窗户和隔墙,致使传教士们被迫筑垒固守在一间很难进入的房子中。该城中最有权势和威望的人却成功地与他们相会合,请求他们去寻找另一个避身之地。他们确实必须撤退到一名藏族小

官吏的府上。夜幕降临时，某些同谋者下达了用斧头拆毁传教士们房屋的命令。这道命令被袭击者们在野蛮的吼叫声中忠实地执行了，接着是藏族人惯唱的那种庆贺胜利的歌曲。

翌日，也就是10月15日，大约在清晨两点钟左右，按照骚乱期间惯用的语言，那就是他们迫使法国人取道打箭炉而离开，我们于11月4日才狼狈不堪地到达了那里。

我们的另外两个基督教站口位于西南更远一些的地方，但始终位于同一片巴塘领土上，它们很可能是遭受了与城内基督教会相同的命运。我们尚未收到正式的消息，但已经有充分的迹象完全可以使我们的怀疑变成真实事实。我们发现，从法律角度来看，在由四川省直接管辖的地区内，喇嘛们没有任何政治或行政的权威。除了对其寺户行使大地主们的权力之外，大家不再承认他们有任何其它权力了。

在这封书简中挂一漏千的细节证明，喇嘛们在何种明显的程度上是使古德尔(Goutelle)和卡罗先生为受害者的那场阴谋的策划者，而且这也是巴塘人的普遍看法。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汉族官吏和至少是数名土酋被喇嘛们用黄金收买了。这就是使大家在思想上感到忧伤的极不公正的行为之一。但最好是对此严守沉默，因为我们根本无法证实此事。

藏族人驱逐了我们，因为据传说认为，我们是1870年的可怕地震、四季不正的原因，同时也是田鼠大量繁殖、水旱灾害频繁以及其它多种自然灾害的祸根。那些不幸的喇嘛们啊！在一个不久的将来就要威胁到他们了。愿永久的光芒照亮这些蒙昧的愚氓们吧！当大家看到如同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控告被加罪于己身时，大家几乎已感到有些引以为荣了。福音书的教义必定是很纯洁的，以致于偶像崇拜的信徒竟然用如此幼稚的侮骂来反击。此外，我们必须

承认,喇嘛们将我们置于这样一种地位,以至于给我们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那些信仰坚强和以其地位而举足轻重的人物们也不肯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来。我们也可能为基督教社会提供于19世纪被摧毁的传教区的第一个例证。我们的官吏们似乎怀有相当良好的愿望。但是,非常令人怀疑,他们会强大得足以战胜喇嘛们。

我们必然会不失时机地向法国驻北京公使馆提出自己的要求,但外交手段却有许多大家都不理解的秘密,它在中国的影响再没有最初几年那样强大了。

我们正等待着更为详细的、能够使我们正确评价给我们造成新处境的新事态。我们的上帝完全有理由接受所有这些考验。它们会一时间使人感到震惊,但它们可能会产生并转而有利于我们的希望足以在苦难时刻给人以安慰。此外,它们也是促使我们保持对你们的美好记忆的一种原因。

塞巴斯托波利斯主教,西藏宗座代牧丁硕卧

中国川西宗座代牧区的综合报道^①

川西宗座代牧主教洪广化致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书简

1874年8月28日

先生们:

自很长时间以来,我便有将于我的传教区中出现的悲惨事件通报你们的想法和意图了,但却被能看到这些事件的结束和能够向你宣布其彻底终止的希望所阻止。十分遗憾,情况始终未能如此。打教事件仍在继续,其破坏行为扩大到了我的宗座代牧区近半数地区,而且还威胁要波及整个地区。先生们,这就是我所指的事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47卷,1875年。

件,也就是近一年来一直折磨我们的原因。

我的传教区由幅员辽阔的四川省的半数地区组成,也就是说该省的西部和北部。这两部分地区只包括了尚不足全省人口的一半。其西部几乎到处都有基督教徒,分散在城市和乡村。他们普遍都能得到和平,因为异教徒们很熟悉他们。那里的基督徒和异教徒们都和睦相处地生活,但我们只能从中计算到很少的归化者。在川北地区,几乎没有基督徒,那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上帝将会为我们的努力降福,许多异教徒都于近年来选择了我们的圣教。我们的新基督徒人数现在已多达 7000—8600 人,零散地分布在我的宗座代牧区北部的整片领土上。

这些归化激起了一场反对我们的强烈风暴。其肇事者都是文人、乡绅、集市和乡村之长。他们收罗了一群流氓、惯犯、职业土匪,这是他们在重庆府大城市的街头搜罗的。每个地区的民团轮流率领他们。这些土匪们来自遥远的地方,不为所有人所熟悉,争先恐后地扑向我们的基督徒们。

顺庆府的新基督徒们成了他们的首批受害者。这些可怜的基督徒们共有数百名之众,均受到了抢劫和暴打,甚至有多名严重受伤。为了使他们的事业如愿以偿,这些暴徒们抢劫了祈祷室和药铺的所有动产,然后又拆毁了楼堂,仅留下几根柱子和部分屋脊仍屹立在那里。

当这类事情发生时,那些营勇和衙役们到哪里去了呢?那些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吏们又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心安理得地躲在其衙门中,至少是其中的某些人置身于这些抢劫场面的观众者中间,但却未给予我们任何帮助。然而,这场大规模的抢劫是于正当午时在一座第一流的城市中发生的,该城内共计有数 10 万人口。

我们义正辞严地向主管人提出了起诉。我们的法官们与被当

场抓住的同谋者们表现得同样畏畏缩缩。他们提出异议,认为自己不能严厉惩罚罪犯,更不能制止他们,完全是由于这些人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巨额财富等……我们不能获得任何令人满意的东西,于是便上书总督本人和鞑靼将军。我们应该承认,这些人都下达了严厉的命令。但顺庆府官吏们的恶意直至今日都为任何可以令人接受的处理设置了障碍。我们的新教徒们几乎丧失了一切,他们被驱散了,数人受伤,但却拒绝给予他们任何公正待遇。为了安慰他们,我们的那些“宽厚仁慈”的官吏们便对他们说:“你们中的任何人都未被杀,请耐心一点吧”等等。

我们现在从顺庆府讲到次要城市巴州。我们在那里有近千名基督徒。这场接受归化之浪潮的见证人是异教徒们,他们立即共谋以造成基督徒们的失败。从各地共召集起 48 名官兵并使他们立即投入了战斗。这些武装匪徒们洗劫了所有的基督教会口,抢劫了房屋,烧毁或捣毁了他们无法席卷而去的一切。在衙门内,有人向基督徒们声称说无法制止这场骚乱。四川布政使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得很好,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的。他当场就派遣一名官吏去负责惩罚罪犯们。非常遗憾,该官吏却是基督徒们的顽敌,他面对骚乱而无动于衷,因为骚乱者尚未放下武器。在等待期间,巴州的本堂神父(已被悬赏收买他的人头)始终被迫保持隐蔽。至于我们的那些失去了一切的基督徒们,若不冒被杀死的危险,那就不能返回其房屋的废墟中去。

事态就发展到这里。我们尚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才能在巴州地区恢复和平。

在涪陵县地区,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归化运动。在不足一年期间,我们作为崇拜者便接受了 3000 多名异教徒。于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阴谋便立即形成了,使我们面临丧失一切的威胁。其成功的希

望本来是具有良好的基础的,而这场阴谋的带头人却是城中的知县。所有人都是根据他那秘密或公开的命令行事的。经过四个月的诉讼和尴尬处境之后,我们也未能预防这场风暴的发生,未能迫使我们的敌人遵守法律和条约。

我们认为一切都结束了,一切似乎都显得很平静。突然间,有一支 400—500 名凶猛山人的匪帮,旌旗飘扬,径直向三个最漂亮的基督教站口冲去,将一切都投入了血与火之中。有三名新教徒被杀,他们更喜欢死亡而不是别人向他们提议的那种背教。于此又一次悬赏搜寻司铎的头颅。

这次教案绝未被平息。但由于该官吏被从其县中解职,他受嫌(绝非毫无道理)为骚乱的策划者和支持者,所以我们尚未失去全部希望。此外,我们三位殉教者的鲜血一直喷向了天空,为了我们本人和我们的打教者们而牺牲了自己。我们希望,上帝的慈悲最终能赐予我们和平,也就是说,在这些动乱不安的土地上享受一种大家企盼已久的和平。愿上帝能饶恕我于此结束对我们悲惨经历的叙述。但在这几段痛苦的文字之外,还应该补充邻水县地区的那些美好的基督教会口的灾难。

这个地域广袤的县已经不只一次地受到衙门武断的欺压。自一年略多一些时期以来,由于现任官吏的良好愿望,我们才享受到了一种暂时的平静。邻水的归化工作利用了这种平静局面,从教人数已近 4000 名。但现在却于任何人都未曾预料到的情况下,700—800 名官兵操起兵器并冲向了我们的基督徒。他们从第一天起,就杀死了五名基督徒。许多基督徒都受重伤,其他人后来也遭杀害了。但我们无法了解被害者的具体数目,因为该地区已变得无法进入了。反叛者们特别想谋害邻水本堂神父的生命。他们首先关心的是派遣一队暴徒去杀害他,因为这些人特别熟悉他所在的地方。

但上帝安排了一切以使其虔诚和勤勉的使徒摆脱危险。此人刚结束了巡视他当时尚不了解反叛情况的站口,而且是于黎明前二、三个时辰出发的,以避开白天的酷暑炎热。当杀人犯们到达该“耶稣受难处”时,他已经离开那里有 20—30 法里之远了。

暴动者们仍继续蹂躏和抢劫那些拒绝背教人的房子,杀死和杀伤他们。官老爷很善良,但其身边的亲信们却都很恶毒。他仅有数百名差役而没有一名营勇,所以不知作何打算。我们刚报告了该省的布政使和鞑靼族将军,但我们还不知道将会采纳什么样的决策。

除了我刚才讲到的打教行为之外,还有其它一些不太严重的情况,但他们依然阻止了我们全部事业的发展。在安岳县内,异教徒们抢劫了几个基督教家庭,拷打和虐待了 10 多个人。为了欺压我们,他们不停地到处划十字,如划在桥头、市场大门等地。老绵竹和灌县地区同样也受到了煽动。

先生们,对于如此之多的教案和如此之多违犯条约的地方,我们应该怎样想和怎样讲呢?我们于本处相信存在着来自北京的一道密令。诸官吏中的最谨慎者都保持沉默,但他们却在秘密行动并且还在煽动民众。其他那些不大喜欢深思熟虑的官吏们却竟然公开宣扬,基督徒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近期,一名知县在审判一桩基督徒作为原告的官司时,便极其卖力地鼓动他背教。县官针对他的顽固拒绝而对他说:

“你今天拒绝甘心情愿地背教,那就再稍等一下吧!你将会看到大家为你们准备些什么。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是西洋杂种和蛮夷,你们的时代永远过去了。”

绵竹县的知县曾在公堂上公开咆哮过这样的话,绵竹县距四川首府仅有一日行程的距离。中国民众面对其官吏会颤颤发抖。如果他也会站起身来做人,那通常也要遵照秘密口令。如果他动用武

器而反对我们的基督徒、拷打和甚至是屠杀他们，那就是他提前早已知道了他可以不受惩罚地这样做。文人们经常出入衙门，与官吏们沆瀣一气，他们经常从官吏们那里接受意见和命令。当我们控告带头闹事的人时，官吏们普遍都拒绝逮捕那些贫苦的小民，他们仅以数千枚铜钱的代价就可以同意听任别人任意地拘捕、投入监狱和甚至是砍掉自己的头颅。这些事实可能会显得不可思议，但它们每天在中国重现。

在那些中国官吏中，大家可以发现某些廉正和具有某种天生正义感的人，但他们只能很艰难地维持这种正义的情感，其大批同事及其衙门中成群的差役都与他们作对。中国的衙门充当了最卑劣之徒的避难所。一位命中注定要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官吏就没有任何行动自由，然后就会在一切问题上和被所有人欺骗。

先生们，你们已经看到，我们的传教区所经受的考验很多也很大。我们请求你们和你们虔诚的教友们用祈祷来保护我们。我们所有人都向上帝请求恩惠与和平，这是我们维持和发展传教事业所必不可缺的。

我无法在不对你们讲几句有关把我们的修道院从茅坪迁到四川省的话之前，就结束这封书简。我们被从传教区赶出来很快就有50年了，我们在那里的修道院遭到了抢劫和烧毁，其财产被没收。我们只好到一个位于汉地边境之外的夷族小邦茅坪寻找一片避身之地。许多原因又迫使我们离开了这一地点。我们于那里再也不能得到柴薪了，当地的法律也不允许开发地下的煤炭，我们根本不可能克服这一困难。该地区经常充斥着中国的作恶者，从而变得无法居住了。我们的房屋最终坍塌了。为了能够居住，则必须彻底重建。由于这些原因的严重程度，我们必须离开茅坪这些寒冷而潮湿气候的山区，于是便决定将我们的神学院迁移到传教区的中心。建

筑工程已经开始。其开销可能是巨大的，是我始料不及的。从各种迹象来看，这笔开销可高达 23000 法郎。这是根据当地的习惯而建的一座简单的木板房。

顺致崇高敬意！

波勒莫尼主教，川西北宗座代牧区代牧洪广化

传教士顾巴德致罗马外方传教会司库鲁赛的书简摘录^①

传教士顾巴德(Coupat)先生于 1874 年从涪陵县向罗马外方传教会的司库鲁赛(Pouseille)先生寄去了一封书简，其中提供了有关该教案的某些具体细节。下面就是这封书简的主要段落。

四月十三日，于一个大市上，有三个家庭要求其信仰教法的成员当场宣布背教，否则他们将被从该商埠驱逐出去。我自两个月来就许诺为他举行洗礼的一名青年人发表了这样一通讲话。

他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自出世以来就住在这里。我们未犯任何错误，你们根据什么法律要迫使我们放弃自己的宗教呢？”

一名文人说：“啊！你想进行辩论！大家快把他抓起来再投入监狱。”

在场的几个人立即制服了他。其中之一抽出了一把大菜刀并于其大腿上深深地砍下了一道伤口。这个青年人感到自己受伤了，于是便呼叫，但任何人对他的呼救都不屑一顾。其他所有的基督徒们都惊慌失措，拔腿便逃走了。

在场的一个人看到了传道士浸没在血泊中，于是便劝告大家到此为止。

他说：“大家饶恕他吧！这只基督们的狗。你快逃走吧！再也

^① 本标题为译者所拟。——译者。

不要因你的出现来给这些地区的灵魂带来灾难了。”

青年人尽其最大的可能而步履艰难地爬行。他于五天之后到了我家，几乎已经奄奄一息了。

十九日，我们的敌人在他们十三日成功的鼓动下，又调来了民团。

他们声称：“我们驱逐了这批该死的基督徒。现在必须摧毁其信仰的任何遗迹，也就是由西方大魔鬼而传给该宗教的一切。我们应烧毁其祭坛和砸烂覆盖它的屋脊。”

他们于是便向我们去年十二月所租的小房子走去，拆毁了祭坛、烛台以及落在他们手中的一切设施，然后将碎片带到了河流经本地区的那条小江岸边，以此而点起了一堆篝火。

他们声称：“这是一次祭祀，他使我们的那些受基督徒们的上帝压迫的偶像们复活了，这是该地区获得解救地唯一可靠标志。”

二十日晚上，这一悲惨事件的消息，由那些在掀起风暴时躲起来的基督徒们向我报告的。我立即通报了大官人，他又对我做了某些花言巧语的许诺。

祝愿讲道者能无忧无虑，我们将整顿所有这一切。

天啊！我们的事尚未完。二十二日，我们的敌人又冲向了我们的花家场的站口。20名新教徒被捕。其中有近一打被吓坏了，纷纷公开背教，有三四个人成功地逃脱。只有三人仍坚持在现场，他们实际上只不过是几个望教者。我本打算于年末为他们举行洗礼，这就是范彼得(Pierre Fan)，授予顶子的官吏；傅保禄(Paul Fou)，村长；周安德(André Tcheou)，商贾。

民团团首对他们进行了审讯。每次审问之前紧接着便是一场残酷的棒打。所有这三个人都宁死也不肯背弃他们刚不久才熟悉的上帝。一名当时在场的异教徒向我叙述了他根本不懂其意义的

下面一段话：

“您的这些基督徒都经拷打后而处于垂死挣扎之中，可是他们还在反复地说：‘耶稣！救救我！圣母马利亚！可怜我吧！’”

这些荣耀的青壮年于1874年6月6日接受了血的洗礼。

10天之后，一名被派来验尸的官吏发现他们三人的尸体丝毫未变质，没有任何腐烂的征兆。这位官吏天真地询问我，我到底给这些人吃了什么药，才使他们如此坚信其信仰。“他们曾经说过，宁死也不能背弃上帝。他们可能会一时间背教，但在暴风雨过去后又重新成为新基督徒。”

这三名新教徒死亡之后，紧接着便是许多灾难。一大批基督徒均遭抢劫、暴打和驱逐。两个家庭的房屋已被彻底拆毁，我今天被一些可怜的信徒们所包围，他们已不知道哪里是安身之地。其他那些信仰不太坚定的人又都祭祀偶像了。现在，到处都出现了一片担惊受怕的气氛。如果上帝不迅速地前来拯救我们，那么我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

川西教案的最新消息是1874年10月13日的情况。这些消息是由柯丹(Cottin)先生致其兄——罗西雍(Rossiun, 贝雷教区)本堂神父的一封信筒向我们提供的。

柯丹先生写道：“自7月9日以来，仇教一直以不同的激烈程度上在巴尔坦(Pa-eul-tan)、福兴城(Fou-chen-tchang)和丰坝堤(Fong-ba-teh)的市中持续着。这场教案给我们造成了五名殉教者和至少30名伤员。

现在，共有1500多名新教徒到处都被围捕并且艰难地度苦日子，他们藏匿于深山之中或流浪于陌生的地区。啊！我的上帝啊！拯救的钟声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敲响呢？

我来到了县衙门，大家在那里佯装希望帮助我们，但仅仅是为

了欺骗我们和赢得时间而已。我前往省府,在那里痛苦地获悉了交州教会的灾难和法国在华事务的悲惨处境。因此,我们必须听天由命地眼睁睁地看着屠杀这些可敬的新教徒们,我似乎觉得,过去把他们从偶像崇拜的谎言中拯救出来,只是为了把他们送给基督教徒的刽子手们。这种想法简直要扼杀我了,使我对于自己未能从这场风暴的一开始就与我们最早的三名殉教者一起死亡而感到遗憾。我已几乎再无希望了,现在,我们的主教已颁发一条禁令,禁止我从大海中返回,迫使我留在海港以从远方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大家始终都指责我们策划了叛乱,甚至如同过去大家所做的那样对待我们。我希望这些诬告不会有结果。因为,如果我们必须在法庭前为自己辩护,那么这将是重复彼拉多(Pilate)^①的那种审判。

前天,我们的两名受迫害者一直到达了我这里,他们犹豫不决和坚持到死亡的意志使我感到了很大的安慰和欢欣。他们的目的在于到遵义府(贵州)的安全地区避难,那里在他们之前已有三个基督教家庭了。因此,我们基督徒的五个家庭都为了上帝的荣耀而自愿地亡命于那里。我给他们分发了自己所拥有的很少一点银钱,送给他们每人一串念珠。我的基督徒们都心情激动地离去了,但其灵魂却是满意的。愿上帝能给予他们神圣的保佑。

中国西藏宗座代牧区的综合报道^②

西藏宗座代牧丁硕卧主教致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书简

1874年10月22日于打箭炉(康定)

先生们:

① 彼拉多是罗马帝国驻犹太的总督,耶稣即由他判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译者。

② 译自《传信年鉴》第47卷,1875年。——译者。

自一年多以来,我们在西藏陷入了一场新的战争。

大家无须装出一副预言家的姿态来,便完全可以肯定地预言这场斗争绝非是最后一次。这种预感的根本原因可以用几行文字和借助于一种简单的比较来解释。例如,当被人非常不确地理解了基督教在中国出现时,便不会在新教徒的道德、思想和习惯方面产生一场革命,而这一切在天朝帝国中绝对是不合情理或罪孽的。在中国人的许多值得赞赏的习惯法中,有许多是完全合理的和在任何方面都不与基督教思想相悖的准则,以至于新教徒们在承认真正上帝的同时,也既不会于实质上有损于其民族的基本性格,也不会有害于其特有的习惯,至少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这样的。

西藏的情况并非如此。为了在该地区变成基督徒,最好是让人忍受和接受一种几乎是普遍性的气氛。佛教在这里已经极其强有力地渗透进了人们的心灵、法律以及最基本的风俗和思想中了。以至于为了导致这些尚处于半蒙昧状态的部族修持基督教,发动一次深刻和几乎是彻底的革命则是势在必行的。然而,众所周知,一个无论别人认为是多么粗犷的社会都不会如此消逝,而又以另一种既激烈又有不同的延续期的震荡形式复活。因此,大家将会理解,在今后的许多年内,大家还应该准备接受严酷的考验,我们尚且不讲准备应付经常不断的灾难。

打教者们在所有时代的行径绝不是完全相同的,但在基本问题上却是一致的,唯有某些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变化例外。最重要的是研究由藏族人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因为这很可能是在整个中亚都会遇到的问题。有一点非常引人注目,这就是西藏人向教会的宣战恰恰既是不流血的,又完全是非暴力的。我认为,大家将无法看清楚这对人类的尊严将意味着什么;大家也无法看清楚,在这些

可悲的偶像崇拜者之间以及在和尚街中出现的恐怖与残酷情形。西藏的战争中也具有某种常规的内容，大家甚至可以说它是沿用一种战争的计划。归根结蒂，这是一场驱逐和抢劫的战争，而不是谋杀和屠杀的战争。我们最好是顺便指出其一种特征，这就是喇嘛教始终在想方设法地侮辱任何外来宗教。在西藏，那里的人也以谎言和诬告来攻击我们，这都是众人皆知的武器。但除此之外，喇嘛和颇有影响的藏族人既以对我们满不在乎，又以蔑视，甚至以在形式上看来是相当辛辣的滑稽行为来打击我们。

当涉及到辨认那些使我们在 1873 年间所忍受灾难的真正肇事者的时候，在我们之间便会有很大的意见分歧。你们对此不会感到惊奇。先生们，每个人都感到了对他们的打击，而又始终都无法知道这种打击出自何人之手。我们的某些教友们认为，唯有喇嘛们才具有策划阴谋的心意和头脑，我觉得这是最正确的一种思想。其他人则怀疑土著首领们煽起了这场风暴并为其主要策划者。我们中几乎所有人都怀疑某些中国官吏们不会与反对我们的骚乱之暴发毫无关系。这些分歧意见却具有可能会站得住脚的一面。为反对这些分歧意见，大家于该地区在此情况下所遇到的困难之一，便是西藏人在涉及到揭露一件可能会造成许多损害事实时，都表现得极其谨慎。这种特征形成了他们民族性格最突出的方面之一。这种本性的谨慎使得我们感到非常棘手并在长时间内束缚着我们。对于我们所缺乏的司法证据，我们不但要推定，而且还要论证。自一年以来，我们有暇搜集了某些情报，从而使我们完全不会对于现在尚在持续的教案之起源和成因产生任何错觉。

我们最早的想法当然会涉及到巴塘的喇嘛，他们在暗中受到了其拉萨教友们的煽动。他们所有人都有正当理由受到怀疑，但在

我们的大多数怀疑中,也可能有些夸张。可以肯定,喇嘛们在我们为其受害者的阴谋中扮演了一种重要角色。但我们却难以断定喇嘛庙是否会大举奋起反抗我们。该喇嘛庙的堪布(扎仓主持人)洛宗仁钦刚失去其僧官职位,大家可以接受他讲的话,因为他现成已不再被牵涉到这个问题中了。这名堪布曾断言,他对于所发生的情况确实一无所知,或者是他只根据一些含糊的报告(他未对此给予多大重视)而知道这一切的。我们的怀疑也涉及到了驻巴塘的中国驻军将领,此人是一名顽固的回教徒,非常贪婪,而且又是一个思想非常狭隘的人,他本人也由于他在古德尔和卡罗先生面前的语言之粗暴特征而受到了牵连。今天,我不想完全原谅他,而是更倾向于认为,他主要不是以直接介入而是由于缺少智力和毅力才支持了骚乱事件。我觉得这个年满75岁的人完全是一个肢体不灵活的老翁,受一名如同他一样也是回教徒、具有一种狂热和暴跳如雷性格的士兵的管制。

真正的罪犯、策划阴谋的公认头子是两名扎巴,或者说是巴塘的藏族头人。这是从多种确凿的和近期才传到打箭炉的情报中得出的结论。那位官吏善意地向我们作了通报,而这却不符合中国衙门的习惯。确实不假,没有任何为人所知的原因而背叛了我们并成为我们敌人的两个人就是两名土酋,第一名叫作阿宗琼年,第二名叫作洛宗扎巴。这是两名由皇帝任命的官吏,他们只听命于皇帝。这两个人自从地震以来就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他们曾为我们效劳过,在我们遭驱逐之前也曾为我们要求稍微多留一点时间。我非常痛苦地看到,自己被迫公开控告我们去年还如同朋友一样欢迎过的那些人。正是他们招来了骚乱者并指挥这些人的骚乱活动。愿上帝饶恕他们吧!

由于神圣上帝的一种非常特殊的恩宠,在至今仍在持续的长

期诉讼中,我们只感到来自中国官吏一方的很少一点纠缠。我们有数次确实看到了某些极为巧妙的诡计。大家向我们提出了某些阴险和令人不快的问题,也有某些可能会产生不良后果的沉默,但我们很难期待出自这些官吏们更好一些的恩典,因为他们与我们打交道时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如果他们确实未以强烈的愤怒,甚至是以一种崇高公正的情感来接受我们的控告,那么他们也确实表现得比较通情达理、彬彬有礼和几乎始终都是友善的。我同样也是带有某种发自内心的安慰而补充说明,他们也多次表现得充满了情感。当我们向四川布政使川西道呈上第一道请表时,这些高级官吏立即委派一名专员去处理我们的案件。稍后不久,根据来自北京的某些公文,这两位大官人又派出了第二位特使,以便迅速结束这场教案。这两位官吏都在这里,在打箭炉,他们似乎怀着良好的愿望。我们至少有五六次在大堂上陈述过这一问题。恰恰在 20 天之前,第一位特使曾告诉我说,我们的教案在两个月之内将会彻底结案。我们根本不相信这样一种献殷勤的行为,但至少应该认为这是一种令人感到宽慰的诺言。

此外,巴塘的那些藏族土酋们始终都很勤勉并自信善于和解折衷。这就是说他们害怕别人花费其钱财,于是便竭尽其能地设法阻止特使们前往当地,因为这种旅行会使他们开销其根本就不具备的 1 万法郎,所以他们认为应该对此感到满足了。他们自己垫资于这个时代重建了他们去年拆毁的房子,以正式文书保证将把我们丢失的东西或者是它们所代表的价值退还给我们。我们完全会预料到他们可能会使用一切可以想像出来的欺骗手段,以逃避他们那最郑重的诺言。我们也在密切地注视着他们所许下的诺言全部兑现的情况。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在不给我们造成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实现,可能会有一些激烈的突变,我们希望能看到最有意义的

事态。一言以蔽之，我们的这场斗争尚未结束，但它的发展趋势良好。

先生们，你们可以从这些话中得出结论，认为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有权力说，自己比我们在四川的数位教友更要幸运得多。他们经常要求给予他们非常公正的补偿，而从来却不肯给予了他们这样的赔偿，或者是尽量长时间地拖延。我们应该将自己的部分成功归于我们周围人的愚昧无知本身。官吏们曾向我断言 20 次，说当有人向布政使首次呈上针对我们的措辞很谨慎的状子时，阁下便惊呼起来：“是啊！这都是一些正直的人。”当然，我们的唯一功德就是要不声不响地行走，我们由于自己不稳定的地位而被迫如此行事。

藏族人因其失败而受辱，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他们被对于他们来说是由于这场案件和他们遭受上司公开反对的分化瓦解激怒了。正如我们刚才讲到的那样，他们可能在想方设法地寻求让我们第二次（我们尚且不讲是第 10 次）破产而振兴他们自己产业的手段。这种打算完全渗透进其习惯行为中了。他们那被完全掩饰起来的性格可以很好地应付这一切。但我们的上帝仍在天堂，它将所有人的心灵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随心所欲地操纵它们。此外，什么事件都可能会出现，它们既不允许头人也不允许其同谋喇嘛们继续他们的压迫政策了。

无论上帝对未来的看法如何，藏族头人们都已经由于他们敢于反对我们而受到了惩罚，他们从未受到过比此更严厉的惩罚。我们上文已经讲到的那名中国团首刚被免去官职，这是令他极为不快的事，惩罚他是为了儆戒其继承人。这几天于理塘地区发生了严重动乱，从而可能使中国总督深悟，如果他还想保住他在西藏的立足之地，那就必须投入更多的精力。喇嘛们自己也关心在这片辽阔

的地区维持和平,因为这片辽阔土地在所有边境上都受到了骚扰,甚至是威胁,即使还不说是攻击的话。他们非常高兴地理解到,基督教并非是为了自己才追求在他们的领土上寻求保护权,它在我们经过的动荡时代和正酝酿形成的更坏时代中,这种宗教都为他们提供了巨大的力量。

先生们,请接受我始终都对你们怀有的深刻崇仰!

赛巴斯托波利斯主教,西藏宗座代牧区丁硕卧

中国江西宗座代牧区的消息^①

江西宗座代牧遣使会士白振铎主教致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书简

1875年11月15日

先生们:

当我于1870年离开北直隶省西南郊传教区赴江西时,是为了取代于1869年9月29日逝世的佐阿尔的主教巴若望(Baldus),我途中经过了北京。那里人的几句话便向我揭示了在这种新职务中等待我的困难。在法国公使馆中,有人对我说:“主教大人,您将前往江西。我们清楚地了解这片土地,那里的官吏和文人比其它地方都更加仇视传教士们,而且他们还做出了巨大努力以阻止传教士们的布教事业。江西和四川是使我们操心最多的两个传教区。这完全是由于这两个省的官吏们的恶意,他们对于文人却既支持又感到害怕。”向我讲这席话的是罗淑亚伯爵,他是我们法国公使馆的临时代办。伯爵先生完全是出于经验之谈,他于前一年曾去过江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48卷,1876年。——译者。

西。

我在这里已经五年了,经常核实罗淑亚伯爵有关江西之所说的准确性。如果我可以根据《年鉴》中发表的某些书简来判断的话,那么我也可以核实他针对四川所说的话之准确性。我甚至敢于承认,在浏览四川主教和传教士们的这些书简时,我觉得就如同是在阅读针对自我就任以来在江西所发生情况的叙述一般,其唯一的差异是我们这里的事件不是那样大规模地发生的,因为正如圣味增爵所说的那样,与重大收获相比,我们仅是捡麦穗的人。

使我觉得江西和四川绝对相同的特点,那就是大大小小的官吏们对待基督徒和传教士们的行事方式。其证据就是1873年6月间发生在范若瑟主教身上的事件;就在同时代,几乎一天也不差,在我们尊敬的萨西(Sassi)会士身上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他虽然手中持有护照,但仍被逮捕并遭到了毒打,而且几乎被抛入赣江中;另外一位证人是洪广化主教大人,他于1875年的《年鉴》第2期中介绍了这些情况;1873年在崇仁发生的打教事件造成了一名殉教者和许多精修圣人……

在这里就如同在四川一样,某些官吏们都成了我们不可调和的敌人。我觉得其中少数几个人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他们对我们和我们的殉教者们略有亲切好感。但大部分人却是发自内心地憎恶我们。我们可以肯定,如果他们由于条约的原因而不敢直接和公开地祸害我们,那么他们就会对我们的基督徒进行报复,以讨好其敌人并以最不公平的方式审判他们的案件或诉讼,而在这个以无理取闹而著名的地区,打官司是非常频繁的事。

对于1874—1875年间在江西发生的某些事件的叙述会使人了解中国官吏对基督徒们的策略,以及基督徒们在能够确保他们宗教自由的条约之后,于某些省份中享受到的所谓宁静。

一、邓家埠教案

邓家埠是一个大镇，位于距饶州府安仁县有 30 里远的地方。有一文一武的两位小官吏驻守那里。

早在 1871 年，我们就已经以 3500 法郎的一笔款项，在该镇中购置了一幢房子，它可以暂时充作当地新教徒们的小教堂。这里的新教徒数目已经增至近百人，而且还倾向于使附近地区的望教者数目也得以增加。从这一时代起，我们每年都能够为数十名成年人举行洗礼，发现在那里已经看到形成了一个人数相当多的和相当虔诚的基督教会。从而使在那里建造一座教堂将是很迫切的事了，因为当时正值魔鬼利用某些异教徒的恶意和二三个官吏的仇恨，不仅想在宗座代牧区的这部分地域阻止受归化的浪潮；同时也是为了残酷地考验我们的基督徒，而让他们忍受巨大的苦难和为其宗教而遭受巨大的损失。下面就是事实：

在 1874 年 2 月间，我们的土著司铎之一的吴彼得 (Pierre Ou) 先生来到了邓家埠，以为当地的基督徒们布道。当他在听忏悔时，有些恶徒便向暂做小教堂的房子的屋脊投掷石块和木块。早就有风言流传说，基督徒的敌人们想烧毁这幢房子。这就是为什么吴先生必然会将有风言流说的地点通知了官府，他特要求官吏们追捕和惩罚罪犯，以便预防更大的灾难。这些先生们却对此毫无作为。他们后来的行径会使怀疑他们与阴谋者们相勾结。

在下一个 5 月间，有 10 多名基督徒满脸流泪地从邓家埠前来看我，来到了我们建昌府的神学院。他们在与我交谈时，都惊呼：“主教大人！快救救我们吧！小教堂已被焚毁，一名基督徒被杀，数名受伤，有人抢劫了我们的房子，基督徒们都逃走并受到了追捕。主教！救救我们！救救邓家埠的基督徒吧！”在安慰了这些不幸的亡命者之后，我又向他们询问了某些细节。

一名基督徒的妻子在小教堂的火灾之前数日被杀了。有人想以和解的方式来解决这一事件。被杀女的丈夫王开秀(Ouang-Kai-Sieou)由于贫穷而无法支付一场诉讼的开销,于是便接受了一笔现款赔偿。王抚台共提供了一笔 1200 法郎的赔款,其中有 700 法郎送给了衙门的人。300 法郎送给了王开秀。当涉及到向他支付所许诺的一笔款项的问题时,又同时要求他放弃成为和自称为基督徒。由于他拒绝背教,所以 300 法郎未能交给他。此外又有一名叫作王昌松的人,他在偷盗时被当场抓住,人赃俱获。他以有损于另一名基督徒的办法而行窃,曾许诺向他支付 90 法郎以便不被追捕,以一刀而严重砍伤了该基督徒的妻子,因为此女子前来向他索取曾许诺的钱。

获悉这些当众污辱人的事件的官吏们,几乎未为他们的伸冤昭雪做任何事情。所以,乡民们变得越来越胆大妄为并以各种方式欺压基督徒们。最后,王昌松为了压迫他们和迫使他们放弃其宗教而结成了一个会社。他征募了 300 多名教友,各自武装木棒和大刀等。他于农历三月(公历 4 月)22 日从大元塘出发,与他们同时来到邓家埠。他们首先包围了基督徒们正在集会的小教堂,从不同的两侧放火;他们接着又扑向了基督徒们,严重地打伤了其中的一人,抓住了另一位叫作吴连生的人。他们把吴连生绑起来之后,经过一阵拳打脚踢和棒打之后,又向他左肋砍了一刀,此人不久便因此而死亡。在这天晚上,小教堂已被化为灰烬,匪徒们组织了对 40 多个家庭的抢劫。那位武官当时不在镇上,但那名文官却在场并且目睹了这些恐怖场面。大家一致断言他是前来烧毁小教堂和屠杀基督徒吴连生的。他们未下任何命令,未讲任何指责的话,而当时本来讲一句强有力的话就可以预防所有这些罪行。

由于我居住得离道台所在地九江很远,所以便友好地为教案

事而致书于他。此外,事态非常严重和非常紧急,我直接投书抚台(该省的巡抚)以求他进行干预。他阅读了我的信,然后又拆开口呈送道台,委托他回答我说,我的做法不合常规,我的请求被视为无效。

抚台的这种不正常做法甚至使抗议者们感到震惊,但却未使我感到失望。我致信道台并请求他立即采取措施,以支持我们在安仁县的基督徒,这些教徒受到了那批暴徒违背所有文明地区法律的迫害、抢劫和追捕。该官吏如同平时那样非常礼貌地回答我并向我宣布说,一名特使将被派往当地,这一事件有希望被尽快地和公正地解决。

我相信了道台的话,而且也联想到了1873年间在类似背景下于崇仁县发生的案件,所以也就逐渐地感到放心了。事实上,在崇仁县又为我们重建了被烧毁的教堂,合理地赔偿了遭抢劫的家庭,在殉教人罗安娜(Anne Lo)的墓地上建了一座纪念碑。所有这一切均是经由派往崇仁县特使调解而完成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被我的会长们召回到法国,以参加我们修会的大会,这次大会选举博雷(E. Boré)为总会长,以取代已去世的埃狄纳(Etienne)先生。我于6月末从九江出发,并非常注意的将我的出发通知了该城的道台,请他在我离任期间与我的代理副本堂神父罗安当(Anot)先生协商处理基督徒们的事务,我的缺任将持续五—六个月。他非常乐意地向我答应了这一切,如果邓家埠的教案以对我们基督徒们非常不利的方式结案,那么我也不认为大家应该将此归咎于九江的道台。

当我在法国获悉江西事件恶化时,便匆匆忙忙地踏上了回中国的道路,于1874年12月31日回到九江。有人告知我说,道台于6月间就向我讲过的政府特使是一名叫作庞义的人,他已到达安

仁县,但却不慌不忙地躲在衙门中大门不出。暴徒们继续强夺豪取安仁及其附近三个地区的基督徒们的钱财,威胁一些人,毒打其他人,以向他们所有人报复,共有 100 多户人家成为其敲许勒索的受害者。为了从这些暴徒们手中获得于自家中生活的权力,我们的基督徒们必须借债或出卖其财物,其中有些很难获得钱财的人只好眼巴巴地看着暴徒们摧毁其房舍。

经过与邓家埠和安仁县官吏们(他们都被牵涉进了这事件中)持续 20 天谈判之后,庞义就呼吁教俗人士都置身于他的指挥之下,其借口是预审一个案件,事实是为了惩罚无辜者和为罪犯辩护开脱。

他以指责基督徒们自己焚烧小教堂,以使用谎状来报复其敌人们。五名暴徒被作为证人传上了公堂,这些人都自称为基督徒,他们非常了解事实并准备讲出真相,而且仅讲真相。他们作证说火灾的肇事者是一名叫作桂云堂的基督徒。后者被传上了法庭,愤怒地断然否认这样的诬蔑。他继续说:“此外,我这一天并未在邓家埠,甚至在离那里很远的地方。当时我正在贵溪县,因而也不在该州。如果需要的话,那我很容易地就会证明这一点。官老爷!这就是我的原告人的另一种厚颜无耻的行为。这五名证人都自称是基督徒,但他们实际上根本不是基督徒,作为基督徒的我可以对此作出保证。让他们背诵几段我们基督徒中所有人都熟悉的祈祷经文吧!如果他们会背诵一段的话,那么我就会同意接受惩罚。”我们的这五个人被勒令当堂背诵经文,但他们个个都被吓得张口结舌,只好承认他们根本不是基督徒。正在已经真相大白,庞义也多少受到了一点侮辱,将桂云堂两名原告下狱,但其它三人却释放回去了。

因此,该官吏必须放弃强迫基督徒们招供为火灾肇事人的打算。这些人又杜撰了另一种理论,而且还是按照官吏们的意志并使

恶徒们皆大欢喜地获得了成功。庞义说：“现在尚未证明基督徒们于其小教堂中放了火，它是由于事故而被烧毁的。因此，基督徒们是诬告者，他们不会逃脱法律的严厉惩罚。”

众所周知，乡匪于正中午时刻，于邓家埠人的众目睽睽之下在该建筑物中放了一场大火。官吏们对此了如指掌，但在本处就如同在崇仁县一样，实际上是指一幢被用于基督教崇拜仪礼的房子。当时必须向上司官吏们呈奏报告，或者更应该说是用表章向上司讲明基督徒们完全错了。这就是江西官吏们惯用的那种翻来覆去的惯用伎俩。

因此，庞义曾假设并进而确认小教堂的火灾并不是应归咎于乡匪们的一大罪行，而纯粹是一种事故的结果。为了使基督徒们接受这种假设，他不惜进行拷打和大动酷刑。在当场审讯中，他令人残酷地拷打基督徒们，以迫使他们招供在小教堂火灾的问题上是诬陷的罪犯。至于那些曾犯下杀死一名基督徒、暗杀另一名基督徒的妻子、拷打并严重致伤两名殉教者、曾经偷盗和抢劫等罪行的暴徒们，则根本谈不到这样的问题。庞义在审问这些暴徒时，其目的仅在于让他们招认，小教堂是由于我们基督徒们的不慎才被烧毁的。

罗安当获悉了特使庞义所玩弄的一套鬼把戏，于是便重新致信九江道台。他获得了将这一案件上报省府的决定。南昌（省府）的官吏们在那里又玩弄了同样的手段，使邓家埠的基督徒们遭受了同样的毒刑，以逼供让他们招认小教堂的火灾纯属一场事故，基督徒吴连生以从小教堂屋顶跳到一棵竹子上的手段自杀。只要此处有竹子就足够了。

最后，经过六个月的囚牢和酷刑之后，发生火灾那天根本就不在场的桂云堂，由于坚持要揭露真正的罪犯而被判流放。王开秀和

吴氏基督徒都摆脱了这一惩罚,被释放恢复自由。前者考虑到其妻子被杀,而后者则是由于其父被暗杀。

江西的司法就是这样发展的,当各地涉及到教案问题时,基本上均如此。然而,我反复地提出了要求。如果我无法获得公正,那么我就去北京向我们领事馆抗议如此的不公正行为。

二、谭坊教案

谭坊是位于距抚州府宜黄县有 20 里远的一个大镇。1873 年之前,在谭坊没有任何基督徒。在 1873 年间,崇仁的某个人到达那里经商,讲到过基督教。这种新的教义使许多人产生了兴趣,有几个人立即开始学习基督徒们的祈祷经文。在短短的数月期间,他们便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崇拜真正上帝的小核心,但却不为该县的传教士们所熟悉。

罗安当先生专心于其州的工作,那里共计有 2000 多名分散在几个地区的望教者。当罗安当先生尚未到达谭坊,甚至尚未向那里派遣任何传教士时,却爆发了一场风暴,它的爆发就如同是使非常幸运地开始的归化使他产生的美好希望破灭了。

1874 年 3 月间,宜黄县的 20 多名衙役们来到谭坊,以在那里缉拿数名即将被传上法庭的人。当他们在一家客栈饮茶时,获悉在该村庄中有些基督徒。他们惊呼到:“这里有基督徒,我们来负责处理他们。正好!刚从省府传来抚台有关他们的命令。在谭坊再也不能有基督徒了。如果某人公开承认属于他们的教派,那么他将受到严惩。”

一名望教者听到了这些威胁,于是便前去警告邻居中的某些如同他一样的望教者,然后又与他们一并前去找衙役们讲理。大批异教徒与望教者们联合在一起以去恫吓衙役们,因为衙役们由于冒昧地欺负人和敲诈,故普遍遭到憎恶。我们的衙役们发现愤怒的

人群反对他们，并威胁要把他们带到抚州知州处去惩罚他们，于是便频频道歉，非常羞愧地摆脱了这次不幸的事件。

返回宜黄之后，衙役们便酝酿策划，为他们认为是受到了谭坊望教者们侮辱的事件进行一次大张旗鼓的报复。他们在宜黄县大堂一名叫作张正法的衙役的指导下，结成了一个会社，其目的就是阻止该地区的任何人选择基督教，同时也是为了大规模地迫害那些归化了基督教的人。

当这个会社牢固地建立起来时，张正法花言巧语地对宜黄知县说：“在谭坊有很多基督徒，他们都很凶恶和厚颜无耻。他们曾扣压了一批衙役们，而这些衙役们只得借助一大笔赎金才得以脱身。这些基督徒们是非常危险的人。必须采取防范措施，因为他们很快就会大批入城，以从那里驱逐官吏们”云云。

知县是一个相当善良的老翁，他相信或者是假装相信了张正法的谎言。那些侵犯者们未能如同大家曾向知县预言的那样前来，知县于是便把我们的一名劳氏老基督徒传去了，我们的修道院长王吾伯(Rouger)先生把他作为领洗师安置在宜黄县。知县就所谓的谭坊基督徒们的暴乱一事审问他。劳氏对于张正法的阴谋诡计一无所知，不由自主地针对这个问题而大笑。他说：“官老爷！在江西肯定没有一名基督徒能有如此之胆量，而且基督教也要求服从现有政权……此外，现在于谭坊尚只有很少的基督徒。如果认为他们具有反叛思想，那将是荒谬绝伦的。”

张正法于是又苦思冥想出了另一种阴谋。在宜黄县有一名富裕的文人，名叫游官保，有一名望教者长期以来都租种他的土地。张正法正是求他把谭坊的基督徒们引诱到自己精心设置的陷阱内。他策划使文人收回让望教者耕种其土地的许可，认为望教者必

然会在其他基督徒们的陪同下前来提出异议,那样大家就会识破他们。

果然如此,当这名望教者获知他再不能耕种游官保地土地时,便与数名望教者和两名世俗人前往宜黄县,以便陈述这一事件,或者至少是要求向文人索回他作为契约的保证金而押在此人家中的一笔款子。游官保礼貌地会见了他并请此人大吃大喝。

正当大家入席就餐的时候,一名心腹奔到衙门通知张正法,张氏又报告了县官。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一队衙役冲到游官保家中,就如同是保护他不受大批前来的基督徒们抢劫、殴打和甚至是杀害他一般。这批人高声呼叫着冲向了这些可怜的望教者,望教者们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众人粗暴地把他们抓了起来,五花大绑后又押往衙门。在衙门中,未经任何形式的审判,便极其残酷地拷打他们,然后又把他们投入关押流氓恶棍的监牢中,其中的两个人由于所受的虐待,而于四日之后死去了。这一切都发生在1874年4月间。

罗安当先生获知了所有这些事实,他在开始时不敢为这些望教者们的利益而冒险采取措施,因为事态尚不明朗。所以,他希望在要求最高当局处采取行动之前,必须掌握某些更为翔实可靠的情况。他为此目的而派遣两名忠实的望教者,以详细地研究这一案件。我们正是通过他们而获知了大家刚才读到的具体细节。

宜黄县的知县立即发了一道公告,于其中命令大家联合起来和拿起武器来反击“匪徒”,也就是基督徒们。这份官方文告招致了对谭坊及其附近地区的望教者们的千般凌辱。我们的那些在押犯

必须多次上堂受官吏们的审判,而官老爷在张正法大肆挑唆怂恿下^①,令人非常残酷地拷打他们,以致于使八个人毙命于狱中。

我们徒劳无益地抗议类似的残酷行为,但至今只获得一些模棱两可的答复。我重新要求进行一次调查。如果人类拒绝给予我们公正待遇,那么上帝至少要以非常多的灾难来取代其最大的天福。这10名出于对基督教名字的仇恨而牺牲的受害者的鲜血成了新争论的起因。“殉教者的鲜血是基督教徒传播的种籽。”这句话于1873年又于江西得到了验证。江西的罗安娜在其婆母为使她放弃宗教和信仰而使她遭受了六个月的侮辱与虐待之后殉教,接着便是其故乡崇仁地区的千余名步她的后尘而受归化,我们于此之后便在那里创建了50多个基督徒会口。

三、上顿渡教案

上顿渡是距抚州府临川县不远的一个大镇。上帝利用了使该大镇的一名望教者与一名老子信徒之间互相争执的一场纠纷,从而归化了一大批不信基督的人。这场争执产生了某些反响,它对于上顿渡的许多人来说,则成了更好地了解基督教的一种机会。某些人希望选择这种宗教,在该镇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基督教小会口。大家甚至想在那里建造一座小教堂。该村中一名叫作冯文达的文人变成了典范的基督徒,他以其影响而大大地帮助实现了这种虔诚意图。由于他的施舍、他在该地区的基督徒中鼓动收取的份子钱以及由传教区提供的一笔款子,尽管异教徒和文人们反对,大家仍得以在上顿渡建筑一座用于宗教仪轨的房子。

^① 上帝打击了这个可耻之徒。他因为在一次疯狂发作时,令人发指地杀死其生母,而被投入专门关押流氓们的监牢中。张正法及其家属中的一大部分人被迫遭受中国惯用刑具中最具污辱性的大刑。他可能已以其生命而为其罪行付出了代价。

我们的敌人曾根据该省的习惯结成了一个会社，称之为“百鸟会”。当他们发现小教堂在冯文达的影响下和几乎是在他的直接主持下矗立起来时，便决定抓捕此人并将他交给临川县知县王大人处理。他们已经通过此人而不公正地囚禁了我们的数名基督徒。他们甚至还希望杀死他。冯文达清楚地知道这些人的厚颜无耻以及他们在知县那里受宠的情况，所以他非常小心地避免与他们相冲突。某一天，这些人正在那追捕他，他认为只有在衙门中，在抚州知州那里才能获得庇护。该知州是一名不太刚毅的老翁，但却很正直并对基督徒们有好感。知州致信临川知县，要求他把冯文达移交给他，以公正地研究和处理其案件。冯文达向王知县提起了对百鸟会的一份很符合规则的诉状。知县否认该会的存在并让人把冯文达投入了监狱，向他宣布说只要他不能证明该会的存在就不会释放他。

数日之后，百鸟会的三名成员在一名叫作于赛西的异教徒（他们却认为他是基督徒）家中抢劫时被当场人赃俱获地抓住了。他们被捕了。其中之一归还了与他捣毁或偷盗的东西等值的物品，应某一名为之做保的亲属之请求而又恢复了自由。另外两个人为了重新获得自由，便编列了百鸟会成员的一份冗长的名单，于赛西将此交给了其基督徒亲属们。其后，于赛西扬扬得意，自认为最巧妙的手段是将两名匪徒交崇仁的官吏，此人对于被盗地区负有司法管辖权。当获悉罪犯们均为黄大官人的子民时，崇仁的官吏便将他们递解给他了。黄大官人令人拷打和关押了于赛西并释放了两名盗窃犯。于赛西的一名基督徒女眷前来为他申诉，知县又令人逮捕了她及其丈夫和儿子。这些大举逮捕的目的是想从基督徒们手中夺走会危及这个百鸟会的文件，因为知县否认该会的存在。黄氏仅在基督徒们向他退还了这一文件之后才停止拷打他们。

百鸟会获得了安宁,于是便加倍地作恶和倍加嚣张。他们抓住了基督徒文人冯文达的家仆胡一生,对他严加拷打并将他家抢劫一空。胡一生提出起诉并出示其伤口。在一名叫作李丁杰的衙役(他是百鸟会的灵魂人物)的挑唆下,黄大官老爷令人把他与其他人关在了同一座监牢中。

李丁杰利用 1875 年的圣灵降临节的机会,散布谣言说我们州的基督徒们(共有数千名之众)将前往抚州,以冲进县衙门和救出冯文达。黄氏官老爷受了他的欺骗,于是便召集了所有的军队,以抵抗可能会直至于其大堂上攻击他的那些基督徒们。从礼拜六晚上直到圣灵降临节的礼拜日,整个兵营都被武装起来了。就在这一天,附近的数百名基督徒都前来我们抚州新教堂听弥撒。大批面目狰狞地好奇者都混杂在信徒群中。他们希望看到一切,显得盛气凌人和使用一种不太令人放心的语言。有谣言流传说,有人将来烧毁我们的教堂。罗安当先生想起了去年在邓家埠发生的事件,所以感到惴惴不安。他要求会见黄大官老爷,但此人却拒绝接见他并以一席很不礼貌的语言将其帖子退了回去。

无论如何,我们只是虚惊一场。当我获知了抚州所发生的情况之后,便向九江道台控告黄氏官吏。大家于是便于表面上对黄氏官吏发出了指责,此人对此根本没有感到畏惧。该官吏重新令人拷打冯文达,又将冯文达与其他无辜的基督徒们投入了监狱中,他们近一年来就一直在这所监狱中呻吟。这样一来,黄氏官吏辱没了“民之父母”的尊号。从各方面来看,他都不辱其抚州基督徒的迫害者的名声。

如果我于此要叙述瑞州府高安县的一名于去年春天被一帮匪徒们活埋的基督徒,同时也叙述官吏们为拯救那些违犯严明法律的罪犯们的行径;如果我也希望叙述我们在南昌府秀才埠的善良

新教徒们于现在所遭受的迫害,那么我将被迫大大地延长这封本来就已经很冗长的书简了。我已经讲过的内容就足以证明,江西的大部分官吏们都使用了各种非法手段,甚至是采取违犯中国法律条文的手段,以阻止“天国”(上帝的王国)在该地区扩张势力。所以,当我一方面考虑该省的 2000 万居民尚不懂我们的宗教时,当我从另一方面以非常高兴的心情看到在许多家庭可以受归化而成为上帝选民整体的根基时,我感到了对这些本为真正打教人的凶恶官吏们的深仇大恨。

至于我们在北京的公使馆(我已经向它请求给予援助了),只从中国政府处得到了由总理衙门致江西抚台的一些模棱两可的信件。我现在只能试图向那些掌权者们采取有限的手段了,我们仍不停地对我们那已在天堂的神父进行活动,我们非常相信在欧洲为所有传教区和特别是为中国传教区的成功所作的祈祷。

根据我刚才的阐述,下面就是我们传教区在从 1874 年 8 月 15 日到 1875 年 8 月 15 日近一年间取得的宗教成果:

欧洲外方传教会传教士.....	8	} 21
土著遣使会会士.....	6	
当地的世俗司铎.....	7	
神学院学生	5	} 23
一年级和二年的拉丁语班	18	
教省的基督徒.....	11871	
望教者	3350	
每年受归化者.....	4037	} 10328
领圣体者.....	6291	
举行坚振礼者.....	248	
临终涂油礼者.....	122	

降福婚礼	87
使基督徒的孩子们领洗.....	630
为异教徒中面临死亡危险的儿童举行洗礼	5081
为成年人举行洗礼.....	456
传教区的教堂.....	4
小教堂和祈祷室	46
由传教区出资建立的学校	30

此表未提供任何引人注目的内容。但那些了解当地困难的人会将此视为一种安慰和鼓励的原因。我甚至说,在如此之多的反对和障碍中,我们还是为 400 多名成年人和 5000 多名异教徒儿童们举行了洗礼,我对此感到欢欣是令人奇怪的,因为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已前去享受上帝选民们的至乐去了。由于中国人的性格和我们为维持新教徒们的信仰所具有的很少一点手段。他们可能得到充分的圣宠,因为他们没有失掉勇气。这样一来,我们的望教者们那日益增长的数目使我产生了一种希望,认为上帝对于该省具有一种特殊的慈悲愿望。

先生们,我将特别请求得到你们和你们教友们的祈祷!

你们的最卑微和最忠实的仆人

莱荣主教和江西宗座代牧白振铎(Géand Bary)

中国江南宗座代牧区传教士们的综合报道^①

自数月以来,打教活动一直在宁国府(安徽省内)猖獗一时。早在 1876 年 2 月 22 日,传教士们在宁国府的住院就被付之一炬了。传教士们的书简将会使人了解这些事件后来的发展状况。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 46 卷,1877 年。——译者。

尊敬的金緘三神父于 1876 年 3 月 20 日自宁国府发出的书简中写道：

一名叫作刘天福的可耻之徒在另外两名乡绅周邦杰和唐培群的帮助下，首先是秘密稍后又是公开地迫害宁国县的高桥渡村的基督徒。

项德来(André)神父反对他们的这些恶意，他甚至向高知县告发了他们。我前往公堂用寻找官吏的办法来支持他。我们获得了一些美好的诺言，但它们绝不会吓住打教者们。

刘天福因被项德来神父强迫放还他刚刚绑架的一名女基督徒激怒了，正准备报仇。他选择了一名称做程明德的望教者作为其迫害对象，项德来神父正是通过此人而获知这次绑架的。他清楚地知道方统领和知县都希望使人相信即将在东岸爆发一场叛乱一般，并且认为一名基督徒为其首领，大家向他们提到了程明德。

因此，刘天福率领一班衙役前往程明德家中，以图逮捕他。项德来神父提前获知消息，急忙跑去帮助并迫使攻击者的退了回去。他的计划暂时被搁置起来了。在元月十五日晚上，刘天福率领 12 名营勇和一队疯狂的人冲开了程明德家的大门并破门而入，对该住宅进行了抢劫，然后又令人把程明德绑了起来并押至方统领面前。

当地的那些正直人士立即前往方统领处以示抗议。但命令已经下达了，仅仅接待原告人。当时程明德已经被打 1500 板子并忍受了各种大刑。我致信给方统领和宁国县知县，为程明德的官司进行辩护。毛神父也写了封信，强调指出了对于一个无辜的人采用的如此不公正做法的后果，因为他们完全是由于对宗教的仇恨才将此投入刽子手们的手中。

方统领将程明德带到了宁国府知府的面前，以使此人的双手

沾上受害者的鲜血。但知府拒绝介入这一事件，方统领于是便在宁国府的监牢中监禁了程明德，并且下令捆绑其双脚、双手和脖子。他声称：“如果大家不这样捆绑他，那么囚犯就会逃亡。”

在此期限内，方统领给我写了一封复函，其中字里行间都弥漫着仇恨和傲慢的语气。更有甚者，他在致安庆抚台的一封信中，指控基督徒和传教士们为暴乱首领并索求程明德的头颅。我请求宁国府的知府和宁国县的知县以及安庆的代表认真对待这一事件。他们出于理智，也都拒绝把这一事件提交抚台——唯一可以做出决策的人。我向安庆送去了一封信，其中附有为证明程明德和其他被告人均属于无辜所需要的文件。

上星期，方统领来到了宁国府。我要求能会见他一次，他却以避而不见的办法拒绝了这次会晤。使者乘轿前往衙门大堂，却被拒绝进入。两天之后，我们获悉程明德也被穿上红号衣，也就是囚衣，然后又在两名营勇的押送下离开了监狱。有人说把他送解安庆了，其他人则声称已经被杀。

这后一条消息不幸却是准确无误的。程明德已在建平县被砍头，其头颅悬挂在该城的城墙之上。

在标明为4月29日写于河沥溪的一封书简中，项德来神父提供了如下情况：

望教者程明德已被砍头。在我看来，这是一名真正的殉教者，因为他完全是被仇恨宗教信仰的人处死的。方统领及其营勇们公开声称：“如果他不是基督徒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处死他。我们是出于对天主教和传教士们的仇恨才杀死他的。”这也是异教徒的说法，他们声称程明德仅仅是由于他是基督徒和不想背弃其信仰才丧命的。

大家于此散布了许多不祥的流言蜚语。仅仅是在方统领的营

勇们设法把黄神父包围在建平县内以使之成为殉教者的时候,才恢复了镇静。这些有关死亡和摧毁宗教的流言于此造成了许多背教。程明德的整个家族在周围被背叛者所包围时,在坚持信仰和忍辱负重方面都令人钦佩。其迫害者在迫使他沦为乞丐之后,还希望从该地区驱逐他。

最后,尊敬的乔迁于(Le Cornec)神父于1876年5月14日自水东写道:“刘天福及其同谋者对于将程明德斩首幸灾乐祸,继续追捕此人的全家。现在的目的是绑架其儿媳。为了预防这些灾难,如果时间还能来得及的话,那么我将要求让人把他带到我们水东的圣女学院。高家渡的其他望教者全都害怕受与程明德相同的命运,正如许多人已经威胁过他们的那样。”

二

望教者程明德的死亡是由方统领长期策划的一场打教阴谋的第一个事件。该将军既是一名文人,又是武官。他从其最早行为未受惩罚之中,似乎得到了能够满足其对基督教之仇恨的鼓舞。为了能更可靠地达到其目的,他便从事讲道,解释康熙皇帝的圣命,尤其是与邪教(其中特别包括天主教)有关的圣旨,建立“圣人(孔子)教”以反对天主教。他于是便令人写下了布告牌,大家在上面可以读到传统的告白:“天地君师亲。”他于其中又增加了四个字:“圣人神位。”这些布告牌由其信徒分发。他在一种籍簿上登录了其信使的数目,向他们许诺给予帮助和保护。如果他们仍敢于接受基督教归化的话,那么他就会因为愤怒而惩罚他们。河南移民“童子何渚”成了新宗教最狂热的宣传者之一,大家如约都会在建平县令的侍从中发现他。当此人按照方统领的榜样解释康熙的圣旨时,他具有让民众相信“圣人教”系出自政府的天才。

在此期间,有些奇怪的谣言流传于镇江、南京、芜湖和扬子江沿岸的大镇中。到处都流传说,中国人的辫子在那里被纸人以神奇的方式剪掉了,这些纸人仅仅高数厘米,大家可以在天空中发现他们。类似谣言一直传到了宁国府地区,基督的敌人便不怀好意地利用这种谣传,公开声称传教士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使人的辫子脱落。大家一致断言,只要向空中抛散一片纸并在上面吹一口气,立即就会有一条辫子脱落,这种巫术的受害者不会再有超过三天的生存期限了。为了摆脱这种灾难,儿童们于辫子上拴上一页写有迷信文字的纸片,男子们勇敢地把发辫握在手中,或者是盘结在其头发之下。这些广为流传的荒谬谣言和这些在光天化日之下暴发的愚蠢行动在民众中激起了一种异常的骚乱,同时又使对传教士和基督徒们仇恨重新萌发了。方统领及其部下从民众的这种思想倾向中发现了使他们苦思冥想和我们即将叙述的那种目的取得成功的另一次机会。

一、尊敬的耶稣会传教士卞良弼(Bies)和沈二神父以及在俗司铎黄方济(François Xavier Ouang)在徐家汇和上海“歇夏”数天之后,于1876年7月3日乘长江的一艘汽轮船前往宁国府。他们于9日晚上约9时许到达那里,卞良弼和沈二神父进了孙家埠公署。黄家山的望教者们都逃到那里以摆脱方统领的追捕,因为方统领要索取他们的性命。

翌日,也就是7月10日,两位神父前往水东。就在同一天,已从毕家桥堂口前来的黄神父将其帖子和一封信交给建平县知县,求县官为其传道员白会清伸冤。白会清于三日前在赴圣枝主节的路上被一帮河南人抓走。此人被严刑拷打并被押送到了方统领正坐镇的十字铺,方统领又把他遣返给建平县官。黄神父后来又向芦村走去。7月12日,他又致信给正聚集在水东的卞良弼、项德来和

沈二诸神父，告诉他们何渚及其下属已公开发誓让他成为一名殉教者。

7月13日星期四，黄神父尚未开始做弥撒，施行圣事者（黄成耀）匆匆奔来，要求他尽快地逃亡，因为有一帮匪徒正向公署冲来。神父首先想到要为女校少女们的撤退创造便利条件。这些少女们在一名宋氏孤孀的主持下，正在由两道院子一座花园与教堂分隔开的女校中学习。但公署已被800名武装持火枪和大刀的人包围，没有任何能够逃出去的通道，这结狂暴之徒立即入侵公署。黄神父在他曾想逃出的学校附近被擒，何渚径直走到他的面前。

神父对何渚说：“为什么要摆出这样的架势呢？如果你想要某种东西，那么我将会凭公道而给你。”

“我的命掌握在天主手中。如果我为天主的事业而丧失生命，那么我就可以升天堂，我在那里将要求你于某一天随我而去。我在这里仅仅为了拯救我自己和我教友的灵魂。因此，如果你想打我，那你就打吧！”

“那么，脱去你的衣服吧！”

“我不脱。”

黄神父刚刚讲完这些话，就有人剥去了他的长袍、衬衣和鞋子。他仅留下最后一件内衣了。

“你自己脱这件吧！”何渚说。他希望于其残暴之外，再用凌辱来折磨此人。

“我更不能脱去这最后一件衣服了。”

何渚于是便抓住了他的头，一刀当面砍去。一道很宽的伤口从前额一直到右耳，黄神父血流满面。第二刀又砍向了其左肋，使他倒在了地上。黄神父喊道：“耶稣！救我！”这是他的最后一句话。暴徒们于是剥去了他那遮掩其鲜血淋淋尸体的最后一件衣服，何渚

的第三刀打开了他的腹膛并掏走了其内脏。其四肢被从躯体上肢解下来了。据说,何渚带走了受害者的头颅,剩余的部分都被就地焚烧了。

黄神父刚刚倒在刽子手们的屠刀下,他的一名传道士杨士孝也在教堂对面被捕。他的胸膛正中被砍去一刀使他倒下了。该青年的虔诚以及他在传播福音时所取得的成功,这一切必会使他受到何渚的仇恨。杨士孝后来被当着其母亲的面活活烧死了。

女校的少女及其女教师们都被在这支野蛮队伍的首领们瓜分了。教堂被彻底抢劫一空,然后又被部分地拆毁。学校几乎完全被变成了大火吞噬的目标。在放火焚烧之前,何渚在一个箱子中发现了九幅纸剪的天神像,基督徒们都习惯于在圣枝主日(Le dimanche des Rumeaux)时,在松树枝或棕榈枝上挂这些纸剪天神像。他带走了这只箱子,向里塞入了一绺无疑是从其一名受害者头上剪下的头发。他后来便散布谣言,声称在传教士这里发现了那些令人憎恶的纸人,正是它们造成了许多灾难。箱子中装的剪发便是黄神父罪行中最令人信服的证据。

二、就在造成这些事件的当日,便有某些信使匆匆忙忙地从芦村出发,以向聚集在水东的神父们报告这些消息,同时也是为了通知他们说何渚的人即将到达。传教士们于是便采取了安全措施。学生们都送回家去了,女教师们前往另一个基督教堂口。沈二神父请求该村村长和乡绅们给予保护,至少是阻止来自村民的任何攻击。

就在同时,项德来神父带领两名传递员骑马出发赴宁国府。他们于午夜时候才到达那里,城门关闭,他们只有在黎明时才能进城。该神父在官吏们那里的活动仅仅获得了某些微不足道的成功。知县拒绝接见他。知府接见了,但却在拒绝相信到处都流传的谣言的同时,又许诺立即派遣一些士兵保护水东。他不是发布通告和

采取强有力的手段以制止匪徒们的行径,而是处于一种完全的束手无策之中,让无可挽回的灾难事故酝酿直至最后大罪铸成。

遭到如此抛弃的传教士和基督徒们被迫为他们自身的安全负责。男女和儿童们都逃回了深山,随身携带着他们所有的最宝贵的东西。沈二神父白天藏身于水东附近的基督教会口中,他举行告解仪式,重新鼓起了勇气。他于夜间便到处行走,向其他基督徒提供其使徒的帮助。卞良弼神父出发前往广德州,于7月16日到达那里。当他穿行该城时,众人不遗余力地对他谩骂和威胁。18日,在街巷中集聚了大批人,他们都威胁要进入其住宅。官员及时获知了这一事态,于是便下达了严厉的命令以阻止骚乱,对于任何犯下攻击传教士人身之罪行的罪犯都将被处以死刑,他又命令四名衙役对传教士的住院严加守护。

项德来神父在离开宁国府之后,又取道河沥溪县。从此时起,三名传教士之间就再没有任何联系了。

沈二和项德来神父的头颅已被悬赏索求。各条大道和林间小路都被严密地监视起来了,以便当这两位神父试图逃亡之时,能够抓获他们,或者是通过强迫基督徒们揭发而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

沈二神父于7月14日离开水东,以前往芜湖。他在那里乘上一艘汽轮船,于17日向上海报告了芦村屠杀的消息。次日,总铎乔迁迁和宁国县北区的传教士李神父乘船前往上海,以便能从那里到达宁国府。他们到达镇江之后,便去寻找金缄三(金式玉)神父。传教区总会长——尊敬的高若天(Foucault)神父动用了其所有手段而全力以赴地与安庆洋务局的官吏们谈判。21日,这三名神父已经置身于芜湖了。乔迁于神父留在那里试图与其堂口的基督徒们重新建立联系,金缄三和李神父前往安庆。

可是,破坏行为仍在不屈不挠地持续,而官吏们的无动于衷又

完全形成了对此的鼓励。方统领令人到处张贴一份告示,迫使基督徒们背弃他们已接受的宗教。如果他们想活命的话,那就必须如此行事。大批望教者和新教徒都被这种危险吓呆了,纷纷脆弱地退却了。

何渚于7月14日前往建平知县处投案,向知县公开供认他于前一天杀死了黄神父。知县冷淡地回答他说:“你使我面临着一件极其棘手的麻烦事。”何渚受到了这句话的鼓舞。他放心地感到至少是暂时不会受到惩罚了。他于是便于同一天抢劫并焚烧了大通镇的公署。门卫吴先生(74岁的老翁)在那里被处死。这名虔诚的基督徒已于其故乡公开承认其信仰。他原籍为河南,自数年前离开那里以开始为安徽的传教士们效劳。黄神父的另一名传道士白会清几乎与吴先生同时被何渚手下的人于途中活捉并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南阳镇于7月15日被抢劫,六家住宅被抢劫一空,基督徒们四散而去。16日,开封镇有人拆毁了公署。基督徒张广志及其妻受了致命伤。在建平县,大部分道路在当时都被截断阻塞,所有那些于其身上可以搜到圣牌或念珠的人均被捕。

千余名河南人操起武器并威胁说,如若官吏们要试图解决基督徒问题,那么他们就要暴动。何渚公开声称:“我的案件很清楚,我将会人头落地。但我在死前将要烧毁水东,将杀死金緘三。”从宁国府到江岸,派人在所有道路上设岗。如果神父试图进入该地区,那就要杀死他。7月15日—23日,共有40座教堂、住院和学校被焚烧或拆毁,现在所知被杀死人数已达八名之多。

现在只剩下水东了。这就是传教士们的总堂,也是宁国府堂口的物资总站。7月24日,水东被夷为平地。学校的地基和直至围墙都彻底消失了。圣器室、小教堂、藏经楼、更衣所、家具等等一切均

遭抢劫。沈二神父埋藏起来的 2500 个皮阿斯特(金币)也被挖掘出来并被偷走了。一个装有马尾的枕头被撕开了,他们竟然声称这种马尾是由传教士们的代理人从发辫上剪下来的。一个由匪徒们杀死的孩子又被抛在了传教士们的一间房子中,每个人都说这个孩子是为了给我们提供药品和做妖术使用才被害的。在花园的角落里停放着伏日章(Fémiani)神父的棺材。有几名暴徒砸碎了棺柩,尚保存完好的衣服被从尸体上剥了下来,又砍下其头颅。这名尊敬神父的部分遗骸被狗吞噬了。在这次亵渎遗体事件的八天之后,有一位仆役偷偷地溜进了花园中,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最后一点遗骨用土掩埋起来了。

在拆毁或焚烧了教堂之后,暴徒们散布谣言说,宁国府的基督徒们进入了全面的叛乱之中。这些诬告却直到南京都受到了善意的欢迎。仇教者们于是便转而反对那些拒绝接受圣人教之布告的基督徒们,抢劫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以将她们转手贩卖。许多家庭都逃向了山区,仅有某些基督徒突破重重障碍才成功地到达了江岸,并且前往芜湖去,到乔迁于神父处避难。

然而,当时已在安庆着手谈判,金緘三神父准确地获悉了宁国府所发生的事件,他于 7 月 23—24 日与藩台陈大人会晤。26 日,一名黄氏特使从安庆前来,经芜湖而赶赴建平,以调查有关黄神父被杀及焚烧教堂一案。第 2 位特使周氏于 7 月 28 日被派往宁国府,但在方统领的顽固坚持下,其使命失败了。第 3 位特使冯庆三负责寻找沈二、卞良弼和项德来神父并将他们带回芜湖。他成功地独自完成了委托给他的任务,解救出了自半月以来始终藏在南湖山中并避难于一间茅草棚楼阁上的项德来神父,本来死神很快就会在那里等待该神父了。项德来神父于圣母升天节前夕到达上海,完全处于一种精疲力竭的狼狈状态。沈二神父当时已离开宁国府,

他利用化装才摆脱其敌人,冒着很大的危险和严峻的困难,于7月31日到达徐家汇。卞良弼神父现在是被滞留在打教现场中唯一一名神父。他仍留在广德府的衙门内,官老爷于7月27日收留他在那里避难。

三

尊敬的乔迁于神父写于芜湖的一封信筒对于安徽省打教者们的活动、官吏们的行径、官吏和基督徒们的处境都得出了一种准确的概念。我们仅提供以下段落。

总督和道台的美好许诺是无法兑现的,他们继续从各方面不受惩罚地欺负基督徒们。

在徐村和水东及其它地方,基督徒们成群结队地在山中游荡,即无衣服又缺食物,甚至无法回来收割水稻和为来年的一点微薄收入略做准备。

他们已经两次派遣特使去丈量我们房屋的废墟,并对其损失做出评估。他们根本不接受我们基督徒们的控告,未曾对仇教者们讲过一句指责的话。在他们走后,欺压教徒们的活动又重新肆虐起来了。

在大部分地区,正是朝臣和地方官吏们迫使基督徒背教,并向他们断言,灭绝我们的命令本出自官吏们。

奉安徽省政府的命令来平定这一地区的道台,只发出了一道非常优柔寡断的布告,其中请求其民众与基督徒们保持平静,但却没有对既成事实做过只字指责。他在建平县一无所成地逗留了一段时间之后,便前往宁国府,在那里无动于衷地看着我们的基督徒在作垂死的挣扎。

由总督自南京派出的1500名营勇都驻扎在宁国府的门户,在

一座山峰之巅修筑一道土墙以在那里扎下大营。六天以来，他们甚至未能抓获遍布该地区的暴徒中的任何一个人。按照官方的说法，他们的使命就是作战，很少关心民众反对基督徒时所做的事。直到今日，我尚未获知道台或者是总兵吴大人（吴长庆）曾为一个被抢劫的基督徒家庭伸冤鸣屈，也未曾保护过一个受威胁的家庭。

地方官吏对向他们递交请愿书的基督徒们说：“去找你们的神父们吧！”宣城的黄知县对水东的基督徒程前固说：“你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呢？”由于此人回答说他在湖北时就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那名官吏又补充说：“那么你是一个老教头了，你不仅仅是罪犯了。”前往宁国县寻找项德来神父的冯特使询问地方官：“为什么不把拆毁我们公署的人和追捕我们的人抓起来？”

“因为这就是现已下达的命令，”此人回答说。“那为什么要逮捕陈修女的劫持者吴金道和夏飞鹏呢？”

“因为他们是自动前来本衙投案的。”

卞良弼神父请求广德州的官吏阻止对我们基督徒住宅的抢劫。官吏回答说：“最重要的是应该保护城市，对于此类小事，我会于稍后顺利地解决的。”他什么事也没干，虽然他当时很容易制止宁国府和广德府大部分地区的暴乱。如果当时逮捕某些流氓无赖并依法处罚他们，那么在八日之前早就恢复和平了。

官吏们非常重视我们在该地区得不到的东西。一俟在安庆的人都知道我到达芜湖的消息之后，抚台便令人向金緘三（金式玉）许诺说，我在获得道台的邀请之前，不会前往宁国府。然而，道台离开已近 20 天了，尚未对金緘三神父发出任何邀请。

那里允许方统领的部下随心所欲地铸造各种武器，钱先生在大元镇中发现三盘炉子正持续地工作，以制造大刀和火枪。

何渚最近出发去南京了，由方知县及其下属的 10 多人陪同，

前去向总督告状。正是方统领建议他前往南京而不是安庆。

芦村学校的两名少女隐藏在方统领的兵营中,另外两名躲避在知县的衙门内。其他人则始终都被关押着,那些人希望通过恐吓而从他们嘴里逼出供词来,从而得以为芦村的屠杀辩护。何渚及其同伙搜集了数箱被剪下的辫子和纸人,以便作为反对我们的可贵证据而呈交官府。接着,他们便将那些诬告呈交或者是将要呈交官吏们。从最后一名镇长到宁国府的道台,所有的官吏都如同是同时接到命令一般行事,也就是说命令他们不要为保护基督徒做任何事,对一切行为都放任自流,以彻底消灭基督徒们。沈二神父仍在芜湖,因为他无法返回其县中,尤其是无法于其县中滞留。新教徒们害怕因收留和藏匿一名神父而受到株连,因为神父的藏身处通常都会很快地被暴露。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官吏们顽固地坚持迫害他们时,我们的基督徒又能干些什么呢?

无论仇教多么令人恐怖,我们却依然希望返回自己那已遭荒废的基督徒堂口。何渚在南京活动未获成功,这似乎是承认我们的希望变得很合情理了。8月16日,大家于总督衙门的大门上读到了下面一条布告^①:

“本官两江总督沈葆楨,对于建平县的难民何渚向本府呈递的诉状,特做如下判决:

若该地的洋教徒确为罪犯,尔等本可向地方官府告发,由地方官来受理这些案件。尔等有何权力率众烧毁洋教堂、杀害二名教徒并焚尸?况且,基督徒们罪行也不足以使尔等率众离乡并焚烧宣城和宁国两县的教堂。尔等实在大胆妄为和无视法律。

本督据此将何渚投入江宁府大牢关押。巡抚和道台必须立即

^① 本布告原为中文,现因无法查找原文,故从法文译出。——译者。

缉拿其他被告何大由、余应龙和吴永庭归案。必须查明真相并将判决呈报本督,以使判决得以执行。本督将把何渚、余应龙和吴永庭等呈递的诉状转给会审官,然后再转回本官。

本督对于建平难民的其他诉状也作出了与何渚诉状相同的判决。

六月二十七日”

尊敬的卞良弼神父于 1876 年 8 月 23 日写道:

“昨天,冯特使来到了这里,以将我带到上海去。这是重新见到我们神父们的一次好机会,我很希望利用他。然而,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认为还是不要让步为好。因此,我毅然拒绝了特使的提议。本地官吏动用了一切手段以摆脱我。如果我离开此处,那么有人还将对我们的基督徒们滥施淫威,我们的最后希望也就会立即化为泡影。只要我在这里,官老爷就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他不敢公开迫害我,因为我时刻都可以提出抗议。因此,我发自内心地回答那名官吏说,只要不逮捕作恶多端的镇长以及为他们出谋划策的人,那么我就不会离去,因为我害怕于中途被杀害。

“前天,我径直前往我们的住院。在大街上,任何人都未曾有过一言一语的议论。我于此后又对官吏说,如果他为我而感到害怕,那么他可以在我外出时让两名士兵陪同我。我希望他们理解,我不会如同囚犯一般地留在这里,所以不能坚持阻碍我与基督徒们的联系。同一天,两名骑马的人进入我们房中。他们自称是由总督派来的差官,负责前来打探消息。他们发出了咒骂,追问我们把这片地盘卖给谁和这里还有多少西洋鬼子。我立即提醒官吏要逮捕这些人,但他未做任何事,这两个人现在仍然下榻于客栈中。他们很可能是方统领或何渚派来的。”

打教案并不仅仅是在宁国府(安徽省)肆虐,它也横行于江苏

省的大部分州府中,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

尊敬的耶稣会士康治泰(Condar, S. J.)于1876年8月23日写道:

“7月26日,在江都县(扬州府),有四名异教徒行人因被当作基督徒而遭逮捕,尽管他们极力否认和辩解。有人向他们宣布说,如果他们拒绝支付相当大的一笔款子,那就要处死他们。由于他们拒绝付款,所以有人便将他们投入到了一个填满生石灰的坑中。经过数小时之后,他们已经完全被烧焦了。官吏们都无法控制局面,从而再也无能力约束其民了。

“在深二卫镇,有一个偷孩贼集团(挂子)。这些盗贼中的两名被擒,他们自称是传教士们的使者。他们于是便在8月21日被砍头,但却未向人揭示他们根本不是我们的代理人。从此时起,人们便威胁摧毁我们的房子。”

尊敬的潘如汉(Pouplard)神父于8月9日自江阴县(常州府)写道:

“最荒谬的诬告列入了反基督教的日程。人们纷纷指控基督徒们剪人的发辫和从事巫术,或者是将祸害人的魔鬼、毒蛇、老虎等放出来扑向人群。

“有一名姓齐的人从无锡来到江阴,由于其容貌令人生疑而被捕,被押到官吏庞玉林堂前。当被问到其住院的所在地时,居住在我们无锡教堂附近的齐氏回答说居住在‘天主桥’,这是位于女校后面的一座桥的名称。原籍为河南的庞玉林不是将此地读作‘天主桥’,而是理解作‘天主教’,认为他是在与一名基督徒打交道。他继续审讯。疯子微笑着回答说,大家在无锡都知道剪辫子的事。庞玉林认为齐氏在嘲笑他,于是便令人对他滥施大刑。疯子继续傻笑和斥责官吏。该官吏无法把疯病与嘲弄区别开来。他在行刑拷打那

个不幸人的同时,仍在继续审问:‘你是否加入了白莲教?’‘没有!但我属于白莲教。’庞玉林听到这些话之后,便无法控制自己了,于是就下令对那个疯子判处斩立决。他接着又说:‘我们应对他剖腹和挖心,我想看一下基督徒们的心是黑色还是红色。’”

同一位传教士于8月19日自无锡写道:

“由我派往衙门的罗先生落入了小民们的手中,并且已被浸于血泊中。无锡最强有势力的三个家族主宰着这场民众运动,罗先生无法进入公堂。人们辨认出了其小艇是属于天主堂的,于是便向他抛去了如同一阵冰雹般的石块。至于他本人,他却被抬到了一间房子中,官吏下令给他治疗。”

尊敬的包若瑟(Boyer)神父自己也写道:

“我的圣彼得(Saint-Pierre)会的一名渔民叫作孙黄林,8月6日星期六正在聂镇桥(常州府),于其船中诵读日课经文。大约在下午一点钟时,所有人都集合了起来,呼叫着和狂奔着寻找‘鬼’,以将之从本地区驱逐出去。他们发现了两只江北人的船,然后就冲向这些西洋人。但这些都逃走了。人群便停留在孙黄林的基督徒船前。‘我们在那里发现了鬼子和剪辫子的人’,有人惊呼道。人群于是便立即将该船抢劫一空并从中找到洋鬼子。他们发现了一幅受难耶稣像:‘这就是鬼。’他们又找到了一根装饰有两个用纸剪的小天使的树枝,‘这肯定就是剪辫子的纸人。’大家将船长痛打了一顿,将其双脚和双手捆了起来,将其身体抛到了相当的高度,然后又使它重重地摔下来。人们殴打他,谩骂他,审问他共有多少次为于夜间迫害人的鬼举行崇拜仪式,他共剪发辫多少次等等。受害人的逆来顺受的精神确实令人钦佩,他仅满足于回答说自己是基督徒,从未犯过此类罪行。其儿子获知了这种可怕的场面之后,便奔来报告戚墅堰镇长。该小吏恰恰在民众即将斩杀孙黄林时到达。镇

长做出了相反的判决,他将此人置于自己的保护下。这样一来,我们的基督徒便有幸得救了。”

尊敬的金铨三神父于9月10日从南京致尊敬的塔场(Tailhan)神父的书简中指出:

“在关于宁国府事件的问题上,南京、北京当局和总理衙门都支持我们。赫捷德(de Roquette)先生和法国公使馆的新翻译索瑟(Schoerzer)获悉了这些事件,于是便前往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又立即致信总督。方统领最后屈服了,他当时还在南京。据说,即将派他赴甘肃以镇压回民起义。杀害黄神父的凶犯何渚被捕,此时正在将此案件提交南京。”

中国川西和川东宗座代牧区的综合报道^①

仇教正以不同的激烈形式继续肆虐四川。大家可以通过传教士们的下述书简摘录而判断该省基督徒们的悲惨处境。

一 川西

1875年6月2日,彭司铎(Bompas)先生从营山致信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的院长瓦赞(Voisin)先生:

在欧洲,秘密会社的手中都控制着新闻工具,它们在一直深入到最默默无闻的村庄时,便到处散布亵渎宗教的言行和对基督教及教士们的仇恨。在中国,青莲教也为它指定了一种同样的任务并让它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在所有的城市中,都流传着一些反对基督教和抨击西洋人的小册子。在大街小巷的所有角落里,都张贴了极其下流的揭贴。某些官吏们下令撕毁这些谤文。其他人(也就是人数最多者)则无动于衷地看着这些辱骂性的揭贴张贴于其大门之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49卷,1877年。——译者

上,他们清楚地知道反对我们的阴谋已经策划就绪。但他们不是保护我们和为我们伸张正义,而似乎是更愿意助从事诬蔑的人一臂之力。直到此时尚为有限地域的教案则趋向于变成普遍性的了。这些漫骂、威胁和诬蔑可能从来未有自赫捷德先生到后那样频繁。这是一种发动叛乱的信号,是对刚刚在天朝帝国港口从事贸易的欧洲列强的一种正面挑衅。

在于整个川北都张贴的诸多揭帖中,有一种写得就如同是出自三大官吏一般。文人们都清楚地知道它绝非出自官府,但我们敌人的主要目标却是愚氓和市井小民。最近,当获悉有人在位于营山有三法里远的村镇回龙场贴出一张揭帖时,我便命令一名姓吕的医生撕毁它。3月22日(星期六)是赶场(开集市)的日子,我的这名勇敢的新教徒迫不急待地随我而去,但立即有一名其体格如同大力士一般的铁匠,从咽喉处抓住了他。

“你有什么权力撕毁由帝国最高官吏中的三人发布的这道命令呢?”

吕氏冷静地回答说:“这道布告根本不是由官吏们发布的命令。正如你所说的那样,这是出自青莲教印经厂的一种无耻谤文。它玷污了我们崇拜的上帝,漫骂了我们的司铎并煽起对基督徒的仇恨,我的义务就是毁掉它。”

“啊!你是这些西洋人的杂种,是彭(彭是我的汉姓)司铎的一名奴才,他是一个乱党首领。你是基督徒,我们将把你带到你的耶稣那里去。”

恶徒把吕氏打倒在地并用脚踢他,被当地两名先生和相当数量的和尚煽动起来的平民百姓们都扑向受害者。这个给他一耳光,那个踢他几脚,另一个再打他数拳,有人揪他的头发,有人向他的脸上吐唾沫并使他饱受凌辱,还有些人烧他的眼睫毛并以钳子夹

其皮肤。

如果一一列举我们这名可怜的新教徒所忍受的全部刑罚,那将会过分冗长。经过数分钟之后,他已经遍体鳞伤了。他在受刑期间不断重复的耶稣、马利亚和若瑟的名字激起了这些暴徒们的极大愤怒。当人群即将把他投入水中时,这次滔天罪行的煽动者——两名镇长害怕事态会造成对他们不利的后果,于是便命令人群撤走和散开。

他们高声呼叫:“住手!我们已经充分报仇了,留下吕先生一条命吧!但从此后,他再也不能返回回龙场作生意了,因为这对于他来说就等于死亡。”

一名由于偶然而恰逢在场的基督徒以及数名怀有同情心的异教徒接待了那名不幸的医生,并且让人把他抬到这里的小祈祷室中。上帝保佑!他的任何伤口都似乎不是致命的,我希望很快就能使他恢复健康。

我向营山衙门提出了起诉,其回答相当令人满意。但究竟会作出什么样的判决呢?

1875年6月7日,欧仁·科坦(Eugène Cottin)从常乌坚致信其教友——罗西雍的本堂神父(柏利教区)说:“自复活节以来,打教事件一直未能缓和下来。在长10法里和宽3—4法里的一片辽阔土地上,我的新教徒们被迫忍受各种欺压。前途是暗淡的,在中国、英吉利和俄罗斯之间始终存在着爆发战争的危险。无知而善于盲从的中国人将其原因归咎于传教士们和基督徒们。他们大张旗鼓地张贴了一些对基督徒大加谩骂和号召民众屠杀这些人的揭帖。有人将这些揭帖翻译给那些不会阅读的人听,有人在解释其内容。大家都在互相激励对西洋人及其基督徒弟子们的仇恨。去年,这些人被从集镇上驱逐出去,然后又根据他们各自的财富情况而

赎身。今年,那些最陋小的茅屋也无法避免遭抢劫,大批家庭的财产都被暴徒们侵占,而且是在官府的众目睽睽之下如此行事的,官府鼓励必须捍卫和镇压的事。在几乎对教义一无所知的成千上万的新教徒中,到底会有多少忠实的弟子呢?我再也无法做更多的其他事来支持他们了,现已发现我自己再也不能公开外出的时间终于到来了。我被迫使用秘密联络系统,只能借助于黑夜来旅行和不能再高声祈祷了。我在近两个月来所供养的 20 多名难民都出动了,以试探寻求与其已分散的家庭重聚的手段并且正准备迁移。风暴到处都在非常沉闷地咆哮。今年,我县是唯一一个人们可以直至使用暴力手段的县。在某些地方,基督徒们正准备投降。”

杜昂(Dunand)先生于 1875 年 11 月 21 日写道:“我们度过了一个灾难深重的时代。大家甚至可以说整个四川省都变成了匪徒的巢穴。”

这几天,在我们周围,众匪共抢劫了 50 多个家庭,匪徒们驻扎在距学校有 10 里远的地方。这是一场全面的惊慌。洪广化主教大人现在正在距我们住院有半小时远的地方从事主教巡视工作,他感到非常懊丧。他对于我们的新修院感到极不放心,因为我们多少有些孤立。此外,我们不知道自己已成了匪徒们贪婪的抢劫对象。昨天,我根据主教大人的建议而取出了盛圣体的圣爵,将我们的珍贵物品放在了安全之地。当地的团首是一名优秀的基督徒,对于我们忠诚无二,他任我们的司库。每当刚一出现打教征兆,他便跑来。一眨眼的工夫,中国人便发动了令人恐怖的袭击。官吏们均为同谋,因为他们故意装作对一切都一无所知。

我忘记告诉你说了,木坪自六个月以来一直处于血与火之中。直到现在为止,他们尚未触动我们的房子,这是由于我们的教友戴图(Tetu)先生,大家就如同害怕“西洋鬼子”一样地对他感到恐

惧。

六个月之后,也就是到了1876年5月20日,川西宗座代牧洪广化主教大人写道:

“在深山中的弹丸小县荣昌县,我们建起了一座相当漂亮的小礼拜堂。它尚未竣工,便突然间有2000—3000名异教徒在数名文人的带领下,冲向我们的房子。他们将房子彻底抢劫之后又拆毁了它。荣昌县的传教士彭司铎为了摆脱这些‘蛮夷们’的疯狂而粗暴的行为,于是便通过后门而冲到大街上,他只不过是抢救出了自己随身穿的衣服,除了为了建造小礼拜堂而花销的款项之外,我们的损失仍然相当巨大。彭司铎的圣杯、司铎装饰与所有物品、书籍都被抢走、焚烧和毁坏一尽了。这种破坏文化艺术的行为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从容不迫地完成的。营山县基督徒人数不多,贫穷而又胆怯,世代与附近的异教徒们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从官吏们自己承认的情况来看,所有的错误均出于异教徒们一方,但却未为我们作出伸张正义的任何举措。有人声称,当时为反对基督教而策划了一场全面的阴谋,它源出于衙门官署之内。有许多证据可以向我们证明这一点:他们拒绝实施公正、异教徒们那日益增大的胆量、到处都张贴的那些极端下流的揭帖。”

1876年8月16日,同一位高级神职人员写信告知我们说:“去年,我向您讲到了在顺庆府出现的动乱^①。他们对我们所做的许诺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希望,也就是说我们很快就恢复秩序,并且还要审判和惩罚罪犯,让我们的小礼拜堂最终从废墟上矗立起来。事实上,我受欺骗了。1876年1月间,四川布政使的职务有变,其继承人是欧洲人的一名不共戴天的敌人,因而也是与基督徒为敌

^① 请参阅《传信年鉴》,1876年,第139—140页。

者。这次变迁已经产生和每天仍在继续产生对于传教区具有灾难性的后果。在顺庆府,我们的小礼拜堂尚未被重建,罪犯们尚未被缉拿归案。尽管我们为了一种可以令人接受的解决办法而反复做出努力,但我们的地位依然如故。受到了官吏们无动于衷态度的保护以及未受惩罚这结果的鼓动,匪徒们人数越来越多,并且威胁要消灭一切。

“大约到了去年底,营山县小城举行童生会试,共有 700—800 名童生冲向了我们的刚建成的小礼拜堂并大肆抢劫,然后又在市井小民们的帮助下拆毁了礼拜堂和带走了所有的物资材料。最后,该城的知县向总督的报告中也承认了基督徒们的无辜,但我们却未获得任何满足。

“今年 7 月 20 日,内江县、荣昌县和隆昌县三县县民联合操起武器,以红旗开路,侵入了内江县最繁荣的基督教堂口。骚乱者们冲向了基督徒,大肆抢劫,然后拆毁他们的住宅,打伤了大批新教徒,仅留下了那些最著名的人物并将用极端残酷的手段杀死他们。他们将受害者都绑在一根大木十字架上并碎尸万段,完全如同屠夫于屠宰牲口的桩子上所做的那样。这样共屠杀了 14 个人,其中包括一个 4 岁的幼童和一个 5 岁的孩子。这些可怜的稚童并未领洗,但他们作为新教徒们的孩子,都被仇教者杀害了。

“匪徒们首先把所有毁伤的尸体都埋在一个共同的大坑中,他们于数日之后又把这些尸体掘出来再投入大火中焚烧。骨灰被抛扬到江河激流中,或者是撒在耕田粪土中。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表明其罪行之不容置疑的证据而向他们出示尸体。

“歹徒们武装占领该地区一直持续到今天。他们从一个地区赶到另一个地区,杀伤或杀死了他们遇到的所有基督徒。有一名姓卢

的新教徒被他们抓住了，然后便被捆起来并直至被活埋。你们可以判断这样一种野蛮行为会在整个地区散布的恐怖气氛。我们内江县的半数基督徒为了挽救其家庭、财产或生命都背教了，其中还有些人在灾难之中变成了犹太或叛徒，倒戈转而反对我们并给我们造成了特大灾难。这是一种全面的破坏。

“现在已知的死亡数字是 14 人，但大家认为其人数可能会更多一些。目前，我们根本不可能从事一次调查和了解具体情况。

“在这最后一件和非常悲惨的事件中，我们的官吏下达了一些表面上看来是无懈可击的命令，但实际上却完全无效。他们没有足够数量的衙役和营勇以平息 5000—6000 名抢劫者。其次，事实上正是这些官吏们自己促成了这几次民众骚乱。自四个月以来，所有这些混乱就已经在我的传教区中存在着，而我们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吏们却断然拒绝给予任何帮助，拒绝颁布能够平息这些暴乱的任何命令和布告。此外，他们还让那些煽动暴乱、号召民众屠杀欧洲人和基督徒的揭帖不受约束地传播。我们的官吏们知道这些谤文的存在。我也曾多次请求他们采取措施以阻止这些公开张贴的无耻文字，但他们却毫无所为。数名官吏（且不说是所有官吏）也秘密地为这些侮辱性文字作品的流行推波助澜。

“顾巴德(Coupat)神父于 1876 年 9 月 8 日写道：“在邻水县，现在已不是过去的那种教案了，而发展到了斩草除根的仇教之程度了，共有 17 或 18 个基督教站口被捣毁，尚残存的七八个也都即将在数日间被夷为平地，啊！我的上帝啊！您什么时候才会怜悯我？已经有 400 多幢房子被烧毁，我们在该城中的小礼拜堂，仅剩下一堆堆碎石瓦砾了！正是由于邻水县官的死亡，打教事件才公开爆发。我即将去找那位代理官吏，他在倾听我的诉说之后，便对我说

我应该离开了,而且要毫不迟疑地离去。我前往赶集场^①,以向我的两位可怜的同教教友请教,然后便登程赴邻水去了。我于半路途中获知小礼拜堂被拆除,基督徒们的房子均遭捣毁。

“9月5日,该城被数千名武装人员入侵,大约于晚上4点钟时,他们发动了对小礼拜堂和住院的袭击。据说,在这些攻击者中,共有江北(川西)的400人,他们反复声称自己接受了其官吏们和甚至是皇帝本人的命令,要彻底灭绝所有的基督徒。所以,他们自吹要在各地都从事他曾在邻水所做的事。

“我们现在于赶集场共有近200名逃亡者,于将来必然会有600—700名之多。”

9月11日,洪广化主教致信范若瑟主教阁下:“有人向我报告了一种令人悲痛欲绝的消息。9月7日,永兴庙的匪徒们已被召到了内江城,在那里摧毁了的小礼拜堂以及基督徒们的所有住宅。官吏未做任何阻止。”

9月15日,洪广化主教又致信范若瑟主教阁下:“我们的敌人在全省到处散发挑衅性的信件。据有人向我们断言,他们将召集民团开全体会议以将基督徒和欧洲人屠杀得一个不留。

“我已向您报告了内江和邻水县小礼拜堂的被毁情况,同时被摧毁的还有这两县基督徒们的住宅。这该是多大的灾难啊!基督徒如同野兽一样地受到了追捕和围猎,有人向他索命或要求他背教,他们之中的任何人都不能返回其家中去了。对于所有这些不幸的人,我们如何做呢?”

顾巴德先生于9月24日写道:“在邻水县,已开始实行《洗净录》(指出与基督徒和欧洲人彻底决裂的手册)。在每个团中都建立

^① 广安州的一个基督教堂口。

一个‘纠’，以负责毫无例外地搜索所有基督徒。背教或死亡、夺取不动产、全面抢劫，这就是基督徒们所注定要遭受的命运。”“官吏们不希望我们于自己的房子中收留在逃的基督徒，其借口是这样做会使我们的敌人燃起仇恨的烈火。大家都指控我召集了大批人以准备叛乱。因为我收留了那些无家可归的基督徒。”

从川西收到的最新消息是情况非常严峻的。瓦赞先生给我们转来了洪广化神父的一封信简，写于1876年10月8日，我们于其中发现了下述资料：“仇教活动为蹂躏我的宗座代牧区与范若瑟主教的传教区相毗邻的部分。我们的灾难是非常可怕的，现时的开销已超过了自己的能力。我们共有1000多人需要供养。有30—40个人已遭屠杀，受伤者不计其数。基督徒们的所有房子都先遭抢劫和后遭焚烧，我们的那些收到了被害消息的亲人甚至无法返回其房子的废墟中去，因为村民们正用刀追捕并屠杀他们。

“正如在数省中一样，异教徒们成群地揭杆而起，以攻击基督徒或处死他们。这些人甚至发展到了一种使人相信存在着一种反对天主教全面阴谋的程度。请大家为我们做更多的祈祷吧！”

二 川东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勒努瓦(Lenoir)先生于1875年12月15日从重庆给我们寄来了如下书简：

您已知道了由于余克林和戴明卿先生的被杀而引起的一场长期诉讼之圆满结果。由于法国驻北京公使馆的有效干预以及赫捷德和白藻泰(Bezaure)先生的四川之行，已经为我们伸张了正义。虽然这种满足至少是有一大部分尚只有停留在于纸面上，但这在中国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了。直到今日为止，在整个这场事件中，除了我们的两名殉教者的鲜血之外，尚未有其他人流血。对于大批被告来说，所有人都是要犯，仅有一个不幸的人被判处绞刑，而且

还不是由我们起诉的。到底什么时候会处决他呢？很可能永远不会处决。我们于这一事件中没有丧失任何威望，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被收买来充当替罪羊的人。

在当地人的心目中，我们的成功之处恰恰得到如下声明：1. 官吏桂衢亭不仅要对此负责，而且还直接地和严重地成为罪犯。如此看来，他完全该终身流放，完全由于范若瑟神父的干预才使他得以减刑。2. 那些戴有顶子的乡绅们是官吏们和桂衢亭的同谋，完全应该判处死刑，只是由于宗座代牧的请求才保全性命。3. 最后，这两项决定要公诸于众。

在法国，这样一种判决似乎不具有多大意义。在中国，如果对于纠正过去的不当判决和对未来的保证之诺言能被忠实地遵守，就如同官吏们都以誓言和文书而对此做保一般，那么这种判决就具有很大的意义了。但在这里，许诺和遵守诺言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事实上，经过6个月的等待之后，任何条文尚未被实施。我们的官吏们，甚至是那些戴红顶子的官吏们都很容易放纵地说谎和进行欺骗。如果他们能将这一切实现的话，那么这对于他们来说则是一些顺理成章而又合乎法律的手段。下面是某些例证。

赫捷德先生同意，在许多被起诉的凶犯中，仅仅有两人和另外六人虽然未被传教士们起诉却被作为真凶被判处死刑^①。由于一再强调，官吏们获许，仅有一人被砍头，另一名将被绞死。他们于是便胆大包天地把一个叫陈棕发的人指定为被砍头者，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此人已经死去很久了。如同他们一样深知这件事底细的总督竟然堕落到使用批准而进行掩饰的中国人的这种圆滑的外交

^① 这些仅仅受到官吏们起诉的人，都是六个被收买的不幸之人。其中就包括谢家俸和陈棕发。

手腕,而且还用微妙的客套话来请求赫捷德先生也于其中附署。赫捷德先生后来发现了这种不体面的欺骗手段,理所当然地对此无比愤慨。但他却在范若瑟主教的请求下表示同意。根据中国对待罪犯的法律,既然“死者”陈棕发已被斩首,那就没有必要再把另一个不幸的人判处死刑了。

上海的一份英文报纸最近报道,在山东,中国当局决定将一名曾杀死一个中国人的英国人判处死刑,稍后却又发现这个中国人仍活在人世间并且身强力壮。你们是否相信我们的官吏会对这样的行为感到脸红呢?你们应该认识到自己大错而特错了,中国是一个很善于玩弄欺骗手段的国家。

在本处——四川的酉阳地区,为了替自己在教堂之内下令杀害李国先生和数十名基督徒的罪行进行了辩解,我们的官吏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些可供自己使用的手段。他们把基督徒说成了迫害狂,把异教徒改判成受害人。他们编制了被基督徒杀害的“良民”中所有尸体的“确切”名单。其中有些老翁、妇女、稚童,共计由官吏一一查验过 260 具尸体,而且官吏还统计每个受害者的伤口数目及类型。其记录于解释中还补充说,“除了这一已知数目之外,还有大家尚有未能发现其踪迹的无数受害者”。这份文件上盖有知县、知州和总督的印鉴,最终被呈报到北京。总理衙门依据这种新的发现,把它作为于 1871 年匆匆忙忙地送往法国、英国、俄国和美国等国公使馆中的那份著名备忘录的基础,这份备忘录又经公使馆被送往欧洲所有宫廷并很快就在地球上转了一圈。由此而激起了对传教士及其新教徒们的普遍愤怒,同时也成了保护这些人的法国政府的某些报刊持异议的原因。范若瑟主教阁下当时正在法国,他立即提出了抗议并保证一旦回到中国,便会提供所有必要的证据,

以明确地证实由中国政府列举事实是错误的^①。

主教大人亲自将其上诉状带到了北京。当时法国驻中国的公使热福理(de Georfroy)先生希望在它呈奏中国皇帝之前,能够通过本国政府的一位代理人核实上诉状中所包含的事实之真实性。他于是便派遣法国驻汉口领事巴士栋(Blanchéton)先生前往就地核实。巴士栋先生的报告完全证实了宗座代牧的上诉状。然而,这份上诉状认为,他主要指出了以下事实。1. 在1869年由基督徒们杀害的260个人中,有数人根本就从未存在过。2. 其中的某些人在此时间已逝世或者是在10年和20年前就已被埋葬。3. 其中的最大多数,约有100多人,至今仍然活在人世……难道我们应该相信中国人的故事吗?许多不幸的人被判处流放,或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杀死了“所有这些人”。在被判刑的基督徒中,有我们的一名土著司铎,也就是他们中的副本堂神父。

这场审判是不公正的、丑恶而又滑稽可笑的,但我们的那些大官吏们却巧妙地让罗淑亚先生批准了它,因为他希望当时正路经汉口的广西传教区会长梅西满先生以川东传教区的名义签署该文件^②。我们没有必要补充说明,法国的临时代办被一名受红顶子的官吏卑鄙地欺骗了,他自认为只是批准和签署针对李国先生被杀和我教堂被焚案所达成的协议,而不是对我们基督徒们的审判。当梅西满后来获知该协议与对基督徒们的审判形成了一个整体,而

① 在此之前,梯也尔和雷慕沙先生曾委托热福理先生将该高级神职人员的要求一直呈奏给了中国皇帝。尽管提出了这些上层的要求,尽管法国领事对所列举事实的真相做了确认,范若瑟主教阁下的呈文仍始终扣留在法国驻北京公使馆的文件档案中。

② 梅西满先生于1869年时在北京。罗淑亚伯爵派他前去处理酉阳教案,而中国官吏却阻止他们前往那里。梅西满在沿海而下赴上海时,于汉口和正从北京前来的罗淑亚先生相会。

这场审判又被严加保密，他于是便刻不容缓地提出了抗议，并通过一封寄往北京的信件而撤销了其签字，但这封信始终是一封“死信”。

然而，我们绝非不希望真相大白于天下，最后是为我们伸张正义。

1876年4月8日，在重庆市郊的江北厅发生了一次反对基督徒的暴乱。下面是我们在外方传教会的彭先生写于6月24日的一封信简中发现的某些细节：

重庆府的府治城由一条小河横贯，河流在该城的一端注入了大江。人口最稠密的一侧叫作重庆，范若瑟主教就住在那里；另一侧叫作江北，它由一名低级官吏治理。

现在，打教事件在江北厅于范若瑟主教的眼皮底下肆虐，而他又无力平息风暴。这完全是由于官吏们的恶意和撒旦般的仇恨所造成的。共有300多幢基督徒们的房子遭抢劫和被投入了火海，共有50多名基督徒被杀。在道路上和城门口，有些岗哨查问和搜查过往行人。那些被辨认出是基督徒的人都立即被杀，其尸体被投入了河中。那些得以逃脱的基督徒们都避难于范若瑟主教的身旁了。这些不幸的人既无蔽身之地，又无食物，失去了他们的双亲或儿童，呈现出一种无法描述的惨象。但范若瑟神父自己出资养活了100多人；其他人被分配给重庆的那些最优秀的基督教家庭中了，与他们共享日常吃的米饭。但有1000多名基督徒无家无业，在近期内也没有获得收成的可能性。整个传教区都被这场风暴搅乱了，在这些混乱和危险之中，范若瑟神父却具有一种完全符合教徒使命的坚定性。正是他安慰、鼓励我们那些可怜的基督徒并使其信仰更加坚定。近来，中国人已经制定了打击重庆宗座代牧区和基督徒们的计划。由于上帝的保佑，这场阴谋被挫败了。上帝最终赐予了

我们和平与安宁。这次打教事件的主要唆使者对于一场难以形容的动乱感到了害怕。他在一幢房子中绞死了其妻子和儿女,在将他们的尸体投入大江中之后,自己很快也自缢身亡了。在一个有许多基督徒遭到通缉和屠杀的村庄中,共有 40 多名异教徒都投江了。几乎在仇教肆虐的所有地区,异教徒们都声称他们发现了大批穿白衣的人,手中操有利剑并追捕基督徒们的敌人。

有人于 9 月 8 日写信告诉我们说:“由于江北厅打教事件持续不断,从而使那些善良的官吏们犹豫不定。他们出于对道台的威慑而不敢表示支持我们,并且还鼓动民众和直至民团准备对我们的基督徒们发动新袭击。如果道台和江北厅的官吏绝对不会在近期有变化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避免巨大灾难。此外,由于这些官吏们作为主要罪犯和被告,所以他们不能成为审判我们的法官;但结果他们离开这里,那么他们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法官了。现在已经逮捕了一些‘灯花教’徒(中国秘密会社的要员)。他们揭发了一些情况,从而证明了青莲教(秘密会社)是这次全面骚动的策动者。”

9 月 13 日,普罗沃斯先生从重庆写道:“现在已经丝毫不怀疑了,如果政府没有正式颁布仇教令,那么它至少应该善意地看待对我们基督徒教堂的蹂躏破坏。当这种事态出现时,传教士和基督徒们都受到了中国人从来不敢对欧洲发动的那种打击。许多中国人都被杀,因为他们作为基督徒而同情外国人。那里都希望首先摆脱那些使民众觉得是欧洲代理人和帮凶的中国人。”

我们的最新消息是有关 1876 年 9 月 28 日的,范若瑟主教于这一时间写信告知我们说:

“昨天,有人从江北前来这里劫持了两名基督徒。下面就是这些人的手段。房子遭抢劫和被焚烧的基督徒提出了起诉,官吏们却无所措。抢劫者们于是便指控这名基督徒犯有一种臆想出来的罪

行。人们于是立即便搜捕了他,并把他带到了官吏面前,官吏向他出示了全部刑具。那名不知所措的基督徒走投无路,于是便在一份判决书上画押,承认自己是诬告,承认他既未遭过抢劫,又未受到过追捕。”

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川东宗座代牧白德立致莫南(里昂教区)的副本堂神父克拉维鲁(Clavelloux)的书简^①

1876年10月27日

副本堂神父先生:

一年以来,我们的处境变得很岌岌可危了。教案毁灭了我们的
大批基督教堂口,其中包括数千名新入教的教徒。

我们所有灾难的肇事者都是几名大官吏,均为基督徒和会使人联想到欧洲的一切事物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已暴发打教事件的那个州的官吏仅仅非常气恼地获悉了日益增多的归化人数。大家成群结队地前来聆听圣教教义并信仰基督教。他希望发动一次沉重打击,使一切均遭到了破坏、蹂躏和毁灭。在属于基督徒的一切之中,仅剩下一片废墟了。劫掠活动停止了,但自七月以来,那些得以逃脱死亡的基督徒们都在离乡背井之中,任何人都未能成功地返回原地。近来,一名基督徒不慎返回了其故乡,立即便被某些异教徒们认出来了,接着就被五花大绑并被投入了江河之中。

下面就是有关教案事件爆发的一些细节。当时已策划了一场反对基督徒的大阴谋。其头目都是一些颇有影响的人物,大部分文人均属于其组成部分,许多官吏都秘密地充当他们的出谋划策人和支持者。这场阴谋波及到了全省,甚至很可能是整个帝国。在所有计划都准备就绪之前,这场阴谋便在我们的一个府中爆发了。如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49卷,1877年。——译者。

果它按照预定的那样同时于所有地点爆发,那么我们就要彻底完蛋了。

在该宗座代牧区的中心,便是我们主教住院的所在地重庆城。重庆是该省的第二大城市,但它却是全省最重要的贸易城市。在重庆的一侧,具有一枪射程之远的地方,在一个由扬子江和另一条自北流来的较小江水形成的夹角中,便屹立着江北城。这两座城市中的每一座都有其各自的领土和独自の官吏。

在江北的一个村镇中,有一个很有权势和极端傲慢的人,他很久以来便在寻求粗暴对待我们新教徒们的机会。某一天,这些新教徒们正在集体念诵玫瑰经,他便疯狂地跑来并使他们饱受凌辱。祈祷结束之后,有一名教徒向他询问,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触犯了他,他为什么对他们进行如此恶毒的侮辱。他的恼火不断上升,立即召集了一大批异教徒,径直冲向了一名新教徒的住宅,将他抢劫一空后便放火焚烧之。那些专门干坏事的人接着又抓住了其他三名基督徒,让他们锁链加身并把他们绑在一根大梁之上,一边数日对他们进行残酷的鞭打。据说,江北厅的长官也是一名官吏的儿子,该官吏在英国首次夺取广州时任该区的总督。江北厅的现任长官是一名无能的老朽,由于贪婪而受其民的憎恶,而且又从其父身上继承了对欧洲人和基督徒们的仇恨,所以 he 不想负责处理这一教案。1876年4月初,其中的一名被告被押解到了官吏的面前,但却立即便被释放了。此人返回其家中之后,便散布谣言说,基督徒们使他深受侮辱,揪掉了他的胡须等等。

打教人只不过是寻求一种借口,一旦发出高声呼叫便会召集大队人马来。所有的人都于夜间向城内挺进。当有人打开城门时,他们便进了城。他们首先前往衙门取得号令,然后便奔向小教堂,将它拆得只留下了堆堆砾石。他们甚至掘地数尺深,这或者是

为了更好地发泄他们的仇恨,或者是为了在那里寻找财宝。他们的第一次举动是在那里官员的眼皮底下完成的,他的赞成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以一种新的狂热袭击民房,没有任何一间房子能幸免于难,那些属于基督徒们的住房均被摧毁,而仅仅是由基督徒们承租的那些房子遭到抢劫,居民们均受虐待或逃散而去。

当在城内再不剩任何可以供糟塌和抢劫的东西时,暴徒们便分散在乡间。他们带着火枪和扛着飘扬的旗帜行进,就如同在正规的战争中一般。他们也是当着官吏们的面这样肇事,而中国的官吏们本来是负责处理扰民行为的。我们在乡间的基督教站口(仅有一、三个例外)大都遭到了毁灭,房子被焚烧,房主逃亡。庄稼、存粮、家具、银钱、畜群等等一切均遭劫掠。

6月10日,川西宗座代牧洪广化主教传教区中的一名新教徒从相当远的地方赶来,回到了其家中。他不久前受归化,随身携带一份目录,上面写有《天主经》(Peter)、《圣母经》(Ave-Maria)、《信经》(Creto)、上帝的《十诫》等,并且还附有给他凑份子而进行施舍的人员名字。由于众人审问他们和搜查所有旅行者以证实他们是否为基督徒,所以这名新教徒落入了衙役们的手中。他不肯背弃其信仰,而仅满足于向刽子手们求饶,借口他是外国人。那些人挖去了他的眼睛,把他碎尸万段并抛入了江河。正是异教徒们自己介绍了这些具体细节。

6月12日,那些人又抓获了几名基督徒,控告他们是那些本来是由异教徒们所纵之火的肇事者,于城市的中心杀害了他们。

复活节的那一天,他们在乡间共杀死了三名新教徒。他们还逮捕了两名青年女子。江北的所有新教徒均遭驱逐或被迫弃教。一名年迈的寡妇收养了几个儿童和并向新教徒们传授教义。人们对她滥加污辱,一连数日都在协商用什么刑罚将她处死,把她推向江

中？于其心脏中刺一刀？还是要用木桩刑将她处死呢？衙门中的某个人为了经商而来到了该城的集市上，对于她的状况颇为同情。他让该老姬坐在其轿子中，自己却步行返回。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能进入该集市，所以我们不知道死者的数目。

4月17日，发现了对一个叫作宁城场的基督教大站口的抢劫，此地基督徒的人数很多。那里有一个年迈的女子向新教徒们布道，有一名虔诚的传道员从事异教徒的归化工作。那些人砍断了他们腿上的神经并把他们活活地烧死。在两天时间里，该女子一直被置于大雨之中，得不到任何食物，被她前往请求收留她的某个人家的异教徒主人用木棍粗暴地毒打。至于那名传道员，据说在有人砍掉其腿和抽其筋时，疼痛使他大声喊叫出了几句背教的话。女主人砥砺他要鼓足勇气，不要于丧失身体的生命之同时也丧失灵魂的生命，在呼唤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名字时将其信仰寄托在上帝身上。该基督徒于是便停止了怨天忧人，使人坚信他对于自己在受拷打期间由于不懂其严重性而讲的那些话感到反悔了。多名新教徒都在危难中背教，但稍后不久又承认他们不再怀疑其罪行的严重程度了。

21日，另一个集场也成了屠杀基督徒事件的舞台。一部分人被投在江河中淹死了，其他人则被从该地区驱逐了出去。其中的某些人不幸背弃了其信仰。次日，他们放火烧毁房屋住宅。

由于仇教者们尚未找到为其罪行辩护的任何借口，所以便同意为绑架我们的一名神学家而支付20两白银(460法郎)的赔偿，为一名基督徒而付出15两白银。其目的是为了使他们遭受可怕的大刑拷打，以期望能推动其它地区的基督徒们拿起武器并大批地前往解救受害者们，于此时便会很容易地把他们当做叛乱者并且斩尽杀绝。我们共有10多名神学家，其中许多人都冒着很大的危

险,但所有人都得以准时逃脱了。

仇教人立即散而谣言说,基督徒们想暴动,他们是纵火犯,最后还说他们已在水源处放毒。这些人甚至到处张贴带有范若瑟主教签字的布告,威胁报复,向他们宣布说我们的士兵和大炮即将到达。我们的敌人甚至狡猾到了贿赂某些可耻之徒的程度,以让他们散布谣言说,主教及某些主要的基督徒们已向该省的四处派遣了大批人,以向水井、粮食和食品中投毒。这些谣言获得了很大的轻信,以至于我们的那些领洗的人再也不能出售食物了。如果这种水是由一名基督徒运来的话,那么大家甚至会拒绝购买江中的水。在江北厅领土上和其它许多地方,任何行人在饮水时都会被抓,随后便会立即被处死或作为投毒犯而押解到官吏面前,由于用大刑拷打他,以使他承认自己是由主教派来投毒的。在这个时代,任何人都不能携带毒品穿越这些地区,大批无辜的异教徒都被捕并受到了大刑的拷打,仅仅在证明他们是异教徒和在某地区很有名气时,才可以恢复其自由。

尽管已经试用了所有的办法,但我们的敌人仍未达到其目的。他们于是便决定以金钱为代价收买某些可怜虫去向水源投药丸,但药丸却无毒,只在于向民众证明当时流传的反对基督徒们的谣言是完全有理有据的。已被抓获的一个人一言道出了全部真相。然而,他并没有摆脱死亡的命运。另外一个人遭到了残酷的拷打,人们希望他承认自己是被基督徒们收买的。在遭受大刑拷打期间,他坚贞不屈,供出了地方上的主要人物乡绅们是交给他们银钱和药丸的人。由于害怕其招供会造成更大的危害,所以官吏便匆匆忙忙地让他暴卒。据说,这个时运不佳的人只接受了很小一笔款,仅值大约4个法郎,便为其贪婪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诬陷之辞四处传播,从而大大地刺激了我们的思想。

5月19日,江北厅的三名乡绅应范若瑟神父的邀请而聚会于其府上。其中之一是一个老实而质朴的老翁,此人曾为基督徒们说情。他返回家中之后,于次日便暴卒。其家庭于此之前就已经接受了许多偏见和谣传,坚信他是被在主教府上给他上的茶点毒死的。因此,其家庭希望提出一次起诉。但某些朋友们却劝他们打消了这种念头,向他们指出这种控告是滑稽可笑的,陪同死者的仆人也曾喝过他杯子中剩茶并吃了他留下的甜点心;其他的两名乡绅也没有任何感觉,虽然其中之一是我们最顽冥不化的敌人。我们非常希望这个老翁的正直性格与影响能够平息这场风波。上帝希望给我们一次新的教训并使我们学会不要轻信别人。

在6月期间,于重庆举行生童会考。大考官被视为西洋人和基督徒们的不共戴天之敌,大家甚至声称他是一封鼓动所有官吏迫害基督教的书简的作者。在他到达重庆之前,仇教者们便派人去向他提出要求,允许在考试期间于该城中打洋教。他清楚地知道,大家指责他对欧洲人表现得过分仇恨了,而且也不希望进一步陷入这场纠纷中,他于是便撕毁了状子并将诬告者轰了出去。有谣言流传说,他到达考场之后,便将原告传到法庭。其中有一个很有权势的人物,对于其家人对于他迫害基督徒的抱怨、由于其错误而面临的危险、他若被起诉便会有羞辱落到家人头上的说教感到厌倦,于是在一次酗酒之后便要去上吊。其妻子只好奔向城内,拜见了官吏和其他主要头目,将其丈夫的死亡归咎于他们并威胁要向上级官吏控告他们。大家以很少一点钱便阻止了其眼泪,这件事到此就算为止了。

重庆的一位画家进入了某名基督徒的家宅进行抢劫,发现墙上张贴着一张圣母像,他恶作剧般地用一根针在画像上刺了100多针。此人接着又画了一幅代表欧洲人的画像,而且是画得头朝

下,又重复了画圣母像的那种伎俩。次日,他便断气了。就在同一地点,有一户五口人的富裕家庭,他们对于纷纷散布的有关欧洲士兵即将到达的谣言感到了害怕,于是便投进了水塘。这些人用一根拴在脖子上的绳子而彼此互相捆绑在了一起。又有人散布谣言说,欧洲大军已经开来,这完全是为了更进一步煽动异教徒们反对基督徒。这种谣言流传得如此广泛,以至于大家在高地中建造了某些堡垒。异教徒们有的藏身于这些工事之中,其他人却隐匿于地洞中。耕田变得荒芜了。每夜都有恐怖和呼叫声:“西洋人来了!”其中有些人如同婴儿一般痛哭,因为他们认为欧洲的飞机将会在他们的领空中飞行。

正如我已经讲过的那样,那些打教人特别希望摧毁我们传教区的中心——重庆的基督教堂口,杀害主教和抢劫一切。形势似乎对他们有利。会考导致1万多名生童来到了该城,这都是一些时刻都会大动拳脚的好斗青年,而且也是基督教公开的最大敌人。从最初几天开始,有人便以抢劫的希望来诱惑他们的贪婪之心,到处都张贴了揭帖,重复了有关纵火和投毒的那些陈旧诬词。

6月13日,人们便开始散发小旗,它们将作为信号标志使用。四川传教区从未面临过如此之大的危险和如此严重地接近于一种彻底的破产。如果这场阴谋在重庆获得成功的话,那么在整个省里就会立即开始大屠杀。人们仅在等待以这座城市抢劫的消息作为信号。道台(首席官吏)是我们的死敌。抚台(第2位官吏)也怀有同样的感情。由于第3位官吏(由军事长官帮助)而挫败了这场阴谋。

在这次教案中,唯有两名官吏表现得具有人情味和公正感。他们严格地维护治安,日夜踏踏实实地干,那些衙役和营勇们能够阻止威胁我们的灾难。许多人都前来向专门负责这座城市的第3位

官吏要求允许拷打基督徒。他严厉地斥责了他们并愤怒地威胁他们，迫使他们对于即将出现的动乱负责。

我们神学院的学生们居住在距该城有 14 法里的地方，他们已经为逃亡而完全准备好了。当大家获得好消息时，他们之中的每个人甚至都已经收到了一笔为回乡而必需的经费。由于那些恶徒们发现其意图在重庆遭到了失败，于是便派遣其密使到乡下去。他们在多处均未获得成功。这样一来，许多受归化时间较长的基督徒家庭都发现自家遭到了抢劫，其住房被推倒了。在我们的地区，异教徒们从未对我们的新教徒们表现出如此激烈的狂暴行为。他们面对任何代价和任何困难都不会后退。所有人都利用了这一切，那些不想完成此项任务的异教徒们都被如同基督徒一般地对待了。许多密使又被派到了大多数府中，以便煽动民众，有些人响应了他们的号召。

江北厅的官吏和重庆府的两位最高官吏（其司法权限和权力扩大到了很远地区）都因曾令人抢劫和屠杀我们的新教徒而又一言不发，没有采取任何可以阻止灾难的行动。更有甚者，他们竟然恬不知耻地致信该省的总督，禀报他说基督徒们企图暴动。他们甚至还补充说，我们根本无力阻止这些骚乱，因为民众们成批地揭杆而起。这同样也是一些设法让人赞成他们的行为以及仇教人行为的手段。道台佯装相信这些诬陷之辞，于某一日在紧靠范若瑟主教的住宅和住院的地方派兵设防，以便在出现任何一点迹象时都能立即处死在那里的所有教士。

所有这些教案都对我们的新教徒起了恫吓作用。那些过去一度曾有意接受圣教信仰的人，现在已经根本不想此事了。所以，我们今年的传教收效甚微，我们的讲道师几乎找不到任何希望聆听他们布教的人了。此外，到处都传播的诬陷之辞使许多人都变得面

目狰狞而令人厌恶。但是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上帝永远不会抛弃我们的传教区，它在严峻考验之后会给予我们平静和安宁。

请接受崇高敬意！

川东代理宗座白德立

下面是川东传教士蓝德银(Londes)神父 1877 年 2 月 24 日从彭水寄给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院长莫里先生的一封书简的摘录，其中包括了对彭水县打教事件的叙述，同时也补充了白德立先生的叙述。

继江北厅教案之后，又在彭水县爆发了大规模的动乱。那里的一切都被彻底搅乱了。但我们的基督徒和我们自己却仅仅是虚惊一场。因为本处的官吏虽然很懦弱，却也颁布了一道有利于我们的告示，形势逐渐地恢复了平静。这种平静持续的时间不长。江北厅教案一直扩大到了涪州和属于该州的基督教站口羊角碛，甚至一直波到了我所在的县(彭水县)。

在 6 月 28 日，我突然间听说有人殴打了羊角碛和武隆的基督徒，他们的房宅已被抢劫和摧毁，基督徒们都逃散而去，甚至在他们之中已有人死亡。

6 月 29 日，有人在晚上六点钟时前来告诉我说，羊角碛的打教者在数日间即将到达，可是任何人都不相信这一点。然而，同一天晚上，在夜幕刚刚降临时，民团团首召集了他手下的人，于我居住的乡间别墅周围部署了一部分军队设防，以使我不能逃脱。他命令其他人抢劫和破坏基督徒们住宅，绑走了他们捉到的那些人，以便在他们拒绝背教的情况下，不久即杀死他们。这一切完成之后，他们又前来抢劫我正在避难的那个家庭，他们想要抓走我。我可以返回城市和逃走的所有道路都被严加防守，唯有通向贵州的

道路除外,因为他们根本不会想到我可以从那里逃走。29日夜间、30日的白天和夜间都被用于抢劫、拆毁住房和缉捕基督徒们。这些基督徒本来要在这一天被屠杀,但由于某些人的干涉而被释放了。但他们被迫要写一份文书,由此而保证永不袭击迫害他们的人,而且还要许诺说司铎与主教也不能控告这些人。他们唯有以这种代价才得以逃命。大家又把他们囚禁了七八天之久。在此期间,暴徒们屠宰了基督徒们的猪并准备一次盛宴。他们作为发誓的标志而饮鸡血酒和盟誓,声称如果他们受到了控告,那就要杀死他们可能遇到的所有基督徒。在彭水仅剩下一个基督徒家庭了,这就是我落脚暂住的那个家庭。30日,当太阳落山时,有人前来向我报告说,异教徒们准备今晚前来抢劫该家庭并搜捕我,我已无法逃身,因为早已被严加看守。我于是便逃往了一名异教徒的邻居家中,他是接待了我的那名基督徒的哥哥。我受到了友好的接待,其全家都尽一切可能地设法掩藏我。

将近晚上10时许,有五个人发现在该基督徒家庭中没有任何人,于是便闯入了我藏身的那个异教徒家庭并询问他把我藏在哪儿。

他回答他们说:“他与我兄弟在太阳落山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便离开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

他们出去后又召来了布置在房子周围的同伙,然后立即回去了。我非常惊奇地发现正是江口的军官率领暴徒们,他们都在狂呼乱叫:“我们要抓蓝(这是我的汉姓)司铎,无论是死是活都要。不许西洋人进入我们帝国,我们不想要他们的宗教!总督和道台已经致书彭水的官吏,命令他杀死所有基督徒及其司铎们,该官吏将这道命令转给了江口的官吏萧泽宁和黄二,他们邀请我们去完成这种爱国主义的任务。所以,我们希望杀死所有基督徒及其司铎,拆毁

他们的住宅和抢劫他们的财产。因此，如果蓝司铎在你这里，那么你就必须将他交出来，否则你将遭受与他相同的命运。”

异教徒们冲破了住宅的围墙，他们抢劫了一切，甚至连锅灶中的砖头也都被抢走了。他们然后将其掠夺物搬到附近的寺庙中。这些人还夺母鸡和阉鸡，准备做一顿美餐，故再也不会想到我了。

我利用这一短暂时刻而从通往贵州之路逃走了。我于天亮前的一小时出发，由一名仆人以及几名以大刀和木棒武装的基督徒们陪同。所有人都一致声称，越过省境之后，我们就再没有任何可以害怕的地方了。两名基督徒用最初几天的时间打通了道路，其他人则跟随着我。我们无法选择正常的道路前进，必须在耕田、大山和森林之中另辟一条道路，并且还必须或者是在隐蔽在玉米地里，或者是藏身于山石之后，有时还藏匿在灌木丛中。

到达省界时，我们才取道大路而行。天亮时，我们三次发现了抢劫者们，他们携带着彭水基督徒们的尸体。我们也被他们发现了，立即就有 75 名暴徒开始追捕我们。

穿过省境之后，我们的人就不再以过去那种强烈的热情行走了。他们认为已经摆脱了危险，但我始终催促大家赶路，希望无论如何也要到达安全地带。有一名在打洋教案时于其家中接待过我的基督徒，他始终陪同我并将我一直带到他的姻兄家中。这些人已经获知了所发生的事，于是便赶来迎接他，但当时尚不知道我与她一起前来。由于他们害怕打教首领们的权势，所以都不敢接待我。因此，我们始终是盲目地向前走。我的那位基督徒愤怒地批评其姻兄们。他在行路中回想起，在邻居中还有一个远亲，叫作聂二老爷。他对我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富裕且有权势，一定会很乐意地会见我们。在他家中，不必有任何害怕的念头，他是该地区的国王。他会借给我们必需的钱以供我们开销。”

经过行走 11 法里之后，我们于 11 点半钟时到达了聂二爷府上了。他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们。在中午时，为跟踪我而来的那些抢劫犯也都赶到了。但聂二老爷根本不害怕他们的威胁。他向他们宣布说，其家中只有老实人。

他又补充说：“如果你们向我讲的那些上层人物接到了其官吏、道台和甚至是总督的成文命令，那就把它给我送来。我可以亲自把我的客人送给主管人，而不是送给你们这些暴徒，相信这一点吧！不要脚迈进我的家。因为我通过所有的神而向你们发誓说，那些不幸进入这里的人绝不会活着从此出去。”

尽管讲了这一席措辞强烈的话，匪徒们仍对这幢房子包围了三天三夜，坚信我随时可能会逃出去并希望能在途中把我缉拿归案。因此，我也只好在聂二老爷府中滞留八天。

在我到达的第二天，当地的一名文人前来向聂二老爷建议花钱买我，以将我献给曾向他许诺一笔巨款的打教人。他提议出 500 两白银（4000 法郎），聂二老爷回答他说“你即使给我 1 万两，我也不会同意这样做。在贵州，有人发动了打教行动，我知道它已经结束了。一旦接受你的建议，这场事件的全部责任都要落到我的头上、你的头上和当地人的头上。这样一来，就将殃及我本人、你以及整个地区。你的头和我的头都平安地长在我们的肩上，我们要尽一切力量保护它。我不会把我的客人交给你，但希望亲自把他押到彭水并把他交官。如果你不顾一切地要他，那你就去向官吏索要他！”

第八天，我们随他的 35 个用刀枪武装的人启程出发，径直向彭水走去。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到达了卡子场，非常惊讶地发现 200 多名匪徒正在等待着我。聂二老爷对他们说：“我前来这里既不是为了攻打该集市，更不会祸害任何人，而仅仅是为把蓝司铎带到彭水。我请求你们让我过去，否则我们就要大打出手了。如果这一次

我失败了，那你们就会知道我将会报仇，而且我在 15 天之内定会获胜。”

听到这些话之后，所有人都退却了。在卡子场以南 20 里处，我们又遇到了 50 多名匪徒。聂老爷只用三言两语就逼迫他们给我们闪开一条自由通道。在江口以北 10 里的地方，我们又遇到了第三帮匪徒，但他们没敢攻击我们。在此时，仅仅有四个家庭遭到了抢劫。次日凌晨，我们乘一只小船出发，必须用两天和半夜的时间才能到达彭水。抢劫者们又有两次试图抓捕我们，但均徒劳无益地失败了。到达彭水之后，我们在住院中共发现 100 多人。与我一并视察彭水的中国司铎吴先生召来了 50 人。此外，许多受到了恫吓的基督徒都逃到了我们这里，每天都有其他人到达我们中间。那时令人不安的流言蜚语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我将聂二老爷及其 25 名下属挽留了两个星期，以便保卫我。

我们向官吏提出了起诉，他回答说我们是诬告者，不肯下令缉捕任何罪犯。他发布了一道有利于我们的布告，向动乱地区派遣一些衙役。当我们发现在彭水很难受理自己的案件时，便向西阳的上级官吏们上诉。此人受到了金钱诱饵的贿赂，未能对我们做比彭水官吏更好的答复。现在已为我们地区恢复了和平，我们被迫停止继续自己的事业并等待一种较为有利的时机。

但经过某段时间的平静之后，涪州的抢劫活动又以更加激烈的程度而重新爆发了。谣言又从那里传到我县中。人们到处都只会议论抢劫教堂和新教徒的住宅、屠杀基督徒和司铎并瓜分他们的财产。在我的再三坚持和恳求下，官员发布了一道得以暂时平定仇教的命令。不久之后，打教事件又强化了其激烈程度。我一再催促官员督办，他也如同平时那样回答我说没有任何可怕的事。面对危险的紧迫性，我第三次被迫雇佣武装人员，准备以武力来反抗暴

力。这是挽救我们生命的唯一对策了,因为所有的道路都被严加看守,逃走已经完全不可能了。我们的人员和我们欧洲武器的名声吓坏了匪徒们,他们不敢贸然进城。

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12月和1月是非常可怕的月份。大家几乎每天都看到成百的匪徒们从涪州和丰都的地面上前来,携来基督徒和某些异教徒们的遗骸。12月16日,他们又抢劫了江口的一个家庭。19日,他们再次抢劫了其他基督徒的住宅以及我们的祈祷室,该礼拜堂仅剩下九根柱子和部分瓦砾了。民团面带微笑地瞅着他们这样做,甚至他们中相当数量的人和江口的营勇们也都投身于抢劫者的行列了。当这一切结束之后,武官和民团都赶来并装模作样地驱散暴徒们。根据在场的土酋们邀请,恶徒们袭击基督徒和拆毁我们的小礼拜堂。一切可以出售的东西都被当地的地主采购了。基督徒再也不能返回其家中了。受其官吏们煽动的市井小民始终都在追捕缉拿他们,敲诈他们的铜钱并强迫他们背教。我们提出了起诉,官吏们对起诉作出了回答,但却未逮捕任何一个罪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罪犯仍是正直老实的守法臣民。

江口受到袭击,仇教的风声以极快的速度在全县传播。两天之后,他们又抢劫了我们在罗家堡的住院,这是我们在当地的两名佃户和所有基督徒们的住宅。那里的房子似乎一直被完好无损地保持至今,仅仅是损失了一些玉米、大米、祭器和家具。暴徒们从那里前往涪州和丰都地域,他们抢劫了基督徒和几个异教徒家庭。两名富裕的基督徒被抓获后又被押解到黄草坝(彭水的市场),然后又用450贯钱被赎回。

当官吏获知所发生的情况之后,便命令民团和衙役们追捕抢劫者,总数共达600人。抢劫犯们四散而去,在整个县内散布了恐怖情绪。高谷的人都前往牛岩铺去了,共集中了100多名可耻之

徒。他们抢劫了一个基督家庭,迫使家长锁链加身,然而又使他在三天期间受到了各种大刑的拷打,敲诈勒索他的钱。由于他无现钞,所以他被迫给他们签署了一张 100 贯钱的银票。他就这样获得了自由,但却受到了许多苦,以至于他今日仍卧床不起。

暴徒们接着便前往张家,向所有那些信仰上帝的人勒索钱财。他们然后又返回到牛岩铺,前往丰都的地面上,抢劫了基督徒,甚至还洗劫了某些异教徒。

他们返回来时携带 25 头牛、3 匹马和 50 套被子,尚且不计他们就地出售的那些玉米和大米、装满衣服的箱子或者是他们带到高谷的其它物品。就在同一时期(12 月 24 和 25 日),高谷的三个基督徒家庭都遭到了邻居们的抢劫,其中之一被桎梏加身。

我们的所有基督徒都受到了恫吓,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人甚至背教了。在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背教者遭到抢劫的情况,而忠实的基督徒们却只受到了恐怖之祸害。大部分人都不敢滞留在其家中,特别是在夜间更为如此。男人、女人和儿童都露天而眠。居住于山洞中或灌木丛中。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因为该地区遍被冰雪所覆盖。那些深受仇教之苦的不幸者们的生活条件更要糟得多。暴徒们彻底地毁灭了他们,如同对待野兽一样地追捕他们。这些人不惜一切代价地迫使他们背教。我们将此事报告了官吏,官吏向民团授权把所有暴徒都带到他面前,甚至命令在他们抵抗时可以就地处决。衙役们抓获了其中两个我们未提出过起诉的人。官吏令人痛打他们 300 棒并用粗大的绳索把他们捆了起来。三天以后,他们全都一命呜呼了。我们押送官府的另一名暴徒被痛打 500 棍子并桎梏加身。根据被我们的仇教者抢劫过的异教徒们的要求,两名暴徒被投入了监牢。其他人始终都逍遥法外。这些诉讼案至今尚未被审理。在等待期间,仇教者们四散而去。

在该县的高海拔地区,流言蜚语却令人非常不安。抢劫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之中。官府决定驱逐抢劫者的命令早就传达下来了。此外,这些地区的基督徒们更为勇敢一些。如果有人攻击他们,那么他们就会做好一切准备进行自卫。据说,火石垭正处于危险之中,酉阳的5个基督教家庭和3个异教徒家庭均遭抢劫。酉阳的官吏立即派兵去追捕暴徒们,一共捕获20个人并准备砍他们的头。我们希望这种儆戒性惩罚能结束这次打教事件。

中国云南宗座代牧袁绶索主教致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书简^①

1877年9月3日于云南

先生们:

感谢上帝!我们今年获得了如此丰硕的收获,甚至超过了我们原来所寄托的希望。这一切都使我们坚信明年将会是更加丰硕的一年。我们的这些出乎预料的成功是从何而来的呢?先生们,我们更喜欢承认,教廷传信部过去是和将来始终都会是我们所有事业成功的基础。若无教廷传信部,我们就不可能在直到那时尚不为我们所熟悉的普通平民中得以立足,在那里居住并吸引异教徒们的注意。因此,希望教廷传信部的教友们能够接受我们的致谢,对他们允许我们所从事的慈善活动(特别是今年)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了使你们对于我们可爱的传教区现状有一种准确的概念,我们将陆续地向你们介绍其主要的中心区。

一、大理府是云南的第二座大城市。由于回教徒们的叛乱,所以我们未能在那里立足。回教徒们将那里变成了他们夺取的诸地区的首府。该城的城墙由云南省占地最辽阔的湖泊所环绕,背靠一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58卷,1878年。——译者。

座名山,大家称之为天青山^①;另外还有大雪山,因为该山终年都被永久的积雪所覆盖。大理府气候宜人,与附属于该府的其它城市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云南这一部分地区那几乎令人无法忍受的气温产生了瘟疫,从而造成我们基督徒们的大量死亡,使传教士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了。造成最大破坏的则是两种瘟疫,分别叫做“烟瘴”和“痒脐症”。

第一种瘟疫意为“由烟雾而引起的肿胀”,它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暴发的。大家看到从地面上的升起一层浓厚的瘴气,到处扩散致命的气体。中了这种瘴气的人将会在腹中感到难以忍受的疼痛,肚子将会极度肿胀。有时也会在头部肿胀,然后便会发生一次致命的高烧。据我们教友认为,这种灾祸似乎是由腐烂植物的有害气体造成的。因此,这些地区拥有多种有机物腐败的热源。有一种佐证可以证明这种说法,那些距这些毒气环境相当远的居民从未受过烟雾瘴气的感染。所以,一旦当浓烟出现时,土著人便纷纷逃往山峦的峰巅,并且在那里一直焦急不安地等待烟雾彻底散去为止。

第二种瘟疫更令人不寒而栗,叫做“痒脐疹”,系由左肋突然出现的小疹而引起的。根据犯病的严重程度不同,这种疹子又被中国人称为“疙瘩”(Ké-ta),在从一个豌豆粒到一个榛子的大小之间变化不定,有时甚至还会有鸽子蛋大。它逐渐地扩散而侵犯心脏,病人便会死亡。“痒脐疹”的病因就如同医治它的药一样有待于去探求寻找。

从自然的观点来看,恰恰是在云南的这片西部地区(滇西),现在正有四名欧洲传教士和一名土著司铎在传播福音。自20多年以来,根本不可能在这个饱受连绵不断战争骚扰的地区发展宗教信

^① 应为点苍山,即苍山。——译者。

仰。当传教士们可以去巡视其基督徒并在沉静的隐居生活之中不落入其敌人之手时，他们是很幸福的。在回乱遭镇压之后，局势又逐渐恢复了和平，我们的教友最终得以重新露面了。英国人马嘉理(Magary)被杀的后果仅仅是增加和巩固了这种长期企盼的和平。云南的人最终理解到，在虐待一名欧洲人之前，则必须仔细审视他两次。在这个时代，罗尼设(Le Guilcher)先生颇受官吏们的器重。他于是便利用了这种有利地位而扩大“天国”(上帝之国)的辖地。土著民发现再没有任何可以害怕的原因了，于是便开始接近我们，对我们更加理解和更加尊重了。

自一年多来，在距大理府有两日行程的城市浪穹县，我们共有近 2000 名新教徒，他们全部出身于良家并具有学习我圣教真谛之虔诚的人。其中已有近半数的领洗人。对于我们来说，困难主要在于向他们讲道和施教。此外，我们也不具备在这些新堂口立即建立学校所必需的手段。当传教士本人可以暂时离开时，他们也被迫去向望教者讲授教义。如果我们能创建学校和拥有数目较多的传教士，那么在那些普通而对我们又怀有极大好感的民众之中，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善行不能做出来呢？

这就是一种我仅从基督徒们口中获知的神圣特征，但我尚未能来得及向罗尼设先生证明这一点。一名妇女及其女儿使其家长非常高兴地信仰基督教。该家长以其端公(一种有权结婚和成家立业的修道人)的身份而很乐意信仰我圣教之上帝，但又不肯弃绝其迷信。我们无需说他们二人尚远不能透彻地理解所有教轨。特别是他们根本不懂或者是他们忘记了星期天因是圣日而禁止工作。因此，在某一个星期日，正当母亲和女儿在从事某种本属仆人的工作时，罗尼设先生突然出人意料地赶来，追问她们出于什么原因要违犯这种圣日之教轨。她们回答说自己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一种

教轨,但从此之后就保证不再于星期天工作了。讲完这一席话之后,当时尚供在这幢房子堂屋里的九尊偶像中有七尊溜到室外了,我们的两名新女教徒非常惊讶地发现了这一切。供像都逃到花园地中去了。该传教士当时也未发表任何感想就离去了。晚上,那位端公回到了家中,询问其供像的情况如何。他目瞪口呆地从其妻子口中获悉了上午发生的事件。他匆忙跑到花园中,搜寻到了他的那些供像又将它们重新复归原位。他于此之后又请求其妻子保证不向外吐露有关这件事的只言片语,以不致于成为异教徒们的笑柄。此二人后来都去寻找罗尼设先生,以请他解释这一神奇的事件。但当他们获知该传教士绝对未曾进过该城、至今仍留在大理府并自一月以来从未离开过那里时,他们对这一切更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了。

罗尼设先生的一名信使向我们叙述了这一奇特的事件,他还向我们断言大家叙述的内容均准确无误。如果上帝以某种奇迹而坚定了所有新望教者们的信仰,从而动摇了许多从未听到过我们神圣信仰之真谛的善良异教徒们那不信仰基督的观念,那也丝毫没有令人震惊的因素。

罗尼设先生利用了这种太平局面和官员们的美好愿望,便在大理府城中安下身来了。一名旧官吏很乐意向他出售其府宅。这是一座豪华的府宅,从中很容易找到一间小教堂、布置一间或两间圣婴堂(孤儿院)、一间司库的办公室等设施。但我们还有一大难题,那就是购价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笔相当巨额的款项。这笔款子再加上我们被迫在京师和其它地方开销的总数目,从而使我们的额积蓄消耗一空了。我们必须支付大理府那个大人物16000法郎。

因此,罗尼设先生得以安稳和体面地定居在该省最美丽的城

市中。在此之前不久,英国人继他们的使徒之后也前来入侵该城,并且还考验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但他们发现我们已在这里足并准备反击他们的进攻。在大理府郊区及其城内,我们有幸于今年共将10个基督徒家庭的归化登录入籍。但撒旦(魔鬼)在看到这些令人鼓舞的开端时也不会无动于衷。

普罗多(Proteau)先生奉命负责大甸街县中的教务。为了复仇,魔鬼在那里挑起了一次教案,造成了数名基督徒的死亡,并且使这个基督教小会口彻底毁灭了。下面就是普罗多先生写信告知我的情况。

受难主日之后的星期二,一名基督徒从大甸而来。他姓徐,过去曾相当富有。他说:“元月29日,在星辰刚出现时,我由于身患疾病而独自留在家中,念诵着我的日课经。突然有一名异教徒出现了,他让我迅速地逃走并补充说:‘有人要杀基督徒,衙役和暴徒们已经堵在门口了。’他刚讲完这些话,大门便开始剧烈地摇动,我立即躲在房子的大墙附近,那里有一条已被堵塞的出口。我从那里听到了抢劫者们的喊叫声,我的妻子和儿媳都被带到了市曹之上。我于是便在黑暗中向距那里有一法里之远的其他基督徒们的住所走去。所有人都逃之夭夭了。我返回大甸,要去一名异教徒家中寻找避难处。我整整躲避了三天。据传言认为,在我返回之后不久,基督徒们的房子都如同我的房子一样遭到了抢劫,传教士先生的房子已被付之一炬。在六日期间,附近的那些敢于及时向我们报告情况的基督徒们遭到了虐待。市曹上的一名基督徒曾被锁链加身,然后才被释放,因为他答应了所要求的一切。继这段记述之后,我只要派人去寻找一名能够写一份递呈官府诉状的异教徒就足够了。这份诉状尚未写毕,另一名基督徒也赶来了,他向我证实了这一悲惨事件的过程,而且还增加了许多具体细节……”

普罗多接着便去寻找当地的官吏,询问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抢劫犯之中。其中之一回答说,他已下令密切地监视在距城市相当远的地方发动叛乱的青莲教,但他从未想到过基督徒。普罗多先生徒劳地提出了给予赔偿的要求。他于是便致书当时正在大理府的罗尼设先生,因为这位先生可能会更容易地处理这一恶性案件。事实上,罗尼设先生受到了道台大人非常友好的接待。道台立即派遣由代表我们的一名教友陪同下的低级官吏去大甸,以估价其损失。最新消息告诉我们说,罪犯们已经答应支付 800 两白银(6400 法郎)作为赔偿。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场教案已告结束。最后,魔鬼可能已经受骗,因为许多异教徒都发现官吏们为其臣民造成的损失而支付了赔偿(这在中国是前所未闻的),于是便不失时机地向我们靠拢,并且试图赢得我们的尊重和选择我们的圣教。

二、曲靖府是云南的 14 个大行政区之一。仅仅是在 12 年之前,我们在该府尚无任何基督徒,但今天已经共计有 960 名领洗的基督徒和 3000 名对教义略知一、二的新教徒。正是我们的代理宗座代牧古分类先生开辟了这一新站口,使之注定要成为该省最早的宗座代牧区。这些民众显得最倾向于选择我们的宗教信仰。他们都很朴实而又没有汉人那样腐化堕落。大家称他们为“猺人”。这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些傲慢的汉人看来,他们都是一些半蒙昧或半开化的人。据说,他们出自中国最早的先民,因其风俗和语言而有别于汉人。今天,四名传教士和一名土著司铎都在忙于照料这些新基督徒并教育人数越来越多的望教者。仅仅在这一年,就有 1300 名异教徒抛弃了他们的偶像并崇拜真正的上帝。

一年之前,刚刚到达我们之中的奥斯特(Oster)先生,立即又被派往这些已受上帝降福的地区。大家于是便把他安置在一个尚未有任何一个领洗成年人的村庄中。共有 11 名领洗的儿童和 10

多名从教人组成了他的全部“羔羊群”(基督徒)。10个月之后,也就是说在近几年中,我们收到了他的报告,其中向我们汇报说已有607名成年望教者,共有21名家长以及他们的26名儿童受洗。这位尊敬的教友所归化的第一个成年人是在他到达之前就崇拜上帝的青年女子。她弃绝偶像崇拜之后不久,便病倒并且沉痾一年之久。在奥斯特先生到达之时,其病情更加重了,很快就再无痊愈的希望。她感到自己的末日已临近,于是就请丈夫前去寻找神父为她举行洗礼。我们的这位教友便派遣其传教先生前往,以尽快向他报告为拯救该女子必须做的事情。经过一个小时之后,他便亲自前来为该女子举行洗礼,为她起了一个教名马利亚(Marie),请求圣母能医治好这个可怜的女病人,以使200多名刚刚抛弃了其偶像并开始崇拜真正上帝的人能坚振其信仰。圣母会赐恩而满足这种朴实的祈愿。病人在举行洗礼之后,立即就感觉好多了。她于次日起床,八日之后就可以从事工作,而且就如同从来就未曾病过一般。她到处都宣传说是圣母治愈了其疾病,强烈地鼓动新从教人。她声称,如果这些人希望拯救其灵魂和身体的话,那就必须尽快地准备领洗。这次痊愈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安慰了我们的新教徒并动摇了大量异教徒。异教徒们逐渐地放弃了偶像崇拜并前来加入我教教友们的羔羊群。

曲靖府的这些新基督教会口一般均由穷人组成,他们为了养家糊口而被迫不停地辛勤劳动。因此,他们只有很少的时间学习教义。此外,还有一种暂时很难克服的障碍,那就是种植鸦片。所有这些受归化的异教徒们都几乎毫无例外地热衷于种植鸦片,因为这是他们的全部财富。然而,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如果他们不种植鸦片,那么他们将会落魄到什么地步呢?再也不会再有财源了,甚至还可能会变得无米下锅,再无供炊之物了。此外,他们清楚地知

道,大家都不应该种植鸦片。但他们立即补充说,难道种植鸦片也会成为一种罪行吗?这样一来,多名谙熟教义的人都无法领洗。若不种植鸦片,那么望教者的数目将会多得多,每年在曲靖府至少可以为 1000 多人准备洗礼。尽管他们做出了所有这些努力,但我们的教友勉强才得以为 300 人行洗。

曲靖府给予了我们在该传教区的其它部分都很罕见的多种安慰。今年,几个望族乡绅家庭、书香门第和甚至是官宦之家的人都参与了基督徒队伍的扩大,并且由此而增加了他们的欢乐。几个城市均向福音开放,它们共为我们提供了 10、15 或者甚至是 20 个家族。不过,我们尚远未能利用已向我們提供的全部有利条件。我们必须在这些城市中各自建造一座小祈祷室、一座传教区住院和开办几所教会学校等。非常遗憾,我们微薄的财力使自己无法支付这样的开销。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间,云南的省府大理以及曲靖府使我们开销了一笔比我们明年将从教廷传信部收到的款项还要多的钱。怎么办?是甘心满足于现状还是祈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呢?

在云南省的首府,布里雅斯(Pourias)先生正在营造一座公馆。你们知道,我们的劳总督^①曾对我们做出了这样的效劳,为我们腾出了一间漂亮的府宅,以赔偿传教区在 20 年来所遭受的全部损失。然而,该府宅被焚烧并由于数万斤火药的爆炸而被彻底摧毁了。由于这是政府的火药,爆炸是由于负责制造火药的职工之疏忽大意所致,所以我们请求总督能够重建我们的公馆。如果这个值得钦佩的官吏不是过早逝世的话,那么他肯定会这样做。其继任者们对于我们的请求置若罔闻,北京也似乎根本不想为我们伸张正义。然而,时间非常紧迫,据说英国人即将派遣他们的新教使徒前来,

① 云贵总督劳崇光。——译者。

而我们这些天主教传士们在省府却没有一处即使是寒酸而简陋的住院。我们根本无法想象会自筹资金从事建筑,因为这项工程至少需要 5 万法郎。

布里雅斯先生于是便被派往北京,由于上帝的保佑,他成功地获得了 5000 两白银(4 万法郎)的资助。我们的教友返回后便前往省府,以着手建造与上帝的地位相匹配的一座小祈祷室和一座住院。但由于所有建材都极其昂贵,布里雅斯先生很快就发现其 4 万法郎已被坐吃山空。我又给他拨去 1000 两白银,并且向他指出传教区再也不可能给他提供更多的经费了,否则将会严重损害办其它事业。大家都希望主体工程能在来年的 2 月间竣工。目前,尚有待于完成的事仅仅是附设工程的收尾了,随着我们财力的允许程度而将会逐渐完成。云南城^①的基督徒人数很少,那里受归化者也很罕见。回教徒们占据了该城,迫使我们远离此地。当我们在善良的劳总督留任期间重新露面时,首先发现了自己那已被烧毁的住宅,然后又看到了我们的保护人被仇人毒死了。我们被迫重新远离而去,天意把我们带到了曲靖府,丰硕的成果将会在那里等待我们。我们现在享受着和平气氛,我们的公馆将会从灰烬中新生。我们希望省府能与该传教区的其它部分同步发展,即将变成一个繁荣而又重要的基督教会口。

三、昭通府是由西加尔(Chicard)会士和另外两名土著司铎主持的教区,建在一片具有 5~6 日行程的领地上。该传教士一般都居住角魁。我们在该城中被迫建立了一种防御工事,以保护我们基督徒们抵抗蒙昧的蛮夷们的侵犯与彝人的骚扰。大家称之为彝人诸部者,也包括当地的土著人。这是一个半开化的民族,中原人征

^① 指大理府的云南城。——译者。

服了该民族并对他们表现出了极大的鄙视,虽然中原人在风俗习惯和淳朴稟性方面远不如彝人。彝人由黑彝和白彝组成。前者是贵族和王公,拥有由那些被称为白彝的农奴们耕种的辽阔土地。当他们与中原人媾和时,我们立即就想到了向他们传播教法。在最初几年中,我们只取得了很少的成功。但当发现这是一个朴实而又未被腐化的民族时,我们却希望能够获得巨大成功。由于上帝的保佑,我们始终未失望过。今年,西加尔先生决定登门拜访他们,这次旅行获得了一次巨大成功,而且还应该是一种始料不及的成功。37个贵族家庭都虔诚地接受了我圣教。促使他们受归化的原因之一是所有这些贵族家庭都精通汉文和汉话。由于他们心地正直善良,所以在阅读我圣教之经书时便会向他们揭示一种光辉前景,并且很快会使他们懂得福音书。由于黑彝依靠自己的收入生活,善于学习,所以他们便立即开始学习教理书和祈祷,直到他们领洗之前都不会有任何懈怠。女子们同样也学习汉文和汉话,她们也以同样的虔诚和成功而学习教义。上帝以他对这些平民广赐圣宠而受到了千般赞扬。

每位黑彝王爷都拥有 10 多名黑彝奴隶受其管辖,奴隶们都迫不及待地模拟其主子并接受归化。我们自己丝毫不用费心地去向他们讲道了,因为领洗的黑彝会引导所有奴隶成为“上帝的选民”,使他们获得真正自由,他们认为这是自己的一种荣誉和义务。经过数年之后,昭通府将成为本传教区最繁荣的地区之一。由于缺少时间,所以西加尔先生只成功地归化 40 多个成年人。但在未来的一年中,我们希望这一数字能够增加 10 倍。就在云南的 14 个府之一的昭通府本城之中,我们基督徒的人数也很少,完全出于我们于上文在有关省府问题上所指出的同样原因,我们在那里拥有一座公馆,它是过去由劳总督出让给我们的。该公馆远不能与云南省城的

那座相媲美,可是它暂时已足够我们使用了。去年,我们在那里用1600法郎作了装修,它现时已成为该城最漂亮的房子之一了。中国人喜欢惹人瞩目的一切。当你拥有一处“大人”的住宅时,他们便会非常乐意地前往拜会你。我们希望善良的上帝会怜悯这座城市,当上帝在向我们许诺会为更多的异教徒举行洗礼时,必然会使我们感到安慰。

四、在我们住院及其周围的三个县内,尚没有我们于本宗座代牧区其它部分发现的那样众多的归化。我们在继续拾捡某些谷穗并关心我们的基督徒,而且这比在传教区的其它堂口的基督徒人数都更多。我们的大部分设施都在这里。传教区的学院、六个孤儿院和近4000名基督徒经常性地由四名教士和两名土著司铎主持。此外,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都绝不会如同在云南北部那样形成人口稠密的中心。每个家庭都居住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上,仅在赶场的日子才会与其他居民交往。但买卖以及其它成百上千种操劳和挂虑使他们无法一心想着唯一的需要。

今年,我们遭受了两次特大灾难,从而使我们的从教人数目只略有增加。首先是暴发了一次饥荒。去年严重歉收,四分之三的异教徒和我们的大部分基督徒很快就发现自己无法维生了。6月和7月间,食物的售价极其昂贵,那些没有任何铜钱的人只能满足于以山中的草根、蕨菜和其它野生植物为生。我们被迫设法减轻所有贫穷基督徒们的苦难。这就又给我们造成了巨额开支。这样一来,许多异教徒家庭都纷纷来到我们学校中寻找心身的食粮,而且也确实如愿以偿地找到了这一切。今年,年景似乎甚丰,但另一种灾难却又抵消了好年成的丰收。

我们的深山老林中有野猪出没,它们于夜间下山糟塌已半成熟的玉米。大家没有其它办法摆脱这些野兽,唯有敲锣击鼓以响声

去轰吓他们。大家有时也放几枪,或者是所有人同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喊叫声,喊声回荡不绝。在两个多月期间,不仅由于晚上这样看护而极端辛苦,而且也无法成功地妥善保护其收成。野猪逐渐地习惯了这整夜的喧闹,它们甚至在距离人只有 20 步远的地方继续心安理得地糟塌庄稼。

该月 2 日,我为一名司铎——我们学院的学生举行了派立礼。这个青年人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但由于上帝的保佑,他始终是胜利者。四年前,有人答应他去巡视他的那些居住在扶廊的人,大家本来希望他能归化他们。但情况恰恰相反,他仅仅是由于上帝的某种特殊恩宠,才未被他们腐化。他在返回我们之中以后,仍继续为其神圣的使徒使命做准备。当他的哥哥突然间从扶廊前来时,他的威望已经大幅度降低并且即将领受五品神职。这是一名文人异教徒,他前来做一次最后努力,以带走其弟并使之永远堕落于异教之中。但是,他简直是一个新保罗(Paul),他是由于上帝的圣宠培养起来的,上帝使他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刚一看到我们的神圣礼仪和翻阅了我们的某些经书之后,便自称是望教者。一个月以后,他做了非常周密的准备,以至于他接受了洗礼和坚振礼,于是便从那里返回其省以试图使其妻子受归化。如果说他遇到了极大困难的话,那么他即将返回云南为其弟(今天已是司铎)效劳。

我立即将一种低级神品授予了我们的另一个学生。对于我来说,这是对布教新工们祝福的一大安慰,他们可能在其同胞中广行善事,尤其是在动乱时代更为如此。

先生们!这就是今天于云南传教区中发生的主要事件。我们可以对此作一番概括,简述了在本宗座代牧区的所有地区都出现了大批受归化的现象。为了满足于如此多的望教者们的所有宗教需要,传教士的人数则显是太少了。为了在如此多的新堂口中营造

小教堂、住院以及建立学校,资金实在拮据。如果教廷传信部的教友们能继续帮助我们,那么他们的人数则会根据需要而倍增,他们也会使我们能够全部接受向我们提供的丰硕成果。他们得到的报酬至少与我们相同,因为我们的成功系由他们的祈祷和施舍所致。

先生们,请接受我最衷心的感谢和最深情的敬意!

你们最忠实和最卑微的仆人

菲洛梅利亚主教和云南宗座代牧袁绷索

博利瑙的主教和满洲宗座代牧杜伯勒主教致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院长安布拉斯特(Ambruste)的书简^①

1880年8月4日于营子

我已经向您提供了有关我去年冬天得以访问的最北部几个县中那繁荣兴旺状况的某些细节。我在阿城、巴颜苏苏和呼兰满腔喜悦地看到了新教徒和望教者(Catéchumène,慕道友)成群结队地前来迎接我,同时也向我表达了他们属于我圣教的荣耀。

虽然元月初的天气严寒,但面对我的却是一副副因欢乐而荣光焕发的面孔。特别是那些新领洗的人,他们的脸庞轮廓似乎带有圣宠的反映。我感到非常安慰地与我的尊敬教友们聚会在一起,以向神主表示他惠予在这三县传播的恩惠。自一年半以来,确实没有任何事件来骚扰这种和平局面,它是由法国驻北京公使团继讷依(Noirjean)先生成为受害者的激烈攻击之后重建的。

在我最后一次经过呼兰的时候,那里的首席官吏——当地的驻军长官曾经非常隆重招待过我,这是大大出乎我的预料之外的。这种非常礼貌的举措极为罕见,因而令人怀疑其真诚了。此外,面

^① 译自《传信年鉴》,1881年第53卷。

对圣教的进展,魔鬼是不会无动于衷的。

我们的大清官吏只是缺少有利机会而高傲地抬起头来。这种机会终于在今年3月出现了,当时在俄中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的流言迅速地传播着。这种流言又首先由衙役们和稍后又经庶民们分别出于欣慰和怀疑的不同心情而被大大地夸张了。据这些流言蜚语散布说,这三省的传教士和基督徒们都要被作为帝国的叛徒而惨遭杀戮。事实上,这了恫吓我们的基督徒,他们力图将我们的事业与俄国事务相混淆,这种虚构的仇恨是很难获得成功的。

您对于我们为促使自己的信徒们具有安全感而付出的辛劳应该作何感想呢?许多人都从事了长途旅行,甚至一直到达营子港口去探听消息。某些信仰尚很脆弱的望教者都在恐惧面前屈服了,放弃了接受洗礼。此外,官吏们都认为使出自其衙门的恫吓语言与行为互相协调起来的时机已经来临。呼兰的官吏(也就是于元月间宴请讷依先生和我本人的那个人)刚刚抛弃了其假面具,令人斩杀了一名完全是无辜的基督徒。

这名基督徒的职业是掌马匠,在一户被控告犯有抢劫罪的人家服役,当打手们出现以抓获其主人时,这个本来与此事毫无关系的工匠也于同时被捕,尽管他提出了抗议和他享有诚实正直的好名誉。大家很快就向官府告发说他是基督徒,他从此之后就注定要被处死了。在此情况下,审判则是既不公正又很草率。由于缺乏可以定罪的证人和证据,那里有的是刑具,所以只要从那些不幸的受害人那里得到一言半语出自严刑拷打的口供,便可以宣布说这一案件已得到了充分审判。

这样一来,周广录(Tchôou-Kouâng-Lou,这是该基督徒的名字)就被拷问了几次,他每次都要昏倒过去。为这种宣判提供证据的口供就被当场杜撰出来了,受害者于今年6月30日在呼兰被宣

判处斩。有人写信告诉我说,这次处死在人类面前是丑事,在上帝面前却是可贵的。因为忍受了这一切的人确实是为正义而受苦的。

在这次被官方处死事件之前的一个半月,某些同样严重和其特征非常明显的事件也出现在这位官吏(阿城的副教统)的府衙中了。由于该满族官吏无法忍受其麾下的军人自称是基督徒,因而非常气恼地发现其身旁的人接受奥拉尼(Aulagne)先生的洗礼而成为新教徒,在始终成为良民的同时而遵守上帝之教法。他首先令人抓获了在海关村和塔尔卡村中天主教徒中的6名。他们被指控为叛国,这些可怜的人声称他们不是有意地以其钱币来赞助建起宝塔的。

他们对于仇教者们的回答只会引起最残酷的严刑拷打。80棍便使受刑者的血肉之躯成碎片而横飞,对面部打40棍便可击碎其牙齿。受刑者的鲜血流成了河,而从那位副都统口中连珠炮式发出的最猥亵的谩骂声则使在场的人群被警告说,外国人和所有那些与他们有关的人从此之后都将受惩罚,前者将被视为一种恐怖行为的对象,而其他则被视为帝国事业的叛徒。

然而,我感到安慰的是现已获悉,尽管受到了棒打和威胁,他们于专横官吏面前仍然很坚定。但他们也声称自己准备听从官吏的话,唯有在有人希望迫使他们从事迷信活动或者是直接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情况下例外。

特别是其中之一黄堂。他当时年仅32岁,曾以面对刽子手时所表现出的忠贞不屈和坚定信仰而令人敬仰。我迫不急待地向您通报此人,因为他忍受的困难导致他获得了殉教的荣耀。今年6月14日,天堂的大门向耶稣——基督的这位战士的美好灵魂开放了。经过在一座令人毛骨悚然的囚室中度过8天之后,由于这名勇敢的基督徒的生命处于危险中,那位官吏对于其野蛮行为的后果

也并非是无所顾及，所以才允许将囚徒带到一个比较舒适的地点。因此，那个濒临死亡的人重新见到了其妻子与其年方 8 岁的独生子，他赢得时间而得以留下了一份使所有人都泪流满面的精神遗嘱。他说：“我在官吏面前没有讲很多的话，况且我也只能回答‘是’或‘不’。当他想迫使我执行某种会导致我叛教的事情时，我始终说‘不’。所以，无论你们去完成落在你们身上的什么事。尤其是我的儿子，你不要忘记我的遗言。因为我将去见上帝，你清楚地知道生命与天堂的幸福相比则不名分文。”

黄堂确实未曾用长篇言辞去回答官吏的问题。他始终是提出相同的抗议，在竹杖打得他遍体鳞伤和皮开肉绽的时候，其舌头仍是念诵他自两年以来牢记在心的祈祷经文。当官吏发现此人双唇微动时便怀疑这种事态。当他确信某种事实时，便陷入到一种如此之大的愤怒之中，以至于他命令重新痛打受刑者的面庞。在打了 40 棍之后，黄堂便再次进行祈祷。最后，他昏过去了。但我们的上帝很关心他那忠实的弟子，不允许他于其刽子手的手中断气。他在临终之前感到安慰的是最后一次接受了圣饼。

奥拉尼先生及时地获悉了这种情况，并且在听到刚刚发生的事情时便感动得泪流满面。他得以匆匆忙忙地跑到尊敬的受伤者面前并为他举行领圣体仪式。他写信告诉我说：“我从未见过更加动人肺腑的场面了。这名受洗仅两年的基督徒作为灵魂必然得救的人而逝世了。他的遗言对耶稣——基督充满了友爱，他经常重复说自己将诚心诚意地原谅其刽子手们。在场的人中没有一个人不对听到这种临终的声音而感到幸运，永远不会忘记为正义而死亡该是多么令人心满意足啊！”

当我看到，交由我放牧的羊群如此之大的一部分确实是成了我圣教敌人猖狂攻击的目标时，确实感到了极大的痛苦。但我的悲

痛却由于这名沉浸在胜利之中的英雄那荣耀的结局而减缓了。上帝无疑是希望再更多赋予满洲一位保护者,同时也为我们的新教徒们提供了某种坚定信心的表率。

黄堂是一个正直和诚实的人,他受到了所有人的敬重。当他一旦熟悉福音书的真谛之后,便会立即非常成功地和坚定不移地归化了基督教。上帝作为全村的第一人而选择了他,新受归化的人丝毫未忽视过向其他人布讲他每天都在虔诚地研究的教理。他虽然目不识丁,但归化活动中却具有魅力,上帝的恩宠往往都会使这种归化颇具说服力。正是通过他的斡旋,其大批邻居都受到了这种信仰的恩惠。他因此而感到欢欣鼓舞,心中牢记将其子培养为以口头进行传教卫道的人。在今年元月间,我欣喜若狂地聆听这个8岁的幼童向我深入发挥了他阐述的论据,他还补充说他曾向近邻中的那些崇拜偶像的大人们论述过这一切,也就是有关上帝存在的问题:神的完德——创世——罪孽——使以信成义者的赦罪——永久的惩奖等。总而言之,其统计表洋洋大观。我的小传道士还补充说,据他认为,任何人都无法驳倒他,因为他自己掌握了其真谛。我没有必要告诉您说,我赞同青年演说家的观点,羡慕这个儿童拥有这样一位父亲的幸福以及父亲对于拥有这样一个儿子的欣慰。这种场面便由对选择这位圣婴耶稣的朋友之鼓励而告结束。但他不希望在向我宣布以下事实之前离开我:即使把他的头砍下来,他也永远不会背教。

可怜的孩子!他当时根本未曾怀疑会如此快地出现使其父亲在受刑时公开承认宗教信仰的机会。祝愿他能够终生作为一名不辱殉教者名声的孤儿!

广东宗座代牧助理邵斯致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院长们的书简^①

1882年4月20日于广州

我刚刚收到了布鲁尼翁(Brugnon)神父的下述书简,它们已无需再作任何解释了。其中第一封书简没有标明时间,用铅笔书写。

致主教大人,基督的永福!

我被脱掉了衣服,落入到了2000只老虎的爪下,它们正准备置我于死地。我变成了基督徒的麦粒,上帝得到了赞扬……我的小教堂已被烧毁,我的基督徒们受到了抢劫,神台上的使者均已四散。有些人希望烧死我,其他人则希望把我投入江河中,还有些人希望砍掉我的头颅。我在人世间已经没有任何东西了,我的全身都成了一片鳞伤、一堆烂肉,我想到了骷髅地^②的第10站。我现在只有一种希望了:我要求这些如狼似虎的暴徒们在佛冈场上处决我,因为那里的一名小官吏可能会拯救我的性命。可怜的小教堂啊!我那些可爱的稚童们即将变成孤儿!如果我死去了,那就请告诉我的家庭、我的恩人以及我所有的教友们,我在最后时刻都在想念着他们,我在天堂将不会忘记他们……现在已有人拖拉我,这可能是最后的时刻了。请所有人都原谅吧!大人,也请您原谅我只为您做了很少一点事。

1882年神圣星期三于象冈

① 译自《传信年鉴》,1882年,第54卷。——译者。

② Calvaire,本指《圣经》中耶稣受难的地方。——译者。

大人：

我已经死过了，现在又复活了。……我到达了象冈，已经精疲力竭，皮开肉绽了，腰已被打断，由佛冈那个救了我性命的官吏陪同而来。啊！浑身赤裸地站在成千上万人的面前，这对我该是多大的痛苦啊！我的头发已被部分地连根拔掉了。我身上保留下来的一切都应归功于众人的慈悲。我再没有一文钱和一件衣袍了，没有任何东西了……

郑神父认为我已经成了殉教者，他刚刚到达本处以为我收尸，永茂行的小教堂已遭火烧，基督徒被抢劫得一无所有并落荒而逃，所有的房子都起火了。时至今日，仍有铜锣的响声在四处回荡。据说已有了座小教堂尚有待于被焚毁。有人想再次抓住我并杀死所有基督徒。那位官吏今天骑马并率领 200 多人来了，但我们的敌人是 2000 人！如果不来援兵的话，那么本县就不可能恢复平静……我已经既没有仪轨书，又没有盛圣油的容器和圣餐面饼盒，更没有正经了……我迫不急待地等着您的来访，现已无法向您写信了，因为我全身都感到痛苦，他们非常残酷地拷打了我，我的仆人雅各(Jacques)被当着我的面逮捕了，我不知道他后来的情况变得如何，大家都说他被处斩了……

1882 年 4 月 12 日于象冈

大人：

今天，我稍微好一些了。我发现我在永茂行的案件至此尚不会结束，打教的流言仍在继续，我的基督徒们都不敢出门。我勉强鼓足了自己仅有的很少一点余力，将向您报告我的不幸遭遇。

本月 13 日，我骑马从象冈经佛冈市场前往永茂行。忽然间有一名叫作温疯子(Wouongfontzé)的士兵集合起了 40 多个人进来

谩骂我并且挡住了我的去路(他对基督徒已经积怨甚重并总想惩罚他们)。正当我要回答时,却有人向我投来了石块,将我的马包围起来并迫使我下马。我由于无法摆脱他们,只好将马匹丢弃给他们,自己徒步而行地前往小教堂。

但很快又有人散布谣言说,我杀死了两个小孩并把他们作为喂我的马匹的饲料、我抢劫了一家店铺等。同一天夜晚,有九个人跑遍了该地区,敲击着铜锣并煽动俗众制造动乱。附近的基督徒们都成群结队地纷纷赶来,于夜间唤醒了我就请求我逃走。我没有附和他们而感到恐惧。然而,在天刚亮时,我便开始收拾过去就藏在基督徒们家中的那些行李。

在同月 14 日的中午左右,那些不信教的俗众在前面吹奏喇叭和打着旗帜,狂呼乱叫地冲来了。他们的人数共有 2000 之众,径直向小教堂扑来。温疯子是他们的带头人并且还煽动他们。刹那间,小教堂、儿童们的学校和神父们的住院均被拆毁和焚烧。这些人入侵了被他们抢劫一空的基督徒们的住宅,同时也强夺了我所拥有的一切。他们在找不到我的情况下,便准备纵火,恰在此时,我本人与我带领的那些人都被最终发现了。

正在此时,有近一打(12 个)真正是人间恶虎般的家伙扑向了我,揪扯我的头发和胡须,在非常粗暴地剥掉我的全部衣服后便在我全身烫伤多处。我费了很大周折才请求他们把裤子还给我。我被拴住头发悬挂了起来,接着从楼上逐层地被推搡到大街上,最后把我拖到了村口前以准备斩杀我。我浑身全是血渍和泥污,四肢都由于遭殴打而呈黑青色。他们在那里辩论是应该把我活活地烧死,还是应砍掉我的脑袋,大家最终决定还是采取这后一种方法。我已经被迫跪下,双臂被反剪背后,屠刀已经高高举起。正在此时,一名陌生人帮腔为我请求并极力要求将我带到佛冈曹市上去。我将在

那里经过一夜示众之后再被处死。

我立即便上路了,与其说是被拖着还不如说是我自己走。在跋涉完近五里(约二公里)的距离之后,我们到了孔孟楼(Konmoun-Lé ou)村,那里有共聚集了 400 多人的一个人群,男女儿童都有。他们也加入了这支队伍并且都索要我的人头。他们把我推向了一条河边,在那里脱掉了我的裤子,迫使我下跪,要求将我的头架在一条板凳上,又带来了断魂刀。我就这样在那里停留了一刻钟多一些的时间,以供众人作为笑柄。正在这生死之际,仍是同一个陌生人迫使他们将我的衣服还给我并把我带往了通向市曹的路上。我后来获悉,这个陌生人是一名仆从,他奉命放任人群烧毁小教堂、羞辱和拷打其中的传教士,但却必须设法救下这名传教士的性命。

经过再次行走五公里路之后,我便到达了佛冈市井,那里的人群扩大到 1000 多人,互相争夺拷打我的荣誉。此人打了我几个耳光子,揍了我几拳头;另外一个人利用我的刀,还有一个人使用了其棍棒,也有一个人把我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最后,他们又把我押解到一座塔的门口。当他们将我捆绑起来时,人群却在争论将我处死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的问题。在他们彼此仍在继续争论期间,当地的那名小官吏来了,他使我从这些人的手中摆脱出来并将我带到了官衙。

我的生命得救了,但得救的仅仅是生命。我的那小装饰物、衣服、小教堂、学校、住院等,甚至包括所有基督徒们的一切,其损失达到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当我看到自己在官署前置身于一种如此处境中时,我便想到了自己的灾难、已经过去的危险、我那些可怜的基督徒,想到了他们那与小教堂同时被焚毁的住宅、我那已被付之东流的七年辛劳,我便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所有人便与我同时痛哭了起来。那名官吏令其手下人为我洗净全身并借给我几

件衣服。次日，他将遍体鳞伤的我带回了象冈住院。16日，一文一武两名官吏前往当地，查验了所造成的损失并缉拿了四名罪犯。

我今天获知，接受了异教徒们对进行诬告的知州刚刚致信总督。早在去年的元月左右，这些人便决定烧毁我的那些小教堂，我致信知州要求他发布一道告示。他回答我说这是一种谎言和误传，其臣民不可能干出这些蠢事来。大约到12月左右，他们当发现我从广州带来许多物品时，听说我有许多钱以建筑两座小教堂，于是便决定再次抢劫教堂。我及时地获知了这一具体情况，而且还得以通知当地官吏，这项计划流产了，但它在稍后不久却还获得成功。

现在，我的小教堂已被毁，我的全部财产均遭抢劫，已经身无分文。但我还需要供养30多个人的生活，我们还有一座尚待竣工的小教堂，由于害怕大雨而必须迅速竣工覆顶。我的那些可怜的基督徒们都破产了，每天都催促我前去帮助他们。

当我想到了自己到达此地的七年以来，于此尚从未祸害过任何人，只会热爱和帮助所有人，此时便充满了痛苦。为什么那些异教徒们今天却想处斩我和毁灭我的事业呢？……

邵斯主教大人于这些书简之后又补写了下面几行文字：

我对于自己于两天前收到的这些书简的富有感情的文字再没有任何可补充的了，只是尊敬的布鲁尼翁神父充任了使徒的家庭教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因为天主的爱德而使他的灵魂为我们牺牲，我们也应该为教友兄弟们的利益而做出牺牲。”他尝尽了愚昧无知的苦楚和痛苦，而且还如同真正的圣师一样说：“殉教者的鲜血是基督教的种籽。”

中国满洲宗座代牧区的呼兰教案——一名传教士所遭受到的虐待^①

英国报刊已经发表并由法文报刊刚刚转载了一次暗杀事件的新闻,巴黎外方传教会的贡罗斯(Conraux)传教士成了其受害者。我们从犯罪现场获知了这一事件的细节,而且迫不急待地把它们公示于众。

呼兰城位于满洲的北部,地处黑龙江(阿穆尔河)省。它最早仅为一片古战场,完全由满族——鞑靼族人居住并由军事长官副都统管辖。自数年以来,汉族的移民潮一直向天朝北部的这些广袤地区迁移,而这些地区直到那时为止几乎无人居住;那里肥沃的土地足以维持大批移民的生活,而这些移民都是由于饥荒而被历年从北直隶、山东和附近其它省市驱向这里的。

这些汉族人远离其故乡,避开了由于受基督教的归化而必然会为自己招致并直至株连其家庭的成千种欺负。汉族人一般均表现得更为容易接受真谛,甚至准备采纳基督教。特别是在呼兰,汉族人口确实似乎准备颇有成果地接受福音的种籽了。这样一来,为了回答望教者们的愿望并促进向我圣教的发展过程,传教士们很久以来就热衷地希望在该城中定居并将此地作为他们的一个活动中心。

但就在中国中原本地,则必须重视地方当局,而这些官府普遍地对所有欧洲人都怀有仇视心情,特别是与传教士们作对。呼兰的官吏们在这方面也从来未使人感到过满意。1878年,讷依先生曾作过首次试验。这位传教士曾前往该城为其受仇教迫害的基督徒们伸张正义,但却遭到了当地的首席官吏中尉惠安的一场暴打和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54卷,1883年。——译者。

欺负。此人由于形势而希望由他本人亲自行使刽子手的职责。

在同一座城市内，又刚犯下了一桩谋杀案，袭击了另外一名传教士的人身。如同前一次谋杀一样，这次谋杀案也应该被记在地方官吏们的账上。我们下面就讲一下这一案件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在满洲宗座代牧杜伯勒主教阁下两年前于其辽阔代牧区的这部分地区从事的一次旅行中，这位高级教士得以发现该地区和特别是呼兰城居民的良好倾向。此外，由于尊敬的主教坚信官吏们向他极力卖弄的尊重与和蔼可亲的表现，所以他认为最终落实在该城立足计划的时间已经来临，正如那些条约所允许的那样。因此，传教区以其自己的名义购买了一片地盘，正准备在那里建起一座附设有传教士住院的简陋礼拜堂。

但这并不符合本地区的那位姓溥的首席武官的心愿。他试图促使传教士们放弃他们的计划。当他不能成功时，便想到采取一些有力措施。他下令逮捕两名出卖土地的人，因为第三位以隐藏起来的办法而得以逃脱。官吏将他们投入了监狱，以迫使他们退还从传教士们那里接受的钱币和撕毁合同；他威胁说在遇到拒绝的情况下将把这些人从他们尚保留的地盘中驱逐出去，让他们忍受各种虐待。

听到这一消息之后，传教士们便向呼兰派去了他们中的一位，也就是贡罗斯先生，以便处理这一案件并谋求两名被囚禁者的获释。当贡罗斯到达该城时，便落脚于恰恰座落在诉讼地盘中的一所房子中，该房子共由两小间组成，被用作新教徒孩子们的学校。

6月4日，贡罗斯先生与一名官吏建立了联系，该官吏在此期间确保了土地原主人的支持。副都统(Fou-tang-toung)说：“这些人拒绝表示他们的赞同，与被囚禁签订的契约变得无效了。”此外，官吏们也希望看一下这些最早买主的证书是否与保存在故主手中

的副本相吻合。传教士给官府送去了所索求的文件，它们被证明是互相吻合的。当那位官吏发现自己在此问题上被击败时，他为了欺骗人便假装是促使最早的领主放弃其要求。但他们知道应该坚持什么，极力避免同意这样做。

谈判又持续了数天。该官吏最终自我宣布无能为力，又鼓励各方上诉于一家高级法庭。这就是那位传教士已经做过的事，他仍在等待着对其上诉的答复。在这些谈判持续期间，出售人仍在遭受各种虐待。有人在衙门中策划了一场阴谋，尚有待我们根据一名传教士的这封书简而叙述其具体情节。

6月15日晚，大约6时许，当贡罗斯先生发现一群武装暴徒骂骂咧咧地冲向街头时，便从其房间中走了出来。我们的这位教友从这些人的灰色衣服上辨认出了他们是营勇。然而，他们却没有佩带标记，其首领也未佩戴顶子。这些狂徒们冲进了围栅并包围了该传教士栖身的那幢房子，他身边只有他那个正在准备晚餐的侍从。一名衣着讲究的人出现在门口，又向询问他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的贡罗斯先生致意。甚至就在来访者尚无时间回答他之前，营勇们便破门和破窗而入地登堂入室，然后便拳击棒打地扑向了那名可怜的传教士。他们推搡他并将他逼向一件用作祭坛的家具之前。在这件家具之上放着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由于害怕这些不速之客夺取那件特别令人害怕的武器并利用手枪来袭击他，贡罗斯先生希望朝天放枪。狂徒们听到了枪声，于是便抓住其双手，向各个方面推搡他。正在这种激烈的搏斗中，枪声一响，暴徒之一被击中。

这些暴徒们的狂怒于是便丝毫没有节制了。他们倍加用力地棒打，用从贡罗斯手中夺取的手枪向他射击。当这名传教士失去知觉时，众人便将一根绳索拴在其脖颈上，再把他一直拖到院子中，

捆住了其双手和双脚,那些残忍的虐待者们仍继续棒打已经躺在地上的受害人。最后,他们拉来一辆车子,传教士被从脖颈和双脚处绑在车尾部。在该车上已经拉上了学校的教师黄子汉(Hoang-tse-han)了,此人是在听到这一片嘈杂声之后就从其教室中走出出来,于是便分但了对神父的虐待(请参看木版画)。

于是便开始了受害者的整个痛苦过程,受害者的鲜血浸湿了道路。刽子手们对自己抓获的俘虏感到得意洋洋,于是便簇拥着拉受害者的车子取道河流的方向,并且还进入了呼兰的主要街道。这条街道长约近一法里。官衙的人员和士兵们直到现在,甚至是直到事件的结束,都是这幕令人惨不忍睹的悲剧的唯一肇事者。这些人不停地呼叫:“淹死他们!淹死他们!”贡罗斯先生恰于此时恢复了知觉,发现其受伤的腿上流了大量的血。仅仅到了翌日,大家才得以知道其伤势的严重程度,其左腿已被一粒子弹射穿。我们的教友无法准确地说明他是在什么时候失去知觉的。

然而,那辆车在沉静而又恐怖的人群中缓慢地前进,每个兵勇都轮流搨贡罗斯先生耳光子并向他脸上吐唾沫。如果大家遇到了一名旗人士兵^①,那么车子就要停下来,他就会受请参加这场可怕的悲剧,耳光子、拳打脚踢、吐唾沫之战,所有这一切都又更剧烈地重新开始表演一番。

在士兵们如此谋杀一名传教士,而且还是一名欧洲人时,城市的最高当局在干什么呢?无论是其官吏还是其属下中的任何人都未出面阻止一场罪行的暴发。

来到河边,他们停留了一会儿。但一名煽动闹事者向车夫作了一个手势以取道另一条路行。贡罗斯先生恢复知觉后,发现自己又

^① 指满族士兵。

从被淹死的处境中摆脱出来了,认为这些人要把他带到刑场以将他砍头。但大大出乎他的预料,大家将他押往位于该城另一端的官署。在这次漫长的行进中,时刻都伴以同样的凌辱和痛苦。

当这支凄凉的队伍进入衙门时,天已经逐渐变黑了。在城内各住宅区都吹响了海螺号,以集合士兵们。兵勇们成群结队地前来包围官衙以及矗立于其旁边的首席官吏的府宅。他们害怕或者是希望已分散在城内的很少的几名新教徒们发生一次骚乱。天啊!这些被吓得失魂落魄的人更多地则是想到了逃亡或躲藏起来。

在衙门的院落中,甚至是在副都统的大堂上,我们的两位尊敬的受害者始终被绑在小车子上,一直到午夜,始终毫无防御地忍受那些发疯般的大兵的所有粗暴虐待。

贡罗斯先生在进入大堂时,在其凶手们之间发现并且正确地辨认出了那位戴有蓝顶子的官吏。他叫作乌尔金额,一般被俗称之为乌白毛,因为其头发已经呈灰白色了。他抽着烟斗,满意地注视着其阴谋活动的结果。他现在已经光着头。贡罗斯先生稍后便发现了其他一些戴有顶子的官吏们,但他无法辨认出他们来。

在这种长时间的垂死挣扎之际,该传教士忍受了能够想象出的一切痛苦。

每件用具在刽子手的手中都变成了刑具:棍棒、扇子、烟斗以及车板都使受伤者遍体鳞伤。其刽子手们将手指插入受害人的双眼中以挖掉其眼球。肿胀和变黑青的眼睑在很长时间内都留下了伤痕。其脚、腿、臂、左肩现在仍遍是黄色和黑色的宽大瘀斑痕。

他的鼻子、额头和头颅都由于多处受伤而血流不止。其面庞很快就被他们抛向其眼部和口部的吐痰、鲜血、灰土与烟灰所覆盖。

当时犯下了在人世间可能会出现的所有耻辱罪行。虽然我的笔拒绝对此进行描述和记录,他始终在那辆令人望而生畏的车子

上被绑住了脖颈和双脚，早就被剥掉了其衣服。在那些刽子手中，一部分人残酷无情地痛打他。由于残酷到了穷奢极欲的程度，所以他们特别是用力拷打其左肩和腿上那已经绽开的伤口；其他人却带着已着火的烟斗前来并烫他的腹部。极度干渴快要吞噬受害者了，于是便要求给一点水，他立即就被人撒了一脸尿。众暴徒拔掉了他的头发。其他人却用尽力气拉拽那根将其脖子绑在小车上的绳索，以便勒死他等等。贡罗斯先生在这场已持续了六个时辰的凄凉的悲剧期间，不知道多少次失去知觉。

我于此便要结束对这场一直持续到午夜之后的恐怖行为的描述了。但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当众暴徒在自己的大堂上（也可以说是在他的眼皮下）拷打一名天主教传教士时，溥副都统到底在干什么？

贡罗斯先生在这次漫长的垂死挣扎期间没有发出过一声怨言。据有人告诉我说，仅有一次从其喉咙中发出了一声喊叫，当时他感到了其眼睛在欲夺其眼珠的刽子手的手指压力下即将进出眼眶。

当贡罗斯先生恢复知觉时，他便感谢我主能使他为上帝的名义而受苦，祈祷上帝饶恕其刽子手们，将他的受刑奉献给了对呼兰居民的拯救。

当贡罗斯及其学校的先生黄子汉被卸下小车时，天时已过子夜。我们的这位由两个男子抬着的尊敬的教友被押到了一个由八名分别戴着白顶子和蓝顶子的官吏组成的法庭面前。

那位著名的官吏乌尔金额主持了由杀人凶手组成的这个法庭。贡罗斯先生双手始终被倒剪背后，现在被置于一块板凳上，由两名仆役扶着他。其口中充满了污血、沙土和烟灰，再不能讲一句话了。于是便有人将水捧到其嘴唇前。他嗽过口之后便可以対向

他提出的大量问题回答只言片语了。他再也不能回忆起这次所谓审讯中的各种事件了,审问一直持续到黎明。在其刽子手们以一连串问题逼问他时,他多次失去知觉。那些人敷衍了事检查了一下他的伤口,又解开其双手以让他签署一件声称这是对其口供的忠实摘要的文件。当旭日东升时,他又被抛弃在一辆小车上。

一名骑马的官吏开道,此官吏始终是著名乌尔金额。一些士兵陪同他。贡罗斯就这样又重新被解往昨天晚上发生袭击的地点。但这间凄惨的陋室中的一切都被砸了个稀巴烂,那里从此既无门扇又无窗户了。有一个异教徒家庭非常希望接待我们尊敬的朋友。愿上帝赐予该家庭受归化和获得拯救的恩宠吧!

正如我已经讲过的那样,呼兰人民对我们远不是仇视的,而是希望我们在那里重新出现。许多不信基督的人都在贡罗斯先生被释放之后前来拜访他,向他表达了这样的谋杀所激起他们的恐惧情绪。这场流血的悲剧是由官吏及其营勇们造成的。唯有他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华北先驱报》中的一封书简最近声称,贡罗斯先生目前正处于一种令人相当满意的状态,颇有希望救活他。

该通讯记者写道:“这位传教士必须具有一种很坚实的体质,才能在遭受了如此虐待之后活下来。他需要忍受的凌辱比我已经叙述的那些更为令人恐怖,甚至有一些是大家无法描述的……大家必然会对这一案件作出强烈反应,因为现已变得根本不可能在中国内地生活。官吏们只要向遍布该省的兵痞们表示出任何一点微不足道的鼓舞,就足以使所有欧洲人的性命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从此意义上来说,这一案件是幸运的,在攻击贡罗斯先生时出现的人是一名戴铜顶子的小官吏,或者说是一名士兵。这就非常清楚地证明,牵涉进这一案件中的是一些官方人物,而不是强盗

.....”

“至于在满洲的传教士祁类斯(Raguit)先生,他曾致信于杜伯勒先生,后者是由于一场痛苦的疾病而被滞留于远离传教区的地方。”

“请你们不必对我们尊敬的贡罗斯先生的命运表示担忧了。他那需要较长时间才能痊愈的唯一伤口是腿伤,系由一种火器致伤。我使用了自己很少的一点流动医院的救护知识,以清洗和治疗这种伤口。唉!我几乎缺乏一切东西:纱布、药品和器械.....”

我们最后将发表贡罗斯先生得以亲自写给其尊敬主教的一封信简中的某些摘录片断,这封信简是由杜伯勒主教阁下非常友好地转交给我的。我们只能是带着一种真实的感情来阅读其细节,那位慷慨的传教士针对他在遭受凌辱和拷打中受到鼓励的感情问题而提供了这些细节。

尊敬的大人:

我将向您写两行文字以使您对我的状况放心。我的伤口正处在良好的痊愈之中。我没有发烧,而且睡眠良好。当大家于此处的巴彦苏苏获悉了已发生的情况时,激起了非常大的感情波动。全城都被包围起来了,大家都害怕基督徒们发动一次造反。此外,有风声传播说,将军已经向祁类斯和比法尔(Biffard)先生发出了传票。

尊敬的大人,在我一直到达呼兰河的长途出行中,我的确是想到了您。我想象着当您获知我死亡时所感到的痛苦。

唉!我不值得去死。但我坚信自己无法逃脱这种命运,我是非常幸福的。

我整天都处于兴高采烈之中,购地的案件可能会以两厢情愿的和解方式解决。我于6月12日发愿,将住院、祈祷室和整个教区

都奉献给了耶稣的圣心。经过一次对这颗令人崇拜的心举行了九日祈祷之后,一切都成功了,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于6点钟时完成了自己的日课经,即将在等待晚饭时前去诵读我的大串珠经(玫瑰经)。我打算与祁类斯先生分享晚餐,他自两天以前便赶来与我会合,恰逢这些可怜虫们突然间闯入了。此时此刻,我坦率地承认自己畏惧死亡。我也害怕再无时间写一份告解文件了,我正是为此而试图将手枪的子弹退出枪膛,我更害怕他们会用这支手枪来袭击我。一旦上了小车,我就为小黄的死亡作准备,于是便最适时不过地出现在他面前。我确实心境很平静,发现他们并未使我遭受很大的痛苦。我无法对于他们使所受的棍棒之苦和向我面部吐满的痰发出怨言。

疼痛仅仅使我发出了两声惨叫,这就是在公堂上当他们试图挖去我的双眼时和当这些不知羞耻的家伙们剥掉我的衣服时。

我很快将再给您写信,现在已过分精疲力竭了。我的左手仍然已麻木得失去了知觉,细绳勒进手腕的肌肉中了。

大人,请为我祝福吧!让我为虔诚的灵魂和传信善人进行祈祷吧!

来自教廷的传教士贡罗斯

中国云南宗座代牧、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古分类主教致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书简^①

1883年6月13日于云南府

我有幸于去年末前后向您作过报告^②,当时并未预测到刚不

^① 译自《传信年鉴》,1884年,第56卷。——译者。

^② 载《传信年鉴》,1883年7月号。

久打击了我们的那次灾难。事实上,自相当长的时间以来,我们都享受到了一种足以能够传播福音书和发展我们事业所需要的平静形势。受归化的人数很多,而且他们还显得很坚定可靠。这些贫穷的异教徒们经常充满信任地来看望我们,该地区在不只一处地受到了动摇。我们的新教徒们确实是甚为勤奋地学习教义,他们大部分人都在缓慢地发生变化,可是最终都表现出了良好的愿望,其余者则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了。现在上帝更乐意以巨大的磨难来考验我们。在该省的西部,异教徒们都揭杆而起地反对我们,公众舆论也并为我们显示出所有官吏们都是无辜的。这场令人心惊胆颤的仇教于一时间毁灭了,或者几乎可以说是消灭了我们最美好的六个基督教传教区,从而到处都使新教徒们的虔诚锐减。世俗人恐怖行为的第一位受害者张若望(Terrasse)先生被处死在浪穹县领土的长营(Tchang-Yn)。在一场如此极端严重的教案中,出于对真相的尊重,我将最大的可能搜寻目击者们的证词。

大约到了去年12月末,我在一次传教巡视中到达了长营。当地的世俗人在这个时代就已经为反对我们而发出了可怕的威胁,他们甚至作出了一次小小的示威以进行试探。他们全副武装地出现在附近的市场上。但当他们发现当时由于巡视而聚集起来的基督徒们在白天都泰然自若而在夜间又巡更时,他们便不敢冒险发动一次进攻了,这项计划便被推迟了。我在该地区居住期间,除了几次警告(而且也是正确的)之外,一切都显得很平静。12月26日,我离开了长营。张若望先生一直陪同我,以巡视始终是处于浪穹县辖区内的其它几个基督站口。

正如他曾经许诺的那样,该传教士为了过复活节而返回到长营。他必须在那里为大批望教者举行洗礼,这些人在数月间已接受了传道员们的教诲。

3月24日,某些间谍借口出售建筑木材而前来当地勘察,同时也是为了核实我们的这位教友是否根本就未曾离开过那里。他们在诸多事项中特别是询问他是否有钱、他是否以始终都付现款等等。大家在把他们送走时告诉说,一旦成交之后,便会毫不犹豫地付款。在3月27~28日夜间,可能是在3时许,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人包围了张若望与其手下的7个人(传道员或仆人)正在休息的房子。根据围攻者们发出的叫喊声、在刹那间就砸碎了房顶并填满了院子的一阵冰雹、石块来看,那些证人认为袭击者应该是有300多人。基督徒们被惊醒了,他们都惊慌失措,大家完全可以猜测到这种状况。他们既无武器,人数又太少,故而无法自卫,许多人都在设法逃亡,但他们立即就被束手就擒了,而且当场被处死。

张若望先生于此时出现了,他希望平息骚乱。暴徒们扑向了他。一部分人设法剥掉他的衣服;其他人则用刀乱砍其头部,或刺其左侧,或劈其颈部。最后,受害者于其腹部中一矛枪后就倒下了。其随从中的所有人都与他起遇难了。接着,便轮到了仅有的两位得以生还的目击者。这是两名均为60多岁的寡妇,她们不是本地人而是前来向新女教徒们布教的。杀人凶手们擒获了她们并更残酷地棒打她们,一直到她们遭到17棍而昏厥为止。众暴徒认为她们已经死亡,便将其身上剥了个净光并把她们拖到了张若望先生的尸体旁边。时隔不久,当她们从第一次昏迷中苏醒过来后,这些不幸的女子们便听到了杀人凶手们吵吵嚷嚷着要纵火焚尸。这些人果然把她们用稻草覆盖起来,然后便去寻找柴薪去了。如若她们作出丝毫一点尚有气息的表示,那就定会招来必死无疑的灾祸。如果就这样被活活烧死,那该是多么痛苦啊!她们的处境实在是岌岌可危。

但正当众人去寻找火种的时候,凶手们发出了一阵阵的欢呼。

他们发现了一名新的受害者。这是一名怀孕八个月的少妇。他们冲向了她们并向她们勒索钱财。其中之一尚未等到回答便使用其大菜刀砍入了其胸膛，一刀同时杀死了婴儿与母亲。

这些凶神恶煞般的家伙们于是便呼叫：“我们先去分配战利品，然后再把她们一并焚尸灭迹。”

正当他们讨论最好的主意时，我们的两名女基督徒便成功地未被发觉地逃走了。她们于此时又听到这些强盗们正在协商将张若望的马匹奉献给当地的官吏叶滋凌(Yè-Chou-Ling)。我们的两位寡妇在数百步远的地方对自己的命运感到非常庆幸，她们遇到了一名慈善的异教徒。他跑到了她们的住处，为她们每个人带来一套衣服并建议她们尽快和不动声色地离开。

这就是学校的两名女教师断言曾经亲眼目睹和亲耳倾听到的情况。她们的证词是不容置疑的。

至于几乎就是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传教士罗尼设(Le Guilcher)先生，他于3月21日从大理府致信我说：

本月14日，在两名分别自他们各自的上司大理府和浪穹县派来的官吏的陪同下，我打开了张若望先生的棺木，他已经死去48天了。其尸体陈殓了一个星期还未下葬。豺狼和野猪都尊重而未敢触动他，但人类却使他处于一种可怜的状态。下面就是让我看到的一幅悲惨景象：其眼睛都被挖去，头颅被砍下来之后又被倒安上，胸膛已经剖开并且几乎成为空腔，心和肝都被刽子手们吃掉了。这具遭到令人恐惧地残伤的尸体被完全裸露着抛弃了，被投进一个很短的棺木之中。他们确实还受到了其它凌辱，但我却无法找到其它词句来描述这一切。在重新盖好棺木之后，我脱掉了自己的一件衣服以遮盖这些凄惨的遗骸，一直到允许我们对他们进行完全适宜的安葬那一天为止。

在长营及其郊区进行大屠杀之后,我们的敌人又扑向了地区的基督教会口。这样一来,小河东、麦地、干庄、孟云、漾濞都饱受蹂躏、抢劫和破坏。我们在各地的小教堂和房产都被焚烧或遭拆毁。抢劫是全面的,被杀害的人数很多。我们已经知道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了,虽然官吏们只承认有 12 名。到了这个时候,所有人都逃亡了。但如果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以恢复和平,那就会很快地平静下来,每个人都不用再惴惴不安地回家了^①。

特内多斯主教和云南宗座代牧古分类

中国教案的综合报道^②

广东省尊敬的助理主教邵斯大人通过自 9 月 13 日的一封电报而报告说,他的那些小教堂都被拆毁了,共有 6000 多名基督徒处于无处栖身的境地。此后的一些书简都包括有关这一灾难性事件最早的具体细节。我们迫不及待发表它们,深知来自远东的所有新闻恰好都是我们的读者们完全有道理地期待的内容。他们非常正确地关注我们的那些入华传教士们的命运。我们还应该补充说明,直到现在为止,尽管出现了那些无法挽回的战争灾难,但传教士们的命运却都受到了中国人的尊重。

卡普斯的主教、广东助理主教邵斯致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的长上和院长们的书简

我心中充满痛苦地向您报告远东的最新事件给我们造成的处

① 古分类主教阁下最近期的一封书简向我们报告说,他不再需要上诉北京以谋求公正了。官吏们赔偿了基督徒们的损失并答应他们将保护主教。

② 译自《传信年鉴》,1885 年,第 57 卷。

境。在法国与中国的谈判决裂之后，法国人接受总督的命令撤离该省。我们希望能不受这项措施的约束。大人一项新命令使等待我们的命运再也无法令人怀疑了。我们必须在48小时以内离开我们的设施，官吏们负责为我们完整无损地保护这些机构。

这一天是8月27日。我正在沙面以同法国领事讨论形势的严重程度，当时收到了留在传教区中的教友们给我送来的这封短信：“大批人入侵了我们的住院，应该如何办？”

我立即回答他们说：“在遇到危险的情况下，前来沙面，我将报告当局。”

就在同时，英国领事（法国领事很快便赶赴其府上了）师克勤（Sherxer）先生派出了一只小艇和一批水兵，以前去保护传教士们的撤退。

我处于一种极大的不安之中，特别是由于我未在那里以分担我的教友们的命运。

最后，经过两个小时的等待之后，我又收到了这样一封新的短笺：“骚动已被平息，住宅已经恢复自由，再没有危险了。”

其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当我们的教友们正在从事其日常工作时，大约于上午9点钟左右，一支由仅穿着一条普通裤子的平民组成的队伍突然间闯进了大教堂的堂前广场，入侵了教堂并登上了塔楼，他们在做所有这些事时都带着一种很不友好的神情。然而，由于传教士们的忍耐力和克制态度，估计大约为500~600人的这支队伍在开始时仅通过花园和孤儿院之间作好奇性的散步。

那名负责保护传教区的中国军官被要求把这些不速之客轰出去，但以其30名士兵却无力将人群驱赶出去。他本人从一开始就拒绝帮助我们，这或是出于威慑，或是由于其它原因。仅仅当他们发现群氓队伍每时每刻都在猛增时，才通知了最近的驻兵哨所。随

着一支由数十人全副武装的援兵的到达,他才成功地将这批人赶出了教堂。从开始动乱起,人群中又加入了一大批攀登上了我们内院那高大围墙上的工匠。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该城中的官吏、道台和知府才来到我们传教区,由尽可能少的一支侍从陪同。他们命令我们在 24 小时内离开该城。这一时限一过,他们就不能再对我们的安全负责了。对于我们的家具与房子,他们许诺负责妥善保护。

根据总督的命令和主要官吏们的指示,我们现在已不可能再留在这里了。我们必须听任自己的不幸命运。次日,也就是 8 月 28 日的圣—奥古斯丁节,我们告别了我们那漂亮的教堂和我们那已经变旧的房子,把它们交付给我们那些朋友们来保护,他们要比中国士兵更加可靠一些……

我们的天主教小教堂和会口几乎完全被仇教之风吹得无踪影了。我们共有 3000 多名不幸的新教徒逃往香港,余者则逃到澳门。据说有数目很大的一批人都被异教徒们扣留下来了,这些异教徒们希望在抢劫和痛打他们之后能迫使他们放弃其信仰。每天都会给我们造成新受害者,我们无法来安慰如此之多的痛苦。

在我们离开广州之后,那位凶神恶煞般的两广总督发表了一项粗野的声明,向所有中国人都悬赏求获一名法国官吏和一名士兵的人头。为了蛊惑这些很凶狠的民众,再也不需要做更多的事了,他们很早以来就已经被交州(Tong king)事件所激怒。由于很少有能赚到总督之钱的便利条件,他的全部愤怒都已经转移到我们的基督徒身上,因为他们早在战争之前就已经被告发与“洋鬼子”相勾结。

在广州本地,现在连一名基督徒也没有剩下,那些曾居住在我

们房地产中与城内的基督徒们都被迫放弃了他们的住宅,受到了街坊头目、邻居和强盗们的骚扰。大部分人甚至在我们之前就已经搬迁,允许他们带走自己所拥有的很少一点东西,那时则比较容易找到在其它地方定居的手段。在这片空旷之地的中央,至今还矗立着我们那用花岗岩砌成的教堂,由士兵们把守并被世俗当局查封。我们的女孤儿院原与我们的住院有一墙之隔,已遭人群抢劫。我们的住院已在夜间被焚烧。

在靠近东门一带,也就是在距城市有 20 分钟行程的地方,新修的墓地小教堂已经连同基督村同时被毁坏了。原法国公使的妻子 N 夫人的墓葬已遭盗掘,其沉重的带铅棺椁已被挖掘了出来,骸骨抛扬在地面上。法国兵营上部矗立的巨大天使像已被推倒并被砸成碎片,最后被以金属的价格出售给铸造匠了。它共值 18000 法郎。

直到目前为止,东部和西部尚未遭到灾难,但总督那道查封全省所有小教堂的命令不会也产生同样的效果吗?我希望这道命令只在广州附近地区被执行。我获悉位于内地的意大利神父们的传教区也经受了同样的考验,他们的小教堂已被关闭。但随着离省府越远,民众的群情激荡之程度也就越小。我们正是应该将距中心地区较远的小教堂能保存下来的原因归功于此,如果说在战后尚保留下了一些小教堂的话。

这就是现时的恐怖局面。我们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看到了自己最优秀的基督徒们都死去了,而又无法帮助他们。唯有一种迅速的和强有力的行动才可能吓退我们的敌人。

广东宗座代牧主教邵斯

波勒米的主教、川西宗座代牧洪广化致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院长上和院长们的书简^①

许多灾难刚刚落到我的代牧区并开始了一系列的灾难,其结果很可能还要使人等待很久。在中国,这种灾难比在其它地方会更经常地降临。至少是消除这些灾难的妙方良药,在一般情况下,只能以一种令人失望的缓慢程度所使用。下面就是其具体情况。

8月4日,一种不祥的流言突然间在乐至县城传播开了。有人到处散布说异教徒们将策划一次令人不寒而栗的阴谋,以反对当地的新教徒,同时又威胁说要把他们全消灭掉。当时便立即就有几名基督徒前往衙门去通禀文武官吏们。这些官吏们回答说,大家错误地逃散了,再不会有严密策划反对基督徒的阴谋了;此外,即使出现了某种事态,他们也要负责维持良好秩序。翌日,也就是该月的5日,谣言又增多了,几乎变成了全面的恐慌。某些基督徒立即奔跑到了官衙。这一次,我们的官吏们都生气得大发雷霆,张牙舞爪地威胁他们,谩骂基督徒们派来的代表并且斥责着把他们驱逐了出去,声称没有任何可害怕的地方。但在6日,有一群熙熙攘攘的人冲向了城市,他们挤满了四座城门。成千上万的阴谋者们均由县城的文人们率领。在他们进入该城之后,文人们便前往一座塔中并在那里向他们的同事们发出邀请。这些人跑到了底层,他们在与其他人协商之后,便决定抢劫和拆毁我们的祈祷室,同时屠杀正在那里的传道员。这名传道员是一个精力充沛和很能干的人,大家曾利用他而归化了数千名异教徒。

这些文人们决定摧毁这一切。他们从塔中奔了出来,发出了攻

^① 译自《传信年鉴》,1885年,第57卷。——译者。

击我们的祈祷室及其周围房舍的呼喊声。阴谋分子的乌合之众追随他们行动。立即便有三四千名贪婪于抢劫的狂徒冲向了我们的教堂,掠夺了落入他们手下的一切东西并迫不急待地将教堂摧毁。与教堂为邻的传道员住宅同样也遭抢劫和被捣毁。那名不幸的传道员被令人恐怖地杀害了,浑身一共被砍 100 多刀。他在咽气之前曾两次半欠起身来,试图将双手揖合于胸前并悲怆地呼叫:

“我的上帝!感谢您让我在这块由我自己建造的圣地作为殉教者而牺牲!我的上帝,饶恕我所有的罪恶吧!我将把灵魂归还到您的手中!”

他刚刚讲完这几句娓娓动听的美好言辞,便再次倒在地上并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我们的祈祷室及其附近的所有房间都被彻底摧毁了,现在于地基上只剩下地板了。那些阴谋者们抢劫了一切和把一切都席卷而去。

我们城市的那些大官吏们都对这一事件感到震惊。但他们对我们的感情是非常暧昧的。他们猜想是在法国传教士与我们驻扎在交州的军队之间有秘密勾结。那些怀有恶意的报刊更使事态恶化了。大家都热衷于虚构猜想,从而出现了使我们陷入严重不安的尴尬处境。

愿上帝和庄严的圣母玛利亚怜悯我们并前来帮助我们!……

波勒米主教和四川宗座代牧洪广化

中国交州传教区的综合报道^①

我们即将在这一总标题之下发表几封书简的摘录,它们或是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 57 卷,1885 年 3 月。

从中国内地,或是从交州传到我们这里来的。这篇简单的摘要本身就包括有向我们的大施舍家们发出的最迫切呼吁。如果说那里的人员至今仍受到尊重的话,那么那些小教堂、学校、传教士们的住院则已经被完全捣毁了,那些被剥夺了一切和遭到放逐的基督徒们都在寻求援助。我们希望一些慷慨的施舍能帮助我们很快至少是部分地补偿这些不幸的受难人。

浙江宗座代牧赵保禄致巴黎外方传教会总会长菲亚特(Fiat)的书简

这封书简巧妙地总结了我们在华传教士们的处境以及官吏们诡计多端的策略。

人类的手段已经几乎被用尽了,流言蜚语和恫吓威胁日益骤增。唯有官吏们方能制止这种趋势。甚至不只是在一种观点上,而恰恰正是他们的任务,尤其是自北京朝廷颁布了一道圣旨之后更为如此,该诏书命令官吏们保证所有欧洲人的安全,其中就包括法国人,如正置身于中国内地与生活于和平之中的领事、官员或传教士们。然而,这道圣旨并未被我们浙江的官吏们认真对待。他们以大量借口极力歪曲其中的条款。为了驱逐我们,他们中甚至有人声称我们没有任何权力享受由皇帝诏书确认的保护。

他们声称:“这种保护仅仅赐予那些喜欢平静生活的人。然而,在你们的住院中,你们私藏大炮、兵器、战争辎重、间谍等。很明显,你们的态度是不大爱息事宁人的。因此,你们不能够援引皇帝诏书为据而要求保护。”

我们徒劳无益地请求他们亲自去参观我们的住宅。他们却极力地推辞,其恶意已经昭然若揭,暴露无遗。

其他人相反却带着一种极大同情的表示而与我们攀谈。他们

对于把我们驱逐于国门之外确实感到很伤心。这些人知道我们都是些安分守己的人，置身于政治事务之外。他们称赞我们的慈善事业，夸奖我们的意图，颂扬我们的功德和我们的机构。无论如何，他们还是请我们离开。

“为什么呢？”我们斗胆发问。

“唉！尽管我们怀有良好愿望，但我们却无法更长时间地保护你们。”

“为什么要保护我们呢？我们到底会面临什么样的危险呢？”

“什么！你们还不知道吗？你们即将被屠杀，你们的设施即将被洗劫一空和捣毁。民众和士兵们都被鼓动起来反对你们，大批重大阴谋正在威胁着你们。我们根本无法制止这一切。我们只是出于友谊和为了你们的利益而警告你们的。稍后不久，你们将会返回来。在等待期间，我们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保护你们的设施。”

“请原谅！目前尚没有任何因素促使我们这样做。很久以来，我们就首先否认危险会像你们声称的那样严重，它很可能只存在于你们的想象之中。那些平民百姓们确实非常同情我们，至少是基本如此。因为我们不应该谈论那些抢劫犯、大烟鬼、小偷。他们由于各种原因而希望撵走我们，其中一部分人是出于受抢劫之欲望的诱惑，其他人则是为了满足发泄其积怨和仇恨。但如若平民百姓中怀有良好愿望的那部分人不会间接地受煽动而反对我们的话，那就永远不会最终导致暴力行为。异教徒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在由战争引起的灾难性流言的气氛中，我们的存在使他们更加放心无虑了。兵勇们的情况也如此。当他们患病时，他们也要求其长官们准许把我带到他们的诊所，或者是在修女院中让我治疗。当一名传教士与他们交谈时，他们便会引以为荣并且会非常正确地指出：‘这不是一个如同那些战争贩子们一样的法国人。’因此，任

何人都不会催促我们这些法国人，他们让我们保持了安静。”

“其次，大家甚至可以假设认为，危险正如你们断言的那样迫在眉睫。我们不承认你们对于防止这一切会无能为力。你们有千种手段可供选择，其中的一种手段定会预防这样的危险和扼杀之。民众们畏惧你们的权威和尊重你们的命令，尤其是当这些命令附有严厉惩罚的威胁时更为如此。因此，只要设法颁布一道诏书就会保护我们。其他的官吏们在别的地方也曾如此做过努力并获得了圆满成功。你们为什么不采取同样的措施呢？你们拒绝这样做，你们在坚信自己的无能为力和良好愿望的同时却希望我们放弃自己的岗位。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义务就是留在这里，你们的义务是于此有效地保护我们。你们应对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人身、事业和设施中的所有灾难负责，大家迟早都将会找你们算帐。”

这些勇敢的人回答我们说：“不！不！我们的义务是提醒警告你们。我们已经这样做了。现在，我们已经解除了责任。对于你们来说，如果发生了某种灾难，那也算活该倒霉了。老百姓不好，士兵更坏。请好自为之吧！”

这就是我们目前在正与官吏们谈判中所持主张的基本情况。他们的恶意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地迫使我们离去。为了这样做而又不影响未来，他们或者是借口我们的政治行径使我们失去了皇帝诏书赐予的保护权，或者是借口他们根本无能力使我们享受到这种权力的优惠……

1884年10月23日于前所

冲击我们的狂风仍在继续肆虐。我们的基督徒正处于一种可怕的焦虑之中。他们把我们从小前所、舟山和杭州的设施中驱逐了出来。我们的修士和修女们到处都勇敢地捍卫他们的阵地，为

了不放弃委托给他们负责的事业而冒着很多的危险。他们仅仅是被迫离开其最后蔽身地,以便不以一种过分激烈的抵抗而招致更严厉的制裁和灾难,后者使基督徒们也被笼罩在我们的灾难中了。

董增德(Procacci)先生被迫以一种更为悲剧性的方式离开。他正处在温州县内,他7年以来一直在那里传播福音。

温州是一个位于浙江省南部的海港,紧靠福建省。因此,它距这次中法之战的战场较近。很久以来,便在街头巷尾流传着非常凶险的谣言。有人在我们住院的墙壁上,甚至几乎是到处都张贴了为煽动民情的揭贴。这些揭贴的口气极端粗暴。

这些传单之一指定8月31日星期天为火烧住院和杀死于那里遇到的所有人的日子。每个人都应该携带一把大砍刀并于中午前后赶到那里集合。其危险变得非常严峻了,为了避免进一步激化这种危险和使基督徒们陷于一种几乎是难以逃脱的灾难之中,董增德先生禁止他们于8月31日前来听弥撒。大家在5点钟时举行了弥撒。在大街上,一切都显得很平静,传教士们认为仅仅是又受到了一次恫吓而已。但有几个面带疑容的人都头缠饰带,开始在附近游荡并且前来坐在我们的住宅前面。

人群逐渐扩大了,他们最终占据了整条街道,危险迫在眉睫,董增德先生随身携带圣体柜的钥匙,时刻准备在一旦出现攻击的征兆时就毁掉圣餐物。突然间,喊声骤起,混乱进一步加剧了。我们的同道教友便冲向小教堂以拯救圣体并准备为殉教而死。但一位使者向他报告说,那位官吏很快即将到达,这是一次出乎预料的造访。这次拜访非常友好,其目的是为了拯救董增德先生,他警告民众说这名官吏参观了我们的住宅,亲眼视察了所有的角落和隐蔽处,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因而所有人都应该去从事他自己应做的日常工作,不必介意恶徒们散布的反对宗教和欺骗民众的谣言。

官吏的这项命令使董增德先生的危急处境稍微有些缓和并使他恢复了平静。

尽管有人书写并张贴了反对他的威胁性揭贴,但他的不安情绪远不像原来那样激烈,因为危险似乎是越来越不太急迫了。10月3日,他必须穿越整座城市以为一名病人主持其临终圣事。在街头巷尾,大家就如同平常一样迎接他,没有任何迹象预兆着第二天即将发生的那场骇人听闻的风暴。

10月4日星期六晚上,这一天未发生任何特殊事件,平安度过了……外面的一切都显得很平静。当董增德先生刚刚上床并怀一种完全放心的情绪休息时,突然响起了一阵阵具有不祥之兆的叫喊声,同时又有剧烈的撞击声响,似乎要敲开了大门了。董增德先生转眼之间便站了起来,匆匆忙忙地穿好衣服便下去了。他希望通知官吏们迅速来救他,但有人回答说新教徒们的住宅已经起火。一阵冰雹般的石块落到了屋脊上,成千的人拥向了大街并包围了住院,大家看到在空中舞动木棒、长矛和火枪。危险在步步逼进,大门已经在强烈的撞击下支撑不住了。人群争相涌入,但两只良种犬一时间使他们不敢冒险,从而使我们的教友吃完了其圣餐物。这项义务完成之后,他就必须逃走了。房子被人侵占了,那些疯狂的人群索要欧洲人并到处寻找他。董增德先生跑到了其房子后面以翻过那道将我们与邻居隔开的围墙。他无法攀上墙顶,曾经三次向前冲,但又三次重新跌落在墙脚下,一直到精疲力尽和双腿鲜血淋漓。他最后一次重新站立起来并抱怨圣母,认为她把他抛弃到了要他留下的地方,同时还试图作出一次极大的努力。

他用力一脚踢在空心墙上并踢碎了一块砖头,另一脚却彻底踢倒了该建筑物。在攀过院墙并跳到另一侧时已经完成了两个阶段。恰恰就在他攀上墙头时,董增德先生发现有四、五个人在屋脊

上距他已经很近了。他们正在那里扬撒火药和泼汽油以使火势增强。他们之中的任何人都未发现我们这名可怜的教友未费多大力气地滑到地面上并前往邻居家避难。他无法逃得更远一些，大街都被小市民占据了。

该神父徒劳地祈求这些人的怜悯，大家带有威胁性地推搡他，甚至还取来木棒以阻止他进入。最后，一名更为慈悲一些的老人示意他前往其家中。

他蜷缩在厨房的一个小角落中并藏身于柴薪束的后面。我们的这位尊敬的亡命者清楚地知道所发生的一切情况。他听到了吞噬其心爱住院的大火之劈啪声，看到了大风从其角落中吹起的火苗，它很快可能就会烧毁其最后的蔽身处。村民们的叫喊声一直传到其耳中并使他获知了所发生的一切细节。到处都在搜查他。有数人进入了他的厨房，他看到他们并听到了他们说话的声音。这些人都在谈论他，对于他能逃脱他们之手感到了惊讶。为了不暴露他，房子的主人随声附和这些破坏文化艺术的暴徒。董增德先生半裸体，热得喘不过气来，心都快要破碎了，处于持久的警戒之中。他于该蔽身处度过了一整夜以及整个星期天。

在混乱与惊恐之中，住院中的任何基督徒都未曾见到过他逃亡。次日，这些可怜的人眼中充满了泪水和心都被痛苦地撕碎了。他们翻动了住宅那尚冒烟的残垣和瓦砾以寻找神父的尸体，当时正有一群异教徒在争夺某些逃脱了烈火的残留物。新教们都坚信他已逝世，于是便虔诚地祈祷以减轻其痛苦的负担。

然而，董增德先生已经设法将他连续遭到的危险通知了那名官吏。该官老爷立即着手设法救援他。轿子已经集中起来了，灯笼也已经点亮了。一批武装以长矛的骑兵已经跨上了马，步兵们也前去寻找他们的破旧火枪。锣声一响，这支军队便向前行进。

在到达距董增德先生藏身处只有 50 步远的地方,官吏制止了这支队伍的前进。他召唤其随从之一并让他携带一乘轿子去迎请尊敬的神父离开其藏身地。此人是一名文人,他请神父迅速地穿上他带来的官服。为了完成他那如此荣光焕发的梳妆,董增德先生希望至少能够找到一点水,因为他自一天一夜以来已几乎完全被熏干了。但天已经黑了,而且时间紧迫。我们的这位新“官吏”脚蹬长筒靴,身穿由一条珍贵的腰带扎起来的丝袍,头戴一顶装饰以金顶的礼帽,威风凛凛地行走在大街上,尽量掩饰其长长的胡须。按照其侍从的某种示意,他便坐上了轿子,前去与仍躲藏在一边以蒙骗人群的官吏相会合。这支队伍突然间大转弯而调头取道衙门大堂。董增德先生在那里由四名骑马走在其身边的骑兵簇拥,共由数百名士兵保护,从那些询问这种嘈杂声原因的好奇者人群中穿过,他既未受阻止,又未被识破地到达那里了。在这次通过大街之行的全程中,他必须经过我们住院和孤儿院的废墟之前。当他看到这些堆积起来的残渣瓦砾时,其心情该是多么难过啊!

在大堂上,那名官吏本人也慷慨地向他深表同情,显得着实痛心疾首。

董增德先生本来希望看到其仆人和了解基督徒们的命运变得如何了。在另一方,这些人也在到处搜寻他们的传教士,他们声称自己无论如何也想找到他,无论是死还是活都一样。他们在满城中游荡,大家向他们关闭了所有的大门,甚至是用金钱也无法弄到食物。他们于是便去敲衙署的大门以便打探消息,但却被轰出去了。他们于是又化装成乞丐并试图重新出现在那里,却又受到了拷打。但他们很快就获悉董增德先生仍然活在人世间,最终成功地一直进入到他那里去了。在这次会见中该有多少欢乐与悲伤啊!……

10月6日星期四,天刚黎明时,昨天的那支队伍又整队出发

以护送我们的那位不幸的英雄到达英国领事庄延龄(E. H. Parker)府上,该领事当时居住在温州城外的一个小岛上。

那名官吏送给了他几只欧式便鞋以及几个金币(Piadtres),以便使他能返回宁波。他买了一条普通的裤子,领事于此之外又多戴了一顶希腊帽子,从而使我们的教友具有了一套显然是很古怪的服装。两天之后,他们一行到达宁波。当获知此神父也在场的消息之后,我们便亲自前去寻找他。对他所经历的灾难的叙述大大地冲淡了这次重新相见的欢乐。

这些魔鬼帮凶们的狂怒究竟要发展到什么程度才能停止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去安慰我们的基督徒和重新开始辛勤的工作呢?什么样的手才能帮助我们重建如此之多的废墟呢?

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贵州传教士罗伯恩的书简^①

对于中国内陆各不相同传教区的传教士们,已经进行过威胁了。但过去没有任何敌对行为能证明这种恐惧情绪。现在的情况已今非昔比了,从贵州传来了令人最为悲痛的消息。该传教区的整个北部仅仅剩下了一片废墟,失去了一切的传教士们逃到了衙门,教堂和住院均遭抢劫和被推倒,育婴堂已空空荡荡,孤儿都被异教徒们偷走了。所有的基督徒都四散而去,他们的财产变成了市井小民们的战利品。平民百姓们为了报中国在与法国战争中失败的深仇大恨,既不愿意要传教士们,又不想要基督徒们了。这些不幸的消息是由罗伯恩(Bodinier)和何神父(Ronat)提供的,他们二人都是从其避难的衙门中寄出了书简。下面就是罗伯恩先生的书简。

贵州遵义府,中国巡抚府,1884年10月4日。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57卷,1885年。——译者。

刚刚在一个月之前,当我获悉法中之间的和谈破裂时,便立即预感到,中国人将会不失时机地对内地的传教士们实施报复。但我不相信风暴会如此迅速地猛袭到我们头上。今年9月28日,遵义府的官吏们令人张贴皇帝的圣旨,皇帝于其中向其臣民宣布已经爆发了战争,号召他们拿起武器,以一种无愧于他统治的国家的造谣气势而向法国人大泼脏水。这道诏令张贴出去还不到一个时辰,人群便聚集起来,并对此作出了一些怀有极大恶意的评论。后来,人们便大批地进入教堂。这些来访者们在开始时尚很胆怯,而稍后不久便开始放肆起来,甚至变得蛮横无礼了。他们声称这是一道禁止宗教的圣旨,法国人在交州杀死了许多中国人,皇帝于其帝国中既不再希望存在有传教士,又不希望存在基督徒了,因为这些人都是法国人的朋友。非常幸运的是闻讯而来的官吏们平息了这场骚乱。他们部署兵力以保卫教堂,整夜都是一片叫喊和威胁的嘈杂声。最后,曦光同时也带来了光明和安全。这一天是大天使圣·米加尔(Saint Michel)的节日,魔鬼在这一天是不会取胜的。

次日夜间,又重新发生了同样的场面和同样的攻击,但又一次却丝毫没有达到目的。我获知人群已开始抢劫农村的基督徒。最后,在9月30日到10月1日的夜间,子夜过后不久,成群结队的异教徒们武装以木棒和长矛等,冲破由形同虚设的卫兵们看守的教堂大门而入,因为这些士兵们也一心只想参与抢劫。人群从四面八方冲来,打砸、推翻和抢劫了他们所遇到的一切。天亮后,一切都结束了,仅有那幢房子仍屹立在那里,银钱、铜钱、家具、门窗都丢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后来还试图放火烧教堂,但只成功地烧毁了育婴堂的一座房子。

我当时正与贝胡尔(Behaourd)先生留在教堂中。此人躲避在附近的一幢房子中,我却成功地跑到了衙门。如果向您叙述我是经

过什么样的危险和怎样的曲折后才达到那里,那将会过分冗长。我们无须再做补充说明,在这个灾难性的夜晚,该城中所有的基督徒住宅都被抢劫一空。次日和此后的数日,他们又抢劫了农村的基督徒以及我们在那里所拥有的小礼拜堂。一共有 53 个基督教站口遭抢劫。这是多大的灾难啊!其中没有任何一个能逃脱被摧毁的命运!我们在遵义有一个专门接受女孩的圣婴堂。这该是多么令人失望啊!们们偷走了那些女童们,把她们领到了异教徒家庭,这些中国童贞女们受到了凌辱和殴打。若不是两名基督徒忠于职守,与她们留在一起以保护她们,在被打时仍不放弃职责,那么情况还要更加糟得多。大家把她们安置在官吏们身后以便保护她们,这些官吏们虽然于抢劫时在场却甚至是未企图阻止之。

她们对知府说:“宁愿让大人杀死我们,也不允许使自己遭受这样大的污辱。”

同一夜间,在距遵义有 10 法里的绥阳县(Sú-Xaug-Hien)又发生了同样的场面,对教堂实施了同样的抢劫,许多基督徒都遭到了严重暴打。当地的传教士朱索姆(Jouishome)先生却奇迹般地逃脱了死亡并成功地到达衙门,不过他也未能避免丢失被人强行脱去的衣服,甚至是短袜。第二天,异教徒们一直追逐他到官衙以索要其头颅。乡间的基督徒小会口及小礼拜堂于此后的数天全遭毁坏,完全如同在遵义一般。

10月2日夜间,又轮到距遵义有 14 法里的桐梓县遭殃了。我们在那里有一座很大的设施和两座育婴堂,共收养有 150 多个男女孤童。这该是令人多么悲痛啊!一夜之间,一切都化为乌有了。当地的传教士何神父先生被扣留在县衙中。今天又为我传来了抢劫了湄潭教堂的消息。天啊!另外两个较远的城市正安和仁怀的情况也如此。这是一场全面的灾难,我们在该省的所有站口都被毁

灭了。

有三座带有教堂和育婴堂的大型设施、另外三处稍小一些却是位于城市中的设施、遵义的 53 个基督教站口、绥阳的 40 多处、桐梓的 20 多处以及湄潭、正安、仁怀的所有站口均被抢劫一空，变成了废墟，基督徒们四处逃散，传教士们被作为囚徒而扣在官衙中。这是一次共达数十万法郎的损失，但它们与人员的损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精神灾难相比，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他们现在该对我们如何处置呢？我听到各处的百姓们都在索求我们的头颅和我们的鲜血。但中国的皇帝或者更应该说是他的那些在北京的大臣们却命令不要杀害我们，而是仅满足于抢劫，无疑这正是他们对“保护”一词所作的理解。其次，大家在北京也都害怕对入华传教士们的一场全面大屠杀会产生不好的效果，对教堂或基督徒们住宅的抢劫更为时髦一些。

当看到继 1809 年的首次教案之后，于 12 年期间，由我们看着新生并变繁荣的这个不幸县的灾难时，我的心都快被撕碎了。今天，我再也看不到怎样做才能弥补这些破坏。

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我只有奋不顾身地投入上帝那仁慈的怀抱中了，我将尽自己最大的可能来这样做。无论如何，仁慈的上帝从来都是根据慈悲的观点进行打击的。此后不久可能于中国还将会出现一个仁慈的时代和一种和平，从而成为拯救一大批灵魂之地位的契机。

据樊索(Vinçot)先生的一封书简认为，在贵阳对于同样灾祸的恐惧心情更为有理有据，特别是由于一名刚从贵阳前来的信使声称，在他于 10 月 2 日出发时，马赖(Lions)主教大人的住院已被士兵包围，百姓们企图抢劫其设施和杀害传教士们。

由尊敬的耶稣会传教士杜朗迪埃(Durandière)大人自江南发出的一封致其宗座代牧倪怀纶(Garnier)阁下的一封书简使我们看到了类似董增德传教士几乎成为受害者的那种场面。同样的预谋、同样的火灾、官吏们同样的共同策划、同样的拒绝镇压。尊敬的盖隐(Gain)和杜朗迪埃神父有幸残留了一条性命,但传教区的设施已被彻底抢劫一空了。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沙海雷会士致云南宗座代牧古分类主教的书简^①。

1884年11月19日于邛部司

主教大人：

一切都是美好的。极不公平的事已经过去！殉教者们的鲜血流得比在由中国挑起的任何一次教案中都要多。我即将向您报告已使我得知的具体情节。上一个星期五,整个白天都是在痛苦中度过的。大家每个时辰都前来向我报告,声称下一个夜间可能会看到彻底根绝基督徒的名称了。我于是便派自己的两名传道士前往衙门,告诉他们说我情愿献出自己的头颅和属于我的一切,以拯救我的殉教者们。官吏们为了更好地欺骗我们而声称,这次事件仅在于寻找几百两白银以分发给9名或10名土匪头子,大家明天将会友好相待,在等待期间应该保持安静,尤其是任何基督徒都不应该出现在大街上。他们补充说,他们“即将向所有方向派出一些专差信使,以便阻止各路的大队人马包围城市和经堂(教堂)。所有的城门和城墙于这一天都要设防”。这一天,我的大部分基督徒们都出城以便到农村寻找一个蔽身地,或者是藏身于异教徒家中,或者是躲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57卷,1885年。——译者。

避在沟壑之中,只有 10 名能够略微作一些抵抗的人与我留在一起。

我的 10 名基督徒希望与我留在一起,尽管有确凿无疑的危险在威胁着他们。到了晚上 9 时许,我受我那仁慈的天使的启发而对他们说:

“任何抵抗都是无益的,最佳主意依然是我们应设法逃亡。这是以人类的办法很难办到的事,但上帝却是无所不能的。如果这是上帝的神圣意愿,那么它完全会在我们的逃亡中保护我们;如果它希望我们死亡,那我们就会非常高兴地为它的事业而洒血!但同时也应采取一切符合常规的谨慎手段以拯救我们。”

我的两名传道士也同意这种观点,我们立即准备执行自己的计划。通常的花园朝城墙方向开门,但西门也在旁边,上上下下都布满了岗哨。我的基督徒们都同意等到午夜之后,当时的守兵们都入睡了。但在蹑手蹑脚地走出花园之后,我听到了官衙中一个人正在对守兵们训话:“多加注意,官老爷即将在午夜之后前来巡视城门。”

我怀疑其中有诈,于是便敦促我的基督徒们离开。大家将一架梯子倚在内墙上,我们每个人都带着绑在雉堞上的一条床单,下降到或者更应该说是滑落到了城外,距西门哨所有 50 米远的地方。恰恰在我们越城而逃的时候,城墙最高层的灯光熄灭了。尽管有几片瓦砾滚落到地面而发出了响声,但我们仍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描述在一个漆黑夜间的路途中遇到的所有曲折变化和所有的复杂事件,那将太啰唆了。

我们在盘旋道上尚未行进 3 里,便发现在距城池 4 里地方的一位年氏基督徒的房子起火了。时隔不久,我们又听到在城墙上发出了一阵可怕的响声,城墙上在各个方向都有武装以火把的人群

来往穿行。继向教堂炮轰一次之后,紧接着又是一阵阵的呼叫声。我的住宅、两所学校以及相毗邻的另外一座基督徒住宅的门面中都出现了火光。所有一切均被抢劫和烧毁殆尽,属于教堂的一切和作为基督徒们财产的一切都完了。在市内和乡间,他们大肆杀戮,洗劫和焚烧了属于新教徒们的一切。

在摧毁了旧衙坪的一切之后,这些暴徒们又冲向了落河(距旧衙坪有两法里远的地方),据说那里遭到了更大的损失。男女成人和儿童都拒绝去张贴“文字牌”(异教徒们的牌子),他们都被用刀挑死了。这些残暴的家伙们的狂怒仍未得到满足,他们又在相距100多里(10法里)远的深山和甚至是密林中,搜捕那些被怀疑藏匿着基督徒或属于他们的物品的异教徒住宅,他们杀死或抢劫了为那些不幸的无辜者们提供过避难处的异教徒。

由于我未掌握任何确切资料,所以我暂时无法向您确切列举受害者数目。但根据众说纷纭的情况来看,那些要服从一种来自上司命令、同时也考虑到坚信自己不会受到惩罚的仇教者们的疯狂程度,殉教者的数目是相当大的,可能超过了数百人。除了接受“文字牌”的两个家庭之外,这些英雄的基督徒们却宁肯死亡也不肯以一种背教而玷污自己的清白。

以上就是我们撤退的主要情节。经过在稻田中、山岩中和各种困难中行走6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山顶。我们必须经过新开集,那里是距旧衙坪有六古法里远的大集市,大约于清晨6点钟经由那里。我们非常害怕会有人来逮捕我们,集市上已经武装起来了。在我们经过那里时,所有人的情绪都非常不安,大家都把我们视为野兽。我们听到了某些喊声:“抓住他们!”我们假装对这一切都不懂并继续赶路。

在到达居住有一名中国司铎的基督教会口马厂时,我们最终

才得以略作歇息并准备吃一点东西了。我想在梅神父那里过夜并于次日星期天在作过弥撒之后出发。我们直到马厂才估计没有敌人追击我们。已经悬赏 80 两白银收买我的头颅,我们那些传道员的头颅则被悬赏为 40 两。上帝仍在保佑我们,我们得以在暴徒们到来之前而到达江边,租了一只船以便一直到达四川边境。但艄公在行船 6、7 里地里后便停了下来以将我们送往一个猓猓人家庭中。次日是星期天,又有人转告我们说已经没有备用船了。我们于是便取道陆路,于 10 点钟左右到达了保波的一个贫穷的基督徒家庭。

次日星期一,太平场的 19 名基督徒前来与我们会合,经过一些很难通行的道路而把我们领向了一座大山的顶峰,我们在那里稍作休息之后又通过另一条道路而到达马厂。在马厂和盖地井,尚未发生焚烧住宅的事件,但那里的人也掠夺了我们所有的食物储备和洗劫了能够带走的一切东西。一名姓唐(Tang)的基督徒被杀;另外一位被从胳膊和头发处吊了起来,我不知道他是否已死亡,一名郑氏教书先生也因未与其他人一起逃亡,因而被剥尽了衣服和受尽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虐待。很可能还有其他许多受害者,但我未掌握其具体情节。我们最终得以租下一只小船并来到了这里。邛部司的基督徒们友好地接待了我们。虽然全部危险均未完全过去,但我认为该省比在其它任何地方都更安全。我将尽快从这里派人却探听我那些可怜的基督徒们的消息。多亏借贷,我才得以为我那此可怜的受打教事件迫害的人提供一切帮助。唉!其中的许多人由于饥饿和受难而死于他们在深山密林中的避难处。愿仁慈的上帝怜悯他们吧!

沙海雷(Chareyre)来自教廷的教士(具有使徒使命的传教士)

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云南宗座代牧古分类一封书简的 摘录^①

云南的大屠杀

……在 11 月期间，云南南部的基督徒们都成了一场仇教案的攻击目标，已经造成了不少的受害者。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只知道 了 29 名殉教者。他们的死亡是英勇而壮烈的，这是 29 名殉教人。事实上，他们只要用一句话就可以赎回其生命、为其全家获得安全并保护其财产。但他们始终未讲过这样的话。所有人直到最后时刻都高高地和坚定地举着传信大旗，这些十字架的英雄们怀着一种神圣的欢乐和一种尽可能大的勇气而泼洒鲜血。其中之一自某些时代以来就看到了兵刃已悬在了自己头上。

他们惊呼：“那你们就快一些吧！或者是应该留给我们一点时间以诵读祈祷经文，因为今天是 11 月 16 日，星期日。”

住宅的主妇是该基督徒的值得信赖的伴侣，当她看到刽子手们进入其家中时却说：

“啊！你们现在都是一些勇敢的人，你们不知道你们会对我们作出什么样的效劳啊！”

在我刚才讲到的那些虔诚的忠实信徒之中，有四名于幼年时期领洗的暴徒。这些不幸的人是基督教的耻辱并使传教士们感到了失望。尽管还有其它的邪恶意向，但当有人前来劝他们背教时，对其先祖的全部信仰便从他们心田的深处显示出来了，而且其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四人都勇敢地为上帝的事业而战斗并流尽了其最后一滴血。他们中的一个人对那些为他带来异教徒的牌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 57 卷，1885 年。

子的人说：

“朋友！我们所有人都互相了解，你们知道我没有高尚的情操。无论遇到了什么事，我过去都曾是你们中的一员，但拒绝上帝而崇拜偶像则永远是不可能的。完全可以肯定，我会砸碎试图将这些魔鬼偶像带到我家中的人的头。”

经过这次强有力的传信之后，他与其三位同伴，于次日便为他们未曾很好地为之效劳的仁慈上帝的事业而死去了。

我非常高兴地得以补充说，在整个省里，我们的新教徒们到处都表现了同样的勇敢精神。天啊！我对此尚很害怕，当重新恢复平静时，当我们能够计算我们的人数时，我们很可能就会对许多背教行为发出抱怨！

远东传教区的最新消息^①

我们在这一总标题之下辑录了从我们那些自安南和甚至是中国内地传教区中收到的消息。尽管现在已实现了和平，但形势始终仍相当严峻，文人们的做法和秘密的阴谋行径依然在继续维持着民众们极度狂热行为。但我们衷心希望，列昂十三世(Léon XIII)教皇陛下对中国政府的强大影响以及法国的坚定立场会加大彻底的和平的可能性，我们从此再没有必要于我们的《年鉴》中发表这些令人极端痛苦的记述了。

交趾支那北部宗座代牧卡斯帕尔(Caspar)致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院长们的书简(附克罗赛书简的摘录)

1886年2月13日 顺化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58卷，1886年。——译者。

我们的厄运中又增加了新的灾难，我在广平省问题上曾向您表示过的担心部分地变成了现实。您可以通过本书简中所附的海里(Héry)神父致我的一封书简而理解我们该忍受着多大的痛苦压力啊！

这是继已经使毗邻省份感到痛苦的所有那些空白地之后，又为我们的基督徒们创造了一片新的沙漠。共有 10 个基督教会口被烧成了灰烬，442 个人遭杀害，近 2000 名不幸的人都逃到了城堡的城墙之下。

从顺化出发的一些法国的特遣部队从各个方向穿越了广平省，以便驱散那些骚乱者。但是，当传来最早动乱的流言时，他们就必须加速行军。只有这样，我们的基督徒们才能逃脱已经打击了他们的那种灾难。

下面就是克罗赛(Closset)神父写信告诉我的情况：

“大家是否可以说那些已逝世的人以及那些已经在上帝和人类面前又得到了一种光荣死亡的人是享真福品者呢？那些经过如此之多的苦难而活下来的人的命运该是多么悲惨啊！当发现目击者面对如此之多灾难也无能为力时，这位可怜传教士的心在流血。特别是在极端严寒的季节却没有任何可供作被子盖的东西。我们的基督徒们被迫在光地上席地而寝，最多也是铺上少许稻草，受尽饥寒和疾病之苦，这是每天都必须忍受的一整套艰苦生活。继在我们的那些可爱的残存者之中又造成许多受害者的霍乱症之后，现在发热病和天花又造成了可怕的灾难。大家经常听到这些因发热而衰竭和正在喃喃呓语的不幸受难人在呻吟，对于自己未能与其亲属们死于镣铐之下深表遗憾，因为后者现在已享天福、远离了凡世间的苦厄。”

中国川东宗座代牧区的综合报道^①

《传信年鉴》对于去年在四川爆发的那场令人恐怖的风暴尚丝毫未作报道,它在中国西部的这个曾非常繁荣的传教区中造成了难以计算的损失。

为了更便于理解这封提供了其最具体事件和最生动细节的深奥书简,我们即将简单地阐述导致这次出乎预料的教案的原因。

这是一些新教传教士,尤其是一些美国人挑起了所有这些灾难性事件。在为他们及其家庭于重庆附近的高地建立别墅(夏日乘凉避暑之所)时,这些传教士们在制高点问题上引起了民众的怀疑。中国人非常愤怒地看到外国人占据了被视为该城之圣地的位置。他们甚至强加给了美国人曾制定了一种从其住院顶部炮轰全城的计划。令人遗憾的是,新教教徒们丝毫不顾忌在他们周围低声发出的威胁性流言蜚语。越来越感到愤怒的人民于7月1日清晨大批前往农村,以摧毁那些仅仅瞥一眼就会激怒他们的机构设施。在回程中,那些骚乱暴徒又攻击了英国人和美国人在该城的住宅。其后,其人数越来越多,冲向了天主教主教府和传教士们的住院。这些人为了逃命而被迫在道台衙门寻求避难,而且他们也确实在那里被接纳了。

这些抢劫活动又出现在整个省内,大批基督教会口就这样被消灭了。虽然孟神父(Marius Bonnet)于其书简中所讲到的事实涉及到了江北城,对于在川东大部分城市(那里有一些新教徒)中发生的教案提供了一种基本概念。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59卷,1887年。——译者。

川东传教士孟神父致其修女们的书简^①

江北厅道台衙门

一、惶惶不安,更为令人放心的消息

7月2日晚11时。我不知道顾巴德主教大人以及我那些位于大江波岸的教友们究竟是已经惨遭杀害,还是仍然活在人世间。仅仅到次日清晨8时左右,我在道台衙门中才对他们的命运感到稍微放心一些了,官吏的一名男仆前去打探事态,他前来汇报了他前往“门长”^②的使命:

主教府、位于其一侧的小教堂以及我们那座地处城市中心的大经堂都被夷为平地了,英国领事馆、美国和英国的新教教堂,最后是三名基督徒富翁的高大住宅也都遭到了类似的命运。但却没有任何人负伤。“洋人”(也就是欧洲人)都逃到道台衙门中了,仅仅缺其中的三个人,大家怀疑他们也都安然无恙地躲藏在某处了。

二、对囚禁我的监狱的描述,弟与兄

大约在8时左右,有人向我宣布说该官吏最终站起来,他即将渡江,但他在出发前要会见我。我正等待于其中的厅堂就是“门长”的客厅。它于一侧背靠大堂,处于官吏的那乘大轿出出进进的大门门坎之上。这同一间客厅由朝广场开放的两扇糊纸窗户采光。那里整天都驻守着相当大的一群人:告状的人、好奇的人、流氓、各种类型的懒汉。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59卷,1887年。——译者。

② “门长”系指官吏的第一名仆人,所有的房间、所有的物品和全部事务在禀呈官吏之前都要经过他的手。此外,所有的仆人都归他管理。

当时,我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正如我曾经能够做的那样),以将与谈话的人那虽然很尊重而又是阿谀奉承的演说与外部的嘲弄性言论区别开,有人却来请我去官吏的书房。此人身穿便服,耐心地等待着我。经过常礼致意之后,他让我坐在上座,我匆忙地告诉他说:“我已久仰了”,也就是久仰其名了。他回答我说他很久就听说过我了,但他从未能会见我。

我接着又说:弟^①感谢兄^②昨晚辛苦地拯救江北礼拜堂。关闭城门和封锁河道以阻止重庆的流氓们前来继续从这一侧进行他们的抢劫活动,命令头人、乡绅、保长和衙役们整夜巡更,每个人都监督他管辖的街道,这是一种绝妙的手段。惟有“兄”自己预料到这一切并采取了这种措施。此外,他自己也整夜巡更并让人在街头和城墙上轮流值班。他就这样使用了其仁慈的心(这就是说感谢他作出的效劳)。

官吏回答说:“弟只不过是尽了自己的义务。这里没有出现任何灾难性事件,而且永远也不会出现任何事件,这是现在已经肯定了的情况。但我们更应该将这一切归功于司铎的良好名声而不是我的关注。因为昨天晚上,在将我的命令传给乡绅们时,我向他们询问过大家对司铎的看法。他们全部回答我说:‘自从他到此三年多来,司铎未与任何人争吵过,大家只会受到他以礼相待和恩惠。对于所拥有的很少一批基督徒,他都力促使他们安分守己。因此,所有人都尊敬他,许多人都爱戴他。’”

“兄是想抬举我了。”

总之,我请他继续其善行。由于他必须立即渡江,所以我目前

① 这是对“我”的一种文雅而礼貌的称呼。

② 这是对“您”的一处文雅而礼貌的称呼。

无法这样做。我请他向当局打探有关主教及其同道教友们的可靠消息。

“我不会忘记这一点，我将尽早返回来以使他感到放心。”

“我等待您返回。”

半个小时之后，他又向我证实了下述消息。他另外还告诉说，大家于本处再也不会发现的欧洲人是三名司铎，但大家可以肯定他们都平安无恙。

其后，他希望让我退下。我设法让他理解存在着危险，如果我返回自己家中，那么即使不会危及我的生命，至少也是危及到了我的小经堂。重庆的所有外国人都遭到了抢劫并被从他们各自的住宅中驱逐了出去，只要那些流氓无赖看到我平安无事居住在自己的府中，他们就不能安心地入睡。他不能马上就理解这种原因，但在我的再三强调恳求下，他为我指定了位于门口左侧的一间小房子，介于大堂和二堂之间。他抱歉地表示无法对我安置得更好，因为他就在今天要留宿其嫂子及全家；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在用餐时和在白天也无法陪同我。

约 10 时许，确实来了七、八乘轿子，其中至少有五乘被一直抬到了第三套院子的住宅。她们之中包括其嫂子、侄女、婴儿、奶妈或女仆。那些略显高贵一些的女眷们始终在远避众人目光的地方下轿，她们绝不能在大众面前抛头露面。

我度过了充满悲哀的一天，时刻都惦着刚刚降临到传教区头上的灾难，受到了已预见到必然成为其后果的苦难之折磨。我于今天和前一个夜中借助大火的微弱光芒而作了祈祷，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作过的事。我感到睡意朦胧，道台衙门中整夜都乱哄哄的，我还是照样上床了。

三、来自法国的一封书简，中国人的谈吐及礼仪

7月3日晚九时。我一大清早便派遣我的仆人前往大江彼岸。他为我携来了一封法国的书简。这是多大的幸运啊！我那可怜的父母啊！你们却从来都不会怀疑你们这些和蔼可亲的书信是在一座监狱中传到我的手中的，其价值因而会倍增。

顾巴德主教大人的工作负担太重并且由于激动而精疲力竭，他给我写了几封安慰和共勉的信。

在江北厅，有些令人非常不安的风言风语在流传。从我的那间仅由一堵单薄而矮小的土墙与大街相隔的房间中，我听到了过路人的对话，他们中十人有九人都在谈论基督徒，叙述了他们的灾难，大声地对他们谩骂，许多人都认为我们算彻底完了。但我的心中却深深地铭记着上帝对其教派的许诺。以及我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句话：“他们将会迫害你们并认为这样就可以永远告别上帝了。”

在11点钟时，官吏的师爷之一，也就是那名主要是负责其钱财的人让我到他的书房去。我们刚刚坐下并互相讲了几句话之后，另外一位师爷（负责联络的那位）进来了。他坐在第一位离开后的荣誉座位上的第二位，前一个人坐在了一把木椅上，背靠侧墙。我的新对话者使我觉得他多少有些狡黠，我时刻保持着警惕。在询问了我的“贵姓”和“大名”之后，他便与我谈论宗教问题，他对宗教的看法倒不错，但却是吱唔搪塞。过了一会儿，官吏亲自前来，他立即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尽管我反复四次请他登上我的座位，后来又加入了我们的谈论。他主要是向我询问司铎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宗教的目的、我是否带来了妻子和我有几位“大阿哥”（男孩）。我在所有这几方面都满足了他的好奇心，所以他未将我们与和尚们（世界上最卑鄙堕落的一类人）相混淆，他明白我们的传教区没有任何政治目的，而完全是宗教性的。

我曾成百次地听到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大家今天又向我重新提出来了:

“在贵国,大家并不注意荣升高职显位,只要懂得制造和讲解一座钟表或一架机器就能享有一种尊号,不是吗?”

“情况绝非如此,在敝国中,若不经经过获取爵位的会试,那就不可能触及任何公职。完全如同在本处一样,这些会试是由写作文章和诗赋而组成的。除了在此地之外,还要求懂得多种语言的知识,在本国史和外国史、世界地理、天文学、化学、物理、数学、三角学等方面都具有非常广泛的基本知识。甚至绝对禁止以银价买官,必须以其额头的汗水和耗费其思想上的全部精力来获得这一切。”

这种说法使他们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在天朝帝国,有许多官吏仅仅是通过购买才获得其顶子的!但在这里,我绝不会害怕惹怒与我交谈的人,他作为一种特殊的例外而是通过合法手段考中的秀才。他始终对于我讲他们语言的方式赞叹不已。师爷甚至声称他只见过很少的中国人能够如此纯正、清楚和如此正确地以其语言作表述。对于他恭维我的美意,我当然会向他表示感谢。我然后又使他理解了,从青年时代就应坚持学习外语并坚持在公开场合下讲话,从而培养成向教徒们解释《圣经》的习惯,所以司铎们具有某种程度使用语言的便利性。

后来,大家竟然发展到赞赏我们的国家了。我颇感局促不安地承认我们没有国王(他们认为这是夷人独具之特征),我只好以斯科尼人的巧妙手段来摆脱窘境,对他们说由于觊觎王位的三个家族的分裂,所以我们尚未为挑选执掌国家政权的国王拿定主意,以便选择全民族中的最贤慧者。

“您的俸禄是多少?”

“分文皆无。”

“那么您就是希望经过数年的艰苦工作而爬上一个较高官职的位置了？”

“绝非如此。”

“那么您希望什么呢？”

“除了身体的至福之外别无所求，用我们的语言来说，这就是指来世。”

官吏怒吼道：“你们正是为此而抛弃家属、朋友、祖国，你们为此才献身？……”

“是啊！”

“那么，您就会非常出色地获得功德了。”

他讲到这里便溜之乎也。我还以为是看到了比拉多(Pilate)，他在询问上帝“什么是真谛”之后未等上帝回答便扬长而去了。但将这句话用于那位杰出的官吏却有些太粗暴了。我在12年的传教使命中曾遇到过许多略有差异的异教徒们都是这样作的，恰恰就在大家触及到灵魂和上帝等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时，他们便会扬长而去或者是改变话题而言它。

四、每个人都很焦急，一系列的抢劫，上帝的报复

7月4日。仆人向我报告说，打教活动在农村中已经到处扩散开了，其口号是将基督徒们的住宅抢劫之后再放火烧毁。可怜的孩子，你们将会变得如何呢？……你们为信仰该要经历了什么样的考验啊！……

官吏也以他的方式表示了焦急不安，他为了其顶子才战栗不安。如果我们遇到了灾难，那么他将肯定会被罢免。然而，本地尽管与一座动乱中的城市为邻，如果这里一切都依旧井然有序，那么他就将会赢得一大分。所以，他必须日夜不停地监视大街上的犄角旮旯，经常于11点和午夜之间亲自乘小轿巡逻，其巡捕们整夜

枕戈待旦地待命。至于军官,他也在城墙上巡视,每天晚上很早便关好城门。他还向每座城门都派遣二三名士卒设岗并奉命截获来自抢劫的东西。现在于此尚没有任何东西摆出来供出售;而同时在大河的彼岸,您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不知羞耻地将这一切摆摊出售的旧货商,许多送饮用水的挑夫都在街头上出售椽头和檩条、大梁残段、木板条、板子等,这都是他们陆续从我们那已被拆毁的设施中取走的。治安警官放任他们擅自如此行事。在7月1日的灾难日子里,就在骚动不安的人山人海冲向这些设施的时候,官吏们更无法抵抗了。这一切都是很容易想象的。但现在这一人群已经散开了,他们却未能没收陈列在货架上的抢劫物,这就是一种很坏的预兆了。这难道不是证明刚刚发生的事实了吗?

但是,如果说人类抛弃了我们,那么上帝(也就是正义本身)却完全懂得关照我们的事业。暴徒中已经有数人在大梁之下被压死,许多人都受伤。昨天,一名不幸的人在我們的大经堂中被他正要从一根柱子上拆走的一块木头活活地压死了。某些异教徒门于前两天就已经声称,他舞动一件圣餐杯而喊道:“我现在变富了,我由此而为自己得到了数个银顶子。”此外,他昨天早上就已经突然间暴卒于床上。在此之前,他就穿上了一件白长衣并戴上了一顶华丽的弥撒帽,就这样在街头散步,请路人承认他是国王……可怜的失去理智的人!

五、我们的保护人,一次警报、一场大灾,中国人的仁慈

7月5日。官吏出发前往重庆。主子一旦离开,奴仆们便自由了。他们中的一个人在距我的房间有五步远的地方,在大堂的后面高声咒骂欧洲人,其他人则在嬉笑。让我们吞下其辱骂,它比火与血总要轻松得多。现在,负责我们避免受迫害的治安任务就委托给了这些人了。

在5点钟时,我们的仆人从大江彼岸返回来了。他向我报告说沙坪坝^①已经受到了袭击,已经向那里派遣了士兵和重庆的基督徒,以保护该地区。一向始终都对我很礼貌的“门长”却害怕我房间的那酷热的空气。他来此呆了一段时间以向我致意,同时也告诉我说,有谣言在城内流传,认为我们的神学院已被捣毁,本省的主教府也遭此厄运。这是不大可能的,但这些流言蜚语却重新激起了我的恐怖心情和我的不安情绪。

7月7日。从清晨一点钟开始,我便被一阵猛烈的喧闹声吵醒了。所有角落中的大门不停地开开关关。以一种惊慌失措的声调传来了某些命令,一些包衣(boys、青年男仆)、侦缉、衙役们都互相呼叫和回答,在我那朝内院开的窗户前有些火光来来往往晃动。我站起身来眺望,在二堂前面的轿棚之下,停放着一乘由四名挽起裤腿的轿夫准备好的小轿。从官吏的书房到大门,到处是仆从、衙役和侦探们持续不断地来往,每个人都手提灯笼,喊叫、谩骂、诅咒和发布命令。官吏最终下楼来并进入了轿子,起轿后便被风驰电掣般地抬走了。我走到外面并向一名或两名仍然在那里的包衣询问,他们于其震惊之中甚至还没有想到回答我,便立即跑到官衙外面去了。但天空反映在小内院中的昏暗光芒已经相当清楚地告诉了我一切:某处起火^②。难道是在我们那里吗?难道轮到我们遭抢劫和火灾了吗?……我至少看到了火光一直升到我们住宅区的上空……一名文书于此时前来告诉我说:“在与你们那条街相毗邻的大街上失火了。”

① 那里有我们病人的乡间别墅,同时也是巡视附近地区的传教士的住院,距重庆城内有三法里远。

② 当时尚没有消防队,但官吏们根据法律而被迫奔去以在部下的帮助下救火。

火光当时已经照亮了半个天空,尽管一直在下着倾盆大雨,但火光仍在逐渐地扩散和蔓延。在这些其房子全部是木结构、拥挤而又彼此之间连成一片的这些城市中,街道仅有6—7尺宽。当在那里发生火灾时,它就必然会吞噬整个住宅区。我们对此还应补充说明,伏天炎热的太阳已使所有这些已被虫蛀很久的木材变得如同火绒一样干燥。这里没有水泵,甚至也没水井。大家必须前往距那里有约600多步远的江中汲水。甚至于欧洲本地,在缺乏水泵管的情况下,在这样的距离中,排成长长的“人龙”就会很容易地运来非常急需的水。但在这里,谁会去排长龙呢?谁提供水桶呢?因为大家极端害怕其水桶被丢失……遭受火灾的人及其近邻很关心灭火,于是便只能会想到自己(这是很自然的),一部分人希望抢救他们能够从其动产和商品中抢救出的一切,其他人则想到了以将它们搬到安全地方的办法而抢救这一切。外国人也应该自己负责这一切。那些最诚实的人都前来愚蠢地围观这一切,堵塞了本来就很狭窄的街道,从而妨碍了衙门人员的活动。那些脚伕们争相哄抬物价,也就是说或者是为了提供水(这一夜是30文铜钱一桶水),或者是为了搬动面临被付之一炬的家具、商品,甚至是转移儿童、女子、老人和猪崽等。最后是存在着一个公民阶级,其人数特别庞大,他们都利用这场灾难而更便利地进行盗窃。

因此,为控制火势就只有一种办法了,那就是必须牺牲部分财产,而为此则又必须表现得很慷慨。但什么样的中国人会甘心情愿地将其具有破坏能力的手伸到其尚未被殃及的和可能永远不会被触及的房子呢?谁知道呢?……官吏、本区的乡绅和衙役们都一无所获地下达命令、大发雷霆之怒,破口大骂和威胁恫吓地无所不用其极,所有人都装聋作哑。这就是全部情况。如果文官(始终乘轿

子)① 果断地下达了为救火的代价而拆毁一部分建筑物的命令,而又未获得建筑物主人的同意,那么在大部分情况下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首先,跟在官吏后面小步跑的家伙对于负责这项重大工作来说就显得特别宝贵了,因为这样做就可以推动在场的苦力们。这些害怕冒犯得罪那些位于失火地边缘的住宅之主,担心登上已经着火的店铺所具有的危险,于是便以哄抬劳动力雇价的办法而掩饰他们的恶意。火势始终以越来越猛烈的程度蔓延。这场灾祸于是便变得令人恐惧起来了,大家从中发现了神灵的一次直接干预。该官吏立即双腿跪倒在地,越来越频繁地向大火跪拜,希望能感动它。他然后又轮番地将其带顶子的帽子、朝珠,尤其是其带绣锦护手的手套、袍子、缎面靴子等作为食物而供奉给火神,他甚至脱掉了其袜子,身穿这种苦修者的衣装而哭泣、呻吟和祈求,加倍地跪拜和甚至是以头撞地而直到碰伤前额。

今天早晨,我们的那位官吏尚未遭受过这种惩罚。因为大火烧到我们那间于1876年拆毁的小教堂遗址上,由于缺少可燃物便熄灭了。该官吏凯旋般地返回来了,虽然显得疲惫不堪。他手下的那些人打着赤脚,个个都将其裤子绾到了膝盖以上,全被淋得如同落汤鸡一般。现在已经是清晨零点钟了。

6点半钟时,监狱的看守前来我的房间取两根植物油蜡烛,它们都被塑成带有豪华装饰的人物像,然后又取走了两包爆竹。为什么呢?该官吏衣着入时地前去火神庙顶礼。这无疑是为了感谢火神前不久所制造的那种假像。

六、嫌疑犯一次审判,酷刑

上午9点半钟。我的那位基督徒显得特别惊慌失措地赶来了。

① 如果某位官吏在遇到一次叛乱的情况下,被迫参加战斗,那也始终要乘轿子。

一位朋友告诉他说：

“您要多加小心。有些专爱讲人坏话的饶舌之徒满城散布谣言说，完全是你们纵的火，因而大家将要拆毁你们的设施。”

我匆匆忙忙地去报官。他又派出新的衙役到原来衙役们所在的地点和广场巡逻，他们当时正忙于监视火灾现场或者是看守城门。

晚 6 时。我的那名基督徒前来与我共进晚餐。他的神情举止完全改变了。我从他的面色上看到了我的人仅仅是因今晨的流言受了场虚惊，这种流言将火灾的责任转嫁到了我们身上。我以几句对上帝的信仰和信任的语言而使其精神振作起来了。

清晨 3 点 35 分。宣读公告的差役们高声喊叫着宣布了一次审判。审判于花亭举行。许多差役来来往往。大部分人都赤着脚，衣服已被撕破或经过了缝补。其中有的人带着锁链，其他人则背着重于受笞刑的板子和带着枷。保长们带来了一名衣着干净和面庞显得诚实善良的青年人，这就是即将受审判的罪犯。这是为了什么罪呢？……此人是“火头”，大火就是从他家中开始烧起来的。

审判开庭了。那名官吏眨眼之间便骑上了高头大马，愤怒得满脸通红，从而掩饰了他在汉语中找到的所有那些不堪入耳的骂人话，不时地用尺子重重地敲打案子，以使其大声斥责更富有表情，最后吐出了一个可怕的字：“打。”立即便有 20 多个人异口同声地重复，就如同有同样多的魔鬼一般：“打。”在由这种故意拖长的吼叫声造成的嘈杂喧嚣中，又听到了锁链声和舞动的板子声。那名已经跪在那里（这是任何被传上官府大堂的人都必须保持的姿态）的可怜被告连连叩头，祈求官吏的宽恕并试图讲话。官吏又一声呼叫，同样由 20 多名喊堂威的人和衙役们异口同声地重复：“打。”棒打又开始了。

那个官吏于是便漫不经心地叼起了一个包衣递给他的烟袋锅。在两名衙役将受难者脸部向下地按倒在地面上时,另外两名则蹲在其脚跟部轮番拷打那名可怜鬼的背部。他的呼叫声和啜泣声已被拷打声和三、四种计算打板子数目的声音淹没了。喊到“100”时,其声音进一步加重以公布该数字,出自稚童喉咙的清脆嗓音:“100。”板子停了一分钟,但那名官吏仍在吼叫:“打。”衙役又继续更加卖力地开始拷打,直至到另外“100”为止,衙役此时才稍喘息了一会儿……如此依次类推。这个可怜的青年人挨了1000板子。那名官吏后来以一种比较温和的口气对他进行了训诫,命令给他带上了锁链,并在脖子上带上了枷。

他被押解着穿过了城市的街道,然后又将他押至火灾现场示众,面对着仍在燃烧着的熊熊烈火,在那里有1000多名愤怒的人,就如同对待一只替罪羊一样向他投掷石块,犹如冰雹般地向他降下了一阵烂物片,碎瓦砾、破罐子等都降到了其头上。大家最终将他押到了官府衙门。

七、始终是仇教,伍神父之死

7月11日。情况再真实不过了。我们的小学校刚刚从那里消失。那里只剩下一层层石块了,大树已被砍断,庄园已遭摧毁。幸运的是人未受伤。儿童和教师自二三天之前就已经逃走。

7月12日。我们的大修道院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威胁,但尚未遭到损坏。现在已经向那里派去了一支由20名营勇组成的民团,重庆的武官甚至也赶到了那里并得以驱散骚乱者。但这些人刚刚离去,人群便又冲向了附近几个基督教站口以及教堂的佃户们:抢劫放火,完全如同在其它地方一样。

7月27日。顾巴德主教阁下写下了这样一封短信:

“白果树(Pee-Ko-Chou)的传教士们都被滞留在大江岸边。河

防团声称必须有巴县的一道命令才能让欧洲人渡江。他们的教友——善良的伍神父(Ouward)自两个月来就生病,所以当他必须逃离学校时仍卧床不起。有两名士兵在逃亡中保护他和搀扶他,一个拉着他,另一个则牵着他。当夜幕降临时,他们已经行进了两法里并到达了一片客栈,另外两名神父正在那里等待他们。正当可怜的伍神父迈进房间的门坎时,他便疲惫不堪地倒下了。大家把他抬到了一张床上,他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便在其两位朋友的怀抱中咽气了。这该多么悲惨啊!不是吗?但对于如此离开本世的灵魂来说这又该是多么壮丽啊!在我们传教区又多了一名殉教人。”

7月28日。尚活在人世间的两名教师于昨天晚上来到了道台衙门,他们都打着赤脚,勉强地穿着一件衣服,几乎因疲劳和饥饿而快要死去了。因为沿途的人不愿意卖给他们大米,过去曾保护过学校的士兵们也受到了相同的遭遇,但值得幸慰的是,巴县的营勇什长于27日前去抢救我们的设施,差一点死在路途中。他必须使用计谋和征用(但付款丰厚)了一家孤立的农舍,以让人为他及其手下的人煮米饭。这样的耽搁使他未能按时到达。在距学校有两法里远的地方,他获悉人群刚刚作出妥协让步,于是便匆匆忙忙地原路返回。

神父的尸体可能已被用一架梯子一直抬到了重庆的基督教墓地,当地的民团不希望允许将他埋葬在一片作为教产的土地中。这位尊敬的教友就这样未作祈祷、未举行任何仪式地被安葬了。

八、官吏和缝纫机的故事,吃葡萄园中葡萄的乐趣

8月13日。一名天主教徒美国人——一家美国商社在重庆的代表写信告诉我说,由我订购的缝纫机已经到货。这是为那名武官购买的东西。我通知了此人。他立即派来两名营勇携货价以及我们已垫付的所有费用22两(共176法郎)前来。这是一个自信无所

不能的精明中国人，既无资料，又无师傅，便学习使用机器。他蹬在机器的踏板上……但却折断了一根针。他又装好另外一枚针，这一次以手转动了飞轮……另一枚针又被折断了。他迫不得已，只好前来找我并恭恭敬敬向我叙述了他经历的意外奇遇。

我对他说：“那么您为什么不亲自去取机器并利用这一机会而向白先生（梅白，该美国人的汉名）咨询某些情况呢？或者至少是借口看一下机器状态是否良好而让他亲自操纵机器呢？……当我们正等待着和平的到来时，我于是便邀他赴敝府，然后再一起到道台衙门去。在那里可以让他面对我而工作一段时间，这样您就可以熟悉机器的用法了。您的天资很聪明，我对此深信不疑……但你应该看到，任何职业都有其师。”

他于是便开始微笑。对于他来说，从我这里获得的任何信息或观点都如同出自一位朋友一般。他是回民，而该地区的伊斯兰教徒们都喜欢与他们称之为“教亲”的基督徒们友好相待。

他接着又向我叙说，有人刚刚向他推销了一部已经使用过的缝纫机，只索求 17 两。如果他早知道此事，那么他就不会采购新机器了。我于是也想到了新教徒们可能有两部缝纫机，但我也在思考这些机器可能是抢来的。该官吏对于买了一部如此昂贵的机器仍感到非常强烈的遗憾，他本来可以基本不花钱而得到一部。因为占有被抢来物品的人总会感到害怕，肯定会以一两银子（8 法郎）而出让它。我对于如此幼稚的表现出来的诚实哑然失笑……

8 月 16 日。我最终可以吃到我那葡萄架上的葡萄了。味道真鲜美！接着便可以吃我那果园中的无花果。这后一种果实刚刚在该国中为人所知。中国人采摘其尚未成熟的青果，而且就如同对待他们的所有水果一样，当发现它们无法吃时，于是便将它们作为药材而出售给药店老板。此外，这种树并不被认为是很罕见的。作为

一名典型的普罗旺斯人，我非常喜欢将一株低矮的老无花果树移植到大田中，因为它自 15 或 20 年以来在一个小花盒中已经枯萎了。我现在已经有了 5 棵能够产 10 棵树一样多果实的漂亮果树。

昨天夜里，一名乡坤刚刚前来拜访我。他是 1876 年的一名老牌打教人，现在似乎是已经转而赞同与这种宗教保持最佳情感了。他向我暗示说我可以毫无困难地返回自己家中，他希望陪同我前往并要向我学习，在这个小房间的生活过分艰难了……我回答说他完全有理，我完全赞成他的看法，但……我要遵循我的主教长上的命令。

顾巴德主教阁下确实曾多次命令我在道台衙门中一直停留到审讯结束。虽然又恢复了平静，但大家仍然害怕有人会利用这一机会而作出反应。

8 月 17 日。清晨出发赴重庆的那位官吏于下午 3 点半钟返了回来。他刚去拜见了 6 天前到达的新道台。在从轿子中出来时，他返回头去招呼其“门长”。当他在等待时，便以手指巧妙地擤鼻涕。这与他那华丽的服装该是多么不相配啊！但请您不要嘲笑，这是一种很大派头的表示……中国人认为那种使用一条手帕然后再珍贵地装入口袋中的欧洲习惯是不干净的或肮脏的。

九、开始大考，武童会试

8 月 29 日。由于来自京师的大考官害怕混乱，所以便匆匆忙忙地于他到达的翌日，在发布一道这样草拟的告示之后便开始审判了：

“本人不负责基督徒们的案件。但如果有人试图制造任何一点骚乱，那么我将立即停止考试并前往另外一个府中去。这样一来，你们就会失去顶子和官爵，而且还可能会持续数年。”

大家都将此视为约定俗成，一切都始终显得很平静。此外，那

些官吏们这一次表现得更加谨慎。他们将全部营勇都武装了起来，或者至少是将他们都召至兵营。由于沿街每隔 10 家店铺便有树木。因此，大家也便将各住宅区隔开的路障数目增倍。这些路障甚至于白天也都始终关闭，仅在中间留下了一个小洞作交通使用。这个洞口也由两名衙役看守，于夜间再加派一名军官设防。这一切都发生在重庆，我们本处却平安无事，就如同我们是置身于 100 法里之外一样。

我将针对大考再略讲几句话。

仅仅允许那些已经在县和州的相继会考中获得了良好证书的投考人进入考场。考试文章开始于夜间 10 点或 11 点钟，一直到次日中午才告结束，主要内容是针对取自经典著作的某项内容，写成 800—1000 字的一篇精湛的文章。然后是那些在各地写文章获取第一名（其总数徘徊于 8~18 人之间）者于数日之后前来面对大考官而写一首小诗，也就是一首六—八句的合仄押韵的诗。若经过这第二次考试而又无过多的错误，那么被接受参加这种考试的举子们的名字都会被张榜公布在“龙虎榜”上。他们于是便成了进士。

武科场上的考试是由“比武”开始的。每位武童都轮流出场以比赛骑马沿 50~60 步长的一条小路奔驰，这条小道形成了一条壕沟的底部，它宽 4 法尺，深 1 法尺。在这种快速奔驰中，青年举子应该连发 3 箭。在壕沟的左侧（距沟缘仅有 3 米）处的桩子上每 15 步都挂有 3 块箭靶。接着是在考场原地的表演，这一次是步行射箭。首先是在 30 步远的地方向一个宽 2 法尺的靶子连发 3 箭，然后将一支重达 120 市斤（约为 90~100 公斤）的长矛（带有矛刃和大块铁的矛杆）至少举到膝盖的高度。其中有些人为了自我炫耀而缓慢地使之围绕其胸部、背部或者甚至是头部旋转。然后是每个人都应该拉开一张张起来力量很大和弛下来很硬的弓，但并不射箭。最后

是以一只手举起一块 50~60 斤的石头,许多人仅仅是装模作样地触及到了它。12 或 14 名高度成功地完成了这些表演的武举子只需要接受一种考试,而且还是无关轻重的,这就是抄一页文字。为此尚需要让一位邻居捉刀。

十、城隍神的出巡仪式,游商,一个令人烦恼的夜晚

8 月 30 日。今天有城隍出巡仪式。官吏不屑于参加这种仪式。为了取代官老爷,一名衙役(包衣)要前去取代他,在一个始终供于二堂公案左侧的箭囊中取一支箭,这支箭要沿其长度而用一条彩纸包裹(令箭),在出巡仪式中间捧着它。在大门上用三声炮响向它致意,它就如同是官吏本人一样。在半个小时之后回来时又是同样的欢迎礼仪。

那些不分日夜地经由我窗户前的游商的叫卖声更有意义。但我却看不到他们,围墙把我与他们阻隔开了。在近两个月期间,这些叫卖声(其中有许多确实悦耳)、其次是一种曼陀林声和一种提琴的乐声,每天还有两个瞎子和算命先生的叫声都在我耳边游荡回响,但这些声音对于我却是一种真正的消遣娱乐。我模拟他们并且可以为您作一场表演(可持续一小时的性格喜剧)。

8 月 31 日晚 4 时。我再也不能坚持下去了,现在简直快要被闷死了。我试图前往衙门的花园中去呼吸新鲜空气。唯一一块多少有点新鲜空气的地方是一个只有 6 平方英尺的平台,但它却恰恰被在那里视察供明天审判用房间的官吏所占据。因此,我被迫留在花园之内,那里如同是位于四壁间一口井的一块方形封闭地,每侧都有 18—20 英尺高,其中有 30 多棵小树,另外还有 4—5 棵既无花又无果的树,它们都因热浪和干旱而快要枯死了。在一个角落中有一朵鲜花正在绽开,这是睡莲,仅有一朵开放。在花园的深处,有一个糊纸窗户占据了整个一侧,正好阻挡了为略透一点空气和

光线而留下的一个小洞。这是一间多么奇怪的亭子啊！没有一件家具，没有一个座位。由于闷热和缺少空气，我简直就要闷死在那里了。

我于10点钟时回到了我那间陋室。我无法呆在自己的蚊帐中，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蒸缸。为了忘却闷热酷燥和百无聊赖，我便着手读完一部我在20多天之前就已经开始重读的长篇著作，也就是《三国演义》。这是一部中国人认为在文学性、趣味性、伦理和民族气节方面都首屈一指的著作。在文学性和趣味性的长处是可能的。至于其它方面，我仅满足于向您指出，这部历史的背景是一系列从未间断的背信弃义、撒谎成性、口是心非、装愚作傻的诡计、暗杀和其它真实的波折突变的故事集。而且它也被作为中国人生活的背景。

十一、在我的家中，出发，受欢迎

9月1日。我必须离开这里出去了，实在是无法再忍受了。很长时间以来，主教就既不命令我也不禁止我停留在这里了。此外，在重庆，一切都恢复了平静。我秘密地出发，以便在城内尽可能少地有人知道我返回住处了。

9月2日。我最终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和僻静的芬芳。我确实是长时间地遭囚禁，至少是被囚禁在我的住处。昨天晚上约9时许，我即将与官吏就我返回的问题达成谅解。他非常客气。

由于司铎已经秘密离开，所以我认为不会再有麻烦了。此外，以过三四天的休息之后，他若有任何一点小事便可以随时返回来……无论如何，我非常希望他能经常前来看望我。

我把自己的文献(书信、札记等)收进了一个小包中，带上了自己的钟表和念珠，穿上了我那件用深蓝色罗制成的袍子。现在已经11点钟了，店铺的所有灯笼均已熄灭，我们可以出发离开这里了。

你们可能认为我会于最忙的时间从小修道院的正门出去,以让人看到我如此警觉和如此高兴。我将向“门长”告别,他在一个中国人那里非常友好地拥抱了我,我便从小门出去了。经过行走一刻钟的路程之后,我们最终到达了。我们的人全都在住处睡了,包括药剂师、神职人员、司库、厨师和顾巴德先生的仆人。该主教自一个多月以来更喜欢我的住处而不是道台为主教指定的贫民窟。我的那只公狗高兴地欢蹦乱跳,但可惜的是我的那只小母狗却未出现……它在傍晚时被埋了。我觉得自己的房子宽敞得就如同一座修道院。但今晨醒来时,我觉得自己的小花园该是多么诱人啊!……我的喷水池比其它任何时候都更欢乐地喷出了如同金针般的三道晶体花絮。我的葡萄树的幼苗以它们的三个漂亮棚架的青枝绿叶争相覆盖,从而为我提供了一个休息和乘凉的蔽阴处。几朵经受了三伏天酷热的鲜花向我微笑,我自认为是置身于人间天堂中了。

9月29日。任何复仇的谣言于现在都停止了,风暴已经过去,又重新恢复了平静。重庆的官吏和从7月中旬就已经前来的四川护督的两名特派员都试图与顾巴德主教妥协。新总督正在赴任途中,他必须经过重庆并就此问题充任钦差。他已受命为我们辩护。法国公使也积极地负责处理此事,龚思当(Constans)先生曾向我们的司库保证他将利用其忠诚和毅力而圆满地结束这一切。

广东宗座代牧区的综合报道^①

传教士们于一段时间内由于法中战争而被从他们的住院中驱逐出去了,近两年以来,他们又得以在整个中国重新恢复他们那已被中断的事业了。但是,如果说中国当局现在于许多县,特别是在

^① 译自《传信年鉴》1888年,第60卷。——译者。

诸如广东那样的远离京师的省份中，正式同意给予基督徒们保护和帮助，那么异教徒们的仇恨却并未被消除，而且还完全可以不受惩罚地制造殉教事件。大家将要读到的一个令人赞赏不已的故事便是一种明证。

巴黎外方传教会赴广东的会士弗雷罗的书简^①

对基督徒钟洛朗(Laurent Chung)的屠杀

在白溪附近的所有家族中，最仇视基督教者毫无异议地应是钟氏(Chung)家族，该家族共包括分散在 30 多个村庄中的数千人。在 1884 年 9 月间的大瓦解时期，该家族便为抢劫而独自提供了多达数百名的受征募人员。在这批人之中，有一个来自白杭唐村的人，名叫钟代旺(Chung Toi-wong)，他将其木工与巫师的职业结合在一起了。这次出征使他得到了几本他对之评价很低的宗教书，同时还产生了一种他很快就奇怪地深受其苦的魔鬼附身的现象。他不停地受此折磨，只好去请教烂泥塘(Lang-neu-tong)村的一名基督徒，此人向他保证，只要他同意受归化，便可以治愈他。

为了使他这样做，再不需要做更多的事了。他于是便毫不耽搁地学习他偷来的那些书，接着又学习给他出主意的基督徒借给他的那些书。这些读物促使他产生了信仰并从事祈祷。从他进行祈祷的那天起，魔鬼便停止骚扰他了。当我于 1885 年返回高州时，他立即前来请求我将他列入望教者行列中。从这一天起，他就不会放弃基督教小教团的任何宗教活动。

他的望教者的身份可能为他招惹了许多麻烦。其亲属们过去都以其中不包括任何基督徒引以为荣。当他的来往活动不再是一

^① 译自《传信年鉴》1888 年，第 60 卷。——译者。

种秘密时，大家便群起而攻之：“他这样不停地前往龙窝干什么呢？过去尚从未有过一名钟氏基督徒……他是否有胆量成为第一名基督徒呢？”

代旺回答所有这些人说：“您们能够保证魔鬼不会再祸害我吗？”

“不能……但归根结蒂……”

“好了！我将继续祈祷。如果必须死的话，那么我更希望作为基督徒而死和前往天堂，而不愿意被魔鬼窒息而死。”

在1886年8月15日，我为此人举行了洗礼并取教名洛朗(Lanrent)。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充满欢乐的日子。从此之后就如同过去一样，虽然他居住在两公里多远的地方，但他始终都是第一个进入小教堂的人。他一般都是于黎明时到达。大家本来可以说，星期天的弥撒从来不会开始得很早。他脸上容光焕发，祈祷对于他来说确实是我们圣经中所说的“审判宴”。在整整一个星期间，他不停地重新考虑他设法更好地理解的主要信条。

然而，其亲属们继续以不信任的目光盯着他，仅仅由于害怕在官吏那里制造事端才确定了其恶意。但他们却不放弃任何机会向他表示其憎恶和恶意。在12月间，其地主收回了过去租给此人的土地，而又未向他退还本处所有佃农都要提前交纳的保证金。

在4月间，终于策划了一场会导致其死亡的阴谋。在这一时期，广东总督仇恨基督徒们的情绪对于所有人都已经不是一种秘密了。钟氏家族的人认为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为所欲为了。因而便决定将洛朗抓起来并解到先祖祠堂里，面对集中在那里的全族人，勒令他背教。如果他拒绝背教，那就要被关在地牢中和被淹死。

但大家还是希望不要被迫采取这种极端措施。钟氏家族的一名异教徒于数年前就曾表示过接受归化的愿望，但在威胁面前却

屈服了。代旺同样也会让步。所以这一切都是在严加保密的情况下完成的。洛朗对此却已经有所耳闻,他曾多次对其族人说:“当你们采取你们的措施时,千万别忘记通知我,以便我能举行告解和得以安全地升天。”

5月15日,在耶稣升天节的前夕,他来到了小教堂以作告解。我的邻居安舒(Agni-Shuk)对他说我不在,他必须等到圣灵降临节。他未作强调而仅是边讲这样一段话边离开而去:“不过我本来很希望做告解,因为我对一切都预料到了。我将在5月末或6月初,最晚也是在7月间死去。”

他的预见可能会实现。

在中国,有一种习惯,即每年向每个家庭分配先祖祠中收入的某些钱。这种钱财应于6月初分配给钟氏家族的所有人,大家决定拒绝把洛朗应得到的那一份分给他,从而将利用他提出抗议的机会而抓获他。

6月10日是白溪的集日,梅菴附近的温东村的乡绅钟喜尚预料洛朗会来找他,于是便让5—6个以其体力而非常著名的人士陪同他,而且还有意地让他们过量地饮酒。

洛朗之兄也通过一些朋友获知了这一情况,于是便劝告他留在家中。

他回答说:“罢!如果他们决定了我的死亡,那么我就无法逃脱他们了。最好就是于今天死。”

他于是便前往钟喜尚习惯于呆在其中的店铺。他刚一提出这一要求,钟喜尚就令人把他绑起来。那些已经准备就绪的刽子手们立即扑向他,以拳脚而争相袭击其头部、胸部乃至全身。

喜尚咆哮着说:“背弃基督教吧!”他同时又以其中国烟锅敲打此人的头颅:“那样大家便会把属于您的那份给您。”

洛朗回答说：“我决不背教。如果您不把应归于我的东西分给我，那我就将放弃它。”

他于是便向观看这一场面的几名老人交谈。

“有些人以其行为而有辱于我们的族人，但大家也未曾拒绝将应分给他们的那一份给予他们。为什么要拒绝分给我属于我的那一份呢？我从未曾行窃，始终都行为端正。我是基督徒，果真不假，但没有任何法律禁止基督徒。”

正当发生共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的这样一幕时，洛朗强忍自己不大打出手，而他本来完全可以自卫，而且其体力也远胜过我。次日，他讲了这样一席话：“我确实非常想打他们，但我想起了上帝的十诫，故丝毫未曾那样做。”

异教徒们非常仰慕地发现此人没有发出叫声，也未听到他的呻吟声。经过这一场面之后，又有人如同对待罪犯一样绑住了他的双手，把他推向了集市的外面的以重新拷打他。其弟前来为他说情，喜尚让他答应次日将此人押往先祖祠堂，族人应在那里集合而对他作出宣判，然后又让人事先将他重新押回其住宅。但我们的新教徒却未以如此的方式来理解事态的发展。

他说：“你们将我置于了一种我永远无法痊愈的处境。我呆在自己家中能做些什么呢？你们应将我治愈或者是结果了我。我要求大家从今天晚上起就把我带到先祖祠堂中去。”

喜尚同意了这种要求并从他手下的那些游手好闲者们中间选择了一个人，此人以挣一笔钱为报酬而时刻准备做所有活计。

在从白溪集市走出来之后，有一条长 20 多阶的石阶，一直通向一座小桥，河水从桥下潺潺流过。洛朗双手被绑着而行走，头向后仰并被捆绑在后面，所以看不见小桥，既无法自我控制，又不能以任何方式缓和其跌落的速度，自上而下地直接坠落地面。在由两

块并排木板组成的桥面上，他又失足而落于水中。其押解人以残酷的幸灾乐祸先让他在水中挣扎了一段时间，才帮助他站起来。

洛朗与其说是活着还不如说已经死去了，其面部和身体令人毛骨悚然地肿胀起来了。他在从白溪一直通向位于龙溪之南2公里处的马跑的路上步履蹒跚地行走。

在波头村附近，他认出了一名在路边劳作的基督徒并向他搭上了话。“代旺！”那位基督徒于是便对他说，“要永远记住我主耶稣——基督。”

“我将记住，”洛朗于是便对他说，“请告诉神父和我的教友们别挂虑，我生生死死都将始终是基督徒。”

又走了不远，他遇到了其姐姐的儿子，此人同样也是基督徒。他嘱咐此人说：“去告诉我的妻子，他不必因我而感到悲伤，她应该好好地耕其田和安心地抚养其孩子们成人。”

丝毫不了解这场阴谋，根本无法相信有人将对他发动最残酷的迫害。6月11日天刚亮，我派了他的外甥前去看望他，询问他，使他知道以后将会有危险。

洛朗先生立即对他说：“是神父派你来的吗？”

外甥回答说：“是，他希望知道您的处境如何并嘱咐您多作祈祷。”

“我昨天夜里整夜地祈祷。疼痛使我无法入睡，即使是小酣片刻也罢。现在，我已经无法站立起来了，我成了一个彻底完蛋的人了。当他们将来释放我时，我也必然会由于伤势而死亡。”

我从此之后便清楚地知道，当他到达祠堂时，有人向他送上了肉、蔬菜和葡萄酒。他拒绝了肉。“今天是小斋日，那里有一枚完整的鸡蛋，我不敢触动它。”他吃了蔬菜并喝了几口葡萄酒。

他继续说：“由于我的酷刑尚未完结，因而必须恢复体力才能

坚持到底。如果我万一意外地昏迷过去,那就会有人说我缺乏勇气……在此人世间有许多成名的方式。”他又补充说:“偷盗犯也有他们获取名声的方式。至于我个人,我则希望如同一名基督徒那样获取名声。如果继此之后有天堂,那么这一切就算不得什么了。”他在一段时间内对于刽子手表现得很严厉。“难道他们应该使我处于这样的境地吗?我的可怜虫们!我将对此永不表态。”

此外,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表现出任何狂怒。

当此人正准备吃饭时,其外甥离开了他。他仍然如同前一天一样和出于同样的原因,拒绝吃猪肉,仅满足于蔬菜,他吃得毫无胃口,又喝了一杯葡萄酒。他的年轻妻子和孩子们于此时都坐在其席子的旁边。他招呼他们并且非常冷静地告诉了他们一些重要情况,告知了各地所欠他们的帐、他本人也欠下的一些数额不大的债务。他将其钱包交给了这些人并要求他们立即离去。

此时出现了一个令人撕心裂肺的场面。其妻子和小孩都拒绝出去,蜷缩在席子上并发出了呼天抢地的叫声。洛朗在一段时间内显得不耐烦了。“回家去!离开我!我只能活很少一点时间了。我需要这点时间以作祈祷。”

所有这一切都讲得很突然,我认为这是为了掩饰其激动情绪,因为他是一个仁慈的好父亲。那些忠实的异教徒们给他身上披上了破衣服,对此表现得非常愤慨。

现在是上午10点钟。在白溪吃过午饭的打教人群来到了祠堂。大家想把他关在笼子中以投入江河,这种笼子已经完全准备好了。这是他们事先预订的,共付了200枚铜钱。这群刽子手中的为首者是一名武秀才,也就是钟喜尚的侄子,如同他一样也是惠东人。正是此人作了发言。他俯身于席子上并手握他准备用来打此人的鞋子。他向洛朗吼叫:“你要背绝基督教。”

洛朗回答说：“不！我永远不会弃绝基督教。”

那个疯狂之徒敲打着洛朗的头颅又重复喊道：“你要弃绝基督教，否则将被抛入水中。”

“越早越好。你们越是将我淹死得早，我就越会更早地升入天堂。”

“您应该前去敬祖，我对你说。”

“我尊敬我的先祖，但我对于你们的木灵牌没有任何崇拜。”

“但你却必须拜跪在它们面前。”

讲到这里，大家迫使他站立起来并将他拖到成排地供奉着先祖灵牌的祭坛之前。大家企图迫使他下跪，但洛朗仍忍着疼痛而巍然屹立。

“让我跪在上帝面前，我完全乐意这样做。但让我跪拜灵牌，则永远办不到。我已曾过多地崇拜过魔鬼了，它从此之后再也不会得到我的任何东西了。”

如同冰雹般的一顿棒打。喜尚的侄子巴山(Pa-shan)气势汹汹，用力地向其肋部踢了几脚。洛朗一时一刻也未失去镇静，他对于每个问题教以非常自然的口吻回答，有时还带有一点狡黠，使其解释中夹杂着每次动作的痛苦让他产生的抱怨声。

“钟氏家族共有近 4000 多口人，只有我才有最好的造化。”

“什么？”

“因为我即将升入天堂。至于你们这些人，你们在死亡的日子将坠入地狱。”

当他受刑一小时之后，大家又重新把他带回席子上。此时此刻，他让人看起来便会感到不寒而栗，再没有人的面庞轮廓了。从其肿胀的身体上落下了成片的碎肉。其右臂已经失去知觉，有数根肋骨被打断了。

继暴力之后，便轮到诡计了；继刽子手之后，便轮到假朋友了。他们一批接一批地轮番前来恳求他讲一句话。

“承认你不再崇拜天主，大家便会释放你。大家甚至还同意送给你 2000 文钱以去买药。”

洛朗回答说：“永远不可能。”

其妻子也加入了假朋友的行列，但这也并未能更多地打动他。他手中紧攥着珍贵的圣母圣牌，这是其洗礼的圣牌。

某人说：“如果大家夺去他的这块圣牌，那样也可能会成功地使他屈服。”

“试一下吧！”另外一个声音回答说，“他宁可死亡也不会放弃圣牌。”

大家留给他一段缓解的时间。他利用这段时间以重新开始他从未间断过的连续祈祷。

但他的那位仍为异教徒的妻子却奔向了住院。

她对我说：“神父！大家只要他讲一句话。请您告诉他作点让步吧！他会听您的话。”

由于我反驳她说，这是一种不可能的事。她于是便狂怒不羁地吼叫：“是您唆使他成为基督徒。如果他死了，那么您就应该养活我们，养活我的孩子和我。”

乡绅钟喜尚是我的一个老相识了。在 1884 年的大抢劫时期，作为一名乡绅，他竟然也偷走了我祭坛上的一个十字架。在此之前，他曾在白溪对一名基督徒说过：

“告诉神父，代旺的事绝不涉及宗教。此外，我将亲自前往马蓬，以就这一问题而去看望他。”

就在这一天，他于祠堂中写一封并未寄给我的信。我派去了自己的传道员和一名基督徒以要求他作出解释。他们受到了很不友

好的接待，大家拒绝让他们进去。喜尚最后出来了，他回答说我必须保持平静，他们起诉的是代旺而绝不是其宗教。

当时在祠堂中及其附近有数千人。某些聚集在门口的妇女哭泣和请求宽恕。我自此之后便知道已经采取了某些措施，以便在发生基督徒们攻击的情况下击退之。

然而，族人变得越来越不太苛求了。对于洛朗来说，现在已不再是真正弃绝基督教的问题了，而仅仅是简单地要求他放弃这种宗教，其目的就在于避免族长的一次失败。次日，他即将自由地返回经堂去了。

洛朗回答说：“如果我说自己放弃了宗教，那我就是撒谎，我绝不会扯谎。”

大家又强调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您明天就可以重新开始祈祷了。”

“真的吗？……难道你们那些人能同意今晚放弃晚饭吗？”

“不行。”

“那好了。至于我个人，我更主要是不能放弃祈祷。”

大家又说：“那到底是为什么呢？”他们几乎始终是这样翻动着嘴唇。

某一个人说：“他疯了。”

“他正在背诵其祈祷经文。”另外一个人补充说。

族长们对于制服洛朗的抵抗已经感到失望了，于是便令人带来了笼子。洛朗的妻子匆忙起来以阻止其丈夫。温东堡的一名乡绅粗暴地对待她并最终把她拉开了。

洛朗于是便跪在那里并且双手揖合地祈祷。当他做完这一切之后，他便全身着地地躺在那里，自动进入了一直到其双肩的笼子，然后又对围观他的人说：“帮帮我吧！我自己永远不能进入其

中。”

大家把他推了进去。那个圆柱体形状的笼子长4法尺多一些。他的身体于其中只能入到膝盖以下。4条身强力壮的汉子抬起了笼子并将它抬到了距河流有50多米处的岸边。

现在已经是近3点钟了。殉教者那肿得令人害怕的嘴唇继续在默默地蠕动。其手中抽搐性地攥着带有圣母像的圣牌。其外甥俯下身来并对他说：“我的舅舅！您还记得神父的话吗？”

“记得。”他回答说。

某人询问他：“神父还有什么东西给他吗？”

洛朗接过话头来说：“没有了。如果我病在自己家中，那么他就会为我举行临终敷油礼的圣事。但在这里，他无法给予我任何东西。他在为我祈祷。”

但其朋友们又重复了他们的坚决要求。

他断然回答说：“永远不可能，我永远不会弃绝宗教。”

他向俯身到其面前的外甥诉说：“如果我返回自己家中，那么我同样也会因此而死去，从而一举失去了我的身体和灵魂。”他又补充说：“如此坚决恳求又有有什么用呢？用脚踢我一下吧，这样就会使一切都结束了。我不会责怪你，我非常乐意地忍受这一切。”

他到达那里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受到了一部分人的喊叫声和另一部分人的恳求声的纠缠，他已感到缺乏毅力了。这是一个新的圣·依纳爵(Saint Ignace)。他于是便开始催促那些尚犹豫不决的野兽般的人尽快吞噬他。

他说：“如果族长们没有勇气结果我，那么他们就不是人。”

但一种新的友好劝说活动又顽强地重新开始了。现在已不再是指背教问题了，而是指承认他对于乡绅们缺乏尊重。

其外甥已将他的恳求与其朋友们的要求结合起来了。

洛朗说：“对于这一点，我可以讲几句话。但其条件当然是我不背教，因为无论是生还是死，我现在和永远都是基督徒。”

他以这种形式请求的原谅未被接受。族人仍希望他背教。同时，在那些曾接受行使刽子手职责的人中，有两个抬起了笼子并它抛入了水中。当第三个人用一条绳子把它拉住以阻止它漂流时。武装以长竹竿的第四个人却把它按了下去并按在河中。正在这个使所有人都感到异乎寻常的时刻，水始终是完全滞流不动了。那名手执绳索的人颤抖了一下，洛朗便突然一跳，笼子脱离了竹竿而又重返水面。大家再次把它沉入水中，于是便出现了一个细微的漩涡，洛朗的灵魂得到了拯救。

1884年9月，钟喜尚曾经说过：

“钟氏家族中没有一名基督徒。如果我们中有某人万一突发奇想地打算受归化，那么我们完全会阻止他这样做。”

上帝听到了他的挑战声，他们之中的一个人确实要求受洗并确实领洗了。

1887年6月11日，在洛朗死后，钟喜尚可能还说过：“钟氏家族中有过一名基督徒，我们刚刚淹死了他。我们将密切的注视着是否还有另外一个人敢于受归化。”

上帝肯定听到了这种新的挑战声音。愿上帝垂顾接受这种挑战，赐给我们一些无愧于洛朗的望教者吧。

望教者和殉教者^①

下面这封也是由沙得容(Chatagnon)主教转递的，李锡尔(Boucheré)神父于其中叙述了圣宠的这些胜利之一，它在宗教的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62卷，1890年。——译者。

衰弱时代尤为显得卓越。这里是指中国人非常鄙视的可怜修女之一，大家都认为其生活没有任何意义。

巴黎外方传教会赴川南传教区的传教士李锡尔
(Boucheré)的书简

在紧傍荣县城的地方，有一个莫氏新基督徒的家庭。他们都虔诚和狂热得如同优秀的新教徒一般，不肯放过任何机会将他们从上帝那里获得的信仰之恩赐物传播开来。某一日，他们的远房亲戚——居住在山中很远地方的一名叫作黛(Táy)的女子为办事而进城来了，于他们之中休息了一段时间。他们于是便根据自己的习惯而向她布道。这次是种籽落到了一片良田沃野中了。信仰已经深入到了这个生来就很正派的灵魂中了。由于未遇多大障碍，所以她也未费很大力气。她如同这些山区的大部分居民一样既无知又是文盲，她通过莫氏之口而获悉了教义必不可缺的内容。她的心可能会取代了其余的一切。

婶母和侄女

一旦返回其家时，她所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于其周围传播她非常出乎预料地获悉的好消息。如果说她遇到过冷淡和甚至是反对，那么上天却通过其侄女——一个 19 岁的少女的归化使她受到了鼓舞，该女孩已经订婚，而且就在结婚的前夕了。婶母与侄女二毗邻相居，她们几乎每天都可以见面，可以随意交谈，互相学习和鼓励。侄女很快就学完了其婶母的全部教义宝库：十字架的标记、天主经、圣母经和信经。至于上帝的十诫，她对它们的运用要比念诵好得多。至于基督教的信德、希望和爱德这三德，她则以其自己的方式表述，其生活很快就可以用实际行动来表述这一切了。

第一次教案

打教事件在开始时确实是秘密的,后来才变成公开和激烈的教案了,这场教案很快就在她自己的家中爆发了。其兄弟和母亲认为,她放弃偶像崇拜而敬仰看不见的上帝的作法很坏。可怜的姑娘啊!她本来完全可以由此而扬名。但其未婚夫将以什么目光看待她的这些行为呢?大家于是便决定结束这一切。首先,严格禁止她与其婶母的任何交往。后来,大家都试图以虐待而阻止她独自于其家族内随心所欲地从事怪癖活动。由于她们无法获得成功,所以便匆匆忙忙地决定,以把她送给其未婚夫而最终摆脱了她。

天啊!如果可怜的姑娘怀着从其丈夫处获得的更多自由的希望,甚至是怀着归化他的希望,那么她却冷酷无情地失望了。她嫁入其中的新家庭要比其父母更为仇视基督教的名声,这都是一些可悲的山人,愚昧无知和头脑简单。尤其是当婆母发现其儿媳是女基督徒时,便大发雷霆,怒不可遏。从此之后,婆母与其儿子(可怜女子的丈夫)便动用一切手段以迫使她背弃其信仰。她们寻找一些鸡毛蒜皮的借口来辱骂她和殴打她。

当然,女异教徒的生活是艰苦的。愿在所有地带和所有国家都有人甘心过这种生活,唯有在基督教已渗透于其中并改变了其风俗习惯的地区例外,到处都是甘愿接受苦厄和耻辱的人!对于其双亲来说,她简直是一种羞耻,他们经常都希望即使冒杀婴罪也要摆脱她这一种包袱。在其夫家中,她又是一个受气包,一个女奴,要比驮兽受到的虐待更多。大家都不知道这是否就是那些希望使该女子摆脱基督教的人描绘的美好理想,他们也确实是倾向于这样做。如同我们一样,大家必须活着,我于此不是说生活在蒙昧人中,而是生活在于基督教之外而达到了高度文明的中国人中,以便判断一下宗教的天堂之福是何等荣耀和对人类何等有益,摆脱这种宗教又该是多大的灾难啊!

然而，我们这位可怜的望教者腹中已怀有其婚姻的第一个果实了。其丈夫的心是否会软化呢？情况远非如此，在唯一能煽动起许多冷酷和残暴的魔鬼的煽动下，他继续虐待其妻子，拒绝供给她食物，强迫她睡在潮湿的光地板上。这样一来，她就比预产期早产了一个带有其母所受苦厄之明显标记的婴孩，这是一个男孩。为了孩子，丈夫稍微放松了一点其严酷的态度，以看一下可怜的母亲是否能康复，婴孩是否能活下去和变得健康一些。他允许母亲和孩子于其家庭中略作一点休息。在此期间，她最喜欢的人就是其婶母的女伴，唯有此人才可以理解她、安慰她和鼓励她。她非常需要此人，可怜的女子啊！她在特别长的时间内因其信仰而受苦，无法看到其灾难的尽头。

然而，其双亲丝毫不原谅她在基督教方面的顽固态度。其兄弟们也指责她，要她对其个人的灾难以及只会对其家庭带来耻辱和麻烦的一切独自负责。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还禁止可怜的女子与其婶母有任何交往。两名望教者必须使用计谋才能互相见面和互相鼓舞。一个小女孩充当了她们之间的联系人。她们白天必须避免相遇，但在夜间却尽量设法在婶母家中见面。因为婶母更为自由一些和被监视得不太严密。少妇的父母们被这种表面的驯服欺骗了，他们略加缓和了其严厉态度，而且还向她显示出了一种略微温和的面色。

在苦难中的英雄行为

天啊！打教事件的这次间歇为期太短了。有一个曾由婶母秘密为之举行洗礼的病孩刚刚升入天堂。听到这一消息之后，丈夫感到其全部仇恨又都复燃，而且也再不受任何羁绊的束缚了。他于是便奔向城市，竟然以真正罪犯的罪名起诉忧伤的母亲，指控她犯有杀婴罪，为了这一事实而要求与她离婚。离婚！可怜的望教者盼不

得地希望如此。难道仅仅一个女子的愿望在中国就能算数吗？难道她甚至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吗？其双亲都被丈夫的指控激怒了，离婚是对全家的一种侮辱，于是便决定反对他和在这场案件中上诉。现在，这个可怜的女子被押到了荣县城，在那里居住在一家客栈，她感到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孤独。她在那里找不到任何能讲知心话的可信赖的人，她于是便想到了派人去寻找她非常敬仰的神父。

现在已是7月间了。我于是便前往距那里有12法里之远的盐井。次日，我便急忙跑去看她。我首次看到了我那羊群中的这只可爱的母羊^①。我过去仅仅听人讲到过她及其苦难。可怜的女子啊！请看苦难和忧伤于其面部留下了多么明显的烙印啊！其瘦弱的身体该表现出了多大的悲痛啊！她的语言显示了圣宠的作用，也正如在信仰和本性之间展开的可怕斗争一样。她对于自己为宗教而受的苦丝毫不抱怨，但她认为自己已经精疲力竭了，怀疑她在未来还能坚持到什么程度。所以，她由衷地希望离婚。

她对我说：“神父！如果我回到我丈夫家中，那么那里又该有多少新的和残酷的苦难在等待着我啊……他们将会打我，也可能会杀死我……”

这些人使我的心都碎了，因为我发现她的预感是有充分根据的。但又该如何办呢？虽然她的亲属们始终都是顽固不化的异教徒，而且也多少似乎有些软化，从来都不打扰我们的谈话，但他们是怀着我将会帮助他们支持其官司的希望才这样做的。他们无法理解会有人支持离婚，甚至也不希望听到别人谈论这件事。由于我不能以任何身分介入这场诉讼，所以我让它随其自然地发展吧。我用了两三天时间准备我已经预料到的祭礼需要的宰杀牲畜。我向

^① 指牧师的虔诚基督徒。——译者。

她布讲受苦难的伟大表率我主耶稣——基督,以及在所有斗争中都帮助他的圣母。那位官吏最终作出了我所预料的那种判决。

那名可怜的女子哭泣着前来对我说:“一切都完了,神父,我已被做出了判决,现在必须返回我夫家中。我的双亲抛弃了我,但神父您却没有抛弃我。以您的祈祷、建议和一切可能的帮助手段保佑我吧。”

从此之后,确实很容易预见她的命运。与其丈夫的任何调和都是不可能的。此人除了对宗教的不满之外,又发现增加了一场败诉的羞耻。他可能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愤怒地迁怒于其妻子。会想尽一切办法使她声名狼藉。我稍后便非常遗憾当时未为她举行洗礼,因为当时尚未发现她相当有学问,对于她的坚持不懈感到了害怕,最终要在危险的情况下而依靠其婶母。因此,我从那里回到了我住院的所在地盐井,心中非常痛苦和特别惴惴不安。

可怜的女望教者的悲痛呼叫,传教士应其呼吁前往。

数日过去了,没有这名不幸的女望教者的任何消息。当接近诸圣瞻礼节时,我接到了她向我求援的一封信。据她说,其处境变得无法容忍了,她想逃走和到盐井避难。

逃走确实是尚存在的拯救她的唯一机会。那些对于其丈夫不满意的女异教徒们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她能够这样做吗?如果其夫放她逃走,那么女子的双亲就会立即前来指责他以犯罪的途径而摆脱了她。因此,他必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密地监视她。我无法清楚地知道能采取什么办法帮助她,于是便应可怜的殉教人的求救声而去。

那里位于我自己完全陌生的山地中的 15 法里远的地方,没有任何人为我领路。我白天向所有过路人打问道路,勉强地向那里走去,到了晚上,当夜幕接近时,我便找不到任何人了,只好盲目地游

荡。我于是便开始严重地感到不安了，当我举目遥望四周时却发现，在田野中相当距离远的地方，发现了一个仍在弯腰劳动的女子。我疾速地向她的方向走去并请她原谅我，我向她询问了有关我正在寻找的那个家庭的某些情况：

“上帝啊！这难道可能吗？”她惊呼了起来，“神父怎么会来到这里！来到这些大山中呢！啊！神父，您来到我们中该是多好啊！快来！就到了，我家距此只有两步远。”

我的慈悲天使就如同用手牵着我一样，使我径直走到了我那可敬的望教者婶母的家中。感谢上帝给予如此的帮助，我进入了她家中并在那里度过了两天。我会见了女殉教人的兄弟们，设法为她而向他们说情。如若无他们，那我又能干什么呢？我不能从这些自私自利和冷酷无情的异教徒身上得到任何东西。

他们回答我说：“我们的姐姐确实非常不幸，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完全是咎由自取，为什么要如此顽固坚持这种宗教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行事呢？我们为了她的案件已经花了很多钱。愿她今后尽其所能地摆脱这场案件吧！”

殉 教

从次日起，我便发出了一封信，将我的到来通知了那名不幸的望教者并向她提议让我帮助她。信件只能直接交到她的手中。过去曾充作中间人的那名婶母的小女孩又一次被派到那里，她于傍晚为我带回了悲痛的消息。她越来越受虐待，其丈夫无法使她背教，曾多次设法摆脱她。她始终勇敢地抗议说，她永远不会放弃其上帝。

她对其丈夫说：“你可以杀死我，但你永远不能实现让我弃绝我的宗教、我的祈祷和我的十字架标记的目的。”

至于逃走，她觉得这件事从此之后就变得根本不可能了。她对

于我的奔走举措和我的美意表示感谢。她听天由命并唯上帝意志的安排是从。

仁慈的上帝确实选择了这个可怜的受伤者，圣祭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数星期之后，也就是在圣诞节之前不久，一封快信向我报告说她已经完成了其殉教。可耻的丈夫和婆母无法战胜这名英雄般的女望教者的抵抗，于某一日抓住了她并将她一直拷打到死为止。唯有仁慈的天使才听到了她最后的话语和接受她的最后一口气。对于她来说，鲜血的洗礼代替了圣水的洗礼。

这名勇敢的望教者就这样在 21 岁时死去了。她默默无闻，遭到了遗弃，受到了她自己家中人的鄙视，而这一切又仅仅是由于她熟悉、崇拜、热爱并献身于真正的上帝。这就是她的唯一罪行，也是她死亡的唯一原因。愿上帝赐予这个因对它的信仰而殉教的女望教者慈悲并饶恕其刽子手们吧！

我无须再作补充说明了，您与您的所有合作者——教廷传教部的成员们会确保得到大量的恩惠。上帝不会不作恩赐地对那些曾帮助将天下四方的上帝选民们集中起来的人的施舍的。上帝的选民、殉教人都对那些为他寄来了好消息的使者们表示感谢。

中国广东传教区的最新消息^①

作为下面这个灾难性插曲之舞台是广东教省，它是华南最兴旺的传教区之一。该教省共包括了万多名信徒、50 多名欧洲传教士和 10 名土著司铎、140 座教堂或小教堂。邵斯主教居住在广州。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 67 卷，1895 年。——译者。

来自教廷的传教士勒·达朗迪埃致广东代理主教邵斯的书简

一名基督徒和四名望教者的殉教

东镇^①是一个基督教会口,其创建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是由于该村庄中的望教者们所属的家族中某些最有影响的成员极端仇恨基督教。然而,其前途似乎显得很平定。当我出发前往广州以在那里退省时,我自信可以对与我为邻的教友弗雷鲁(Fleurean)先生说,我是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离开教区的,而上帝对此却作了另外的安排。

为了使其阴谋能够彻底实现,族长们召来了附近的一名基督徒,也就是他们的盟友。10月4日,这名基督徒以他们的名义向望教者们讲了几句调和的话。但我们的新教徒们完全有理由不信任其敌人以迎合这些主动接近。

次日便发生了秋祭。庄丁们(一种护田队)前来正式邀请他们去赴一次传统的宴会。望教者中的七人让步并接受了邀请。这就是冯利、辛丁、山丁、席宗、阿尚、唐利、阿八。

在祠堂中,大家盛情地欢迎他们,在那里为他们支开了一张桌子,促请他们在那里就座入席。

人们虚情假意地补充说:“如果全家人不都在那里,那么调解将是不完整的。”

因此,大家又重新派一名庄丁去寻找冯利的父母及其年长83岁的祖母。经过一些时间的犹豫之后,他们也前往池洞(Tsytong)。

^① 即信宜, Tan-Chung。

他们刚刚迈进门坎,大家就在他们之后关上大门。突然间,有50个全副武装的青年人站了起来并包围了基督徒们所坐的桌子。左秋处于第一行,他催促他们弃绝其宗教。辛丁回答说他们宁死也不肯。左秋仍在坚持。

席宗(唯一的一位受洗者)说:“你们在浪费自己的时间,我们现在是基督徒,我们今后仍为基督徒。”

歹徒们听到这些话之后,立即挥动其兵器向前冲去。席宗第一个倒地。其头颅被打破了,又一长锄(一种铁铲)打开了其胸膛。

其他人都被这种出乎意料的打击感到惊慌失措,他们为了逃脱打击而从人群中溜走了,或者是向各个方向四散而逃。他们很快就被追上了,这次轮到他们被打倒在地,头颅开瓢、遍体鳞伤和四肢折断了。

冯利正置身于其母亲及其祖母的怀抱中,她们以其身体而为他筑成了一道围墙。但仍然有人从她们怀抱中夺走了他,他跌落在地并受了致命的重伤。当看到这些浸在血泊中的血肉横飞的尸体,刽子手们已快被吓死了,人群中的异教徒们胆怯地抗议着,指挥这次大屠杀的族长们却突然开始思考问题了。

他们说:“如何办?在受伤者中,有不少人即将死亡,必须前去寻找当家人。”

他们知道当家人对于基督教的一切都极端仇恨。两名主要带头闹事的头目手中仍操着他们那沾满鲜血的长锄,匆匆忙忙地赶到了当家人的府上。一名传道士已经赶在他们之前而到达了该人的府上。乡绅们的这位首领非常不友好地接待了他。

他对传道士说:“基督徒们的教案事件与我没有关系。傅氏家族可以按照其意愿而处理其事务,可以对其某一名成员采取他们认为是合适的措施。”

他对刽子手们则表示了要友好得多的欢迎。

他回答他们说：“要消除凶杀的所有痕迹，结果那些伤员并焚尸灭迹。”

经过协商和大量酗酒以刺激杀戮的勇气之后，凶手们决定服从乡绅首领的指示行事，那里有数量充足的柴薪。为了使火力更加旺盛和更有效，他们又派人去寻找煤油。共有 10 多名青年人在内院中挖了一个砖窑形的土坑。

尚有待于最后结果伤员，席操向大家指出，为了使这种行为迅速而又完整，必须事先放血并除去软组织部分：肠、心和肺等内脏。他本人与其他另外几个人以 5000 文钱为代价而从事这项令人厌恶的工作。他们操起了大刀，俯身于受害者的上面，一丝不苟地从事向他们建议的这项污秽的工作。冯利、辛丁、石钟、阿三已经被肢解成了数块。当他们即将去抓唐利时，有一名老翁开始居间调停了。

他说：“流的血够多了，难道你们是想把他们满门抄灭吗？”

他的话引起了大家在某种程度上的注意，但席操由于酗酒和喋血而头昏了，他猛然地冲了上去。

他说：“放开这些活人吧！你们好好想想这件事吧！这同样也是不利于我们的证据。”

戴弘回答说：“我将尽力保证阻止他们提出起诉。”

许多个人的声音同时反驳说：“这很好，但你要以你的人头担保。”

“我以我的人头担保。”这名诚实的异教徒回答说。

“好！”席操回答说，“放开他吧！满丰（冯利的父亲）、其妻、唐利和阿八，本处只有四具尸体，本来应该有五具，山丁哪里去了？”

这个可耻的家伙于此时操起一支长矛登上了仓顶并发现了山

丁躺在那里,于是便一连向他扎了二、三枪,以脚踹其身体,尸体在跌落时撞在了一扇半开门的上部并重重地跌落于地面。

我们再提供一个残酷的细节:石钟的儿子阿旺只是个15岁的孩子,他也必须参与这些处理死人的活动。

然而,夜幕降临了。应该焚毁尸体的炉子已经准备就绪。有二三层经泼洒煤油的柴薪,于其底部也泼上了油脂。刽子手们的衣服和双手都沾满了鲜血,手中大把地攥着他们最早扔掉的肠子和肺。然后又运来了另外几块尸体,于其上部再次垛起了柴薪。这一切上面都浇上了煤油,柴薪堆被点燃起熊熊烈火。

火焰很快就在夜间的黑暗中升起来了,照亮了整个附近地区并一直将其阴森可怖的光芒投射到遥远的大山上。在村庄中,到处都是死一般的寂静。席操和洪才如同两个魔鬼一般,于火堆旁度过了整整的一夜,以一根长竹杆将火拨旺。

天刚蒙蒙亮时,这项恶魔般的工作结束了,仅剩下一块炽热的火炭,其中也只有一些被焚人体的灰烬,至少是那些刽子手们认为是这样的。他们拨开了第一层火炭。但是,该多么令人吃惊啊!受害者的心脏和头颅竟然完好无损。他们迅速地取出了这一切,用竹杆砸碎了头颅,再与心脏堆在一起,放在筐子中并通过屋脊洞中递了出去。灰烬、火炭、带有火痕的上层土都被相继挖去,然后通过同一洞口而将之隐蔽起来。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期间,壕沟中便填满了从外部运来的新土。

现在尚有待于消除屠杀现场的血迹。大家用一把铲子把土挖了起来,又运来沙子覆盖。此时天已经大亮了。他们最终打开大门,每个人都可以从那里离去。满丰与其妻、老祖母又悲痛地返回了其住处。唐利和阿八无法行走,于是便找来几乘轿子。

受害者们那珍贵的遗骸被藏到哪里了呢?如其头颅和肠子。大

家至今仍一无所知。大家仅仅知道灰烬和炭化物都被抛撒在附近的江河中了。

从5日晚上起,冯利的妻子就前去向官府告状。官吏非常不友好地接待了她。然而,该官吏答应进行调查。6日晚上,为这一目的而派出的营勇们返回来了,以他们那营勇的荣誉作保而断言在东镇未出现任何不正常情况。为了更好地使他们坚信这一点,凶手们确实作为筹码而送给了他们200—300个现大洋,这些人非常仔细地将它们装进自己的行囊中带走了。

7日,唐利的妻子又一次在辛丁妻子的陪同下出现在官衙。官吏对此很受感动。

他声称:“即将亲自前去就地勘察。”

8日晨,他尚未出发。

冯利的妻子、辛丁的妻子、见证人席正的儿子,最后是阿三的母亲都前来讨取公正。官吏无法逃避这些人的恳求,只好于9时出发赴现场,他由受害人的亲属陪同前往。

那名官吏终于到达了。凶手们的同谋犯——乡绅头人在那里接待他。花钱雇来的400名广西土匪陪同头人前来,借口是为了给他壮威,而事实上却是为了劫走受害者的亲属。由于无法劫持他们,所以那些土匪们仅满足于对他们痛骂一顿。

第二天10日,官吏吃过早饭之后便前往祠堂。他一旦进去之后,便转向人群讲起话来。

他问道:“是否能够找到一名曾于5日在场的证人呢?”

“是,”一句基督徒回答说,“现有冯利的祖母。”

“找一乘轿子并把她带到这里来。”官吏又重复说。

这名可怜的老夫人曾是杀害其长孙的见证人,她首先拒绝前往祠堂。

“他们无疑是想把我也杀死。”她说。

大家向她解释说官吏要见她，她于是便被人带去了。

当她受到这位官吏的审问时，便作了非常明确而详细的回答。

她说：“我是满丰的母亲，于5日到达了这里。他们从我的怀抱中夺走了我的孙子，以将他处死。”

“你是怎样抱着他的？”官吏询问她。

这名善良的基督徒只凭着其一颗母亲的心去做，她让官吏把手按在其心口上。该官吏满眼含泪，轻轻地摆脱她并继续询问她：

“你的孙子掉在哪里了呢？”

“这里。”她用手指点着附近的一片地方说。

“大家把沙子铲去。”官吏命令道。

大家于是便开始工作，从铺地面石块的缝隙间发现了黑色的痕迹，这是他们刮去血迹的残余。

大家把那位官吏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辛丁倒在这里。”

稍后不久又说：

“阿三倒在这里。”

大家在所指出的三个地点发现了相同的血迹。

“但是，”官吏说，“他们共有五个人。”

“不错，”女基督徒回答说，“不过，三丁登上了仓顶，人群在那里杀死了他。大人是否愿意去看一下。其尸体落在了此门之上，头从一侧悬了下来，脚从另一侧摔了下来，门上染上了其血迹。”

证据是明显的。为了更可靠一些，该官吏让人除去了新近翻动过的土层，因为这些土覆盖了于其中焚烧尸体的坑。他们在那里发

现了已经钙化的骨骼的残片,仔细地搜集了起来。在凶手们敲碎这些人头颅的地方,他们找到了数颗牙齿。

张干、隋春、席操和洪才都勇敢地前来自我辩护,他们被官吏带走了。现在,他们都在监狱中。但其他暴徒们尚未被捕。

信宜的这位官吏可能觉得自己到了一片圣地,因而表现得过分热忱了。

我们能够得到公平正义吗?这名年长 70—80 岁的寡妇和老祖母是否最终会从中国法官那里各到某种帮助以使她们不会被饿死呢?这一切都令人非常怀疑。如果完全如同大家所害怕的那样,我们的要求不能获得成功,那么受害者将始终要由该教区的传教士们负责。愿那些仁慈的人能允许其心灵的慷慨倾向得到自由发展,并能支持这些可怜的基督徒。那些在当地支持他们的人都宁死也不肯放弃他们的上帝。我对于上天充满了信任,他们也将为那些帮助他们的人祈祷。

中国川南宗座代牧区的综合报道^①

我们一直坚持使《传信年鉴》的读者们能自始至终地了解已经爆发的袭击四川传教区的教案。基督徒们遭受了巨大痛苦,主教们都被投入了监狱。今天,由于上帝的保佑,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沙得容(Chatagnon)主教大人得以重新管理他的 18000 名基督徒,由其 44 名司铎和 60 名传道士协助。那位尊敬的高级教士于介绍了他被囚禁经过的记述非常引人注目,使我们很乐意刊布这几页生动而又饶有趣味的文字。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 68 卷,1896 年。——译者。

川南宗座代牧沙得容主教致圣—加尔米埃(里昂教区)的
本堂神父塞翁修道院长的书简

1895年8月19日于成都

我的最后一封书简的时间应为我眉州监狱时期。刚刚过去一个月,我觉得就如同已有一年了,以至于我目击的那些严重事件使人感到时间很长了。在我致书于您之后,不多几天,便接到了您5月1日的书简。它在我最需要安慰和鼓励的时候,来得该多么及时啊!我当时被与三位教友关闭在一间有四米长和同样宽度的牢房中,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它同时充作我们的卧室、餐厅和工作间。我甚至没有自由为我那可恨的传教区的毁灭哭泣。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实在无法坚持下去了,必须向所有人都表现出一种我从未有过的安详面色和自信。我不知道有多少次退避在一个角落里给那些不在场的教友们写信,以加强他们对待风暴的信心,给予他们指导,安慰和鼓励他们。一旦当我发现自己很孤立时,眼泪便从我的双眼中涌了出来,啜泣声使我窒息得透不过气来,我再也无法写下去了。

我感谢上帝给我送来了一些卓越的囚友。大家可以交谈,叙述过去时代的故事,从而可以使人忘记目前这个悲痛的时代。大家都在开玩笑,甚至还在欢笑,这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只会产生比哭泣更多的好处。后来,我的教友们充当我的顾问和秘书,因为我自三个月以来始终有些要写的材料,或为了对外通讯,或是为了与中国官吏们和法国公使馆之间的外交交涉,特别是为了与传教士及土著司铎们的通讯。

—

感谢上帝,正如我已经向您写过的那样,虽然我们由于事态本

身的力量而成为囚徒,但是只有在官衙中才会有我们的安全。我们落到了一名善良官吏的手下,他对于我们很忠诚,从未阻止我们与外部的联系,给我们保留了符合我们安全的全部自由。所以,虽然我们住得很狭窄,但白天可以自由地在整个官衙内走动,绝不会有任何衙役们敢于粗暴地对待或嘲笑我们。由于在数目如此之大的衙役(总共有 125 人)中,有些人的不信任程度不大。所以那位官吏亲自向我们指出了我们可以与之打交道和请他们帮助的那些人。这样一来,我们就未受到骚扰,每天清晨都前往院子中、花园内和其它偏僻的地方进行默祷。此外,在 8 点钟之前最为安静,那时所有人都在睡觉。在白天,大家可以到能够立足的地方去,以便阅读、书写、用烟斗抽烟,但那时周围总会有一大批好奇之徒围观我们,他们希望翻阅我们的书籍、触摸我们的羽笔,有时也向我们提出某些有关欧洲和我们整个世界的最为滑稽可笑的问题。

至于宗教,他们全都以彼拉多的方式向我们提问,向我们询问真谛的情况,但他们并不肯倾听我们的答复。那些好奇的人最终让我们安静休息了,他们坚信我们都是些与其他人一样的人物。

此外,那位官吏,也就是我们的“主保圣人”不允许别人来纠缠我们,其所有衙役们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这确实是一个正直的人和公正的官吏,我们在这方面的条件确实要比在成都知府那里的杜昂(Dunand)主教好得多。

从我们到达开始,该官吏就使我们感到了无拘无束,他也尽其一切可能来使我们感到放心。这是一名老资格的行武之士,既不抽鸦片,也不酗酒。他矮胖、坦率、既活跃而又很坚强。他只是作为取代另一个人而临时补缺的官吏才到达眉州,因为其前任既无法整顿好治安,又不能肃清曾骚扰该地区的土匪。他在数月期间获得了如此之大的圆满成功,以至于其民众在我们于那里时为他们举行

了一次盛大宴会以向他致谢。我们也必须向他送些礼物以使我们和我们的基督徒受到更好的保护,虽然附近地区的一切都遭到了蹂躏。

该官吏对我们说:“请看!我们于此就如同在一个岛屿上一般,附近地区于同时却都被淹没了。”

后来,他将其袖子挽到了肘部并裸出了其青筋暴露的胳膊。他接着又说:“请看!一只手中有5个人,另一只手中也有5个人,10个人也不会使我感到害怕。在我这里,请放心,你们没有任何可怕的地方。”

事实上,我们和我们的基督徒,在该州的全部领土范围内,均未受到过粗暴对待。他又补充说:“我曾到过四个王国。我懂得外国人的情况。现在掀起了反对他们的一阵风暴,但风暴即将过去,而他们却将永远留在这里,狂风仅会刮走那些掀起这场风暴的人。”他向大批官吏们都重复讲过同一件事,这些人均来自省府,在路经本地时曾去拜访过他。“您要注意一些!不要因与外国人和基督徒打交道而连累您自己。”

对于他来说,他问心无愧地完成了其义务,我们却非常遗憾他不是基督徒。他管辖着其衙门,衙门共由120—130人组成,如同是一个教团一般,其中没有争执,没有伤人的恶言,任何人都不抽大烟。他时刻提醒其属下要永远保持警惕,对于那些忘记这一切的人始终准备打板子。他几乎每天都坐镇那里,甚至有时是全天如此。

由于我们置身于大堂和客厅之间,所以我们立即发现了所有前来拜访的人和所有的判案。对于我们来说,看到动大刑拷打人和听到他们痛苦的喊叫声,那不会是一桩快事。他以一种宏亮的声音压倒嘈杂声,有时根据需要又用一块粗大的镇堂木敲击案子以维持肃静,但他却始终带着一种愤怒而又无情的神色。

有几次，他刚退堂就抛开了其纱帽和衬帽，衣冠不整地跑到我们这里休息起来了。他对我们说：“当我升堂时，形色便非常凶恶。你们看到了吧！我必须使百姓有一种威慑感。否则，百姓们就会无法治理了。”他有几次站在被告面前，用白眼球盯着他们，就如同他已经深入到了他们的思想深处一样，向他们叙说他们的罪行。我想他是从其他地方获知这些罪行的。啊！在盗窃犯和杀人犯们看来，他确实是非常可怕的。他对我们说：“怜悯这些人！这都是一些虐待百姓的刽子手。”

所以，匪徒们几乎完全逃离了该地区，前往更远的地方寻找发财的机会了。在其它的诉讼案件中，他却显得比较容易通融一些。他装出一副仲裁人的姿态，甚至是装作一个鼓励其臣民和平生活的“慈父”的样子来。有一次，他非常善良地与我们开玩笑，这是指安慰一名孤苦伶仃的寡妇及其幼子。他从大堂上下来抚摸幼童，在观察其手上的轮廓和线条之后，便转向寡妇并以一种受神灵启示的神情说：“我嘛！我既知道过去也知道未来。好了！我告诉你说吧！好好照顾你的孩子，他会变成一名大文豪，有大福大贵在等着他。”

我发现他在对一件诉讼案或一份卖契的判决时，如同是介于基督徒和异教徒之间，我无法判决得比他更好。他肯于下功夫研究文件，每天早上都前往其首席师爷和顾问处。他言简意赅地和不带虚伪之谦虚地对我说：“您永远不会看到像我这样的官吏，因为所有人都抽大烟。当他们在抽大烟时，必须火烧眉毛才能使他们同意离开其位置。”

他经常前来与我们交谈，独来独往，不拘礼节。他使我们获知了已发生的情况，而且对一切都了如指掌。

我们希望以自己的资金养活我们自己，他从未同意。他在自己

的饭桌上招待我们，在吃饭时前来看望我们是否满意，尚且不算他在白天给我们送来的中国糖果和点心。

二

无论如何，我们的事业日趋衰败。所有这些好的做法无疑都是一种缓和，它们无法阻止我们那非常悲惨的命运。在第一个月（6月）间，从我们传教区的所有据点都只能传来一些令人悲痛的消息。

任何人都未曾等待一阵如此激烈的狂风暴雨。

在公众舆论和流言中，没有任何因素会使人害怕一场反对欧洲人和基督徒的武装骚乱。在与日本的战争爆发伊始，我们就已经感到了严重的不安。中国战败了，而在我们这些偏远省份，老百姓却未产生任何一点不安情绪，依然无动于衷。大家最多也是略微关心一点面临的新税收威胁，老百姓们也并未因此而变得对我们更加仇恨多少。所以，我们也处于最彻底的安全之中。只有很少的政界人物和以总督为首的省政要员陷入了一场正在策划中的阴谋，但却相当严格地保持了秘密。我们勉强听到了某些威胁，但对此并未给予多大注意，我们很长时间以来就已经习惯于这样做了。

这样一来，当有人煽动自数年来就骚扰该省的土匪头子反对我们时，所有的传教士和基督徒都感到茫然而不知所措。我收到了各地请示意见的报告。

“怎么办？应坚持什么样的行动准则？是应该抵抗土匪们还是听之任之？是逃亡还是躲避？”

我建议采取这后一种政策。因为我们那些藏匿起来的基督徒们都已无法抵抗了。

土匪们在一开始并不攻击基督徒，而仅仅是袭击传教区的公

共设施。他们很快就对抢劫产生了兴趣，攻击我们的那些富裕家庭，最终又在各地劫持整个的站口。

共有四个州或县受到了特别摧残。有两个位于四川西部，即邛州和崇庆州；另外两个位于南部，即嘉定府和峨边厅。一般来说，打教事件仍保持了其最早的表现形式——抢劫。但它在某些地点却采取了一种仇教的形式。土匪、强盗，甚至是某些官吏都煽动基督徒们背教，在最近入教的新教徒或热情不很高的老基督徒中，出现了某些变节的背教者，他们认为传教士们将会永远被驱逐和宗教已被废除。

当我与三位教友到达眉州州衙时，基督徒们都放声号啕大哭并认为我们即将走向死亡。异教徒们对此也毫不怀疑，在我们被捕的最初几天中，他们经常来窥伺是否已将我们处死。他们怎能想象到事情会如此功败垂成，因为他们发现过有人以此地最高官府名义，以一种非常大的疯狂来追捕我们。官吏们明显曾接受了放任如此行事的命令。但相当罕见的是那些如同我们眉州判吏那样的人都反对土匪们的抢劫行为，而且过去一直都相当清廉公正、相当坚强和特别是相当英明。他们都预见到了打击不会获得成功，当地最高官府在危害了他们之后不久又撤销了过去的措施。这确实是已经出现过的事，因为直到现在为止，始终是那些相对无辜的小吏们为那些大罪犯们付出代价。我们就等待结果吧。总督本人已开始承受其惩罚了。当时谁能会预料到这一点呢？他曾是胜利者，破坏工作正在按其既定方向发展，而且也没有显示出会在该省边境内停下来的迹象。大家本来确实会说地狱的锁链已被打开，它已经在一段时间内接受全权，将利用这一切以试图破坏基督教的名声。

我们的新教徒们被遗弃给小民们了，受他们愤怒情绪的主宰，他们既不能去找其亲戚，也不能去寻其朋友。任何人都不敢向我们

的人表现出任何一点兴趣,相反,每个人都想以向他们投掷石块而做出一种能受到褒扬的的行为。那里是以对新教徒们的敲诈勒索和抢劫而开始的。最后,由于他们依然一如既往地作为基督徒,所以大家便为他们带来了偶像和迷信的灵牌。由于我们的基督徒们拒绝了这一切,所以众人便焚烧了他们的住宅。他们在邻居中的一些已开始获得了慈悲心的异教徒家中找到了避难所。当时的打教者们也在威胁烧毁敢于收留他们的异教徒们的住宅。张路易(Louis-Tchang)的信徒们——大批的基督徒都必须长期露天野宿,白天受灼热的阳光暴晒,夜间又被迫彼此拥挤在一起以取暖。

在此期间,首当其冲地受到追捕的传教士们盲目地游荡,不断地变换避难地,在旷野中露天过夜。

仅有四个人在官衙中找到了避难所,有三人与我一起在眉州,另外一个人在峨嵋。在15天期间,我们过的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啊!大家只会频频接到坏消息,而且又被公共舆论做了夸张。

我在眉州的这一官衙中获悉了我在嘉定的住院、司库处和我们在叙府的神学院均遭摧毁。由于神学院突然间受到了袭击,所以它没有时间将学生们遣散,其中有些人也很难被找到。他们还袭击了我们在峨眉收养女婴的大育婴堂,但非常幸运的是育婴堂已被撤退。最后,他们袭击了我们传教士们的16座教堂和住院。我尚未计算那些遭抢劫、焚烧或破坏的药铺与基督徒们的住宅。大家无法得到遥远地区的任何消息,它们使我产生了更多的忧虑,因为我怀疑那里会出现更多的灾难。当我所在的传教区的这部分地区的一切都被摧毁时,在我的周围却出现了一种死一般的寂静,这种寂静比我们的设施坍塌的响声更为令人难以忍受。难道这确实就是我们四川传教区的末日了吗?

正在此时,美国和英国新教的牧师们由士兵陪同经过此处,他

们乘小艇沿江而下地飘荡而去,据说是前往上海去了。现在轮到咱们了,难道不会同样也把我们发送而去吗?那些没有羊群的牧师们离去了,仅仅是怀着对他们遭受的物质损失之遗憾而离去。对于咱们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咱们自己与咱们那些新入教的教徒们是通过某些不可分割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新教的教徒们无疑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才表现得非常勇敢,我甚至可以说他们由于对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所表现出来的鄙视而具有挑衅性了。这一次,他们到处都首先是招致了对他们自己和其后是对咱们的致命打击。

在新教教徒们离开之后不久,北京关于制止打教的第一批命令下达了。虽然大部分电报局都向咱们关闭,但咱们仍成功地发出了几条电讯以发出警告。咱们驻北京的大使施阿兰先生勇敢地保护咱们,这次教案的罪魁祸首总督被迫阻止了他的手下的帮伙们的行为。现在是时间了。唯有一个州——距成都最远者,始终为川南的未遭殃及者。从此之后,攻击停止了,但威胁一直持续到新总督于7月中旬的走马上任为止。因为咱们的这位仇教者为了最终“在火药桶中点火”,而必须等到他为行使其职务而于此度过的最后一个月。他想要在火药桶大爆炸之后才脱身而去,让其继任者煞费苦心地去挽回已造成的损失。但此人至今仍在掌权并还将一直掌权到将帐算清为止。

施阿兰先生要求并获准让宗座代牧在首府与最高当局谈判。这样一来,杜昂主教大人和我本人,咱们都出狱了。由官吏们亲自租给了咱们一处合适的住宅,以于本地——成都接待咱们。我在本处的知府和一支武装卫队的陪同下离开了眉州。百姓对此毫不理解,我于道路沿途都听到了各种各样的议论。有的人说:“简直是徒劳无益地攻击这些欧洲人,现在又要回头向他们赔礼了。”

其他人又补充说:“但是,大家把他们带到成都来是为了砍他

们的头。”

总而言之，直到目前为止，我尚不完全明白究竟是谁有道理。新总督不应该仇视我们，他甚至在到达时还发表了一道支持我们和支持我们基督徒们的命令。但就全省的情况而言，形势却依然如故。我们不可能于一日间就全部改变整个官府，现在仍是由前任遗留下来的官府，而且也因该前任而被牵涉进仇教案中了。所以，反对我们与基督徒们的威胁和煽动性的揭帖在这里仍在连续不断地出现。百姓们揭走或者是用泥巴覆盖了新总督的布告。自我到达此地之后约半个多月的时间以来，谈判毫无进展。全都是同谋犯的官吏们都在煽动民众，以便能够请求谅解和声称他们无力保护我们。我不相信有看到重新开始打教的危险，但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使善后工作变得不可能完成或者是毫无意义。

出于万幸，我们在北京遇到了我们的大使施阿兰先生，他既忠诚又具有一种罕见的勇气。其次是形势也对我们有利，因为中国需要法国。为什么我们的敌人选择了一个如此不利的时机呢？首先是由于各省的那些官吏们的无知和愚蠢竟然发展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们对于基本政策一无所知。其次是由于这一次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我们的敌人不相信法国会支持中国反击日本。其他人还声称，这位总督过去由于贪赃枉法而被罢黜，这次希望能以频频发难而向基督教报复，更确切地说是向欧洲人和中国政府报复。最后，上帝经常使仇教者们受蒙蔽而难辨真假。然而，他们却给我们制造了一种任何赔礼都无法弥补的灾难。在该省的四部分地区，有两部分未受损失，这就是东部和北部。因此，负责主持西部和北部工作的杜昂主教大人尚有未遭摧残的一半宗座代牧区。但我仅负责南部，只有一座小县城仍完整无损。我再没有可供土著神职人员学习的神学院，也再没有收留这些传教士们的住宅了，他们被迫

到那些在教案中幸免于难的基督徒家庭中避难。

当看到有如此之多的废墟需要修复,我曾多次感到生活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我多么希望未在教案中残存下来啊!……然而,我也必须向上帝证明它始终与那些历尽苦难的人在一起。首先是上帝支撑了我这种弱不经风的风烛残年,使我未受很大的苦难和震动;其次是我也并不完全缺乏勇气。我非常真诚地向上帝讲了这一段话:“我不拒绝工作,虽然我认为最好是死去。愿您神圣的意志能够实现。”

中国广西宗座代牧区的综合报道^①

传教士邓玉函(Mazel)殉教的具体情节。

我们于其最后一期中刊登了一条宣布了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邓玉函先生殉教的消息。他于1896年7月29日出发赴广西,于今年4月1日被害于逻里,这恰恰发生在他到达中国的八个月之后。我们匆匆忙忙地从中刊登下面的一封书简。它提供了对于使广西失去了其年轻传教士的这次暗杀事件的所有细节。邓玉函会士于1871年诞生于博祖尔(阿韦龙)。

广西宗座代牧区的传教士赖神父致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德
尔佩斯会长的书简

1897年4月21日于南宁府

邓玉函会士逝世的消息是于前天由两名信使之一确认的,他们曾陪同过我们,也就是说它是由那位幸免于死的人向我确认的。我正是根据他的叙述才得以向您提供有关他作为目击者的流血悲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69卷,1897年。——译者。

剧中的下述细节。

邓玉函先生于1896年11月19日来到了我在南宁府的家中。经过数日的休息,他离开了我并乘船出发前往百色,这一天是11月24日。他必须前往该省西北部的西林县,在那里学习语言,以等待为他指定一个县。

他刚到达百色,便有一次发高烧的疾病向他袭来,从而迫使他返回南宁府。我成功地治愈了他。

今年3月5日,邓玉函先生再次离开南宁府。他身体很好并且热忱地希望尽快地为拯救灵魂而工作。此外,他通过其善良的思想和慈悲心肠而希望成为一名优秀的传教士。

今年3月15日,他非常顺利地到达百色。17日,邓玉函向该城的知府送去了帖子以向知府致意,将自己经过此地一事通知了他,但后者不屑于对他的礼节做出回答。

19日,这是圣若瑟(Saint-Joseph)节。我们的这位教友乘轿子从百色出发。他沿云南之路而行,路过了大市场逻里。我们在那里有一处住宅,以供路过的教友们歇脚,那里平常始终都有一名看守人居住。

邓玉函先生于3月22日下午3时左右到达逻里,未发生任何事故。然而,在到达这一大集市之前不久,他遇到了一些原路返回的骡帮商人。因为在距逻里城外半法里的地方,他们的骡子和马匹以及驮运的全部欧洲货物都被一群土匪抢劫一空。

该传教士首先关心的是将其名帖送给了当地的一名小军官。由于他必须换轿夫,而且在一条公开从事抢劫的道路上,不带护送卫队地冒险前进是极不谨慎的。所以他决定停留在逻里。他在那里没有任何可以害怕的地方,集市很平静,商品交易也如同平时一样进行,来自百色的数百名士兵维护公路治安。

由于在逻里无法找到轿夫，所以邓玉函会士便致信居住在距那里有三日行程的地方的罗惠良(Lavest)会士，以求此人于其基督徒中为他找到轿夫并为他获得一支护卫队。非常不幸，罗惠良先生未在其府上，他前往西林县去了。由此而产生了一种相当严重的耽搁。

驿夫被迫前往罗惠良会士平时在西林县的住院沙梨，直到4月1日上午才从那里返回，带回了罗惠良会士的指示以及西林县知县的一份公文，命令逻里的武官护送邓玉函先生上路，以使他能够继续旅行。但一切都为时太晚了。事实上，就在这一天的清晨，我们的教友刚刚被其一名陪同人杀害。

在他赴逻里旅行期间，邓玉函先生发现自己从早到晚都被一群人包围，这是由观看“洋鬼子”的愿望吸引他们这样做的。所有人都讲述有关欧洲人的一些最为荒诞古怪的事情。甚至有些人还讲过这样的话：“这都是曾进攻过我们的法国人，他们夺走了我们的交州。既然我们遇到了其民族中的一个人，那么我们就应该满足大家杀死他的要求。”

陪同该传教士的驿夫们都无法摆脱这些不速之客，他们穿堂入室地在各处行走，察看了房间所有犄角旮旯。驿夫们只好前往恳求武官运用其权威来保护我们的教友。该官吏口头答应这样做了，但却毫无作为。其手下的人也仿效他行事，本来兵营距我们的住院不太远。

4月1日，大约是清晨4时许，共有30或40个人用步枪和手枪袭击传教区。大门很快就在—根大铁棒的撞击下粉碎了，攻击者们进入了房间，洗劫了一切并偷走了行李。当其中的一些人满载抢劫物而去时，其他人则守住出口并用他们的武器向住院的窗户射击。

大家发现我们的教友倒毙在其床头。他被三颗子弹击中，其中一颗射中了太阳穴，另一颗恰恰射进了其胸膛，最后一颗射穿了其心脏。他应该是立毙于枪口下的。

两位驿夫中的一名睡在与神父相毗邻的另一个房间中，他也断气了。一颗子弹击中了其额头，另外一颗子弹则穿透了其胸膛。第二名驿夫却奇迹般地幸免于被屠杀。

根据我们刚才叙述的情况来看，似乎根本不用怀疑邓玉函先生被杀是由于他是欧洲人，而且还是法国人，虽然物质利益的引诱在他成为被害的流血悲剧中也起了某种作用。

大家都在思忖逻里的营勇和百姓在袭击住院期间的态度到底如何。天啊！逻里既没有一名营勇，又没有一名居民曾想到过从杀死他的匪徒手中拯救我们的教友。仅仅是在他们离开之后，那名军官才为了做点样子而出现，询问有多少死亡并装作对于受伤者的命运很同情。他仅在此时才指挥其手下的人追赶盗贼，但营勇们几乎是立即顺原路返了回来。他们声称：“我们未能成功地抓住这些人。”他们仅满足于捡了几个做弥撒用的葡萄酒瓶子，这无疑是强盗们为了减轻负担和更容易地到达山上才抛弃的。

大家有权询问营勇的头目及其部下，他们为什么没有想到预报这次袭击呢？事实上，他们只要派遣神父卫队中的几名士兵就够了。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士兵们呆在他们驻扎的营房中无所事事。然而，陪同邓玉函神父的两名基督徒都请求过那名官吏负责我们教友的安全。

集市上的人同样也有无法逃避的罪责，因为在发动攻击时，他们不肯劳神行动以击退土匪们。这样一来，从中国法律的眼光来看，也就形成了一项严重错误。

类似的罪行似乎主要是出于对欧洲人名，特别是对法国人名

的仇恨而犯下的。其证据是一目了然的,因为在该庞大的集市中,除了我们的住院之外的其它任何住宅都未受到攻击,无论是在当时、此前和此后均如此。更有甚者,卫兵占据着与神父房间相毗邻的另一间房子,大家知道他与其家庭在那里绝对未曾遭受过任何损失。所有的步枪和手枪都向邓玉函会士的房间射击。最后,卫兵的任何东西都未曾失窃。

我在自己致驻龙州领事先生的长篇报告中,未忽略强调这些事实,它们自然会说明一切。我同样也不害怕向他指出,法国人陷入了这场事件之中,因为法国人的血怯懦地洒在了中国当局的眼皮之下。

斯泰尔的两名传教士在华被杀^①

在《传信年鉴》的最近一期中,我们发表了报告尊敬的神父能方济和韩理被杀的简短电报。斯泰尔(Steyl)神学院的尊敬的院长(两名受害者均属于他)——非常尊敬的神父让森(Jaussen)向我们报告了这场极端恐怖的悲剧的细节,它使鲁南传教区失去了它的两名最年轻和最勇敢的传教士。

鲁南传教区宗座代牧福若瑟(Freinademetz)神父的书简

我11月3日的电报向您通报了我们两位尊敬教友的遇难,这就是尊敬的能方济和韩理神父。下面就是有关这次骇人听闻的大罪行中最惹人注目的具体细节。

10月3日,来自巨野城的两名传教士前往视察张家庄的基督徒,那里很可能是鲁南最漂亮的一部分。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70卷,1898年。——译者。

11月1日中午之前,尊敬的能方济神父从李家庄前来,那里距张家庄有27里(12公里)。他在李家庄度过了诸圣瞻礼节并希望张家庄与尊敬的韩理和薛田资(Stenz)神父一并庆祝追思已亡节。

大约到了晚上10时左右,尊敬的能方济和韩理神父睡在同一房间,而尊敬的薛田资神父由于缺少床而就地躺在门厅中。

传教士们刚入睡,将近11点钟时,有一支20—30人的武装到牙齿的队伍冲进了院子中,又通过被强行砸破的窗户而进入了房间。

在4分钟的时间内,一切均被抢劫一空,两位神父嘶哑地喘息着并被淹没于血泊之中。在6分钟之后,他们都死去了,从而结束了他们的苦难。

能方济神父共被刺13刀,韩理神父共挨9刀。前者面朝地趴在那里,后者则背朝下仰卧在那里。在他们身旁则是一个令人害怕的血泊覆盖了地面。能方济神父的衬衣就如同被在鲜血中染过一般,我们将其血衣作为遗物而寄往了斯泰尔。

当暴徒们犯下其大屠杀的罪行之后,便呼啸着游荡于房子之中:“我们尚未杀死‘大胡子’(尊敬的薛田资神父)。“大胡子”在哪里?”

可怜的薛田资神父正倚门蜷缩在一个角落里。大家后来发现他的生命危在旦夕。上天希望仍将他留给传教区。那些野蛮的家伙根本未找到他便离去了。

他们刚迈出院子的大门,尊敬的薛田资神父便爬出了其藏身处并去寻找他的两位教友。尚有知觉的韩理神父接受了为其举行赦罪和临终敷油仪式,此后便立即死去了。能方济神父再既没有表现出有生命的迹象并且有条件的接受了赦罪仪式。

同一天夜间，一名驿使将这一可怕的消息传到了济宁，我立即与彼斯特曼(Pistermann)神父跑来。我察看了犯罪的现场并前往报官。我于是便向斯泰尔发去了电报。我也订购了两口棺木并将两具棺木抬到了张家庄，于11月16日在那里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这场大屠杀是一次可怕的考验，就如同是我们传教区从未经历过的考验一样。两名忠诚和勇敢的传教士在年富力强时被杀害了。亲吻如此残酷打击的手则太令人痛苦了。但我们希望这样做，因为这甚至是上帝告诉我们说，正是尊敬的神父惩罚了我们。愿我们受到祝福吧！

斯泰尔神学院院长让松神父的书简

我在另外一封书简中发现了一些具体记载，于是便自作主张地把它补充于福若瑟神父所提供的那些详细情节中。

这次屠杀的背景实在恐怖得令人目不忍睹，尸体上遍布伤口。造成这种伤口的刀子应很长并且是在两名受害者的身上来回转动。在尊敬的能方济神父身上，几段肠子已被剪断并被拉了出来。

尊敬的埃尔勒曼(Erleman)神父认为，这两名殉教人都预感到了他们的流血牺牲，或者至少是他们都强烈地希望这样做。

他说：“我可以引用能方济神父于1885年2月19日自上海寄来的一封信中的一段文字，时值他刚刚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那位年轻的传教士承认：“我经常请求上帝给予殉教的恩赐，但我却未享受到这种恩赐。我的鲜血尚不够殷红，它已被人世间的尘埃所污染。一种殉教者的鲜血尚未在我的血管里流动。然而，善良的上帝给予了很大的恩宠。如果我回顾一下上帝，那么我就会惊呼：‘上帝是无所不知的’。”

中国的教案——苏安宁被杀案^①

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的院长德尔佩斯于4月30日收到了发自香港的一封电报，它通报了于4月21日发生在广西的一次新的惨案。传教士苏安宁(Martinet Bertholet)刚刚与他的数位新教徒被杀。

下面就是由广西宗座代牧司立修(Chouzy)主教大人发给在巴黎外方传教会司库马天恩(Martinet)神父的电报全文，系由这后一个人带到了杜巴克大街。

司立修报告苏安宁与数名基督徒于4月21日被杀情况

苏安宁会士于1865年6月12日诞生于圣—日尔曼—朗贝伦(多姆山区)的乡镇夏尔波涅。他被吸收参加了里昂教区，于1885年6月11日受剃发礼而加入了巴黎外方传教会，于1889年7月7日举行派立礼而成为司铎。他被派往广西。于1889年11月27日出发。苏安宁先生是一名优秀的传教士，充满虔诚和热情。他在他那位于1897年4月1日被杀的教友邓玉函之后的一年零20天时落入了杀人凶犯的手中。

在我们被迫发这封电报时，尚未获得有关该传教士及其基督徒们死亡的详细情节。

苏安宁会士被杀和广西基督徒们遭受的苦难

在我们刊物的7月号中，我们发表了通报苏安宁会士被杀案的电报。该传教士死亡的具体细节、导致它产生的原因和继它之后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70卷，1898年。——译者。

事件、由法国政府向中国索取的赔偿等问题……所有这一切都是广西宗座代牧司立修主教大人的一封书简中的内容。虽然这篇感情丰富的叙述已经刊布于我们的周刊《天主教传教区》中并由所有国家的报刊转载,但我们认为自己仍有义务将这页文献的大部分内容刊布于《传信年鉴》中,因为它是宗座代牧区的名人录。

广西宗座代牧司立修主教的书简

……3月22日,一批以其颠覆倾向而臭名昭著的匪帮声称,他们奉了官府的命令,于光天化日之下和全副武装地冲向我们在平南县的经堂——寄宿学校,将之抢劫一空并烧毁了它,然后又同样洗劫了附近的9个基督教家庭。传教士周(Heraud)先生不在那里。由于及时得到了警告,所以学生和基督徒们都逃走了。对于我们的优秀领事的及我们自己的要求,当地官吏(知府和知州)自6个星期以来的回答仅仅是毫无成效地派遣一名小官吏去调查情况,这种奔走尝试的唯一结果是鼓励了抢劫者们。

新入教的教徒们现在已经无处蔽身了,根本无法耕种他们的土地和隐居于其亲属们的家中。他们为了确保自己生命的安全,于是便逃向了附近的一个县中我们的府上。他们将由此人员负担其生活开支,一直到这场教案的解决为止。因此,如果基督徒们不前往帮助他们,那就是这些家庭开支的一种巨大负担。

作为赔偿之保证的平息骚乱的工作进展缓慢,从而又鼓励了某些人的恶意。周会士很快就发现自己于其在武宣县的住院也受到了攻击。他来此是为了参加每年的僻静或退省。

一支由两三名武生煽动起来的做恶坏人的队伍,借口他在大风暴前逃走了,于4月14日正午时手持长矛地出发,以去拆毁我们教友住宅的围墙。他们于16日掠夺走了传教区农场中的12头

水牛,同时又放出话来威胁说农场中的妇女和少女们不久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而且也会被抢劫一空。大家不再东藏西躲了,因为所有人都认为再没有任何会引起恐怖的因素了。幸运的是知州在实施最后威胁之前进行了干预,设法使他们还回了12头水牛并为所造成的损失而支付一定赔偿。但由于对于以如此赤裸裸的厚颜无耻而犯下的双重罪行未做任何惩罚性的打击,所以大家对于这一切一有机会便会重新开始感到心惊胆颤。

无论如何,前述暴力行为与我即将向您介绍的野蛮场面相比较,只不过是儿童游戏而已。他们现在所需要的已不再是抢劫东西,而是要喋血了。

3月25日,苏安宁会士从修仁县的基督教站口出发,以去巡视在荔浦县和永安州的基督教新会口。

由于他即将前往这些新地区,所以他小心翼翼地通知了各地的衙门并请求官吏们给他配备一支小卫队。这次旅行未出现任何事故地完成了。永安州的官吏们甚至邀请他入城,非常友好地接待了他并且派遣兵卒们负责他在这片很小的基督地区居住期间的安全,已经向地方上的头人下达了命令,一些匿名揭帖已经被揭了下来。

我们的教友面对如此善意的安排而认为可以延长其巡视了,在该站口度过了复活节,接受为全部共达12人之多的望教者们举行洗礼。

4月21日,他怀着向上帝感恩的心情离开了该会口。在他经过永安城时,该城的官吏还希望再次接待他。在经过约半个小时的会谈之后,该神父又偕6名基督徒或望教者和6名衙役继续赶路了,他是乘轿子旅行的。

在距该城有1.5法里远的地方和大约在下午2点钟的时候,

当这支小小的旅行队刚刚穿过一座大桥时,便有约 15 名面色难看而又没有武器的人企图阻挡这支队伍前进的道路。他们声称是奉了一个名叫黄政球的享有参将顶子的官吏之命令前来的,而且还声嘶力竭地呼叫:“不让他们过去,杀死他们。”

就在同时,于河谷的所有村庄中,铜锣声和海螺号声混乱地响起了集合令,几面民团的军旗迎风招展地出现了,有数百名疯狂般的士兵武装以火枪、长矛、梭标和大刀冲了出来。

我们的教友于是便下轿落地,他希望逃向一个村庄中,但所有的门都向他们关闭。因此,又偕其全部队员向城市方向原路退回。在半个小时期间,有人向那里射击却未击中他们。最后,该神父被从各个方面团团围住,浑身被长矛刺得伤痕累累,他倒在地上并咽了气。

当时仍为望教者的唐启虞(Tang-Ky-Tu)和已接受归化的基督徒彭亚冒(Pe-A-Tchang)在距他有数步远的地方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另外两名望教者被捕并被押走了,但却以每个人 12 个皮阿欺特金币^①而赎回。三名差役受伤,这群暴徒抢劫了神父的小教堂,尤其是掠夺了其中的重要档案,这种损失是无法挽回的。

然而,其侍从中的两个人,特别是苏安宁会士自己的仆人曾成功地进入城市中,并向知州通报了令人痛心的事件。该官吏未敢浪费一分钟地率领他掌握的全部力量而奔向犯罪现场,总共有 40 余人。他找到了伤员和尸体。该官吏令其差役们先将尸体洗刷干净,然后用白色裹尸布包裹,再陈殓入大家到城内购买的棺木之中。最后,大家草率地将之埋葬在距那里不远的地方,再立上一块记载有他们各自名字的木牌,将木牌插在每具尸体的两端。有数名士兵被

^① Piastre,本指埃及等国的货币。但有时也泛指金币。——译者。

派去看守,但当哨兵从那里撤出来之后,难道不会有人试图销尸灭迹吗? ……

这天子夜,官吏当场便传召刚犯下不可言状之罪行的罪魁祸首,他仅在第二次传召时才遵命而来。这是一个隆重的时刻。知州居住在村庄中一间相当贫寒的房子中。其四周由武装士兵们护卫,所有人都时刻准备一旦接到信号便开枪射击。虽然大雨滂沱,杀人暴徒们在外面手执展开的旌旗,置身于具有一枪射程之远的地方,勇敢地准备捍卫其长官。

对于向他提出的指责,此人敢于以否认而抗辩。由于众人大声喧哗,所以大家根本无法知道该地区若无他的命令是不会发生任何事的。但是,当局的代表却命令他重新返回其住处。因为该官吏感到力不从心,此人于黎明时分返回了其城中。

在此后的几天,众人抢劫了于复活节时领洗的基督徒们的住宅,但大家都不知道其人员的情况如何了。

知县令人护送苏安宁会士随从中的残存者。这样一来,我们教友的管家和传道员都来到了这里,以向介绍我这一幕凄惨悲剧的所有具体细节。他给我带来了官吏本人的亲笔信。作为一个害怕危及自身的人,官老爷指出了事实而又未对之作具体叙述,对于具体事件则完全相信他派向我的那些亲眼目睹的证人。他一口咬定曾向其上司们呈奏过一份有关所发生事件的准确报告。那个可怜之辈似乎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已经完成了其义务。

大家对于广西巡抚却不能讲同样的话。自近 20 天以来,他对于杀人凶手未采取任何镇压措施;他也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以防止灾难的扩大并确保传教士和基督徒们的安全,尽管我们的领事祁理恒先生针对攻击我们的每次暴力行为都反复提出过交涉。

处境艰难的广西传教区确实经受住了考验。每当听到有关其

连续不断的苦难之论述时,谁不会受感动呢?

我们本人、我们的事业和生命都被操在上帝的手中。请以你们在神圣陛下那里获得的威信而给予我们帮助吧!在上帝乐于广施恩惠的圣殿,让所有善良的灵魂和在心中牢记扩大耶稣——基督在大地上的统治权的教团,都为我们祈祷吧!其次,请为我们派来一些士兵以填补空缺和占据新的地盘。我在此之前很久就给您寄去了我的请求,我现在再次向您旧话重提,尤其是因为这种请求既非常急迫,完全有权利被提出来。

苏安宁会士的年龄为 33 岁,他是于 1889 年末左右到达传教区的,始终在象州县内工作。他在那里学习了汉语之后,便奉命从 1891 年初开始主持传教区的工作,也就是说正当我于春季去视察传教区的时候。当我主持教区的工作时,他又即将负责修仁和荔浦县基督教会口的工作也列入该传教区的辖地范围内了。他本来可以对这些传教区大力发展,并且一直扩大到他刚死于那里的永安州。

他主要是在象州虔诚地工作,曾在那里创办了多项事业,尤其是在那里牢固地创设了圣子教堂的慈善机构,而且他自己(里昂人)也从事在龙女村建造圣母院。他正是由于圣母的保护才获得了许多恩宠。

中国广东宗座代牧区的综合报道(伸德辉会士与 13 名基督徒被杀案)^①

外方传教会神学院的院长向我们传来了有关伸德辉会士与 13 名基督徒在广东被杀的下述情节。我们已经公布了这一悲惨事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 71 卷,1898 年。——译者。

件,但刽子手们的残酷行为要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我们过去很少会有机会叙述类似的流血场面。

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广东宗座代牧区邵斯主教的书简

1898年10月21日于广州

您已知获了伸德辉神父的暴死案,这件事发生在10月14日晚上4点钟。我们下面就用简单的几句话将我们刚刚搜集到的有关柏塘(Pak-tong)流血悲剧的具体情况做一番简介。柏塘是博罗县的集市,属于惠潮道,距广州有35法里之远。

在该省中,当所有人都未预料到此时会有任何令人不安的消息时,我于10月15日早8时左右收到了如下内容的一封电报:

“伸德辉神父与13名基督徒被活活烧死。”

两小时之后,又收到了这样一封电报:

“伸德辉神父的头颅被用石块砸碎了。”

伸德辉神父的邻居——尊敬的冯舜生(Frayssinet)神父签署了这几封电报。然而,他处于距柏塘有6法里之远的地方。很明显,他可能是受发疯似的基督徒们欺骗了,因为正是这些人传来了最早的消息。所以,我们怀着这可能仅仅是虚惊一场的想法,便开始稍微平息了一下最初使我们心碎的不安情绪。此外,立即获知了这一消息的总督让其知府转告我们说,该神父并未死亡;他又让其知州告诉我们说,柏塘的所有教案都于10月13日被完全处理完毕了。这一切太具体和太好了!但大家更喜欢在如此残酷的环境中抱有幻想。大家都希望这种事实仅为一场梦幻。

唉!10月17日,事实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任何怀疑都云消雾散了,伸德辉神父已经与13名基督徒一起被杀害。在北

京就如同在巴黎一样，大家已经从外交部获悉了这一令人悲痛的消息。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这些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在柏塘附近共有千余名望教者，尚且不包括那些基督徒。然而，异教徒们和尤其是官吏们都非常痛苦地看着崇拜上帝的信徒人数与日俱增。自一段时间以来，继这些麻烦事之后，在基督教教民和异教徒民众之间又爆发了战争，基督徒们被包围了。

我们从广州促使总督平息这场动乱。一名特使和 120 名营勇被总督阁下派遣出去了。至于伸德辉神父，他也前往柏塘以便与官吏们进行讨论。这一天是 10 月 10 日。

因此，此时在场的共有 4 名军官率领的 120 名营勇以及两名文官：博罗的知州和总督的特使。

虽然市井小民们被鼓动了起来，但由于他们主要是反对官吏们而不是神父，所以危险似乎尚未迫在眉睫。事实上，13 日晚上，大家达成了一项全面的协议，用 300 个皮阿斯特作为对基督徒家庭损失的补偿，因为这些家庭至少损失了 800 个皮阿斯特。

该神父接受了这项条约，仅有几项手续尚有待于完成，这一切都应该于次日结束。尽管如此，伸德辉神父希望尽快出发。有些不祥的流言已开始传播。异教徒们秘密地集合于柏塘集市之外，距天主教小教堂约有数步远的地方，在该城首席官吏的店铺中讨论，该市的长官是基督徒们的最大敌人。

14 日清晨，博罗的知县点燃了导火线，他派出了 9 名衙役去索求一个邻村答应支付他的 20 个皮阿斯特的一笔款项。当衙役们把债务人带回来时，异教徒们出其不意地扑向了他们，杀死了三四个人，解脱了被囚禁者并冲向了知县下榻的衙门。他们企图烧毁衙

门,但集市上的人却阻止了他们这样做。

暴徒们曾坚信自己不会受到伤害,被包围于其府宅中和战栗不安的官吏们也无能为力,他们现在也知道了自己更喜欢捕捉哪一种猎物了。他们于四面八方吼叫:“处死洋鬼子及洋教信徒!”众人在所有方向都敲响了警鼓,将集市上的所有恶少都集合了起来。经过半小时之后,骚乱者的人数超过了 4000 人。

现在已经是早 8 点钟了。他们于是便冲向了伸德辉神父所在的小教堂,该神父刚与 20 多名基督徒做了神圣的弥撒。歹徒们又冲向了大门并企图用斧头破门而入。当他们发现大门不会按他们的心愿很快地掉了下来时,于是便去采购 450 公升煤油。为了支付这些煤油,他们便敲诈勒索集市上的人。这些人又令人运来了 20 多驮干草,将它们沿门扇而堆积,接着在干草上浇上煤油之后便于其中放火。他们也从城墙之上抛下几束已点火烧着的柴薪,用一种日本泵喷洒煤油以加旺火势。

火苗很快就从所有方向升起,烧着了建筑物的正面,而且火舌已舔着屋顶了,就如同形成了一个时刻都准备吞噬无辜受害者的巨大的柴薪火堆,而那些受害者则被囚禁在已着火的围墙之后。异教徒们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声。其中有四个囚徒从一扇窗户跳了出去,以试图在逃跑中获救。有两人被发现和辨认出来了,他们当场就被毫无怜悯心地杀死;而另外两个人却赢得时间以消失在人群中,从而逃离了劫难之地。

在此期间,于小教堂中的这些殉教者之间,该产生多么动人的场面了,他们慷慨地以牺牲其生命而奉献于上帝。我们的羽笔拒绝对此作出描述。该传教士发现死亡逼近,于是便为 7 名望教者举行洗礼,为基督徒们举行忏悔仪式和分发完整的赦罪符,促使他们准备去死。他们现在都在那里于洗礼或悔罪的

永福水中再生。他们集中在祭坛旁边，既不感到心烦意乱，又不无恐惧地等待着最崇高时刻的到来，按照上帝的榜样而饶恕了他们的刽子手。

最后，大约在晚上4时，经过8个小时死一般的惊慌不安和残酷的临终痛苦之后，当大火最终完成其“工程”时，经大火焚烧的建筑物前侧发出巨响地坍塌了，从而造成了一个可以使人自由进入其内的宽阔缺口。营勇们对这些废墟发动了进攻，并且通过升空的烟雾而发现该传教士紧傍祭坛屹立在那里，既保持平静又很驯服，由其呈祈祷姿态的基督徒们所簇拥。

这种空前绝后的情景完全可以使最冷酷的心软下来，只会激起这些凶暴之徒们的野蛮行为。当他们正准备向人群射击时，柏塘的那位官吏突然间分开人群而匆匆忙忙地赶到了。他以一种手势而阻止了射击并进入了小教堂。囚徒的心中立即透过了一丝希望之光。他难道是前来拯救他们的吗？难道上帝会满足于向他提供牺牲机会而放弃索求其他人的性命吗？啊！他们的犹豫绝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而且对于他们奉为自己的解救者的那个人的勇气和怜悯心估计得太高了，他前来仅仅是为了将其亲属中的一个基督徒从死亡中解救出来。神父请求他拯救他们，或者至少是拯救其基督徒们。因为此人在表现出勇气和决心时尚有能力这样做。官吏仍对向他的乞求置若罔闻。

他刚刚偕其亲人出来，敌人们就迫不及待地将其双手浸在血中。从缺口中出来后，用枪口对着他们的受害者。该神父未喊叫一声地倒在了地上，他身上共中了三颗子弹。第一颗打在了大腿上，第二颗恰恰将胃穿透，第三颗擦右额而过。凶手们在发出残忍的喊叫声时，便如同秃鹫一般俯在他那尚在跳动的胸膛上以满足其仇恨。他们特别是发疯般地追击传教士，每个人都在争夺痛打他的荣

誉。他们用剑和刀于其胸膛的每侧与脖颈上都刺成了很大的伤口。其中的一名暴徒用斧头劈开了其头颅，其部分脑浆喷了出来。其他的受害者们都遭到了剑刺、刀砍和残伤其尸体，另外有些人被斩首了。很少的几位基督徒未被最早的几枪打中，以消失在好奇者与刽子手们混杂在一起的人群中而幸免于难。我们正是从这些人中获得了对这场流血悲剧的记述。

凶杀完成之后，凶手们又用脚乱踢乱踏其受害者的尸体，从而满足了他们那掠夺和抢劫的欲望，抢空了他们手下能遇到的一切什物。但这还不算完，在最野蛮的残酷之外，还进而加以最卑鄙的污辱和最可耻的行为。刽子手们又扑向了殉教者们那淌血的尸体，而殉教者们于其享天福的受难之中可能具有与耶稣——基督受难时的许多相似之处。凶手们剥去了受害者那沾满鲜血的衣服，使这些人完全赤身裸体并将他们拖到了在距小教堂有 30 步远处流动的一条小河畔。大家在那里发现传教士的双手仍在痉挛性地摆动着。这些恶徒之一害怕把传教士活着抛在那里，于是便用一块巨石砸碎了其脑袋。

凶手们那恐怖的勾当完成之后，便又转向小教堂。在将小教堂彻底抢劫一空之后，又把它拆了个底朝天。当他们认为基督教和基督徒们现在已完蛋的时候才感到了心满意足，他们不再怀疑殉教者的鲜血是使得能够征募殉教者兵团的种子，天主将会鼓动受其温柔与慈悲鼓舞的新传教士们，这些人将会自己为其战友们的鲜血报仇，甚至会归化那些受蒙蔽的刽子手们。

包括神父在内的多达 14 名的受害者之尸体整夜都被暴尸于那里。次日，有几名基督徒得以让人搬走了其亲属们的尸体。伸德辉神父的尸体已经失踪，大家在数日期间一直在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最后，11 月 3 日，我们获悉已在惠州府找到了他的尸体，

他可能是由凌洛朗(Laurent)和冯舜生神父负责安排在博罗的小教堂中,而且在那里一直停留到新命令的传来。

在如此突然发生的这次流血教案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持续了近9个小时的对小教堂的包围中,没有任何官吏和任何兵员前来帮助该传教士。然而,兵勇们驻扎在距那里只有二里(800米)远,军官距那里只有30步,其余人距那里只有不足一公里远。他们在前几天都曾与传教士谈判过。我们不能说他们无力相救,因为集市上的官吏曾得以进入小教堂以救其亲属,而且这还是在最危险的时刻。这或者是由于策划了一次反对神父的阴谋,或者是这次可怕的屠杀是无法理解的。应该怎样解释这一切呢?未来可能会向我们澄清事实真相。暴徒们于前一天夜间在衙门中整整聚会了一个夜晚,这种事实不会与该教案无关。

但大家可以说,整场灾难的原因首先在于柏塘知县,其后则在于总督。知县自就职以来的4年间,尚未审判过一桩案件,在其辖地之内共犯下了700多件谋杀案,他始终放任自流。曾经有人徒劳地试图将他革职,但从未获得成功,因为他受到了广州的一名大官吏的强有力的支持。当大屠杀的最早消息传来时,他确实立即就被免职了,但这已为时太晚。此外,我获悉他此时已被投入大牢关押起来了。

至于总督,我确实认为,他在刚才发生于我们身上的事件中负有很大责任,他通过其仇视传教士们的急信而向官吏们下达了不受理基督教案件的秘密命令。许多官吏都向我们出示过这些文件。望教者人数太多,这就是该官吏感到特别烦恼的原因。必须恫吓这些人,这就是他的口号。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伸德辉先生是1865年9月22日诞生于普依区的库本(Coubon)。他于1887年10月25日在巴黎

神学院领受小神品,于1889年9月21日举行派立礼而成为司铎,于该年12月23日出发赴广州。

中国鄂南宗座代牧区的报道^①

我们于上一册中发表了一份通报在湖北南部的比利时方洛各会士董若望死亡的简单电报。下面就是从引起这次凶杀的流血现场传给我们的一些令人恐怖而又悲惨的细节,这些情节是在我们的本刊即将付梓的时候才传给我们的。

帕利多尔和卡西安神父对董若望神父被杀案所作的记述

逝世之前

小兄弟会的尊敬神父董若望于1870年5月14日诞生于布瓦尔(比利时),于1891年3月间入华。祁国良(Christiaens)主教阁下指定他负责花家河传教区,但他在那里患有一种慢性发热病,仅仅到同年12月才痊愈。为了使他恢复健康,宗座代牧于是便将他送往担子山的格里蒂安(Gratien)神父处,那里有一个位于大山中的基督教会口。他在那里一直停留到1898年9月间。在这个时期,居住在蛇口山的尊敬的玛塞尔(Marcel)神父正处在垂危之际,他匆匆忙忙地前去帮助这个尊贵的病人。某些尚很含糊和遥远的风言风语已开始流传。11月28日,神父向宜昌寄去一封书简,以阐述其处境的危险。

他说:“快来救救我吧!否则,一切都太晚了。官吏丝毫不管我,他甚至不回答我反复提出的请求。我不知道该如何办,自五天以来已经未曾入睡了,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眼泪了。”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71卷,1898年。——译者。

主教大人在汉口时就病了，尊敬的卡西安(Cassien)神父前去拜访宜昌的大官吏并且为了拯救神父而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这位高级官吏于是便下达了命令，但非常遗憾的是巴东的官吏却无动于衷。

小麦田的基督徒们认为该神父在他们之中更为安全，于是便于11月29日前来找他。他于是便决定离开蛇口山而前往小麦田，小麦田是距那里有12公里之远的一个会口。

同一天在距蛇口山36公里之远的中溪，打教也如同暴风雨般地发生了。那些骚乱者们攻击基督徒，抢劫和焚烧他们的房屋。基督徒们为了挽救其生命而逃亡到山洞中或深山老林。在逃亡中，有两名望教者落入到了暴徒之手。

“背教或投降！”

两名望教者之一回答说：

“背教？永远不可能。如果你们愿意的话，那就杀死我吧！但我永远是基督徒。”

暴徒们使他遭受了各种不同的大刑拷打，接着又砍掉了其头颅。

次日，将近晚七点钟左右时，有一名新教徒前来向董若望神父叙述这些令人恐怖的场面。基督徒们刚听到他的叙述便各自以逃亡而寻求保全自己的性命。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现在神父遭到了所有人的抛弃，他正置身于一个自己不认识路的地方，而在四面八方又都被与其不共戴天的敌人所包围。怎么办？在这个最后的时刻，对其母亲的思念萦绕于其脑际。他匆匆忙忙地给其母亲写了几行遍洒其眼泪的文字。信写完之后，他将信件交给了一名基督徒，嘱咐他将信送至其家中。

他在一名辅弥撒者和一名仆从的陪同下，稍后于晚7时许便

登程了。其仆人突然间对他说：“神父！在距此有6公里之处，于山峰上有一个岩洞，我们应该前往那里去。”

于是便开始了一条真正的骷髅地^①之路。他们必须在黑暗中攀登，在荆棘和刺丛中开辟一条路，攀援大树和山岩，这一切都是以怀着一种敌人即将接近的念头而完成的。

在黎明之前，董若望神父进入了山洞。他自认为在那里找到了一个可靠的避难处，但他的希望仅是一纵即逝。事实上，在那里居住了4天之后，其蔽身之处便被异教徒们发现了。现在必须上路。那时刚到半夜，漆黑的夜和不停的雨使行路非常艰难，宜昌将是一个可靠的避难处，但任何人都不认得路。

传教士对其同伴们说：“勇敢点！我们都是仁慈上帝的保护之下行事的。”

为了避免遇到任何人，他们沿一条激流行进，随时都需要渡到大河彼岸去。清晨，可怜的神父双脚都满是鲜血，再也不能走路了，于是便坐在一块岩石上以多少吃一点食物。现在已根本不可能再继续沿同一条道路前进了。这就是他为什么派其仆人前去寻找另一条道路。天啊！这名忠实的仆人再也未能返回来。他被那些迫不及待地想抢劫他的暴徒们抓住了。对于他们来说，物品便成了该传教士处于附近地区的一种可靠迹象。他们于是便立即开始呼喊，左右奔驰，四处寻找其猎物，酷似一群发怒的老虎。董若望神父确实试图摆脱他们，但依然很快便落到他们手中。众人立即剥掉了他的衣服，捆住了其双手。由于其双脚都已挫伤，所以大家只好把他带到了黄柏山。

他于上午7点钟到达那里。一旦当大家看到他时，便发出了一

① Calvaire, 本指耶稣受难之地。——译者。

阵吓人的欢呼声，一阵疯狂的呼叫声。人们首先用竹杆拷打他，然后便把他带到了塞口山，他在那里垂死挣扎了6天。他遭受的虐待可能是极端恐怖的，在5天间一直被手脚绑在一起地悬挂在一棵树上。人们戳扎他，用已烧红的烙铁施烙刑。除了身体的受苦之外，再加上灵魂的折磨。他亲眼看到了其7名教徒先遭到大刑拷打和后被斩首。

最后，12月11日，董若望神父被斩首。每个头领都想殴打他，其头颅直到第17棒时才滚落在地上。这些恶虎般的人物以饮其受害者的全部鲜血而解除其魔鬼般的口渴。他的头颅被暴陈在那里示众，后来又被拖入了污泥之中。其头盖骨被用木棒击碎，脑浆也被吃掉了。大家用一把斧头劈开了他那从下腹直到脖子处的胸膛，以便能够取出其心脏和肺。他们割掉了其左大腿，暴徒们之间瓜分了其肉。

死 后

塞口山的几名基督徒传来了宜昌的消息。该城的大官吏立即向巴东县的官吏发去了一封急信，只要求他对此做出解释。此人回答说：“神父已被抓，但他还活着。”

他在第二封信中又说：“神父已死，但我不知道是自然死亡还是暴卒。”

该官吏于12月6日接到了保护该神父的命令，但屠杀却是于11月发生的。在5日期间，如果他稍微有一点善意的话，那么他就能很容易地进行干预。因为从巴东县到塞口山之间只有4日的行程。

11月23日晚，宜昌的官吏向我们描述说，董若望神父的尸体已被运达，大家可以把他抬到教堂中并将他埋葬在那里。我们回答说，首先必须当着官吏的面验尸。他制造了一些难题，这就是为什

么我们紧急报告了法国驻汉口的领事德托美(Dautremer)先生。

在等待期间,大家将灵柩陈殓在大江的沙滩之上,他在那里一直停留到1月26日。中国人犯下了一种令人憎恶的野蛮罪行。灵柩刚停放在那里,他们便开始践踏和诋毁他,对这名可怜的殉教者破口大骂和讽刺挖苦。他们高声呼叫:“啊!大家最好是设法吃掉这个西洋鬼子的肉。另外还必须取其骨以熬汤喝。对!我们自己也希望轮到在宜昌吃欧洲人的肉。”

这就是在大家声称非常文明的天朝帝国中出现的场面。这就是他们怎样对待欧洲人的,即使这些人已死去了也罢。这个民族竟敢于吹嘘对于死者具有尊重感情。

星期四,1月26日,该官吏由于总督的一道命令而被迫为了对尸体验明正身而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点。由于中国人出于迷信而不允许死人进入城廓以内,所以必须在城墙之外找一处地方。官吏指定了龙王庙。

一打开棺木,便看到了一颗血迹斑斑的头颅、一副已被剖开的胸膛,这是一具遍布伤口的尸体,使我们的心的碎了。该官吏本人也严峻地如同一块顽石般地站在那里,既不流露任何感情,又一言不发。

尸体覆盖以司铎的装饰物,然后被陈殓在一口豪华的棺木中。修士们匆忙将龙王庙改造成成了一个灯火辉煌的小教堂。我们尊敬的教友就安歇在那里,而我们却在焦急地等待给予他公正的评价。

中国广东宗座代牧区的综合报道^①

下面发表的是邵斯主教的一封书简,它向我们提供了有关从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72卷,1900年。——译者。

传播福音的观点来观察其传教区现状的一些令人深感宽慰的细节。大家看到了伸德辉神父被杀案就如同过去一样,也导致了基督徒们的一次新收获。此外,上帝报复了那些策划这次屠杀和为此提供了方便的人。相反,许多危险仍威胁着传教士们。天啊!为什么我们事业的人力和物力会如此有限呢?我们该是多么希望便利传教活动啊!

巴黎外方传教会广东宗座代牧区邵斯主教的书简

打开法国的各种报纸,我略感意外地从中读到,广东传教区遭到了破坏,而伸德辉神父的被杀案则为其原因。我可以对你们说,难道唯有广州的主教及其传教士们才是仅有的不知道这一消息的人吗?然而,这一错误当然是很容易解释的,因为自一段时间以来,报刊中便大量刊登有关远东的越来越不准确的新闻。相反,这种消息同时向我提供了阐述广东传教区大好形势的机会,虽然此时在中国却出现了普遍性的动乱和动荡。

在伸德辉神父被杀之前,我们在该省共有4—5万名望教者(慕道友)。自从他死后,我们却共有6—7万人左右。因此,该传教区远没有被摧毁。我甚至相信,就目前情况而言,大家还完全不能指望它更会繁荣一些。

自从1884—1885年法中战争时的著名教案以来,法国驻北京的公使馆尚从未为我们谋求到赔偿。由伸德辉神父被杀而引起的教案本身也尚未能从总理衙门得到一种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然而,我们的小教堂每天都被新的崇拜者挤满,所有的传教士都有大量工作压在身上。所以,为了促使对整个该民族的教化变得更容易一些,我刚刚要求对这片辽阔领土进行再划分。我希望我们将来将会把广东东部也奉献给您,那里仅有不足2万名基督徒和同样数

目的望教者。

非常遗憾,我们那年轻的传教区既没有交州传教区那样富裕,也没有它那样组织得严密。我们的手段过分有限了。我们的资本过分短缺,而无法教化这些人。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6—7万名的各种年龄层、不同性别、社会地位各有所异和分散在整个法国的学生的情况吧!为了教育他们,该需要多少教师啊!仅仅清除实用主义的所有污染,那就该费多少力气和心血啊!你们这些基督徒们计算一下,你们将会发现归化100名异教徒所必需的献身精神啊!

你们现在也可能希望知道继伸德辉神父死后柏塘市的情况。柏塘的领土面积很小,它在广东这个广袤的省份中只是很小的一点。大家可以说它正相当于法国的一个区。它位于博罗地区,距该城有6古法里。冯舜生神父就居住在那里,正是此人向我们通报了1898年10月14日的悲剧。他从未离开过其区域,这就证明了柏塘的动乱并未扩大到大家可能会猜测的那样遥远。

在杀害传教士及其基督徒之后,暴徒们因其“战功”而得意洋洋,于出事地点周围停留了4天,蹂躏和抢劫了附近地区,而又不大注意把异教徒与基督徒区别开来。他们是以战胜者的姿态行事的,甚至还在集市的旁边修建一座小堡垒以保持其声誉。他们大吃佳肴美味,只要求继续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过上一种舒适的生活。

对于他们来说,非常不幸,这一切都在该片领土上结束了。大约到了11月最初几天,惠州军队的统帅率领1500名士兵来到了柏塘,他奉命缉拿和惩办罪犯……暴徒们不等他到来便逃至深山中了。

唐将军首先关心的是军事占领受牵连的所有村庄。然而,他在

那里遇到了抵抗。在惠东村,有人向他派出去的人射击;他要求缉拿三名罪犯和索赔 2000 元大洋,其士兵在当地受到了步枪射击的欢迎。反叛者们遭了大殃,将军共有四门小口径的克鲁伯(Krupp)大炮。他将这些大炮搬上了阵地,爬上了该市最高的塔以指挥攻击。

只要瞄得很准,有几炮就足以使村庄的四角起火。他于是便派出了由 400~500 名士兵组成的一支小分队。居民们确实曾在一段时间内试图击退来犯者,他们甚至杀死了四名士兵并使一名戴红顶子的军官受到了致命伤。但在不足一个小时的期间,该村庄就只剩下一片废墟了。共有 50 多人倒在了炮弹之下,其余则四散溃逃,23 名被押到柏塘的俘虏均立地斩首。

这次胜利在整个地区散布了一种恐怖情绪。将军控制着局面。罪犯中的每个人都试图处于安全之中并前往相当远的地方去了。

柏塘的地方官与惠州的官吏于 13 日的会上决定处死神父。这次会议将于该城小教堂附近的一家制糖厂中举行。这个官吏仅在距那里有 12 法里远的罗浮山和尚庙中才停了下来。

在两个月期间,整个地区都成了一片真正的荒凉不毛之地了。贸易已被化为乌有,仅仅是那些正直的人才有权在那里行走,基督徒们完全自由,任何人都不想骚扰他们。营勇们始终都在寻找罪犯。最使人感到害怕的抢劫犯在深山中筑垒固守,因此为铲除他们而组织了一次远征。但大家在那里仅找到八名落伍掉队的家伙。他们在一段时间内曾试图自卫,其中之一被杀,其他人则被俘。他们的党羽发现形势不太安全,从一开始便逃之夭夭,移营它地了。

正当所有人都想躲避起来时,营勇们却在大肆搜捕人,每天都有一些不幸的人落入他们手中。博罗的监狱暴满,知县再也不允许

囚徒有时间感到厌倦烦恼了。

每天清晨,知县便将 10—12 人裸体吊死在监狱的大梁上,然后招来大街上的人以使他们以此为儆。知县于是便令其衙役们以一根吓煞人的藤条倍加卖力地抽打他们。当他们的皮肉或碎片而四处飞溅和血流成河时,知县便转向围观人群,向他们做一次颇有分量地说教,现身说法地解释某种放荡生活的后果和一种罪行之必然结果。继此之后,你们可以判断大家是否有兴趣再重新犯这种罪行。所有人都狼狈不堪地退了出去,个个都指其诸大神为证而发誓今后要行为检点一些。

现在尚需要惩罚曾眼看着传教士被害而未能出面救助他的知县和军官了。前者很快就感到了其错误的严重性,他于 10 月 14 日晚上就试图于其位于柏塘南部的衙门中自缢。绳索绝断了,这个可怜虫不希望在这些可怕事件之后再活下去了。因为这一事件使他在中国法律面前永远显得卑贱了,于是便服毒自尽。其尸体被陈殓在一口棺木中并被抬回了府邸,其子也被囚禁起来了。据说他的两名主事都变疯了,在某个的陌生的村庄中为其罪行而服刑。至于那名王氏官吏,其官衙位于距杀害伸德辉神父的小教堂只有 40 步远的地方。他在这场斗争结束时才进入那里以救出他的一位被与神父关在一起的亲属。据说,这位官吏继他的可耻行为之后也未能再活下去。他被起诉是这次大屠杀的罪魁祸首,于是便奉命前往广州以作出解释。但他感到没有勇气面对上司的审判,于是便吞下了一把金箔一命呜呼了,就如同那些遭到巨大羞辱之后而不想再活下去的中国富翁们一样。

事实上,这位官吏是不折不扣的罪犯。大家知道他曾参与了 13 日该市糖厂的会议,他是这一滔天罪行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大家还曾记得共有 150 名营勇们被布置在距小教堂只有二公里远的

地方，任何人都不能前来帮助该传教士。这些营勇们的团总获悉了对教堂的包围，据说他也希望集中其军队并赶去保护神父，但他没有找到任何人。这位王氏官吏似乎采取了某些措施以不让从该侧对受困者作任何援助。此外，这也是该军官于其寄给我们领事的报告中所证实的情况，这同时也可能正是使他免遭惩罚的原因。

据我刚才向您讲的情况来看，我们似乎觉得于该省中呈现出了一片十分安宁的局面。很明显，暂时尚没有任何打教的风声，宗教到处都在发展之中，但却不应该认为再没有任何可供改进的地方了。那里良好秩序仅仅是相对的，武装偷盗、抢劫、海盗行为等问题都比任何时候更加迫切地提到日程上来。大江、大河、小河上都有强盗们的船只游弋，秘密会社也在蠢蠢欲动，凶杀事件日趋增多，我们的老总督对这一切尚未介意。

在东部，骚乱变得非常频繁，以至于政府被迫向那里派遣出一支出征军队。有时整个村庄都受到了攻击和被摧毁，陆丰城也差一点被夺占和遭到蹂躏，我们在那里也有一座遭到了抢劫的小教堂，其规模不算太大。在其它地方，如果抢劫者们尚不算特别多，那么他们也足以使民众们时刻都不得掉以轻心了。

那么，这种混乱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生活贫困和米价昂贵在其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近年来的干旱非常有害于收成。今年头五个月的天气非常不利于水稻的生长。各地居民们发出的呼唤声直上九霄，这是为了祈雨。大雨最终于6月最初的几天降落了，也就是当该省的南部已开始初次收割时，但这次降雨量特别大，以至于现在的农作物被完全淹没了。

这就是广东省当前的形势。

中国广东宗座代牧区的综合报道^①

我们从广东又收到了这封令人沮丧的书简,它说明了华南的传教士及其基督徒们正忍受着什么样的苦恼和焦虑。此外,在辽阔的中华帝国的其它省份,尽管大家根据刚颁布的赞同传播福音的圣旨而抱有很大希望,但其形势根本不是一片光明。我们的合作者于其祈祷中对于这些受到了打教之苦的传教区保持一种良好的回忆吧!

广东传教士纪尧姆(Guillaune)神父致巴黎外方传教会修道院长德尔佩斯的书简

愿上帝的意志始终保持稳定和其神圣的名字始终都能受到祝福。作为圣父领地的无用仆人,我需要通过在本站口完成大量归化,用自己的虔诚行为来报答其圣宠。现在由我施行圣事的共有78名领洗的成年人,一切都预兆着在下次施行圣事时,这一数目将会被远远地超过。天啊!一次既激烈又出乎预料的教案刚刚使我那可爱的教区陷入悲哀之中,前途将会怎样呢?它现在已完全掌握在上帝手中,我只好服从上帝的善意了!

去年和今年,我曾经得以跑遍了所有的基督教会口,经常穿过位于距此有一刻钟行程之远的兴宁城那人群熙攘的街道,却未听到过任何大声咒骂和任何一点仇恨的喊叫声。我今天再也不能那样做了。农历五月十七日(西历6月24日),新教的使徒们不顾知县的反对,背着他从衙门的监狱中放出了一个人,而他们本来没有任何理由去保护此人。继这次鲁莽行动之后,在兴宁城的四门都张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72卷,1900年。——译者。

贴了一些揭帖,要求驱逐“洋鬼子”,彻底毁灭天主教和惩罚基督徒。一名望教者撕下了这些可耻的诽谤文字,我将之寄往广州。农历该月的十八日,相距约有一法里远的云佛溪地区的乡绅们前来向知县报告了“三清风”(sam-tiam-fong)的秘密活动,这是中国的一种共济会,它受到了法律的禁止。

次日,也就是十九日,衙门中的 32 个人,也就是营勇和衙役们都被派出去查看实际情况如何。由于他们索取现大洋,而且还是当场交付,所以数百名“三清风”成员于夜间前来包围了他们所住的房子,在进门处放了一把火。15 名衙役试图逃生,却被以前所未闻的极端巧妙而又残酷手段杀害。

二十日,从黎明起,这是一种真正的导火线,整个地区都处于一场大动乱之中。到处都是唯一的和相同的一种呼叫声:“一定要杀死洋鬼子!杀死天主教的所有崇拜者!”大家无法想象出会如此突然地爆发出对我教的仇恨,为此则必须倾听一下这些狂怒者们的呼叫声。骚乱者们错误地指控新教的使徒们向城市当局报告了他们的行为。此外,由于新教在此颇受鄙视,由于大批人都不会在天主教传教士和基督新教牧师之间作出区别,所以由此产生了这种不可调和的仇恨。

这些威胁性的语言很快就化成实际行动了。

农历该月二十日(西历 6 月 27 日),位于距此只有 8 里(10 市里相当于 6 公里)的沙坪的新教机构均被大火烧毁。我接到一些善意的异教徒的报告,只得被迫逃亡,抛弃了我的小教堂而避难于城中。一时间,附近所有村庄均被抢劫一空;同一天,云佛溪和内比溪的基督教店铺均遭抢劫。二十一日,我们拥有的唯一一个距此有 17 里的基督村(会口)也被烧毁。骚动者们的狂怒如此强烈,他们砸碎了无法烧毁的一切,甚至到水塘坑底去寻找由我那些逃亡的

基督徒们沉进去的物品，将它们砸成碎块。非常幸运，该村庄的 18 个家庭都得以及时逃亡山中，否则他们必会遭到屠杀。也是二十日，由一名和尚率领的 100 多个人在罗浮放火。烧毁了四个基督徒家庭的住宅。同一天晚上，他们又在其它地方烧毁了另一幢房子。

仇教情绪最激烈的揭帖都被张贴在市广场上。这个秘密会社的成员在那里宣布，他们希望杀死所有的洋鬼子，因而也就是要消灭洋教、屠杀所有的基督徒。他们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中国就必然会变成外国人的一片领地。”我们既不抱怨民众，也不责备知县。因而为我们自己留下了一条自由通道。否则，大家就会对此后悔莫及。

在各个不同地方，都悬赏索求我的基督徒们的头颅。某人的头值 20 块银元，另一个人的头值 30 块。这样一来便出现了一种无法言状的恐怖气氛。共有 500—600 名基督徒（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立即放弃了其村庄。只能在山中寻找了蔽身地，而且还必须要在哪里度过数日。非常幸运的是，天气尚不寒冷。老熟人、朋友、亲属都冷酷无情地向他们关闭上了大门，把他们推了出去，并且作为表示歉意而声称，接受他们就会因株连而殃及自己，面临被抢劫和遭火灾的危险。这一切再真实不过了。

如果说“三清风”信徒们当时仍在坚持执行其计划，我的基督徒们仍在遭到屠杀和我的教区已不复存在了，那么他们后来却走得更远。他们的匪帮以抢劫相威胁而敲榨勒索所有富裕的人，在内比溪焚烧了一家当铺，于该集市附近抢劫了九只满载货物的船。异教徒们明白，现在已轮到抢劫他们了，必须对此作出反应。他们于是便在四面八方都开始同心协力地抵抗敌人。本县未遭到更大的灾难，这应该归功于他们。除了上帝之外，我应该把能将自己的教堂、我的住院和查沙梁(Tchack-sa-liang)学校被保护下来的功劳

也归功于此。事实上,有这些教派的数百名信徒怀着在我这里破坏一切的意图前来了,距此有四里的大罗屯的人于途中阻止了他们。面对这种出乎意料的抵抗,他们只好原路返回并四散而去。

我个人并没有因遭受损失而抱怨。但我这个可怜的教区将会如何呢?难道不应该担心我在长时间内再也不能巡视它和再也不会会有归化者了吗?我在查沙梁的那些人,那些织机均被捣毁和房子已被烧毁的纺织工,他们该怎样维生呢?他们现在的处境非常艰难!

大家可能会试图认为所有的灾难都会不约而同地同时降临到我的身上。

元月三日,一场火灾烧毁了城市的大部分设施。接着是一场大旱灾,继此之后又是一场可怕的大水灾,大江西岸的许多家庭都颗粒无收(本来还应该以此收成维持生活和修浚河堤);接着一场新的旱灾使人无法插晚秧,而早稻的收成又极坏,不超过正常年景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除了所有这些灾难之外,再加上完全缺乏贸易,情况太糟了。这并不是怀着向传教士试探上帝神意的目的。它只会讲:“好吧!”

我希望这封书简能寄给《传信年鉴》,以便能促使许多读者对我们教区进行祈祷,同时也期望某些具有慈悲心的人能在分配其施舍时记得起他们!

在必须立即付印本刊的时候,我们对于北京的屠杀尚未得到任何正式确认。我们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了,正在焦急不安地等待这种可怕事实的消息。

无论如何,我们都怀着一种痛苦的崇拜而刊布法国人樊国梁(Favier)主教阁下的这封令人非常钦佩的辞职书简。我们有幸在数月前于巴黎见到过他,我们也得以欣赏他该是多么热爱这个中

国啊！而中国自 40 多年来就已经是他的第二祖国了。

中国北直隶樊国梁主教的书简^①

1900 年 5 月 18 日于北京

我在法国的逗留时间流逝的非常快。所有对我的友好接待都未能使我在自己的宗座代牧区之外停留更长时间。我庆幸自己及时返回了我的宗座代牧区，因为我预感到正在策划着某些严重事件，一场风暴可能已经掀起。因遇到巨大风暴的情况下，船长在驾驶室中，他应该专心致志地尽职。

为了更好地理解如此迅速地产生的暴乱和反洋教运动，则必须研究其原因。因此，请允许我向您提供某些初步解释吧。

当皇太后发现光绪皇帝无能力成为皇位继承人的时候，特别是当她发现他在策划反对皇太后的阴谋以让她放弃垂帘听政时，便拥立了另外一位新皇帝，或者更应该说皇位的一名指定继承人（皇太子）。这位未来的中国皇帝年龄只有 12—14 岁，是晏驾于 1860 年的咸丰皇帝的五弟醇亲王的孙子。

这位醇亲王儿子也拥有同样的尊号，他是新皇帝的父亲，充满了仇恨欧洲人及其宗教的思想。这种仇恨和敌意是很容易解释的。事实上，恭亲王（六王子）于 1860 年夺取了摄政权，其弟七王子作为光绪皇帝的父亲而继承了他。他们二人都是醇亲王的幼弟，醇亲王本来可以名正言顺地从 1860 年亲政。此外，当涉及到选择取代无嗣而晏驾的同治皇帝的王储时，大家选择了七王子的儿子，而本来完全应该选择醇亲王的儿子。这两次不公正行为严重触怒了醇亲王，他于是便率领其全家返回了盛京（沈阳）。对于皇位继承人的

^① 译自《传信年鉴》第 72 卷，1900 年。——译者。

这种选择,使醇亲王目前在皇太后面前具有了一种很大的影响。他怀着对欧洲人、中国人与欧洲人签订的各项条约以及自 1860 年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之深仇大恨而返回北京。此外,他也是以对欧洲事务、已出现的发展、已形成的租借地的绝对无知,充满着对 40 多年的中国全部旧思想而返回来的。由于中国的元老派和上层人物一方始终都保持着对欧洲人及其宗教的满腔仇恨,所以他们都迫不及待的与端亲王联合起来了。由此产生了两个界限分明的阵营,也就是以该亲王为首的一派,以其他亲王和自 1860 年以来相继主政的官吏为首的另一派。这后一派势力接受了进步发展的思想,故起草保护宗教的圣旨和法令,一直到作为其大获全胜的 1899 年 3 月 15 日的诏书颁布为止。皇太后本人正是这一事件的唆使者,她本人署名,而且从未撤销这份诏书。

中国的元老帮最终获得了胜利。大多数派系集团都会集于“义和团”、“大刀会”等的旗帜之下。这些会社的起义诞生于山东,自 6—7 个月以来,已经开始在直隶传播并直指北京。

“义和团”确实是恶魔般的秘密会社,乞灵、念咒、魔鬼附身和甚至是着魔中邪,这一切于他们之中应有尽有,无所不为,其信徒中的奇特行为原来可能是被学者们归咎于磁性或催眠术。大家称之为歇斯底里(癔病)患者,或者痉挛病患者,但我们却认为魔鬼的作用是明显可见的。

对于基督徒名称的仇恨促使这些“拳匪”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分散在各个村庄中,于特定的日子汇集合起来以攻击某一基督教会口。5 月 12 日星期六,他们烧毁了高乐村,那里共有 70 多人被杀。此后的几天间,其它许多村庄也被烧毁,基督徒们四处逃散并抛弃了其家产。北京城本身也不安全了,义和团大批人马进入那里,到处张贴揭帖,宣布要烧毁教堂和灭洋人。这场运动似乎受到

了一些强有力人物的支持。义和团从四面八方汇向北京城内，起义军的军旗上有这样的大字：“扶清灭洋”，或者是“奉旨灭洋”。因此，危险迫在眉睫。

我们以小心谨慎的态度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我向所有的高级官吏都写了大量书信。在我的要求下，中国当局已经向许多基督教机构派出了一些军队。但军队的人数似乎始终不足，而且有时候布防也很糟。然而，若无这些军队，我相信灾难将会更加深重。

当我们处于焦急不安中时，我便命令为向上帝乞求和平而举行公开祈祷，因为惟有上帝才能赐予我们这种和平。我正式致函法国公使，他立即约见中国外交机构的代表。大家一致决定要求中国政府迅速弹压，否则将会面临欧洲军队登陆进行惩罚的危险。尽管危险迫在眉睫，我们每个人都勇敢地面对风暴和各自坚守其阵地，基督徒们实在令人钦佩，有人向他们提出背教，但他们却宁肯逃亡、破产，甚至是死亡。数名望教者在血泊中领洗。

5月28日。10天前开始写的这封书简已被10天的焦躁不安打断了。每时每刻都使我们获知新的灾难。高乐的屠杀是很恐怖的，共有80多名受害人。幼童受刑，妇女被烧死在教堂中或被乱刀砍死，男子汉都被长矛刺死或者是被枪打死，甚至传说有数人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共有20个人得救了，因为他们在发生屠杀时并不在那里。

有一个18岁的青年人蔽身于井底并在那里滞留了近48个小时。当杀人凶犯离开后，他才从井中出来，刚刚到达我们之中。在一个村庄中，两名基督徒被碎尸。在第三个村庄中，又有数人惨遭屠杀。至少有30个村庄被基督徒们遗弃了，有6个村庄以及他们的教堂都被完全烧毁。我的那些受到追捕的可怜中国人逃亡于深山中，或者是避难于我们的大住院中。我们已经收留了这些人中的

2000 多名。近几天来特别令人感到恐怖。

义和团于 5 月 26 日集结成了一支大军,以进攻正好位于北京城门的滕公栅栏(cha-la)住院。它于这一夜间仅仅是由于奇迹才得救。我们小心翼翼地让育婴堂的修女们回到了城内。从翌日起,一条令人惊魂丧胆的不幸而又千真万确的消息传播开了。义和团以一种大家无法想象到的胆量放火烧毁了汉口—北京之间的铁路,其受害范围约有 150 公里,一直到达首都附近的终点站。物资、车站、仓库,那里的一切均化为灰烬。我们现在尚不知道生活在沿线的所有欧洲人是否得救了。

就在这一天晚上,他们打算烧毁我们北堂大片设施。早在数日之前,这一切就已被张贴布告而公布了。我对于自己尚能活下来一事视为奇迹一般。各国公使都聚集起来并最终决定调集特遣部队。如果说这些部队自 8 日来尚未到达,那绝不是我们的公使毕盛先生的错误,他始终都表现出了最令人钦佩的勇气。完全如同驻天津的总领事杜士兰(du-Chaylard)先生一样。

中国军队已经开拔,以去重新占领铁路并恢复已经中断 48 小时的与天津的交通。

一道尚不能令人完全满意的圣旨已于今晨颁布。但所有这一切既未使宗教设施,又未使北京公使馆避免受到攻击。至于该省的基督教会口,它们都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每分钟都会给我们传来一场新灾难的报告。现在仍存在着希望,但我们被控制在上帝手中,没有上帝的允许,我们头上的一根头发也绝不会脱落。

这就是我们今天(5 月 30 日)的处境。希望我在未来的几天中能向您提供最佳消息。但反对欧洲人的这场动乱和对基督徒的迫害似乎组织的非常严密,以至于我们尚可以期待一切。我们以及我们的那些可怜的基督徒们的祈祷最终会平息上帝的愤怒。

在转交给方济各会士神父们的这个传教区中,我们再也不能抱任何幻想了。由各不同新闻机构发布的消息已于今天得到证实。下面就是杰里科(Jerico)的主教和中国的方济各会传教区司库波特伦(Potrom)主教阁下发给我们的电讯:

“我们收到了汉口的下述电报:湖南传教区被摧毁,三名传教士被杀,其他逃散的人正处于绝望的危险之中。”

湖南宗座代牧区是根据 1879 年 9 月 19 日的教皇通谕建立起来的。它在 1000 多万人口中只有 7000 多名天主教徒。其宗座代牧是范怀德(Fantosati)主教阁下,属方济各会。同一修会的一些神父、土著司铎和方济各会修女们组成了在这片辽阔领土的施行圣事的机构。

直隶东南部

尊敬的耶稣会士德玛斯盖(Desmarquest)神父为向我们传来一条电讯,这条电讯向他通报了两名传教士的死亡。他们都是被义和团杀死的。但电讯未提供任何具体细节。其中之一是康布雷(Cambrai)教区的尊敬的神父伊索雷(Remi Isoré),卒年 48 岁;另外一名是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教区的尊敬神父安德鲁埃(Andelauer)。

尊敬的神父伊索雷于 1852 年诞生于拉姆贝克(Rambacque, 北方)。他从哈兹布鲁克(Hazebrouck)小神院进入了康布雷大神学院,然后又在鲁贝(Roubaix)的维多利亚圣母院学院任教授三年。圣-阿歇尔(Saint Acheul)初修院于 1875 年接受了他。他于 1878—1880 年间在阿米安的上帝学院任教授,此后又继续在荷兰的格梅尔(Gemert)继续其神学学业。他于 1882 年出发赴中国,当是尚仅为一名五品修士(助副祭),在华举行派立礼为司铎,于是便将附属于张家庄中心住院的小学院的领导权交给了他,他在那里

逗留了很长时间。该神父所表现出的管理能力使他于1895年被任命为广平府地区的基督使者。由于他的巧妙手法、他对中国人的习俗和气质的熟悉、他所获得的巨大影响,大家始终都抱有很大的希望。在义和团于去年秋季发动首次进攻时,他组织了抵抗,成了义和团狂热行动的受害者。

尊敬的安德鲁埃(Modeste Andleauer)神父于1847年出生于鲁赛姆(下阿尔撒斯)。他先后为斯特拉斯堡小修道院和大修道院的学生,于1872年在圣—阿歇尔参加耶稣会。他先后赴拉瓦尔教堂和阿米安里尔和布雷斯的学院,在这些机构中分别任学监并教德文课。他于1880年被迫离开法国,在英国的哈尔若尔居住了一年,最后于1882年出发赴华。当他掌握了汉语之后,便被派到很远的地方,负责巡视基督教机构和管理各地区。他最热情工作的地方是吴桥和武邑,在那里默默无闻地做了许多工作,从而得以赢得了其基督徒们的热爱。大约到1900年6月24日,义和团才于丧失理智和狂热中杀害了他。

德玛斯盖神父请求我们从中加入以下附注,我们匆匆忙忙地遵照执行。

“由于传教士们所冒的危险,将他们及其基督徒们陷入最彻底贫困的破产等原因,耶稣会香巴尼教省从现在起就向中国派遣尊敬的贝格沃尔(de Becquevort)神父,以试图与传教区建立联系,向那里提供现在能够提供的最紧急援助。”

“贝格沃尔神父已经在直隶度过了近20年,尤其是作为传教区的司库而居住在天津市,他了解该地区及其语言。但我们无须对此隐瞒,他即将接任的传教区充满着困难和危险。所以,他必须利用与这些遥远的、今天受到了严重考验的基督教会口之命运有关的所有人的祈祷。”

四 川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学院院长德尔玛斯会士于7月18日给我们发来电报：“四川很平静。”舒伏龙(Chouvellon)主教大人于7月10日向我们宣布说：

今天上午，德尔玛斯会士向我们通报了以下情况：“我们未从满洲收到有关其他三名传教士的任何消息。据报刊报导，他们可能也被杀害了。我们更喜欢怀有一丝希望，认为有人告诉我们的某些流言不是既成事实。”

满 洲

德尔玛斯会士的另一封书简(1900年7月10日于巴黎)中说：

我有义务向您转去下述电报。这是从我们的上海司库那里收到它的，又几乎是同时从我们的香港司库处收到了一封措辞相同的电报：“纪隆主教阁下、埃莫奈(Emonet)先生与另外两名女教徒均在盛京被杀。”1900年7月7日。署名罗伯尔(Robert)。

“我们尚没有掌握有关发生在南满这个灾难深重的传教区的任何报告，而该传教区数年来一直都很兴旺发达。”

“我冒昧地向您并通过您向您的所有读者们要求，为该传教区(它现在已使我们产生了许多不安)和为我们在华所有的传教区祈祷。德尔玛斯院长。”

欧麦尼的领衔主教和满洲南部的宗座代牧纪隆主教阁下，于1854年11月8日诞生于尚贝里(Chambery)教区的钦德里厄，于1877年9月23日举行派立礼，1878年1月10日出发赴满洲，于1889年12月任欧麦尼的领衔主教和满洲的宗座代牧。

埃莫奈会士于1849年4月19日诞生于尚贝里教区的鲁米利(Rumilly)。他于1874年3月30日举行派立礼成为司铎，于1875

年1月27日出发赴满洲。

两名被杀害的女教士均属于圣—迪埃教区的方济各会的修女会。

鲁 南

斯太尔外方传教会(位于荷兰特格伦附近)的亨利·哈恩(Henri Hahn)神父于1900年7月5日写信告诉我们说:省会长尊敬的富约瑟(Freinademetz)神父于6月26日从济宁给我们发来的电报说:“传教士们缺少保护,其生命极其危险。”

同一天晚上,传教区的司库又从青岛给我们发来了电报:“形势非常严峻,抚台(巡抚)建议传教士们逃亡胶州港。”我将向您通报我们从中国收到的所有消息。

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

1900年7月25日

《传信年鉴》的印数巨大而且有15种不同译本,因而必须付出巨大的劳动,这就迫使编辑部将7月23日作为9月号的待印稿的最后交稿期限。但7月25日又为我们传来了一些重要的消息,以致于使我们认为应该提出一个新期限。啊!难道我们宣布的屠杀会是最后的大屠杀吗?我们不敢抱这样过分美好的希望。

在我们的读者接到本份《年鉴》的时候,笼罩着北京的神秘气氛就可能明朗化,我们可能也应该完全有理由感谢上帝拯救了我们的传教士及我们的慈善机构中的嬷嬷们,或者是我们应该牺牲掉如此多年的努力和献身精神。这是上天的秘密!无论如何,我们与我们的传教士则只能重复这样的几个字:“希望你们要有坚强的意志。”我们正是怀着这种听天由命的感情而发表了下述电讯。

南 满

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的会长德尔佩斯神父于7月24日给我们发来电报说：“布尔热瓦(Bourgeois)、维奥(Viaud)、勒格维尔(Leguevel)、巴雅尔(Bayart)和阿纽斯(Agnius)会士被营勇们杀死。”布尔热瓦属于贝桑松教区，诞生于1863年，于1888年出发前往满洲南部。

维奥(Viand, Jean-Marie)属于南特教区，诞生于1864年，于1891年出发赴同一传教区。

巴雅尔属于康布雷教区，诞生于1874年，于1897年出发赴同一传教区。

湘 南

杰里科的主教和方济各传教区司库贝特伦(Petron)主教阁下于7月24日写信告诉我们说：“我从湖北收到的一封电报，内容如下：‘范怀德主教阁下以及尊敬的神父约翰—巴波蒂斯特(Jean-Baptiste)被杀。’”

范怀德神父诞生于1842年，于1892年9月11日被选为宗座代牧。

报刊中还发表了有关中国传教区的其它一些极不吉利的消息。在今天，7月25日，我们尚既不能证实之，又不能否认之。

在事态的目前情况下，非常不幸，一切都是可能的。

中国闽北宗座代牧区的最新消息^①

该宗座代牧区创建于1696年，始终由马尼拉教省的西班牙多明我会士们主持，他们自1633年起就在中国工作。

该宗座代牧区过去包括福建省和台湾岛。自1883年以来，第

^① 译自《传信年鉴》1900年，第72卷。——译者。

2个宗座代牧区脱离了福建,它便仅由厦门市、台湾岛和福建原宗座代牧区组成。

目前,大家共计算到 34000 名天主教徒。小教堂的数目达 40 多个,学校的数目为 24 个。那里共有 19 名多明我会传教士和 13 名土著司铎。

尊敬的宗座代牧的那封译自西班牙文的书简,向我们介绍了其传教区所遇到的困难和所感到的安慰。他始终一如既往的给予我们和我们的那些施舍人慷慨可贵的帮助。

闽北宗座代牧玛索(Masot)的书简 成功与困难——主教的巡视

在该省辖地最广袤的福清县内,我们共拥有 500 名基督徒,大部分都在官井和海拉岛上。在我做传教士的那些年间,该县的基督徒、教堂和小教堂的数目倍增。1884 年,我被任命为福建的宗座代牧。我于是便决定在这些群岛的首府建造一座教堂,那里有许多名官吏居住。有一名司铎常期驻任海坛。而另外一位尊敬的马可(Marc)神父则巡视大陆上的会口,该神父所掌握的医学知识为使他获得异教徒的信赖非常有益,许多人都即将成为望教者。尊敬的马可神父以其巧妙的做法赢得了福清县某些大人物的青睐,他们虽然尚未受到这种信仰归化,但他们确实为我们做出了巨大的效劳。

这样一来,我们的影响便在整个县内传播开了,由于望教者的数目日益增加,所以我们便决定在福清城内建立一处住院,其中黄石就有 2 万人。一次天赐良机出现了,我购买了一块地皮,大家于是便开始施工,建筑一座教堂和一处住院。

在这个传播福音的阶段,主要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新教徒一方

的困难从来也未能幸免。但法国领事的帮助使我们得以战胜他们的不公正和粗暴的行为。

这座房子建成了,我认为最好是亲自去巡视该县,以鼓励那些新教徒和吸引异教徒们。这次巡视隆重地举行。我未曾预料到望教者和异教徒们的聚会人数如此之多,因为我知道这种举动会使官吏们感到不快,但他不可能阻止它了。无论如何,我要感激上帝,请求他保护一个已有如此良好开端的传教区。

大家可以在处于福清县管辖之下的不少于 60 个村庄中都发现有望教者。为了向如此之多的人施教,我们本来还需要平静地度过数年,但鉴于中国的现状,我们根本不可能受到优待。

福清的最高当局实际上确实很快便转而反对我们。福清县官使我们觉得尚堪称友好,但他很快又被另一个非常仇视我们的人取代了。

该官员具有很大名望的文士。尽管他仇恨基督徒们,但其本性仍不失善良,只是过于傲慢。我下达了一些指示以使基督徒和望教者们都谨慎行事并对他的权威表现出极大的尊重来。如果在他们亲自向官吏求援伸张正义时,受到了异教徒或新教徒们的指责,那末他们就应该以非常人道的表现来这样做,自称为其非常崇拜的臣民。除非有人询问他们,否则就不要说他们是基督徒,不要提及法国领事。这样一来,便可以避免许多灾难,该官吏甚至还不只一次地给予基督徒们公正的评价。但由于他被派往福清的动机就不是为基督徒们伸张公正,而是为了消灭他们,或者至少是阻止他们的行动。所以,他刚一到达,便到处都有谣言流传说他是前来迫害我们的,衙役们、新教徒、异教徒和所有人都成了这种令人惊慌失措的新闻的传播者。基督徒们被吓呆了,大批望教者都不再露面了,以避免招致他们已经预见到的欺压。

非常幸运,我已经指出这一点了,该官吏的心地善良。有一名文人可能是为了讨好奉承他,便诬告某些基督徒吹嘘自己没有任何可怕的地方,他们受到外国领事的保护。结果他倒了大霉,因为基督徒们轻而易举地驳倒了他的诬蔑和恶意中伤。该文人作为诬蔑者而受到了惩罚,被查实企图勒索这些可怜人的钱财。

这项决议使文人们陷入了最大的惶惶不安之中,但他们却成功地设法废除了这项决议。

该官吏的继承人是臭名昭著的万肃顺,他在11年间曾于福安县向我们发动一场激烈的战争。为了阻止归化运动,其上司无疑是做了最佳选择。万氏利用多次机会表现了他对于外国人的仇恨,特别是对传教士们的仇恨。他被认为是在朝中打官司时具有巨大才能和罕见巧妙本领的人。

他刚刚到任,在湄州便开始了一场仇教。我们在那里有几个新入教的¹家庭。有人想强迫他们赞助异教徒们节日设宴开支。基督徒们理所当然的拒绝了。异教徒们抢劫了新教徒们的住宅,毁坏了他们的耕田,新教徒们一无所获地求助于官府,异教徒未受惩罚地继续他们的抢劫活动。

湄州的例证很快就由其它地方的异教徒们所模拟,那里的基督徒就基本如同在各地一样,都居少数。在东岸,20个新教徒家庭从其村庄中被驱逐出去了,他们的住宅及其耕田均被没收。所有人都逃往古邑,他们在那里居住了四个多月却未能获得公正对待。

我非常害怕这个兴旺发达的传教区会彻底崩溃。经过法国领事的调停,我上诉福州最高当局,他们最初只给予我们一些吱唔搪塞的回答。然而,法国领事讲得既气势汹汹又坚定不移,总督害怕引起非常严重的纠纷,于是便下令囚禁了这些恶性事件的主要肇事者。他为了此目的而派遣一位官吏前往福清,以研究全部事件以

及万肃顺的行为。基督徒们得以安全地返回他们的村庄。大家将他们的住宅和耕田都还给了他们并支付了少量赔款。

当重新恢复平静时，我便决定对福清县进行第二次巡视，以鼓励这些可怜的新教徒们。我竭力地安慰他们，鼓动他们坚持不动摇，首先嘱咐他们进行谦恭而虔诚的祈祷，因为这种祈祷一直可以上升到天并从上帝那里获得一切。

由于海盗频繁出没于所有这些中国海中，他们在福建沿海为所欲为，所以总督大约于同时派出了由百余名士兵陪同的一名特使，以便从海岸清除这些海盗。他们以捉拿海盗为借口，从关押囚禁基督徒、无抵抗能力的贫苦耕田人而开始。由于法国领事高乐待(Claudel)先生的支持，我才得以获准使总督研究事态。其结果是释放所有被囚禁的基督徒，退还由衙役向他勒索的钱财。从此以后，我再未获知万肃顺曾粗暴虐待过我们的基督徒。

仅仅在福清一个县，我们当时就有约 300 名已领洗的基督徒。至于那些在近年来曾表现出受归化为基督徒之愿望的人，可能会多达数千人。但为了替这些人举行洗礼做准备，我们需要数年的平静和大幅度地增加财源。

对于这个如同法国教区一样幅员辽阔的县来说，福清和古邑这两个教堂已经远远不够用了。为了建筑这些教堂就必须借债，而我又不知道应该如何偿还。天啊！这些债务再加上官吏的敲诈勒索，这就是一名可怜的入华传教士主教永无尽头的噩梦。

近年来，我曾试图在其它许多县创建新的传教区。工程进展很慢，本来为此需要开销 100 法郎。愿上帝能鼓励某些具有善良的心肠的人前来帮助我。

在华殉教者的名册

随着稿件的逐渐寄达,我们及时地发现来自天主教教区的那些令人非常悲伤的书简和我们在中国发生的可怕事件的书简。我们尚需要在一幅简表中总结教案的主要事实。这是宗座代牧区《黄金书》中新的一页。高级神职人员、欧洲和土著司铎、传道士、普通基督徒、望教者们竞相表现其英雄主义和勇敢精神,以为基督徒和圣教争光。

北 满

北满宗座代牧蓝绿叶(Monnier)致外方传教会神学院院长德尔佩斯的书简

7月初,本省副都统1900年8月13日的一道命令张贴在各城市和乡村。它向民众通报说,欧洲的27艘战船已在天津被击沉,无数的外国士兵都被中国人杀死。这条虚假消息使整个国家处于一种群情动荡和激昂之中。从此以后,便不再存在消灭欧洲人与基督徒的问题了。这项邪恶的计划很快就被付诸实施了。

在北满的北端,我们刚刚在大镇余庆街一所学堂立足,那里有我们新建的基督教小会口。在衙役们的帮助和煽动下,义和团开始活动。有五名基督徒被擒,他们的双臂和双腿均被砸碎,刚刚竣工的学校已遭拆毁。

教友们很快就向我报告了降临到他们各自县中的灾难。但由于我们没有掌握任何有关在满洲之外发生情况的具体资料,所以我们并不想在风暴面前逃走而将我们的基督徒留给异教徒们主宰。

然而,葛里荣(Georyon)和李纳(Lenay)神父在北林子的处境

很危险了，他们暂时集中于那里，我写信给他们要求他们前来巴彦苏苏与我相会。由于他们无法白天旅行，所以准备于7月15—16日夜间出发。已经备好马鞍子，由余庆街基督徒们派来的一位驿使恰恰于此时到达。驿使叙述说，基督徒们受到了从未有过的侮辱虐待，李纳神父应立即决定直接赶往那里去帮助他们。葛里荣神父挽留了他，但此人徒劳无益地辛苦。该神父骑着其教友的马出发了，径直向北走去，而不是前往巴彦苏苏。他奔驰了整整一夜，次日晨九时到达了余庆街。就在这同一天，“守斋者”们冲进了住院，已经失去了任何希望。该神父高声呼叫：“让所有基督徒们都前往小教堂，我将为他们举行赦罪仪式。”

他刚刚进入祈祷室，陪同他的传道员便发现神父倒在地上。他希望搀扶神父并询问神父怎样了。他仅在此时才发现传教士的胸膛被刚从窗口射来的一颗子弹穿透了。传道员被吓呆了，他在激烈的殴斗中成功地只身逃脱。但他跑出了百余步之后，又从小教堂一侧返了回来。大火已经从各个方向腾空而起。大批基督徒如同神父一样死于那里了。

当葛里荣神父告诉我李纳神父已死亡时，便询问我是否愿意派遣神父到北林子取代该神父。他本人将前往余庆街，以试图挽救基督教机构的某些残余，再为我们那些被杀害的教友们举行葬礼。我在答复他时，向他下达了迅速赶到我处来的命令。但由于巴彦苏苏距北林子有两日行程之远，我的书简没有及时寄到他手中，他已经出发了。他被“守斋者”们杀害了，这一切都获得了余庆街官府中某些人士的赞同，甚至还可能是由他们煽动的。我们在最后一刻才收到了苏西聂(Jean-François-Régis Sousignet)先生逝世的消息，他于1854年出生于瓠河上的莫尼斯托尔(布伊教区)，于1882年11月22日出发前往满洲。

南 满

南满巴黎外方传教会会长舒莱(苏赖,Choulet)致辛纳(Hinard)的书简

1900年7月9日于营子(牛庄)

如果说我在青年时代曾想象过殉教和仇教,那么我今天却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在我们的可怜住院中,该陆续造成了多少废墟啊!我们的教堂和我们的设施很快就会只剩下一片灰烬了!我们暂且撇弃物质损失不谈,尚有纪隆主教被活焚、埃莫奈主教被活焚、李若望(Jean Li)神父被焚,圣一十字学院的修女们和阿尔贝婷(Albérline)修女被活焚,共有近300名基督徒在盛京的的教堂中被活活烧死……这一切太悲惨了。

纪隆主教率领他的基督徒小部队顽强地坚持抵抗义和团。当他们发现中国士兵们到达并用他们的大炮瞄准大教堂时,便命令停止交火并让其基督徒们返回教堂中。他本人则带上其主教装饰勇敢地等待着死亡。大家向我断言说,中国士兵共有2000名之众,由“二大人”(继总督之后的首席官吏)都统率领。

那些被杀的人从善良的上帝处获得了他们所期待的恩赐。但对于我们那些可怜的基督徒又该怎样讲呢?他们如同野兽一样地遭到了四面八方的围攻;对我们的童贞女和女婴们又该如何讲呢?她们如同奴婢一般被押走并如同驮兽一般被出卖给异教徒们。

为了使您对于我们敌人的残酷行为有所了解,请允许我向您讲几句有关我们已故的木兰(Moulin)神父的话。他于6月24日死于伤寒热,已被安葬有12天了。当牛庄亭城堡被毁时,教堂也着火了。这些暴徒们于是便挖出了这名可怜神父的尸体,在摧残了尸体之后,又将其碎尸片抛进吞噬了教堂的烈火中。

在圣一若瑟庄园中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挖出了已逝世15年

的海伦(Hélène)修女的尸体,烧去她的遗骸及其衣服的残余物。

在盛京沈阳,现在只剩下堆堆瓦砾了。在东甲房城,有40多名基督徒们在保卫教堂时死亡。负责该岗位的善良的夏阿肋(Alerandre Hia)遭擒,被押解到盛京后被斩首。在小黑山,67名基督徒也丧失了性命。小黑山的维奥和巴雅尔(Bayard)神父、广宁的阿纽斯神父都携带他们的女孤儿逃走了,想在别处得到一定程度的安静。很快便有风言流传说,他们的蔽身之处已被发现。他们于是便藏身于大草丛之中,在那里没有任何食物地度过了两天。第3天,暴徒们发现了他们。这些暴徒为了更容易的地夺取他们的马匹和兵器,可能是使用了一种策略,这就是以给这些人送食物为诱饵。由于这种虚伪的人道行为,神父们感到放心了。他们未加介意地被夺走了他们所有的一切。我于此时接待了一位驿使,并且通过此人而把他们召到这里。他们获得消息后便上路前往营子。

我没有发现他们到来,于是便向他们派出了另一名信使,信使向我汇报说,三名传教士和陪同他们的四名基督徒已被异教徒们阻止在距谢子屯有几法里的村庄。三名神父已遭枪杀并被抛尸于河中。他们的四名同伴未被枪毙,而是被捆绑起来并沉入了同一条河中。信使于途中看到了许多被杀死的人(男童、女童、老翁)。有一个年近四旬的人的脖子被砍断了一半,仍在喘息。他是接近了垂死的人,但却未能从他的嘴里得到一句话。

李·莫里斯(Maurice Li)神父曾是土司,他与三名陪同他的基督徒一并被杀。这就是在南满被杀死的第三位土司。

在连山,他动用尚不足2500名士兵,就战胜了布尔热瓦、顾维尔神父以及武装起来捍卫堡塞的基督徒们的抵抗。最后,由于两名传教士未能成功地寻找到另一只船,于是便与约12名勇敢的人栖身于一座古庙之中,紧傍大塔山。追杀者们可能动用了大炮。神父

们耗尽了所有的铅弹,于是便砸碎了其衣袋里所携带的银元并将之装进其枪筒子中。当缺乏火药时,布尔热瓦神父焚烧了他随身携带的纸币。他们最后在岩石上砸坏了他们与其同伴们所有使用的武器,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死亡。他们都被砍头了。两名神父的头颅被带到了宁远州。同时带去还有玛丽(Marie)和苔蕾丝·穆(Thérèse Mou)的人头,她们是连山育婴堂的院长。

为了不再过分繁琐的地论述,我们就用两句话来描述我们现时的处境。在我们的 25 个县中,仅仅有三四个仍保持使其中心未受损害。因此,从物质观点上来看,我们的破产是彻底的。60 年的工作、辛劳、艰难、开销(该传教区创建于 1840 年)都毁于一旦,在不足一个月期间便使这一切都化为乌有了。

从精神方面来看,如果说我们记录下了某些很痛苦的软弱行为,那么我们也获得了很大的安慰。“义和团”以盛京总督的名义发表了一道煽动所有异教徒焚烧我们教堂和屠杀我们基督徒的命令。许多信徒、男人、女人、青年、儿童都是直到最后一口气仍在勇敢地重复说他们活着永远是基督徒,而且希望死仍是基督徒。非常不幸,在那些新基督徒中,背教的人数相当多。大家是否会对此感到极其惊讶呢?不!大树尚未有时间将其根系扎进土壤中,这场来势如此凶猛而又突然的风暴便将它刮倒了。

直隶东南部

直隶东南部张家庄住院的会长、耶稣会士谢内沙神父致
亚眠耶稣会士省会长神父的书简

耶稣会发现其殉教者们的队伍于 6 月 19 日又增加两位“上帝的选民”,这就是武邑城的安德鲁埃和伊索雷神父。

尊敬的会长神父尚未确切理解到北方形势的严峻程度,将伊

索雷和李西蒙(Li Simon)两名神父派往本处,让他们在此略作休息。

这两名神父于星期六16日到达住院。由于义和团又开始侵犯直隶南部,所以现在很容易预料到已经再没有能通过此地的任何办法了。大家向尊敬的神父伊索雷建议重新启程赴其辖地,以便领导那些很快即将面临义和团袭击的基督教机构。他本人自己提出要再度离去。由于沿途有危险,我留给了他充分的自由。但这位忠诚的神父对我说:“您的意图对于我便是一种命令,我今晚即将出发。”

尊敬的伊索雷神父自己提议要经由武邑。这是一条不太安全的道路,他于清晨一点钟左右出发,于九时左右安全无事故地到达武邑。但他刚刚进入住宅,一个叫作圈头的大镇的义和团成员便进入了武邑县,以要求释放他们的某些被囚的同党。该官吏立即令人关闭了大门以阻止他们的活动,但为时已晚,义和团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一切。

当获悉有两名欧洲传教士(尊敬的伊索雷和安德鲁埃神父)在场时,他们就企图射击。

约在下午5时左右,门房便意识到大队开来的义和团即将炸掉车辆通行的大门,于是便向正从侧门上了望的安德鲁神父指出了这种危险。神父返回了院子中并关上了侧门,但该侧门也无任何抵抗作用。义和团砸破大门并且冲入内宅。这两名神父于是便前往小教堂,他们必须在那里跪着等待其刽子手们的到来。大家发现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被长矛戳穿了身体。我们的任何人都未曾见到过他们。但住院有两名友好的异教徒邻居,他们叙述了自己曾见过我们的两位神父做这种姿态。他们声称安德鲁埃神父还显示过某种活着的迹象,这就有些令人质疑了。由长矛刺下的伤口可能会很

多,因此这就是我们的两名殉教人。

过了某些时间之后,有一封电报通报了另外两名耶稣会神父的被害,这就是尊敬的邓恩(Denn)和芒金(Mangin)神父。

“尊敬的邓恩神父于1847年出生于里尔,很晚才进入修会。他最初供职于斯卡贝(Scabert)银行,后于1869年受赴遥远地区传教活动的吸引,于是便投考于亚眠的使徒学校。1872年,他便进入了耶稣会初修院,于同一年出发赴华时尚为初学修士。他于1878年被授司铎神品,先被任命为司库,又于以后数年期间领导张家庄的教会学院,接着又主持传道员师范学校,他为这些学校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仅是在数年前才离开这一职位被派往古城县,在那里接受了作为其最高愿望之圣宠的殉教。”

“尊敬的芒金神父属于梅斯地区的一个贵族家族,于1855年生于维尼(莫塞尔)。他成长于梅斯的圣—克莱芒学院。在该学院附属亚眠省之后,他于1875年进入了圣—阿瑟尔的初修院,在一段时间曾于列日(比利时)的圣—塞尔韦学院任教授。但他很快(1882年)又出发前往中国传教区,充满着活力和决心。他于1885年在那里接受司铎神品。于是,立即便将古城这个重要的县托给他了。他的管理才能使他很快就占据了一个很明显的职位。他于1890年被任命为河间府南部的司铎。这些职务使他与中国当局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他以其坚强的性格赢得了中国当局的高度评价和尊重。在近期,他又迁居景州并主持周家河附近的育婴堂。他在那里因保护其基督徒而死亡。”

湖 南

汉口方济各会士司库比科利(Piccoli)神父致波特伦(Potron)的书简

1900年7月20日于汉口

您可能已经收到了向我通报范怀德主教阁下和安守仁修士被杀的电报。

下面就是这件事的发生经过。刚一宣布这场灾难,魁林(Quirin)神父立即致信不在那里的范怀德主教。经过这封信的告示之后,主教阁下便找来正在附近的安守仁修士,他们二人同行前往衡州府,其目的是救助他们在那里的教友和应付危险。

当他们到达城下时,甚至就在他们登陆下船之前,范怀德主教就曾向当地的首席官吏道台递交了一封急信,以向他请求保护。送信人被发现了,或者是道台获知了他们的到来行踪,于是便亲自出面煽动平民百姓们。由于始终有混乱的一群人集中于河边,所以他们便跳上了渡船以捉拿我们的教友、主教及其同伴,挖掉了他们的眼睛并在他们身上滥施极刑,用竹板子非常残酷地殴打他们,以至于安守仁修士经过两个小时后便咽气了,主教大人又过了两个小时后才死亡。

湖南的基督徒们值得赞扬。这不仅仅是由于他们的信仰很坚定,而且还是由于他们作出了全部努力以拯救教士们。

北 京

自从联军解救北京之后,我们仅收到下面唯一的一份正式电讯

9月3日于上海

董文学(D'Addosio)、艾儒略(Garrigues)、金葆光(Doré)、文德来(Chavanne)、李·巴尔特勒米(Ly Barthelemy)、聂伯录(Nie Pierre)、修女若莉雅丝(Jaurias)、两名祖母会修士均已死亡。甘肃和南堂设施被夷平。

前四名受害者均为欧洲遣使会会士。文德来会士属于里昂教区,入华仅有四个月。另外两位传教士都是土著司铎。该修女是北

京爱德修女会的会长,另外两名修士均属于位于里昂附近的圣一热民斯—拉瓦尔的马利亚小兄弟会。

蒙 古

圣母圣心会修道院长贺歌南(Van Hecke)神父的书简

韩默理(Hamer)主教、海芒(Heirman)和玛莱(Mallet)神父被杀。韩默理主教是蒙古西南部传教区的宗座代牧,他是1885年从斯格脱修会(圣母圣心会)派往蒙古的最早四名传教士中的最后一位残余者。他于1840年8月21日诞生于尼梅克,于1864年8月10日受司铎神品,于同一年加入我们的修会,1865年出发赴蒙古。

1878年10月27日,该神父举行派立礼之后成为特雷米特的领衔主教,于次年出发前往甘肃。1889年,他被调任到蒙古西南部的宗座代牧区。在去年3月间,他将主教府从西部地区迁移到东部地区,因为后一个地方的归化活动更为突出一些。

海芒和玛莱神父的均属于中蒙古宗座代牧区的东部县。

尊敬的海芒神父于1862年10月24日诞生于特尔蒙德(Termonde)附近的贝拉尔。他于1883年进入了斯格脱初修院,于1888年2月出发赴中蒙古的宗座代牧区。

尊敬的玛莱神父于1870年10月14日诞生于赫特尔—勒—魏克玛(林堡)。他于1891年9月进入斯格脱初修院并于1891年9月出发赴中蒙古。

9月16日,从大沽出发的东蒙古宗座代牧阿尔叶步司(Abels)大人签署的一封最新电报,传到了斯格脱神学院:“司神父(Segers)殉教,被一名官吏杀害。王神父被下狱。5个住院被焚烧。八沟地会口几乎被毁。在围场,13个基督教机构被焚,100名基督徒被杀。400人既无家可归,又无食物充饥。在松树镇,有20多名

教友继续处于危险之中。”

东蒙古宗座代牧区共有 28 名传教士,其中 8 名为荷兰人。主教本人是荷兰林堡威尔人。司神父(Joseph Segers)于 1869 年 10 月 20 日诞生于圣—尼古拉(瓦斯)。1889 年 9 月,他进入了斯格脱初修道院并于 1895 年 9 月出发赴东蒙古。他的传教同伴王神父自 30 多年以来便一直是司铎。

山 西

9 月 23 日,正当本期《年鉴》付印之际,我们通过邓神父(Bettembourg)而收到了范国梁主教的下述电文,它非常简洁地说明了仇教远未停止。

“在山西,格拉西(Grassi)主教、弗格拉(Fogolla)主教、埃利(Elie)和巴拉(Balat)神父以及七名女教友被杀。立即通知方济各会士们的司库。”

格拉西主教于 1833 年 12 月 13 日诞生于彼埃蒙的卡斯特拉佐(亚历山大教区),自 1876 年 1 月 20 日起任山西北部的宗座代牧。

弗格拉主教于 1839 年诞生于蒙德特尔吉奥(蓬特莫利教区)。他于 1898 年 7 月 18 日被任命为格拉西主教的助理。

中国北京的教案

我们在《天主教传教区》中发表了范国梁(Favier)主教逐日记载的日记,各种新闻报刊都匆匆忙忙地作了转载。这位著名的主教于这篇重要文献之前加了一封书简,于其中对文献作了一番概述。我们迫不及待的在《传信年鉴》中对此加以转载。

我们的基督徒非常令人钦佩,所有人都以最大的虔诚祈祷并且毫无畏惧地为此献出其生命。我们派往公使馆的诸多信使都处

于死亡的危险之中,其中的不少人尚未归来。8月10日,他们中的一个人为了去通知公使,报告我们正处于绝境之中,但此人已经牺牲。可怜的年轻人啊!他被活活地剥了皮,义和团将其皮肤和头颅陈殓在距我们的围墙只有数米远的地方。

我们必须眼睁睁地看着女基督徒们失去了她们为喂养其婴儿所拥有的很少一点口粮。她们很久以来就没有奶了,只好用小白铁片充作汤匙,将稀饭糊喂进了她们的那些可怜的婴儿口中。事实上,在这两个月期间,这里的30多个新生儿又进一步增加了中国的人口。

一日清晨,在举行神圣弥撒之前,于夜间分娩的这些勇敢的女基督徒之一跪倒在我的脚前并对我说:“主教!主教!让人送给我一碗小米吧,好让我有点奶。”

我只好哭着拒绝给她小米,因为我自己连一点米也没有了。

大家用树叶、大丽花和美人蕉根、百合茎块来煮炊。所有这一切都被碾碎成稀糊,从而增加了我们分给每个人的很少一点口粮。

大家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极力躲避炮弹,尤其是躲避地雷。共有200—300个孩子在嗷嗷待哺,闷热使我无法入睡。我自认为是听到了准备屠宰羔羊的咩咩叫声。此外,这些呼叫声日益减弱了,因为我们共埋葬了170名这些无辜的人。

痛苦、饥饿、疾病、子弹等等使基督教人口的死亡超过了10%以上。被埋葬在我们花园中的尸体数目已经超过了400个了。所有人都是作为优秀基督徒而死亡的。他们都声称:“我们是为我圣教而死亡的。由于某些人对宗教怀有仇恨,所以我们才被杀。善良的上帝将会赐给我们天堂。”

我们的爱德修女们是令人钦佩的。她们可能经受了比我们更大的考验,因为她们失去了为哺育其婴儿所必需的一切。除了一、

二个人可以用神经衰弱来为其畏惧辩护之外,所有人都表现出了一种真正的男子汉气概。最后一颗地雷那令人惊恐的震动使尊敬的会长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这就是若莉雅丝修女。她已经患病并已高龄 78 岁。她是愉快地死去的,因为上帝仅仅是在拯救她之后把她带走了。

我对于传教士们说讲些什么话呢? 我的助理主教频频到处出现,负责照顾一切,鼓励、安慰、搀扶所有人,而且还不停地穿行在最危险的地区,不顾呼啸而来的炮弹的子弹和袭击。修道院长与其青年人日夜监视教堂的屋顶、街垒和工事。神学院的那些大院士与我们的一名尚未进入修会的欧洲青年教友,勇敢地取代了那些已经死亡或受伤的士兵,他们如同真正的水兵一样使用勒贝尔式步枪。其中的许多人都被子弹击中。但由于上帝的保佑,没有一个人死亡。

我们的司库继续以一种令人惊讶的冷静行使其使徒的职务,他预见到了一切。虽然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但却以一种非凡的毅力忍受了贫困和艰苦。我们的土著教士也与日俱增,从而使住院多少恢复一点秩序了。他们指挥着那些劳工们,监督分配生活用品、维护治安和为死者做最后的安慰。唯有我自己没有做什么重要的事。我几乎始终都蜷缩在自己的房间中,以祈祷仁慈的上帝、圣母、善良的天使,即我们所有的神圣保护神。我曾试图把自己在类似情况下所必需的驯服、毅力和沉着的精神为自己保存下来并传给他人。

我如果将受害者的数目约估为 15000 人,那么我也并不认为是过分夸张了。15000 名受害者被烧死、碎尸并被抛弃于江河中,而都不愿意简单地做能够救他们一命不死的偶像崇拜式的跪拜。我并不认为有 2% 的人会以某种迷信行为来赎回其生命,他们

心里肯定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们传教士中没有一个人擅离职守,尽管官吏们重复提出要求,希望派兵护送他们并将他们置于安全保障之下,但没有一个人放弃基督的信仰。时至今日,依然如此。尽管已经发来大兵,但仍有 25 名传教士被包围于他们的住院之中。愿上帝保佑他们。

在北京,共有 3 座教堂、7 座大祈祷室、学院、医院、圣一若瑟修女(土著)们的设施被夷平了。埋葬着有自利玛窦到都士良(Sarthou)之间(3 个世纪)传教士们墓葬的墓地均遭亵渎,墓碑被推翻,遗骸、甚至是棺木也都被烧成灰烬并随风飘扬。唯有弹痕斑斑的北堂尚屹立在那里。董文学、艾儒略、金葆光和文德来会士均在北京被杀,传教区中的数名中国司铎也都遭到了同样厄运。

宗座代牧区中共包括 577 个基督教会口,过去大部分都曾有过小教堂,现在却只勉强有四分之一了。基督徒们的住院均被抢劫和烧毁。据我所知,北京仅有一幢住院尚存在着。

总而言之,这几乎是一场彻底的毁灭,40 年的辛勤工作已毁于一旦。但传教士们的勇气却并非如此,我们怀着必定会成功的信念即将重新开始,因为“殉教者的鲜血是基督的一颗种子”。然而,上帝却希望惩罚这个不幸的中国,因为它自数世纪以来滥用了上帝的圣宠。

我们希望上帝还能够原谅,许多人(甚至是在那些官吏之中)都在所犯的这些暴行中清白无辜。我们爱护并将永远爱护这些可怜中国人。为他们和为我们自己祈祷吧!

湘 南

有关湘南范怀德主教被杀的详细情节

我们最近已经通报湘宗座代牧主教范怀德阁下及其两名传教

童哲西和安守仁神父的死亡。他们都是现在正血溅中国的这场悲剧事件的受害者。我们当时缺少有关这些恐怖性杀戮的具体资料。同一传教区的魁林神父向我们通报了这一切。

在7月3—4日夜間，一名特派官吏前來向我報告說，有一群騷亂暴徒搗毀了衡州新教徒的住宅，天主教傳教區受到了威脅。

我对特派员说：“如果具有迫在眉睫的危险，那就应该毫不迟疑的注意保护我们自己的住院和圣婴院！”

他回答说：“根本不可能给予你们保护，但你们可以通知贵主教迅速返回衡水府。如果他认为这样做很好的话，那么他从那里可以很容易地率领欧洲传教士们撤回汉口。”我觉得这封信具有某种异常，当时的整个衡州似乎都很平静。我立即将此信转给了范怀德主教阁下，因为我深知他正忙于对一个公共小教堂的建筑工程监工，它是去年由异教徒们焚烧的。主教大人对于这一通报却无动于衷，坚信这是一场虚惊。因此，他不急于离开该基督教会口，因为他在那里与该县的传教士安守仁会士相会合。

然而，在衡府附近的主教府和圣婴院中爆发了某些恐怖性事件。7月4日中午前后，也就是继特派员那本身就为时太晚的拜访之后，约10小时的时候，一大群穷凶极恶的家伙突然间闯入了与主教府相毗邻的教堂，然后是入侵了住院院落及其周围。他们很快便开始了具有某种凶暴性的破坏文物艺术的行动。伴随着杀人犯们的呼叫声，两名中国教士得以未被发现地从主教府中逃了出去。童哲西神父和我只争取到一点时间，登上楼层并躲避到我的房间中。我们在那里藏身两小时，而人群却在外面狂呼乱叫：“杀死洋鬼子！”接着，突然间在我们身旁响起了一声喊叫：“他们都在里面！”我房间的门立即被撞开了，我们束手就擒。然而，打教者们就如同被我们的出现吓呆了一般地愣神片刻，从而使得我们两个人得以

从这群乌合之众中通过，共同走下楼梯到达我们主教府大门的门坎。但在那里，院子中发疯般的人群挡住了去路。拳头和石头已经像雨点般地从四面八方落到了我头上并将我打倒在地。若无某些勇敢基督徒们如同出于神意一般的帮助，我便必死无疑了。这些勇敢的人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从死亡中拯救出来，然后又将我抬到了距那里有 15 公里的安全地带。

仁慈的上帝却以不同的形式支配着童哲西会士的命运。当此人发现由骚乱者们占据了主教府周围时，便返了回去并试图从一个秘密门中逃走，令人遗憾的是他未能成功地打开大门。他被迫原路返回，从而落入了狂怒不羁的暴徒们手中，他们用长矛和木棒疯狂殴打他，使他负了致命之伤。后来，当该殉教者咽气时，他被裹在一捆浇上了煤油的麦秸中并被焚尸灭迹。

这一滔天罪行酿成之后，大批异教徒的乌合之众便开始放火烧毁教堂、住院、基督徒们的住宅，其中包括收留有近 200 多名圣婴孤儿的育婴堂。

从这个灾难性日子的翌日起，范怀德主教大人便收到了童哲西神父死亡的消息，同时又获知了其它所有灾难。次日，主教大人阁下在安守仁神父的陪同下乘船南下衡州府，希望能在那里向地方当局起诉以消除最大的灾难，这是尊敬的宗座代牧主教的一种令人痛苦的幻想。

在距主教和安守仁神父应该下船登陆地点具有一定距离的地方，他们被识破是欧洲人，于是便在沿途发出了警报。当船舶在衡州靠岸时，眨眼之间便被装满暴徒的小舟包围，立即便开始了一幕野蛮粗暴行为的悲剧。范怀德主教的小舟受到了攻击，而这群狂怒暴徒中的部分人扑向了他们的行李，另一部分人则猛烈袭击主教的人身，对其头颅的一阵当头棒喝便将他打倒在地。他后来被拖向

了河岸,同时被拖走的还有安守仁神父。

正是在那里,面对一大群观众,殉教者的荣耀正等待着他们,但这已经是在经过令人恐怖的痛苦之后了。

他们二人都变成了其刽子手们的玩物。安守仁神父的一只眼睛被挖掉,浑身惨遭痛打,经过一个多小时之后便咽气了。其尸体被这场罪行的肇事者们完全烧毁了,而且就在他刚刚处死的地方。

范怀德主教阁下所遭受的酷刑拷打尤为令人发指并持续了约四个小时。从船舱出来之后,他的双眼便被挖掉,众人脱去了他的衣服,打得他遍体鳞伤、皮开肉绽。最后,人群对他施用木桩刑。由于他在遭到如此酷刑之后仍在喘息,所以其刽子手们便用短木棍把他彻底击毙了,后来又焚烧了其尸体。

在范怀德主教的土著从教人中,有一名70多岁高龄的司铎。此人暂时返回其湖北的故乡,因为他的原籍就在那里。另外六名中国神父仍在湘南,但他们必须采取极其小心谨慎的姿态,以便不被异教徒们辨认出来。他们化装为平民百姓,穿越了该宗座代牧区的各县,尽最大努力从灵魂和思想上去拯救我们的那些分散而又始终受到仇教者们围追的基督徒们。

毫无疑问,在由地狱掀起的这些恐怖性折磨的日子里,湘南宗座代牧区于上天获得了保护主,而我们却在它强有力的干预下等待恢复和平和宗教修会在中国获胜。这是至今仍在我们耳边回响的一种撕心裂肺的喊叫声:“救命啊!”我希望让你们能够听到的正是这种失望的呼救声。愿上帝为支持我们而大动慈悲之心!没有任何一名基督徒不想前去帮忙其中国的教友们。在我们等待能估计出损失总数时,我们将请求做一种虔诚祈祷的施舍,它会使我们些不幸的基督徒们坚定其信念。

还有其它一些具有很高价值的书简寄到了我们这里,目前仍

从中国所有受打洋教事件之苦厄的传教区传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将在下一批寄出的书简中描述这一切。但所有的传教士都为不幸的基督徒们发出一种绝望的呼吁，我们也全心全意地响应这种呼吁。

译 后 记

《清末教案·法文资料选译》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选自法国外交部的《外交文书》(俗称“黄皮书”)中有关中法教案交涉的外交文件。其中主要是选译了1894—1899年间法国外交部与驻华公使馆以及驻某些地区的领事馆之间的来往电文,也有少数法国外交部与罗马教廷各机构之间的交涉电稿。这些外交文件原稿被汇编成册,由巴黎的国家印制局(Imprimerie Nationale)出版。第二部分是选译由法国里昂年鉴出版社(L'Editeur des Annales)出版的《传信年鉴》(Annales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1856—1900年)。这套年鉴是18世纪的《耶稣会士书简集》(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1702—1781年,其编印本一直持续到1843年)的继续,它主要是刊布由新旧两个大陆(当时欧洲人将西半球的美洲称为新大陆,将欧、亚、非三大洲称为旧大陆)的传教士们寄回法国的书简,同时也包括有关这些地区的传教区与传信事业的文献。当然,本译著选编只选译了其中有关中国教案的部分资料。

1985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年会。会后在游览博格达峰中的天池时,福建师范大学的陈增辉教授提出要我承担由他主编的一套《中国教案史资料》中法国资料的翻译工作。我当时立即婉言辞谢,因为一来自己很忙,二来近代史也不属我所的研究工作范围。后来,陈增辉教授和我院宗教所高望之先生

多次找我,称原来上海承担翻译的先生由于各种原因已谢绝,希望我来翻译。面对学术界老前辈及诸同仁的一再催促,我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此项出版计划干干停停,一直到1992年,中华书局的陈铮先生、侯明先生与福建师范大学的徐恭生先生再次来找我,催促尽早交稿。恰恰于此期间,译者曾三次赴法国作较长时间的学术访问。1994年春,陈增辉先生不幸与世长辞,他在弥留之际,仍然念念不忘这件事。但我个人却杂事缠身,只好求我的老同学外交部的法文翻译杨佩纯同志帮忙,又适逢杨佩纯同志到我国驻比利时使馆工作四年,她远在布鲁塞尔利用工作之余翻译了一些,再将译稿从布鲁塞尔携回国内。可见译事实在不易啊!不过苍天不负有心人,今天也总算使这部译著面世了,于苦涩的回味之中顿生一丝欣慰。

近代入华传教士大都有汉名,但实在难以查出。译者对1800年之前的入华传教士尚为熟悉,对于近代则颇为陌生。此外,这些文献中提到中国的一些不见经传的小地名、普通人的名字以及其他一些用法文拼写的中文词,大都极不规范,而且又完全是根据当时当地的方言拼写,所以颇难复原。当我一接触这些外文资料时,便向陈增辉教授提出无法解决此类问题。当时陈先生答应代为查对。但由于陈先生年事已高(他于1994年逝世时享年91岁),遗愿未酬。译者后来曾请教陈先生的出蓝弟子林金水和谢必震先生,他们于1994年5月复信说甚为棘手,只好音译,责任由他们负吧!当然,译者为了尽可能地核对,真可谓“读破书万卷”了,无奈遗留问题尚不少,只好音译,谨请读者们到时自行检索去吧!

书中选择的资料,均系陈增辉先生生前亲自选定,指定我们翻译的。陈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选择得甚为得体。当然,由于年龄、语言以及资料匮乏等原因,尚有不少问题。例如,外交文件选得很

少,因为在国内各大图书馆极难觅得。《传信年鉴》也只从 1856 年(第 28 卷)开始选译,而 1856—1900 年的资料又有一部分因刊物暂缺而未译。在已翻译的部分,法国传教士较活跃的东部藏区(康区)、内蒙(北直隶)以及北方数省的文献均未多选,而这些地区的教案既重要又不大为人所熟知。对于这些问题,译者曾与陈先生多次交换意见,陈先生当时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见到本书的问世,故一再来函声明可以忍痛割爱。译者完全尊重陈先生的意见,故形成了今天奉献给广大读者的这本书。

自鸦片战争和西方列强频频将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之后,西方入华传教士们在华的行径就与 16—18 世纪时完全不同了。他们不但强行在中国传播洋教,甚至还仰仗殖民列强的坚船利炮和洋枪队的力量,霸占中国人的房地产、草菅人命、欺压良民,无恶不做,无所不用其极。洋教士们这样做,必然会激起中国广大民众以及大批具有民族正义感的官吏们的义愤,举国上下纷纷起来打洋教,驱赶传教士和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焚烧教堂,确曾打死过某些洋人。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但不支持本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相反却往往只会赔款、处罚曾支持过民众打洋教事件的官吏和镇压参与教案的群众。但在法国外交文书和传教士们的书简中,对参与打洋教的群众和支持打洋教的官吏们统统诬称为“匪徒”,竭尽攻击和谩骂之能事,甚至语言污秽,不堪入目。对于这一切,我们应该冷静对待,客观分析。实际上,我们应该用“另一只眼睛”看待这一切,透过现象而看到本质。这是大家在阅读此书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本书是在多方面的帮助下才得以面世的。陈增辉、高望之、涂世华、徐恭生、林金水、谢必震诸先生曾在翻译中帮助过我们,中华书局的领导以及近代史编辑室的陈铮、侯明和沈致金等先生又颇

费心血地做了加工。于此特向他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再加上此书的特殊性,错误和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耿 昇 1994年国庆之夜灯下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